

民國之死

與其說中華民國是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終結的，
不如說是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顛覆的。

余杰——著

從落第秀才到割據軍閥、
從庶民到獨裁者、
從國學大師到外國使節，

二十五篇人物肖像，揭開被掩蓋的真相，
還原被抹黑的清白。

中正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丹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
楊憲宏

台灣文史工作者、作家
管仁健

推薦

獨立作家余杰史學研究代表作，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的最佳讀本。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次

自序　天下已逝，邦國難成

第一卷　武人的落幕

吳佩孚：五色旗才是真民國

孫傳芳：曇花一現的「東南五省門羅主義」

張作霖：「好總督」與「壞國王」

第二卷　黨人的崛起

蔣介石：危機四伏的巔峰時刻

汪精衛：縱橫憂患今方始

毛澤東：從筆桿子到槍桿子

第三卷　文人的異議

梁啟超：中國即將陸沉魚爛

胡適：敢向黨國爭人權

郭廷以：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第四卷　庶民的活力

劉大鵬：沒有詩情畫意的晴耕雨讀

石美玉：救人身體，更救人靈魂

盧作孚：北碚是建設未來中國的縮影

張幼儀：在塵埃中綻放的花朵

陳光甫：自命為「新士人」的銀行家

第五卷　逝者的證詞

李大釗：迷途不知返，走上絞刑架

汪壽華：五四青年／青幫頭目／工運領袖

王國維：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第六卷　鄰人的呼吸

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現代化的展開與頓挫

穆罕默德．伊敏：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川島芳子：無國可愛，無家可歸

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

劉吶鷗：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第七卷　外人的影子

鮑羅廷：揮舞紅布的鬥牛士

金文泰：深受港人愛戴的「使君」

史迪威：當美國鷹遇到中國龍

注釋

自序

天下已逝，邦國難成

一九二七年，對於那個時代的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仍然延續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而對某些中國人來說，則是他們生命中的重大轉折點。

結婚無疑是人生中最大的喜事，這一年前後結婚的名人有：蔣介石與宋美齡、梁思成與林徽因、羅家倫與張維楨。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被譽為「世紀婚禮」，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中國的明星軍人由此與全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聯姻，宋美齡也藉此獲得權力。美國《時代》週刊如此評價這樁婚姻：「僅僅一個家族的觸鬚就分別伸向了中國偉大的首任大總統（孫文）、今世的征服者（蔣介石）、位高權重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及中國先哲的第七十五代孫（孔祥熙）。」而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的性質及外交政策，也深受這場婚姻的影響。

如果說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意味著政治，那麼梁思成與林徽因、羅家倫與張維楨的婚姻就意味著愛情──這兩對新人都是留學歐美歸來，都將在未來中國的文化、教育和學術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在這兩場婚禮的背後，還有一場在前一年完成的婚禮，卻與這兩場婚禮有

著草蛇灰線之聯繫，那就是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

「新月」才子徐志摩因為追求林徽因，決然拋棄妻子張幼儀。等徐志摩追隨林徽因回到中國，才發現林徽因選擇的未婚夫是跟她同樣從事建築學的梁思成。徐志摩燃燒的激情不能熄滅，必須尋找新的對象，他找到了同樣堪稱絕代佳人的陸小曼。徐志摩的父母勉強同意這場婚事，但提出必須由徐志摩的恩師梁啟超作證婚人。梁啟超在婚禮上對這對新人厲聲斥責，心中大概暗自慶幸：幸虧兒子梁思成在愛情長跑中勝出，否則若林徽因嫁給徐志摩，一定不會幸福。所謂「人間四月天」，只有一個月轉瞬即逝的美好光景。

而更為有趣的是，張幼儀離婚之後，留學德國，在獨身時代遇到的第一個追求者居然是也在德國留學的羅家倫。那時，羅家倫與初戀女友張維楨因一場誤會而分開了，張幼儀的堅韌與溫柔深深打動了他。然而，張幼儀拒絕了羅家倫的求愛，這才有後來羅家倫與張維楨的重歸於好。這個世界真是太小了。

幾家歡樂幾家愁，生命在這一年終結（非自然死亡）的人們，更是個個有話要說。

國學大師王國維聽到黨軍（即國民黨軍，此為一種新式軍隊，模仿蘇俄以黨領軍的組織模式）北伐節節勝利的消息，毅然赴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此前，王國維可以忍受北洋政府的統治；此刻，卻不願忍受即將到來的國民黨的統治。他留下「以共和始，以共產終」的預言，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被他一語成讖。發人深省的是，北伐軍即將打到北京的消息，在清華園引起兩極反應：青年學生欣喜若狂，國學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卻個個憂心忡忡。

上海工運領袖汪壽華原本是一名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的熱血青年，後來成為教育程度最高的上海工運領袖。在蔣介石發起的「四一二」清黨屠殺中，他是枉送卿卿性命的第一人。不可思議的是，汪壽華與殺害他的兇手杜月笙同是青幫大老。左與右、正與邪，如同川劇「變臉」一般，其身份的錯亂折射出時代的荒謬。

北大教授、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躲藏在蘇俄使館遙控北方的左翼運動。張作霖的軍隊闖入蘇俄使館，將其逮捕並處死。李大釗希望未來的中國是「赤旗的時代」，為此他願意接受蘇俄讓其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命令，其「賣國罪」的真實性，比之中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政權的巨頭們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藏書家葉德輝螳臂擋車般地對抗湖南農民運動（毛澤東所謂的「痞子運動」），被當作「土豪劣紳」捕殺。康有為死於神秘的食物中毒，其《大同書》生前秘而不宣，他不會想到毛澤東的「紅寶書」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禍害。佔領南京的國民黨軍隊，悍然殺害為近代中國教育、慈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美國宣教士、學者、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John Elias Williams），「南京事件」儼然是「縮小版」的義和團運動。他們的生命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們的死亡，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

十六歲的中華民國夭折了

一九二七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

若以一九二七年為分界線，這一年之前與之後，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國」。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南京政府，拋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蔣介石雖然血腥清共，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依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胡適只用一句話就戳破了這個泥足巨人：「中國今日之當行憲政，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

北伐戰爭之前，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承認的、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並非國民黨的廣州政府，乃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被黨軍以武力顛覆，從此一直遭到勝利一方（國民黨以及後來取代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肆意妖魔化。實際上，北京政府是辛亥革命所締造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儘管那個時代政局動盪、復辟紛擾、軍閥混戰，且列強凌虐，但北京政府畢竟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與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五四運動才可能成功）。那十六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均獲得長足發展，理應得到歷史之公正評價。

北洋時代的「舊軍閥」如徐世昌、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們，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那些為北洋政府服務或支持北洋政府的文化精英和技術專家（少數後來繼續為南京政府服務），皆為一時之選，如同群星璀璨：顏惠慶、顧維鈞、湯化龍、章太炎、梁啟超、蔣百里、丁文江、王之江、陳遺陶等人，哪一個是南京政府可以培育出來的？而完全是匪幫的中共集團，就更等而下之了。

胡適指出：「北伐的主要社會基礎，就是邊緣知識分子。」一九二七年之後取代北洋軍人支配中國政治的，是由邊緣知識分子形成的「黨人」。如果說蔣介石是城市和沿海的邊緣知識分子（城市流氓），那麼毛澤東就是農村和內陸的邊緣知識分子（農村流氓），在他們之間「比好」毫無意義──這恰恰是中國和海外多如牛毛的「民國粉」、「國（國民黨）粉」和「蔣（蔣介石）粉」們的精神支柱。北伐大大加劇了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羅志田語），造就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樣舊學和新學都不通的人從邊緣佔據中心位置。所以，北伐剛剛完成「統一大業」，胡適就哀嘆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已經失敗，中國仍然沒有一個重建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社會和政治的重心，「再造文明」的理想也就成為遙不可及的水月鏡花。

跟此前的北京政府相比，南京政府是一個全新的政權。早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之前，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黨軍北伐就已顛覆了在淒風冷雨中苦苦掙扎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所以，蔣介石而非毛澤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顛覆者」。蔣政權並沒有繼承中華民國之法統，它敗退台灣之後，更沒有資格高舉中華民國的神主牌，並自詡為「自由中國」。

北伐與清黨：二十世紀中國災難的源泉

一九二七年，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北伐和清黨。

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將北伐視為不朽之盛事、千古之偉業；共產黨則至少肯定前半段的北伐──蔣介石清黨之前的北伐，因為共產黨在其

中也出了不少力。

一九二七年春，生於蘇州的美國傳教士費吳生（George A. Fitch）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北伐戰爭不僅是像美國南北戰爭一樣的內戰，而且是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及文藝復興於一身的『大運動』。」那個時代到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大都屬於傾向「社會福音」的左派，費氏亦不例外。當瘋狂排外的南京事件發生之後，他的這種樂觀的評價會不會改變呢？

北伐真的是一場「正義之戰」嗎？這是一個需要重新回答的問題。

對很多普通民眾而言，北伐的勝利以及此後威權政府的建立，並非福音而是更大的災難。北伐戰爭期間，南方黨軍所宣揚的「國家統一」理想，不過是蔣介石等新軍閥追求權力的遮羞布而已。在歷史轉折關頭，並不是所有人都傾心支持北伐，不同的態度和聲音──包括被主流史觀認為是「反動」的人物，如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陳寅恪、丁文江、葉德輝等知識界名流對黨軍北伐的恐懼和反對──都有其合理性存在，都有被記錄、思考、探究的價值。

支撐北伐戰爭的意識形態，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逐漸形成的極端民族主義、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等偏執而邪惡的學說。北伐戰爭的殘酷性超過了此前軍閥間的內戰。軍閥的內戰還停留在古典狀態，通常不會殺戮俘虜，更不會槍殺對方的高級將領。失敗的軍閥一般通電下野，然後去租界當寓公。北洋時代少有槍殺高級將領的事件，始作俑者往往自己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徐樹錚槍殺陸建章，後來為陸建章的姪女婿馮玉祥所殺；孫傳芳槍殺施從濱，後來為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翘所刺殺。然而，北伐中的黨軍不講任何規矩和原則，偏偏以殺俘虜和殺高級將領來製造恐怖氣氛。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由國民革命軍、國民黨黨部和部分民眾組成「江西人民審判委員會」，將在去年十一月南昌戰役中被俘虜的孫傳芳部下高級將領張鳳歧、唐福山、岳思寅、白家駿、侯全本、蔣鎮臣、楊賡和、李彥清、王良田等人，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這是民國以來戰爭中槍殺敵對方高級將領最多的一次。

清黨則是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事件。今天，有不少反對共產黨的所謂「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當年殺共產黨殺得不夠、沒有斬草除根而感到遺憾。似乎如果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殺掉更多共產黨，就能確保一九四九年不至於被共產黨趕到台灣。然而，邪惡的方法從來不可能

達致美好的目標。當時，《大公報》即就清黨事件發表評論說：「政治刑事犯而付軍法，且特立機關，執行殺戮，此種制度為任何文明國家所不許，亦古來專制政體下所從無有之。惟民國後之中國耳。」清黨運動也留下致命的後遺症：它導致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分裂，尤其是蔡元培和吳稚暉等人在清黨中的表現，加劇了知識精英退出社會領導位置的過程；邊緣知識分子逐步走上政治運動的領導地位，與知識精英分子的某些自損形象的行為不無關聯。胡適敏銳地發現，國民黨「以思想殺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正是其由興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轉折點。

北伐和清黨並不能解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即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如同「出三峽」般的國家建構和民主轉型。蔣政權在名義上實現了全國統一，實際上卻帶來更酷烈的戰禍和黨爭，中原大戰及剿共戰爭，次次殺人如草不聞聲。

此後二十二年，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坐視農村經濟凋敝，又與城市新興資產階級為敵。於是，民間的左派激進思潮節節升高。國民黨不願接受自由主義價值，除了回歸傳統儒家專制主義以及向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取經之外，提不出任何吸引人心的意識形態，最終失去民心。

靠清黨的方式無法消滅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在城市發起的暴動暫時受挫，但以共產主義思想包裝的、毛澤東式的土匪割據模式終將烈火燎原。

分裂的中國，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快樂

北伐之後，南京政府建立並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這個過程符合「大一統是歷史之必然趨勢」的大中華史觀。然而，「必然統一」是歷史的真相嗎？唯有「統一」才是中國人的最高信仰嗎？

南京政府及蔣介石權力所能行使的區域，在一九二○年代末期僅有長江下游及華南少數的幾個省市。清帝國崩潰之後，帝國傳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遲遲不能成形，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天下」與「國家」的兩極之間搖擺。

一九二七年，清帝國的「藩屬國」或「羈絆國」如西藏、北蒙古等已取得實質性的獨立地位，處於半獨立狀態的有滿洲、新疆、青海、寧夏等地，處於高度自治狀態的則有山西、陝西、四川、兩廣、雲貴等地。在獨立、半獨立或高度自治的狀態下，某些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民眾之生活品質優於昔日中央的直接控制。這段不同區域「各自為政」真實的歷史，足以解構「統一是民眾福祉之保障」的虛假史觀。

我不認同梁啟超在清末生造出來的「中華民族」之概念，而以「住民自決」和「民族自決」的現代普世人權觀念來審視所謂「少數民族」的國家和族群認同。我講述了那些為各自民族的獨立而奮鬥的人物的故事，並盡量還原他們本人的想法：作為藏族人的土登嘉措（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維吾爾族人的穆罕默德．伊敏、作為滿族人的川島芳子（前清公主愛新覺羅．顯玗），與作為蒙古族人的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他們拒絕接受「中國人」的命名，至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鄰居」。如果中國人要對他們進行殖民統治，他們自然將中國人看作「敵人」。

最有趣也最具悲劇性的人物無疑是旅居上海的台灣人劉吶鷗，他是超越「一元」國族認同的「世界人」，正如他所引領的新感覺派小說和電影的潮流，他的觀念領先於他的時代，甚至今天的時代。在血緣上，他是華人；在國籍上，他是日本人；在出生地上，他是台灣人；他的母語是閩南語；他的文化品味是日本文學和法國文學；而他喜歡居住的城市是上海。劉吶鷗參與汪精衛政權的文化工作，並不覺得這是「賣國」之舉，而只是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已。他卻被國民黨特務以「漢奸」的罪名暗殺。

這是一群需要為之「正名」的人物，嚴肅的歷史寫作者，當為他們的言行和選擇提出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以此恢復歷史與精神本身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個體的自由、尊嚴和幸福，高於國家、民族、階級等宏大敘事。北洋時代，中央政府的衰敗意外地為民間社會的發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生機勃勃的民間社會是那個時代最大的亮點。我要講述的是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過去的歷史書中無法歸類的人物的故事。比如：以陳光甫、盧作孚、張幼儀為代表的商人、銀行家、企業家（即「民族資產階級」），以劉大鵬為代表的農民（在中國的主流歷史敘述中，農民一直是「失語者」），以及作為虔誠的基督徒、醫術高超的醫生和女性解放的先驅的石美玉，他們以堅韌不拔的努力捍衛自身信念，成為那個時代值得被記取的標竿，他們應當被請回歷史的中心位置。

近代以來的中國，已非閉關鎖國、唯我獨尊的「天朝」，從船堅炮利到新式軍隊，從汽車火車到洋火洋燈，從西裝革履到大學中學，從國會憲法到民主自由，外來因素之影響無遠弗屆。我將若干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故事納入其中：代表蘇俄勢力的鮑羅廷曾經對北伐的勝利、國共兩黨的分合一言九鼎，最終以失敗者的身份回到蘇聯，成為史達林遠東政策失敗的代罪羔羊並死於古拉格集中營；英國駐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本身是一名漢學家，卻能以外交家的手腕平復省港大罷工，並為香港政治改革、教育和醫療等民生事務作出重大貢獻；擔任美國駐天津的十五步兵團營長的史迪威不會料到，在十多年之後的太平洋戰爭中，他將被任命為美軍在中緬戰場的最高指揮官，並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從這些人物在中國的活動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已然無法擺脫外力所發揮的或正面或負面作用。

我仿效歷史學家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之寫法，描述二十五位核心人物（兼及七十五位次要人物，共有一百人登場亮相）在一九二七年前後生命歷程、政治觀念及精神取向之變遷。雖然是小說般生動靈活的筆調，卻有成為思想史的企圖：在人物的交互作用中，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天下）向憲政共和（民族國家）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美國式的「聯省自治」為何無法在中國成功複製。

回首歷史，立足現實，眺望未來，希望這本書能啟發更多人為尚未完成的中國民主化以及華人文化圈之精神重建，尋找一條可行的路徑。

書中人物	生卒年份	1927年時的年齡
吳佩孚	1874－1939	53
孫傳芳	1885－1935	42
張作霖	1875－1928	52
蔣介石	1887－1975	40
汪精衛	1883－1944	44
毛澤東	1893－1976	34
梁啟超	1873－1929	54
胡　適	1891－1962	36
郭廷以	1904－1975	23
劉大鵬	1857－1942	70
石美玉	1873－1954	54
盧作孚	1893－1952	34
張幼儀	1900－1988	27
陳光甫	1881－1976	46
李大釗	1889－1927	38
汪壽華	1901－1927	26
王國維	1877－1927	50
圖登嘉措	1876－1933	51
穆罕默德・伊敏	1901－1965	26
川島芳子	1907－1948	20
德穆楚克棟魯普	1902－1966	25
劉吶鷗	1905－1940	22
鮑羅廷	1884－1951	43
金文泰	1875－1947	52
史迪威	1883－1946	44

第一卷

武人的落幕

1　吳佩孚

五色旗才是真民國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雲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勁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

—吳佩孚《滿江紅》



甲午年，中日艦隊進行海戰，日本軍艦無故向岸邊的山東蓬萊發砲。二十一歲的秀才吳佩孚正在蓬萊閣漫步，一砲飛來，擊中蓬萊閣上的匾額，將「海不揚波」四個大字，單單轟去那一個「不」。[1]

附近的民眾東躲西藏，唯有吳佩孚屹立不動，怒髮衝冠。「海不揚波」變成了「海揚波」，大清帝國真的到了暴風驟雨、朝不保夕的時刻。這意外的一發砲彈，讓吳佩孚產生了棄文從武、保家衛國的念頭。清末科舉之廢，令無數仕途終結的讀書人哀哭切齒；偏偏吳佩孚一改重文輕武的儒家傳統，投筆從戎。一生叱吒風雲的功業，由此開啟。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清帝國的最後十一年到北洋政府，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始終是「武夫當國」。不過，武夫與武夫之間差異頗大：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既是武夫，更是政客，雖久經沙場，骨子裡是朝秦暮楚、口蜜腹劍、厚黑無形的權謀大師。在北洋體系中，真正配得上「儒將」和「戰神」稱號的，唯有吳佩孚一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也唯有吳佩孚一人。吳佩孚長於行軍作戰，拙於韜晦謀略，他號稱不問政治，卻為政治牽累而功敗垂成。

吳佩孚的民族主義思想，始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刺激，成形於「五四」運動之薰陶。五四前後，吳佩孚是北洋第三師師長，在湖南前線領軍作戰。在「大帥」林立的北洋系統中，他只是初露崢嶸的後起之秀，卻敢於通電全國，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聲稱「國亡於外敵，固軍人之罪；國亡於內亂，亦軍人之羞」，並呼籲「文官不貪汙賣國，武官不爭搶地盤」，一夜之間，「區區師長」成為內戰中人人稱道的「和平使者」。[2]

當北京學生上街抗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時，吳佩孚通電公開支持學生運動，嚴厲譴責中央政府的作為：「當此外交失敗之秋，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捨，銅駝荊棘，坐視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赴後繼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吳佩孚同時請求總統徐世昌「以國本為念，以民心為懷，一面釋放學生，以培養民氣而救危亡」。[3] 次年元月，吳又發出「息內爭，攘外侮，南北團結，共赴國難」之倡導，得到全國輿論一致好評。

吳氏之良知與熱血，放眼二十世紀的軍人當中，唯有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中拒絕執行鄧小平開槍殺人命令而被送上軍事法庭的解放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可媲美。這只有在北洋政府時代，徐世昌

那樣的文人總統，才能容忍進步軍人與進步學生相互唱和，且還有自由的新聞媒體加以報導和讚譽。若此時執掌大權的是威權的國民黨，「五四」就可能變成「二二八」屠殺；若此時執掌大權的是極權的共產黨，「五四」就可能變成「六四」屠殺。

吳佩孚一生以書生自居，與學生關係最為親近。一九二三年，吳氏在洛陽開學校練兵，對著一群投身軍旅的青年學生大呼：「我要把你們培養出一百個將軍來，把中國失去的土地都收回來！」底下的青年學生們則高喊：「大帥萬歲！」[4] 此時，吳的聲望和實力如日中天，他是第一個被美國《時代》週刊當作封面人物的中國人。西方輿論普遍認為，張作霖和孫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是吳佩孚的時代，「吳氏今日正有絕好機會，掃除國中離攜分子，統一全國，建樹莫大之功勳。苟能利用此機會，固不難流芳百世，當為國人所崇拜」。[5]

然而，吳佩孚失敗的速度如冰雪在烈日下消融。吳佩孚的失敗，不單單是他個人的失敗，更是整個北洋系統的失敗。他的失敗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雖然舊時代未必更壞，新時代未必更好，但新時代沒有他的舞台和角色了。

一九二七年之後，吳佩孚未嘗沒有想過東山再起，但作為百分之百的民族主義者，他不假思索地拒絕了日本方面的遊說。一九二七年冬，當吳佩孚喪失數十萬雄兵、退居四川，跌入人生最低谷之際，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與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等十多名將佐，專程從宜昌乘坐小型兵艦到白帝城拜訪。日方表示，願意借給吳現金一百萬元，贈送步槍十萬支，山炮五百門，機關槍兩千挺，以助其重振雄風。吳一笑了之：「本人過去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下百萬，卻仍一敗塗地，以至於今。可見成敗利鈍，和槍械金錢無關。中國事中國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6]

一九三二年，日軍在北方步步進逼，東北已失，華北岌岌可危。國民政府無所作為，聲名掃地。西北五省實力派人物聯名上書中央，推薦吳佩孚領導對日抗戰。吳也公開表示：「捨此殘生，以御國辱。」然而，心胸狹窄的蔣介石怎麼可能讓吳佩孚搶了他的風頭呢？

常勝將軍是如何煉成的？

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卻沒有張宗昌那高大威武的外貌。他早年投考開平武備學堂，因身體瘦弱單薄而改學測繪科。吳落魄時曾遇貴人郭緒棟之助，郭常常請吳到如夫人戈氏家吃飯。郭已看出吳將來必定前程萬里，戈氏則對吳頗為輕慢：「我看你和娘兒們並無兩樣，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哪裡像個坐八抬大轎的樣兒？」[7] 然而，人不可貌相，出身貧寒、北人南相的吳佩孚硬是自己打出一片天地來。

一九○六年，吳佩孚任北洋軍第三鎮曹錕部管帶。在清末創編陸軍之時，款項充足，該部之軍械皆購自德國，有重炮二尊、轆轤過山炮等多尊，其步槍為七九毛瑟槍，後來添置之機關槍亦為德國造。[8]

北洋軍是一支為應對西方的軍事壓力而產生的近代職業軍隊。出乎清廷預料的是，這些新軍並沒有成為有效的國防工具，反而與立憲派士紳結合，一舉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吳佩孚與新軍中的大部分中下級軍官一樣，在民族主義等新思想的衝擊下，對清廷的忠誠度只剩下薄薄一層紙，他已經將「中國」和「大清」區分開來，既然「大清」不能保「中國」，那麼拋棄「大清」、創建民國就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入民國後，第三鎮改為第三師。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派系紛爭浮出水面，跨區域層面的政治控制，落在由軍閥控制的軍事機構手中。憲法和議會等政治制度的安排一直未能發揮良好的作用。[9] 作為中級軍官的吳佩孚對此深感痛心，可他人微言輕，只能靜觀其變。

張勛復辟時，吳佩孚任團長，率先攻入北京。吳推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卻不認同恢復帝制。一九一七年，吳佩孚升任北洋陸軍第三師師長，駐湖南衡陽。他善於帶兵，部隊素質好，當兵的一半都是學生出身。此後數年間，第三師南征北戰，大出風頭，甚至團長當了督軍，士兵做了營長。[10] 在吳佩孚幕中的北大畢業生汪崇屏回憶說：「舊時直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官真正像官，兵也真正像兵，任何一個士兵都有他的規矩，你跟他說話，他都有自己的一套。」[11]

一九二○年五月二日，吳佩孚拒絕執行段祺瑞征伐南方的命令，反倒從衡陽撤兵北上，通電聲討親日的段祺瑞政府。旁觀者看到，在船上，「吳部士兵均赤手對坐，狀極閑雅，且有扣舷高唱軍歌者，一望而知其為久經訓練，紀律嚴明之師」。[12] 一路上，全軍高唱吳佩孚所作之〈滿江紅〉，慷慨悲歌，壯懷激烈，各界無不為之動容，青

年毛澤東亦稱讚其「信義昭於中外，威望洽於全湘」。[13]

吳佩孚以區區一名師長，揮師北京，一舉擊敗段祺瑞的皖系大軍並推翻安福系政府。兩年後，他又擊潰企圖問鼎中樞的奉軍，迎來直系的全盛時代。第一代北洋巨頭，如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大都如眾星捧月般簇擁在袁世凱周圍，是幕僚型特質，並無太多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吳佩孚從基層幹起，常年指揮戰力最強的野戰軍，擊潰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自然不足為奇；而打敗張作霖領導的、兵強馬壯的奉系，才是其軍旅生涯之巔峰。

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大獲全勝，當時的評論家有如此之觀察和評論：

> 吳氏對於此次作戰，有七晝夜未睡眠，一切排陣計劃，煞費苦心。在戰期內，親臨前線指揮。當其攻下豐台時，有兩人某謁吳，見其衣服多泥土，並有二晝夜無飽食，而吳仍不失常態，可知英雄作事，其忍耐勞苦，不與庸人同。較之奉軍張氏，徒巡閱軍隊，而自不身先前陣，見少挫而令退兵，其師雖眾，終不能與吳抗也。[14]

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曾前去拜訪吳佩孚，在一份給史達林的報告中，對吳佩孚的軍隊大加褒揚：「我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好。」可見吳絕非浪得虛名。

一九二○年代上半期，吳佩孚在大小內戰中多次獲勝，除了練兵嚴格、用兵奇詭之外，對手亦頗為不堪，他並未遇到旗鼓相當的勁敵。時人評論說：「大抵吳之成功，皆能於險中求勝。是以哀兵憤兵，一鼓作氣而得之。幸其所遇之敵，初為皖系之驕兵，後為奉張之惰兵。」[15] 當遇到有主義支撐、有蘇俄軍事顧問幫助、有蘇俄先進武器接濟的北伐軍時，他就敗下陣來。

直系中央成立後，吳佩孚退居洛陽，訓練軍隊，建設名城。免於權力的誘惑，不到北京控制最高權力，確非尋常人所能為之。一時間，各方人士紛紛前往洛陽獻計獻策。就連政見不同的康有為也為其五十大壽送來一副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吳佩孚隱然成為左右中國前途的決定性人物，也是北洋政權的最後一個強人──張作霖算不上北洋嫡系，雖然在北京自我加冕為陸海軍大元帥，但一般人仍將其看作是來自關外的「胡匪」。

那幾年，吳佩孚在洛陽的生活極為簡樸，比之京、保、津三地直系顯要人物的酒色財氣、花天酒地，一清一濁，天壤之別。其秘書呂哉描述說：「洛陽民風樸厚，將軍亦生活簡單，天氣炎熱，絕少電扇等設備。遠離城市，汽水冷飲，貴若瓊漿，同仁皆以『人丹』為解熱之品。退公之後，絕無不正當之消遣，勤儉治公，洛陽足以當之。」[16] 其幕僚汪崇屏亦回憶說：「吳每日三餐，都跟大家一起吃，除了生病，絕不回家吃飯。這些都表示他的克己復禮，與部屬共甘苦的精神。」[17]「吳既無嗜好，又無任何娛樂，平素往往天一亮就起來看操，看操完畢，同幕僚一起進早餐，早餐後，進辦公室辦公，中午，大家又在一起吃中飯，下午仍然辦公，晚飯還是跟僚屬們一起吃，飯後才回家。」[18] 吳具備獨特的人格魅力，吸引群賢畢至：國學大師章太炎、舊派詩人楊雲史、新派學者汪崇屏，無不雲集其麾下。

一生兩大災星：曹錕與馮玉祥

然而，直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吳佩孚難以單手扭轉乾坤，他的努力「無非是沙灘上築造七級浮屠而已」。直皖、直奉兩次戰爭之後，吳佩孚建議恢復法統，使民初參、眾兩院召集復會，歡迎黎元洪復總統位。黎元洪於一九二二年入京復職，舊國會亦於八月一日在北京復會。一切似乎步上正軌，吳佩孚可以安心練兵洛陽，經營華中，警戒北方之張作霖和南方之孫文。他刻意與中央政治疏遠，卻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脈動失去了感知：要想「救中國」，就必須尋求適當的途徑以超越軍閥混戰和體系分裂的狀況，發掘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重建中央的權威和憲政的權威。然而，吳佩孚不可能將北洋系統拆毀了再重建。

危機蔓延開來。首先，失敗方不會善罷甘休，坐視吳佩孚獨大。張作霖、段祺瑞、孫文這三個原本互相敵對的勢力，因反直、反吳建立起「三角同盟」關係。其次，直系內部，也出現了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的對峙。再次，由於吳佩孚過於驕傲，御下太過嚴格，若干他親手扶植起來的省一級督軍對其離心離德。對此三大危機，吳渾然不覺。

吳佩孚何其不幸，一生先後遇到兩大災星。一為曹錕，曹錕是提拔吳佩孚的上級和恩師，在上下、尊卑、主從等舊觀念的束縛下，吳佩孚明知曹錕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對其總統大夢勸阻無效後，遂任由其胡亂折騰。吳既不願取而代之，就只能被其連累乃至成為其殉葬品。

昏庸寡德之曹錕，在周圍小人的包圍之下，一步步實施總統夢。他讓部下索餉逼宮，迫走合法總統黎元洪。黎元洪是吳佩孚請回來的總統，遭到曹錕手下非法軟禁、追討國璽之羞辱，吳佩孚未能有力干預，致使全國輿論大譁。

趕走了黎元洪，曹錕以五千元一張的選票，坐上總統大位，卻迅速走上自取滅亡之路。

經過這一套把戲，總統之位分及國會之尊嚴全被玷汙。曹錕賄選，是北洋政府永難洗清的一大汙點，也是吳佩孚平生最大的恨事，同時它也為北方政府和直系中央敲響了喪鐘，可以說是直係由盛而衰、迅速垮台的一大轉折點。

曹錕賄選之前，海內外輿論對吳佩孚好評如潮；曹錕賄選之後，「吳佩孚神話」幾近破滅—吳佩孚連曹錕的惡行都不能節制，又如何為中國開一新局？浸淫民國政治甚深的李劍農評論說：「曹錕的勢力全在吳佩孚，吳佩孚的潛勢力全在他取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自吳氏聽任驅黎、賄選以來，他所取得的潛勢力已經完全毀滅了。他必定失敗，已經很明白，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曹錕也很明白他自己得志的由來，坐上總統的椅子之後，向人家說：『非子玉無以至今日。』」[19] 吳佩孚標榜自己只是軍人，不問政治，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哪裡有跟政治無關的軍事？政治上的失敗，必然帶來軍事上的挫敗，以及影響力的喪失。吳佩孚在政治上的短視、天真與固執，使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只能耀彩於一時，而無法收成於久遠。

吳佩孚的第二個災星是馮玉祥。吳佩孚向來將馮玉祥視為心腹，殊不知馮玉祥因個人野心未得滿足，早有了叛逆之心，暗中與南方國民黨和北方張作霖有了來往。第二次直奉戰爭開戰時，身為負責熱河方面軍事的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臨陣倒戈，回師北京，推翻政府，軟禁曹錕。吳佩孚連夜乘火車疾馳七百里回到天津，發現局面已不可收拾。腹背受敵的直系軍隊全面潰敗，吳甚至在整個北方都無立錐之地。

在此危急關頭，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出面調停，希望吳佩孚擁戴段祺瑞出山收拾殘局，直系尚能保存部分實力。但吳堅持認為，中國有「千古不磨之成文憲章」，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世人認為中國共和政體成立之後君臣之義已滅，但吳認為可用長幼之序代君臣之義，他不願因「結段以背曹」而失「大義名份」。他最後的回答是：「蓋中國之興微，繫於大道之消長；我面臨國家興亡之邊緣，獨欲紹述斯道而無返顧。至關於個人之成敗，本不在念中。此為我不能擅背曹而結段之原因，故寧為玉碎而不望瓦全也。」[20] 他不願犧牲原則而保持實力，直系在北方的力量就此瓦解。

吳佩孚擇善固執，馮玉祥有奶便是娘。北洋政府的終結者不是蔣介石，而是馮玉祥。若非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致使吳佩孚及直系中央覆滅，然後奉軍入關，政局敗壞，豈會有兩年後的黨軍北伐？

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有如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乃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之兩大劫難。

此役，吳佩孚苦心訓練的精銳之師一日盡沒。此後，在漢口查家墩復出，已是迴光返照、外強中乾。

此役，北洋政府名存實亡，隨後的段祺瑞之執政府和張作霖之大元帥府，已不能承續中華民國之法統，國會已被解散，段、張二人臉皮再厚，亦不敢自命為「總統」。北洋政府所凝聚的最後一點民心被耗盡了：

> 四年之間，三次大戰，至是而北方之局面，既每況愈下；北洋之系統，亦凌亂不堪。蓋任何一種勢

> 力之養成，其初基之草創，幼弱之滋長，壯盛之勃興，乃至全局之底定，每歷數十年之艱辛，與儻來之際遇，締造之而不足；偶一失當，則一朝破敗之而有餘，及已至是，而再言恢復，便覺難若登天。[21]

兩線作戰，無力回天

第二次直奉戰爭慘敗之後，吳佩孚四海為家，輾轉投奔，世態炎涼，點滴心頭。一九二五年，張作霖、馮玉祥關係破裂，段祺瑞執政府行將就木。吳佩孚趁機組成「十四省討賊聯軍」，就任總司令，誓言「救國鋤奸」。

在吳佩孚、張作霖夾擊之下的馮玉祥，宣佈下野出洋，以保存國民軍之實力。段祺瑞倒向奉軍，佔據北京的馮玉祥部下鹿鍾麟、張之江包圍段祺瑞執政府，迫使段祺瑞遁入東交民巷。國民軍恢復曹錕的自由，邀請吳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並在電文中表示，「此後動定進止，惟玉帥馬首是瞻」。吳對馮玉祥及其國民軍恨之入骨，不願寬恕叛將，在電文上批復：「全體繳械。」同時命令手下幾路大軍快馬加鞭北進。國民軍遂向西北退卻，扼守南口，以逸待勞。

一九二六年六月底，吳佩孚到北京與張作霖會面，獲得統帥各派系軍隊討馮的指揮權，親赴南口督戰。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他手下的軍隊各懷異心，且遇到國民軍勁旅劉汝明部，致使南口久攻不下。

與此同時，南方局勢丕變，國民革命軍在唐生智的幫助下，進軍湖南，連克湘鄉、湘潭、寧鄉、益陽、長沙，收湖南於囊中。南方告急電報，如雪片般飛來。吳佩孚咬緊牙關說：「南口一日不克，本總司令一日不能南下。」[22] 此舉乃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南口並非戰略要地，攻下南口並不能殲滅馮玉祥的國民軍。若早日率主力南下拯救兩湖，或許可以翻轉南方糜爛之戰局。吳逞才使氣，非得等到八月

十四日大軍攻克南口、鎮遠、青龍橋，才志得意滿地南下。然而，此時北伐軍聲勢已壯，吳佩孚率領的疲憊官兵，難以再打一場硬仗了。

湖南一省的戰局，牽一髮動全身，為吳佩孚始料未及。有史家指出，吳佩孚以善戰馳名全國，實則有勇無謀，顧前而不顧後，顧左不顧右，二次直奉之役失敗即由於此。一九一四年，德皇威廉二世以絕世梟雄犯了東西兩面作戰的錯誤，最終一敗塗地，此例婦孺皆知，而吳悍然有所不顧。這一次，他既要北上與國民軍為敵，又不惜挑起湘省戰禍—只是為了支持對其有恩卻被唐生智驅逐的趙恒惕，吳對趙確實有情有義，為朋友兩肋插刀，卻讓自己手中捧了一包炭火。

清末以來，曾國藩在湖南招募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湖南成為不可忽視的軍事大省。湖南問題是個不可觸碰的問題，袁世凱、段祺瑞全勝時期亦無力解決。吳佩孚過去明白這個道理，第一次屯兵衡陽不進，第二次淺嚐輒止，這次卻賭意氣。

唐生智派歐陽任赴武漢與吳佩孚疏通，請以岳州作為緩衝地帶。吳還是老脾氣，對著歐陽提筆寫了個「北」字，大聲說道：「我本來打算向北用兵。」接著，又寫了個「南」字，並且畫了個箭頭說：「現在要移師向南了。你叫他馬上退出長沙，一切還好商量。」[23]

唐生智也是一名梟雄，豈能不戰而降？唐聽聞吳要討伐他的消息時宣稱：「我本無名之輩，寧願以卵擊石，與吳一戰，無論勝敗，便可聲震群雄了。我也不入租界，我若戰敗，開槍自殺。」

此時，吳雖擁兵數十萬，但絕少嫡系部隊，東歪西倒的雜牌部隊，只知道吃飯領餉，不懂得衝鋒陷陣。吳明明無可用之兵，偏偏要一意孤行，橫挑強敵。[24] 曾任吳部政務處長的白堅武評論說：「吳帥再起，治本未遑，治標又誤。其方略最為謬誤者，對唐生智用兵也。自古用兵，無兩方同時並進者。蓋既根本不能容馮而出於用兵，則在馮未敗之先，對唐不能不出於和緩。況唐逐趙後志在主持湘政，再次表示求盟，正應將計就計，緩唐對馮，何必自樹多敵，迫之鋌而走險，自招失敗？」[25] 若吳佩孚與唐生智暫時結盟，唐生智不會引北伐軍入湘，黨軍自然不會倉促北伐，吳也就不止於陷入南北兩線作戰之窘境。

果然，既然吳佩孚要戰，唐生智便與北伐軍結為一體，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中路前敵總指揮。湘省局部之爭使得黨軍北伐提前發動。唐與吳幾番惡戰而立於不敗之地，遂使豎子成名。直到一九三七年，日軍攻陷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作為守將的唐生智棄城逃亡，這個「佛教將軍」才露出其怯懦無能之本相。或許感念其襄助北

伐的功勞，即便丟棄首都，蔣介石也沒有將唐生智像韓復榘那樣軍法審判、執行槍決。

吳佩孚匆匆南下，卻已無法救湖南，只能力保湖北。除衛隊外，他所帶只不過一旅兵力。靳雲鶚部高汝桐師叛變，將其主力十幾萬人堵在武勝關外，遠水救不得近火。前線無可戰之兵，這才給革命軍以可乘之機，否則北伐不會如此輕易成功。另一方面，吳佩孚對已獨樹一幟的孫傳芳頤指氣使，孫傳芳不願聽從其號令，拒絕出兵援助，吳遂陷入絕境。

國民黨黨史中大肆渲染的攻克武漢三鎮的戰役，其實規模並不大。汀泗橋之戰，吳方參加軍隊不過一旅，雙方總共參戰的軍隊加起來不過萬人。相傳吳以大刀隊督陣，吳且手刃後退的軍官數十人，全係捏造。那時，東拼西湊的吳軍已不堪任戰，假如在二次直奉戰前，直系全盛時期，革命軍早就給吳打垮了。[26] 時勢造英雄，英雄卻不能改變時勢。

忠於哪個民國：真民國已成過眼雲煙

失去湖北之後，吳佩孚率殘兵敗將退守鄭州與洛陽一線。他雖在洛陽練兵，但河南並非可安生之巢穴。他在無比風光之時，可任命十多個省的督軍，卻未能像閻錫山經營山西、張作霖經營東北、白崇禧和李宗仁經營廣西那樣，以一省或數省為牢牢掌握之基地。他沒有充裕的時間從容佈局，更沒有在軍事之外管理行政和發展經濟的稟賦。

中原為四戰之地，腹背受敵，難以安居。原先那些服服帖帖的小軍閥，個個覬覦這塊肥肉；不等南軍打過來，張作霖就已翻臉不認人，派奉軍以飛機大砲為掩護搶渡黃河。若再不離開鄭州，就成甕中之鱉。於是，吳佩孚從河南入鄂北，沿著隆中山與白河的荒僻小路前進，一路躲避南北敵軍、叛變部屬之圍追堵截：

> 所過之處多為人跡罕至的地方，攀藤附葛，有如登天。有時無路可走，須從這座山頭，翻到那座

山頭。士兵們因路難走，又背著糧食，故一路走，一路向路邊丟擲彈藥。且風餐露宿，衣衫襤褸，真是備極艱辛。[27]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吳佩孚一行數千人進入四川境內。當時四川是劉湘、鄧錫侯、楊森、劉文輝、劉存厚、田頌堯六分天下，川東的楊森願意款待吳佩孚。楊森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但頗念舊情，「吳玉帥與我，有舊日袍澤關係，何能於其日暮途窮之時，不許其在青天白日之下，為一含哺鼓腹之民」，遂向南京方面擔保接待吳佩孚「純出私誼，若有軌外行動，願向中央擔負完全責任」。[28] 吳佩孚在四川安居下來，先是住在白帝城，體制上仍維持元帥府，「不管誰到四川，就先看到飛揚的五色旗」。後因在白帝城惹人耳目，又移居更偏遠的大竹。

吳佩孚一生忠於五色旗。對他來說，五色旗才是真民國，青天白日旗是另一個國家的標誌。革命前輩、國學大師、「中華民國」國號的發明者章太炎，也堅持此種國家認同。所以，章太炎才會不顧艱險，隻身來到吳佩孚的「討賊聯軍總司令部」就任「總參議」之職。

早在清末革命時，章太炎就與孫文一黨發生過尖銳衝突，對孫文獨裁專橫的個性洞察秋毫。二十年代初，孫文投靠蘇俄，章太炎批評說：「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引為同族，斯固大謬。」孫文在北京去世後，章太炎寫了一副極不客氣、卻足以概括孫文之一生的輓聯：「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章太炎也最早揭露馮玉祥「與俄通款」，「叛國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今馮玉祥之用俄國軍官，與李鴻章之用戈登無異」，兩者都「事同叛逆」。在章太炎看來，廣東的蔣介石、汪精衛「奉鮑羅廷以為主」，也是「招致外患，為罪至深」。[29]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章太炎與一些士紳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國大聯合」，任三理事之一。他發表通電說：「赤禍日熾，漢奸公行；以改革經濟為虛名，而招致外患為事實。不亟剪除，國將不國。」該聯盟「以反對赤化、保障國權、實行民治為宗旨」，希望全國各界起來「共除國賊」。[30] 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章太炎雖然強調「恢復法統」，也認可在沒有合法的中央政府時，只要大家都反赤，實行區域

自治或許比有名無實的統一更有效率，今日大勢「宜分不宜合」，倒不如「廢置中央，暫各分立」。[31] 控制東南諸省的孫傳芳和控制華中諸省的吳佩孚，都願意接受章太炎的政治觀點。

一九二六年八月，章太炎發表通電反對廣東的黨軍北伐：「借外兵以侵宗國者謂之叛，奉外國以為共產者謂之奴。」他點名批判蔣介石說：「詳其一生行事，倡義有功者，務於摧殘至盡；凡口言國家主義者，謂之反革命。是其所謂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華民國之命者也。」[32]

章太炎雖是一介書生，對全國局勢的觀察和分析卻比「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吳佩孚更為精闢，他力勸吳「將北事付之奉晉，而直軍南下以保江上」，並「與南省諸軍共同討伐……雖有小憤，待事定而後論之」。若是吳佩孚聽取章太炎的建議，重新部署軍事，早日率大軍南下，並與唐生智達成妥協，與孫傳芳結盟，北伐軍不可能一舉定三湘、克武漢。

北伐軍圍攻武漢之際，吳佩孚處境困難，無可用之兵；昔日為吳佩孚下屬的孫傳芳羽翼豐滿，作壁上觀，不願加以援手。章太炎致信孫傳芳，警告說：「蔣中正竊據廣東，惟赤俄鮑羅廷之命是聽；自署國民政府，則不冠中華之名；所用旗章，則不用國旗五色之式；昌言國民革命，須受第三國際指揮；察言觀實，叛國之事正彰。」若黨軍攻佔武昌，「則中央崩而四維解，長江上下，地將為赤俄之領土，民將為赤俄之順民」。他建議孫出兵援鄂，「國之廢興，在此舉也」。[33] 可惜，孫與吳一樣，低估北伐軍的實力，且不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大剌剌地坐山觀虎鬥。等到吳潰敗，北伐軍打到自家門口，孫才悔之晚矣。

一九二七年年末，吳佩孚和孫傳芳的大軍灰飛煙滅，章太炎仍不願屈從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在這位比孫文更有資格號稱中華民國「國父」的革命前輩心目中，「旗幟」與「名節」是相通的。章太炎像明末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那樣，即便被國民黨通緝、抄家，亦持守名節，拒奉新朝。[34] 蔡元培請他到南京參與教育事務，張靜江請他為其父寫墓表，他都拒絕了，「非尚意氣，蓋以為拔五色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華民國。此而可為，當時何必反抗袁氏稱帝耶？」五色旗是章太炎不斷強調的中華民國的象徵，這一旗幟決定著政權政治正當性的延續或中斷。一九二八年，北伐軍進入北京之際，章太炎仍堅信：「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35]

南京政權改北京為北平，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改共和國為黨國。自此以後，章太炎儼然以「民國遺老」自居，既然是「遺老」，在他心目中，「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孔子與關羽，無法勝過二十世紀的新主義

與章太炎一樣，吳佩孚生命中最後的十年成了「民國遺民」。

與妻妾成群的多數軍閥截然不同，吳氏與前後兩任夫人均相親相愛，雖膝下無子仍拒絕納妾，更沒有傳出風流韻事。有一位金髮碧眼的德國小姐，視吳佩孚為偶像，非要嫁給他。吳在對方寫來的綿綿情書上批了四個字：「老妻尚在。」可謂不解風情之至。

吳對家人更是「絕情」，開府洛陽時，定下嚴格的規矩：「凡吳家近親，上至父輩，下至自己之後三代，即天、孚、道、運、隆五世，永不敘用。」

吳佩孚一生最崇拜關羽、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彭玉霖等忠臣名將，自詡精忠報國，反抗異族侵略。他也推崇孔孟，又研究周易，著有《循分新書》、《明德講義》、《正一道銓》等探討傳統文化的著作。在民國的軍人中，吳是少有的儒將，難怪《劍橋中華民國史》稱之為「學者將軍」。

吳佩孚倡導「父老政治」、「恥道文化」，認為「民國成立首廢禮教」是大亂之源，禮教要保存的是傳統的道德、社會結構、中國的舊秩序。[36] 他支持「五四」學生的愛國之舉，卻不能認同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新思想、新觀念。晚年他對學生演講說：「有兩件要緊的事情，就是『廉恥』，『廉』是不要錢，『恥』是愛面子。哪一個要是不賺公家的錢，就是愛面子，不知廉恥的人，就是不愛面子。」可惜，三十年代的學生，對這一套道德教化了無興趣。

吳佩孚的失敗，既是軍事戰略的失敗，更是主義的失敗。吳氏受近代以來從甲午到「五四」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衝擊，接受並堅持近代民族國家的價值。但民族國家的價值還需要與其他近代化的意識形態相結合，才能形成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如國民黨用「三民主義」包裝的威權主義，共產黨則高舉來自蘇俄的「共產主義」，以及

胡適、雷震等知識階層所信奉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

然而，除了民族主義之外，吳佩孚不願接受任何新思想、新觀念。蔣介石給胡適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上半句，用到吳佩孚身上，倒恰如其分。吳佩孚基本的文化教育在清末就完成了，世界觀也奠定了。他無法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發掘出生機勃勃的部分來支撐其南征北戰的事業，更不可能吸納新的、更有力量的意識形態來對抗國民黨和共產黨，他的失敗早就註定。即便他打勝那場武漢保衛戰，也無法建立一個持久而穩定的政權。

吳佩孚的思想觀念，大概就是孔子加關羽，即文聖加武聖。他卻不知道，儒家文化所依托的社會結構（由皇帝、紳士和農民構成的「三元社會」）和生產方式（農耕文明）已經解體，無論他怎樣倡導儒家文化，如同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無法解決當下中國面臨的難題。吳的人格堪稱完美，卻不幸成為一個被時代潮流拋棄的悲劇人物，用汪崇屏的話來說就是：

> 吳的政治理想，可以說是維持中國舊傳統，仍要保持民為邦本、明君賢相那一套的政治道德標準。他所言所行，幾乎都向這個方面努力。凡為輿論所不容的，他就起而攻之，在他心目中這完全是弔民伐罪。他喜歡讀周易，尤慕內聖外王之道，總希望將中國治好，使中國富強。並且認為中國事應由中國自己來解決，堅決反對列強干涉或勾結外援。他仍保持了中國舊軍人完美的典型。[37]

晚年的吳佩孚手書一幅對聯，掛在廳堂中自我勉勵：「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是解甲歸田。」對聯中嵌入他標榜的「四不主義」。僅不入租界這一條，他就勝過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和共產黨早期都在上海等地的租界內活動，享受租界給予的法律保護。孫文長期居住在租界，蔣介石在租界內舉行盛大的婚

禮，共產黨中央則在租界內給各地黨部發號施令。對照之下，誰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呢？吳佩孚之表裡一致，連國共兩黨的元老都表示敬佩。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說：「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政見怎樣，都是應該表示欽佩的。」共產黨元老董必武說：「吳佩孚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

一九三一年，吳佩孚從四川移居北平，他生命中最後的六年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他是北方人，更喜歡回到北方生活，而當時北平在張學良的勢力範圍內，至少不是直接處於南京政府的控制下，他勉強可以接受這個現實。他看不慣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見面時對這個後輩出語嘲諷，以後張學良便躲著他了。

一九三七年，北平陷落，吳佩孚沒有南下避難。有人說是昔日曾背叛他的部將于學忠故意沒有通知他，其實是他自己覺得無處可走，且無走之必要。他雖然是一個「光桿大帥」，但有著最大的武器帶在身上，必要時也許用得著，這件武器就是一個「死」字。 [38]

日本佔領軍希望吳佩孚出面在北方組織傀儡政府，與南方的汪精衛政府形成一文一武兩大系統。吳佩孚召開記者會，身穿中國傳統紳士的長袍馬褂，一字一句地聲明說：「唯有『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本人認為，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自華北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為全面議和交涉對手。」說完之後，他厲聲命令秘書「斷乎不容更改」地將自己「最後的政治宣言」翻譯成日文，告訴日方。

日本人知道無法讓吳佩孚屈服，對他動了殺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吳佩孚吃飯時被一塊骨頭傷了牙齒，此後牙齒發炎，疼痛不已。一名德國醫生應邀前來診治，告知可以去受國際法保護的東交民巷內的德國醫院動手術，吳佩孚為踐行「不入租界」（使館區亦形同租界）的諾言，婉拒之。

十二月四日，吳佩孚的老部下、已投靠日本人的前江蘇督軍齊燮元和一直尊吳為老師的日本特務機關長川本大作少將，帶著日本軍醫處長石田和護士匆匆趕來。石田不顧吳夫人的反對，強行為吳拔牙，結果割開吳的喉管。數小時後，吳佩孚蹊蹺死亡。中央社在香港發佈消息稱：「吳佩孚將軍之死，經過多方面調查，得悉並非因病致死，確係經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新政權宣言，經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 [39]

吳佩孚晚年最大的心願是，等國事上軌道，便到峨眉山出家，為

昔日麾下戰死的官兵唸經超度。他的這個心願未能實現。

吳佩孚早已為自己寫好悼詞。他五十歲那年任直軍總司令，大敗奉軍，權傾朝野，望重中外。那時，他寫下躊躇滿志、目無餘子的《五十自壽》，此自壽詩亦可當作其一生之蓋棺論定：

歐亞風雲千萬變，英雄事業古今同。

花開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萊第一峰。

2　孫傳芳

曇花一現的「東南五省門羅主義」

民國成立，胚胎約法，當時開國，眾彥多取西法，而於本國政情，大半拋棄。故約法精神，全注重於中央集權，置地方特殊情形於不問，又懼中央權力過大，流於專制，復採用內閣制以限制之，束縛馳驟，無微不至，卒之府院之爭，立法與行政爭，地方與中央爭，始基不慎，流毒至今，良可慨歎。

—孫傳芳



當國民黨的北伐軍與孫傳芳的五省聯軍殊死搏鬥之時，後來成為近代史大師的郭廷以正是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班的學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郭廷以的同學親眼看到孫傳芳打敗仗後狼狽入城。郭廷以觀察到，北伐剛開始之初，南京的一般人民仍看好孫傳芳，認為孫傳芳一定能夠勝利，南京的小孩子打架常說：「我是孫傳芳，你是蔣介石。」直到孫在江西吃了敗仗，損兵折將，才改過來說：「我是蔣介石，你是孫傳芳。」[1] 這是普通百姓心思意念悄悄發生變化的有趣細節。大部分民眾信奉成王敗寇的鐵律，而罔顧是非善惡。

早年，孫傳芳從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獲得清廷公派赴日本士官學校深造。他在那裡完成四年學業，其先後同學有盧香亭、楊文愷、周蔭人、趙恒惕、徐樹錚、姜登選、張群、曲同豐、閻錫山、劉存厚等人，這些人此後或成為其友軍、部屬，或成為其戰場上的對手。

北伐軍興，孫傳芳起初並不將國民黨看在眼裡。以軍事素養和才能而言，孫傳芳優於只在日本受過初級軍事訓練的蔣介石。而且，孫擁有江浙地盤、上海財源，又有英方支持（丁文江做淞滬商埠總辦，負責向英國借款），蔣百里籌劃軍事，論兵力、地盤、財源，似乎居優勢。即便在江西、福建吃了敗仗，他仍然認為五省聯軍可以在江浙戰場取勝，《紐約時報》報導說：「孫傳芳對他的部隊進行了一次檢

閱，深信他的力量足以保衛上海，這是因為他的部隊在當時的中國部隊中，裝備算是最好的一支。」[2] 那麼，孫傳芳為何在短短兩年間便潰不成軍？

從孫傳芳這邊的原因來看，孫雖號稱「五省聯帥」，兵多將廣，但他是北洋後起之秀，內部複雜，可靠的基本部隊估計不到五萬人。很多將領表面上依附於孫，卻見風使舵，隨時變臉，紛紛被蔣介石收買和招降。不少原孫系將領後來在國軍中混得風生水起，如陳調元、陳儀、周鳳岐、賴世璜、林蔚、上官雲相等。

其次，北洋軍閥各自為政、各懷鬼胎，缺乏合作精神。當北伐軍在湖北、湖南與吳佩孚大戰時，孫傳芳不願加以援手，企圖坐收漁翁之利；等到吳佩孚大軍覆滅，北伐軍抽出手來對付孫傳芳時，孫已獨木難支。屢戰屢敗之後，孫不得已隻身北上，到張作霖在天津所居住的德記軍衣莊，向昔日的手下敗將負荊請罪、卑詞求援。雖然得到張作霖的援兵，將士離心的孫傳芳已無力回天。

以北伐軍那邊的原因來看，經過蘇俄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悉心訓練、先進武器的大量供給，「國民黨軍隊具備了高度的作戰能力、鋼鐵般的嚴格紀律，細緻的政治工作以及獻身於政治理想的決心」。[3] 北伐軍學會靠宣傳「主義」來征服人心，「革命軍氣盛，得人心，尤其是青年支持」。[4] 孫傳芳承認，五省聯軍戰敗的最大原因是「革命軍宣傳力太強」、「便衣隊防不勝防」。[5] 《國聞周報》亦評論說：「黨軍長處，在能以軍事政治並行。故師行所至，事半功倍，質言之，一舉一動，皆有政治的意味。」用蔣介石的話說就是：「北洋軍無主義，北伐軍有主義。」作為旁觀者的「海歸」胡適也指出，這是一場「無主義者與有主義者的對抗」，全國人心已經發生變化，「實由人心厭舊，怨毒已深，對新興之勢力，懷抱一種不可明言之企望」。

其實，孫傳芳不可謂全無主義。為對抗孫文的三民主義，孫傳芳曾提出「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的「三愛主義」，「用揭三愛主義，期與國人共相構榷」。其主要內容是：一曰愛國，「人民為求生存而組織國家，世界未統一以前，各國各有自立之根源，即各有自救之方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不肯以己殉人，始為真愛國」。二曰愛眾，「凡屬含生負氣之倫，皆在民胞物與之列。樂利必求其共用，政治則選賢與能，交際則講信修睦，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孤獨廢寡疾皆有所歸。……蓋國家事，非一人一黨所能為，故當泛愛合眾，以求多助，不宜分黨立異，以自樹敵。」三曰愛敵，「政黨政治，觀成於英美，流風所被，

波及東亞。然政黨政治，應以國家為前提，最忌一黨之專斷，最重各黨之友愛，政黨之相對雖有政敵之稱，而彼此尊重，實有切磋之雅。中國歷來具有實力者，但知競爭實利，實無政黨可言，而樹敵者之互為牴觸，各不相容，實為擾亂之重大原因」。[6]

就其內容而言，「三愛主義」未必不如三民主義，若孫傳芳找一群有論述能力的新式知識分子為之包裝潤色，或許會對民眾頗有吸引力。只是，在近代中國，主義要靠武力支撐，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共產主義之所以先後席捲天下，關鍵是以新式政黨的組織形式、大眾宣傳和黨對軍隊的軍隊控制，這樣讓主義與暴力機器融為一體。可惜，孫傳芳雖然提出三愛主義，卻只是抽象的、陳腐的口號，沒有能更新其統治方式，如同油浮在水面一樣。所以，三愛主義註定了無法與三民主義競爭，隨著孫傳芳的失敗，很快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重用丁文江，打造大上海

孫傳芳在全盛時期，「開府南京，領袖五省」，「吳越奉其正朔，朝野仰若天神」。其外貌不怒自威，吊梢眼、八字鬚，殺氣騰騰，實際上他在軍閥中算是儒雅聰慧之士，文公直評論說：「孫傳芳為北洋後起軍閥之最狡詐且有機警縱橫之才者。」徐一士評論說：「其良智有過人者也。」楊雲史則評論說，在出身於北方的將領中，「沉潛莫如閻（錫山），機智莫如孫（傳芳），北人之二雄也」。[7]外國記者亦較為公允地指出：「孫傳芳在北方軍人中還算是一位思想比較開明的將領，就是在行政方面，他也沒有什麼壞名聲。」[8]

孫傳芳是文武兼備的儒將，猶不忘禮賢下士，邀請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任政治顧問、科學家丁文江為經濟顧問、軍事家蔣百里及日本名將岡村寧次任高等軍事顧問，其幕府可謂群賢備至。梁啟超對孫傳芳的評價也不錯，當作為左傾青年的兒子梁思永詢問為何「梁派」多站在孫傳芳一邊時，梁啟超在家書中解釋說：「孫在北洋中總算比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總算比較的清明，丁在君（丁文江）、蔣百里與孫的合作並不算無理由。」[9]

孫傳芳佔據富庶的江南之後，將目光瞄準上海。一九二○年代，

上海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和商業中心，遠東第一大城市，與巴黎、倫敦、紐約并稱世界四大城市。由於上海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北洋政府高度重視上海華界的治理。一九二五年，北京臨時執政府宣佈淞滬地區為非軍事區域，設置淞滬商埠督辦，凡出任此職的人必須具有最高官等的特任職。孫傳芳既已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北京政府順水推舟任命其為淞滬商埠督辦，孫傳芳請來丁文江任負責具體事務的總辦。

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孫傳芳與丁文江聯袂赴上海就職。孫傳芳在就職演講中說：「特聘富有學術經驗之丁文江君，充任總辦之職，襄助辦理，以期淞滬商埠之各種事宜，得順利進行，推而至於收回公廨，收回租界，皆為鄙人今後之責任，鄙人做事，注重實際，不尚空談，極願以平日所懷從實際方面早日實現。」[10] 他進而立下誓言：「我設商埠公署的目的，是要發達淞滬商埠的；不是借商埠的名義，來籌款為擴充軍備而用的。」他保證公署的支出不向地方攤派，由他特別撥款維持。

在招待上海各界名流的會議中，孫透露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計劃：「我想在上海設一個機關，把地方行政權力集中在一起，使它有能力可以改良原有的市政，籌備未來的商埠，解決外交上的懸案，漸漸地把租界以外的上海造成一個模範市，然後以模範市的成績，為要求收回租界的根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志願。」孫希望將上海「建成真正的自治邦」，「淞滬介於兩省（江浙）之間又為全國商業中心，如將來治理得宜，再推至於兩省，即可越日本而上」。[11] 這個從上海到江浙再到全國的自下而上、由小到大的建設思路，跟梁啟超、章太炎倡導的聯省自治模式異曲同工。

孫傳芳宣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反對租界的存在，「每次我到一個通商口岸，都深感恥辱，因為通商口岸一直提醒著我們國家主權的喪失」。但他並非義和團式的盲目、矇昧的民族主義者，他看到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在治理能力上的缺失並勇於承認：「每次從租界到華界，都會感到穿過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是上層社會，而後者是下層社會，華界的許多東西，馬路、建築抑或是公共衛生，都無法和租界相比。這種對比構成了我們民族最大的恥辱，這種恥辱比我們喪失的主權還要大得多。」

所以，孫傳芳深信，只有建設好大上海，才可能廢除外國租界。此前，在建設大上海方面，有張謇的淞滬計劃、孫寶琦的特別市計劃，可惜都是紙上談兵。到了孫傳芳時代，才將建設計劃付諸實踐。孫努力整合公共資源，大刀闊斧地將此前的交涉使、上海道尹、淞滬警察廳長降職為淞滬督辦公署的處長。輿論評論說，大上海計劃是一

個大膽的中國近代城市發展計劃，可以視為中國新型大都市之濫觴。[12]

丁文江是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地質學家，同時對政治和軍事都有強烈興趣。知識分子要實現政治抱負，必須跟實力派人物合作。丁文江的思想集中於在一個穩定的地方統治者之下求得可能的行政解決辦法，而這位地方統治者要允許受過教育的專家採取主動的行政措施。在丁文江看來，「孫傳芳關心社會治安狀況和部隊紀律，抑制稅收，並公開宣稱為愛國而獻身，不失為一個『好』軍閥」。[13] 在軍事上頗為自負的孫傳芳自己辦金陵軍官學校，沒有接受丁文江當軍校校長的毛遂自薦，卻對其另外委以重任：讓丁文江出任上海的行政長官，同時也請丁文江擔其在外交事務方面的非正式發言人。

在短暫的八個月任期內，丁文江最大的成就是收回了西方列強在上海的治外法權。他率領一批中國當地的法律專家經過四個月的直接談判，使租界當局與上海市政府達成一次新的協議，租界法庭成為中國人掌握的司法機構。在內戰環境和國家缺少一個中央政府的情況下，這個協議是當時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14]

在市政方面，丁文江從督辦公署繼承的當地破爛攤子中，組建了一支現代化的警察隊伍以及衛生機關和財政機關。他對市機關僱員實行效率檢查，定期召開各部門首腦會議。他的改革計劃一直延伸到向開業醫生發放執照，建立訓練職業警察的學院、在全市學校強制實行教育標準，成立城市規劃委員會。五個月之後，稅收上升百分之二十，得以使用新的資金修築道路，以便向關心租界外沿道路的外國人顯示中國人的效率，並為這個擴大的城市帶來統一的交通網絡。[15]

丁文江任期內的種種舉措，對上海未來之發展影響重大。他以科學家的精神，悉心策劃，時間雖短，規模稍具，亦即此後上海設市之濫觴。胡適在五十年代回憶說：「我們在三十年後回想起來，丁在君（文江）當日擔任的建立一個統一的『大上海計劃』的工作確是一項有遠見有開創魄力的建設大事業，若沒有孫傳芳和陳陶遺（當時的江蘇省長）的完全合作，這個試驗絕沒有成功的希望。……孫傳芳想來不認得在君，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給他全權，在他八個月任內從沒有干涉他的用人之道，這不能不算是孫傳芳的政治家風度了。」可見，孫傳芳絕非一介武夫，若是在民主政治之下，他或許能夠通過建設地方的成績而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家。

浙江自治：聯省自治的最後一道微光

十九世紀中葉，清朝依靠曾國藩的湘軍剿滅太平天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從此大為削弱，督撫政治和地方自治初現雛形。庚子事變期間，劉坤一、張之洞等督撫發起「東南互保」運動，若是在強勢中央政府時代，此種「不奉旨」的行為形同叛亂，但逃竄西安的慈禧太后不得不認可乃至嘉許。辛亥革命發生，帝制終結，帝國轉型為共和國卻困難重重。袁世凱稱帝失敗，大大加劇了中央弱勢、各省自主之格局。

二十年代的聯省自治思潮和運動，在湖南、廣東、浙江三省有三次高潮。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湖南率先通過省憲草案審查，並交付公民投票。在十二月十一日的總投票中，以一千八百餘萬之「可決」對五十七萬之「否決」，省憲獲得絕大多數支持通過，並於次年一月一日在長沙正式公佈施行。然後，展開省議員選舉，全省選出一百六十四名省議員。半年之後，又是省長選舉，先由省議員選出七人，交由全省縣議員決選，出席投票者兩千五百九十三人，趙恒惕得一千五百八十一票，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16] 然而，一旦有野心家奪權，無軍隊支持的議會就無法招架。趙恒惕麾下的湘軍第四師師長、湘南善後督辦唐生智，羽翼豐滿，漸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一九二六年，唐生智進軍衡陽，趙恒惕不得已向省議會辭職。七月十四日，唐生智進入長沙，宣佈廢除湖南省憲法，解散省議會，結束了前後六年的湖南自治局面。

一九二一年初，廣東省議會選出省憲起草委員會起草省憲。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比湖南與浙江兩省的省憲晚幾個月。粵軍實力派人物陳炯明是廣東自治的操盤手，他推動政府頒布「暫行縣自治條例」、「暫行縣長選舉條例」和「暫行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使得縣級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務的決策權。陳炯明支持司法獨立，將地方法院分為地方審檢廳、一等地方法庭、二等地方法庭、三等地方法庭等四級。陳炯明在任期間，廣州市正式建市，建立立法、行政、財政、審計等機構。陳炯明堅持認為，「中國地方自治為達到共和唯一之路」，而「中國聯治可為世界自治國之模範」。[17] 廣東自治蒸蒸日上，卻未料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孫文。孫文不惜犧牲廣東一省以達成其武力統一全國的妄想，陳炯明不予認同，孫文便對陳炯明及其部將下暗殺令。陳炯明乃發兵驅逐孫文，此為結盟破裂，算不得「叛變」。孫文走投無路之際投靠蘇俄，

蘇俄遂幫助其建立黨軍。陳炯明被黨軍擊敗，退出政界。廣東淪為黨軍北伐的基地，國共之爭及國民黨內鬥不斷，廣東人民再無和平之日。

聯省自治的第三個高峰是孫傳芳時代的浙江。一九二五年年底，孫傳芳擊敗南下的奉軍，一生事業達到頂峰，浙江紳士甚至稱讚說，如此戰績「古今名將亦罕見」。孫傳芳在東南五省廢除督軍制度，標榜「浙人治浙」，地方財政絕對公開，減輕人民負擔，培養元氣，增修浙江省道，整頓沿海漁業，計劃開浚南湖水利，還支持工商業界參加在美國舉辦的世界博覽會。 [18]

在孫傳芳寬鬆的統治下，此前一度消沉的浙江自治運動再現生機。浙江自治聯合會召開大會，討論通過《浙江省自治法》。該法共十七章一百八十四條，堪稱一部小型憲法。其特點有五：第一，保障人權，保障省民之私有財產，保障省民自由發表意思之權以及集會、結社之權等。第二，擴大省權，國家對外締約，若有損及本省之權利或加重負擔，未經本省之同意者，得為適法之抗議，從而使中國的國體具有聯邦制的性質。第三，加大省議會之權，省議會可彈劾省長等高級官員。第四，強調弱勢群體的保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之性質。第五，重視教育，明確規定教育經費佔預算之百分之二十五，教育經費之十分之三作為義務教育經費。 [19]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浙江各界聯合會宣佈浙江自治政府成立。

然而，外部已無和平環境，浙江不是世外桃源。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與孫傳芳部在江西交火，全面大戰即將開打。浙江省第三屆議會和蘇、皖等三省聯合會發起「和平自治運動」，這個運動跟此前的自治運動相比已變質，其領導者大都是傾向國民黨的人士。孫傳芳表示妥協，答應「只要黨軍不入浙，自治可，獨立可，即將聯軍撤出浙江亦無不可」，並於十月任命在浙江頗具聲望的浙江人陳儀為浙江省長。然而，陳儀表面上對孫傳芳恭順，早已投靠蔣介石。若干年後，這個二二八屠殺的兇手又企圖遊說湯恩伯投共，被湯恩伯出賣，再被蔣介石槍殺，也算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十二月，孫軍進入杭州，扣押陳儀，宣佈取締蘇浙皖三省聯合會，通緝蔡元培等七十人，浙江自治遂告終結。消滅浙江自治的，不是孫傳芳，乃是蔣介石。

在湖南、廣東、浙江三地，聯省自治的推動者是趙恒惕、陳炯明、孫傳芳，消滅者則是唐生智、孫文和蔣介石。然而，在視大一統為絕對正確的主流歷史敘事中，前面三人成了叛徒或罪人，後面三人成了英雄與偉人。

論戰劉海粟，禁止模特兒

孫傳芳雖然留學日本，但只是學習軍事，一心追趕日本之船堅炮利，其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不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留學日本時，是明治末期，世紀之初的日本大致實現了「脫亞入歐」，文化開放，日新月異，孫傳芳卻不具備寬廣的眼界與心胸，未能擁抱新文化、新思維。他迷戀中國舊文化、舊道德，認為民國以來的混亂是因為「禮治不興」、「綱紀不振」，「人民無率由之規，風俗有隳遲之懼」[20]，便在東南各省復興儒學，在學校推動讀經和祭孔，請來國學大師章太炎籌劃「修訂禮樂制度」，舉行「雅歌投壺」典禮。孫傳芳刻舟求劍，抱殘守缺，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有趣的是，在北伐軍步步進逼之際，孫傳芳在戎馬生涯之餘，還有閒情逸致，與在上海法租界內開設美術學校、採取裸體模特兒的畫家劉海粟展開筆戰，以取締有傷風化的裸體模特兒為己任。這與蔣介石在抗戰的硝煙裡捨本逐末地發起「新生活運動」相比，同樣讓人哭笑不得。

入民國之後，沒有了皇帝，但皇帝意識陰魂不散，孔家店（儒家思想）仍然不倒，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國的普及非常困難，女子纏足、女子為亡夫殉節等「怪現狀」屢禁不止。不過，總有文化先鋒邁步向前。一九一七年，年輕畫家劉海粟在上海美專展覽人體畫，有人辱罵說「劉海粟是藝術叛徒，教育界之蟊賊」。一九二○年，上海美專延聘裸體女模特兒陳曉君，坊間傳言「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識的張競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錦暉，三是提倡一絲不掛的劉海粟」。上海有位議員姜懷素更攻擊說，美術學校採取人體模特兒教學，「足以喪失本性之羞恥，引起肉欲之衝動」。

北京政府電令孫傳芳取締劉海粟的學校。孫傳芳認同儒家「男女授受不親」之「大防」，一度計劃禁止男女同校，當然不能接受人體寫生，遂命令上海縣知事危道豐負責查禁。危道豐在經過調查之後彙報說：「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有人體標本之事，種種穢惡情形，不堪寓目。」因此下令嚴禁美術裸體畫。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劉海粟抱病撰文反駁孫傳芳的查禁命令，長文《劉海粟函請孫傳芳、陳遺陶兩長申斥危道豐文》在《申報》上發表。劉海粟強調說，裸體寫生「目的在明察人體構造，生動

歷程，精神體相，表現人類之偉大生命力，事極凡常」。他從希臘羅馬源遠流長的裸體繪畫和雕塑談起，「男體象徵人類剛毅之節概，女體象徵人類純潔之天性」，而「自醫學學校有人體解剖，美術學校即有生人模特兒」。他強調說，「人體作品為藝術上主要部分」，「歐、美、日本各國美術學校不計其數，美術館總計有百數十所，陳列先賢近人之人體作品不下萬千，藝術發達足以提高國家之文化」。[21] 不過，劉海粟只是針對危道豐開炮，將孫傳芳當作申訴對象，避免與之發生直接衝突。

六月三日，孫傳芳以個人名義，用文言文答覆劉海粟。即便不是其親筆撰寫，至少經過其過目、首肯。孫的主要觀點是：「生人模型，東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國素重禮教。凡事當以適國情為本，不必循人捨己，依樣葫蘆。……模特兒止為西洋畫之一端，是西洋畫之範圍，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術矣，去此模特兒，人必不議貴校美術之不完善。何必求全召毀。為維持禮教，防微杜漸計，實有不得不然者，望即撤去，於貴校名譽，有增無減。」[22] 該信口氣溫和、苦口婆心，並無淩人之盛氣，彷彿是兩名權利平等的公民公開辯論。

孫的放低身段並未換來劉的感激涕零。六月十日，劉海粟再度發文申辯，雖然肯定孫的目的是「顯揚儒術，教尚衣冠」，但強調「學術為天下公器，興廢繫於理事，事蹟在人間耳目」，所以仍要與孫爭辯。首先，劉海粟指出，早在民國十一年，政府的教育部門在制訂藝術專門課程時，就「列人體模型」為繪畫之必須。其次，自置人體模特兒以來，並未與禮教牴觸，學生與模特兒之間並未發生不軌之事。其三，龍門、雲岡的佛像有若干袒露身體，無損於佛法之莊嚴。最後，劉海粟綿裡藏針地宣告：「先生必欲廢止，粟可拜命，然吾國美術學校，除敝校外，各地都有，學制變更之事，非局一隅而已也，學術興廢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23] 也就是說，你可以查禁在你轄區之內的裸體模特兒，卻無法查禁在你轄區之外的裸體模特兒，學術和藝術的自由，不是誰可以一手遮天的。

孫傳芳在辯論中處於下風，只好以權力來壓制，讓地方政府對劉海粟發出通緝密令。由於劉海粟和美術學校在上海法租界，孫傳芳鞭長莫及，就由危道豐出面與法國領事協商。法國領事告知劉海粟，「中國官廳攻擊貴校，交涉四次」，雖「為之辯護四次」，已不勝其擾。六月三十日，劉海粟被迫決定暫時不用人體模特兒。

劉海粟表面上被壓服，但社會一般輿論卻對其頗為同情。《晨報》副刊刊登新月派人物張嘉鑄的文章，稱讚說：「劉海粟本人已成

了一尊巍巍豎立的雕像。」《小公報》發表一篇署名「摩得樂」的文章〈孫傳芳兩大禁令：旗袍與模特兒〉，對孫傳芳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孫傳芳以五省總司令赫赫權威，與幾個窮苦女人、無力文人劉海粟作對，以虎搏兔，勝之不武。我記得他從前禁止婦女穿旗袍，可是他那位賢內助去杭州降香，穿的卻是旗袍，人都看見了。這次劉先生縱然被征服，封禁模特兒，恐怕他的尊夫人援旗袍之舊例，給他個凡加提倡，或者以身作則，本身先作個模特兒，給他一人看不算稀奇，還要供大家觀賞。那才好玩得很呢，看孫大司令還維持禮教不？」

孫劉論戰乃是觀念之爭，孫傳芳對劉海粟並未趕盡殺絕，更沒有像北京的「狗肉將軍」張宗昌那樣，悍然槍殺新聞記者邵飄萍、林白水。而後的國共兩黨對不馴服的文人、學者和藝術家再也不會如此「吞舟是漏」。國民黨在二二八屠殺中殘忍地殺害了台灣頂級的畫家陳澄波。而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文學藝術家更不可能有跟統治者公開辯論的機會，被當作劣等賤民、「牛鬼蛇神」送入勞改營。在文革中，畫家吳湖帆、陳半丁、潘天壽等人含冤而死，畫家石魯、葉淺予、林風眠、李苦禪、黃胄等人九死一生，劉海粟亦備受紅衛兵的凌辱與折磨。那時，回想起四十年前與孫傳芳的那場論戰，劉海粟會不會感到孫傳芳其實有很可愛的一面？

「門羅主義」能保住錦繡東南嗎？

孫傳芳治理東南期間，曾發表《維護實業宣言》，支持地方經濟發展。他的部下說，如果不是北伐戰爭，孫傳芳「從容治理，則政治修明，商民樂業，熙皋之象，早已在東南半壁江山出現」。

孫傳芳既不參與外界爭端，也不受人擺佈，標榜「中國版的門羅主義」，「中國非統一不可，予將以門羅主義漸次施及全國」[24]，「今以徐州為大門，施行閉門主義。講求內治，以民意為依歸耳」[25]，「所以我抱定宗旨，在這種混戰的局面之下，任何方面，我都不參加，決計以五省為範圍，保境安民，以全副精神來整理內政」。[26]

孫傳芳的言論，大都採用儒家傳統文化的語彙，「門羅主義」是

他使用的極少數西方概念之一。門羅主義是美國的一項外交政策，一八二三年，美國總統門羅在國情咨文中說，美國不想奪取殖民地，但也不允許歐洲列強再將已經獨立的美洲國家當作殖民地。對於歐洲各國之間的爭端，或各國與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戰事，美國保持中立。一八五○年，「門羅主義」的說法出現，美國開始在外交事務中展現自己的立場。[27]

然而，美國可以奉行「門羅主義」，孫傳芳卻不具備實施「門羅主義」的條件。就地理而言，美洲與歐洲隔著大西洋，自成一地理單元；但東南各省在南面和西面同時受北伐軍之威脅。就政治現實而言，當時美國的實力已足以抗衡任何一個歐洲強國，但孫傳芳無力單獨與北伐軍抗衡。在此情形之下，孫傳芳的東南五省版的「門羅主義」，乃是故步自封、自取滅亡。

其實，早在北伐軍師出長沙時，孫傳芳的軍事顧問、號稱「民國軍膽」的蔣百里就向他提出三大對策：上策為突出奇兵，自江西出兵西進，腰斬北伐軍，斷其歸路；中策為待北伐軍圍攻武漢時，率大軍溯江西而上，可解武漢之圍，更可將勢力深入長江中游；下策是將主力佈防江西，以逸待勞，相機而動。孫傳芳由於在政治上實行「門羅主義」，在軍事上就選擇了保守的下策。

然而，此下策不足以自保。北伐軍在對付吳佩孚時，暫時承認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地位；等到吳佩孚戰敗，北伐軍立即從江西和福建兩面展開攻擊，孫傳芳這才發現大禍臨頭。研究民國軍事史的學者齊錫生指出：「北洋軍閥逃避不開國民黨分化和征服的策略，國民黨分化直系軍隊的戰略獲得成功，因為孫傳芳認為，無論是國民黨可能被吳佩孚打敗，還是吳佩孚被打敗了，國民黨會滿足於得到的領土而願意談判。」[28] 北洋內部並無嚴格的組織體系，也沒有規矩和原則來制約或統合，故而被北伐軍逐個擊破。孫傳芳錯誤評估了北伐軍的軍事實力和統一中國的意志，甚至認為可以跟國民黨劃地而治、和平競爭。殊不知，北伐軍早已將消滅孫傳芳當作戰爭的目標之一。

不過，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勝利也是暫時的。國民黨佔領了孫傳芳治下的東南五省，卻未能好好治理。在孫傳芳時代，孫傳芳特別注重利用江浙的財力發展江西的經濟，在富裕和貧窮的省份之間取得平衡。而南京政府只是把江浙兩個富庶省份作為統治中心，對待貧瘠的江西如同雞肋一般若即若離。經歷了北伐軍與五省聯軍的鏖戰，江西愈加貧瘠凋敝。毛澤東及中共有機可乘，在江西的井岡山和瑞金等地發動貧苦農民暴動，佔山為王，建立割據政權。蔣介石五度圍剿才讓紅軍「長征」，窮兵黷武而忽視民生政策，為蔣介石的失敗埋下伏筆。

中共在江西建立蘇區，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江西人民如同生活在人間地獄。直至國共內戰末期，國軍已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慘敗，隻身逃脫的胡璉將軍赴江西招募新兵，居然還能在國府前景黯淡的背景下招募到超過十萬新兵，重建十二兵團，可見江西民眾對中共何其痛恨。這支新軍後來大半漂流到台灣，胡璉在新竹辦怒潮學校加以整訓。不幸的是，其中部分官兵在柯遠芬的率領之下參與二二八屠殺。這些貧苦人家的子弟幸運地從國共內戰的絞肉機下逃生，卻又被國民黨誘騙去屠殺台灣人。二十世紀歷史的弔詭與血腥，讓人掩卷嘆息。

歷史已塵埃落定，後人卻可加以想像。倘若沒有黨軍北伐，孫傳芳從容整理東南各省，假以時日，江西亦成模範省，共產黨又豈能在江西肆虐，江西民眾又怎會遭遇殘酷的階級屠殺？[29]

龍潭一戰，東風不與「孫郎」便

孫傳芳統治江南各省時期，坐擁最富庶的半壁江山，儼然以三國時期孫權自居。[30] 然而，東風不與「孫郎」便，龍潭一戰，損兵折將，落花流水春去也。

龍潭戰役是孫傳芳與北伐軍之間一場決定生死成敗的戰役，也是北伐戰爭中最激烈、最凶險的戰役。龍潭戰役奠定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業，也使得孫傳芳從此一蹶不振。縱觀中國戰爭史，多由北方統一南方，北伐成功的例子極少，只有朱元璋取代元朝和國民革命軍推翻北洋政府兩例。不少國民黨元老對龍潭戰役印象猶深，于右任曾寫過一聯：「東南一戰無餘敵，黨國千年重此辭。」蔣介石也說：「此役關係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敗，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上實占重要之地位。」龍潭戰役關係重大，勝可繼續北伐，統一有望；敗則構成右路北伐軍主力的黃埔系、桂系都將不復存在，北伐只能偃旗息鼓。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夜，退守江北的孫傳芳精銳盡出，以十一個師又五個旅的兵力，在南京與鎮江之間渡江逆襲。為鼓舞官兵鬥志，孫傳芳命宣傳處編「作戰要訣」十條，發給參加渡江的全體官兵。

次日拂曉，長江晨霧迷茫，孫傳芳的主力進至江南，佔領烏龍山炮台、青龍山、黃龍山，以及堯化門外的龍潭火車站。滬寧線交通被切斷，蔣介石嫡系的何應欽第一軍首尾不能相顧。此時，李宗仁的第七軍主力佈置在南京西南的蕪湖、當塗方面，防備武漢方面唐生智的部隊東下。南京城內防守相當空虛。白崇禧見情勢危急，命令衛立煌部展開反擊，一度奪回龍潭火車站。

四十三歲的孫傳芳深知，此戰關係自己一世英名、北洋的命運以及五省聯軍的存亡，遂親自坐鎮龍潭火車站附近的中國水泥廠就近指揮。二十八日晚，孫軍發動猛烈攻勢，東線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寡不敵眾，紛紛後撤，幾至潰不成軍。與此同時，龍潭西邊的棲霞山第三次被孫軍攻佔。

南京城聞風震動，政府機關、黨部、報館紛紛將招牌取下，各人收拾行李，準備逃難。危難之際，連軍事委員會三巨頭之一的何應欽也準備帶第一軍撤離南京，退守杭州。李宗仁竭力說服何應欽堅守陣地，何答應上前線指揮，由此穩定了黃埔軍之軍心。

三十日，兩軍發起決戰。龍潭周圍數十里地域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戰鬥至為慘烈。孫軍已是強弩之末，彈藥、糧草不繼，且遭遇已投靠北伐軍的北洋政府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率領的艦隊攔截炮擊，本是背水之戰，卻水陸受敵，甚是狼狽。孫傳芳被迫下令全軍撤出龍潭，退往滬寧線以北、長江以南的狹長地帶。

以戰略而論，孫傳芳未能掌握制海權是其致命弱點。若孫傳芳擁有一支艦隊，有力支援渡江作戰的陸軍，戰局或許會截然不同。此前，孫傳芳佔有江浙等沿海身份，並曾在重視海權的日本留學，他在整頓軍備之時卻嚴重忽視海軍建設，五省聯軍獨缺海軍，顯示其仍是大陸型思維。 [31]

次日，國民革命軍發起反攻，孫軍全線潰敗。孫傳芳見大勢已去，只好率少數親信乘小火輪北逃。軍事史家評論說：「是役也，孫氏妄欲行險僥倖，以成希世之功，雖曰奇計，亦險著也。假令南都群公，稍有猶疑，則危急存亡，係於俄頃矣。孫亦人傑矣哉！」 [32]

至下午二時，龍潭戰役畫上句號，孫軍除少數渡江北遁和化裝逃跑外，大部被俘。此役，白崇禧、李宗仁、衛立煌等將領名聲鵲起。

一將功成萬骨枯，古今皆然。當時從上海趕至戰場的顧祝同回憶

說：「到處死屍橫陳，無人收埋，又值溽暑，腐臭難聞，人人掩鼻而過，其慘況迄今猶令人難忘，可見當時戰鬥的激烈！」另一位將領鄭洞國回憶說，戰役結束後，他請假到蘇州養病，火車經過棲霞山、龍潭時，仍聞到「強烈刺鼻的屍臭」。軍事史家文公直則評論說：「龍潭之戰為國民革命中重要一頁，就軍事之劇烈言之，則以龍潭附近數十里之地，集兩方軍隊十餘萬之眾，激戰七日，死傷數萬，其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史上之地位，蓋可與汀泗橋、武昌、南昌諸劇戰相等，或且過之。」[33]

在北洋的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三大系統中，孫軍成軍最晚，但戰力最強。孫軍既敗亡，奉軍更無法單獨抵抗北伐軍。次年國民黨的二次「北伐」，奉軍一路敗退，北伐軍再未遭遇如此慘烈的戰役。

從此，曾經是聲威顯赫的「馨帥」、「聯帥」的孫傳芳不再是軍事強人，他手中無一卒，腳下無寸土，依靠奉軍的支持，雖困獸猶鬥，已無足輕重。

一九二八年，奉軍敗退關外，張作霖斃命途中。張學良宣佈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還派兵清剿流落河北灤縣的孫傳芳、張宗昌的殘部。萬念俱灰的孫傳芳避居天津，篤信佛教，日日誦經。雖然放下了屠刀，最終仍死於弱女子施劍翹之刺殺──十年前，孫傳芳下令槍殺敵方將領施從濱，破了北洋不同派系作戰不殺被俘官兵之慣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僅五十一歲的孫傳芳死於施從濱女兒之手，算不算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呢？[34]

3　張作霖

「好總督」與「壞國王」

本大元帥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份子，假借中山主義，投降外人，宣傳赤化，害民禍國，背友蔑倫，種種罪惡，難於指數。……本大元帥為老友爭榮譽，為國民爭人格，為世界爭和平，仍當貫澈初旨，問罪興討，劍及履及，義無反顧。

──張作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在十三個省和三個特別區的支持下，五十二歲的張作霖接受了「安國軍總司令」的印信。二十七日，張作霖率領奉軍主力進入北京，並仿效滿清皇帝的入城儀式：命沿途百姓在其經過的道路上撒一層黃土。

此時，在北洋系統內，張作霖再沒有可以爭鋒的人物。曾經打敗過他的吳佩孚和孫傳芳，已被北伐軍打得滿地找牙，吳佩孚成了無足掛齒的孤家寡人，孫傳芳隻身北上求援且甘拜麾下。張作霖大筆一揮，任命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和閻錫山為安國軍副司令，但並沒有跟吳、閻商量過，彷彿他們是他的部下。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張作霖宣佈改組內閣，網羅外交家顧維鈞及若干研究系成員，借此避免給外界一種過分的奉系或軍人內閣的印象。實際上，大權操控在張作霖一人之手，這是一個赤裸裸的軍政權。「反共」是張作霖唯一的意識形態，在總司令部，懸掛著「推翻蘇聯共產主義」、「澈底摧毀共產主義」的標語。 [1]

張作霖與蔣介石和馮玉祥的對立，不再是此前北洋軍閥內部亦敵亦友、時敵時友的關係，權力爭奪變成了不同社會政治秩序及其背後意識形態的鬥爭。「國民黨和國民軍把『軍閥』統治者看成是封建主義的，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時代裡它是不合時宜、不能容忍的。奉系和直系則把國民黨和國民軍看成是『赤色』的，是傳統原則的破壞者。他們不再具有共同的觀點，因而不再希望繼續維持這個系統。於是，權力均勢系統不可能繼續存在。」[2]

安國軍偏偏不能「安國」，在河南、江蘇和山東等地屢遭敗績。蔣介石以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人的身份，向張作霖開出和平條件：宣佈信奉三民主義，將安國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出任「東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由此，南京方面將張作霖的地位降低到地方層級。

張作霖為了將其地位提高到與南方「對等」，不惜終止中華民國法統，成立「安國軍政府」。六月十六日，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通電擁戴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以完成「討赤大業」。十八日，張作霖在中南海懷仁堂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就職典禮冷冷清清。身材瘦小、穿著大元帥禮服、佩戴閃閃勛章的張作霖，登上了人生的最頂峰。張作霖任命潘復為內閣總理，發表九個總長名單，並發佈軍政府「組織令」。該「組織令」規定，「大元帥」不僅統治全國陸海軍，而且在軍事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國務院「輔助」大元帥執行政務。大元帥就是不經選舉而產生的「大總統」。[3]

張作霖陰差陽錯地成了北洋最後一任「名不正、言不順」的國家元首。面容猥瑣、目露凶光的張作霖，「望之不似人君」。張作霖多次對手下說，民國初年他以區區師長身份獲袁世凱召見，「哎！人家做總統，才有帝王之相呢！」這一天，張作霖在就職儀式上有氣無力地唸完誓詞，似乎耗盡了全部力氣。

組建新政府未能帶來「沖喜」的果效，前線不斷傳來噩耗。張作霖日漸消沉，夜夜笙歌。當時在順承王府安國軍總司令部擔任幕僚的薛觀瀾回憶說：張老帥喜熬夜，整個下午為老帥晝寢時間，無人敢高聲。副官長楊毓珣看到大局潰爛，當面頂撞說：「老帥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張作霖文化程度有限，沒有聽懂這句話的意思。[4] 終於過了一番「皇帝癮」的張作霖，渾然不覺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後一年，北京政府亦將斷送在他手上。

從土匪頭子到奉系首領

北洋第二代「大帥」大都出身於社會底層：吳佩孚是落魄秀才，孫傳芳是寡母養大的吃不飽飯的孩子，而馮玉祥是陪伴少爺玩耍的僱農的兒子。與他們相比，張作霖的出身更加卑賤，他的父親是賭徒兼土匪，在他十歲時就過世了。少年時代的張作霖賣過包子，當過貨郎，學過木匠，隨繼父學過獸醫、相馬。他在本地的小客棧當雜役，也在清軍中當過兵，二十二歲時加入「綠林」。不過，張作霖唸過私塾，書法尚可，也喜歡附庸風雅、結交文人。

一九○二年，張作霖率兩百多名土匪，接受清軍將領張錫鑾的招安，被任命為新民府巡警營馬隊幫帶（相當於副營職）。日俄戰爭期間，他時而為俄國人服務，時而向日本人提供情報，是雙面間諜。滿洲居民大都是為了逃荒而從關內移居關外的冒險家，不受皇權和禮教束縛，沒有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他們對於孱弱的中央政府與前來奪取土地和資源的俄國人、日本人一視同仁地看待，唯一的判斷標準是誰能少收賦稅並提供較好的安全保障。張作霖當時的選擇無可厚非。

當日軍佔領新民時，張作霖被日軍逮捕，並以俄國間諜的罪名判處死刑。最後時刻，張作霖自我辯護說，他曾為日本人服務，以後更可為日軍提供重要情報。有一位名叫井戶川辰三的日軍中尉發現，這名囚徒外貌如女性般柔弱，說話卻大膽而直率，覺得他可能對日軍有用，遂向上級建議特赦之。結果，這份生死攸關的文件送到作戰參謀田中義一中校手中，田中義一決定免其一死。[5]

二十多年以後，張作霖成了東北的最高統治者，田中義一成了日本首相，他們的命運再一次神秘地糾纏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張作霖乘坐專列從北京返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坊間紛傳是日本關東軍所為。田中義一宣佈進行獨立調查，嚴懲當事人，後又表示此事與日方無關。田中義一向登基不久的裕仁天皇呈送了兩份截然相反的報告。裕仁為之震怒，斥責說：「這麼說不是有違前言嗎？我沒有再聽的必要了，你提出辭職吧！」在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中，天皇從未當面逼迫首相辭職。不被天皇信任、也遭軍部壓迫的田中義一被迫下臺。[6] 田中義一大概從未想到，他當年赦免的一名土匪頭子的死亡事件，終結了他的首相生涯。

張作霖在滿洲數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中崛起。在滿清統治中國的

最後歲月裡，清廷發現作為滿族「龍興之地」的滿洲成為列強覬覦的一塊肥肉，若不更換治理方式，這塊土地就保不住了。於是，清廷將東三省設置為行省，設立一名總督和三名巡撫一同治理。首任總督是在北洋新軍中地位僅次於袁世凱的徐世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即波及全國。張作霖以「勤王」的名義進軍盛京，他擁有數千名精銳軍隊，一躍成為東北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全國陸軍整編，張作霖部被編為第二十七師。一九一五年，張作霖支持袁世凱洪憲稱帝，被袁封為二等子爵、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

接下來幾年間，張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混亂和孱弱，奪取了對吉林和黑龍江的控制權，被中央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領奉天督軍並兼任省長。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中，他成了兇猛的東北虎。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節制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都統。滿蒙都在其控制之下，作為漢人，他鎮壓滿人和蒙古人的獨立運動毫不手軟。在其有生之年，對東北的牢牢控制從未被打破──最大的一次危機是郭松齡兵變。

早年貧寒卑賤、餐風露宿，每天都在與死亡擦肩而過的土匪生活已成為過去。張作霖出行時，有一支特別組織的重裝保鏢護衛，他們都是奉天講武堂畢業生。他在底特律訂購了一台由厚裝甲打造的豪華轎車，有鋼鐵百葉窗，並留有六個貼身保鏢的位置。它還裝有一架口徑五十毫米的水冷機槍，連美國總統的座駕都自慚形穢。張作霖居住在奉天郊區按照法國城堡樣式修建的宅邸中，陸續娶了五個夫人，她們為他生育了許多孩子。

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應運而生：從跨入二十世紀的那些混亂年代開始，以控制一群馬賊的幾個結盟兄弟為核心的軍事力量，發展成複雜的、難以對付的集團。強大的軍事機器和民政官僚體系也隨之建立起來。在那個時期的中國軍事政治學中，奉系軍閥集團是一個非常難於下定義的組織：它既沒有像政黨那樣在思想上的一致性，也沒有像秘密社團結盟兄弟那樣在信念上的一致性。它更缺乏共有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意識，甚至缺乏一個具有超凡領袖魅力的首領──人們幾乎不會對張作霖提出這樣的要求。[7]

奉系的延續性和凝聚力卻超過皖系和直系。皖系領袖段祺瑞和直系領袖吳佩孚比張作霖更有能力和魅力，但他們對本系統將領和政客的控制沒有張作霖那麼嚴密。東北處於中國文化的邊緣地帶，跟在

「孔孟之鄉」山東出生的吳佩孚相比，張作霖離儒家「大傳統」更遠，左右其思想意識的是同樣左右毛澤東的民間的、低級的小說和戲曲。奉系內部是封建式等級結構，更原始，更粗陋，或者說更接近以《水滸傳》為代表的中國黑暗文化。張作霖給東北講武堂題寫的校訓是「良心」。所謂「良心」，對於張作霖來說，就是要讓部下人人有官做，人人有財發，人人有飯吃。[8]

如同孫傳芳創制「三愛主義」來對抗「三民主義」一樣，張作霖也委託下屬中文化素養最高的許蘭洲將軍杜撰一個可以借此團結東北人的思想體系。張作霖對任何西方現代理念都不感興趣，才會選擇同樣沒有西學背景、迷戀中國武術的許蘭洲承擔此一工作。許蘭洲大略地節取儒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教義，創立並宣傳一種古怪的「五教之合」—東北盛產此類怪力亂神的玩意。大概張作霖也覺得這套把戲沒有說服力，未加採納。[9] 張作霖在意識形態上的弱點，意味著他幾乎不能吸引東北地區之外的追隨者，對其他地區也只能進行不穩定的軍事統治。

大部分軍閥一次失敗就永遠失敗，因為失敗意味著失去軍隊和地盤。而奉系有一個從未被外敵威脅乃至侵佔的大本營—東三省，張作霖每次出關戰敗都能退回老家休養生息、整軍備戰。這種優勢，來自張作霖本人的老謀深算，也來自東三省地理和空間上的特殊性：東三省如關內的鏡像一樣存在著，但兩者被山海關所隔開，那裡是長城的最東端，與海相接。中央政府的權威愈來愈無法穿過此關而到達「東北堡壘」。從二十年代初開始，張作霖就停止將大部分稅收匯往中央。[10] 當然，更關鍵的原因是日本向張作霖提供的保護—日本在滿洲的經略與張作霖在滿洲的開發，既有互相競爭的一面，也有作為利益共同體的一面。每一次張作霖兵敗如山倒之時，日本都會阻攔張作霖的敵人乘勝追擊。比如，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大獲全勝，本來計劃乘勝追擊、直搗黃龍，卻被日本所阻止，並迫使雙方簽署和約，如此才會有幾年後張作霖的捲土重來。

中國之東北，或東亞之滿洲？

作為軍閥，張作霖的軍事才能不如吳佩孚—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

作霖獲勝，是因為馮玉祥陣前倒戈，讓直系遭到釜底抽薪，以致無力再戰。張作霖不具備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使得奉軍敗給了裝備上更弱的北伐軍。但張作霖對東北的悉心經營成果斐然，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陳炯明經營廣東、閻錫山經營山西和李宗仁、白崇禧經營廣西。

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之後，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佈免去張作霖本兼各職，但這個命令不可能實施。張作霖在東三省樹大根深的地位非北京政府一紙命令所能動搖。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東三省議會在張作霖的操縱下，宣佈推舉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宣佈東三省「自治」，與北京政府斷絕關係。由此，張作霖治下的東三省處於獨立或高度「自治」狀態，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直接佔領東北。

此時的東北不單單是中國的幾個省份，也是列強在東亞的競技場，是外國人覬覦的「滿洲」。其實，滿洲一詞最早由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在一六三五年使用，來自藏語，意思是「東方的光明」。近代以來，日本和沙俄賦予「滿洲」以新的意涵：「滿洲」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無主之土，能者得之。[11] 張作霖不得不接受沙俄和日本的勢力像釘子一樣深深鑲嵌在東北的事實：沙俄修建的中東鐵路和日本修建的南滿鐵路，以及由此獲取的在東北的各項特權，從滿清到民國的中央政府都以條約的形式確定，不可能奢望張作霖以一己之力統統廢除。更何況，張作霖父子也先後跟蘇俄和日本簽訂了條約，他們對東北並沒有完全的統治權。[12]

在「中國的東北」和「東亞的滿洲」的夾縫中，張作霖治理東三省自有一套。一八九七年到中國宣教、大半生時間都在東北度過的愛爾蘭傳教士弗雷德里克評論說：「東北人的主流觀點對這位統治者持正面評價，因為他統治下的長城外的廣闊地區維持了和平狀態。在這個全中國都處於亂局的時代，東三省幾乎是唯一的特例。……尤其在張作霖統治的早中期，他為東北帶來不少利益。他自己雖沒有上過學，但他支持建設最新的教育體系，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即便在他發動戰爭而浪費大量金錢時，教育的發展也沒有被擱置和荒廢。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賭博和沉迷麻將的人少了，人們對鴉片也不再那麼熱衷。」那時，外國人受到保護，歐洲人和美國人經商也未受阻撓。基督教會獲得充分的發展空間，張作霖友善地對待傳教士，傳教士的工作不大受警察的監督和干擾，這與後來的日據時期有重大區別。張作霖多年來均向瀋陽教會醫院捐款，還資助醫學院。[13]

張作霖知道自己才能有限，放膽使用文武官員，他比段祺瑞、吳

佩孚和馮玉祥都善於用人。張作霖對王永江的重用，如同孫傳芳對陳遺陶的重用。一九二二年，財政專家王永江出任奉天代理省長兼財政廳長，王對奉天的發展充滿信心：「為政之要諦在於使民富裕，富民則專賴振興實業。我奉天土地膏腴，氣候溫和，物產豐盛為各省之冠，誠足以天然之物產興辦各種實業。如能因勢利導逐漸擴大，不出數載其財力雄厚必為他省所不及。」王永江提出一系列實業政策：「於山地振興礦業，水邊振興漁業，於平原振興農業，沙漠振興畜牧業。」他還將大量官營事業改為民營，給東北經濟注入活力。[14]

王永江展開一系列現代化政策，包括貨幣改革、紡織製造業、公路和鐵路建設、電報和電話服務、移民計劃和新興商業，帶來經濟的大幅增長。張作霖對王永江獨具的敏銳判斷力、謹慎的行政改革及其對奉軍帶來的利益十分欣賞。[15] 而在由富有商人、工業家、投資者以及知識分子所組成的精英圈子中，王永江是一位頗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人物。多年之後，蔣介石巡視東北時，特別向當地人詢問東北是否還有王永江那樣的人才。

短短數年間，奉天的各種建設飛躍進步，凌駕關內各省之上。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也隨之增加。一九二六年，稅收合計六千一百五十三萬元，輿論評論說：「東北財賦之歲增額，有如幾何之累數，庫入之豐，允稱奇蹟。」[16] 跟華北的艱苦生活比起來，東北宛如天堂。一九二一年一名在奉天工作的苦力每個月可掙十八元，在山東的農民只能掙四元。王永江鼓勵華北移民到東北，給他們土地產權和賦稅優惠，直到一九二七年，每年有二十至四十萬移民來東北。與當時中國其他地方的戰亂相比，東北如應許之地一樣，給人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懼。隨著人力和資金的大量湧入，東北在中國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17]

王永江的政府精兵簡政，與後來國共兩黨冗員充斥、人浮於事對照鮮明。以省長公署第一科而言，該科負責人事、吏治、財政、外交、蒙旗等事項，所管之事，相當繁多。然而，其公務員人數極少，除會計、庶務、收發、管卷以外，僅有主任一人、主稿一人，科員四人，辦事員三人，一共才九人。王永江以身作則，身邊不設秘書，凡事親力親為。

張作霖和王永江都重視教育事業。一九二九年，奉天全省有小學一萬多所，在校學生達六十萬人。一九二三年，又創辦東北大學，王永江親自兼任校長，張作霖從不干預學校事務。東北大學很快發展為中國規模最大、經費最多的大學，其年度經費相當於北京大學的三倍多。凡東北大學教授一律發銀元且不許拖欠。日本學者新島淳良說：

「作為省立大學，東北大學的實驗設備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國立大學高許多。這所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優秀大學，它的教育水準無疑高於日本在滿洲開辦的教育院校。」[18]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東三省在民生、經濟、社會安全等方面優於關內各省。但是，在東三省內部，張作霖父子統治的城市、區域和行業，跟日本人統治的城市、區域和行業相比，又相形見絀。這一點，即便是深具愛國心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承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四川實業家盧作孚到東北考察，寫出《東北遊記》一書，感嘆滿鐵株式會社「經營礦業、航業、碼頭、旅社，乃至學校、醫院，以及其他一切公共事業，差不多權力之大，等於一個政府了」，滿鐵設有「滿蒙資源館」和「中央試驗所」，對滿蒙的資源瞭如指掌。日本人管理的地方，從城市到鐵路、碼頭，秩序井然，「與長江各碼頭比較，這種現象尤其是顯然不同的」。[19]

盧作孚發現，同樣是公務員，「日人事業中的職員是怎樣明瞭其事業的全域」；反之，「我們一到中國機關訪問，則接洽或領導的人員，一切茫然」。張學良治下的瀋陽與日本人治下的大連宛如兩個世界：「（瀋陽）有無數市民仍在地獄之中。道路積滿灰塵，任風飛揚；穢水、穢物，點綴左右，任它奇臭。人則侷促於破爛房屋裡，衣服面目亦同周圍環境一樣不肯講究。中國人真有守舊的精神，連野心侵略者緊迫著在旁的影響，都不容易接受。」[20]

就治理的績效而言，如果剔除民族主義和政治正確的因素，回到事實本身，必須承認，日本人優於張作霖，張作霖優於國民黨，國民黨優於共產黨。張作霖時代和滿洲國時代東北亞最富庶的東三省，在共產黨統治七十多年後，淪為貧弱、汙染、失業的絕望之地，誰之過？

如果是一名生活在一九二七年的一名普通華人，可以選擇其居住地，該如何選擇呢？從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出發，首選或許是像胡適和劉吶鷗那樣居住在上海租界，其次是日治下的台灣，再次是張作霖統治的東北，再次是國民黨統治的南方各省，最後才會是共產黨割據的井岡山等地。

是坐擁東北，還是問鼎中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南京、武漢雙方分頭進攻華北。日本田中內閣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登陸青島。北京政府外長顧維鈞、南京政府外長伍朝樞、武漢政府外長陳友仁先後對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日本外交評論家清澤冽嘲諷說：「我們當時對於同一個事件，從同一個國家同時提出三個抗議，覺得這種國家哪裡有其主張的不可侵犯的主權。……一個國家有三個皆主張其為正統政府的機關，國際法不是以此種國家為前提而成立的。」[21] 這種刺激，讓逐鹿中原的三方更堅定了統一全國的意志。

縱觀張作霖的一生，什麼時候滿足於坐擁東北，他和東三省的民眾就其樂融融；什麼時候想要問鼎中原，他和東三省的民眾就苦不堪言。然而，張作霖始終沒有放棄統一中國的訴求，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稱王稱霸」以及留名青史的野心，更是由客觀環境和時代氛圍形成的、難以抗拒的合力。張作霖的野心，遠遠超出了東北，就像希臘悲劇中所有毀滅的根源。他想成為北京的主人，從而領導中華民國。對他來說，東北就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自然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寶庫，一個為他向中原擴張勢力提供所需資源的基地。[22]

國家統一是中國應對近代以來國際政治壓力的必然條件，更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信念。「國家應該統一的原則得到全國從學者到農民的一致贊同，成為一條毋庸置疑的信念。這個觀點指導和規定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個政治組織如果敢於違背這個全國一致贊同的信念，它就別想得到人民對其權威的承認。」即便是張作霖這個最具地方主義思想的軍閥，也禁不住「統一中國」的巨大壓力和誘惑，「普遍地贊成國家統一，使所有軍閥的合法性產生了危機，他們陷入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獨立性，又無法否認國家統一原則的矛盾之中」。[23]

經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短暫的寧靜之後，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復出後的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改編國民革命軍為四個集團軍、一百萬人，發起「二次北伐」。與此同時，張作霖也在北京召集軍事會議，確定作戰方案。此前，吳佩孚犯了兩線作戰的錯誤而全軍覆滅，張作霖又犯了同樣的錯誤：防守津浦線，以精銳兵力消滅馮玉祥國民軍及已經投向國民黨的閻錫山部，再回頭與蔣介石決戰。

四月七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北伐軍擊敗孫傳芳、張宗昌部，馮玉祥和閻錫山攻入石家莊。張作霖嘗到兩線失利的苦果，將安國軍撤退至保定、河間、滄州一線固守。五月二十八日，北伐軍發動總攻，安國軍再度潰敗。張作霖大勢已去。

張作霖不僅在戰場上兩線作戰，奉系內部也有一股呼籲他固守東北、不問中原的強大力量。這一立場的代表人物正是王永江。王永江倡導「保境安民」、發展經濟，他所呈現的是資產階級理性、務實的立場。王永江快速抓住工業、建築、通訊、商業和銀行的新想法和新手段，改變了東北的面貌，為此後東北地區成為中國的工業中心打下了基礎。王永江和他的行政團隊認為，為了本省的經濟利益，省級稅收一定要盡可能多地再投資於本地區。[24] 他們希望張作霖放棄統一中國的迷夢，反對蠻不講理的戰爭冒險。這一立場正好與日本的軍事以及民政領袖的看法相一致——日本人一再阻止張作霖入關。

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張作霖將主要精力從經營東北轉移到控制中央政府上。東北最有價值的資源，從人員和牲畜，到食物和煤炭，都被搜刮一空，去支持在華北乃至深入南方的奉軍。不久，被置於巨大張力之下的東三省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顯現出破裂的跡象。王永江以辭職向張作霖發出警告，可是這一次張作霖沒有接受這個警告。王永江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家鄉金州去世，年僅五十五歲。這位為實現有序政府而夙夜匪懈的官員，被一個軍閥的武力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所擊敗。[25] 但他生前為東北帶來的短暫的復興卻證明了，清朝滅亡後的幾十年間，不全是黑暗與絕望，儘管國家瓦解的凶兆如影隨形。民國初期的中國依然是一個有著驚人活力的、通常運行良好的社會，一個活躍的、創造中和建設中的社會。

張作霖忙於在北京指揮對國民黨軍隊作戰，沒有參加王永江的葬禮，不過他的生命也只有幾個月了。張作霖不聽王永江的勸告，在主戰派楊宇霆等人的鼓動下，拿出全部老本逐鹿中原，最終輸得精光。奉軍出關，唯一的收穫就是張作霖當上大元帥，卻賠上身家性命。

張作霖的登場，加速了北洋政府的覆滅。北洋政府的統治，前後十七年，始終處於間歇性的波動之中：

> 自總統、國會、內閣，以至大軍閥之起伏，小軍閥之升沉，如戲劇之一幕一幕，如弈棋之一局一局。北洋時代，八易元首，三次攝政。以總統而言，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前四任還算有章有法，然後是黎元洪之復職、曹錕賄選、段祺瑞任執政以及張作霖

任陸海軍大元帥，沐猴而冠、法統已亂。……總統如此，總理和內閣更是走馬燈般替換。以此統御如此廣大之國家，延長其政權，自不可能。 [26]

張作霖以大元帥取代大總統，是不得已而為之。國會已被段祺瑞解散，即便張作霖想如曹錕那樣賄選也不可得。在戰爭的硝煙中，他只好因陋就簡、匆匆登基。一九二八年春節除夕，張作霖仿效他最崇拜的袁世凱到天壇舉行祭天儀式，雙膝跪地，聲嘶力竭，呼天搶地，卻被旁人看作笑柄。他組建軍政府的做法，破壞了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失去了北方的民心。

北洋軍人原本是晚清最早受過西化教育的精英階層，從袁世凱、段祺瑞到曹錕，再到張作霖、張宗昌，其「成色」江河日下，其威望消耗殆盡。「縱觀北洋全域，袁世凱固是開創之祖，段祺瑞實為不祧之宗。吳佩孚啟北洋分裂之端，曹仲珊（錕）成北洋式微之漸。張作霖結北洋殘破之局，閻錫山收北伐勝利之果。國民黨享打倒軍閥完成統一之名。」 [27] 然而，就個人人品而言，即便是在北洋巨頭中被漫畫化最嚴重的張作霖，也遠優於國共兩黨的獨裁者蔣介石和毛澤東。北洋政府的失敗，不是民主、憲政、共和制度在中國實踐的失敗，而是一戰以後華盛頓和會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失敗，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學徒期根本不算長，困難也不比別的學徒多。她迅速放棄了國會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為遠東體系的崩潰。」 [28]

炸死張作霖的元兇，不是日本，而是蘇俄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下午，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晚八時，留守人員為之舉行告別晚宴，張作霖毫無食慾，且神不守舍。次日凌晨，張作霖由國務總理潘復等高官陪同，乘車駛往前門車站。臨行前，他命令許蘭洲將安國軍大元帥的印、旗，以及國務院的印信、外交部的檔案運往關外，做好隨時打回北京的準備。 [29]

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場景：「沿著新綠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從過去住了兩年的大元帥府正門出來，經過窗子，依依不捨地回望中南海樹叢的張作霖的眼睛裡，竟閃著光芒。」此前，張作霖多次因戰敗而逃離北京，但這一次氣氛尤其冷寂。凌晨二時三十分，列車啟動，駛出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五點二十分，專列經過皇姑屯時，發生了可怕的爆炸。張作霖的保衛處長溫守善受了輕傷，如此記述血腥的場面：

> 早晨五六點鐘，張和吳（俊升）望著車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綠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火車穿行老道口交叉點時，轟隆一聲巨響，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節車廂炸碎。……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當時沒死，內傷看不清，只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汙染領襟，我用一個大綢子給堵上了。然後我和張學曾把張作霖抱到趕來的齊思銘的汽車上。看樣子，張非常難受，已神志模糊。[30]

當時，輿論一致將肇事者指向關東軍。日本政府在調查報告中加以否認，卻無人相信。中國史學界認定幕後兇手是關東軍，日本和西方學者也大都接受此一觀點。

戰後多年，日本背負戰敗者的恥辱，知識界是左翼佔上風，很少有人對關東軍暗殺張作霖這一「不言自明的事實」有所懷疑。近年來，有一些日本學者發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歷史學家加藤康男在《解謎炸死張作霖事件》一書中指出，河本大作暗殺張作霖之說是謊言。當時奉天領事內田五郎命令館員所繪製的示意圖，成為河本大作並不是首謀犯的證據。內田五郎將這張圖交給英國人，加藤在倫敦的英國公文書館內發現了這份決定性的證據。

日本歷史學者宮協淳子認為，張學良和他的部下相當可疑。張學

良早已是國民黨員，後來發動西安事變，證明他是共產國際內部人員。或許他成為國民黨員，只是為了隱藏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31] 站在日本的立場來看，「張作霖平安無事撤回滿洲是好的，反之，他的死沒有任何加分作用。」[32] 宮協淳子也將矛頭指向蘇俄：「老是想著要讓中國人和日本人起爭執的蘇維埃，絕對很可疑。日本人雖然不是主犯，但是這件事之所以被視為日本人所為，是因為日本人之中，的確有部分人信奉世界共產主義、同情革命，而這些人在這件事中摻了一腳。」[33]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將大量原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的檔案解密。這些解密檔案讓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一九二○年代末期，與張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勢力，不是日本，而是蘇俄。張作霖最堅決反對「赤化」，多次嘗試收回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的權益，嚴厲打擊蘇俄特務在東北的活動。張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後，與蘇俄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他命令軍警衝入蘇俄駐北京使館，逮捕並處決躲藏在內的李大釗等中共要員，查獲並公佈蘇俄利用共產國際等組織顛覆北京政府的檔案。

一九二八年初，張作霖預感到難以守住華北，需要與日本就東北的未來達成妥協。他派負責外交事務的心腹于沖漢去日本，與日方簽訂了《滿洲獨立密約》。其主要內容是，日本繼續支持張作霖統治滿洲，張作霖必須同意以下條件：成立「獨立滿洲共和國」，包括滿洲和內蒙古地區，受日本保護；日本將外蒙古變成緩衝國；「獨立滿洲共和國」雖不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為敵，但禁止從事「赤色」宣傳和「赤色」運動；滿洲政府與日本政府共同反對蘇聯政府對東北地區的蠶食和滲透等。[34]

這份密約達成後，日本與張作霖的緊張關係改善，日本不再有除去張作霖的理由。對於日本而言，這種「代理統治」是代價最小的方式。而蘇俄在第一時間就通過間諜獲知此一密約，史達林為之震怒，蘇共政治局下達對張作霖的暗殺令：「該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35]

曾任列寧貼身保鏢、時任蘇聯國家保衛總局局長的緬任斯基（Vyacheslav Menzhinsky），向下屬發出指示：「必須選擇大智大勇、一擊必中的同志，完成這項極為特殊的任務。」蘇聯情報機關挑選了頂級特務出馬。這項行動的負責人為「冷面殺手」埃廷貢，此人在「全俄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即KGB之前身）的「特別行動小組」工作多年，此後還策劃了對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殺。這位擁有少將軍銜的殺手，一九五一年出任國家安全部情報局副局長。這項行動的參與者還有武器專家維納羅夫及其妻子、軍

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以及負責招募亞裔特工和負責外圍工作的資深情報員薩爾嫩。 [36]

行動前夕，莫斯科給該小組發去密電：「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媒體，做好宣傳工作。」 [37]

就在張作霖的列車啟動之後幾分鐘，遠在奉天的薩爾嫩接到密電，特工們迅速行動起來。如同此前多次演練的那樣，埃廷貢帶著兩名亞裔特工，於三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準備好的四十袋共一百五十公斤炸藥秘密擺放在老道口三洞橋下，然後躲藏到十多米外的路基下。當張作霖的專列疾馳而來之時，埃廷貢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事件發生後，蘇俄的宣傳機器開動起來，咬定是日本所為。關東軍在千夫所指之下，無論如何辯白都脫離不了關係。而張學良由此蛻變成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接掌東北的權力之後，宣佈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 [38]

二戰結束之後，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突然在國際法庭作證，承認自己是皇姑屯事件的策劃人。河本大作的證詞似乎坐實了關東軍的陰謀。然而，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河本大作的證詞乃是其恩師岡田啟介在蘇聯的指導下完成的。岡田啟介在戰前曾任日本首相，在少壯派軍官發動的「二二六」未遂政變之後被迫辭職，從此憤世嫉俗，思想左傾，並受蘇聯傳奇間諜佐爾格之招募，向蘇聯提供機密情報。佐爾格被捕並被處死，沒有供出岡田，岡田繼續與蘇聯保持聯繫。

當東京國際法庭開審並計劃重啟對皇姑屯事件的調查之際，蘇聯唯恐真相敗露，安排岡田配合演戲。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給岡田發去密電：「請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子弟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楚，使之同意：該案件係自己勢力所為。具體人員由您來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為其準備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明：該爆炸案是由自己領導並組織實施的。」 [39]

岡田挑選了他的弟子河本大作出庭作證。當時，河本正躲藏在東北，隨時可能被當作戰犯抓捕並處決，在走投無路之下，他同意了蘇聯的合作建議。

即便如此，東京國際法庭的專家們經過長達三年的調查取證，以「缺乏可信性和實際證據」為由，決定不對此案專門立案審理，並得出結論：案犯不列為疑犯，皇姑屯事件仍是「懸案」。蘇聯方面掩飾真相的目的也達成了。

張作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人物，如果在過去的時代，他有可能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的流氓無產者那樣歷經千辛萬苦而登上皇帝的龍椅。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華民國，他卻是一個過時的、註定會失敗的人物。

曾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和日本政府內務大臣、外務大臣的後藤新平，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九月，兩次對滿洲進行政治考察，認為必須放棄支持其他勢力，全力扶持親日的張作霖。他在《關於滿蒙日本軍隊的行動》一書中如此評論張作霖：

> 張作霖在滿洲有一種特別之地位，他並無特殊的履歷，也與中國中央政府無密切因緣。其心中唯有權勢利慾，別無何等經論。且張認為日本在滿洲有絕大權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順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張作霖商議滿蒙之事，日本皆可橫行無阻。

後藤新平或許小看了張作霖。比起手無寸鐵、百依百順的滿洲國皇帝溥儀來，擁兵數十萬的「東北王」張作霖並非日本人的奴僕或花瓶。張作霖的傳記作者加文．麥考馬克認為，「就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而論，張作霖比一個純粹的傀儡還多些什麼，但卻比一個民族主義者少些什麼」。[40] 當時在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的有三種力量—軍閥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張作霖正處在這三者的焦點之上。他是一個「好總督」，卻成不了「好國王」。他統治半開化的民眾似乎綽綽有餘，但處理東北亞地區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卻缺乏基本的知識、視野和理念。他像泥鰍一樣在這三者之間游弋，最終被近代的激流撕

扯得粉身碎骨。

第二卷

黨人的崛起

4　蔣介石

危機四伏的巔峰時刻

如果要使軍隊真個能為人民求自由安樂去打仗，真個能為黨實行三民主義去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種編制不可，故此實行仿照這種方法去練我們的黨軍，現在我們的黨軍已經練成了，做到了。

—蔣介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蔣介石無望地告別中國大陸，乘飛機自成都飛往台灣，內心百感交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澈底失敗而絕望矣」。[1] 此後他在台北的歲月，始終陰雲慘澹，縮小版的中華民國，宛如迪士尼樂園裡的微縮景觀。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被共軍窮追猛打、倉惶辭廟是蔣介石一生中的最低谷，那麼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黨政軍大權逐漸集於一身就是其一生的最高峰。從最高峰跌至最低谷，僅二十二年時間，毀滅的種子，在那萬人矚目的巔峰時刻就已悄然埋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南京政府的成立典禮簡樸得有些寒磣——高級官員們沒有穿威風凜凜的禮服，也沒有戴閃閃發亮的勛章，蔣介石本人身穿一套皺巴巴的國民革命軍軍服，滿臉倦意、憂心忡忡。蔣介石並非南京政府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卻是掌握實權的靈魂人物——此後，無論蔣擔任什麼職務（即便宣佈下野淪為平民），「旁人已將他當作國家最高主權人。現下的情況由他造成，他也應對現狀負責。」[2]

蔣介石的最高理想是統一中國，蔣深信南京政府最有希望統一中

國。「大一統」既是中國皇權專制傳統的當然邏輯，更是現代民族國家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救亡圖存」的先決條件。「統一天下」是歷代野心家的夢想，更是現代政治人物追求的遠景。

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力排眾議，發起北伐。他自視為革命者，自信其使命是繼承孫文的未竟之業，當然不滿足於統御廣州的小朝廷。蔣的崛起部分出於他對軍隊的控制，同樣重要的是他在各界培植的關係網，包括軍界、上海的財界、秘密社會和名門望族。[3]

北伐前三年，國民黨在蘇俄及中共的幫助下，完成三件大事。第一，創立有效的國民政府，儘管只控制廣東一省，但廣東是華南最為富庶的省份。第二，創建一個集中控制但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列寧式政黨，通過政黨滲透社會生活的每個方面。第三，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集中領導、具備政治觀念的國民革命軍。這是國民黨打敗軍閥的三大要素。[4]

在北伐期間，蔣已有創造一種新中央體制之動向，比如不待準備力量成熟即問鼎中原，原則上接受宋子文之中央財政，以軍校學生填補各部隊之幹部，提倡軍用航空並初步建造無線電聯絡網。[5] 但是，國民黨的軍事勝利如此迅速，以至於政治理念的灌輸和中央的組織與財政都無法跟上形勢的發展。倒向國民黨的軍閥部隊既無法解散，又不能完全整編，南京政府只能依靠發放軍餉和武器來維持其忠誠。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國民政府沒有一支統一管理的、服從中央的軍隊，更無法對廣大的鄉村地區的資源實施行政管理。[6] 由於新的中央集權體制遲遲不能成形，蔣只好以本身的勤奮、道德感召以及中統、軍統等秘密警察代替組織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不足，這又為日後的失敗埋下禍根。

在中國現代史上，正如長征成為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話，北伐則成為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神話。在國民黨的黨史敘述中，北伐的勝利比抗戰的勝利還要輝煌；即便在「清黨」被屠殺大半的共產黨，也肯定前半段有他們參與的北伐的榮耀。為了將北伐神聖化，自然要對北伐的對象—北洋軍閥集團—進行妖魔化。然而，當北伐軍最終於一九二八年佔領北京時，其結果並未「形成國民黨及其新的穩定的軍政機構的統治」，相反，蔣介石及其軍事集團以南京為新的基地，其官僚機構卻迅速淪落成充滿偏執、陰謀、謀殺和暴力的、比帝制更加不堪的統治階層。北伐的收穫是加固了醜惡的暴力文化。[7]

一九二七年，是蔣介石一生的重大轉折點，無論是安邦大業，還是私人生活，都為其後半生劃定了方向。

常敗將軍的戰敗與精明政客的下野

袁世凱以小站練兵起家，蔣介石則以黃埔軍校起家。中國的近代化，首先是軍隊的近代化。在與西方列強屢戰屢敗的背景下，清末開始仿效西方建立職業陸軍。袁世凱在天津郊區的小站練兵，創設保定軍官學校，蔣介石曾在此求學。直到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中擁有上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保定軍校出身者遠多於黃埔軍校。與土耳其、伊朗等追趕西方的文明古國和「亞洲病夫」一樣，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移了國內的權力中心，使上過現代軍事學院者──能使其他人接受紀律、熱忱、自我犧牲觀念的強人──地位上升。[8] 從追隨孫文到敗退台灣，蔣氏戎馬半生，戰場上之勝負往往決定其事業之成敗。蔣以軍事力量為後盾，農、工、商、學等階層皆為軍事和政治的附庸。國民政府從成立始，其權力皆在軍人、官僚、政客和職業革命家之手。[9]

北伐是蔣一生軍事成就的頂峰。十萬黨軍打敗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集團八十萬大軍，讓包括蔣在內的高級將領都深感意外。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三師師長、武漢三鎮衛戍總司令的李品仙回憶說：「國民革命軍誓師之初，雖號稱十萬之眾，實際上不過五六萬人。而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後不過八個月時間，領有長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10]

黨軍獲勝，原因何在？當然不是蔣介石用兵如神。首先，黨軍乃是「為主義而戰」，「主義」的灌輸使官兵將個人生死與國家民族興亡聯繫起來，有了十字軍般的宗教熱忱。其次，黨軍得到蘇俄的武器支援和戰術訓練。蘇軍經過一戰及內戰的磨練，已成能征善戰之鐵軍。蔣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即布留赫爾元帥）乃是蘇軍一員猛將，將在俄國內戰中發明的戰術如運動、奇襲、速進、包圍等傾囊相授。再次，北伐軍採取正確的戰略：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放開張作霖。北方三大軍閥集團受惑於南方的離間計，不能協調行動，甚至時而聯合時而開戰，遂遭北伐軍逐個擊破。[11]

北伐之勝利，乃是敵人太弱，而非蔣英明神武。日後一旦遇到強悍的日軍和共軍，蔣便一敗塗地。蔣在抗戰期間曾向高級將領訓話

說，一般而言，國軍軍長的素質不如日軍的旅團長。[12] 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

蔣介石自幼喜好兵法，熟讀《孫子兵法》、《曾胡治兵語錄》。一九○七年，蔣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年終考取留日陸軍學生。次年，蔣東渡日本，入振武學校，後升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蔣的軍事教育只是中學程度，比之閻錫山、孫傳芳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正式畢業生明顯不如。蔣偏偏學會日本軍閥的蠻橫作風，大權在握後，要求部下對其「服從要到盲從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蔣介石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秋天兼任長洲要塞司令，隔年又任東征軍司令。由設立軍校教導團、組成校軍到建成國民黨革命軍第一軍並兼任軍長，成功創立了第一支屬於國民黨的「黨軍」，蔣也第一次有了「嫡系」部隊。[13] 蔣不喜歡蘇俄派駐中國的全權代表鮑羅廷，卻與軍事顧問團團長加侖將軍惺惺相惜。即便後來與共產黨殊死搏鬥，蔣介石回憶起加侖將軍仍充滿感情，「加侖將軍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14] 這是蔣與外國人之間罕有的一段情誼。

北伐是蔣介石第一次指揮全國性戰爭，北伐的勝利讓蔣成為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最高領袖。其實，北伐中的許多硬仗並非蔣及其嫡系部隊打的，如攻克武漢三鎮的是親汪精衛的張發奎部，拯救南京的龍潭之役的功臣是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

蔣介石偏偏敗績最多，包括前一年攻取南昌損兵折將、這一年徐州戰役招致慘敗。蔣氏承認，黃埔軍自北伐以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這些不光彩的紀錄都被北伐全面勝利的榮光遮掩了。

五、六月間，寧漢分道北伐，漢方北進河南，寧方渡江北上。武漢方面的張發奎、唐生智企圖揮師東下討蔣，蔣腹背受敵，乃從北方撤軍。李宗仁的第七軍撤回蘇南，原黔軍將領王天培之第十軍，受到張宗昌、孫傳芳部的壓力，不戰而棄守徐州。

七月二十六日，蔣下達反攻徐州的作戰命令，並親抵距徐州僅七里的雲龍山督戰。但側翼的白崇禧觀望多日，進展遲緩。八月二日，孫傳芳抽調的大批兵力趕到，第十軍全線潰敗，左翼無法固守。三日凌晨，蔣介石忍痛下令全線撤軍，徐州攻擊戰功敗垂成。

蔣一怒之下命令拘禁此前戰績彪炳的王天培，並於八月十一日將

其處決。王罪不至死，坊間對其頗為同情。蔣以軍令如山為殺王辯護，但真正的原因乃是王並非其嫡系。[15] 這不僅是蔣性格上的弱點，更受制於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國仍是農業社會，所賴以聯繫的，是血緣、地緣、業緣等「關係」，而非制度。中國的軍事行政機構自古即已高度發展，私人關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16]

有日本學者發現，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將作戰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手下將領身上，陸續將他們貶斥。對孫立人、薛岳等名將，蔣更是刻意疏遠乃至陷其入罪。蔣不曾受過高層次的軍事教育，「正是因為這種自卑感，讓蔣介石對經過美日嚴格軍事教育鍛鍊出來的將軍們抱著複雜的心結，並且刻意和他們保持某種程度的距離」。[17] 另一方面，蔣介石給自己頒發大元帥的最高軍銜，至死都不承認，自己並非拿破崙式的軍事天才。蔣氏「外戰外行」，內戰也不「內行」。

國民黨的殘酷內鬥宛如鯊魚群挑選王者，一旦王者受傷流血，覬覦王位者立即衝上去攻擊之。在孫文時代，廣州政府即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到了蔣介石時代，黨內大佬倚老賣老，軍隊更是魚龍混雜。蔣只能合縱連橫，一步步拓展自身勢力，一時難以成為史達林、希特勒、佛朗哥那樣說一不二的獨裁者。

三月十至十七日，武漢召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恢復和提高黨權的決議，並專門針對蔣介石制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四月五日，武漢政府決定廢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這是武漢政府削弱蔣的軍權的重大措施。[18]

蔣的權力基礎並不牢固。他不僅面臨合法性危機，更處於內外交困、四面受敵的境地：北方有張作霖集團虎視眈眈，武漢有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共產黨的口誅筆伐並企圖發動「東征」，南京內部則有桂系、粵系等派系蠢蠢欲動。

徐州戰役失敗，反蔣力量有話要說。桂系首先逼宮，就連何應欽也與蔣疏遠。八月十二日，蔣宣佈下野。這是一著險棋，很多政客一日下野便終身下野，再也不能重返政壇中心。但蔣手上握有兩大「殺手鐧」可以確保頭把交椅非他莫屬：首先，蔣已締造出一支忠於他個人的軍隊，在這一點上他勝過導師孫文──這支新軍隊，是黨軍，更是「蔣軍」。蔣學到曾國藩治軍之神髓：當年，湘軍上下，但知有曾文正公，不知有朝廷；如今，在黃埔系將領眼中，「校長」即「黨國」之象徵，他們拒絕效忠沒有「校長」的「黨國」。

其次，蔣牢牢控制了財源，即江浙和上海財團──經過未來的妻兄宋子文的穿針引線，富可敵國的江浙財團與蔣結盟。與其說這批新興資產階級支持南京政府，不如說支持蔣本人。蔣在位，就給錢；蔣不在位，就撤回財政支持。

一手是槍桿子，一手是錢袋子，蔣有了制勝之法寶，才放心大膽地以退為進。「他用辭職來表明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一個唯一可信賴的『中國的救世主』」。[19] 果然，數月之後，南京政府軍心渙散、財源枯竭、舉步維艱，不得不請蔣回來主持大局。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還將有三次下野，然後再回來執政，獨裁更勝以前。每當政治鬥爭太劇烈時，蔣有一種傾向，便是誇張地跟政治嘔氣而下野，佯裝出古典士大夫的派頭，去寺廟隱居，進行儒者的反省和縱橫家捲土重來的規劃。[20] 下野成了蔣的一門政治藝術，他深知政敵並沒有能力應對困居，而且會暴露重大弱點，最後還是需要自己回來主持大局。而即便在下野之時，蔣手中仍然掌握著軍事、財政與人事大權。[21]

敗退台灣後，蔣自動恢復中華民國總統之職，從此永遠連任，直到死神降臨──在被其控制得如鐵桶一般的台灣，他不再需要表演「下野秀」。蔣未能成為中國的獨裁者，卻意外地成為台灣的獨裁者。

蔣善於玩弄權術，大部分敵人都是其手下敗將：胡漢民突然遭到軟禁，鬱鬱而終；汪精衛被逼投靠日本，身敗名裂；桀驁不馴的「新軍閥」白崇禧、閻錫山、薛岳等人，到台灣之後更成為其案板上的魚肉。然而，蔣的勝利只能算「慘勝」──他本人是一場更大的戰鬥的失敗者。蔣未能打敗毛，反而被毛擊敗，只能哀嘆：「既生蔣，何生毛？」政治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即便你打敗九十九個敵人，只要有一個敵人打敗你，你就是失敗者。

清黨：開因政見不同而殺人之先河

蔣介石追隨孫文初期，是其「容共」政策的支持者。早在一九二○年，蔣介石就勸說孫文放棄對歐美和日本的外交期待，「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並「赴俄考察政治，為澈底解決國是之計」。

一九二三年，蔣介石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率團赴蘇俄考察。蔣在莫斯科稱蘇共是中國國民黨的「姐妹黨」，會見紅軍高級將領，暢談在蘇俄幫助下進軍北京的計劃，並起草《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22] 他應邀在有四百名紅軍官兵參加的大會上演講，稱讚「紅軍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強大的軍隊」。據蘇俄接待人員記載：「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他的雙手在顫抖。」演講結束，他被熱情的紅軍士兵抬了起來。

孫文去世後，隨著蔣介石地位的上升，與共產黨的權力和理念之爭激化。經過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與蘇俄及中共漸行漸遠。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蔣透露清除共黨的決心：「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共產黨亦認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者，蔣是「反革命」。從此，國共兩黨陷入「革命」和「反革命」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及赤裸裸的殺戮和戰爭之中。[23]

一九二七年春，蔣介石佔據南京和上海兩大中心城市，擁有東南富庶之地，有了清黨的本錢。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等人以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支持清黨，掌握兵權的何應欽、顧祝同、李宗仁、白崇禧等將領也表示支持。最殘酷的屠殺從上海開始，此時蔣介石沿江而上去了南京，故意遠離殺戮之地，保持雙手的乾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青幫頭子杜月笙招募的數千名配備槍械的青幫分子，在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的配合下，向多處工會據點發起攻擊。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商務印書館大樓，從裡面突圍而出的人中有中共未來的總理周恩來。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已成為蔣介石重金懸賞的要犯。一日之間，上海有上千名共產黨、工人、學生和無辜者被殺害。

此後數月，清共殺戮在蔣介石軍隊控制的多個省份重演。共產黨則以在南昌、廣州等地發動更血腥的暴動來報復。仇恨這個魔鬼一旦被從潘朵拉的盒子中釋放出來，就再也裝不回去了。擔任蔣的秘書的陳立夫寫道：「這是一場消滅敵人的血腥的戰爭，我必須承認許多無辜者也被殺掉。」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國民黨市黨部工農部秘書張君毅，並非共產黨員，被莫名檢舉，遭警備司令部秘密逮捕。市黨部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請其釋放，均遭拒絕。張氏終被槍殺，且罪狀未宣佈，屍身亦不知去向。

清黨運動的最大特徵，就是它的血腥。它開創了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奪取政權者用暴力，並輔之以群眾檢舉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

殘酷地清除異己的先例。[24] 北洋時代的執政者也曾用卑劣手段對付政見不同者，卻從未大規模地殺戮平民。從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黨到一九四七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蔣介石「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人」的處置方法一脈相承。採訪蔣的記者文森特．希恩感嘆說：「蔣敏感而機警，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他已經踏上了成功之路，而且我完全相信他會獲得成功。」[25]

盲目而恐怖的殺戮行動，並不能消滅政見的不同和思想的差異。國民黨剛剛結束全國範圍內的清黨行動，共產黨又在各個城市的學校和工廠中奇蹟般地展開活動。蔣介石調動兵力撲滅共產黨在各城市的武裝暴動，卻無法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從人們頭腦中驅趕出去，也不可能澈底禁止青年人捲入激進政治這個「黑暗世界」。[26]

胡適在一九二七年的一場演講中提出，解決中國赤化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趕快促進物質進步，如果社會民生問題解決了，就能根絕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剛愎自用的蔣介石不願聽取此類建議。即便確立了絕對的軍事與行政控制地位，蔣介石明顯缺乏能力或極不情願改革基層的政治制度，並推動社會經濟改革。[27] 這就將廣大生活困苦的農民拱手讓給共產黨，成為共產黨的「群眾基礎」。

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這一天開始，蔣介石註定一生與共產黨纏鬥不已。他未能在與共產黨的民心爭奪戰中取勝：他自己不貪汙，卻縱容家人和親信貪汙；他生性冷漠，對農民的苦楚漠不關心。他甚少得到民眾的愛戴──除了抗戰勝利之後那短暫的幾個月。

蔣介石晚年像義和團的大師兄唸咒語般地宣誓「反攻大陸」，這是他給跟隨其逃到台灣的兩百萬官兵唯一的慰藉。實際上，他心知肚明「反攻大陸」此生無望。一九五四年，蔣介石與美方簽訂《中美防禦條約》，規定台海任何軍事行動須雙方有一致意見方能發動。美方明確表示，只是協防台灣，不支持蔣反攻大陸。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對國府駐美大使葉公超抱怨，在美國不支持的情況下反攻只是自殺行為，老蔣卻年復一年地侈談反攻大陸，不但是「騙人」，更會讓民眾失去信心。[28] 對蔣氏而言，騙別人騙久了，把自己也騙進去了──沒有望梅止渴的期盼，又如何度過失敗者的餘生？

南京國民政府顛覆中華民國之法統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黨部授印，胡漢民代表國民政府受印。這兩位德高望重者足以撐起新政府的面子。但是，這一儀式從一開始就表明，國民黨高於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權力來自國民黨中央黨部。

這一儀式也顛覆了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國家元首由民選之國會推舉。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國會，蔣介石亦不屑於承續中華民國的法統。南京國民政府的國旗（青天白日旗）和國歌（「中國國民黨黨歌」，又稱「總理訓詞」）都迥異於此前在國際上代表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的國旗（五色旗）和國歌（「卿雲歌」或「中華雄立宇宙間」）。嚴格地說，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中華民國──與其說中華民國是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終結的，不如說是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顛覆的。

是日，胡漢民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身份在檯面上主持典禮，發表「建都南京宣言」，舉行「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資歷遠比蔣介石深，蔣需要利用胡壓制正在武漢與共產黨打成一片的汪精衛。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躲在幕後，但這個政權從此打上了「蔣記」的烙印。

蔣介石是「建政」而非「建國」，南京政府是一個新政權，卻不是一個新國家。或者更確切地說，它連一個政府也算不上，只是一個幫派的聚集。蔣任人唯親，既不能杜絕黨內出現新的派系，更無法消滅與之離心離德的地方勢力，他不得不在不同派系之間扮演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隨著內部活力的逐漸喪失，國民黨政權因為政治紛爭而消耗殆盡，蛻化成為一幫根據與蔣介石的親疏遠近而劃分的各個官僚派系。而蔣介石幾乎將全部精力和才智投入到對付其他軍閥和剿共的軍事行動上。文官參謀和行政機構屬於軍事系統，其官員的任命僅僅按照蔣個人親信的恩惠關係來設立。國民黨停止吸納民眾所支持的人員，喪失了在蘇聯指導下的那種決策和協調功能。 [29]

「國民政府」一詞，首見於一九○六年同盟會本部所發佈的軍政府宣言。該宣言將革命的性質界定為「國民革命」，以別於過去的「英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的國民政府」。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孫文拒絕承認北京政府是合法的中央政府，一九一七年在廣州建立「軍政府」，一九二一年改為「非常政府」，一九二三年改為「陸海軍大元帥府」，都不以國民政府為名。直到孫文去世之後的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才在廣州成立。同時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指導監督，掌管全國政權。 [30] 國民政府建立之初，轄區尚未覆蓋廣東全省，更未

得到國際社會承認。

一九二七年，隨著北伐軍事上的勝利，廣州國民政府隨軍北遷，先到南昌，然後分裂為寧漢兩方。此時，中國有三個以中央政府自居的政權：北京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搖搖欲墜，張作霖打算退往關外；武漢政府與中共及蘇俄即將攤牌，仿效蔣介石清黨；南京政府內部矛盾重重，但蔣已成為不可取代的領袖，前景最被看好。

但民間對南京政府並非一致擁戴。留美歸來的政治學者蔣廷黻發現，人們原來以為革命軍獲勝之後，米價會跌，結果米價反倒上漲。國共激烈內鬥，老百姓搞不清楚誰是共產黨誰不是共產黨，就是搞政治的和軍人也弄不清楚，到處充滿懷疑和猜測。在國民黨內部也不和諧，人與人、派系與派系之間，紛爭不已。大部分人想營求地位、爭奪工作崗位。「在政府或政黨中的獲得位置的朋友帶我去看他們的老闆。我希望他們和我談些土地改革、工業發展、銀行國有、國父理想，以及中國的其他各方面問題。這些題目只有在報紙上討論，革命的大人物先生們卻不討論這些。」[31] 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就已腐敗不堪。

蔣介石宣佈「訓政」時代開始了。「訓政」是孫文刻意挑選的一個「壞詞」，孫文自信到懶得用歐威爾式的語言來潤飾它。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先總理傳下來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動的真理。敢討論總理學說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評總理主張的，罪不容誅。」質疑孫文主義的胡適差點成為階下囚。蔣介石知道，神聖化孫文及其學說，是神聖化自我的第一步。他作為孫文「唯一的學生」，比孫文血緣意義上的兒子孫科更親──在權力鬥爭中，他毫不留情地將孫科鬥垮，不在乎孫科是孫文唯一的兒子。孫文和蔣介石的「訓政」把戲，是從慈禧太后那裡學來的：慈禧將光緒捧成皇帝，再把他定性為阿斗，接著自己成了太上皇；孫文和蔣介石把國民稱為皇帝，再把他們定性為阿斗，孫文和蔣介石便經由慈禧而至乾隆了。[32]

因為「訓政」的緣故，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沒有憲法，也沒有國會，蔣樂於遵循孫文的遺命：「在革命時期，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訓政的本質乃是「黨治」，「黨治」不是「黨員民主共治」，而是「黨魁的獨裁統治」。一個有趣的細節可以證明這一點：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開始營造南京，這是十五世紀初期明成祖改建北京之後，中國首都城市的一場最大規模的規劃建設。國民政府聘請美國建築師茂非（Henry K. Murphy）擔綱設計，但蔣是最後拍板者，蔣修改設計方案以符合自己的政治意圖。茂

非將行政中心設計在城外的紫金山南麓，在中軸線的終點有一處最顯赫的建築，仿照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套上北京天壇祈年殿的外衣，卻不是「國會山」，而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南京政府沒有國會，其政治結構是「黨權高於一切」。出人意料的是，蔣介石佔用了這塊風水寶地，興建他與宋美齡休憩並做禮拜的「美齡宮」──在其心目中，他和宋美齡更高於中央黨部。[33]

北洋時代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都失敗了，蔣介石卻成為南京政權的新皇帝。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的何廉評價說，蔣「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一談到許多事情該制度化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就會往別處轉移。……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何廉生動地描述了蔣處理黨政軍事務的獨特方式，「隨身總帶著一支紅鉛筆和一疊紙，如果他認為該作出決定或給哪位來訪者一筆錢，他會立即簽發一項有關的手諭。這類手諭到處流傳」。[34]

國民黨的失敗不能全部歸結到蔣介石一個人身上。國民黨未能仿效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建設戰略，倚重重工業，發動無產階級，並把鐵路運輸轉化為軍事優勢，不是國民黨不想這樣做，而是中國沒有這樣的資源。中國還是一個前現代社會，中國在一九二七年的近代化程度遠遠不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現代工業總產值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點五，產業工人的數量始終不到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一。中國的鐵路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重要網絡，以連接所有主要的城市與鄉村。[35] 經濟基礎決定政治結構和領袖的治理模式。所以，即便蔣介石有史達林的手腕，也無法成為史達林那樣的人物。

娶妻與棄子：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下野後的蔣介石從上海啟程赴日本訪問，第一目標是拜會正在日本有馬溫泉養病的宋耀如夫人，請求其應允他與宋美齡的婚事。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蔣介石已有過多次婚姻：一九○一年，年僅十四歲奉母親之命與毛福梅成親；一九一一年，姚冶誠成為蔣之側室；一九二一年，蔣與陳潔如在上海結婚，張靜江是證婚人。蔣常出沒煙花柳巷，曾染上性病，失去生育能力。當蔣在國民黨內地位躍升之時，陳潔如不能給他助力，他需要新的婚姻。蔣向孫文遺孀宋慶齡求婚，遭到拒絕。這個插曲使宋慶齡成為妹妹與蔣介石婚姻的最堅定反對者。

蔣介石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宋美齡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底，僅記載宋美齡受邀參加黃埔軍校學生結業典禮。一九二七年春，宋美齡成為其日記的第一主角，「非常思念美齡妹」的字眼不斷出現，蔣也以「三弟」、「三哥」稱呼宋。生活方式西化的宋美齡，未必與鄉下人出身的武夫蔣介石有很多精神共鳴，但她已是「高齡」未婚女性，不能放過成為未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妻子的良機。

一九三四年，蔣宋婚後第七年，一個七年之癢的關鍵期，宋美齡在給一家美國雜誌寫的文章中，部分吐露其隱藏的抱負及其婚姻選擇：「我極度的熱心與愛國，也就是渴欲替國家做些事情。我的機會很好，我與丈夫合作，就不難對國家有所貢獻了。」她不經意地道出心中的秘密：嫁給蔣介石，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一個可以滿足現代女性改變社會的最佳路徑。

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近好幾年最負盛名的中國婚禮」。婚禮分為兩場，前半場按照宋母的要求，在上海西蒙路宋家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36] 後半場則是公開的、世俗的、中西合璧的儀式，在大華飯店跳舞廳舉行，加入了蔣安排的環節──臺上置有孫文遺像，邊綴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中間懸掛「福」、「壽」兩字。

四十歲的新郎穿著正式的燕尾服和條紋褲子（蔣平時喜歡穿戎裝和中國長衫，甚少穿西式禮服）走在前面；二十六歲的新娘穿著銀白色紗長裙，挽著其兄宋子文的手臂，和著俄國樂隊演奏的孟德爾頌《婚禮進行曲》走在後面。入場後，新人對孫文像三鞠躬。[37]

《北華捷報》記者用動人的筆墨描繪新娘之國色天香：

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銀色旗袍，
白色的細薄縐紗用一小枝橙黃的花
別著，輕輕斜披在身上，看起來十

> 分迷人。她那漂亮的面紗上，還戴著一個由橙黃色花蕾編成的小花冠。飾著銀線的雪白色軟緞拖裙從她肩上垂下來，再配上那件長而飄垂的輕紗。她穿著銀色的鞋和絲襪，捧著一束用白色、銀色緞帶繫著的淡紅色康乃馨和棕櫚葉子。

由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宣讀證婚書，文稱：「茲者蔣中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舉行結婚禮於春江大華禮堂，良辰吉日，六禮告成，瑟好琴耽，雙心默契。……元培等忝作證人，樂觀嘉禮，爰綴吉語，藉貢歡忱，是為證。」

到場的賓客有一千三百多位，婚禮花費銀元三十萬。[38] 當時為蔣掌管婚事財務的奉化人孫鶴皋透露：婚禮熱鬧隆重，所接受的財禮大大超過婚禮費用。不過，蔣宋在婚禮前宣佈將當日婚禮所收禮錢，用來做慈善事業，建立榮軍院照顧在北伐中受傷的軍人。

禮畢，蔣發表一份簡短聲明：「今日得與最敬愛之美齡結婚，為有生來最光榮、最愉快之一日。余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故革命當從家庭始。余確信余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自今日始也。」蔣氏的這番言論，卻惹得主持《大公報》的張季鸞大為反感。張乃撰文斥責說：「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聯哉？」

蔣介石此時如同浸潤在蜜糖之中，顧不上他人說三道四。蔣在日記中寫道：「從禮堂出來，見吾妻姍姍而來，如霧中仙子，美奐美輪，如仙子之下凡也，騰雲駕霧而來。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余身置何地矣……」蔣的日記極少出現如此文學抒情化的語言。次日一整天，蔣在新房裡沒有出來，並日記上說：「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擬的。」

這場婚禮，象徵著蔣介石「娶」了西方──宋美齡是一個澈底西化的女子。而這場婚姻，是「一加一遠遠大於二」的婚姻，延續四十八年，直到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大公報》創始人胡霖評論說：「蔣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預謀的政治行動。……如果宋美齡成為他的妻

子，他便在與西方人打交道時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欣賞宋子文在財政方面的才幹。但是，如果說蔣沒有愛上宋美齡，那是不公平的，蔣顯然把自己視為一名英雄，而在中國歷史上自古都是英雄愛美人。」[39]

蜜月結束之後，蔣介石即返回南京，宣佈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國民黨召開四中全會，推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共主中樞。蔣的敵人或銷聲匿跡，或暫時臣服。王師北定中原日，屈指可數。

西安事變中，蔣淪為階下囚，面臨死亡之威脅；宋飛赴西安，也做好赴死的準備──她將一把小手槍交給外國顧問端納：「如遇軍隊譁噪無法控制時，即以此殺我，萬勿遲疑。」宋日夜陪伴左右，蔣深受感動，相信聖經中「女子必護衛男子」的話是上帝對他說的。宋美齡成為無畏無懼、專情救夫的象徵。[40]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娶到新的妻子，卻險些失去唯一的兒子。兩年前，年僅十五歲的蔣經國赴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取俄語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蔣經國在學校極為活躍，僅從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登記表來看，他兼任七個職務，包括俱樂部書記兼副主席、俱樂部政治委員會主席、蒐集中國情報委員會委員、俱樂部活報組副組長、少共委員、第十一班俄文書記等。[41]

「四一二事件」之後，南京國民黨中央訓令莫斯科所有國民黨籍學生離開中山大學。蔣經國當然知道他不可能遵從這個命令，他的生命掌握在史達林手上。他在中山大學集會上譴責蔣介石「背叛革命」，幾天後在塔斯社宣佈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並在《消息報》發表文章說：「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俄國檔案中甚至有一份蔣經國在這一年的七月間寫下的自白書，宣稱他要和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終止夫妻關係，他指控國民黨利用馮弗能監視他。[42]

在此期間，蔣經國一度因同情托派的觀點而成為異類。他與幾名浙江老鄉常常聚在一起吃中國飯菜，醞釀成立「儲金互助會」，籌款下館子。蘇聯秘密警察視之為「反革命秘密組織」，欲興起大獄。共產國際東方部、蘇聯軍委代表、秘密警察和中共代表向忠發共同開會，提出一個予以開除並逮捕的十二人名單。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

大，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在一份報告中將蔣經國當作「反革命組織江浙同鄉會」的「唯一的領袖」，作出的處理意見是「槍決」。最後經由蘇共中央出面干涉，蔣經國才死裡逃生。[43] 此後，蔣經國轉入蘇聯軍事情報局特種學校，並在蘇聯紅軍第一師擔任學生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又轉往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一九三○年，蔣經國畢業時，軍校稱之為「最優秀的畢業生」。

史達林並非對蔣經國特別仁慈，蔣經國是一枚棋子，等到時機來臨，與蔣介石重新打交道時或許能派上用場。一九三一年，蘇聯間諜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宋慶齡求見蔣介石，提出蘇聯願意以放蔣經國回國為條件，換取牛蘭夫婦獲釋。蔣在日記中記載：「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亡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數日之後，蔣又提及此事：「經國如未為俄寇所陷，則余雖不能生見其面，適余死後，彼必有歸鄉之一日，如此，則余願早死以安先人之靈也。……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44]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史達林決定無條件釋放蔣經國歸國。蔣介石對兒子在蘇聯長時間所受之陶冶不放心，命蔣經國與被軟禁在溪口雪竇寺的張學良一起讀書。蔣經國按照父親的吩咐，讀《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以及孫文著述。同時，將留蘇十三年經過寫成兩部報告，一部是「在蘇聯的日子」，另一部是「冰天雪地」。由此，蔣經國重新獲得父親的信任，成為父親晚年的枴杖—父子的親密程度一度超過夫妻。[45]

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某些特質已經定型，終身不變。跟他崛起的動盪歲月一樣，蔣是混合多方面的產物：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儒家與基督教、威權的天性與民主的做作。他試圖用中國的傳統倫理和美德恢復政府與人民的力量，也不拒絕引入西方科技振興貧弱的中國。他夾在衝突之間痛苦異常，敏銳的觀察家從他的服飾中發現了內在的矛盾：無論身穿普魯士將軍式剪裁筆挺的軍禮服，飾以肩章、勳章、閃亮皮靴及指揮刀，還是披上西式斗篷戴黑呢小帽，抑或穿著傳統風格的儒家長袍，足蹬棉布鞋，不然便穿高領的中山裝，他似乎融匯東西。有時候，他甚至拿一根細長手杖當行頭，有如英國殖民地居民般昂首闊步。[46] 但是，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蔣介石呢？或者換一個問題：哪一條道路，才是中國的出路呢？

5　汪精衛

縱橫憂患今方始

闌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汪精衛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還都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下令摧毀位於中山陵西南梅花山的汪精衛墓地。一年多前，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去世，最後的心願是「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然而，汪精衛與孫文為伴只有一年多時間，蔣介石不能容忍汪精衛玷汙這塊只有孫文和他自己才可享有的風水寶地──當然，彼時的蔣介石不會料到，短短三年多之後，他在共軍的窮追猛打之下逃離南京，死後亦無法安葬在孫文之畔，其遺體只能在台灣桃園大溪慈湖的陵寢「暫厝」（「待反攻大陸勝利成功之後，再奉安南京」）。

月黑風高之夜，第七十四軍工兵營的數十名官兵，使用一百五十公斤烈性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墳墓。人們打開棺木時，發現其遺體上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其遺體尚未腐爛，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點，民國第一美男子的風采依稀可辨。其馬褂口袋內有一張白紙條，上有陳璧君手寫的「魂兮歸來」四個字。[1] 隨即，其遺體被送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現場有攝影師拍攝照片呈送蔣介石，蔣介石看到纏鬥二十多年的政敵落得如此下場，心中是何感覺？毛澤東的心理比蔣介石更變態，毛的副手劉少奇，臨終前被凌虐得不成人形，如野狗般趴在地上舔食。有攝影師專門錄影呈獻毛澤東，毛看到如此畫面之後開懷大笑。獨裁者的心思意念不是常人可揣度的。

然而，此種羞辱已與汪精衛無關。一九四一年，汪精衛曾赴日本交涉，與已故友人宮琦滔天的夫人相遇。宮琦夫人拿出一張老照片給他看，那是三十六年前流亡日本的一群革命黨人，在回國發動黃花崗起義前夕，於東京《民報》社庭院內的合影。如今，照片中慷慨悲歌的黃興、章太炎等七人中，在世者僅汪精衛一人而已。看到這張老照片，汪精衛萬感交集，潸然淚下，遂題寫一首〈金縷曲〉，其下闋為：「故人各了平生志。早一抔、黃花嶽麓，心魂相倚。為問當時存者幾？落落一人而已。又華髮、星星如此。賸水殘山嗟滿目，便相逢、勿下新亭淚。為投筆，歌斷指。」[2] 那一刻，他似乎預見到了自己的悲劇結局。

汪精衛晚年投靠日本、建立傀儡政權，此後兩岸的主流輿論皆斥之為漢奸。然而，編輯汪精衛詩詞的詩人汪夢川深受其詩詞中「深重之憂患意識、強烈之犧牲情結及民胞物與之志意」所感動，作詩為之翻案：「後生休望真情白，末日惟期上帝公。掩卷無言心欲死，樓頭且看夕陽紅。」[3] 歷史學家余英時亦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征服者的宰割了。」[4]

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未必全然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權力欲望，「在佔領之下創建與重製一個國家，要比一小撮道德扭曲的傀儡協助外來權威來得迂迴曲折」。[5] 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淪陷區的無政府狀態是最糟糕的境況，傀儡政權的建立畢竟為淪陷區的同胞提供了最低標準的社會服務。退而言之，作為老百姓，生活在汪精衛的轄區，未必就比生活在蔣介石的轄區或毛澤東的轄區更加悲慘。若非由汪精衛出面組建政府、維持局面，在半壁江山的淪陷區生活的半數中國人，將不得不直接面對日軍的凌辱與濫殺，必定活得更加暗無天日。

汪精衛晚年的選擇，更與他在一九二七年「等閑歷了滄桑劫」的人生際遇有著草蛇灰線的因果關聯。一九二七年年初，汪精衛一度眾望所歸地登上政壇頂峰，汪精衛這個名字，跟「今之完人」、「黨聖人」等輝煌的稱號緊緊聯繫在一起。到了年底，他又跌入千夫所指的谷底。汪精衛的悲劇性，部分源於一個軍事化的時代文人的處境。從北洋軍閥內部的戰爭，到國民黨黨軍北伐，再到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以及國共內戰和抗日戰爭，戰爭是民國史的主潮，軍人是民國舞臺的主角。「汪一生懷抱以文人羈勒武人的理想，始終未能成功，又謀力挽狂瀾，出面和談，拯救東亞於戰火，可歎毫無實力，既脫離國民黨和國家，又不見重於日人，終致身敗名裂。」[6] 反之，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掌握了武力，善於利用中國社會底層積壓的一股「近似野蠻的能量」，義和團運動中曾經爆發過，而國民革命取得勝利也是借助這種能量。[7]

逞才使氣一書生：「出國」與「歸國」之輪迴

一九二七年春，黨軍北伐取得階段性勝利，國民黨內部矛盾卻趨於白熱化。前一年在「中山艦事件」中受到蔣介石威迫而避居海外的汪精衛，一時間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迎汪」運動所造成的聲勢，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慨。國民黨中央及地方各級黨部、各軍黨員代表大會、各界群眾大會等民眾團體，給汪精衛發去雪片般的電報。

共產黨發覺蔣介石磨刀霍霍，也將希望寄託在被視為左派的汪精

衛身上。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在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上說：「蔣介石已經名譽掃地，代表大會很容易把他清除。對於全國來說，汪精衛是個有聲望的人物，他能夠巧妙地應付各派。」[8]

萬事齊備，只欠東風。汪精衛從法國啟程回國，三月八日抵達莫斯科，跟史達林及一群「久慕大名之革命大家」會面。他是否跟蘇俄達成了某些秘密協議？至今尚未發現有關檔案資料，但史達林「允諾予蘇聯政府及第三國際以全力支持」。[9] 可以看到的結果是：汪回國之後，言行更加左傾。後來，史達林同意向武漢政府發放一千五百萬貸款，跟汪精衛出面主持武漢政府不無關係。

四月一日，汪精衛抵達上海，發出電文，對前途表示樂觀：「數月以來，以諸同志之努力，國民革命獲一日千里之進步，謹以滿腔的熱誠，施革命的敬禮，並當追隨諸同志之後，從事工作。」然而，他只在上海停留五天便匆匆離開──若留在上海或南京，他至多是一塊被蔣介石利用的招牌，他不願屈居蔣之下。

四月五日，汪精衛乘輪船沿江而上；四月九日抵達武漢，隨即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中央組織部長，有了獨當一面的地位。武漢政府的文武大員，大都是汪系人馬：黨政系統如顧孟餘、陳公博、孫科等人都擁汪反蔣；掌握軍隊的唐生智、張發奎，紛紛表示支持汪。全國左派聚集於武漢，民間輿論亦對汪寄予厚望，漢口的《民國日報》讚揚汪「親承總理遺訓，經此一髮千鈞，危機四伏，眾望喁喁，民眾擁護，救黨救國」。汪遂在演講中宣佈其左派立場，「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中共及蘇聯都很欣賞此種表態。

兩天以後，蔣介石在上海及其控制的東南和華南各省發起清黨運動。汪精衛公開譴責蔣背叛革命，「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對於總理留遺之黨及政策，加以毀壞」，「為民眾之公敵，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10] 十七日，武漢政府與國民黨中央開除蔣介石黨籍，並免去其本兼各職，通電討蔣。寧漢正式分裂。

世事變幻如棋局，三個多月之後的七月十五日，汪精衛亦在武漢宣佈「分共」。汪精衛的「分共」與蔣介石的「清共」相比，一字之差，似乎更顯溫柔與仁慈。十月，由於與唐生智的關係惡化，汪精衛從武漢奔廣州，依附張發奎。之後，汪精衛與張發奎合作，趕走留守廣東的桂系將領李濟深、黃紹竑。卻未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十二月十一日，趁廣州兵力空虛之際，共產黨人張太雷、葉劍英等人率被策反的張發奎的部分軍隊，與工人赤衛隊一起發起暴動，一度攻

佔廣州。

雖然廣州暴動在三天之後即被鎮壓下去，但它對國民黨造成巨大衝擊。國民黨的輿論認為，廣州比南京更加重要：若南京丟失了，還可以再來革命、再來北伐；而廣州如果落在共產黨之手，奪不過來，國民黨可就萬劫不復，中國將遭受「千古未有的奇禍」。汪精衛被當作廣州暴動的「幕後黑手」，在黨內遭到圍剿，指控其「甘受第三國際指揮，唆使張黃竊據百粵、勾結共黨、焚劫廣州」。隨後，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二屆四中全會，開除陳公博等汪系大將之黨籍，汪本人也受到書面警告處分。

汪精衛百口莫辯、羞憤不已，只好通電表明態度：「廣州省城，經此焚劫，綢繆善後，刻不容緩。竊意宜集合各界公正人士，共謀補救，共黨餘孽，必去之無盡；即輕薄少年，好為偏激之論者，亦宜痛斥，不可錄用。民眾運動，在中央未確定方針以前，宜停止進行。農工運動中，尤易雜入莠民，不可不防。」[11] 如此表白，仍悔之晚矣，汪得不到黨內同志之諒解，在很長時間裡，反汪的國民黨右派稱之為「準共產黨」或「灰色共產黨」。

桂系軍人更對汪恨之入骨。李濟深班師回廣州，在泰康路天字碼頭豎起一座石碑，將廣州事變的「禍首」刻在石碑上。在其眼中，「禍首」居然不是荼毒廣州的、共產黨暴動領袖張太雷和葉劍英，而是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顧孟餘等人。此時，汪精衛住在上海法租界亦不再安全，白崇禧找到杜月笙準備用綁票的方式直衝汪精衛寓所。不願多事的法租界當局力勸汪出國避禍。

短短半年多時間，汪精衛從天堂步入地獄，大起大落宛如過山車。此時此刻，他的心情大概跟昔日被陳炯明趕出廣州的恩師孫文相彷彿，可謂欲哭無淚、無語問天。青年時代的汪精衛當過刺客，親自策劃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行動，被捕後口占一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但實際上，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汪仍是一名脆弱多情的文人，正如左舜生之評價：「大抵汪之為人，富情感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爾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讀書人從政，必然在理想與現實、價值與權謀之間掙扎至撕裂。

也正是因為文人習氣，汪精衛動輒稱病辭職、出國考察，他公開宣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不斷上演「出國」和「歸國」循環劇目。時常離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祖國，這樣做有害

於紮實經營培植自己的派系和實力。這種任性的性格，是政治家的一大弱點。汪偏偏以此為榮，還認為自己「比較其他文人戀棧阿附、甘為傀儡，略微乾淨些」。汪不治家產，身無餘財，旅居海外期間，孤獨而拮据，其權力慾望更強的妻子陳璧君哀嘆說：「我們不能一輩子流亡！」

既生「蔣」，何生「汪」？

國民黨的半部黨史，可以說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爭鬥的歷史。汪的外貌、風度、文章和演講都優於蔣，若是在民主制度成熟的西方，汪與蔣打選戰，有必勝之把握。

一九二五年，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孫文的三民主義，二十三歲的北大畢業生周德偉受其感動，此後多年追隨汪精衛、顧孟餘。周德偉在晚年回憶說：「汪精衛於每一場合均發表演講，具極大之煽動力，足以提高士氣……其辭令具有血性，又極工巧，聽者無不動容，甚至流淚。」[12] 汪自己也說：「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說和論說，當作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然而，正如魯迅所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不單國民黨對抗軍閥是如此，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如此，再厲害的嘴巴也敵不過槍桿子。沒有掌握嫡系軍隊的汪精衛，只好在有軍權的各軍頭之間遊走。「汪精衛以一個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且從未真正掌握過軍隊的文人，投身政治，適逢中國經歷空前嚴酷的戰爭、軍事化和國家社會重組的世代。」[13] 因此，不是汪精衛才華不夠、努力不夠，而是他生不逢時：企圖實現「黨指揮槍」原則的汪精衛，怎麼敵得過要用槍來指揮黨的蔣介石？

一九二七年，周德偉一度加入武漢政府，為汪精衛效力；又主持媒體，為汪精衛張目。兩年後，他加入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的、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他是蔣汪之爭的見證人，也是蔣介石最嚴厲的批判者和汪精衛最知心的同情者。[14]

在國民黨的黨史上，每逢蔣介石的地位上升，則汪精衛的地位必

然下降；若蔣介石的地位下降，則汪精衛的地位肯定上升。兩人一輩子明爭暗鬥，從未精誠合作。一九二七年，是少數汪精衛的鋒芒蓋過蔣介石的年度。這一年的三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委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組織部長的多個要職。大會一致要求汪精衛回國復職：「自從去年春天，直到現在，海內外各級黨部，同聲一致要求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可是汪同志仍是沒有回來。我們不能不追問汪同志之不能銷假復職，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銷假復職的障礙，如果有這種障礙存在，我們全體黨員便不能不大家起來消除這種障礙。」[15] 甚至將其缺席選舉為國民政府主席。這裡所謂的「障礙」，呼之欲出的就是蔣介石。

迫於輿論的壓力，內心最不願意汪精衛回國的蔣介石，也發出措辭誠懇的通電，邀請汪回國主持大局，並派張靜江、李石曾等黨內前輩前往法國勸駕。對此，《國聞周報》語帶諷刺地評論說：「蔣以武人方法對汪，汪以文人方法對蔣，論者不察，乃非蔣而是汪。故曰汪氏二年來之聲譽，孰造成之，蔣介石造成之也。」[16]

周德偉認為，蔣不能容汪，是國民黨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儘管這個說法誇大了汪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失為一個重新審視歷史的視角。在一九二九年，周德偉即對蔣介石的獨裁表示失望：「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反之，周德偉對汪精衛三十年代初任行政院長的政績大加讚賞：對外方面，緩和日軍之進攻，北寧鐵路復通瀋陽，美國和英法等國答應對華貸款，國聯決定技術援華；對內方面，將喪權辱國的張學良解職，實行法幣政策，幣值穩定，並主張先設立國民參議會，以為憲政之先聲。「凡所舉措，不為無功，乃國民黨一概抹殺之。國民黨政府從未著手修國史，只頌蔣氏之功，其實蔣氏在民國二十六年前並未出一卒抗日。」[17]

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之「正史」均給予正面評價。但周德偉認為，蔣介石被張楊扣留之時，國民黨全體中委主張迎接汪精衛主領黨政，對蔣刺激甚大。蔣介石獲釋後對何應欽、陳氏兄弟等親信失去信任，乃決心重組幹部，以戴笠為中心實行特務治國，並重用從蘇聯歸來的兒子蔣經國。蔣對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汪嚴加防範，汪去職後，「國民黨內已無人能將國內、國際形勢向民眾作實際之分析，蔣氏排汪，乃國民黨存亡之關鍵」。[18]

蔣介石逼走汪精衛，如同毛澤東逼走林彪。汪、林固然被冠以叛

國者的罪名而口誅筆伐，蔣、毛自己何嘗不是傷痕累累、醜態百出？余英時認為，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更進一步正式佔據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19] 余英時還引用民國元老馬敘倫的一段話說明此一論點：「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衛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衛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深）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衛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20]

左右不分：「容共」與「分共」之間的游移

「共產黨」這個抽象名詞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呢？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之前，共產黨的代言人，是跟汪精衛一樣充滿傳統文人氣質的陳獨秀，還是帶著鄉土之氣卻又霸氣十足的年輕人毛澤東，抑或就是具備英美紳士風度卻心狠手辣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共產黨是朋友，還是仇敵？共產黨是國民黨的救命藥，還是催命符？共產黨是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的孫悟空，還是一台源源不斷的自動提款機？如果國民黨人弄不清楚這些問題，就會陷入被人賣了還要幫著數錢的絕境。

四月五日，離開上海前夕，汪精衛與中共黨魁陳獨秀共同發表一份聯合宣言，對外表示國共合作仍親密無間，人們無須杞人憂天「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其實，汪多少知道共產黨不懷好意，當吳稚暉告訴他陳獨秀公然宣稱「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成共產國」（實際上，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共產黨用了二十二年），他回答說：「哪裡要二十年呢？兩年罷！」[21]

但汪精衛仍然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原因有三：首先，他的第一

身份是詩人，心中原本就有浪漫的革命情懷，革命與詩歌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左傾是必然；其次，孫文臨死前吩咐「容共」，作為孫文遺囑的執筆者，他必須繼承孫文的遺志；第三，只有獲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他才有實力對抗即將南面稱孤的蔣介石。

汪精衛臨行前，與蔣介石之間有一番促膝長談。汪對蔣說：「介石，如果這一回東南與武漢開戰，若你失敗了，我們國民軍就要從此消滅，共產黨必就此起來。若你得勝了，國民黨就要恢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無論右派的軍隊，左派的黨員，一定不會同你合作，你蔣介石在黨裡的生命，怕要從此消滅。」

蔣則反駁說：「現在是國民黨的生存問題。現在我們只有不管成敗利鈍，同共產黨分離，就是將來國民黨失敗了，我個人可以負這個責任的，說國民黨之消滅完全是我蔣介石一個人攪出來的也可以。如果共產黨被我們國民黨消滅了，那只要他是純粹國民黨黨員，能為本黨奮鬥爭氣，無論什麼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蔣並嚴正勸告汪捨武漢而去南京：「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來，那時你想不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就是國民黨的罪人了。」[22]

然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蔡元培、吳稚暉等人苦苦相勸，汪精衛仍不為所動，悄然沿江而上到武漢出席這場革命的盛宴。

當汪精衛進入被稱為「中國的匹茲堡」的武漢，進入這座熊熊燃燒的革命火爐，這才發現自己的位置並非「首席」。鮑羅廷頤指氣使，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唐生智陽奉陰違，不過是換了國民革命軍軍裝的軍閥；共產黨幹部、工運和農運的領袖們，個個自行其是，並不將他放在眼中。

那麼，汪精衛如何從「容共」政策的堅持者變成「分共」政策的決定者？幾個月間，他如何完成此一「川劇變臉」？

首先，共產黨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農村展開比義和團還要殘忍的農民運動，讓汪精衛感到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毛澤東三十多年後重回湖南，仍然為當年的殺戮而手舞足蹈：「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縱橫十里燒光。」[23] 這跟後來日本人在中國北方的「三光」政策有什麼區別呢？周德偉在湖南醴陵鄉間親身體驗到「紅」與「白」兩邊的殘酷殺戮：先是共產黨煽動「地痞流氓作先鋒」，殺戮地主鄉紳；然後是地方民團和國民黨軍隊捲土重來，屠殺激進學生和地痞流氓。周德偉在逃亡途中被民團發現，一男子指著他說：「這傢伙著工人裝，而皮膚白皙，必屬兩

黨的那批東西，綑起來！」幸虧旁邊有一農村女子出面解救，他才撿到一條性命。[24] 看一個人的長相像讀書人，就要索命，跟後來紅色高棉的階級屠殺一樣。

其次，武漢的工人運動雖然沒有農民運動那麼血腥，卻因工人動輒罷工而讓經濟走向崩潰。九省通衢、富甲中南的武漢，人人都在鬧革命，無人願意工作。美國記者鮑惠爾在報導中寫道，為了鼓吹階級鬥爭、迎合激進學生和勞工組織的行為，武漢的左派領導者和蘇俄顧問們，發動了一場「與古羅馬觀看角鬥士取樂完全一樣的運動」。工人停止工作，由激進分子帶領，白天黑夜地演講、遊行、示威。大街上擠滿學生和工人的遊行隊伍，高舉各種旗幟。工礦企業被迫關閉，長江航運停滯。「成千上萬的工人度過了遊行、示威慶祝革命的日子後，突然發現他們自己沒有飯票了。政府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採取自殺性的方法：為購米而濫印鈔票，以緩解饑餓。但結果卻是食品價格、尤其是大米價格飛漲，高到幾乎無人能買得起的地步。」[25] 蘇俄事先答應的貸款大大縮水，遲遲不到位，即便匯到少許，亦如同杯水車薪、於事無補。一場沒有飯吃的革命是無法持續下去的。

第三，武漢政府遭遇軍事上失利，讓武漢隨時可能遭到來自各方的攻擊。戰鬥力最強的張發奎部不在武漢，武漢防守空虛。與武漢政府結盟的唐生智自詡為佛教將軍，卻整日吸食鴉片，對左派理論一知半解。其部下戰鬥力很弱，率軍東征南京，無功而返。蔣介石若發起反攻，武漢方面毫無招架之力。西面還有與蔣介石結盟的四川軍閥楊森沿江而下，佔領宜昌一帶，直接威脅武漢的安全。此前與武漢方面交好且被視為唯一救星的西北軍閥馮玉祥，在鄭州與蔣介石會談之後，通電呼籲武漢效仿南京實行清黨，如此才能實現寧漢合流、黨國統一。馮軍隨即南下擊敗奉軍，佔據河南，與武漢僅有咫尺之遙。在軍事上，武漢已經陷入四面楚歌之絕境。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汪精衛看到一份蘇俄給中共的密令。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易與鮑羅廷長期不和，彼此拆臺。為了籠絡汪精衛，羅易將史達林親自簽發的「六一電報」透露給汪。這份電報包括六條具體指令：改組武漢政府，加強共產黨的力量；改組國民黨中央，增加工農領袖；武裝兩萬名共產黨員；挑選五萬工農積極分子加入並改造國民黨軍隊；設立以國民黨左派為首的革命法庭，嚴懲反動軍官；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汪精衛拿到副本，發出衝冠之怒：如果這六條實施任何一條，國民黨就再無容身之地。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看了之後，面如土色，說：「這意味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爭。」

一國之內不可能施行兩種社會制度，一個政黨的黨員也不可能效忠於另一個政黨━其結果要麼是宿主驅逐寄生者，要麼是寄生者吞噬宿主。於是，汪精衛下定決心分共。周德偉如此記載當時的經過：負責宣傳工作的汪系大將、曾任北大教授的顧孟餘，召集中央宣傳部高級職員開會宣佈分共事宜。周進言：「分共，送之出境可也，不必效京滬之殺人，累及無辜。蓋一開殺戒，不能制軍人行動之橫暴。」顧回答說：「中央正是此意。」之後，鮑羅廷、鄧演達、徐謙等人先後被禮送出境。武漢國民政府分共未殺一人，深得輿論及人民同情。[26]

蘇俄是比日本更大的外患

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一九二七年，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遭遇重大挫敗，他最恨的不是國民黨黨內的政敵，而是他視之為盟友的蘇俄及聽命於蘇俄的中共。蘇俄和中共將汪精衛當作棋子來利用，當汪精衛恍然大悟時，蔣介石的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已難以撼動。

當時唯一忠於汪精衛的軍隊，是名將張發奎麾下第二方面軍的三軍九師。這支軍隊在北伐中功勛卓著，被譽為「鐵軍」。然而，它卻被共產黨所滲透：賀龍的二十軍，全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是共產黨；蔡廷鍇的第十師，三個團長中兩個是共產黨；第四軍的參謀長葉劍英是共產黨；繆培南的第十二師，三個團長中有兩個是共產黨……難怪聽到分共的指令後，張發奎不由地哀嘆說：「我們如果分共，還有什麼？」[27]

但是，如果不清除共產黨，汪精衛自己就要成為共產黨的代罪羔羊。廣州暴動讓汪精衛改變了以某種「友好」的方式跟共產黨分手的天真想法。十二月九日，在上海的汪精衛得到中共即將發動廣州暴動的情報，立即電告張發奎，並派妻子陳璧君將指令帶到廣州：「蘇聯領事館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我們期待您進行搜查，驅逐蘇聯領事。所有共產黨員都應逮捕。這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次日，汪精衛再次發出同樣內容的電報。

當十一日中共發起暴動時，張發奎有所準備。國民黨軍隊襲擊蘇聯領事館，槍殺了五名以外交官身份為掩護的蘇聯間諜。整個廣州都在散發哈西斯、烏科洛夫、波波夫、伊萬諾夫和馬羅卡屍體的照片，

上面有題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被槍斃的五名俄國人。」[28]

儘管共產黨的廣州暴動被迅速撲滅，但汪精衛依然顏面掃地，不得不辭職出洋避風頭；張發奎更是精銳全失，再也無法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抗衡。從此之後，汪精衛不再擁有挑戰蔣介石的道德高度和軍事力量，其政治生命等於結束了一大半。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當然是蘇俄及共產黨，汪精衛怎能不仇恨、恐懼共產黨呢？

一九二七年的切膚之痛，在汪精衛的心頭留下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共產黨是殺不死的九頭蛇，蘇俄是比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外敵都更邪惡的心腹大患。在「攘外必先安內」這一點上，汪精衛的堅持比蔣介石更為澈底。這也導致蔣汪二人對抗戰的看法截然相反：蔣認為，不怕對日戰爭持久，反倒可以借領導抗戰、抵禦外敵提升國民政府的政治認同以及他本人的領袖魅力；汪則認為，對日戰爭拖得越久，「中國國民愈窮，財愈盡，共產黨人愈有憑藉」，即便國民政府最後領導抗戰成功，其實力已經從內部被掏空，將來難以應對藉機壯大起來的共產黨的挑戰。[29] 曾經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共產黨的瞭解透徹肺腑的汪系大將周佛海也如此表示：「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

汪精衛雖早死，但就抗戰之後中國歷史的走向，他看得比蔣介石更清楚。國民政府取得抗戰之「慘勝」，卻雙手空空；躲在後方「游而不擊」的共產黨尾大不掉，成為這場戰爭最大的受益者。抗戰勝利之初，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在美國的提攜之下，中國躋身世界四大強國，似可揚眉吐氣。蔣擁有四百多萬久經沙場的國軍部隊，不把困居延安一隅的共產黨放在眼中，得意滿滿地宣稱，三個月內便可消滅共產黨。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到三年時間，蔣就丟掉整個中國大陸，這一次是滿盤皆輸、淨身出戶。如果沒有跟中國大陸隔一個海峽、由日本人經營半個世紀的台灣島，蔣能跑到哪裡去躲開「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毛澤東呢？

是恐共和反共的立場，使汪精衛不惜與日本人合作。換言之，汪精衛在一九二七年所受之欺騙與羞辱，是其一九四○年代選擇與日本一起對抗「赤禍」的根源。歷史學家卜正民在研究淪陷區的「合作者」時指出，沒有一個佔領者光靠武力就能進行管理。再兇殘堅定的征服者也需要當地人的指點與告密。成功的佔領有賴於得到被征服者內部有叛意、同情或是有野心的人的共謀。[30] 日本人需要汪精衛，汪精衛也需要日本人。汪認為，他與日本人有共同的敵人——蘇俄及其傀儡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須的。但日本人並沒有兌現事先的承諾。汪精衛傾其所有走上賭桌，輸得精光。

對於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單單指責、咒罵其生下來就是「漢奸」，並不足以解釋歷史的真相及汪本人的精神軌跡。公正的歷史研究應當是「讓歷史行動遠離被民族主義情緒束縛的假想，或者遠離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預設，使事件退回到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狀態」。如果抱著此種「同情的理解」的心態，或許會對陳璧君在法庭上的辯護產生或多或少的共鳴：

>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哪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烈士」、「詩人」與「政客」身份的糾結

汪精衛是一名極富個人魅力的美男子，一九一八年，同樣也是風流倜儻的美男子的徐志摩在南京號輪船上與汪精衛初次相遇，對汪驚為天人。後來，徐志摩記載說：「他真是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精衛的眼睛，圓活而有異光，彷彿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我們講了一路

的詩，精衛是做舊詩的，但他卻不偏執，他說他很知道新詩的好處，但他自己因為不曾感悟到新詩應有的音節，所以不曾嘗試。」同記「君武（馬君武）大怪精衛從政，憂其必毀。」[31] 汪精衛讓胡適和徐志摩等留洋見過世面的文化界領袖亦為之傾倒，可見其相貌、學養、氣度均名不虛傳。而徐志摩特別記載馬君武的一句評價，說明他認同馬君武的看法：詩人氣質的汪精衛投身詭譎幽暗的政治場域，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早年曾與汪精衛通信討論詩歌的胡適，聽到汪精衛的死訊時，在日記中這樣感嘆說：「精衛一生吃虧在他『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情結（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且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如此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32] 胡與汪的人生際遇大不相同：胡適的生命如長江中游，大抵平順和緩，故而寫不出一首好詩；汪精衛的生命則如長江上游，處處驚濤駭浪，故而下筆就能感動人心。抗戰初期，胡適與汪精衛一樣是主和派，是「低調俱樂部」成員。但胡適很快洞察日本的狼子野心，義無反顧地出任中國駐美大使，為爭取美國的支持奔走呼號，他顯然不認同汪精衛依附日本的選擇。不過，胡適的解讀又與眾不同：汪精衛投日，不是為了榮華富貴，乃是「烈士情結」之驅使。

「烈士情結」不是汪精衛一個人所獨有，清末民初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後一代士大夫」和「第一代知識人」大都有此心態。這種「烈士情結」，使譚嗣同在可以逃亡的情形下拒絕逃亡，留下來以生命殉道。思想史家張灝認為，譚嗣同的思想在許多方面反映了在面臨傳統政治秩序瓦解，以及文化價值和基本宇宙觀所造成的「取向秩序」解紐這雙重危機時所作的思想掙扎，透露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面臨的文化危機。譚嗣同的「仁學」，既有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經世致用學說的道德實踐精神，無疑也糅合了普救眾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和基督教士冒險犯難的殉道精神。具體到譚嗣同個人，還有由於家庭及身世的不幸所帶來的對生命的愴然之感。[33] 作為受過儒家傳統教育的最後一代人，且父母早逝，汪精衛亦有一種「心似勞薪漸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的犧牲精神。

就生命的頓挫與詩歌的昇華而論，唯南唐後主李煜可以跟汪精衛相提並論。李煜是亡國之君，且被宋太宗毒殺，卻成為詞壇上永恆的君王。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汪精衛不就是二十世紀的李煜嗎？汪不是卓越的政治家，甚至不是成功的政客，但若不因人廢

言，其《雙照樓詩詞藁》堪稱字字珠璣的傳世之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晚飯時，陳璧君向汪精衛敬酒。汪問，今天是什麼日子？陳回答說，五年前的今天，你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遇刺，身中三槍，幸而不死，乃有今日。

那時，汪偽政權剛剛成立半年，本該是汪精衛春風得意之際，他卻作了一首悲苦之極的〈邁陂塘〉以作紀念：

歎等閑、春秋換了，鐙前雙鬢非故。艱難留得餘生在，纔識餘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傷痕，未是傷心處。酒闌爾汝。問搔首長吁，支頤默坐，家國竟何補？

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懼。翛翛猶賸毛羽。誓窮心力迴天地，未覺道途修阻。君試數。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聽殘葉枝頭，霜風獨戰，猶似喚邪許。[34]

汪精衛居然覺得，活下來比遇刺身亡更痛苦！在其詩詞中，除了悲苦之情，就是死亡的陰影。他並不恐懼死亡，死亡對他充滿了誘惑。或許，國家不幸，人生不幸，方有此渾然天成、情真意切的詩句。

民國肇始之際，章太炎強烈反對「不履禹跡十餘年」的孫文當總統，認為「臨時總統，論德應為汪精衛，論功應為黃興，論才應為宋教仁」，將汪精衛視為總統的第一人選。十年之後，作為民國的開國功臣，汪精衛到旅順弔唁當初力排眾議釋放他的滿清肅親王善耆的時候，卻對肅親王生前留下的「民國不如大清」的遺言感喟再三。民國的失敗，也是汪精衛個人的失敗。而更大的失敗還在後面等著他，他無處可逃。「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

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35] 一九二七年，汪精衛半推半就地參與釀造一杯更苦的苦酒，他將一直喝到生命的終了。

6　毛澤東

從筆桿子到槍桿子

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年底，國共內戰塵埃落定。此前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的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被轉移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繼續服

刑。與陳璧君頗有私交的宋慶齡與何香凝在政協會議上找到毛澤東、周恩來，替其說情。毛澤東應允只要陳璧君寫個認罪聲明，政府就下特赦令。

宋慶齡與何香凝給陳璧君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曾經在國父孫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瞭解。……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只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馬上恢復你的自由。」信很快送到陳璧君手裡。陳璧君提筆寫了回信：「正由於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願意在監獄裡送走我的最後歲月。」[1]

最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在此事件中的態度。毛並不是一個念舊的人，很多他的故人都被其折磨致死。毛澤東為何對陳璧君網開一面？

毛澤東在仕途上的第一個大恩人是陳璧君的夫婿汪精衛。正是汪精衛的提拔，毛才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澤東受命代表汪精衛管理中央宣傳部──那時，孫文剛剛去世，作為孫文遺囑起草人的汪精衛炙手可熱，出任廣東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委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汪身兼數職，無力主持剛成立不久、卻很重要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故而將毛澤東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

從數年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名不見經傳的臨時工，一躍而成為國民黨中央一級的顯赫人物，毛澤東可謂「鯉魚跳龍門」──毛澤東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表面上甚至在蔣介石之上。不過，名義上的地位與實際的權力並不必然對稱。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蔣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成為國民黨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長，並通過「整理黨務案」，清除在國民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擔任了八個月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不得不離開這個屁股剛坐熱的職位。

無論如何，毛澤東一定對汪精衛的知遇之恩充滿感激。在廣州的三年裡，毛與汪精衛夫婦密切來往，陳璧君或許在夫婿面前稱讚過年輕的毛澤東。北伐軍興，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隨之白熱化。毛澤東奔赴武漢投效鮑羅廷、汪精衛及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漢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毛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此期間，毛與汪精衛應當有不少交集。

七月十五日，內外交困的武漢方面作出清共的決定，汪毛分道揚鑣。八月七日，中共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毛參與了由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所主導的對陳獨秀的嚴厲批判，以此為投名狀，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毛加入中共以來獲得的最高職位。

十多年以後，身為延安地方割據政權首腦的毛澤東，派出特務頭子潘漢年秘密出使南京，拜會南京偽政府主席汪精衛，協調共同對抗在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之策略。汪雖然不喜歡毛，但為了對抗蔣，暫時接受毛的秘密結盟請求。

無限風光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國民黨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作為汪精衛心腹，積極參與大會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還執筆起草《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座位為十五號。兩天之後——一月八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臺，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在一月十八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臺講話。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台報告，這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後，三人分別成了延安共產黨割據政權、重慶國民黨政府、南京日偽政府三方首腦，成三足鼎立之勢。這三個人都是熱衷於權力的野心家，但此刻他們無法預見各自的未來。

國民黨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的地位迅速躍升。據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記載：「汪精衛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辦事，前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許可另請代理，今請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部長案。決議：照准。」毛澤東不僅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而且列席中常會，進入權力核心。三天之後，毛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提出：「沈雁冰為秘書。」[2]

以毛澤東的資歷、學歷和影響力而論，代理宣傳部長這個職位如同天上掉下的餡餅。那是國民黨草創時期，還沒有成熟的官僚體制嚴格地論資排輩，而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氣象，毛遂脫穎而出。毛的文采讓汪精衛印象深刻，而毛的第一個啟蒙者是梁啟超。十七歲的毛在家鄉湘潭半新半舊的東山學校就讀時，就將梁啟超等維新派知識分子的文章「讀了又讀，直到熟記背誦」。在清朝垮臺之際，他寫了平生第一篇「大字報」（比文革時「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那張大字報早了五十五年），貼到學校的牆上，呼籲成立新政府，請孫中山

當總統，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卻不知道孫中山與康梁勢不兩立。[3]

中國的史學家通常忽略毛澤東個人發展中的這一階段，但毛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在該部的任期，是該部有史以來領導人最長、最穩定的一段任職時期—他領導該部長達八個月之久。毛就任之後進行了很多創新，規範宣傳程序，邀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共同監督宣傳領域，為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注入命令和紀律。[4]

毛澤東為國民黨宣傳部打上了鮮明的個人烙印—後來他以此為模式一手打造共產黨的宣傳部，直到今天，中共宣傳部仍按照毛當初立下的規矩運作：所有媒體都是黨的喉舌。此前此後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葉楚傖、戴季陶、張道藩等人，大都是舊式文人，而非現代黨人，他們有文才，卻缺乏組織和管理能力；唯有毛澤東受過蘇俄顧問指點，深知宣傳的重要性，一心一意將此前一盤散沙的國民黨宣傳部打造成一個準軍事化單位。毛向國民黨各部門發出指令，個人和組織在公眾場合發佈的一切宣傳材料，都要送交中央宣傳部檢查。在毛領導下，匯報、監控和監督，成了國民運動中實施日常紀律的標準程序。在毛看來，宣傳部長的義務，是分清革命的朋友和敵人，對前者加以稱讚，將後者揭露出來並加以批判。[5]

同年十二月初，毛澤東又兼任國民黨中央的一份新刊物《政治週報》的主編，毛親自撰寫這份刊物的發刊詞，牢牢地將其置於共產黨控制之下。反之，此前那些跟國民黨保持密切關係、卻時不時發表批評言論的報刊，毛無情地給予打壓，撤回經濟資助，並運用黨紀來懲戒其編輯人員。

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時間，沒有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那麼長，但在「謊言大師」之維度上，毛澤東不亞於戈培爾。靠著宣傳，毛整肅了黨內的競爭對手和不同派系；靠著宣傳，毛在內戰尚未全面開打時就已戰勝了蔣介石；靠著宣傳，毛在中共建政之後不斷掀起政治運動，甚至發起文革摧毀既有的官僚體系。毛直到晚年還要親自審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中央報刊的社論，並親筆修改其中的措辭。這絕非小題大作。毛清楚地知道，文字可以殺人於無形。就文采而言，毛的秘書們—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沒有一個比得上他。毛的文字從不迴避底層社會的俚語和粗話，從而極具煽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白話文寫作的第一人，不是梁啟超、陳獨秀、魯迅和胡適這些學者、文人，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不僅要當偉大領袖，還要當偉大導師；不僅要控制人的身體，更要控制人的靈魂。

那段時間，毛澤東在國民黨內享受部長級待遇，地位顯赫，薪資優越。可是，當時廣東國民政府財政相當困難，毛澤東居然也遭遇拖欠薪水。二○○八年，據台灣《聯合報》報導，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證實，從黨內已解密的文件中發現，黨部確曾拖欠毛澤東月薪。泛黃的會計資料僅記載著：「毛澤東薪水為一百二十塊大洋。」[6]

不過，毛那段時間並不缺錢，除了國民黨方面「明碼標價」的薪水之外，毛還能從蘇俄那裡領到不為人知的豐厚津貼。此前經濟困窘的毛，終於鬆了一口氣，將妻子和兩個孩子接到廣州來享受小資產階級生活。

最幸福的事情，是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滾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支持下，毛澤東又擔任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並兼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這是一個由蘇聯人資助的項目。毛成了與彭湃齊名的農民運動專家，毛在黨內同志圈的綽號是「湖南王」。[7]

隨著北伐軍的推進，毛澤東來到國民政府的新首都武漢，繼續訓練農民運動人員。毛的思想愈發激進，他在培訓材料中不加掩飾地寫道：「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活活打死。」用恐怖氣氛控制人民，這是列寧主義的精髓，毛比那些留學蘇聯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更瞭解蘇共奪取權力的秘訣。

一九二六年底，毛來到故鄉湖南發動農民運動，他利用「痞子」階層為其衝鋒陷陣，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如同前幾年希特勒起家時，利用德國城市流氓無產者組成專門從事暴力活動的「褐衫隊」一樣。毛鼓動翻身做主人的地痞們到地主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打滾──這是赤裸裸地煽動地痞們強暴地主的妻女。毛知道，若幫助地痞們解決性饑渴，就能將他們吸引到革命陣營。毛的下流和卑劣讓陳獨秀感到不齒，陳獨秀從此與這名「五四青年」分道揚鑣。中共官方編輯《毛澤東選集》時，保留了這篇重要文章，卻刪去這段「少兒不宜」的句子。[8]

毛澤東在湖南農村指揮地痞們燒殺搶掠，是他青年時代最得意的時刻。「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他找到了奪權的秘訣：中國未來的任何革命都要以農民起義為重。[9] 他與地痞們在一起時最為愜意和自如，在北大圖書館、在少年中國學會，與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他都覺得被「大知識分子」所蔑視，渾身不自在。在農村，他不再受上級和組織的制約，突破了法律和一切道德規範，成了說一不二、天馬行空的土皇帝。歷史學家余英時評論說，毛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西方新思想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共產國際」的邊緣。當歷史把他送到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發揚得淋漓盡致。[10]

長期以來，中國的鄉村有儒家的倫理道德之維繫，若非遇到特別殘暴的暴君和特別嚴重的災荒，地主與農民一般相安無事。大部分勤勞耕作的農民只是希望減租、減稅，並不想置地主於死地；毛澤東則想鼓動農民分配地主的浮財甚至殘害地主的生命，其前提是在農村中製造出農民和地主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仇恨的假象，所謂「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毛是製造仇恨的大師，他深知，一旦地痞或農民殺了人，有了血債，就會成為他的奴隸，乖乖跟著他走。

在五四時期的北大就認識毛澤東的傅斯年，對毛如何控制底層農民的心靈有深切的觀察和思考。傅斯年曾親歷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在廣州的暴動，差點被殺死。一九三○年下半年，傅斯年對他的中共朋友說：「你們共產黨人要殺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則萬萬做不到。」他斷言「階級鬥爭」只是中共用來掩蓋它對權力無止境的貪慾的托詞，這種對權力的貪慾利用了以下八種仇恨：中國人仇恨外國人；無錢的恨有錢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員；一種職業中的不行者恨同職業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鄉下人恨城裡人；兒子恨父親；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於利用人們潛意識中的情感，人們易於接受任何將他們的仇恨報復願望正當化的理論，「階級鬥爭」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出路。[11]

辛亥革命之後大致還算安定的中國農村，一步步地被毛澤東的仇恨哲學改變。從湖南農民運動中的殺戮到四○年代的土改，再到五○年代末期的大饑荒，其線索有跡可循。當農民協會負責人向毛報告有人被打死時，毛無動於衷地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此前，湖南農運領導人約束暴力，扣押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

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必須造成一個短暫時期的恐怖現象。」地痞們得到授權，更加瘋狂地對地主階層施加暴力。由於獲得現代武器很不容易，毛發現梭鏢是一種很厲害的兇器，他要求湖南農會將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12]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長沙省特別法庭宣告成立，同時各縣特別法庭也相繼成立。此前，鮑羅廷認為民眾執行私刑，是「因為司法機關不好」；如今，共產黨可以利用「合法」的特別法庭殺人了。在長沙，每日必有十多起槍決，屍橫通衢，行人掩鼻而過，不敢卒視。各縣有甚於長沙，每次提出槍決斬殺者，有七、八人一起，或十餘人一起，如殺雞鴨一般。商不安於市，農不安於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13] 究竟有多少人在這場農民運動中遭到殺害，迄今為止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這種濫殺無辜的赤色恐怖模式，從此成為毛澤東一生樂此不疲的權力遊戲。這是一種用新的意識形態包裝的義和團運動。毛性格中最邪惡黑暗的一面也袒露出來，那就是對人的私有財產、人的生命和尊嚴的極度蔑視。

四月十八日，南京政府成立的當天，頒佈了共黨首要分子的通緝令。在通緝的一百九十七人當中，鮑羅廷位居第一，陳獨秀位居第二，毛澤東排在惲代英之後，名列第九。[14] 七月，武漢政府決定「分共」，毛東躲西藏了一段時間，然後竄到長沙郊區組織「秋收暴動」。當他為組建軍隊而僕僕往返於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隊之間時，有一天被地方民團俘獲，多年以後，毛如此回憶當時的場景：

> 他們命令將我押到民團總部，要在那裡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士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處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副官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幾個農民一同蒐尋。好幾次，他們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兩次近得我幾

> 乎可以碰到他們，可是不知怎樣地沒有發現我。……我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15]

毛澤東洋洋得意地向美國記者斯諾講述死裡逃生的故事，斯諾忠實地記載下這個傳奇故事。不是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長大的斯諾，不會明白毛沒有說出來的話：大難不死，天命所歸。其實，歷史充滿偶然因素，倘若民團知道他們捕獲的年輕書生就是通緝令上名列第九的匪首毛澤東，一定會派出重兵把守，最後毛一定難逃李大釗那樣走向絞刑架的厄運。那麼，未來中國的走向會不會截然不同呢？或者，歷史會選中另外一個類似毛澤東的人物收拾殘局？

中國共產黨是因為嚮往共產主義理想而成立的，可是隨著毛澤東的崛起，這個理想淪為陪襯，暴力革命和權力鬥爭成為其宗旨，正如學者韋政通所論：「暴力革命是敵我之爭、生死之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這樣的過程中，原始的人道關懷，恐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尚未獲得權力時，必須不擇手段地搶奪權力，有了權力為了鞏固權力，就只有不斷擴大權力，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奪權、固權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之中，消耗了無從估計的物質和精神的能量，直接受害者是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16]

一九二七年，毛在湖南和江西的一些鄉村利用地痞流氓殺戮地主鄉紳。四十年代，毛將這套做法普及到「解放區」乃至全中國。等到作為「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被消滅殆盡，到了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此前揚眉吐氣的「貧下中農」的厄運便來臨了──毛故意製造的大饑荒，導致至少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是紅軍，還是土匪？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信給正在蘇聯讀中學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他隨信附了一份希望兒子閱讀的書目，一共有二十一種書，除了一些中學生的文史讀本以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之外，全部都是小說及歷史書籍，包括：《精忠岳傳》、《官場現形記》、《子不語正讀》、《三國志》、《蘭花夢傳奇》、《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聊齋志異》、《水滸傳》、《薛剛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義》、《洪秀全》、《俠義江湖》等。這份書目在中國歷代的家訓中，絕對是破天荒的，也多少透露出毛的興趣與價值取向。中國傳統文化是毛一生的主要思想，毛尤其喜歡傳奇小說和造反故事。在毛的意識中，對正統士大夫視為歷史「負面」人物的重視程度，要超過「正面」人物，對小傳統的興趣又大於大傳統。[17]

蘇共的奪權之路是利用貧窮的城市工人和從歐戰戰場敗退回國後一無所有、充滿怨恨的官兵造反，中共的奪權之路卻無法仿效之——蔣介石、汪精衛及國民黨新軍閥控制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而共產黨孤注一擲發起的廣州、南昌等城市暴動先後失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險主義，使中共付出慘痛代價。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共黨員從將近五萬八千名左右，降到只剩一萬人，折損約五分之四。那麼，如何絕處逢生呢？

瞿秋白、李立三等共產黨領袖的選擇是，繼續靠蘇俄的津貼，在城市發動工運；而毛澤東的選擇是，像他所心儀的梁山好漢那樣「佔山為王」、「落草為寇」。中國的產業工人大都集中在國民黨佔據優勢地位的沿海城市，數量有限；與之相比，農民多如牛毛，更容易受其擺佈。馬列主義的教條不能拯救共產黨命懸一線的處境，唯有《水滸傳》才是一本如假包換、起死回生的教科書。毛讀得最多、引用得最多的書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毛從中汲取了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18]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坐上火車，前往湖南的一個新興工業城市和鐵路樞紐——株洲。在那裡，他與地方黨委同志討論了暴動計劃，並決定組織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兵力約五千人。他深信，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在變化多端的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如果沒有自己的武裝，僅僅依靠知識分子來發動工人與農民來組建政黨和領導權力，將會是徒勞無功。毛的新的策略是：努力與以農民為基礎的社會性盜匪勢力結盟，建立一支能夠奪取和維持行政區域的紅軍。然後，在共產黨的軍事和行政控制的保護傘下，地方政治得以重

組，讓農民擁有歷史上缺乏的反對地主的集體力量。[19] 由此，農民成為紅軍源源不斷的兵員和財源。

毛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早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儘管筆桿子必不可少，但槍桿子比筆桿子更重要。毛指出：「發動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個團的兵力，這樣起義就可起來……要奪取政權就一定要有兵力，沒有兵力的支持就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在南昌起義失敗後的黯淡歲月裡，毛說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槍桿子裡出政權。」追求權力、鞏固權力、運用權力，形成毛參加共產黨後的生命主軸。[20]

當時毛澤東率領的軍隊只有幾百支槍。在冷兵器時代，這樣的農民武裝有可能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在新的時代，血肉之軀不可能對抗鋼鐵武器。白色恐怖癱瘓了秋收暴動，不是把暴動的農民趕回老家就是送進墳墓。[21] 毛後來似乎不太願意重提這段往事。這場暴動的失敗，是因為毛缺乏軍事上的經驗、作戰方法拙劣，與計劃沒有得到大眾的支持。毛是優秀的戰略家，但在身為戰術家或戰鬥指揮官方面，在他一生中則乏善可陳。秋收暴動的失敗，使毛受到黨中央嚴厲的批判，他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且被猛烈批判為左傾冒險主義者。[22]

「秋收暴動」失敗後，毛澤東在長沙東方一百公里的小鎮文家市集結殘部七百多人，宣佈奔向井岡山。羅霄山脈中部的這塊險阻的山區一向就是土匪、叛徒的藏身處，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毛認為它是機動部隊的絕佳根據地。當時，袁文才、王佐率領一群土匪佔領了井岡山。袁、王屬於本地客家人，與本地居民關係緊張，他們組織「馬刀會」，宰制著整個寧岡縣十五萬人。[23] 當時的中國，有很多由土匪代行政府職能的地區，處於某種「半無政府狀態」。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澤東進入井岡山後，深知強龍必須與地頭蛇結盟，便修書給袁、王，請求結盟。關於這一段故事，曾追隨毛澤東的紅軍將領龔楚（後來的紅七軍軍長）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寫：

> 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

　　毛澤東運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二人帖帖服服，都接受了毛澤東所委任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岡山立定了腳跟。[24]

　　毛、袁、王絕非「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不久，毛澤東按照《水滸傳》中「火併王倫」的情節，著手清除袁文才和王佐。一九二九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要求，「暴動前可以同他們（土匪）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袁文才和王佐的命運即已註定。兩人被清除，還有族群矛盾的因素。當時，當地土籍和客籍兩族矛盾越發激化，袁文才槍殺了土籍的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槍殺了與袁、王交好的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一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縣遭到湘贛特委指揮的部隊與彭德懷紅五軍第四縱隊伏擊，邊界特委書記朱昌楷親手槍殺袁文才，同時被殺的還有袁、王部排長以上幹部四十餘人。[25]

　　毛澤東成為井岡山的最高統治者。共產黨的教科書渲染毛在井岡山過著茹毛飲血的艱苦生活，近年來中共在井岡山新建黨校以培養官員「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實際上，毛澤東這段時間的生活養尊處優。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吃緊，隨時可以撤進山裡。這是一棟美麗的八角樓，這棟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一名醫生，被毛的軍隊強佔。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裡只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毛並不是生活簡樸的人，他擁有眾多僕人，用共產黨的術語叫「工作人員」。裡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門燒水挑水的，有馬佚，甚至有專門負責為他蒐集煙草和報紙的人員。[26]匪首的生活標準，當然是普通匪徒望塵莫及的。後來，當毛在延安建立割據政權，更是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知識分子王實味因為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而招致殺身之禍。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率領兩千人的殘餘部隊來井岡山跟毛「會師」。合編的朱、毛部隊約有三千人，成為紅軍第四軍，「第四」取自張發奎又稱鐵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共產黨誓言延續鐵軍的傳統。他們卻更改了旗幟：舊有的青天白日旗改為紅旗，紅旗中間是白色五角大星配以交叉的鐮刀、斧頭標識。[27] 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的實力在毛澤東之上，但玩弄權術朱德不是毛的對手，毛成功地實現了「黨指揮槍」。除了朱德之外，毛在軍隊中還找到了一名年輕有為的支持者：林彪。

毛澤東很快成為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土匪頭子，當時中國沿海城市的報紙常常出現關於「毛匪」的報導。但毛又不僅僅是傳統的土匪，他背後有共產黨，儘管「蝸居」上海的黨中央難以遙控毛的作為，但毛要拉大旗作虎皮，以震懾群雄。紅軍在打家劫舍、謀求自身生存的同時，其中的黨員幹部始終向士兵和暫時被統治的農民進行宣傳，始終銘記共產黨綱領中的基本原則和目標。而且，只要條件允許，紅軍就沒收士紳和地主的土地並且分配給農民，以此來吸引貧苦大眾。[28] 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一個自認為負有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在這一個政治前提之下形成的中共武裝割據，絕非尋常軍閥可以相提並論。中共在其割據區內，根據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念，逐步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權力結構。[29]

不過，躲藏在上海租界裡的中共中央，以及遠在莫斯科的後臺老闆史達林，對毛的「流寇」做法不以為然。毛不進攻長沙，被中共中央冠以「軍事機會主義」的罪名，在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等人被撤銷其湖南省委委員的資格，還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不過，由於聯絡中斷，毛澤東直到第二年三月才知道這個結果，而且這個結果並未動搖他對土匪隊伍的控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的中共中央再下令免去毛的前黨委成員資格。當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在一份報告中說：「毛澤東的部隊只是到處流竄的土匪。這樣的領導人不相信廣大群眾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軍事機會主義。」周認為，毛的部隊完全由「地痞流氓」組成。[30] 當然，周恩來日後要為他說的真話和對毛的輕視付出沉重代價：周擔任中共總理長達二十七年，對毛百依百順，但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也未得到毛的信任。毛故意拖延批准醫療小組對周實施癌症手術，完美地達成了對周的謀殺。

蘇俄方面並不看好毛和他的散兵游勇。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代表亞伯瑞奇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說：「建立

紅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於這些軍隊既無基地，又無給養，他們對農民構成極大負擔。由於這支軍隊有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澤東的單位即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會分化，會讓農民反對他們。尤其糟糕的是，這些軍隊經常跑掉，留下農民應付軍閥部隊的進攻。」[31] 多年以後，直到毛奪取了中國政權之後，史達林才給予毛遲到的肯定。

此時此刻，毛澤東已部分地脫離了「大老闆」的控制，他對於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及莫斯科的命令，大都採取拖延或模糊的方式回應，以達成「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結果。毛不願屈居任何人之下，儘管朱德比毛年長、也更受官兵愛戴，但毛通過若干巧妙的權力運作，讓朱德淪為其配角。紅軍領袖雖以「朱毛」并稱，但朱從未掌握實權，是有名無實的總司令，難怪文革時林彪當面羞辱朱說：「你一天都沒有當過總司令。」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的性格就已定型，他習慣於發號施令，絲毫不懷疑自己有權決定屬下每個人的命運。[32]

此後二十二年，毛的武裝鬥爭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逐漸成為中共的主流路線。他用槍桿子武裝被他煽動起來造反的農民及流氓光棍群體，再用筆桿子吸引和麻醉知識分子和學生。毛從農村破落戶子弟和城市邊緣人，搖身一變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領袖，以及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二十七年的終身獨裁者─除了緩緩來臨的死神，沒有任何人可以撼動他的權力。

「無情才是真豪傑，憐子確實不丈夫」

毛澤東唯一推崇的文豪魯迅說過：「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魯迅的文章固然失之於刻薄和冷酷，但生活中的魯迅卻在「橫眉冷對千夫指」之外，保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這在毛澤東看來，大概是「革命不澈底」的體現吧？毛對待親人的態度是：無情才是真豪傑，憐子確實不丈夫。多年為毛服務的醫生李志綏指出，毛缺乏人的感情，從不知道愛、友誼、溫情為何物。

毛澤東將他的威權化的父親視為人生中的第一個敵人，對父親沒有絲毫的感情。但是，即便是對他自己聲稱感情很深的母親，亦相當

冷酷無情，他的母親在病逝前希望見兒子一面，毛卻不屑一顧，讓母親含恨而終。

對於妻子和情人們，毛更是絕情之極。毛的第一個妻子羅氏，是他的父母為他挑選的、比他大四歲的女子。那時毛年僅十四歲，毛對其毫無感情。一年多之後，羅氏便在毛家患病去世了。

毛自己承認的第一個妻子是楊開慧。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十分賞識毛這個小老鄉和私淑弟子，有意促成女兒與毛澤東的婚事，卻未料到由此葬送了女兒的幸福乃至生命。

一九二○年年底，毛澤東與楊開慧結婚。不過，當時並沒有官方的法律登記程序，他們也未舉辦傳統的結婚儀式。結婚之後，曾經熱戀楊開慧的毛澤東，很快在外面結交了兩名女友。楊開慧無可奈何地寫道：「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瞭解他……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由於毛澤東四處奔波，所謂「好男兒志在四方」，兩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多。一九二四年，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楊開慧才攜毛岸英、毛岸青兩子到廣州，一家四口同住於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

北伐開始之後，毛離家北上，楊開慧則帶著孩子回到湖南長沙。此後，夫妻二人再也沒有見過面。一九三○年，毛澤東和彭德懷率軍圍攻長沙，毛絲毫不考慮此舉會危及妻子的安全，也沒有做過任何努力將妻兒接出來。

守衛長沙的國民黨將軍何鍵最痛恨共產黨和毛澤東，其父親曾經被由毛澤東煽動的暴民抄家並遊街示眾。為了報復毛澤東，何鍵逮捕了年僅二十九歲的、絕望的少婦楊開慧，匆匆審訊之後，將其槍決。而毛澤東是間接殺害楊開慧的兇手。

楊開慧生前寫過八篇給毛澤東的文章，用蠟紙仔細包好，藏在老屋的泥磚縫隙裡。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年兩次修繕房子時，這些文章才被發現，而那時毛澤東已經死掉了，再也看不到這些文字了──即便能夠讀到，心如鐵石的毛也不會掉下一滴鱷魚的眼淚。

在這些秘藏半個多世紀的文章中，楊開慧對毛澤東灌輸給她的信仰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懷疑：「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唉！殺，殺，殺！耳邊只聽見這種聲音。人為什麼這樣獰惡！為什麼這樣殘忍！為

什麼呵！？我不能去設想了！我要一個信仰！」那麼，她需要的是少女時代在教會學校接觸的基督信仰嗎？

另一方面，楊開慧仍堅守她對毛澤東的愛，以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何鍵告訴她，她只要宣佈跟毛澤東脫離關係，她就可以免死，她斷然拒絕，毅然赴死。或許，她覺得既然已被毛拋棄，還不如一死了之。楊開慧寫道：「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臉頰，他的額，他的頭，他是我的人，他是屬於我的。」另一方面，她對毛的絕情亦不無哀怨之語：「他丟棄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腦海中翻騰，以後的事我也假定。」她也覺察到毛連親生兒子也不顧的超級冷酷：「父愛是一個謎，他難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嗎？我搞不懂他。」[33]

楊開慧永遠搞不懂毛澤東，她的殉難不會讓毛澤東流下一滴眼淚。而何鍵企圖以槍殺楊開慧打擊毛，也達不到目的。毛早已有了新歡，即第三任妻子賀子珍，何鍵幫助他除去楊開慧，反倒讓毛不再有對楊開慧的愧疚之心。

毛剛上井岡山時，匪首袁文才為了籠絡毛，將一個朋友漂亮的妹妹介紹給他。這個少女就是年僅十八歲的賀子珍，知書識禮，身材苗條，皮膚白皙，小名叫「桂圓」，毛比她大十六歲。

賀子珍雖然年紀小，經歷卻已相當豐富。她的父親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以開茶館為生。賀子珍十六歲時就參加永新的工農運動，剪了短髮，歡迎北伐軍，並當上了縣婦女部長。蔣介石清共之後，她被迫逃亡，加入袁文才的土匪部隊。

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賀子珍。在袁文才的隊伍裡，從來沒有一個像毛這樣見過大世面的革命者。不過，兩人結合之後，很快就爆發了矛盾。兩個性格倔強的人在一起，必然時常發生衝突。毛只是享受賀子珍那比楊開慧更熱情奔放的肉體而已，對她更談不上溫柔和憐惜。後來，賀子珍精神失常，被毛送到蘇聯養病，毛趁機與江青勾搭成奸。

在槍林彈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很少想念他與楊開慧生的兩個兒子，對兩個兒子多年來顛沛流離的悲慘生活少有關切。「中共領導人對其子女絕情，不完全出於經濟因素。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子女；他們必須專注在主要任務上──革命、內戰，與解放被壓迫的群眾。在宏偉的計劃中，小孩的眼淚，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實質上並未受到注意。」[34] 後來，毛岸青在上海因被警察毆打而腦子出了問題，被毛澤東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毛岸英意外地死於韓戰中聯合國軍的一場轟

炸，據說是毛岸英執意要生火做蛋炒飯吃才讓轟炸機發現了目標──這起意外使得毛澤東無法像北韓的金日成那樣在家族內部傳承權力直到第三代，也使得中國人免於像北韓人那樣過更加悲慘的奴隸生活。

至於以後毛澤東在延安遇到來自上海的女演員江青，並不顧同僚的反對而與之結合，那是後話了。江青幫助毛策劃了清洗黨內高層的文革運動，也像楊開慧那樣至死保持對毛的忠心──毛去世後，江青作為「四人幫」的魁首被送上法庭審判，當庭咆哮說：「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鄧小平為維護毛的地位，將江青作為毛的代罪羔羊；而江青一語道破天機──毛一生以破壞者自居，甚至像頑童惡作劇一般破壞自己建立的黨。

「破壞論」來自於梁啟超。在一九○二年的流亡生涯中，梁啟超旅行歐美，觀察英、法兩國能達成現代性，是因為它們的革命及內戰摧毀了舊有的封建系統。梁得出結論，破壞乃再生的契機。此後，毛澤東引用唐代文豪韓愈的話對梁啟超的「破壞論」作了發揮：「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梁啟超晚年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破壞論」，而毛澤東則以「破壞」為終身志業。[35]

第三卷

文人的異議

7　梁啟超

中國即將陸沉魚爛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相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唯有狹義的革命。

──梁啟超



在北京西北郊外的清華園，一座前清的舊園林，如今是清華大學的所在地。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的，是中國經費最充裕和現代化設施最完備的大學。在圖書館、教學樓、體育館等氣勢宏偉的紅磚建築的外圍，是一排教授的住宅。其中一棟房子的主人就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

梁啟超書房的燈光總是最晚熄滅。清華園是北京郊外極少數有電燈的地方，有自己的發電機可以發電。不過，校園裡還是常常停電。好幾次，文稿或家書剛寫一半，電燈突然滅了，梁啟超便點上一盞洋燭，繼續奮筆疾書。

梁啟超經歷了從清朝到民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的很多變化都跟他有關。光緒二十九年，梁啟超在東京創辦《新小說》月刊，發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設想新中國的國號是「大中華民主國」，開國年份為一九一二年，與後來的中華民國不謀而合。梁啟超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其「言論與行動與民初十幾年間政局之動盪，黨派之離合，思潮之起伏，以及社會之轉變，都密切相關」[1]。

一九二七年，梁啟超已淡出政壇，仍以言論影響時局。他五十五歲，正值盛年，卻已積勞成疾，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前一年，梁啟超因尿血症住進了協和醫院，由院長劉瑞恒主刀，切除了右腎。但手術

之後，尿血症並未痊癒。梁啟超的弟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談及這一經過，字裡行間相當失望。隨即，梁啟超被誤割右腎的說法在坊間流傳。

一向反對中醫、支持西醫的梁啟超專門撰文為協和醫院辯護：「我期盼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幾個月後，梁啟超還出席了協和的畢業典禮並發表演講，對協和高度讚揚：「如果我們問中國需要什麼，最一致的觀點將是，我們最需要的是科學精神和方法。這樣的需要怎樣才能夠得到滿足？我的回答是，通過醫學科學。」在一九二九年去世之前，梁啟超先後十次進入協和醫院治療。[2] 他對協和醫院的情感，就如同他一生像夸父追日那樣追逐的西方文明。

清華園與飲冰室

梁啟超是同代人中著述最多、精力最充沛的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類似於同時代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之於德國。僅一九二七年一年間，梁啟超就完成了《中國文化史》、《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儒家哲學》、《書法指導》和《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多部著作。他每日下筆數千言，還能忙裡偷閑打幾圈麻將。

梁啟超答應出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因為清華是當時薪酬最豐厚的學校，也因為清華環境幽靜—在勾心鬥角的京城內，梁啟超常常感到心情煩悶、心灰意冷；而一到「水木清華」，他立刻變得心情愉悅，彷彿有一線光明出現在面前，讓他產生無限的希望。同時，梁啟超也利用清華良好的學術環境，聚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力完成醞釀多年的《中國通史》—然而，直到兩年之後驟然病逝，梁啟超念茲在茲的《中國通史》仍未完成。

要成為伯樂，還需要有千里馬。清華學生素質乃是萬裡挑一，梁啟超在這裡可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這個學期，梁啟超給清華學生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他的演講和授課極具現場魅力，作為學生的梁實秋回憶說：「有時候，他背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先生的

講演，到緊張處，便成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3]

梁啟超是清華國學院的創建者和領導者，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就是他建議延請來的。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不同意聘請陳寅恪，認為陳一無學位，二無專著。梁力爭說：「我梁某也是沒有學位的人。著作雖稱等身，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4] 梁獎掖後輩、愛才如命，心胸之寬廣真若大江大河。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炮聲隆隆，南軍勢如破竹，北方軍閥集團合縱連橫，中國局勢風雲詭譎，梁啟超似乎難以安心著述。他深知，若北伐軍佔領北京，恐對己不利，「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據清華大學國學院學生姜亮夫回憶，當時北京籠罩在恐怖氣氛之下：「陰曆五月一日早晨，梁任公先生的老門房接到一封送給任公的信，接在手裡覺著沉重，仔細一摸，覺出信封內裝有子彈一顆，門房不敢轉交，但任公先生已知道有人送信，就向門房要來看，門房說信內夾有子彈，任公說：不用擔心，沒有事。」[5] 用子彈恐嚇政治觀點不同的文人，是南方黨人的把戲。有人勸梁去日本靜觀其變，但此前已旅日十多年，他不願再度流亡，「國勢如此，見外人極難為情也」。

暑期，梁回到位於天津義大利租界內的私人住宅「飲冰室」。「飲冰」之名源於《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梁啟超以此表明憂國憂民之心，並自號「飲冰室主人」。一九一四年，梁啟超自己設計的一棟磚木結構義式二層小樓，他與美國開國之父傑佛遜一樣喜歡自己設計房屋。一、二層各有九間房，二樓由互通的隔扇門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半部為會客廳、起居室、圖書資料室，為梁啟超專用，西半部為其家屬居住之所。這裡是梁啟超真正的家，比清華園的住宅更加寬敞和舒適。

此時，南北雙方的戰事愈演愈烈，梁啟超發現列強的軍隊雲集租界、枕戈待旦。義大利領事特意告知，不必擔心安全問題，租界不會變成戰場。但梁啟超並不樂觀，「鎮日將外園鐵門關鎖，除少數親友外，不接一雜賓，亦不出門一步」。[6] 不過，他的文稿仍然一篇篇地傳出這棟小樓，引無數讀者擊節讚嘆。

「法治國」成南柯一夢

入民國後，梁啟超挾言論界鉅子之光環進入政壇，一回國便宣稱「非國務大臣不做」。民國二年九月，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準備有一番大的作為。然而，由於缺乏實際經驗和班底，經費亦困難，且總統袁世凱消極應付，使得梁在此任上幾至受窘。特別是司法部舊有的那些官員「稍惡作劇，即可令長官鬧大笑話」，幸虧有法學家江庸為次長，羅維恒為顧問，梁啟超才得以「坐嘯畫諾」。

半年之後，梁即提出辭職，任期既短，鮮有建樹。此時他對司法界的情形已有透徹瞭解，專門寫了《改良司法十事》呈送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支持繼任的司法總長切實整理，納司法於現代化之軌途。[7] 不過，袁世凱隨即於南方征戰、謀劃稱帝，哪裡會對建設法治國家有興趣？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便對立憲和司法改良懷有濃厚的興趣，有「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國」之想法。梁啟超認識到，中國的法治精神已經蕩然無存，「固有之法律已成僵石」，而「文明國」的前提乃是「法治國」，「今之稍知大體者，咸以為養成法治國家為要圖」。中國必須成為法治國家，司法獨立，人人守法。宣統二年，梁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認為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治國家才能生存，必須有責任心強的國民才能成功。而當時的中國人普遍不知法治為何物，更不知道保護私有產權之重要性。

中國的法律傳統與歐洲截然不同：以希伯來和希臘羅馬為文明源頭的歐洲，法律的發展與宗教有緊密關係，人們認為法律是造物主給予或展示給人類的。布萊克斯通在《英國法釋義》中指出，神法是整個法律大廈的基石。而在中國，有史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認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於神的旨意。當法律在中國出現之後，它既不維護傳統的宗教價值，也不保護私有財產。它的基本任務是政治性的：對社會施以更加嚴格的控制。[8] 因此，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法治國家，不是零敲碎打地引入或照抄幾部外國法典，更需要一場法治理念的重大變革。直到今天，這一變革仍未發生。法治的滯後成為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最大阻力之一。

入民國後，中國卻離開「法治國」越來越遠。無論現實環境如何惡劣，梁啟超始終沒有放棄這一理想，從組織政黨，到反對復辟；從潛心學術，到登臺演講，法治、憲政問題一直是其思考和研究的重點。

一九二○年，吳佩孚擊敗段祺瑞，宣佈將召集國會，制訂憲法，希望梁啟超擬一憲草。梁啟超有心發動「國民制憲」運動來制訂中華民國憲法。所謂「國民制憲」，就是由若干人簽名提出一個憲法草案，或是利用報章發表，或集會討論，作成決議，而其他國民團體亦可另外提出草案。如是，彙集數案或數十案，最後綜合討論，必可得一定案，交由國會通過，即為憲法。[9] 此種設想過於理想化，難以付諸實踐。就連美國當初制訂憲法時，都沒有如此繁複之過程，更何況當時中國民眾的知識水準和法治觀念，遠遠無法跟美國獨立革命時候的民眾相比。

梁啟超希望倚靠軍事強人吳佩孚實現「制憲夢」，這本身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治思想，並不符合法治精神。中國的改革者在實現其理想時，不得不採取背離該理想的手段與方法，必然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這一次國民制憲運動也是如此：吳佩孚默許曹錕賄選總統的鬧劇，讓「新直系」的民意支持一夜盡失，梁啟超的國民制憲運動亦成黃粱一夢。

既然無力打造一部好憲法，梁啟超只好退而求其次，從培養、教育法律人才做起。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司法部設置司法儲才館開館並邀請梁啟超主持。梁啟超不顧在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已承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勉力受聘出任館長。

開館當日，各司法機構長官均親自出席，學員有一百四十五人。梁在開館致辭中說：「收回法權為目前最要緊之事，慮無不知之者。既欲收回，則須預備。雖前清以來，頗有籌備，惟中經時局變遷，時作時輟，應再更進一步，以期促成，本館之設正為此故。」[10] 可惜，半年之後，這項事業每況愈下，梁感嘆說，「儲才館最為痛心」，「現在只算白費心力了」。

最後就只剩下議會政治這處空間了。中華民國的最高立法機構是國會，梁啟超曾組織進步黨參與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在現實世界中他所樹立的典範是英國，他希望中國成為英國那樣守法律、有秩序的民主法治社會。由於他對歷史與人性的深刻觀察，使他瞭解政治過程中必然會有黑暗的一面，而民主社會的政黨制度和法治原則就是對私心的過度發展的抑制。[11]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以執政之名，下令取消國會參眾兩院。警察廳隨即查封、接收參議院。當天下午，非常會議預定在參議院開會，因警察攔阻、不准入內，而被迫取消。[12] 國會居然被

非民選的政府首腦的一紙行政命令廢除，知識界的幾位重要人物均視為理所當然：「中華民國」的取名者、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公開主張廢除國會，恢復古代的給事中和監察御史；當過國會議員的法學家和大律師章士釗，認為中國是農業國，「不能採取工業國之議會制度」；一向守舊的史學家錢穆，其《國史大綱》以北伐勝利作結尾，亦贊同「以革命的武力來掃蕩軍閥，以一黨專政的理論來停止黨爭」。這些博學鴻儒的法治觀念，似乎不如歐美國家受過基本公民教育的中學生。

一九二七年，梁啟超悲哀地宣佈，中國無法實行代議制和政黨政治。中國人的觀念意識與行為習慣，與法治憲政的要求相背離，「文者化身為政客，武者蛻變為軍閥。強者謀為開國帝王，次者謀為擁戴功臣。帝王之不可復為，退而求為獨裁元首；功臣之不可復得，退而求為割據自雄。所謂制憲云云，反成了野心人物盜名竊位所假借的宣傳口號。」[13] 梁啟超自辛亥革命以後的政治活動可謂「顆粒無收」，與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吳佩孚等軍閥的合作，使他的名聲遭到玷汙。他的影響力迅速喪失，「他對中國傳統的質問，對中國適應險惡競爭世界之能力的懷疑，這時成為一種新的絕望、無助心態的基礎。對於舊改革派的演變信念，年輕人都不予認同，沒有急迫且斷然的行動，什麼都改變不了。」[14]

梁啟超生前沒有看到中國成為「法治國」，但他的學生張君勱是一九四六年版《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者，在中國和台灣的立憲史上留下重要一筆。或許，這可差強人意地安慰九泉之下的梁任公？

康有為之死：兩眼久枯，微言遽絕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為在青島去世。聽聞噩耗，梁啟超立即匯去數百元，讓康氏家人得以處理後事，並在北京為康舉行公祭。梁在輓聯中稱，康此時辭世「倖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

此前兩週，康有為因躲避北伐，從上海抵達青島。康有為對國事持極為悲觀的看法：「今自浙江內訌，各自割據，真為印度矣，進而南北俄化，粵政則決於俄鮑羅廷，兵權則操於俄加倫，蔣介石只為俄

將，無足議焉。……惟今上無憲法，中無國會，下無總統總裁，不知中外古今對此是何國體。蓋自去年改執政，破約法，民國之滅亡矣。半為印度，半為俄，以此危急至極之秋，國人有懷莫白，鉗口結舌於暴民專制之下以待亡，豈不哀哉！」[15]

三月二十九日，康有為參加某同鄉在英記酒樓之邀請，飲橙汁一杯，突感腹痛如刀絞，未終席，即回家中，請醫生到家診斷為食物中毒。三十一日凌晨五時三十分，七竅流血猝死，屍體不僵，死狀甚慘。關於其死因，其女康同璧生前堅持「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導致死亡」；康同壁之女羅儀鳳文革中所寫的一份交代材料稱康氏「是被國民黨下毒害死的」。康有為另一位女兒康同環則認為「可能是英記酒樓的食品不潔所致，未必是因為政治鬥爭而犧牲的。」康氏弟子呂振文臨終對其子披露，因康氏不同意溥儀「跟著日本人走」，故而遇害。[16] 康有為生前為保皇派魁首，清末時期與孫文領導的革命派互相攻伐，亦不時有彼此暗殺之策劃。康有為還針對清廷高官發起暗殺行動，當然他自己也是清廷暗殺的對象。康有為自戊戌後屢經險難而不死，卻在剛過完七十歲生日之際離奇死去。

康有為死後，梁啟超、徐勤等為其發起募捐，為其「撫養遺族、奉安遺骸、刊刻遺著」，聲稱「先生以國為家，夙不治家人生產作業，每遇國難，輒毀家以圖紓救，居恒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以故身後不名一文，且負債至六七萬」。實際上，康有為生活奢侈，揮金如土，才導致財務困難。其門生故舊多有認捐，而最慷慨大方的是山東督軍張宗昌，立即匯去三千元。[17]

康有為一生忠於清室，但死後請遜帝溥儀賜諡，卻遭到與之敵對的遺老陳寶琛、鄭孝胥的反對。他們認為，康有為草率發起戊戌變法，事機不密，致使光緒皇帝幽死瀛臺，不應予諡。倒是有日本人同情康有為的遭遇—六月十三日，日本駐福州總領事松園介次郎致信溥儀說：「陛下遽失如此忠臣，定為震悼，不佞自聞噩耗，亦為大清國之將來，深感惋惜。」[18]

實際上，康梁兩人早已形同陌路。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之後，梁啟超的政治主張從保皇轉向革命，一度與孫文、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來往密切，甚至有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梁啟超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之後，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

在尊孔保教問題上，梁啟超也逐漸擺脫了康有為的束縛。一九○二年，梁啟超發表文章指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他從「保教黨之驍將」轉變為「保教黨之大敵」，受到康有為的嚴厲批評。

張勛復辟，更使得師生關係瀕臨破裂。康有為積極參與張勛復辟、粉墨登場，梁啟超則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討逆宣言》即是梁所起草。梁啟超還以個人名義發表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據說通電寫好之後，有人擔心會破壞師生友誼，梁啟超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康有為在張勛復辟失敗後，將怨氣發泄在梁啟超身上，咒罵其為「梁賊啟超」，將其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

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大都體現在《大同書》當中。此書完成之後，康秘而不宣，他深知該書如同潘朵拉的盒子一樣，一打開便會有魔鬼飛出來。「大同思想與情懷，與西方及儒家中國都有親近關係。結果是，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創立了一個最具想像力的烏托邦。」[19]《大同書》沒有成為中國革命的催化劑，與之思維方式相近的共產主義思想，卻經由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傳入中國。康有為從早年憧憬大同，到晚年恐懼赤禍，甚至支持張宗昌反對黨軍北伐，跟支持孫傳芳的梁啟超殊途同歸。

文革期間，康有為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保皇派」。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破墓開棺，將其帶有白髮之顱骨遊街示眾、批鬥拷打。後來，康有為的顱骨被青島市博物館王集欽研究員以「造反有理」實物展覽為名收入館中藏匿，才使得十八年後重修墓地時，墓中尚有康氏的一點屍骨。梁啟超慶幸康有為早死的預言應驗了。

前財政總長如何持家？

康有為之死，讓梁啟超痛感康「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不足三個月之後，與梁啟超同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投湖自盡，王之自殺，源於對政局的絕望，也與個人財務困難有關，此事更

讓梁更有「物傷其類」之感。梁還聽說他的學生、護國運動功臣蔡鍔的家人在鄉下雖有薄田卻無法維生，為之痛心疾首。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堪比美國開國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以經世致用之學而論，梁對財政問題有特別的興趣和研究，他認為要實現憲政必須對財政進行改革。他著有數十萬言的《財政原論》一書和數十篇論述財政經濟問題的文章，有關財政經濟的知識和見解，當時中國無人能及，可以說他是中國近代財政學的創始人。 [20]

民國建元，梁啟超躍躍欲試，「本人確有野心來整理財政」，希望為國家「立一有系統之財政計劃」。但袁世凱不願讓他掌握財政大權，只給他一個幣制局總裁的閑職。梁啟超欣然上任，因為他流亡日本時便認為，中國救亡圖強的第一要義就是整理貨幣、流通金融。然而，就職之後，他擬定幣制局簡章七條，並撰寫了一系列闡述幣制改革的文章，但統統被袁世凱束之高閣。

一九一七年，梁啟超輔佐段祺瑞瓦解張勛復辟，獲得政治發言權，其領導的研究係在內閣的九名成員中佔有六席，他本人也如願以償當上財政總長。梁啟超提出「改革幣制，整頓金融」的計劃，擬定出《整頓幣制辦法大綱》。然而，段祺瑞政府借對德宣戰為名，擴軍備戰，企圖實現武力統一。直系軍閥反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迫使段辭職，梁啟超和其他內閣成員也連帶辭職。梁啟超只做了四個月財政總長，被巨額軍費報銷弄得焦頭爛額。從此，他宣佈脫離官場，重返學界。雖然他未能建立一套良好的財政制度，但他的財政思想，如國幣觀念、金本位制度等，啟發後人，逐漸納國家財政於現代化之軌道。 [21]

理一國之財失敗了，理一家之財呢？做過財政總長的梁啟超是如何持家的？從其書信中可看出若干端倪。

梁啟超在近代文人中算是生財有道之人，身兼數職，薪水豐厚，文思泉湧，稿酬不斷。但是，他的家累之重也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他要養育九個子女，其中多人在歐美第一流學府留學。他還要周濟眾多親朋故舊（梁不斷抱怨「窮親戚」太多），開支浩繁、入不敷出。梁啟超本來計劃一九二七年再赴美國遊歷，但連五千美金的旅費都無從籌措，以至於遲遲不能成行。反倒是二弟梁啟勛幫助他料理財務，每月為之儲蓄兩千元，又以梁思成的名義存一萬元於正金銀行，以備不測。幾處房產的購置，也都是由梁啟勛經手的。 [22]

在這一年的家書中，梁啟超在多處提及支持兒女及親友的款項：

思順的留學支出匯去七百五十元；資助兒媳林徽因三千（華幣），可以用於婚禮（這位細心的父親的叮囑稍顯囉嗦：「婚禮只要莊嚴不要侈靡，衣服首飾之類，只要相當過得去便夠，一切等回家再行補辦，寧可省點錢作旅行費」）；思永赴西部考古，資助美金兩百等等。有親友借錢不還，梁啟超亦叮囑家人不必去討帳。他再三告誡子女，保持寒士家風，總不要壞家門本色，「生當亂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要「養成節儉吃苦的習慣」、「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奮，志氣強立」。

僅僅靠筆耕和授課，無法應付無底洞般的開支。梁啟超除了在北京和天津購置地產、興建房屋之外，更採取多元化投資方式。比如，他在家書中提及五折出賣中國銀行股票，「買時本用四折，中交票領了七八年利息，並不吃虧。賣去二百股得一萬元，以後思順的學費不消我再管了」。他還討論所購買的保險單，「十五年間納費三萬七八千元，若只得三萬，豈非我們白虧了七八千元，還有複息不在內，這不太吃虧了嗎？」在一九一二年剛回國時，他就購買了加拿大保險公司的保單，其理財觀念相當超前。

「小家」尚可勉力維持，「大家」卻已千瘡百孔。一九二七年年末，梁啟超悲觀地評估說：「國內經濟界全體破產即在目前，舊物只怕都變成廢紙了」、「國民破產，連我這樣大年紀也要餓飯」。他寫信給在美國的梁思順，叮囑說「我把所有的現錢湊五千美金匯存你那裡，請你們夫婦替我經理著，生一點利息」。[23]

不過，次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南京政府實現了名義上的全國統一，國勢趨於好轉，梁啟超擔憂的經濟崩潰並未出現。倒是在二十年之後，對日抗戰獲得「慘勝」的國民政府無力阻止通貨膨脹，法幣確實變成廢紙，經濟危機成為國民政府垮臺的催化劑。

孩子們，不要將毒藥當良方

作為教育家，梁啟超在自己家中實踐其教育理念，九個子女個個成就斐然，三個兒子成為中央研究院或中國科學院院士。梁啟超耗費很多時間給在海外留學以及在國內各地展開事業的孩子們寫信，從日常生活瑣事談到學業和人生安排，以及對天下大勢的分析—這一年年

末，這位慈父還親自籌劃長子梁思成與林徽因的訂婚典禮。

從孩子們的來信中，梁啟超發現，在知識界普遍左傾的環境下，很多年輕人成為左派激進分子。在北美留學的五個孩子中，二十歲的思忠政治熱情最高，一度想終止學業回國參加北伐。梁啟超一般不會反對子女的決定，但這一次他在家書中提出反對意見。

首先，梁啟超承認中國青年人的左傾是因為中國社會政治黑暗的背景所激發的：「思忠……思想一天天趨向激烈，而且對於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幾十年來，時局太沉悶了，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為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24]

其次，梁啟超勸誡說，熱情、勇氣和愛國心很容易被政治勢力所利用，如今國內的北伐已經不是革命，而是新舊軍閥的混戰。許多青年自以為參加革命了，卻是不明不白地送死。有些則在失敗的打擊下，陷進背叛、墮落的深淵—國民黨「清黨」屠殺之後，多少左傾青年走向幻滅！

儘管理解青年左傾的緣由，梁仍規勸孩子們不可過於天真。他深知，一方面不可以打擊孩子的勇氣，另一方面又不可以任憑孩子走錯了路，兩者之間如何平衡和拿捏，非常不容易。梁啟超並不認同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的名言—「如果我兒子在二十二歲時沒有成為共產黨員，我會瞧不起他。如果他到了三十歲還是共產黨員，我還是會瞧不起他。」—真正聰明且有良心的人，二十歲時也可以不左傾！

在父親的教導下，梁思忠放棄了立刻回國參加北伐的想法，繼續學業。後來，他轉入維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25] 三○年代初畢業回國，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入伍後，由於留學資歷和傑出才幹，梁思忠很快升任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抗戰中，梁思忠表現相當出色。可惜此後不久，年僅二十五歲的他卻因患腹膜炎服錯了藥、貽誤了治療時機而去世。若非英年早逝，梁思忠一定能夠在抗日戰爭的戰場上縱橫馳騁，成為一代名將。

一九二七年年初，梁啟超即已預見到張作霖政權即將垮臺，取而代之的黨國體制卻會更糟。一月二日，他在給女兒梁令嫻的信中寫道：「時局變遷極為可憂，北洋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十有九不能開張……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

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拚耳。」[26] 梁手無一兵一卒，只能以筆為槍，討伐黨人獨裁，可惜他已失去了清朝末年以報刊轉移時代風氣的力量與地位。

入民國後，梁啟超視袁世凱和孫文為兩大禍害。此時，袁孫雖逝，但兩大惡勢力「北方軍閥」和「南方黨人」，仍是中國轉型為憲政、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梁啟超一連用四個極端負面的成語形容孫文之作為—「不擇手段」、「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國民黨精心塑造的「國父」，在梁啟超心目中居然如此不堪。

梁啟超在清末是激進民族主義者，他是「中華民族」這個似是而非的概念的發明者，也是中國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積極倡導者。學習明治維新，就是要將中國打造成現代民族國家，乃至與西方列強分庭抗禮的帝國。他認為，作為形成「近世國家原動力」的「民族主義」，經過「進化」和「競爭」，現已成為「民族帝國主義」。

另一方面，梁啟超又是較早發現美國等西方國家聯邦制或邦聯制之優越性的思想家，他以聯邦或邦聯體制來對照中國近代以來權力逐漸下沉的趨勢，認為跟武力統一相比，聯省自治不失為中國國家建構更好的選項。早年，梁啟超寫過一篇〈中國地理大勢論〉，認為中國雖是「天然統一之大國」，但四川和廣東兩地具有獨立的地理優勢和歷史傳統。四川「其險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四川、雲貴，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而廣東「數千年來未有大關係於中原」，「粵人者，中國民族最有特徵者也」，「廣東包括廣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他甚至預言說：「他日中國如有聯邦分治之事乎，吾知為天下倡者，必此兩隅也。」在統獨議題上，梁的想法頗具彈性和張力。果然，入民國後，四川長期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即便軍閥混戰，也多是內部爭鬥。直至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內遷，以重慶為陪都，中央勢力才進入四川。而廣東更是在陳炯明時代成為聯省自治運動的先鋒，陳炯明治理廣東，百廢俱興、深得民心，卻被蘇俄支持的孫文以武力擊敗，廣東成為模範「自治領」的希望終告破滅。

二十年代以來，梁啟超反對北方或南方武力統一中國的企圖。對於依賴蘇俄勢力、宣揚共產主義的國共兩黨，他更是目光如炬，指出兩黨帶給中國的絕對不是福音，乃是喪鐘。首先，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輕率引入蘇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之理念，吸收和扶持痞子流氓為革命主力，摧毀中國民間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

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設想。」、「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便飯。而在這種會中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他們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簡直是認作惡為天經地義。」[27] 弔詭的是，梁啟超深惡痛絕的以姦淫擄掠為榮的革命者，其中之一正是被他啟蒙的湖南青年毛澤東。

其次，梁啟超發現，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壞，國民黨已經被共產黨攫取魂魄、身不由己。梁之反對國民黨容共政策，並非歷史上與國民黨之恩怨，而是價值上的針鋒相對。「國民黨早已成過去名詞，黨軍所至之地，即是共產黨地盤。」「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成是由共產黨主動；但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南方事態如「城頭變幻大王旗」，梁又發現蔣介石與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之間已出現重大裂痕，「蔣介石輩非共產黨，現已十分證明，然而他們壓制共產黨之能力何如，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現在上海正在兩派肉搏混鬥中，形勢異常慘澹，若共黨派得勝，全國人民真不知死所了。」[28] 以此觀之，梁之反共，比蔣更澈底。蔣反共，更多是因為共產黨威脅其權力；梁反共，乃是從根子上不認同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政策和哲學基礎—共產黨對人生命的蔑視和對人的物化，是推崇儒家人本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的梁啟超堅決反對的。

再次，蔣介石清黨之後，共產黨和蘇俄勢力似乎頃刻間灰飛煙滅，但梁啟超並未盲目樂觀。他指出，共產黨背後是蘇俄，蘇俄提供武器、經費，更提供意識形態和主義。蘇俄是比英美日更危險的新帝國主義。[29]「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佔領，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揮而成功者。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眾？所以從國民黨中把共產黨剔去，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梁啟超指出，國民黨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勝利，若國民黨不能提供一套足以跟共產黨抗衡的意識形態，一旦共產黨捲土重來，國民黨必是手下敗將。中國很可能迎來亙古未有之厄運：「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真的勝利—不會像俄國一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30] 二十二年後，蔣介石率國民黨殘兵敗將逃亡台灣之時，若讀到梁啟超的這番預言，不知當作何感慨？

梁啟超是過渡時期中國的一位關鍵人物，「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同時將這一傳統固有的關切轉變為以他著名的國民形象為標誌的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其思想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意

識形態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的和永久的組成部分」。[31] 梁啟超雖然思想多變、與時俱進，但對最具迷惑力的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好感。然而，梁啟超的子女，多半並未聽取父親之勸誡，深受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之蠱惑，在一九四九年的大變局中，選擇留在中國。他們幻想為「新中國」服務，卻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妻，雖然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卻因呼籲保護北京古城，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受盡批判和屈辱。林徽因於一九五五年鬱鬱而終，梁思成一九七二年死於江西農場。不知他們離世前是否還記得父親當年在家書的真知灼見？

　　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梁啟超的孫子梁從誡，亦因祖父和父母的原因成為批鬥的對象。紅衛兵稱之為「梁三子」，在他胸前掛上這樣的牌子：「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梁從誡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他的後半生投身環保運動，創建自然之友組織，卻屢遭挫折。談到梁家三代人的不同，梁從誡曾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但是，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是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招致厄運。[32]

8　胡適

敢向黨國爭人權

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的。

—胡適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適暫時離開生活了十年的北京──在過去十年間，他從一名寂寂無名的普通「海歸」，暴得大名而成為文化界的領袖。「我的朋友胡適之」是知識界的一張入場券，而進入過胡適的書房、跟胡適討論過問題，則是北大學生的一大榮耀。

離開的時候，胡適自己並未料到，他就此告別了一種他再也無法返回其中的生活：在琉璃廠淘古書，到西山看紅葉，與友人去上等餐廳品嘗涮羊肉。雖然三○年代胡適還會回到古都，還會回到北京大學，但已然物是人非。南方正在興起的種種事件，不僅最終將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還會改變胡適一年後要返回其中的那個世界的形態和各個方面的情況。 [1]

這是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後第一次出國旅行，他從北京登上開往瀋陽的快車，再穿越蘇俄廣袤的大地──順道考察傳說中蘇俄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然後奔赴歐洲。年底，他再從歐洲前往美國。十個月之後，當胡適啟程回中國之際，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然大變，跟他在一九二六年秋天的預測驚人相似──「吳佩孚三個月倒，張作霖六個月倒」，國民黨將在五個月內取勝。 [2]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船到日本橫濱，國內朋友們傳來種種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在上海的高夢旦認為，「時局混亂之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遭忌」。[3]

在南方如魚得水的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則認為，「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常可愛」。顧頡剛勸告老師不要回暮氣沉沉的北京，因為胡適的很多老朋友都在為張作霖服務，「明白就是反革命」。顧告誡老師說，「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於先生者」。最後，顧頡剛提出忠告，「如果要做政治宣傳工作，最好加入國民黨」。[4]

老朋友丁文江勸胡適留在日本一段時間，研究學術，靜觀國內局勢之演變，也借此機會熟悉一下日本這個可能很快就會在中國人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民族。丁文江此前在孫傳芳手下任要職，此刻已是國民黨的通緝犯。

胡適認為丁文江說得有道理，但他盤纏用盡，在日本沒有私交，又不會講日語，倉促之間難以找到一份教職。他決定如期回國，而且他不願在祖國發生劇變之時在國外當旁觀者。五月二十日，胡適從神戶乘坐一艘小型日本輪船抵達上海。

此後，胡適在公共租界的極司菲爾路租了一套舒適的公寓，將妻子和孩子接來團聚，此後一家人在上海居住三年半之久。胡適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任教，又在東吳法科大學主持哲學講座，兩處要佔用四個上午授課。後來又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新月書店董事和《新月》雜誌編委，在處理諸多行政和編輯事務之餘，平均每天還要寫作三千字以上。那是他一生中最閒暇的時期，也是他最努力寫作的時期，他完成了一百萬字的文稿，包括《白話文學史》上卷、十幾萬字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兩萬五千字的《菏澤大師神會傳》、十七八萬字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等等。

胡適為什麼沒有回到北京呢？顯然不單單是採納顧頡剛的建議。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北京降格為「北平」，北大的學術地位也有所下降，胡適覺得那裡不再是一個可供他長袖善舞的舞臺。

胡適選擇居住在上海，因為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以及

新聞出版的基地。上海的外國租界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提供避難所。上海離南京很近，住在上海，更容易對南京的新政府發揮影響力。[5]

面對白色恐怖：說，還是不說？

此前，胡適在海外就中國政局所發表的言論，基本傾向於南方，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抱有相當之期待，將國民革命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新階段。[6] 他甚至成為國民黨在海外的義務宣傳員，贊同國民黨在學校吸收和組織學生的做法，進而禮讚作為軍隊的領袖、老師、靈魂和大腦的國民黨。[7] 胡適認為，南京方面有蔣介石的軍隊，有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等德高望重的「三老」的道義支援，有宋子文的理財能力，有可能形成中國的權威中心和穩定的基礎。或許基於與宋子文的交情，年底胡適還應邀出席了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並在婚禮上聽到吳稚暉對蔣介石肉麻的吹捧。[8] 然而，當時胡適就對國民黨即將面臨的困境有所預測，「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

蔣宋豪華婚禮上響徹雲霄的聖詩，與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在教堂中聽到的一模一樣，但這歌聲並不能掩蓋白色恐怖的血泊。回國之後，知道了更多關於清黨的真相，關於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和腐敗，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發生了改變，他不再支持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而回到了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一九二七年是胡適一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在政治上，這個轉捩點是最具戲劇性的。這是胡適最右傾激進、最法西斯蒂的曇花一現，也是他從右傾激進撤退的開始。」[9]

如何看待國共兩黨的互相殺戮？能不能支持國民黨的清黨？即便是主張反共的美國記者索克思（George Sokolsky）也公開評論說，南京等地「清黨」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於兩湖的赤色恐怖。[10] 用胡適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話來說，「清黨」的實質就是「以思想殺人」，這是「最可恐怖的」。胡適支持的《現代評論》雜誌評論說：湘鄂因土豪劣紳之名殺人，北方以三民主義之名殺人，南京以共產黨之名殺人，實際上都是為了「政見不同」而殺人，結果是，「湘鄂愈殺反共產黨人，蘇粵也愈殺共產黨人」。胡適認為，作為精英知識分子，與軍閥說話是「對牛彈琴」，同暴民說話是「與虎謀皮」，那麼與南京

政府主持者中那些「思想清楚、眼光遠大的人」說話呢？胡適的忠告是：「我們希望不再見胡亂的殺人，不經正式法律手續的殺人，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

胡適珍視人的自由和生命，批評政府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他重視憲法和制度建設，呼籲限制政府和政黨的權力，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他反對纏足、反對酷刑、反對殺人，也反對國民黨自欺欺人的「訓政」理論。他認為，人民的能力有限，民主政治正是因此有必要，民主政治就是增強人民能力的辦法。如果說人民需要訓練如何使用民主權利，那麼政府更需要訓練，而施行憲政是大家最好的學習辦法。[11] 所以，國民黨應讓人民參政而不必考慮人民的成熟水準，民主制度本身就有教育功能。儘管政治參與的最初階段不免要出一些錯，但也正是參政的經驗將使得人民取得更好的政治判斷力。[12]

但此時國民黨已大權在握，堅持施行「訓政」。雖然只學到了蘇聯一黨專政的一點外形，但黨部中人挾「革命」之名而到處橫行。[13] 國民黨人認為，中國人還沒有自我治理的準備，必須由黨來當猶如嬰孩般的百姓的「保姆」。

國民黨的「清黨」在上海和南京尤其酷烈，胡適的老朋友們對此看法各異，分裂為彼此對立的三大陣營。

本身就是共產黨人或親共產黨的左派陣營，當然仇恨國民黨的「清黨」，並以暴易暴，在南昌、長沙和廣州發起一系列暴動。胡適在北大的同事李大釗被張作霖抓捕並處死，胡適對其命運並無太多的同情，因為李大釗的行為確實是賣國。陳獨秀被中共解職之後隱居鄉下，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捕殺，胡適則頗為之傷感。數年後，陳獨秀被國民黨拘捕，胡適為之仗義執言。而對於昔日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工的毛澤東，胡適大概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多年之後，在國共內戰前夕，胡適致信毛澤東，希望毛放棄武力征伐，效仿美國政治家佛斐遜，參與競爭性的選舉，通過選舉上臺執政。然而，這樣的建議對於迷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毛澤東來說，實在是過於天真了。後來，毛澤東將胡適也列入「戰犯」名單，五○年代在中國大陸發起了批判胡適的運動，肅清胡適的影響之後，西化派知識分子才會向新政權俯首稱臣。

持第二種立場的，是全面投向國民黨、支持國民黨「清黨」的蔡元培和吳稚暉等人。蔡元培主要起名義上的作用，吳稚暉則積極地參與其事。吳稚暉是「清黨」運動的代言人，鼓動蔣介石對共產黨大開

殺戒。吳致信給上海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楊虎，認為被捕的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尤屬惡中之惡」，建議「必當宣佈罪狀，明正典刑」，這封信加速了陳延年的死亡。吳稚暉還在《大公報》發表文章，說江浙「清黨」被殺的人「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對此，周作人舉出也有死得安詳從容的人的例子後，譴責說：「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骷髏為飲具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14]

持第三種立場的，正是周作人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周作人當然不認同共產黨人的學說和實踐，但他是最大膽地批判國民黨濫殺無辜的知識分子。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周作人是思想最深刻、文字最優美、知識最淵博之人，可惜他的思想成就被漢奸的惡名所遮蔽，而不為後人所重視。若不因人廢言，重讀周作人對清末以來中國政治、文化走向的觀察和評論，則必嘆為先知。周作人對人類文明和人性本質的理解，優於他的長期被過度拔高的哥哥魯迅。

周作人不僅尖銳批評吳稚暉等「以筆殺人」和「為殺人鼓吹」的知識分子，而且對胡適的過於低調和明哲保身也表示不滿。周作人說，殺人固然是中國的遺傳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代表的蔡、胡諸君在上海，卻又視若無睹」。周作人批評胡適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未能起到「社會良心」的作用──不過，周作人對胡適的批評稍嫌苛刻，因為胡適回到中國時，上海的大屠殺已過去一個月，胡適並非此事件的親歷者。不過，周作人對胡適的期待是有道理的，因為胡適既是自由主義者，也是人道主義者，自然不能對政權系統性的殺人行為保持沉默。胡適在上海演講提到中國還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文明國。胡適將「人力車」與「文明國」作為兩個對立的概念提出來，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周作人指出，浙江黨獄，「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而胡適「只見不文明的人力車而不見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15]

跟周作人一樣，魯迅也對上海殘酷的清黨屠殺感到「目瞪口呆」，那時他還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從此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魯迅對日本友人增田涉說：「在這一點上，舊式軍閥為人還老實點，他們一開始就不容共產黨，始終堅守他們的主義。他們的主義是不招人喜歡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國民黨採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麼也感到厭惡，總是覺得可恨。他們殺了我的許多

學生。」[16] 可見，魯迅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甚於北洋政府。

殘酷的「清黨」奪去若干熱血青年的生命──他們只是一時被共產主義這種邪惡的意識形態所矇蔽，大部分人罪不至死。屠殺不僅奪去數千條人命，更毀滅了一代知識青年的理性和希望，以及對南京政府的好感。《現代評論》敏銳地指出：「共產黨裡面雖然有許多極無聊賴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實行的毅力的青年。……我們希望不要為殺幾個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們更希望不要殺幾個共產黨而驅人表同情於共產黨。」這大抵就是胡適的觀點，他雖然沒有周作人那樣激憤，但基本立場與之近似。

然而，後來中國的時勢，恰是朝著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派」所擔心的方向發展。自由主義反對暴力、反對殺人，卻無法為建構獨裁政黨、軍隊、特務系統以及民族國家提供強有力的論述。靠暴力和殺人來奪取權力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選擇、不欣賞自由主義，都將自由主義當作敵人看待。而渴望個人富裕、國家強大的民眾，對自由主義者強調的人權、民主、法治也缺乏興趣。「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麼答案。」[17] 這是胡適及其信奉的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必然遭遇的悲劇命運。

為什麼必須捍衛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這一階段，胡適與國民黨的論戰，主要圍繞言論自由展開。對國民黨來說，孫文乃是不可批評的新偶像；胡適偏偏要針對孫文提出質疑，對孫文的大雜燴學說不以為然，對國民黨將孫文打造成「國父」的宣傳術也不予認可。他寫道：

> 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裡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

> 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18]

國民黨的心胸還比不上北洋軍閥，胡適在北京辦《新青年》和《努力周報》沒有遇到干涉，在上海辦《新月》卻遇到了大麻煩。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上海黨部主委、宣傳部長陳德徵在國民黨全國大會上提出嚴厲懲處「反革命分子」。那麼，如何定義「反革命分子」呢？陳氏的說法是：「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唯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若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胡適被這種充滿法西斯味道的言論觸怒了，他立即給老朋友、司法院長王寵惠寫了一封抗議信，其中寫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嗎？」

於是，一場偉人與癟三的戰鬥打響了。其實，陳德徵不配成為胡適的論敵，只是他的黨棍身份讓他進入胡適的「法眼」。他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僅僅因為他企圖置胡適於死地。

對於胡適的抗議，陳德徵反駁說：「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的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總理主要的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博士來胡說的。」陳氏終於將國民黨高層羞羞答答不願說出來的話全盤托出：黨章高於憲法，黨大於政府。南京政府並不是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而是重新打造的「黨國」。

緊接著，國民黨各地黨部紛紛發電，要求中央下令封閉新月書店、逮捕胡適，並撤銷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並剝奪其公民權。一九二九年八月，陳德徵發出正式公文：「宣傳部提議，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辦案決議，呈請中央。」

胡適受到的懲罰僅僅是失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位，以及後來新月書店被查封。但是，坊間傳言，胡適遭到逮捕，甚至有生命不保之虞。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阿班（Hallett Abend）甚至斷言說，胡適面臨死刑審判，連執行的日子都已經確定。《紐約時報》刊登了

阿班的報導，並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發表社論指出：

> 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一九二七年回國後不久，面對主宰一切的排外主義，胡適便充滿勇氣，敢於放言，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作比較，堅持認為，橫遭抨擊的西方物質文明中，其所蘊含的精神性，比之骯髒、殘暴、極端漠視人類生命及充滿宿命論的東方「精神文明」，要遠勝一籌。胡適的真話，對於這一精心塑造的東方假想來說，無異於叛國之舉。

> 中國企圖逼迫外國記者沉默，已經夠惡劣了。而當他們企圖懲罰一個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這種偏狹何時到頭。要知道，這個受迫害者對當代中國所作的貢獻，將被永遠牢記，而迫害他的人，將早早被人遺忘。……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在胡適冒險對中國人道出實情時，他的聲音，應該是去傾聽，而不是去壓制。 [19]

阿班將這篇社論在遠東各國廣為散發。英文版被送給上海的所有英文報刊，並通過無線電報發往中國各大城市，中文版則發給所有的中文報紙。日本、菲律賓等國的媒體也都有轉載。阿班記載說，四天後胡適被釋放。

然而，胡適在日記中並未記載自己曾被捕之事，國民黨的官方文件中也沒有相關記錄。因此，胡適研究者格里德認為，此事可能是捕風捉影，是「優秀記者捕捉戲劇性事件的本能使阿班在這件事上走入了歧途。」[20]

無論真相如何，胡適一定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恐嚇，國民黨用言論場之外的力量強行結束了這場論戰。「儘管他很有威望和影響，但他對國民黨習慣於用折磨、恫嚇、酷刑和監禁等手段還是非常清楚的。他必須考慮自己的人身安全。在與國民黨衝突後，胡適的態度明顯轉變，他以後再未這樣嚴厲批判國民黨了。」[21] 像〈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可有憲法？〉和〈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樣的痛斥國民黨的文章，從此成為絕響。再加上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共產黨的武裝割據，日本人的蠶食鯨吞，使得三十年代以後的胡適修正了對國民黨的態度，「將國民黨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統治力量而接受，逐漸抱有認為那種諸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將加快加深中國危機這一看法」。[22] 當然，胡適一生都沒有放棄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鼓吹，只是選擇更溫和、更安全的方式。

教育獨立、拒絕黨文化是不可讓步的

在這場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論中，站在胡適對立面的國民黨黨棍們，說理說不過胡適，便求助於權力的外援。胡適受到了來自教育部的申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教育部的領導者蔣夢麟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胡適不客氣地寫信反駁教育部的公文，還保持了他一向引以為自豪的幽默：他沒有忘記指出對方信函中的幾處錯別字。由此，胡適與國民黨的衝突，從言論自由擴展到教育獨立。

國民黨對胡適採取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六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改教育部為大學院，以蔡元培為大學院長。十月，蔡請胡適擔任委員，胡拒絕，直言不能附和「黨化教育」。後來，在蔡的再次敦請之下，胡適勉強就任。次年五月，南京方面動員胡適參加全國教育會議，胡適幾度推辭。老朋友錢端升說，「太堅辭了也好像生氣似的」。連胡適自己也承認，「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於是決定去南京一趟。結果他發現，會場上大

半是熟人，可見英美派知識分子多半已為國民黨所用。[23]

但是，胡適不願「學而優則仕」，更不願放棄對教育獨立的價值的堅持。蔡元培計劃改北大為中華大學，讓李石曾任校長。胡適明確表示反對，在會上與吳稚暉發生激烈衝突。吳離開座位，跳起來大聲斥責說：「你嗎，就是反革命！」

胡適在會上「十分忍耐」和「不與計較」，回家之後即寫了一封給吳稚暉的信，自稱「不很明白今日所謂『革命』是怎樣一回事，所以也就不明白『反革命』是怎樣一回事」，要吳指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條例》的第幾條。不過，胡適稍後冷靜下來，這封措辭激烈的信並未發出去。

這場關於「革命」與「反革命」的爭論，正表明出「革命」這個概念已經成為一個不容置疑的善惡劃分標準。「革命」原本是本土詞彙，它在二十世紀初的復活，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日語翻譯，也即受到某種西化的洗禮，遂構成如美國著名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革命之謎」—近代以來中國激進主義的形成。[24] 其實，定義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的，不是某種絕對的真理，而是言說者背後的槍桿子。

這場爭論的另一焦點是胡適要捍衛北大的地位與聲望。當年，蔡元培辭職南下，不是因為學生運動和北洋政府的壓力，乃是因為北大內部的權力鬥爭。蔡對北大始終有一股怨氣，更何況如今蔡身為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教育部長），當然要遵循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政策並對全國教育資源作出重新分配。在這個新的格局中，北大的處境非常不利。胡適在北大的時間比蔡元培更久，對北大的感情更深，不願看到北大被國民黨人控制並淪為二流大學。早在五月二十一日，胡適在中央大學（原東南大學）宴請大學院委員會委員時，就「說了幾句很不客氣的話」，他回顧了五四時代北大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前身）的對峙之後說：「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殺者殺、逃者逃，北大久不為北大；而南高經過東大時期而成中央大學，經費較北大多三倍有餘，人才更為濟濟。我希望中央大學同人擔北大所負之責，激烈的謀文化革新，為全國文化重心。」有心人可聽出其弦外之音，胡適對心愛的北大的邊緣化不無怨言。而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中央大學，迎來政治上更為保守的戴季陶當校長，又豈能突然之間轉型為「文化革新」之先鋒？

此時，主持南京政府教育政策的，表面上看是蔡元培，但掌握實

權的是蔣介石的文膽、中央大學校長戴季陶。一九二七年，戴季陶大多數時間都為病魔所纏，他撰寫了新書《青年之路》，側重於論述如何建立一個強大、正統而且以三民主義和中國傳統道德為基準的國民黨思想體系，也強調務必制定遏制學生運動的新政策。蔣介石吸收了戴季陶的思想，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以國民黨軍委主席的名義發佈命令，即刻停止一切群眾運動，包括學生運動在內，學術之外的各級學生組織一概解散。[25]

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在學校中開展軍訓。在討論學生軍訓法案時，胡適提出增加「有正當主張不願加入者」可不軍訓的內容，因為「愛國固重要，但個人自由亦不宜太抹殺」。但代表軍方出席會議的何應欽則「對良心上的自由，全不承認」，認為「中國人自由太多，須加嚴格訓練」。中國人自由太多、一盤散沙，這是孫文的看法。何的這一席話體現了「馬上打天下」的國民黨軍人對孫文建國理論中「訓政時期」的理解。[26] 此刻真個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胡適當然不接受國民黨對他的「反革命」的命名，更不能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屈服。他向蔡元培提出辭職並自稱：「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是非。我看不慣這種只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故決計避去了。」胡適先後五次提出辭呈，蔡元培只好同意。

胡適對南京的觀感不佳，「上焉者日日開會，下焉者分贓吃飯」，他聽說宋子文、孔祥熙輩「結夥賣缺」，更是深惡痛絕。他看到國民黨從學習西方的典範變為與明末的復社相類的傳統中國式組織，對其前景日漸悲觀，既然「中國人不能組織大規模的事業」，那麼「政黨是大規模的組織，需要服從與紀律，故舊式政黨（如復社）與新式政黨如國民黨都不能維持下去」。[27] 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維持的時間僅二十二年，若以朝代算，跟短命的秦、隋兩朝差不多。

當全盤西化論者遇到儒教加法西斯的國民黨

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美德構成的黃金世界。」國民黨剛剛統一中國，就開始了一系列保守的壓

制政策以鞏固權力，嚴厲推行黨的信條進行思想鉗制，懷疑並排斥思想上的持不同政見者。黨控制的報紙和官方文件都使用文言文，電報也一樣。 [28]

於是，胡適猛烈批評國民黨，因為它在尋求一種意識形態時正在日益表現出對於「新文化」的敵意。國民黨一天天地轉向一種保守的文化，並把它作為其世界觀，重新肯定深埋在中國的思想和社會傳統中的儒家觀念。一九三四年，當國民黨人開創了他們滿懷希望的「新生活運動」並再度實行官方的孔子誕辰紀念時，儒家社會價值的復活得到正式承認。但這種向過去運動的傾向，在二十年代後期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的公開講話中已明顯地表現出來。 [29]

胡適捕捉到了這些重要的資訊。從一九二七年開始，胡適成為國民黨組織和國家權力支持的保守主義的痛苦而孤獨的抗議者、反對者。這種保守主義在廣大學生和新文化的領袖中沒有什麼影響，卻令人生畏、不可挑戰。胡適與之對抗，宛如螞蟻對抗大象，但這足以讓國民黨如坐針氈，因為「作為對一個暴虐的政府意識形態基礎的破壞，也就大致相當於對政府本身的直接否定」。 [30]

胡適與蔣介石及國民黨的關係，正如中央研究院在胡適紀念館舉辦的一次特展的名稱所說—「道不同而相為謀」。在抗戰期間，胡適勉強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不是支持國民黨，乃是支持中國這個仍未成型的民族國家對抗日本侵略，「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了」。但他從來沒有興趣加入國民黨，也對蔣介石一度希望他做虛位總統或行政院長的探試毫不動心。胡適晚年從美國回到國民黨佔據的台灣並批判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暴政，只是在「壞」與「次壞」之間選擇「次壞」罷了。 [31]

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適結束在美國九年的旅居生涯回到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四月十日，蔣介石親臨就職典禮並致辭，聲稱中央研究院這一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蔣在講到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後，話鋒一轉，再度將學術研究與政治聯繫起來，謂：

> 五四運動造成共產黨坐大，最後政府只好退來台灣。……今日大

> 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起者的胡適，不能接受蔣介石單方面將其「儒家化」的企圖，更不能認同蔣介石提出的學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在胡適回台灣前夕，國民黨人炮製了一本《胡適與國運》，既無出版社，也無發行人，作者多匿名，偏偏在機關學校廣為散發。其中有文章將胡適倡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作導致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罪魁禍首，認為胡適推廣白話文比之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批判文章乃是用白話文寫成），甚至攻擊說，「社會上的青年，到處實行家庭革命，手刃父母，兄妹結婚，倒戈叛上的種種作為，無非受胡博士思想解放的影響」。[32] 胡適知道背後是蔣介石對他的警告。但他拒絕保持沉默。

等蔣介石致辭完畢，胡適直截了當地反駁說：「總統，你錯了，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共產黨坐大，是十幾年後的事，跟五四運動無關。……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據當時在場的中央研究院青年學者李亦園回憶說：

> 胡院長就職時蔣老總統特別親自來了，來了之後還講話，在他的講話中不知為什麼忽然說到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可以說與五四運動的提倡自由主義不無關係，這樣的說話對胡先生來說當然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五四運動跟他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重要的推動者。結果老總統講完之後，胡先生站起來繼續答話，

> 他的答話讓大家臉色都凝住了，他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在當時那麼威權的時代，他這樣講使全場的人臉色都變白了，氣氛非常緊張，老總統卻很有風度地主持完會議，只是在胡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一件事，胡院長的表現可以說確實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33]

蔣保持禮節沒再說話，但並非無話可說，而把話留在日記裡。幾十年後，蔣介石日記解密，有學者赴美特地抄錄這一天的日記內容：「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鮑羅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辭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禮遇不予計較……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蔣介石將胡適對他的頂撞與三十多年前在武漢歡迎宴會上受鮑羅廷之羞辱相提並論，可見其反應之強烈。作為獨裁者的蔣介石，長久以來習慣於頤指氣使，尤其到了台灣，肅清反對派系之後，極少有人敢於「逆龍鱗」，突然遭到胡適「搶白」，自然氣急敗壞乃至夜不能寐。蔣臧否人物，單從他予對方的小恩小惠出發，而不衡量事件本身的是非對錯，他生活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還未進入現代工業文明。

胡適與蔣介石的這次衝突，並非偶然事件。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蔣介石曾面告清華大學學生代表：「胡適係反黨，不能派（當校長）。」胡適的反應只有一句話：「今天報載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蔣自己不曾意識到，他無意之間成了胡適自由主義精神的一面鏡子，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是在一九二九年與執政國民黨的激烈爭執中才獲得明確而具體的展現。一九三四年《獨立評論》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和一九四九年後台北《自由中國》上關於『自由與容忍』的討論，他所堅持的都是這一基本立場。」[34]

胡適晚年最後一場論戰，是對陣得到蔣介石資助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群體。趁胡適生病住院之際，文化保守主義者徐復觀發表文章攻擊胡適是「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在的」的「七不懂」，甚至用若干汙穢的語言辱罵胡適「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經摔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本來，文化保守主義或新儒家，可以跟自由主義和全盤西化論，在學術層面平等對話和討論。但徐復觀等人以「正統」為標榜，氣勢洶洶地討伐「異端」，卻又借助權力之手，已然淪為國民黨的文化打手，反過來印證了儒家從來是權力的幫凶。[35]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在中研院歡迎海外院士等酒會上發表最後一次講話。他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講到此處情緒激動，心臟病發作，數分鐘後仰身暈倒，再未醒來。

胡適的墓地設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外面的小山坡上，墓誌銘由胡適生前好友毛子水撰文：

>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二十多年之後，台灣實現了胡適夢寐以求的、也是鄭南榕用生命來捍衛的「百分之百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中國至今仍然身陷在極權主義的泥沼之中，人民不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華人文化圈，迄今為止尚未擺脫儒家專制主義文化之陰影。一場新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有待後人接棒前行。

9　郭廷以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

—郭廷以



一九六九年，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創辦人、一代宗師郭廷以，應夏威夷大學之邀赴美講學。兩年後，他正式卸任所長職務，從此長期滯美。儘管生活艱困，仍孜孜於研究撰述，完成《近代中國史綱》等多部巨著。[1]

早在一九二五年，在東南大學求學期間，郭廷以即受到南方革命宣傳的吸引，秘密加入國民黨。不過，他甚少參與黨員學生操縱的學運，而是埋首學問，只能算是一名「消極黨員」。當北伐軍打到南京之時，一九二七年春，郭廷以大學畢業，本來想出國留學，有同學勸他先做一兩年事再出國較好。於是，他追隨老師羅家倫，進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參與國民革命軍的文宣和史料撰述工作。

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郭廷以受命創辦中研院近史所，近史所形成「南港學派」，影響中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甚鉅。

然而，學界與政界一樣，人心險惡，鬥爭頻仍。「福特基金」一筆四十萬美金鉅款注入近史所，人人眼紅。外有吳相湘、姚從吾、黎東方等人杯葛，內有學生李毓澍反目成仇乃至在雜誌上造謠說「近史所是共產黨通過費正清滲透到台北的據點」，不擅長行政管理的郭廷以苦不堪言。

白色恐怖時代，近代史研究禁區重重。中研院內潛伏情治人員，隨時向上方報告院內動向，甚至以「釣魚」的形式用紅色書刊引誘南港同人入罪。郭廷以曾幫一位香港來的學生作保，後來這個學生好像在思想上發生問題，導致郭廷以也受到牽連，上了警總的「黑名單」。[2] 再加上助理研究員魏廷朝因「彭明敏案」被捕，一時間近史所風聲鶴唳。謙謙君子的郭廷以害怕成為「雷震第二」，乃避居美國。

郭廷以的學生郭正昭對恩師在美國的生活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 回程迎著夕陽，晚霞彌漫天際，又是晚秋時節，沿途楓紅，絢爛一片，而落葉遍地，更平添幾許悲涼氣息。我回首看看兩位老人家，顯得有幾分倦態，內心無限感觸。我問郭師母，《近代中國史綱》寫作完畢出版，結束美國的研究計畫，還要回台灣長住嗎？兩老聞言，沉默良久，才有郭師母透露一個訊息，他們在師大的宿舍已被迫遷離，回台灣已是無家可歸了。葉落又如何歸根呢？[3]

對於恩師終老異鄉，郭正昭感慨說是一個大時代的悲劇：「像胡適，劉子健，以及郭所長，都可歸納在這個大悲劇的範疇之中，這便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花果飄零的宿命。因為經濟的，特別是政治的原因，本土社會不能提供一個優良的生態環境，讓這些知識人安身立命。他們必須飄洋過海，流浪異域，追求自由的新生。這種花果飄零的宿命，構成了一幅時代悲劇的圖像。」[4]

買槍自衛、無須政府的河南鄉村

郭廷以一生研究近代史，他自己也是近代史的見證人。

中國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因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之前，中央政府是從州縣、省到北京，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的最高點。一切情報、建議都集中於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轉達到省和州縣。中央政府也是禮教、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中心，儒家的理想是，聖明的君王以王道治理天下。[5]

辛亥革命之後，中央政權分崩離析，地方勢力迅猛發展，地方主義者在其鄉土自組政府，握有兵權，控制財源，建立其自主權力的統治。[6] 民眾對北京中央政權的忠誠，轉向對本省本土的忠誠，如梁啟超的學生歐榘甲所說「愛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郭廷以在口述自傳中，真切地回憶了故鄉河南舞陽民眾半自治的生活形態和鄉土認同。

郭家在清末家道中落，到了父輩一代，經商致富，擁有多家商鋪。殷實的家境使郭廷以能到南京上中學和大學。那時，中國的水準較高的大學和中學，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學生除了需要繳付較高學費外，還得負擔膳宿費，這又進一步增加了學生的個人負擔，同時導致城市和農村接受教育的人數比例更加懸殊。[7]

河南雖名為出兵的地方，但全省的正規軍不過一萬人。河南未能像直隸（河北）、山東、安徽、湖北、山西、陝西等周邊省份，形成統治時間較為長久的本土軍閥，而不幸成為軍閥各派系的戰場。在二

十年代上半期，過重的兵差，加上呈波狀出現的嚴重的自然災害的襲擊，作為軍閥自身經濟基礎的農村經濟逐步崩潰，北方各省的治安狀況極度惡化。

作為中原大省的河南，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土匪猖獗，政府無力處置，民眾備受老洋人（張慶）、路老九、王老五（王振）、孫甸卿、孫殿英等土匪軍及殘兵騷擾。國家不為民眾服務，民眾自然不必效忠國家。人民為了自衛，必須買槍。當時，有錢人家可登記買槍。一般是日本造，最好的是德國五響鋼槍。每一支槍帶兩百發子彈，價約三、四十圓。鎮上百戶人家約有槍二百餘支，郭家即有三十多支。郭廷以推算，舞陽一縣共有四千多支槍，以全省一百縣估計，應有三、四十餘萬支，可見民槍之多。[8]

有了武器，各地進而組織民團，成立團練局，俗稱「局子」。由各家出錢，找幾個壯丁，便可以開始。團丁俗稱「隊上」，除由各家派飯外，每月有兩吊零用錢；無事，則幫忙農作，若出去打匪，可得些好處，難免趁火打劫一番。郭廷以在回憶錄中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團練頭目李兆豐生擒土匪頭子的故事，正規的軍隊做不到的事情，民團卻能做到。

除了鄉紳組織的民團外，農民也組織紅槍會之類的武裝組織。紅槍會逐漸發展成一支標榜保境安民的獨立武裝，對抗一切外來勢力：吳佩孚的北洋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國民黨的北伐軍。吳佩孚的軍隊瓦解之後，若干二流軍閥各自為政，紛紛投靠新的主人，比如靳雲鶚即向武漢政府輸誠，而遭到南下的奉軍的打擊。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河南信陽、確山等縣因靳雲鶚、魏益三大軍屯駐五個月，民間財富和食物被搜刮殆盡，激起民變，民團、紅槍會等聚集十多萬人，與駐軍周旋。[9]

一九二七年六月，在鄭州會議上，馮玉祥被任命為河南省主席，立即發佈命令禁止紅槍會等社團的活動。武漢政府則在「分共」之後的七月二十九日，通過《河南地方紅槍黃槍會等改編民團暫行規定》，試圖將紅槍會等組織納入由縣長擔任總監督的「正式機關」。然而，紅槍會拒絕接受改編。

一九二七年八月末，紅槍會和天門會等農民武裝在彰德將馮玉祥的一支軍隊解除武裝，驅逐出城。九月一日，馮玉祥派兩個師團包圍彰德城，用大砲轟擊一晝夜，由南門殺入，入城後採取屠城手段，七萬八千人被殺。民眾悲憤不已，由東門退出的紅槍會聚集十多萬人，再度包圍馮玉祥軍。九月十日左右展開三天的激烈戰鬥，將馮玉祥軍擊退到湯陰。之後幾個月，在石家莊至磁縣的元氏、高邑、臨城、內

丘、邢台、沙河、邯鄲等縣，掌握在紅槍會、黑槍會、天門會手中，成為不管奉軍、閻軍、馮軍，任何軍閥勢力都不能進入的地區。[10]

若是人人有槍，政府便不能為所欲為。河南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當四川陷入軍閥混戰之時，有人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振興民團，有民團即可制約軍隊。四川旅滬同鄉會在一份電報中建議，在川局未統一之前，各縣地方得由各縣自治，由各縣民團驅逐濫軍出境，自行維持治安。同時各縣民團督同全縣人民，堅壁清野，一切不與當地駐軍合作。[11]

民眾若有持槍權，暴政必定不敢肆無忌憚。昔日河南沒有受過現代教育的村民明白這樣的道理，今天多數知識分子卻不支持公民的持槍權。[12]

東南大學：與北大對峙的學術重鎮

中學畢業後，郭廷以一度想報考北大，因為北大名氣大，文史方面有一套特色。有在北大的同學放假回家，說北大鬧得很，請願、打架，很少上課，學生住公寓沒人管。「我有一班同學到北大去，拖了六七年畢業不了。又像陳雪屏比我早一年進北大，比我還遲兩年才畢業。」於是，他轉而選擇東南大學。

郭廷以在東南大學求學的四年，南京及江浙地區在孫傳芳治下社會安定、人心平靜。東南大學的校長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郭秉文，他是中國學人中第一位留美教育學博士。郭秉文之於東南大學，猶如蔡元培之於北京大學，奠定了學校之校格。他廣攬英才，延攬五十多位學有所成的留學生，教育界遂有「孔雀東南飛」之說。二十年代的東南大學，名師雲集、群星璀璨，僅郭廷以回憶錄中提及的名教授便有：湯用彤、柳詒徵、謝無量、陳去病、梅光迪、吳宓、羅家倫、梁實秋，葉企孫、熊慶來、竺可楨、陶行知、陳鶴琴、汪懋祖、茅以升等人。

據郭秉文的學生、後來在國民政府擔任高官的張其昀回憶，郭秉文的辦學方針是：通才與專才的平衡、人文與科學的平衡、師資與設

備的平衡、國內與國際的平衡。「郭師常說大學生應有國士的風度和志節，國士者，『以國事為己任』，又『以天下為己任』。郭師出席世界教育會議時，曾以大學教育與世界和平為題，而闡明大學裡『平天下』的志趣。他曾以鍾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靜，作為我校校風的象徵。」[13] 郭廷以如此評述東南大學兼收並蓄的學風：「學生循規蹈矩，一切都不走極端，既接受西洋文化，亦不排斥我國固有文化。」[14]

與蔡元培在北大倡導「相容並包、思想自由」一樣，東南大學包容持各種主張的師生：人文主義、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都可百花齊放、百無禁忌。學校鼎盛時，曾邀請泰戈爾講演，體育館擠得水泄不通。又邀請羅素與杜威來講學，後來在東大實驗小學建立了羅素館和杜威院。

蔡元培創造北大自由學風，離不開徐世昌等北京政府政治領袖的開明；郭秉文奠定東南大學的學術底色，同樣離不開先後統治江蘇的軍閥齊燮元、孫傳芳的優容。孫文去世之後，雖然孫文與孫傳芳立場對立，但孫傳芳並未阻止南京學界在東南大學為其舉行追悼大會。

二十年代中期，東南大學名曰國立，北京教育部除了任命校長和發佈一般性命令和教育政策外，於學校之經費和建設發展無力過問。北京政府各部屬機關的一般職員有「災官」之稱，薪水經常拖延不發，發放時還打折扣。各大中小學教師同遭此厄，生計艱難。而在齊燮元和孫傳芳統治江蘇時期，首先確保教育經費的發放，東南大學和附中、附小從未欠薪，師生生活安定，弦歌不輟。[15]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版圖上，東南大學佔有一個重要地位：以《學衡》雜誌形成「學衡派」。這是一群持文化保守主義（或曰「新人文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現代價值提出了與五四完全不同的估量與解讀，進而與北大陳獨秀和胡適主持的、強調趨新和西化的《新青年》雜誌構成了兩極。

《學衡》雜誌的發起人和參與者，有吳宓、梅光迪、胡先驌、湯用彤等人，他們先後留學哈佛大學，歸國後執教於東南大學，稱得上純正的「學院派」。（他們與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胡適等人的分野，背後隱然有哥大與哈佛的學術思想的分野）學衡派諸君對中國文化抱有同情之理解，如梅光迪所說：「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事例孕育而成。」這批人的學養遠勝於陳獨秀、李大釗等淺嚐輒止的左翼文人。若是在成熟的民主社會，新舊、左右各種思潮，都可並行不悖，

百家爭鳴。然而，在「比賽誰更激進」的近代中國，《學衡》諸君所倡導的中道立場，被北大及《新青年》諸君所遮蔽。學衡派及其倡導的新人文主義，卻未被年輕一代學子認可、接受和傳承。即便在學生中屬於中間派的、對左派「職業學生」厭惡的郭廷以，也沒有選擇這條道路。

《學衡》雜誌的具體經辦人，是近年與陳寅恪一起被重新發掘的吳宓。由吳宓撰寫的《學衡》雜誌簡章，提出雜誌的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編輯部設在吳宓家，經費大部分由吳宓個人支付。吳宓還自製一塊木牌，白底黑字寫著「《學衡》雜誌社」，掛在鼓樓北二條吳宓私人寓所門口。[16]

吳宓在東南大學打造了中國獨一無二的西洋文學系。當時，各大學的英語系大部分以教語言為主，對於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化關注甚少，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的成立開了風氣之先。吳宓在西洋文學系同時開四門課：「英國文學史」、「英詩選讀」、「英國小說」、「修辭原理」，大部分都是從中國文化觀念出發，對西方文學進行詮釋，可以說正是比較文學的先聲。一九二三年春，梁實秋曾到南京聽吳宓的課，回京後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盛讚東南大學學風醇美，老師博學負責，學生勤奮好學，特別提到吳宓「講課根本不用翻開備課筆記，更不看書本，而講得有條不紊，滔滔不絕」。他說：「清華園中這樣高水準的老師寥寥無幾。吳宓教授正好是清華的校友，為什麼不請他來清華呢？」[17]

東南大學還有一個教育特色，本科生的學術訓練廣博而紮實。郭廷以選修史學家柳詒徵的課程，使用之教材讓人咋舌：「中國文化史」的近代史部分使用日本資料；「印度史」由於中文著述不多，柳氏找牛津大學史密斯編的英文本印度史來讀；北亞史的講義，北伐後有人譯成日文，日本人看了非常佩服。郭感嘆說，老一輩的人做學問和教書的精神實在很偉大。郭廷以只唸了四年本科，沒有繼續唸研究所，但其學術功底讓此後中國和台灣名校培養的博士望塵莫及。更高的學位，並不意味著有卓越的研究能力；更多的經費，並不意味著有豐碩的學術成果。

近代中國學術與教育的黃金時代，定格在北洋政府時期，秘訣只有一個：政府盡可能少干涉教育。

黨人操縱學潮，大學淪為戰場

就在郭秉文和國立東南大學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元老汪精衛有意染指東南大學校長一職，和吳稚暉、李石曾等國民黨人士指稱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屬於「直系人物」，運動在北京執政的段祺瑞撤換郭秉文。另一方面，在東南大學任職的楊杏佛與郭秉文產生衝突，去北京找剛剛代理教育總長的老友馬敘倫，鼓動馬罷免郭秉文。這兩條線索的結合，使北洋政府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突然免去郭秉文校長職務。消息傳出，師生震怒，以集體退學力爭，展開「護長運動」。

東南大學內部分化為擁郭派和反郭派，尖銳對立，新任校長胡敦復無法上任。本來胡答應暫時不進入學校，卻又違約到校，被憤怒的學生包圍在校長室。學生打破玻璃衝入室內，用紅墨水瓶襲擊胡氏。有一個名叫盧恩頌的學生在校長室窗臺上，大演其說，並丟下胡的帽子說：「這是烏龜殼。」胡具結「永遠不進東南大學的門」，從後門離開。郭廷以支援郭秉文校長，但對部分擁郭學生的粗暴言行不能同意，與學潮保持距離。他觀察到，教育部的命令不能貫徹，地方當局對此事毫不干涉，根本原因是「當時軍閥們很少干涉教育事項」。[18] 此類學潮若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治下發生，學生輕則被「秋後算帳」，重則被抓捕乃至被槍殺。

校長風波，既是北洋系統內部奉系、皖系和直系的鬥爭，更是南方國民黨的策劃。郭廷以是國民黨秘密黨員，卻對國民黨背後操縱學潮並不敏感。當國民黨的學生黨員奉命反郭校長時，郭廷以反而同情郭校長。國民黨在東南大學處於地下狀態，沒有組織嚴密的黨部，無從控制每個黨員的言行與思想，也沒有上級強迫郭必須參與學潮。

據郭廷以分析，郭秉文校長與國民黨結怨的原因是：他不肯幫國民黨從事活動。郭秉文曾與孫文關係密切，孫文的《建國方略》英文稿據說是郭草擬的。孫文希望郭在東大幫助其培植國民黨力量，但郭作為校長有其客觀環境與立場，不能表示同意──像作為國民黨黨員的蔡元培在北大當校長時，其立場就常與國民黨不一致，還曾打電報勸孫文下臺。由此，孫文及廣東方面將郭秉文看作「軍閥的幫凶」，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郭秉文深知政治險惡，深怕學生受到傷害而悄然離校。郭秉文的

去職，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東大易長爭端，實則是「學者治校」、「學術自由」和「黨化教育」的矛盾之始。隨著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終以黨派勢力滲透進入學術教育界和「黨化教育」的推行為結局。從此，中國進入黨化教育錮桎學術教育界的時代，共產黨取代國民黨之後更是變本加厲。

就東南大學來說，郭廷以求學期間的「黃金時代」再未重現。校運與國運一樣命運多舛：一九二七年八月，東南大學被南京國民政府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一九二八年二月更名為江蘇大學，因師生反對而於同年五月定名中央大學。

一九四九年，原中央大學之一部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之後在桃園中壢復校，留在中國的部分更名為南京大學。而目前名為東南大學的那所大學，跟郭廷以就讀的東南大學並無太深之淵源。

國民黨打敗北洋，一是靠蘇俄援助，二是靠新式黨軍，三是靠被革命理念和理想激勵的青年學生。一九二三年之後，學生和新興政黨有了一段蜜月期，學生需要政黨以實現理想，政黨也樂於與具勇氣、有熱情、能迅速動員的學生接近。但是，學生與政黨的關係過分密切，學生運動政治化過深，政治的變化無不在學運上反映。學運隨政治運動起舞，學生加入政黨，學運政黨化，使得「教育為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由此學運和學生步入絕境。[19]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國民黨的身份由在野黨變成執政黨，它的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對學生運動也由支持變成限制。清黨以及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動盪，學生首當其衝，借反共以報私仇者大有人在，一時青年人人自危，受誣犧牲者不在少數。以致鋌而走險投向共產黨者有之，憤而消極頹靡者亦復不少。[20]

一九二七年年底，蔡元培和戴季陶執掌取代教育部功能的「大學院」，通過限制學生會活動和管束學生參加民眾運動的文件，形成「戴季陶–蔡元培政策」。[21] 一九二八年二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其中提出了新的教育政策：因中共操縱學運，而必須反對學生參與政治運動。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跟北洋政府相比，國民黨固然是煽動學潮的高手，但更精通學生心理的共產黨上場之後，國民黨便左支右絀、窮於應付。學者指出：「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不僅不能限制學生參與政治活動，而且這種消極的做法與共產黨統一戰線積極爭取學生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推向共產黨一方，

使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虎添翼，導致國民黨最終喪失政權，退守台灣。」[22] 短短十多年之後，在更為暴烈的學潮中，國民黨從學潮的煽動者淪為被學潮打倒的對象，真是「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

五四運動之後七、八年，學運的表現，已經成為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自由、人權與個人主義被拋棄，充滿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口號「改造中國社會」席捲一切。學生以強烈的民族主義取代早前對個人的關切，願意暫時拋開對個人自由的堅持，而加入政黨以對抗軍閥和帝國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真是學生能和注重群體忽視個性的政黨接近的理由，也正是二十年代學生運動變質的根源。[23]

從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四十年代，學運進入了「比左」的惡性循環。文學家王鼎鈞在抗戰時是流亡學生，也是四十年代中期共產黨鼓動的學潮的親歷者，他回顧那段經歷說：「學潮這個怪物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中共與學運之間曲曲折折的線，明明暗暗的人，閃閃爍爍的話，國民政府的情治人員只會逼上梁山。」他又說，國民黨早已失去青年世代的心：「我對學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蔣介石發表《告全國青年書》，老生常談對初生牛犢，學生當做笑話。官員文告的說服力比不上北洋政府時代的蔡元培，而學生的鬥爭技術超過五四。」[24] 國民黨失去革命話語的控制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處處被動挨罵。

同樣也是抗戰流亡學生的齊邦媛，抗戰勝利之初，在四川、武漢多次被迫參加遊行活動，內心充滿困惑和悲憤。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抗戰勝利之後，自華北開始，共產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滲透與說服魅力。」她認為那一代青年成了共產黨奪權的犧牲品：「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25] 可惜，夢醒時分，悔之晚矣。

一九二七年之後，在國民黨一黨獨裁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政治參與變得困難重重；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政治參與權被剝奪殆盡。

遷台之後，郭廷以服務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勉強延續其學術生命，最終再度遠走天涯，埋骨異域；而郭廷以在東南大學的老師吳宓，未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的邀請去台灣任台大文學院長，

留在中國受盡折磨與羞辱，悽慘地死去。文革伊始，七十二歲高齡的吳宓被架上高臺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然後被紅衛兵推下跌斷左腿。文革結束後，目盲腿折、生活無法自理的吳宓，與胞妹吳須曼相依為命，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有時候夜間，吳宓起床大喊：「快開燈，我是吳宓教授，我很餓，給我一碗稀飯喝吧。」[26]

這一對師生，若是回首一生，最堪追憶的或許是在東南大學安靜而自由地教學和讀書的歲月吧？北洋軍閥治下的大學，具有國共兩黨治下的大學所不具備的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對於這兩位一代宗師級的文史學者而言，歷史何其弔詭！

也曾投筆從戎，終究分道揚鑣

一九二七年春，南京稍稍安定了。郭廷以從揚州回到南京，暫時沒有打算找什麼工作，學校有駐軍，也不常去學校。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學校管收發信件的，對郭說：「有一封要緊的信晚上來拿。」郭晚上去了，一看是老師羅家倫寄來的，要郭去上海四馬路真化旅館見面。郭連夜乘車趕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見到羅家倫。[27] 這封遲到的信件，改變了郭廷以一生的命運。

羅家倫是成名於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對郭廷以的吸引力大過謙和沖淡的學衡派諸君。羅家倫於一九二○年出國留學，在四大國五名校研讀七年，研究歷史哲學與國際關係。一九二六年回國，任教於東南大學歷史系及附中，在此期間與郭廷以有了師生之誼。

一九二七年二月底，羅家倫應蔣介石之邀到南昌與之會談。蔣介石屢屢向其詢問：「國民黨的出路在哪裡？」隱然有反共的心思。[28] 蔣介石派羅家倫到武漢參與宣傳工作，羅家倫目睹共產黨在武漢的種種活動，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氣氛。羅離開武漢趕到安慶與蔣會面，問蔣下一步該怎樣打算。蔣說，現在唯一的出路，便是打下南京。羅問：「打南京有沒有把握？」蔣答：「有把握的，三天以內總可以攻下。」[29]

果然，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後，蔣介石發動清共之役。清黨前後蔣介石的〈告軍人書〉、〈告工人書〉、〈告民眾書〉、〈告同志書〉等文稿，都出自羅家倫的手筆。四月二十五日，羅家倫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階級少將。此後，又任總司令部參議、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及校務會議主席等要職。

蔣介石關於清黨的對外宣言，是蔣口述之後，羅家倫請東南大學西方語言及文學系主任張歆海起草英文稿。羅家倫將翻譯成中文的工作交給郭廷以，要求他在五天內完成。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時張宗昌的軍隊還佔據長江北岸，偶爾向南京開炮，一入夜，南京市內不敢點燈，黑漆漆一片。郭廷以在房內點蠟燭工作。第三天晚上快要結束時，因口渴到房東廚房泡茶喝，看到室友在打牌，停下來看了十分鐘。不料房間內的蠟燭倒了，不僅將翻譯的稿子燒了，連原稿也燒去一個大洞。

第一次接手重要工作，就犯了大錯。郭廷以不敢告訴羅家倫，直接到上海盧灣找張歆海。張還有一份原稿，取來交給郭。為了保險起見，郭找到商科大學的朋友幫助重打一份，放在手提箱中。

在離開上海回南京的路上，遇到印度巡捕搜查路人，若是被查到文稿，很可能被當作革命黨拘押。郭廷以非常緊張，幸虧巡捕只查人，不查箱子。過關之後，心想，還是隨身攜帶安全些，就將文件放在內衣袋子中。果然，又來一名巡捕，這次專門搜查箱子，總算有驚無險。回南京後，郭廷以徹夜工作，次日如期交卷。又過一天，報紙上登出了這份〈為清黨對外宣言〉之中文稿。[30]

羅家倫和郭廷以都支持蔣介石的北伐和清黨，對於清黨中被殺戮的共產黨和無辜者，並無太多同情。郭廷以在清黨次日中午去閘北觀看，只記載了半句話，「大概死人不少」。他哪裡知道，殺戒既開，以後兩黨之爭，死人更將滿坑滿谷。清黨之後，中國知識界的左右兩翼頓成水火不容之勢，同樣是五四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選擇支持國民黨，張國燾、許德珩、陳潭秋則加入共產黨。在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中，不容有「中間地帶」和「第三條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羅家倫與留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的才女張維楨結婚。兩人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認識，書信往來多年，終於結為秦晉之好。剛滿三十歲的羅家倫在這一年春風得意馬蹄疾，一身筆挺的將軍服，風流倜儻。後來，羅家倫任清華校長

時，送給史學家陳寅恪一本他編的《科學與玄學》，陳寅恪回贈一副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又說：「我再送你一個匾額：儒將風流。你在北伐軍中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你討了個漂亮的太太，正是風流。」

比羅家倫小七歲的郭廷以，更對未來充滿美好憧憬。年輕人都以參加北伐軍為榮，有所謂「三皮主義」，即皮帶、皮包、皮鞋「三件套」，沒騎馬的軍官也手拿「皮馬鞭子」，走在街上神氣十足。女性政工人員首開風氣剪了頭髮，一般人就稱她們為「鴨屁股」，稱軍人為「皮帶」，看到女政工常和軍人一道走，就說：「鴨屁股跟著皮帶走。」郭廷以是身在其中的時髦分子，多年以後仍然對在軍中從事文職工作，掛著軍銜、披著武裝帶的經歷津津樂道。[31]

投筆從戎，仍是書生。在北伐剛開戰時，郭以史家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據報刊之新聞逐日寫下「大事志」。郭廷以所在的政治部下屬的編史局，專門收集國民革命軍史料，因此他有條件寫作「日誌」，為將來撰寫軍史做預備。郭廷以有過史料學訓練的根基，在搜集資料方面非常用心，據他自述說：「當時我收集資料的範圍很廣，標語也加以收藏，並記載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個機構貼出來的標語，由此可發現軍政方面變化的跡象。」一代宗師，在軍中邁出了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步。

郭廷以在國民政府文教學術圈的靠山是羅家倫。[32] 耐人尋味的是，郭廷以離開台灣的那一年，正是長期關照和蔭蔽他的恩師羅家倫去世的那一年。或許，正是因為羅家倫的去世，讓郭廷以感到在台灣既不再安全，也無所留戀，這才決絕地離去，再也沒有回來。

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憑藉著與羅家倫和胡宗南的關係，郭廷以認識了不少警備總部的高層，使得近史所是全台灣除了情治單位之外，學術界唯一能有所謂「匪書」藏書的地方。但是，這些危險的書籍必須有專人管理，不得外借，只能在館內看。

這種「特權」肇始於一次進口書籍被查扣的事件。兩岸對峙的年代裡，台灣只能從香港進口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有一次，香港集成圖書公司經理胡家健寄來近史所的三大箱書籍遭到基隆海關查扣，兩三年都取不出來。接手管理圖書的周道瞻詢問郭廷以，郭廷以告知，此事很麻煩，他竭力找許多朋友包括警總副司令李立柏（李的兒子在近史所工作），以及保密局丁少將，都表示無能為力。

因為周曾在警總軍法處工作過，郭廷以便請周想辦法。周來到基

隆海關詢問，承辦人告訴他：「這批書是被警總聯合檢察處依法檢扣的，有本事向警總要。」態度之惡劣讓人髮指。周又去警總找到曾經的上司軍法處主辦王上校，王幫他找到政治部，政治部又說歸政戰部管，找到政戰部，答覆卻是：「這件事歸行政院敵情研究室管。」

周道瞻到了行政院，找到敵情研究室的專員。對方告知，只有少數單位有權進口敵方資料，例如國防部第二廳、保密局、情報局、調查局、總政戰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等，除此之外，其他單位一律不准進口。中央研究院不是研究敵情單位，進口這些大陸書籍，當然會被扣，這已經是最輕的處罰了。

周道瞻瞭解到這些情況之後，向郭廷以匯報，建議由中研院致函行政院，將中研院列入「敵情研究機構」的名單，這樣中研院以後就可以買書了。然而，文件發去之後如石沉大海。

郭廷以再次動用關係，寫信給老朋友、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在陳雪屏的催辦和幫助下，經過行政院會報通過，准許近史所登記為「敵情研究機構」，這批塵封在基隆海關的「匪書」，這才物歸原主。最高的學術機構，連買書權都沒有，郭廷以能不鬱悶嗎？[33]

其他學人自己買書，更是提心吊膽。一九六八年，郭廷以的學生林明德從日本訪學歸來，運回一批日本外交史的書籍，卻被警總召去審問並寫「誓約書」，保證資料不能影印、不能外借。警總的特務說，引用這些資料要特別注意，不能直稱蔣介石，非寫蔣總統不可。特務還說，資料裡面充斥馬克思主義，林明耀一看，原來是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但與之辯解根本就是對牛彈琴。另一位年輕學者廖隆盛寫論文需要日本出版的中國近代現代的社會經濟書籍，只能請日本朋友幫著帶到台灣，還要藏在內褲裡夾帶過關。[34]

警察國家，文字獄成災。近史所的張玉法、李國祁等人也被警總警告過，「說是寫國父前面一定要空一格；又說一定要先寫民國再括弧西曆，不能直接寫西曆再用民國」。[35]

白色恐怖時代，郭廷以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學生們。他本人卻因為跟費正清和福特基金會來往，被批評說「費正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而郭廷以是費正清的同路人」。關鍵時刻向郭廷以伸出援手的是中研院院長胡適──胡適也遭遇過類似的攻擊，在收到郭廷以的辭職信後，在病床上回信懇求其留任近史所籌備處主任，「這好像是一個

心臟病人，對於另一位心臟病人的『不近人情的請求』」。[36] 然而，最後胡適仍無法保全郭廷以。

郭廷以人不能回台灣，書很長一段時間也不能在台灣出版，因為他挑戰了國民黨正統史學的流行教條。[37] 郭廷以的學生張朋園回憶說：「郭先生去世十年後，近史所才在所長呂實強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在此之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郭先生這套書沒希望出版了，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敢批評政治。」郭廷以的遺著《近代中國史綱》因為觸及若干「敏感」的人與事，只能在香港出版，長期被台灣列入「禁書」。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郭廷以從來沒有享受過學生時代在東南大學的那種學術自由。晚年在美國生活的郭廷以，有沒有設想過，假如一九二七年不跟著國民黨走，此後會是怎樣的一種人生呢？

第四卷

庶民的活力

10　劉大鵬

沒有詩情畫意的晴耕雨讀

維新黨人遍中華，角勝爭雄亂若麻。

賢士高人都隱遁，卜居泉石泛煙霞。

──劉大鵬


甲午科舉人太原劉友鳳先生肖像

華北漫長而嚴峻的冬天終於過去了。從清朝中期開始，中國人口迅速膨脹，土地難以承受人口的壓力，華北農民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其表現之一是森林過度砍伐和政府治水功能弱化，水旱災害頻繁，冬天必需的燃料嚴重不足。

山西省太原縣赤橋鎮的農夫劉大鵬一家，每到冬天都要承受燃料缺乏帶來的巨大痛苦。負責拾柴和燒飯的婦女兒童花費不計其數的額外勞動，仍然無法蒐集到足夠的燃料。儘管劉大鵬經營過煤礦，但自己家卻買不起煤、用不起煤，煤一般都運到城市供應城市居民和工廠使用。對於農民來說，所有可能的選擇──在一些寒冷的日子裡不生火，湊合著過，在冬天盡量不離開炕，少吃熟食──都涉及嚴重的煎熬和健康危險。 [1]

劉家共有六畝地，包括適種稻田和宜種小麥的灌溉田，另一些則是只能用來種小米的旱地。如果以全國形式上的平均值來估算，在共產黨的階級劃分中，劉大鵬家大致算是「富農」或「中農」。 [2] 劉大鵬是一家之主，他前清獲得過舉人的功名，是紳士階層，「一般持紳士身份者必須具有某種官職、功名、學品或學銜，這種身份會給他們帶來不同的特權和程度不等的威望」。 [3] 但是，這些特權和威望在民國時代已經所剩無幾。

劉大鵬是紳士階層的下層：他多次參加下一階段的科舉考試，希望考中進士，從而躋身官僚階層。然而，直到一九○五年清王朝取消科舉制度，他一直未能在科舉之路上獲得更大的成功。劉大鵬對朝廷突然廢止科舉制度充滿怨憤，認為這是清廷失去儒生支持並最終傾覆的重要原因。以他的知識背景和視野，不可能明白科舉制度的致命弱點：科舉制度不能適應西方衝擊所產生的新的需要，也不能作為一種支柱來支撐起一個變化了的社會。 [4]

失去了做官的希望，劉大鵬只好嘗試做其他工作以養活家人：他當過學校老師、開煤礦和經營木材店的商人，以及備受尊重的縣議長。在一個變動的時代，他奮力掙扎，以免被時代潮流所淘汰。可悲的是，他從事的每一項事業都失敗了，大部分的失敗並非因為他不夠聰明，而是因大環境的限制，他個人的失敗似乎是整個國家轉型失敗的隱喻。他沒有能夠順利地轉型為商人或政府公務人員，他早年閱讀和研究的「聖賢書」不能為他個人事業的轉型提供任何有益的幫助。晚年，他又回到了最初的職業身份上：農夫。

一九二七年，除了劉大鵬之外，劉家的成年男性全在外地務工──

中國內地的農民背井離鄉地外出打工，並非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在對農民的遷徙自由並無嚴格限制的清末就已經開始了。留守在家的是老人、婦女與孩童。

這一年，劉大鵬已經到了「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年齡，卻還要充當家中的主要勞力。跟他一起下地勞動的是十七歲的孫子全忠和十二歲的孫子精忠—劉大鵬不能支持他們到縣城接受新式的學校教育。劉大鵬的妻子和媳婦在家操持家務，女性一般不下地幹活。僅靠祖孫三人無法耕種全部六畝土地，劉大鵬將一半的土地租給鄰村的佃農。在農忙的時節，還要僱請短工幫忙。[5]

若是往年，這個時候差不多有超過兩百個短工來赤橋找活幹。可是，一九二七年的春耕，卻很難僱到短工。

短工都當兵去了

一開始，劉大鵬不知道往年赤橋鎮上擠擠攘攘的短工們都跑到哪裡去了。到處打聽之後，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要打仗了，他們都當兵去了。

幾個月以前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山西的實際統治者閻錫山與孫傳芳、張宗昌、劉鎮華等十六名將領以十五省區等名義，聯名發表通電，擁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以對抗北伐的國民黨軍和南下的馮玉祥的國民軍。然而，內部各懷鬼胎的北洋軍閥的頹勢已經無法挽回，安國軍在各條戰線上都節節敗退。閻錫山見勢不妙，又轉而尋求與北伐的國民黨結盟。

外號「閻老西」的閻錫山，有山西商人精打細算的本事。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閻錫山宣佈廢除北洋政府任命的山西「督辦」一職，改稱號為晉綏軍總司令，以此名義統轄山西、綏遠軍民兩政，並將原有的十七個師擴編為八個軍，加上一個獨立旅和兩個旅，一共十七萬人。四月五日，頒動員令宣佈服從三民主義。當孫傳芳致電質問時，閻錫山則於四月十六日回電，虛與委蛇說：「此間因徇人民之請求，已表示贊同晉民研究三民主義，但純粹係內政問題，於外省決不使發生影響。」[6]

六月六日，眼見南軍勝券在握，閻錫山通電宣佈，除五色旗，改懸青天白日紅旗，晉綏軍改編為北方國民革命軍，親自任總司令，出兵參加北伐，搶奪勝利果實。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重新上臺，發起二次北伐，晉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對即將撤退回滿洲的奉軍開戰。至北伐勝利，閻錫山獲利甚豐，晉軍控制了晉、冀、察、綏四省及平、津兩大城市。

一九二七年的春耕時刻，正是閻錫山在山西拚命擴軍之時。閻錫山的募兵條件相對優厚，以前當僱工的青壯年都報名當兵去了，難怪劉大鵬只能失望而歸。在二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現實生活中，農民沒有理由輕視軍隊，事實上，參加軍隊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地位。歷史學家齊錫生指出，農業中國的貧窮和社會蕭條，使軍隊比其他職業對農民更有吸引力。參加軍隊後，貧困是使他們繼續留在那裡的最有力的因素。具體到山西，因為太窮，無力維持一支阻擋鄰省軍閥入侵的龐大的常備軍，則通過徵兵制度訓練新兵，訓練完後讓他們再回去當老百姓。這樣，山西有約十萬人接受軍訓，和平時期正常的生產活動並未受到影響。[7]

社會學家陶孟和在一九三○年六月號的《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名為〈一個軍隊士兵的調查〉的論文，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閻錫山在太原的警衛旅五千人中的一千人為對象，分析起社會背景。在這一千人中，百分之八十七點三來自農民或無業家庭，其餘是小手藝人、商人、醫生，與教師。而來自農民家庭的士兵，如果家有耕地，也是數量較小，單靠農業無法養活自家，需要當兵來養活家裡。

值得注意的是，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三是家中獨子，大部分父母健在。在中國傳統社會裡，獨子是異常寶貴的，遇到強行徵兵的時候，獨子家庭寧可出一筆錢找人「替丁」，也不願讓獨子從軍。當時出現如此高的獨子從軍比例，說明這些家庭已經到了赤貧狀態，當兵成了生存的唯一出路。[8]

在經濟壓力下，「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重文輕武的儒家傳統破局。太原警衛旅的士兵每月收入在六元三角到九元之間，他們多數有能力寄一些錢回家。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在一九二六年北伐之前，每個人平均月收入在十元到十一元之間。軍人的收入遠遠高於農民：一個士兵如果收入每月八元，等於耕種一百畝地的一個四川自耕農的一家五口的收入！只有土地在五十畝到一百畝左右的小地主的收入才比他的收入好一些。[9]

由此可見，當時的農村是何等凋敝和蕭條，而城市工商業尚未充分發展，無法提供給農村青壯年更多的工作機會，當兵成了唯一的出

路。

僱不到短工，劉大鵬只好讓自己和家人承擔更大的勞動量。這就是北伐戰爭對劉大鵬最初的影響。

我乃一老農，吾心在田裡

中國是歷史學科高度發達的國家，歷史甚至上升為中國人的「準信仰」，如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中國是農業大國，直到今天，被鎖定為農民身份的國民依然佔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然而，中國的農民沒有自己的歷史。歷史是由識字的人書寫的，農民通常不識字，沒有能力講述和書寫自己的故事，中國的二十六史便成了帝王將相的家史。

從來沒有哪個中國文人願意為農民寫一部傳記，除非文人本身沉淪為農人，並且自己寫日記。劉大鵬就是這樣一個卑微如螻蟻、脆弱如蘆葦般的「草民」。他卻像蔣介石一樣堅持寫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日記（《退想齋日記》），由於他記日記是從個人目的出發，自覺自願寫下的，即「積憤積恨，無處發洩，惟藉吟詠以瀉一時之感慨，然雖筆之以冊，不敢為外人道也」[10]，所以比撰寫時即預設有讀者會閱讀的名人日記更加真實。這些汗牛充棟的日記和劉大鵬的其他諸多並不出名的著述，奇蹟般地逃過二十世紀中國腥風血雨的戰爭、革命和政治運動，如今完整地保存於山西省圖書館。

多年來，沒有多少人來此查閱這些資料，偏偏是一位來自英國的學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像發現寶藏一樣發現了這筆原始文獻，並以此重構了劉大鵬平凡、乏味而漫長的一生──極端仇視西方、蔑視女性的劉大鵬若地下有知，他的「起死回生」乃是因著一名英國女子的獨具慧眼、韋編三絕，不知當作何感慨。

沈艾娣為什麼為劉大鵬寫傳記？她認為，雖然劉大鵬並非「典型人物」，但他的人生可以成為「微觀史」的案例──對一個相對不為人所知的個體生命進行細緻的研究，旨在展現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思想

世界。[11] 劉大鵬是地主，更是農民，即便到了古稀之年，他也不能袖手談天、頤養天年，他必須親自勞動，以承擔半個僱工的勞力。

劉大鵬一家的農作物主要是小麥。然而，小麥磨成麵粉，再由麵粉做成的麵條，卻是只有過年過節才嚐一口的高級食物。大部分時候，家人都吃小米、玉米等粗糧。有一次，劉大鵬邀請縣長來自家吃飯，也只能以玉米高粱粥相待。蔬菜是自家種的，幾乎沒有農民買得起蔬菜。劉大鵬種了豌豆、黃瓜、綠豆、辣椒、蘿蔔、蔥、白菜等蔬菜，蔬菜成熟時，他大方地贈送一些給朋友。

前一年，劉大鵬買了一些棉花籽，種了一小片棉花。然而，棉花需要精心照料，由於缺乏經驗，大部分棉花都死掉了。今年還要嘗試種棉花嗎？他心中很是糾結。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棉紡織業迅猛發展，農民種植棉花的利潤高於種植糧食。所以，儘管山西地區傳統上並不種棉花，但是省政府積極鼓勵農民植棉。[12]

這一年的大半個夏天，劉大鵬都是在田間度過的。劉氏自稱「余家以耕讀為業，不耕則糊口不足，不讀則禮儀不知……」，並以儒家的道德觀念來自我勉勵：「昔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予今年已近於古稀，窮而在野躬耕畝，始知伊尹之樂道為不虛也。」最艱辛的農活是施肥──村莊裡沒有人使用昂貴的化肥，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肥水」就是人的糞便。家家戶戶都在家門外建有露天的茅廁，以吸引路人使用。雨天時糞便都溢出來，乾旱時則臭氣熏天。生產力的低下、耕作方式的落後，使得中國農村很難做到「衛生」。三十年代蔣介石發起的、脫離中國農村現實的「新生活運動」，最後只能草草收場，水過無痕。

劉大鵬幹挑糞和撒糞的重活有些吃力，四處尋覓才僱到一個名叫棗花兒的人幫工施肥三天──後者是百分之百的、一無所有的農民，他沒有固定居所，也沒有家人，靠幫人幹活勉強果腹。「棗花兒」這個名字（其實僅僅是一個綽號，當時國家政權並未深入鄉村，很多赤貧的農民沒有身份證件和戶籍資料，所以也就不需要正式的名字）僅僅出現在劉大鵬的日記中，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關於他的資料。否則，像棗花兒這樣的赤貧、無產的農民，更應當成為本文的主人公。

繁重的農耕生活讓劉大鵬體格強壯、身體健康。他與一些鄉紳登高秋遊時，其他人氣喘如牛，唯有他健步如飛，他為此感到自豪，並將良好的身體狀況歸功於常年的田間勞作。然而，耕田是世間最辛苦的勞動，他在日記中也常常哀嘆勞苦過重，晚年亦不得安息。

既做不成曾國藩，也做不成陶淵明

十五年之後的一九四二年，大半個山西都在日本統治之下。劉大鵬走完了八十五歲的人生，在去世之前的第五天，他寫下最後一篇日記，內容是通宵雨水淅瀝，所以不怕會有秋旱。這是他生命最後的階段裡最為關心的事情。以讀書的事業為起點，以儒者的追求貫穿終生，以農夫的身份走到結束，他有幾多遺憾，又幾多滿足？後人從劉大鵬作為儒者、孝子、商人、議政者、農民的不同身份狀態下的人生景況，透視中國在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的動盪中，下層文人或「有文化的農夫」所面臨的生活的困難、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由此而來精神的折磨與堅守。

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劉大鵬不能通過科舉考試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更沒有希望效仿中興名臣曾國藩達成「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堅持寫日記是受《曾國藩家書》之啟發），一生只能侷限在「修身齊家」的範疇之內。由於地理位置、生活環境和資訊的限制，他未能像梁啟超那樣實現從傳統士大夫到近代專業知識分子的轉型，「像劉大鵬這樣從中國腹地山西出來的讀書人，……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口岸士子。」[13] 心裡想著做曾國藩，最終做了劉大鵬。一顆達官貴族的心，卻久囿於老農的身份，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落差可想而知。

辛亥革命顛覆了帝制國家，也促成了鄉紳的解體。這是由中國鄉紳階層自身的弱點所決定的。科舉制度使士紳依附官僚化的帝國政權，中國沒有一個全國性議會將來自各個村落、集市、地區的士紳代表聯結在一起。在中國這個疆域如此廣大的國家，歷史上竟然沒有發展出地方權力與全國權力的結合與制衡。唯有帝國政權統一的行政和強制權力，才能給士紳提供某種長久的後盾。但是，帝國一旦崩潰，士紳在農村秩序中的地位也隨之傾覆。[14]

辛亥革命之後，無論是文人還是受過教育的地主，在地方支配階級中的影響力都有所下降；而隨著商業化和政治的不穩定，卻提升了商人、投機地主及走私者的影響力。[15] 劉大鵬因舉人的功名和威

望，數次當選縣議長。他一心想努力整頓縣財政狀況，卻觸動其他成員的利益，不得不辭職。傳統「士工農商」的四民社會解體了，但士的弘毅和擔當意識仍深存於劉大鵬心中。

劉大鵬的遭遇堪稱紳士階層走向衰亡的縮影：最遲到三十年代，仍遵循儒學、認真扮演地方名流和權威者角色的人，都被排擠到旁邊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土豪劣紳」，他們在農村散播懷疑和仇恨，以為不再受農民與精英間的關係所互相承擔的傳統「道義農業」的約束。他們腐敗、勒索，任意徵收雜稅，尤其是毫無節制地使用暴力。 [16] 而稍後共產黨的農村革命正是利用了農民對新興的「土豪劣紳」階層的仇恨心理，在鄉村展開殘酷的階級鬥爭。

劉大鵬心目中士大夫的典範，除了曾國藩，就是陶淵明。前者是達則兼善天下，後者是窮則獨善其身；前者是進而居廟堂之高，後者是退而處江湖之遠。就詩人這一身份而言，陶淵明遠比曾國藩受推崇。劉大鵬也寫詩歌，並刻意模仿陶淵明田園詩的風格。他將農耕當作踐行其儒家信念的廣闊空間，由此樹立了勤勞、堅定和負責任的形象。

劉大鵬深知，自己並非陶淵明。陶淵明是統治階級的一員，只是將自己想像成農民—實際上，陶淵明生活優渥，躬耕是其閒情逸致，不必「為五斗米而折腰」，也不必為一日三餐發愁。但正如沈艾娣所說，「劉大鵬本身是農夫，卻將自己想像成統治階級的一員」，他以「臥虎山人」的形象自居，是「一種面對失敗保持體面的方式」。在面臨失敗或無力競爭卻心有不甘之時，轉而以「退出者」或「旁觀者」的清高來自我認同，是一種自我安慰。 [17]

在近代化過程中，士大夫階層喪失了兩千年來對「道統」的掌控權，被看作是一個「寄生蟲」群體。清末的改革派思想家魏源為之辯護說：「君子者，佚樂而為君子者也；小人者，憂勞而成小人者也。」魏源認為，像劉大鵬這樣為生計「憂勞」的下層紳士只能算「小人」，而君子是脫離了勞動和生產、無須憂慮生計的儒學理想的繼承者。然而，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魏源式的儒家改良主義迅速被「反儒家」的意識形態所取代：不是君子變成了小人，而是君子這一稱號變得毫無價值。 [18]

劉大鵬自稱「夢醒子」，他認為自己總是不由自主地做夢，直到有一天他描述自己經歷了一場夢而徹悟了儒家的道德核心「誠敬」之後，才完全認同「夢醒子」這個名稱，並以其為筆名。劉大鵬所說的「夢醒」，是指他看清了儒家現實主義目標的虛妄，唯有遠離政治權力才能實現倫理上的高標；同時，也表明劉大鵬對清朝、北洋政府、

南京政府、閻錫山、日本人以及正在興起的共產黨等形形色色的統治者的疏離與不信任—其原因正如杜贊奇所論：「二十世紀時，國家政權在竭盡全力放棄甚至摧毀文化網絡之時，其建立新的溝通鄉村社會的管道又進展甚微，這只能削弱國家政權本身的力量。」[19]

由一八九五年開啟的現代化革命，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及其他地區反共勢力的勝利，這段時期內的政治勢力，主要來自城市。義和團運動結束後，除了零星的地方性盜匪事件外，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裡，農民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未扮演重要角色。[20] 劉大鵬不得不接受他本人和他所屬的階層被邊緣化乃至被政府拋棄的命運。

山西的農村何以走向貧困化？

如果劉大鵬讀到杜贊奇研究中國近代農村的著作，一定會同意他的觀點：「華北農村的苦難之一來自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經濟上的橫徵暴斂、政治上強迫專制、鄉村公職成為謀利手段等。」[21] 劉大鵬本人是晚近一個世紀以來山西經濟衰敗的見證者。

進入民國以來，各地政府在努力推進現代化，鐵路修通了，公交系統也建立起來。劉大鵬曾坐公交車到省城太原，赤橋鎮上也出現了自行車。比起當年興師動眾的趕考之旅，出行方便多了。

但大多數現代化措施並未改善農民的基本生活狀況，反倒加劇了農民的貧困。比如，火車運來其他省份甚至國外生產的價格更加低廉的穀物，讓本地農民難以與之競爭，農業生產雪上加霜。比鄰近省份的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湧入更可怕的，是外國物美價廉的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大量湧入。二十年代中後期，米、麥、麵粉和棉花這四種與人民生活關係重大的農產品的輸入都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比如，洋米比國米價格便宜，人們紛紛購買洋米，洋米很快就霸佔了中國的市場，並迫使國米降價銷售。南京、湖南等地的米價一度跌落到僅及生產成本的百分之五十。農產品價格的跌落，不僅使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進一步拉大，農民收入減少，生活更加貧困，也嚴重挫傷了他們種田的積極性，這又導致田價貶值，農產品萎縮。[22] 在山西當地的報紙上，開始用「農民破產」這個新詞，但劉大鵬的感受是：由於無人願意購入田產，此時他們一家已「無產可破」。

第二個原因是山西在中國版圖上的地位的變化。現代化進程重寫了道德秩序，也重塑了地理空間。政治決策使得一些地區變成重要的中心，另一些地方變成邊緣地帶。誰能想到曾是小漁村的上海崛起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而西安、開封等北方古都卻退化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在中國尚未受到西方衝擊之前，山西就發展出具有近代特質的商業和金融業，山西的票號如同銀行一樣遍佈全國。山西在清代中後期的繁榮，歸功於區位（作為中俄貿易的中轉站）及票號。山西是清朝與俄羅斯陸上貿易的最大受惠者。早在清朝中葉，兩國每年的皮毛、絲綢、棉花、瓷器、茶葉和大黃等貨物的貿易就達五百萬至七百萬盧布。一些漢人家族通過這些貿易積累了巨額財富，其中多數人來自山西。[23] 等到清朝倒臺，山西的榮景無可避免地結束了。外蒙古獨立、俄國革命，讓北京政府取消了與蒙古的邊境貿易，中國的國防重心和貿易中心由內陸轉移到東南沿海──所有這些發展將山西從一個貿易主幹道變為一個孤立的、交通不便的省份。至一九二○年，山西的票號倒閉殆盡，商號損失大半，大批失業者返回家鄉，加入農耕隊伍。

劉大鵬身不由己地被捲入現代化的浪潮。父輩經營的店鋪或關閉或轉手，一家老小由小康陷入困頓。他轉而從事山西早已有之的煤業，採煤基本上依賴人力，僱傭大量人手。然而，煤業的困境在於層層稅收，劉大鵬參與經營的都是規模較小的煤礦，課稅之後，利潤十分有限。

那時的煤炭產業還沒有成為日後的「黑金產業」。二十世紀九○年代以來，山西盛產富可敵國、一擲千金的「煤老闆」，煤老闆炫富報導常常激起公憤。他們不是企業家，而是暴發戶與血汗工廠的代名詞。有經濟學者評論說：煤老闆一無商業文化內涵，與煤老闆聯繫在一起的不是誠信、不是企業家的破壞性創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是一擲千金購買豪宅，是品位低下、揮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闆二無信仰，才有令人震驚的黑煤窯童奴現象，不僅違法使用童工，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無法滿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無法做出如此無底線的事。煤老闆三無創新精神，他們從政府那裡獲得煤炭資源，用簡陋的方法挖掘，通過煤炭的稀缺性換取大把現金，小煤礦沒有出現組織結構與管理結構的創新，更沒有技術創新。[24]

人們視之為「一場瘟疫」的「煤老闆現象」，是如何在現代社會重演的？道德與能力的指責無濟於事，必須深入催生煤老闆的土壤才能看到其本質。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能源產品，擁有煤炭相當於擁有硬通貨。擁有煤炭開採權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不是自由商業精神競爭的結果，而是商人逐利與官員尋租共生的結果，是官煤勾

結的結果。[25]

二十年代末，席捲全球的經濟衰退影響至中國時，閻錫山著力拯救大型現代煤礦，通過把礦產所有權收歸國有，加收開礦的註冊費，來淘汰小煤窯，讓大型煤礦控制市場。力量單薄的劉大鵬只好退出了這個產業，一家老小「只能靠他們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

殊不知，政府的過度干預反倒加劇災難的程度，國有化之後，煤炭行業並無起色，閻錫山束手無策。有趣的是，國有化也是如今共產黨政府面對產能過剩時，拯救山西煤炭產業的錦囊妙計。[26] 共產黨不知道他們在重演那段失敗的歷史，對經濟學者的追問充耳不聞：驅逐了煤老闆，山西就能迎來企業家精神？就能復蘇晉商傳統？如果驅逐煤老闆，迎來的是計畫體制，山西最多回到一九七九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業文化。

從清朝中期到二十世紀中葉，華北農村的人口不斷增加，經濟卻沒有明顯的成長，社會分化加劇了。中國的農村處於某種「結構危機」的狀態，在南方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在北方發動的義和團運動，不僅沒有緩解這種狀態，反倒讓矛盾更加激化。而辛亥革命發生的動因跟農村關係不大，它不可能著力解決農村問題。

進入民國之後，以下三個問題愈演愈烈：第一是地方性的暴力，以直接的殘酷性和對經濟及生態環境的間接影響，使農村的生活成為生存的掙扎。第二是生產力過低，使個人平均收入不可能有明顯的成長；而農業的衰退與停滯現象，成為難以改變的命運。第三是所有制。農村社會的兩極化，體現為農民的無地化和地主寄生蟲般的生活。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似乎沒有哪個政治領袖能化解這三個問題。基督教會、晏陽初和梁漱溟等人發起鄉村建設運動，希望力挽狂瀾。晏陽初的「四大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主要是道德訓練和國族意識的訓練，「我們所做的工作，不是造制度的工作，乃是造人的工作」。梁漱溟倡導「創造新文化，救活新農村」，也包含著道德倫理的重建。[27]

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鄉村建設運動成效有限。烏江實驗區主持人孫友文說：「農村問題之嚴重，已成普遍之火災，滴滴之水，無濟於事；然盡力一分，即減少良心一分的呵責，成功不以為榮耀，失敗亦不以為恥辱。」農村已成為一座活火山，等待革命家去點燃其憤怒和怨恨。戰爭、經濟崩潰和革命，是可以預見的前景。[28] 毛澤東所謂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要有「點火者」。晏陽初、梁漱溟

這些宅心仁厚、愛人如己的「滅火者」，最終沒有跑在毛澤東這個「點火者」前面。

劉大鵬與閻錫山的對峙：無法躲避的國家權力的「內卷化」

從一九一二年開始，閻錫山就成為山西的實際控制者，儘管他先後名義上臣服於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但山西一直是閻錫山的「家天下」。閻錫山在山西創建了一種「領地穩定的軍政府」，由於缺乏大規模的外國援助，其軍事、政治勢力主要來自他們起家地區的繁榮，尤其是商業繁榮。[29]

閻錫山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又有留學日本學習現代軍事的經歷，他身材高大，臉龐寬闊，兩隻眼睛炯炯有神。美國雜誌將其比喻為「中國的摩西」，有外國記者如此描繪說：晚飯時他坐在主座上，旁邊是他在牛津受過教育的秘書，餐桌擺設都是西式的，有緞子桌布、銀器、石榴色水晶葡萄酒杯以及疊成玫瑰花、小鳥及塔形的餐巾。晚飯後僕人用長竹竿挑著罩在塗有彩畫的薄紗中的燈籠，陪著客人們到月光下的花園。閻錫山說他希望山西對整個中國能夠起到一種酵母的作用，但他又很有自知之明地說：「中國是塊很大的麵團。」[30]

除了少數時刻（如中原大戰當中）萌生問鼎中央權力的野心──作為反蔣陣營名義上的盟主，卻因張學良率軍入關支持蔣而一敗塗地；在大部分時間裡，閻錫山都將精力和資源集中在對山西的內部治理上。為了抗拒外部勢力的滲入，他甚至在山西修建特殊的、跟外省鐵路不接軌的「窄軌」鐵路。

抗戰爆發後，日軍佔據了包括省府太原在內的山西的精華部分，閻錫山的殘部、蔣介石的中央軍和共產黨瓜分了其他的地區。同為山西人的中共幹部薄一波跟閻錫山簽訂協議，許諾幫助其建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卻反客為主，漸漸侵蝕閻錫山的權力基礎。及至國共內戰爆發，閻錫山再也無法「保境安民」、置身事外。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被共軍攻破，閻錫山在山西三十八年的統治畫上句號。他本人卻迎來晚年最後一抹輝煌：南京失守後，他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並兼國防部長，離最高權力只有一步之遙。可是，閻錫山拿不出拯救大廈將傾的良策來。閻錫山在重慶向蔣介石提議進行土地

改革，遭到陳立夫憤怒回應：「共產黨還沒到，你就想趕在他們前面迫害地主嗎？」到台灣之後，為了避免蔣介石的猜忌，閻錫山定居陽明山，過著「十年隱居，十年著作」的生活，直至一九六○年去世。

閻錫山長期治理山西有一定的成就，直到一九六○年代，還有不少山西的老人懷念閻錫山統治山西的時代，並以此對共產黨惡劣的農村政策表示不滿。閻錫山對山西的經營和李宗仁、白崇禧對廣西的經營，使這兩個省份成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模範省」，也證明了地方自治可以優於中央集權。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一度在全國推行山西地方政權建設模式。

一九一七年，閻錫山在山西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菸、斷辮、天足；「三事」：種棉、造林、牲畜），成效顯著。一九二二年，梁漱溟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設，誇獎山西農村建設的成績：「現在全國各地都亂到極點，哪處不是民不聊生！……山西這方面，我們總是可以讚美地方政府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同年六月，胡適撰文評論說：「現在有許多人愛批評閻錫山，但是閻錫山確有不可及的地方。」他特別讚揚閻錫山推行的義務教育計劃說：「閻錫山治山西，是有計劃的。」[31]

為了贏得民心，閻錫山也在山西倡導實行「村本自治」，一九二七年，他對山西的基層官員發表講話指出：「共和國家無不以人民自治為基礎，扶植自治不由村子裡著手，總是隔靴搔癢，成效難睹。余從前但辦『村本政治』，以為非將『政治』放到『民間』，社會不能穩固，人民難享福利。是以施行村政，即以期達到人民自治之目的。」過去人們認為軍閥統治摧殘地方經濟，這個看法並不準確。閻錫山在山西推動工業化，就使得山西的人均工業產出長期超過除上海、天津和東北之外中國的所有地區。[32]

然而，閻錫山統治的山西，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趨勢。在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北方農村權力結構的變遷時，杜贊奇提出「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國家權力的擴大及深入極大地侵蝕了地方權威的基礎。「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權，都企圖將國家權力深入到社會基層，不論其目的如何，它們都相信這些新延伸的政權機構是控制鄉村社會的最有效的手段。」[33] 在鄉村，與政權正式結構相伴隨的是非正式結構的出現，比如「營利型經紀人」，他們取代以鄉紳為主體的地方治理，改變「皇權不下縣」的傳統，加大了農民承擔的苛捐雜稅。

在「國家權力內卷化」的過程中，劉大鵬屬於被犧牲掉的傳統鄉紳階層。他們不甘心於這樣的命運，在此過程中，劉大鵬跟閻錫山有

一番交手。閻錫山也是前清舉人，在輩分上比劉大鵬晚一輩。劉大鵬儘管落魄，卻未必對閻錫山懷有多大的尊重。劉大鵬上書南京政府，揭發閻錫山在山西徵收苛捐雜稅—閻錫山在山西推動很多改革，但並沒有減少地租和稅賦，山西農民的租稅壓力在全國名列前茅。

劉大鵬思想觀念保守，念念不忘慈禧太后統治時候的「太平盛世」，但他內心接受了民國以來傳播開來的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觀念—若是在清朝，一個普通舉人豈可上書皇帝，妄自批評封疆大吏？那是有可能會掉腦袋的事。如今，劉大鵬敢於寫告狀信，說明他至少內心認可兩個新觀念：第一，普通人給中央政府寫信揭露地方黑幕是言論自由（即便他不一定具備現代公民意識），受到法律保護，民眾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第二，即便不明瞭南京政府的運作方式，但他知道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是閻錫山的上級—當然，他並不知道南京無法干涉太原的「內政」。

有趣的是，南京政府果真給山西當局發去一封非常長的訓令，要求閻錫山對農民減稅。南京政府對民間來信頗為重視，一般不會置之不理。南京政府也樂於利用這樣的機會，與閻錫山爭取民心。

更有趣的是，閻錫山收到南京的批復，繼而得知此事源於一位老儒生的上書之後，一笑置之，絲毫不理會南京政府的復函。另一方面，閻錫山也算是「新制度中舊倫理之楷模」，沒有對劉大鵬這位科場前輩實施打擊報復，堪稱「宰相肚裡能撐船」。[34]

劉大鵬的一些行為看起來不合時宜，他越級反映問題也毫無結果，但其勇氣和壯舉被當地村民所敬重。在其經濟狀況日漸惡化的晚年，他對傳統價值的堅持使他越來越像是一塊活的紀念碑。

作為一場革命的北伐，對北方農民的震動遠遠小於對南方農民的衝擊。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到達山西省城的第一個消息，是一個從城裡回來的人散播的。他報告說，將會有大會宣傳革命。所有這類團體和組織都散發傳單；飛機從頭頂飛過，傳單從天而降。

但對劉大鵬來說，最驚世駭俗的還是新式學校的女學生剪短髮，不穿褲子而穿短裙。那些結伴到晉祠春遊的、有說有笑的男女學生，與劉大鵬在晉祠門口不期而遇。這位《晉祠志》的作者、講究「男女授受不親」的儒生，為此痛心疾首。

幸運的是，閻錫山治下的山西沒有出現共產黨在兩湖掀起的血腥的農民運動，否則劉大鵬有可能成為犧牲品之一。

11 石美玉

救人身體，更救人靈魂

對主充滿信心和愛，將這項捨己的工作作為畢生的事業；不圖任何回報和獎勵，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悅納。

—石美玉



一八九六夏，兩名年輕的中國女子石美玉和康愛德從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畢業。在隆重的畢業典禮上，嘉賓們注意到，作為畢業生代表，穿著粉紅色旗袍的石美玉和穿著藍色旗袍的康愛德，儀態大方

地走上講臺，從校長手中接過學位證書。校長在致辭中激動地稱讚說：「勿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國之女作比例，愧無地矣！」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一時間，石美玉和康愛德成為新聞人物，當地的報刊雜誌均在顯著位置報導此事。[1]

在芝加哥醫院完成實習之後，石美玉和康愛德婉拒醫院的聘任，她們早已歸心似箭。深秋時節，兩人受美以美會婦女國外宣道會所差派，作為醫療宣教士，返回中國服務同胞。在回國的遠洋輪船上，兩人心潮起伏：去國多年，國事多變，中國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慘敗，不知朝廷和民眾對於留洋回國學生的態度如何，是否以為「非我族類」？

沒有想到，九江的親友們竟然燃放了四萬串鞭炮，熱烈歡迎這兩名遠遊的女子學成歸國。兩人回家的第一天，就被請去處理一宗危急的難產症狀，她們保住了母子二人的性命，這成為她們在地醫療事業的良好開端。

石美玉和康愛德在芝加哥結識的但福德醫生（Isaac Newton Danforth）願意捐資在九江興建一座醫院，以紀念剛去世的夫人。正當醫院落成之日，突然爆發席捲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之亂。石美玉的父親石宅嵎慘遭拳匪殺害，石美玉本人不得不暫時離開中國，前往日本避難。一九○一年，亂定之後，她返回九江。經過重新整頓恢復，但福德醫院正式開業，石美玉出任首任院長。[2] 她的母親應邀在醫院做「院牧」，向病人及其家屬講解基督教信仰和聖經真理。[3]

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知道康愛德和石美玉的事蹟之後，在《時務報》撰文加以介紹。梁啟超寫道，石、康兩位女子在密西根大學的學業與儀態都﹁翹然異眾﹂，「所領執據，又為頭等」，她們的表現讓西洋人「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位而鞠躬以為禮」。她們回國服務的理想更值得讚揚：「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

一九二七年，石美玉從事醫療工作已長達三十年，她的人生迎來一次轉型──她將「人生下半場」轉向布道工作。她的上半生致力於救治人的身體，下半生則致力於救治人的靈魂。作家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也曾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字喚醒那些圍觀日軍在東北處死同胞的中國人麻木的靈魂。然而，魯迅並未找到真理的源頭，他一生所做的，是消極地「跟黑暗搗亂，讓黑暗不能那麼肆無忌憚地黑暗下去」。與之相比，作為基督徒和布道家的石美玉清楚地知道美善的源頭在哪裡，她要引領更多同胞歸入耶穌基督的懷抱。

對於基督徒和傳教士而言，一九二七年並不是一個美好的時刻：此前幾年暗潮洶湧的非基督教運動，伴隨著國民黨黨軍北伐的勝利，激化演變成一場新式的義和團運動。國民黨的軍隊和暴民在南京和其他很多地方暴力攻擊跟基督教有關的中外人士。「南京事件」製造出一種恐怖氣氛，迫使在中國的八千名西方宣教士先後撤離，僅有五百人冒險留下。在此後二十二年南京政府統治中國時期，在華的西方宣教士再也沒能恢復到此前的規模。[4]

留下，還是離開？堅持，還是放棄？這是五十四歲的石美玉需要面對的挑戰。

引入現代醫療，救治孱弱同胞

石美玉，一八七三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父親石宅嵎是美以美會在華中地區最早的牧師之一，母親吳氏是一名傳道婦女並在美以美會所創辦的女子學校擔任校長。由於信仰的緣故，父母親思想開明，不再遵從封建禮教與習俗，反對婦女纏足，石美玉得以免遭纏足之苦，一雙大腳使她遠近聞名。她比張幼儀年長一代，保有天足更不容易，天足意味著獨立和自由。

石美玉自幼從母親那裡接受文化與聖經的啟蒙教育，父親則因受美國醫療宣教士凱蒂．布什奈爾（Kate Bushnell）的影響，希望女兒學醫，將來從事醫療宣教工作。一八八二年，父親將她送往九江「儒勵女學」接受基礎教育。在校長、女宣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的精心教導下，她眼界打開、學識精進。十年之後，昊格矩推薦石美玉和養女康愛德一同赴密西根大學攻讀醫學學位。

一九○一年，石美玉和但福德已然成了九江的「地標」。她已經有了「全人醫治」的概念：世俗的醫院一般只關心人身體的疾病，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則更加關心人心靈的疾病。石美玉醫治人的身體，還要醫治人的心靈，她希望醫院的每一名醫護人員也能如此。她開始在醫院開辦附設護士學校。沒有現成的課本怎麼辦？她自己動手翻譯美國護士學校的課本。她除了教導醫護人員專門的醫藥知識之外，還為她們開辦每個禮拜四的查經班。她親手訓練的護士術德兼備、愛人

如己。在此期間，石美玉顯示出她具備的諸多特質：外科醫生的卓越醫術、宣教士的愛心以及行政主管的傑出才能，三者完美地結合於一身。

此後數年間，石美玉不僅創辦了但福德護士學校，又在上海、青島、濟南等地開辦護士學校，培養出許多優秀護士。她的心願是，使護士在中國從「苦力」成為受人尊敬的職業，並將利他主義和奉獻精神作為護士的職業規範。僅但福德護士學校就培訓出五百多名護士，她們都獲得了「中華護士會證書」。其中，聞名遐邇的「中國護士之母」、「中華護士會」中方會長伍哲英就是一九一二年但福德護士學校的畢業生。「中華護士會」的成立使教會護士學校有了統一的課程和考試制度，一九二六年，僅在「中華護士會」註冊的護士學校就已達一百一十二所。 [5]

石美玉如同「中國的史懷哲」，以尊重生命為最高原則。她憑著精湛的醫術和基督博愛精神，很快贏得九江及其周邊地區百姓的信任與愛戴—在擁有五百萬人口的九江地區，但福德紀念醫院是唯一一所由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現代化醫院。根據石美玉的工作報告，在僅十個月的時間裡，她和康愛德診治了兩千三百多名患者，外出巡診高達三百多次。有一段時間，石美玉染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貼出告示，禁止任何車馬經過她門前的街道，以免影響她養病。附近的小販知道了，也彼此相戒不高聲叫賣。還有記載說，若石美玉在夜間到城外出診，已經關閉的九江城門會專門為她打開。

在女性備受歧視、不得拋頭露面、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時代裡，人們對這位生活方式西化的單身女子的尊敬卻超過當地的任何人。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建構是建立在公私分野的觀念上的，修齊治平歷來是男性的專屬，女子則自幼被教導為婦之道。這種文化觀念使得女性無法認知自身潛質，也無緣實踐其能力。 [6] 後世學者感嘆說：「一涉『女子』，見識便陋，確像是一種『儒病』。」 [7] 然而，石美玉的成就讓那些思想僵化的人豁然開朗：原來，只要給女性足夠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她們可以創造出比男性還要優秀的職業生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石美玉堪稱倡導女性權利和女性解放的先鋒。

清末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醫療體系不是由政府主導建立的，而是由西方宣教士幫助建立的。從十九世紀初以來，基督教會的傳教士醫生為中國帶來現代醫學及服務，從簡單的街道門診所和下鄉的巡迴醫療，發展成完善的鄉村和城市醫院，「在種種發展中有一個決定性的燃燒著激情的目的，那就是堅定地通過醫治病人來展示上帝之愛」。 [8] 許多教會創辦的醫院在管理、醫療水準等方面，「不愧為醫院中之

模範」。而且，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跟普通醫院相比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即不以營利為目的，救治那些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的社會底層的病人，因此它們在經濟上難以自負盈虧。石美玉多次到美國訪問，為醫院、護士學校和孤兒院等機構籌款。她以真摯的態度以及出色的演講能力，成功地籌到所需之款項。石美玉還積極參與全國性的醫學組織的建立：一九一五年，她與伍連德、顏福慶等籌組中華醫學會，並出任副會長，這足以顯示她在全國醫學界享有的崇高地位。

石美玉的事業，引起湖廣總督、清末著名的改革派大臣張之洞的關注。張之洞是最熱心興學的朝廷大員，先後設立兩湖書院、自強學堂、儲才學堂、農務和工藝學堂、南洋公學等學術和教育機構，並鼓勵年輕人出洋留學，甚至說「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張之洞和袁世凱也是促成清廷廢除科舉考試的重要人物，通過教育改革引入更多的新式觀念，很多觀念甚至超越了張之洞自己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體西用」論。[9] 當張之洞發現其轄區內居然有石美玉這樣的奇女子，便視之為振興民族、強盛中國之典範，派遣代表去會見石美玉的恩師昊格矩，想通過昊格矩邀請石美玉去他在上海創辦的醫學院任教。

然而，石美玉婉拒了張之洞的邀請，她希望保持自身及其機構的獨立性。石美玉去上海是多年以後的一九二○年代，那時張之洞早已去世了。

石美玉的事業，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國推動的現代醫療和女性解放兩大革新運動的交集。石美玉在九江等地創辦醫院和護士學校，並非孤立的個案。同一時期，中國的很多城市成立了女子醫院、護士學校、女子工業走讀學校、女子盲人學校等各類以女子為主體的醫療、教育機構。一位美國宣教士觀察到，很多女子學校都是由外國女性主持，中國人承擔了大部分費用，中國的女性尋求新知識如饑似渴，「這充分證明新的中國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旅程，他們最先做的就是保證女性能夠獲得教育和平等的機會」。[10]

石美玉的工作引起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注意。一九一六年，石美玉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到馬里蘭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與她差不多同時獲得獎學金到該大學學習的，還有她的妹妹石志成和她的助手吳麗蓮。

在美期間，石美玉除了刻苦汲取美國最新的醫學成果之外，還受邀四處演講，向美國教會和社會各界分享異象以及中國教會的需要。她結合她自己的經歷，鼓勵中國留學生回國服務。由此，她成為當時女傳教士和醫學專家中的明星人物。

石美玉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結緣，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來華推動醫療教育的龐大事業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如果說洛克菲勒的事業象徵著財富、進取、大資本的社會影響，那麼成立於世紀之初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則是在美國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中孕育的私人慈善事業之代表。一九○五年，作為洛克菲勒慈善事業總策劃人的弗里德里克．蓋茨（Frederick Taylor Gates）給洛克菲勒寫了一封信，信中希望將基金會的重心轉向遠東、轉向中國：「在世界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海島，都真的開放了。這為我們英語國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業提供了自由的土壤。」此後，經過十年的調查，洛克菲勒基金會終於一鳴驚人，模仿美國頂級醫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王冠上的閃光寶石」閃亮登場。[11]

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初的策略是建立第一流的醫學院，培養高水平的醫生。醫學院當然要建立在大城市，而醫學院的畢業生大多數都留在城市服務。這跟石美玉的策略有所不同：石美玉向完全接觸不到西醫的農村選派「福音護士」，為農村提供基礎的、有時卻能拯救生命的小手術，施捨藥品、接種疫苗，與處理難產。[12]

當時，由中國知識分子發起和推動的西化運動，起到了動員與整合中西力量，通過提倡科學與進步來發展中國現代知識界和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作用。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心在改變中國的大趨勢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北京協和醫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軔的那年動工，可以算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巧合」。此前數十年間，由於教會和中國人自己的西學教育的結果，已經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享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石美玉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通過發展現代醫學來改變中國的社會前提。[13]

二十年代後期，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支持一個名為「中國項目」

的鄉村建設計劃，將主要資源投入農村經濟、公共衛生、初級教育和地方行政的綜合改造與發展。[14] 一個私人基金會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居然扮演了半個政府的角色，這是史無前例的。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轉向，很難說沒有受到像石美玉這樣一群受過西方精英教育卻願意為中國鄉村現代化獻身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比石美玉晚一代的、協和醫學院畢業生陳志潛，就是其中的一名傑出人士。陳志潛於一九○三年生於四川華陽，是「中國遙遠地區一個社會底層舊式學者家庭的孩子」。一九二一年，十七歲的陳志潛以名列榜首的成績進入協和醫學院，開始其八年漫長的學習生涯。一九二八年，北伐軍進入北京城之時，他即將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他的遠大志向建立在這樣幾個堅定的信念之上，「一個國家的強大有賴於她的百姓；從西方傳來的科學醫學的優點在大多數方面超過我們的傳統醫學；只有當一般大眾而不只是少數享受特權的人能夠受益於現代醫學時，國家醫療制度才能產生重要影響」。從協和畢業後，陳志潛到陶行知創辦的曉莊鄉村師範學校執教，並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村衛生機構：曉莊鄉村衛生實驗區。後來，他又赴哈佛深造，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5]

一九三一年，陳志潛來到河北定縣，加入鄉村建設運動，組建由村而縣的保健體系。經過四年的努力，他在定縣建立起三級衛生網，基本解決了大多數農民無醫無藥的困難。傳教士的女兒、深切關懷中國農民命運的作家賽珍珠稱讚說：「這是一個宏偉而永恆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無比正確和晏陽初、陳志潛制定的實用的計畫的確令人信服，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像一個已經成熟的思想觀念那樣有力量，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的時刻已經來臨，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熱情和決心向前邁進。」

然而，外部的政治環境並不容許石美玉、陳志潛這樣的知識精英用從容而溫和的方式改變中國的鄉村──毛澤東血雨腥風的「土地革命」的騙局，在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競爭中取得了勝利。中共建立新政權之後，旅居美國的石美玉再也沒有回到過她深愛的祖國；留下來的陳志潛則理所當然地被打成右派，多年以來處於「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狀態。毛澤東享有李志綏這樣受過西式教育的優秀醫生的貼身醫療服務，但中國農民只能接觸到所謂的「赤腳醫生」。直到今天，在中國的許多農村，農民們仍然處於缺醫少藥的悲慘境地。

一九二○年，石美玉與美國女宣教士胡遵理（Jennie V. Hughs）一起赴上海創辦伯特利教會和伯特利醫院。數年之後，她們以此為基礎，發展出許多重要的工作，包括設立中學、小學、神學院、孤兒院、護士學校等，她們營造出一個擁有十八棟建築的獨特社區。作為一個不從屬任何教派，也不受任何外國宣教會控制的組織，伯特利教會為石美玉開闢了一片新天地，使她能夠繼續追求中國人自己領導教會的願望。[16] 石美玉也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她是中華全國基督徒聯禱會和福音廣播電臺的發起人，也創建了「中華基督徒婦女節制會」，提倡中國婦女要認識基督、接受教育，並貢獻社會。

一九二六年，石美玉基本上放下醫生的工作，成為一名全時間的傳道人。她發現，僅僅救治人的身體是不夠的，如果靈魂不得救，身體痊癒的病人仍然是行屍走肉。她更發現，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越來越多西方科學和世俗思潮的傳入，物質主義和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科學主義，或者說唯科學主義成為一種新的偶像崇拜，如R．G．歐文所說，「在某些方面，科學被認為是全知全能的人類救世主而逐漸受到崇拜」。由陳獨秀發動的、一直佔主導地位的一元論的實證唯科學主義潮流，隨著馬列主義日漸吸引人心而凱旋得勝。[17] 這顯然是石美玉不願看到的結果，她意識到，要對抗這股潮流，僅僅作為一名醫生是不夠的，現在是直接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一名奮興佈道家的時候了。[18]

早在一九一八年，石美玉就與余日章、陳維屏、誠靜怡、胡素貞、蔡蘇娟等七人，在廬山牯嶺蓮谷夏令營，創建了中華國內佈道會。這是中國本土的第一個佈道組織，持續差遣宣教士外出佈道，腳蹤遍及邊疆各地，影響教會發展甚大。

正是在中華國內佈道會，石美玉與蔡蘇娟相識並相知。蔡蘇娟出生於清朝高官家庭，十六歲時在基督教女子學校求學期間接受了基督信仰，隨後成功地帶領全家五十五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後來，她身患惡疾，不能見光，只能在暗室之中靜養。然而，她於暗室之中所寫的文章卻極具穿透力地帶給當時代年輕知識份子極大的鼓勵。成千上萬的人慕名前來，在病榻前聆聽她的勸勉。她的名言「床榻不是我的監獄，乃是受訓的學校；聖靈是我的導師，訪客是我的功課」、「我從沒有問過一次上帝，為何這樣的事發生在我的身上，只是問你要我如何行」成為很多遭遇病患之人的鼓勵。[19] 晚年在加州生活的石美玉

與在賓州生活的蔡蘇娟，雖然分別住在東西兩岸，卻心心相印、彼此代禱。

石美玉的神學思想受美以美會的影響，美以美會為約翰．衛斯理所創立（John Wesley），該宗派重視宣教及救恩論，注重過聖潔生活，參與社會關懷。石美玉到中國各地主領佈道會，曾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學講道，佈道資訊感動很多學生信主，其中一位是後來也成為女奮興佈道家的汪佩真。汪佩真在見證中寫道：「有一天，石美玉醫生來主領禮拜。她所講的話，句句都打入我的心坎，深覺得非承認救主，就不能除罪。但又怕親長攔阻，恰好那時父親正在宰治台州，母親也同去了，我就受浸進入了教會。」

一九三○年代，伯特利教會創立了伯特利佈道團，佈道團到全國各地傳教，講員有石美玉、宋尚節、計志文等人，掀起了中國教會復興的高潮。在計志文牧師的記事中，提及「石美玉醫生曾公開宣佈不再做醫生，專心作傳道，因為有很多人請她主領奮興大會」。男尊女卑的觀念，不僅存在於中國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儒家文化傳統中，也滲透在中國和西方的教會文化中。在教會，女性雖然承擔大量的事工，卻不能擔任重要的職務。偏偏這一段時期，女性在中國教會裡面大放異彩：無論是像胡尊理這樣的西方女宣教士，還是像石美玉這樣的本土女佈道家，紛紛成為教會的中流砥柱。

伯特利佈道團迎來了一位傑出的佈道家宋尚節。計志文牧師說：「宋博士充實了佈道團的力量，而佈道團則給宋博士打開了傳道之門。」[20] 在宋尚節的日記中，這樣記述說：「有一次，一個西國朋友很誠懇地警告我說：『上海西門斜橋伯特利教會，是富於情感性的，你萬不可去加入他們的教會。』然而他聽了這勸告後，反而引起他興趣，前往伯特利教會拜訪，因而被邀請在教會中負責一次講道。」由此宋正式加入佈道團的事奉，幾乎走遍全國各省上百座城市，帶領超過十萬人歸向基督。

宋尚節是在一九二七年奉獻成為傳道人的。他在美國留學十年，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因信仰虔誠，一度被關進精神病院。十月四日，他從西雅圖搭輪船回國。回國之後，父母希望他早日結婚。他與未婚妻錦華見面，預先告知：「你跟從我，必須要有絕對的犧牲精神。」錦華亦告知，她深知這門婚事是出於主的帶領。十二月十八日，兩人舉行了簡樸的西式婚禮，陳志遠牧師讀《創世紀》十七章，也有西方女宣教士獨唱獻詩。[21] 在榮華顯赫的世俗層面，宋尚節的婚禮無法與兩個多星期前蔣介石的婚禮相提並論；但是，宋尚節的婚姻更加單純而美好。宋尚節夫婦和蔣介石夫婦都是基督徒，在上帝眼中，哪一

對夫婦才是寶貴的兒女呢？上帝更愛的是那愚拙而卑微的人。

與石美玉一樣，宋尚節並不太關心中國的現實政治，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基要派基督徒的一個傳統。[22] 但是，讓人「因真理，得自由」的純正的基督信仰，註定會與獨裁政治發生激烈衝突。宋尚節在講道中申斥教會中有人向死人遺像跪拜鞠躬，這是明知故犯拜偶像的罪。這話給國民黨地方黨部知道了，認為宋尚節詆毀國父孫中山──剛剛在北伐中獲得勝利的國民黨政權，正在著手塑造對「先總理」的一整套偶像崇拜系統，蔣介石以此建構自己的權力合法性──其權力不僅來自於軍事力量，更來自於「聖人」孫中山的授予。然而，既然孫文和蔣介石都自稱是基督徒，為什麼對聖經的十誡中「不可拜偶像」視而不見呢？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官員認為宋尚節是反動分子，下令派兵緝捕。可是，宋尚節一大早就離開仙遊返回興化了。[23]

石美玉的佈道事業遇到的攔阻遠比醫療事業大。正如美國學者列文森所說，中國人對西方基督教的敵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常常體現於民族主義的思想之中，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眼中，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是同盟關係。二十世紀之前，中國人反對基督教是因為它不是中國的傳統的一部分，它與儒家文化之間存在著衝突；二十世紀之後，中國人則用另外一種來自西方的觀念來反對基督教：基督教不是科學。在這個意義上，近代傳教士對中國的西方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這只是世俗上的或次一級的成功，他們那更為重要的宗教事業卻失敗了。而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和一九二七年的北伐之後，本來富於潛力的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停滯了，根本原因在於：作為一種社會抗議的象徵符號，基督教可能暫時不具有激進的物質許諾所產生的那種強大的吸引力，而這種激進的物質許諾是由那些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發出的。[24]

暴風眼中的基督徒：從「非基督教運動」到「南京事件」

一九二七年，石美玉、伯特利教會以及所有中國基督徒、在華西方宣教士、教會及機構，都面臨著自義和團運動以後最嚴峻的挑戰。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非基督教運動」，幾年來若隱若現，至今蔚為大觀，蛻變成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絕非偶然事件。一九二二年，上海、北京等全國數十個城市先後成立「非宗教大同盟」，掀起「非基督教運動」，宣稱「有宗教而無人類，有人類而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獸」。[25]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幕後策劃的政治運動。據當時任北京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的羅章龍回憶，這一運動是由中共北方區領導的，「實際主持與組織者為中共北大支部諸同志」，「我黨在北京發起非宗教運動，是當時中共北方區領導下的革命思想戰線上的偉大鬥爭」。[26] 這場運動的經費來自正在本國國內迫害教會的蘇俄共產黨政權。「政黨的參與是非基督教運動全盤政治化的重要表徵。由於全盤政治化，反教運動才獲得前所未有的社會支持。」[27] 共產黨熱切地吸收及拉攏新興起的學生力量，為了與基督教爭取人心，發動了一次醜化與揭發基督教的「罪惡」的運動。[28]

此一時刻，反對「非基督教運動」如同對抗「政治正確」般困難。北大教授周作人挺身而出，與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等聯合發表北大五教授《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29]

在宗教信仰背景薄弱的中國，一般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將宗教信仰自由這一近代以來的普世人權價值視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品」。但周作人敏銳地意識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類自由的基石。他撰文指出，「這回對於宗教的聲討，即為日後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思想自由的壓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數的力來干涉少數的異己者也即是壓迫」。他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中強調：「現代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在前一年所寫的《山中雜信》一文中，他甚至主張：「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其實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發達才有點希望。」然而，周作人的真知灼見並不為當時被政黨煽動的、以反基督教來反帝國主義的青年們所理解。[30]

北洋政府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般不加干涉，比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遵紀守法。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段祺瑞執政府在辭職前夕，還特別發佈一道公文，命令禁止反對宗教：「中國釋、道、回各

教，沿習已數千年，翊輔治化，拊輯邊徼，罔不由茲。天主、基督二教，歷訂條約，於傳習保護嚴切申明。共和成立，尤重信教自由。近聞各處頗有宣傳反對宗教之印刷品，及結社集會等事，若不急為禁遏，內則違戾國俗，外則搖動邦交，關礙殊巨。著責成各省軍民長官，力為制止，以杜淆惑，而弭亂源。」[31] 然而，公文的起草者茫然不知南方煽動的反帝思潮已然席捲全國，在公文中提及「條約」及「邦交」之字眼，反倒讓那些「愛國者」們抓住把柄，在辯論中處於下風。

黨軍北伐，非基督教運動與黨軍的反帝意識形態高度契合，遂得以改頭換面，沉渣泛起。這一次，有了黨、政、軍的力量主導，自然是所向披靡、凱歌高奏，而且不再停留在紙上辯論的層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攻擊有關人士和物產。教會人士汪朝翔指出：「反教人士，黨軍中也大有其人，所以國民政府勢力所到的地方，非教聲浪，亦甚囂塵上。」[32] 教會人士王冶心也指出：「青天白日所到之處，基督教遭遇著一種從所未有的影響。」[33]

在南京事件發生之前，黨軍所佔領的南方各省，教會機構首當其衝地成為劫掠對象。在湖南，「一切教堂、學校、醫院、住宅，不問大小粗精，無不皆被軍隊、黨會及其他所謂的革命團體所蹂躪」；在浙江，「其不善者竟無理佔據，且將主人驅逐，或更加以侮辱」；在福建，「教堂駐軍，司空見慣」；在安徽，「大軍雲集之時，會所學校，均為軍隊佔駐，各項事工，均無形停頓」；在江西，「各地教堂大多在戰火中損毀，其餘則為軍隊及黨部佔駐」。[34]

有了前面的鋪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黨軍進入南京時，發生「縮小版的義和團運動」即「南京事件」或「寧案」就不足為奇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第七次大會上對於中國問題作出了訓令，要求發起攻擊外國人的武力戰鬥，「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最先入城的是國民革命軍第二、第六兩軍，軍紀最差的是第六軍第十九師。幕後操縱者為身為共產黨員的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而最高指揮官程潛事先亦知情，武漢方面以封官許願贏得他的支持。[35] 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身穿南軍服裝、說話為湖南口音的官兵專門挑選外國使館、商行、教會及住宅，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遇難者中最知名的一位是金陵女子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博士（John William）。文懷恩於二十八歲結婚後，夫婦受長老會支持差派前往中國，於一八九九年抵達中國。他是金陵大學的創辦者，但他存心讓賢，又因時常奔波於中美之間，無暇顧及學校行政，而甘心屈就副校

長職。他在華從事傳福音、興學、救災、建設等多項事工，前後二十八年，期間往返奔波於中美之間十餘次，對中國宗教教育與學術上作出了偉大貢獻。

文懷恩對國民革命軍持同情態度。二十四日上午，他與幾位西方傳教士和教師上街觀察動靜，被一群士兵抓住，搜走身上值錢的所有物品。有一名士兵要他交出手錶，文懷恩用華語向劫奪他的人請求說：「給我留下這錶吧！它不值什麼錢，是母親給我的紀念品啊！」所得到的答覆竟然是一名士兵對準他腦門開了一槍。文懷恩應聲倒地，與世長辭。

文懷恩博士殉難時，蔡蘇娟三十七歲。由於被她當作父母一樣看待的美國宣教士李曼老牧師夫婦與文懷恩博士的舊誼，她與文懷恩夫婦也保持著親密的關係。文懷恩的殉難讓蔡蘇娟悲痛欲絕。多年以後，她在自傳中記載了文懷恩殉道的故事。

當時，數百名西方人士倉惶奔向南京城內的一座小土山，即美孚石油公司所在地的「美孚山」避難，那裡有一隊美國海軍陸戰隊守衛。在避難者當中，有後來因「傑出的作品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種族的遙遠距離」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賽珍珠。《申報》報導說：「粵軍即炮擊該山，於是英美軍艦亦發炮回擊。」[36] 最終，這批人被拯救到軍艦上。不堪設想的是，若賽珍珠此刻遭到殺害，人們就無法讀到她此後完成的文學巨著了。

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收藏的傳教士書信中，有死裡逃生的「南京事件」親歷者的描述。傳教士比爾在信中指出，南方政府煽動的革命包含了強烈的排外情感、強烈的反基督教情感以及強烈的鼓勵勞工運動，背後是蘇俄的主義滲透和金錢資助。另一位傳教士理查森躲藏在鍋爐房的稻草堆中才得以逃生，第二天早上發現，「我們的家已被洗劫一空，甚至建築物也被部分拆毀」。[37] 研究者根據這些史料得出結論：南軍士兵負主要責任，而南軍士兵之所以有選擇性地針對外國人搶劫而難以制止，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官員此前過度宣揚反帝意識形態，將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妖魔化。北伐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其內涵絕不限於軍事，它同時也是一場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的征討，一切與國民革命宗旨背離的有形的、無形的、內部的、外部的敵人均在打擊之列。因此，「南京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38]

蔣介石畢竟不敢像慈禧太后那樣作出「向萬國宣戰」的愚蠢決策。等局勢稍稍穩定，他就出手控制瘋狂的排外運動，與西方各國談判賠償問題。清黨之前，他將罪責推給潰敗的北洋軍隊，但當事人的證詞確鑿地表明，肇事軍人操湘、贛、粵之口音，必定是南方軍隊；

清黨之後，他又將罪責推給共產黨—共產黨南京的黨部確實在背後煽風點火，但控制軍隊的是國民黨將軍程潛，國民黨方面要負更大責任。

「南京事件」雖然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了，但南京政府與知識分子、教會及西方的關係留下一道難以癒合的裂痕。尤其是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急轉直下。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日本若槻內閣的外務大臣是幣原喜重郎，一向對中國的內爭採取觀望與不干預政策。而素來同情中國也是孫文好友的犬養毅，亦為此時內閣閣員之一。在這段時期，中日之間並無不愉快事件發生。

「南京事件」之後的四月初，日本政壇發生逆轉。由於日本駐南京領事館受到嚴重攻擊，使得日本國內輿論大譁。[39] 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對若槻內閣及幣原外相發動無情的攻擊，使得若槻內閣倒台。四月二十日，田中組成新內閣，自任首相兼外務大臣，開始對華實施強硬政策。同年七月，日本出兵山東，阻撓北伐，造成大量中國軍民傷亡。此後，中日關係進入新的一頁。

在此意義上，「南京事件」是中日兩國關係改變的標識，它也伏下了十年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在南京實施大屠殺的導火線。[40]「南京事件」使得日本政府和軍方有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藉口—雖然此後蔣介石發動清黨之役，但日本無法相信蔣能確保中國不變成「亞洲的蘇俄」，而一旦中國成為第二個蘇俄，日本的生存就岌岌可危。既然中國不願遵守國際公法，日本也就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相關準則。

一九二七年，身在上海的石美玉沒有遭受生死考驗。第二年，南京政府宣佈「收回教育權」，要求教會學校向政府註冊，負責人必須是中國人，宗教課程只能是選修課而不能是必修課。前兩條沒有問題，但一向溫和的石美玉拒絕接受後一條：她堅持護士學校的學生必修聖經，這是教會學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即使以政府不予註冊為代價。也許因為石美玉聲名卓著，儘管她公然抗拒政府的命令，蔣夫人宋美齡還是發表了一份表彰伯特利的正式文件。[41] 但這並不意味著像石美玉這樣的主持獨立基督教機構和學校的人士，在南京政府治下有更大的活動和發展空間。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時期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很難繼續，儘管南京政府的首腦蔣介石和他的妻子常常標榜基督徒的身份，以此贏得西方人的親近感。很多自我標榜為基督徒的獨裁者往往打壓教會，因為獨裁者害怕一切在其控制之外的民間組織和公民社會，即便那些並不積極介入現實政治的教會。專制政府掠奪教會的教育權，既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更是處於世俗權力的狂妄—國家不僅要統治人的身體，還要統治人的靈魂，通過教育對民眾實現「規

訓」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一九三七年，石美玉再度赴美國籌款。正在此時，日本進攻上海，伯特利教會和醫院等建築被炸毀。無家可歸的石美玉從此旅居美國。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將石美玉創建的醫院和學校統統充公，並對教會展開大規模迫害。石美玉更不能回到山河變色的祖國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石美玉在加州帕薩迪納去世。她一生未婚，但她先後撫養了數十名孤兒。為了醫療和傳教的事業，她犧牲了愛情和家庭，但她在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中幸福而喜樂。

12 盧作孚

北碚是建設未來中國的縮影

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創造幸福，不在創造個人的幸福，供給個人欣賞，而在創造公眾幸福，與公眾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創造，且欣賞，且看公眾欣賞。這種滋味不去經驗，不能嘗到。

—盧作孚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對於四川和四川人來說，這句話不知是褒還是貶？

辛亥革命之後，川系軍閥相對於其他地區的軍閥勢力，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存在。川軍只是四川地方軍隊的總體稱謂，從來沒有形成統一的體系，內部政治傾向各異，各派系自成門戶。[1] 川軍內鬥頻繁，不常參與省外的爭鬥，也排斥外部勢力染指四川，滇軍、黔軍進入四川都先後遭到川軍聯手驅逐。隨著國民黨北伐成功，川軍將領審時度勢，換上青天白日旗，接受國民政府任命和國軍編號，但其他一切保持不變，連軍隊的服裝亦不曾統一。川軍對蔣介石尊而不從，直到抗戰爆發，川軍主力奉命出川抗戰，蔣介石的勢力才得以滲入四川，國民黨政府亦遷都重慶。[2]

一九二七年在長江流域炮聲隆隆的北伐戰爭，與四川關係不大。人們聽到的都是遲到的戰報，宛如天方夜譚。四川的民眾和官兵，依舊在一九一九年形成的「防區制」下生活。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實力最強的四川軍閥的劉湘任命盧作孚為嘉陵江三峽峽防團務局局長。

這一看似尋常的任命──這個職務大致相當於市長而已──卻對周邊地區乃至整個四川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

三峽峽防區跨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共轄三十九個鄉鎮。轄區內山嶺重疊，形勢險要。入民國後，這一帶陷入無政府狀態，匪盜橫行，商旅難行，民眾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一八年，當地人士為了安定地方，自發成立峽防營。一九二三年，改組為峽防團務局，局址設在緊靠嘉陵江的北碚鄉。[3]

此前的局長形同虛設，盧作孚上任之後，以北碚為中心的三峽峽防區的面貌為之改觀。誰也沒有料到這個個子矮小、面容消瘦，宛如鄉間窮教書先生的中年人，身體內居然蘊含著那麼大的爆發力。一個人的力量有多大？一個名叫柏格里的傳教士，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翻轉了貴州石門坎地區苗族社群的信仰與生活；而盧作孚改變的也不僅是北碚的房舍和街道，更是絕望而潰敗的人心。他們是被歷史選擇的巨人，用美國政治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的話來說就是：「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數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實現人類的才能，而其餘的人都背叛了它。不過這並不重要。正是這極少數人將人類推向前進，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義。」

因為盧作孚的到來，北碚這個籍籍無名的小鎮，將在未來幾年裡聞名全國。那麼，盧作孚又是何許人也？他是民生實業公司的創辦人，民生公司是民國時期中國規模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亦是最成功的現代集團企業。盧作孚在北碚進行的漸進式社會改革，於混亂之中開闢了一個新型社會的雛形。他是一位致力於變革社會、匡正人心的實踐者，又是一位最早梳理出中國現代化建設思路的思想家。

在盧作孚身上，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長四十歲的、早在清末就走「實業救國」之路的張謇的影子。跟擁有狀元功名、顯赫出身和廣泛人脈的張謇不同，盧作孚是一介布衣，出身貧寒，沒有拿得出手的學歷，也沒有非富即貴的朋友圈。他一九二五年才創業，已錯過了一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十多年後，民生公司成為長江航運的龍頭老大，卻又遇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民生公司幫助國民政府完成了一場堪比「敦克爾克撤退」的人員與物資的內遷。看上去弱不禁風、骨瘦如柴的盧作孚，居然在波濤洶湧的長江上，在波詭雲譎的大時代裡，闖出了一片廣闊天地。

最讓後人驚訝的是，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從事鄉村建設實驗所創造的奇蹟，迄今無人能夠超越。與同時代鄉村建設的範例──如梁漱溟的山東鄒縣實驗、晏陽初的河北定縣實驗、陶行知的江蘇曉莊實驗──相比，盧作孚在北碚的建設最具成效、最為持久，是全方位的、系統性

的，卻也匪夷所思地最為後人所忽視。[4] 或許，後世的主流敘事者，不願意讓人們發現，在被偶像化的政治領袖之外，其實有真正值得敬仰的民間偉人；而所謂「歷史的必然方向」，其實當年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若不能改變一個國家，就先改變一座城鎮

從接掌峽防局那一天開始，盧作孚便將「北碚模式」的理想訴諸於實踐。他說：「我們憑藉了一個團務機關──江、巴、璧、合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憑藉局裡訓練了幾隊士兵，先後訓練了幾隊學生，在那裡選擇了幾個點──北碚、夏溪口以至於礦山北川鐵路沿線──試作一種鄉村運動」，其目的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他要在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區域形成一種「理想」，「將嘉陵江三峽佈置成一個生產的區域、文化的區域，與遊覽的區域……」。[5]「北碚模式」的思路糅合了上海的現代工業技術，德國建設青島、日本建設大連，以及張謇建設南通的經驗。[6]

與單純以教育家身份介入鄉村建設的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們不同，盧作孚當過教師、新聞記者、教育官員，更是創辦民生公司的實業家，其「北碚模式」遍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盧作孚振興北碚的計劃從兩個方面展開：第一，吸引新的經濟事業，發展地方經濟。他意識到，四川地處西南內陸，「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人們的觀念更是嚴重滯後。所以，「要使外間的人都以技術的力量或經濟的力量來幫助四川，以促成四川的各種實業的經營，還要把外間的人向來對於四川的觀念根本轉變過來的」。他主張「用力運動外省人都到四川來」，「以成群的集團力量幫助四川」，「拚命運動，白日不夠繼之以夜」，要把「四川造成『租界』吸引世界上的人和錢」，以期將民不聊生的「魔窟」變為人人嚮往的「桃源」。不可能變成了可能：短短數年間，周邊的航運、鐵路和公路相繼貫通，數十個不同類型的工礦企業投入生產，北碚的礦業迅速躍居四川之首位。

第二是創辦文化事業和社會公共事業。盧作孚創辦了地方醫院、圖書館、公共運動場、平民公園、嘉陵江日報館、兼善中學及其附屬小學校、各類民眾學校等公共機構。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創辦於

一九三○年的中國西部科學院，這是繼一九二八年創辦的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九年創辦的北平研究院之後，當時中國的第三大研究機構。西部科學院設有生物、地質、農林和理化四個研究所，面向全球招募一流人才，確實有不少「海歸」學者慕名而來。西部科學院也是中國首創的民間自辦的科學院，至今在華人世界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抗戰時期，大規模的內遷使北碚一躍成為大後方的教育科學文化重鎮，西部科學院與其他外來的文教科研機構彼此合作又有競爭。當時到重慶考察的科學史家李約瑟，敏銳地觀察到北碚在中國學術版圖上的顯赫位置：「無疑，此地最大的科學中心是在一個小鎮上──北碚，它位於嘉陵江畔。這裡有十八所科學和教育機構，他們大多數都有極大的重要性。」[7]

盧作孚深知，要改變民眾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要移風易俗，首先要改變公權力部門在民眾心目中腐敗不堪的固有形象。長久以來，四川民眾對遠在天邊的皇帝抱持無可奈何、忍耐到底的心態，入民國後對貪得無厭的地方官員更是厭惡至極。為了贏得民心，盧作孚先從改變北碚各事業機關的環境入手，「辦公室佈置得十分整齊，地面亦清潔非常，牆壁上都掛上了一幅兩幅教育或新智識的圖畫，及一般民眾生活上有關係的表圖。每個機關門首當眼處，都張貼著一張該事業機關的概況，使人一望而知其一切內容」，即使是寢室、廚房、廁所，也都清潔、整齊、簡樸，任人參觀。然後，他再逐步改變公務人員的身份認同：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而是兢兢業業為百姓服務的公僕。對此，賀伯辛在《八省旅行見聞》有極佳之觀感：「北碚印象，街市清潔，秩序井然。至公務人員之生氣勃勃，市民之努力工作，皆極堪欽佩。」

在盧作孚的領導下，北碚始終朝著建立「一個大眾公共享受的城市」目標而努力，與軍人市長潘文華治下大興土木「學上海」的重慶形成頗有意味的對照。重慶倒是有更多高堂美廈，但官府的貪瀆和民眾的萎靡一成不變。而在北碚，陌生人初來乍到，立即可以感受到一種新的氣象和活力。盧作孚創設了一個新的節日──「夏節」，以幫助民眾休閑避暑，且寓教於樂。在「夏節」期間，民生公司展出電車、飛機和輪船等內陸地區人們很難見到的現代化交通工具的模型，並配以詳細的解說。兼善中學舉行科學展覽，有機械農具、農產品和動物標本、書畫，讓市民流連忘返。民眾不僅踴躍參加各項活動，整個北碚的空氣「簡直是被一種新的精神燃燒著，充滿了動的活力」。盧作孚本人熱愛川劇，還親自改編川劇，忙裡偷閑編寫了《碰碑激子》、《救定遠》等劇本，上演後深受民眾之喜愛。一九二八年，北碚修建了一座寬敞的民眾體育場，次年在此召開了四川近代體育史上規模最大、參加面最廣的運動會。盧作孚還將北碚過剩的廟宇改造成學校和

博物館，一開始人們害怕神仙降罪，但看到盧作孚一天比一天生龍活虎，大家也就欣然接受並享受這樣的結果了。

北碚的鋒芒蓋過了重慶和成都兩座大城市，美國《亞洲》雜誌撰文稱讚「北碚是迄今為止中國城市規劃的最傑出的例子」。其實，北碚並無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這個人口不到十萬的小城市，就物質的「現代化」而言，無法跟中國沿海的任何一個都市相提並論。那麼，北碚的魅力或者變化體現在哪裡呢？它憑什麼短短數年間就蜚聲中外呢？「北碚模式」的特色在以「精神」和「人的現代訓練」為重。經過盧作孚培訓的一支由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組成的團隊，深入社區和家庭，宣講文化和科學知識。民間流行的賭博、迷信、吸食鴉片等陋習幾近絕跡。如盧作孚所說：「這十萬人的行動都變了，變成：都有新的技術去工作，都有新的組織去工作；都能識字，都好求學，由不讀書變成好讀書，由無知識變成有知識；不僅懂得油鹽柴米，尤要懂得本鄉本土的公共事情，更進而明白這個國家，認識這個世界。」[8]

這些在數年間因陋就簡草創起來的事業，卻使北碚呈現出無限蓬勃的生機，各界人士紛至沓來且讚不絕口。

一九三○年，學者翁文灝與中國科學社的任鴻雋等人訪問重慶，專程趕到北碚參觀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他建設。翁文灝對盧作孚和北碚的建設讚嘆不已，他在一份報告中說：「於此水鄉山國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練兵防匪之餘，修鐵路，開煤礦，興學校，倡科學，良出意計之外。更觀之川中軍界政界，頗多頹敗不振之氣，而能布衣粗實，節餉捐薪於建設之事，無論其將來成績如何，要其不囿於環境，卓然獨立之精神，良足尚焉。」[9] 此後，中國科學社受邀在北碚召開年會，並稱讚「北碚本一小村落，自盧氏經營後，文化發展，市政畢舉，實國內一模範村也」。[10]

一九三一年，新聞界名人杜重遠參觀北碚之後，在給友人鄒韜奮的信中寫道：「北碚面積縱橫一百二十里，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以一人之力，不數年間而經營如此，孰謂中國事業難辦？黨國諸公對此作何感想？盧公四十許，思想縝密，眼光敏銳，處事勤奮，持身儉約，雖時至今日，仍短服布衣，出門向不用車轎。……弟之來川，以得晤盧公為平生第一快事。」[11] 盧作孚並非貌比潘安的美男子，待客亦只是粗茶淡飯，卻能讓閱人無數的杜重遠為之折腰。

一九三四年，銀行家、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到四川實地考察實業，參觀了北碚的建設試驗之後，為北碚建設的成果和北碚民眾的精神面貌「感動得至於流淚」，並決心幫助北碚的建設事業及民生實業公司。[12]

教育家陶行知認為，北碚的建設「可謂將來如何建設新中國的縮影」。[13] 盧作孚也有這樣的期待，他曾充滿激情地宣告說：「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建設起來，先曾以北碚這個小小的地方做一度經營的實驗，懸出了一個理想，叫做『將來的三峽』。最初進行起來頗困難，但畢竟能建設成功一個這樣的局面。尤以遷建事業機關的幫助，兩三年內完全實現了原來的理想。從這小小地方的經營，可以證明：中華民國是可以建設起來的，是能夠建設起來的；使別的國家也認識中國，必決有希望，有前途。」[14] 若非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及此後又爆發國共內戰，盧作孚的願景未嘗不可能變成現實。那麼，中國當代的歷史，將避免多少的腥風血雨、困頓悲情？

現代化需要喚醒民眾。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當人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能力，當他們開始認為自己能夠理解並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會之時，現代性才開始。現代化首先在於堅信人有能力通過理性行為去改變自然和社會環境。」[15] 讓每一個人成為獨立自主的公民，讓每一個公民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這就是盧作孚的努力方向。如果說國共兩黨是以「民族」和「階級」這兩個新的概念喚醒民眾，進而「喚醒中國」，建立「黨治國家」的模式，而這種方式必然將不同意見的人清除出「國民」的行列[16]；那麼，盧作孚是靠著法治和道德，靠著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中的精華部分，靠著他自己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的勇氣和毅力，改變北碚、改變四川乃至改變中國。

國共兩黨「喚醒中國」的方式，是如此迅猛、劇烈、殘暴，最終滿足的是少數野心家的權力欲望；而盧作孚「喚醒中國」的方式，則是如此溫和、篤行、開放，只有聖徒般的人物才能踐行這條「少有人走的路」。然而，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最終拋棄了盧作孚的模式，選擇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模式。

盧作孚背後的四川軍閥們

論及軍閥，尤其是內戰不斷的四川軍閥，主流的歷史敘述將他們貶斥得一無是處。人們所引用之史料，往往也是左派文人的一面之詞。比如，二十年代旅居外省的四川同鄉社團，曾在通電中如此描述四川軍閥的暴行及四川民眾的苦難：「川省養兵百萬，巨酋六七，全

身割據，有同異國。兵愈打愈多，帥時離而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為擴張私利，保存實力，誅求民眾，剝削地方。橫徵暴斂，已預收民國五十餘年之錢糧；兵連禍結，實演成省內四百餘次之戰亂。杼軸胥空，興髮已竭，政府無救焚拯溺之師，人民有吸髓敲骨之痛。」[17] 文字琅琅上口、鏗鏘有力，極具感染力。此類描述固然不全是捕風捉影，但豐富的歷史絕非只有此種單一的面向。

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季林指出：「中國的軍閥時期不是一個沒有任何收穫的戰爭時期，而是一個見證重大變革的轉型時期。沒有這些重大變革，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統一和近代化都將是不可能的。」[18] 軍閥的統治必然遵循一定的理性：既然仰賴駐地的人民提供給養，他們一般不會如流寇般竭澤而漁。劉湘的第二十一軍對重慶的內外貿易徵收賦稅，但避免對商業徵收「壓榨式」的賦稅，還注意與商業圈保持良好的關係。作為「領地相對穩定的軍政府」，其轄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狀況呈現朝良性發展之態勢。軍閥們支持發展了一系列驚人的進步活動，他們熱衷於辦學校，也鼓勵商業貿易。在重慶、萬縣、宜昌等內河港口，國際貿易值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間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間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五。[19] 軍閥並不全是嗜殺的屠夫，更不會執著於某種意識形態而「以理殺人」。軍閥不會像蔣介石那樣悍然發動二二八屠殺，也不會像毛澤東那樣熱衷於製造「人禍」而導致數千萬平民活活餓死──僅四川便有超過一千萬人死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

毋庸諱言，盧作孚經營民生航運公司的成功，和建設北碚「特區」的成就，離不開執掌地方軍政大權的軍閥的支持。盧作孚與川軍各路軍閥均保持良好的關係，早年他曾在軍閥楊森的支持下，在成都從事大眾教育，興建圖書館、博物館。盧作孚著眼於春雨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建設與教化，反對摧毀一切、打倒一切的暴力革命。後來，因為楊森戰敗下野，此項工作不得不告終。

盧作孚的改良方案，得到大多數四川軍閥的認可。清末四川爆發保路運動，清廷從湖北調動軍隊入川鎮壓，這才使得武漢防禦空虛，武昌起義一舉成功。四川人向來不願臣服中央政府，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入民國之後，四川始終處於各路軍閥混戰的局面之下。而共產黨及左翼思想也趁機在四川滲透和發展。共產黨員吳玉章、劉伯承等人以四川特派員名義，煽動軍隊起兵、民眾暴動，四川局勢愈發緊張。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紀念日，被共產黨控制的國民黨四川黨部居然公開散發署名「中國共產黨四川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宣言傳單。三月三十一日，重慶發生三萬人參加

的反英市民大會，衛戍司令王陵基派兵鎮壓，士兵對民眾開槍。參加大會的人，或中流彈，或因擠迫踐踏，死傷數百人，釀成「三三一」慘案。[20] 這是「四一二」清黨之前，國共鬥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事件，而犧牲的大都是無辜民眾，國共兩黨都難辭其咎。血的教訓讓四川軍閥和民眾都認識到維持地方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而盧作孚扎根地方、默默耕耘的做法，比那些高舉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黨徒更能造福家鄉父老。

盧作孚的峽防局局長的任命，來自於剛剛接受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番號的劉湘。早期峽防局的經費也由劉湘撥給，一九三○年六月，盧作孚致信熊明甫等，指示熊明甫「親見劉湘，面陳北碚峽防局的種種困境」，向劉湘「商借預支補助費」。另一方面，盧作孚在北碚事業的成功，使得二十一軍因「新」北碚的出現逐漸改變了在全國公眾中的負面形象，北碚為劉湘的主政四川增添了若干合法性資源，劉湘當然樂於支持盧作孚大刀闊斧的地方建設。

一九三一年八月，劉湘率領麾下的一眾高級將領，乘坐民生公司的輪船到北碚考察，冒雨參觀了北碚的各項事業──三峽染織廠、地方醫院、中國西部科學院、平民公園、動物園、民眾俱樂部、兼善中學等。劉湘對峽防局全體職員發表演講，鼓勵說：「大家重新立起信仰，很穩重地幹著，確是極重要的。如此不說是社會上破天荒的事業，卻也是有數的了。」劉湘還稱讚「峽防局像一股清泉」，並非「西洋式徒供消耗奢侈的洋八股」。當劉湘嚴厲鎮壓四川地區中共的活動並參與追剿經過四川邊境的紅軍的同時，對於以盧作孚為代表的體制內成長起來的溫和的變革力量，卻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21]

除了劉湘，其他川軍將領也受邀到北碚參觀，如二十軍軍長楊森、二十八軍副軍長兼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藍文彬師長、王陵基師長、王纘緒師長等。北碚的建設成績觸動了川軍各路將領，他們在各自的防區內像比賽一般推動基礎建設。盧作孚欣喜地發現，他的激勵策略奏效了：各軍都在修馬路，許多城池、市鎮和名勝都可以順利到達了。從成都到重慶，如今只需要一天；從成都去峨眉，還不需一天時間。四川已經有了四千多公里的馬路。大小城市翻修得整齊清潔，各地還修建了公園、運動場和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在戰亂中的四川，居然透露出幾許欣欣向榮的氣象。

那一代的軍閥大都受過傳統教育，知書達禮、尊師重教，沒有哪個軍閥會像毛澤東那樣從心底裡仇恨知識分子，甚至以摧毀文教機構、文化遺產為樂。為了改善「武夫」的形象，軍閥們樂於投資辦教育。比如，第二十一軍第二師師長王纘緒，在重慶創辦了巴蜀小學，請盧作孚幫助其聘用校長。經黃炎培的牽線，教育家周勗成答應就任

巴蜀小學校長。當周勗成乘船從江蘇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時，前去歡迎者有數百人之多，王纘緒和盧作孚亦親自去迎接。如此隆重的禮遇，在四川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周勗成深受感動，從此以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心情，廢寢忘食地教書育人。幾年之後，巴蜀小學果然名揚全川。[22]

受盧作孚和北碚建設之啟發，李家鈺將軍在其駐守的華陽、遂寧、安嶽、樂至、潼南、蓬溪等縣內銳意改革，於地方建設中推行輕稅減徭，嚴厲官箴，嚴懲貪瀆。李家鈺創辦了成績斐然之遂寧高中，修築簡順、遂潼公路，規劃射洪、蓬溪水運，設鄉村電話，闢各縣公共公園，立慈善機構，賑撫災民，一時軍民各安其樂，欣欣向榮。[23]

盧作孚不僅影響了川軍將領的思想觀念，更以中立者身份調解各將領之衝突。他撰寫文章呼籲各將領團結合作，建立全省之「公共理想」。他更與各界人士一起努力，於一九三一年促成了四川的三個軍事首腦──劉湘、劉文輝、楊森──共同召開「三軍長聯合會議」，討論如何結束內戰與建設四川。盧作孚在會議上呼籲說：「今天以後的中國，應靠法治，不能靠人治。……如果四川政治上的領導者，能領導人們上此軌道來，我們相信很容易地打破防區制度，而為分共制度；很容易變衝突為合作，很容易統一四川，並幫助中國統一。」[24]

一九三一年，盧作孚赴北方考察，到大連時曾去拜訪擔任過四川勸業道台的實業家周孝懷（周孝懷也是民生公司董事），與之暢談四川及中國的局勢。關於統一問題，周說：「民國以來，袁世凱有了一個好機會，蔣介石有了第二個好機會，都把中國弄不好，真可惜了。進步不一定要統一，能夠像四川那樣不統一而在經營地方上比賽著努力，比統一還要來得活躍些。」盧則回答說：「統一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用武力一部分、一部分地打下去。這個方式已經有十九年的證明不成功了。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各經營各的地方，一件事、一件事地逐漸聯合起來，最後一切統一。」[25] 可見，盧作孚大致贊同國家統一，但反對武力統一。他所期望的國家統一，是符合民眾意願和民主程序的統一。後來，國共內戰爆發後，著名報人王芸生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指出：「論武力，講打，最後不論誰打倒誰，必然都是武力統一。武力統一了，必然沒有是非，一切服從暴力，那非但不會有民主，還要製造更大的戰亂。那樣是國家的不幸，人民遭殃，憑持武力者本身也終必慘敗。靠武力，講打，頂多打出一個秦始皇來，頂多打出一個拿破崙來，然而秦始皇與拿破崙的帝業又如何？」[26] 盧作孚一定心有戚戚焉。

盧作孚的晚年，不由自主地迎來共產黨以武力實現的大統一局面。天真的盧作孚對共產黨政權抱有相當的幻想。殊不知，共產黨的那種「統一」，不單單是國家政權的統一，更是政治模式、經濟發展方式、文化教育乃至思想和言論的絕對「統一」，是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要嚴酷一百倍的「黨天下」專制主義。那樣的「統一」，必將吞噬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設，乃至他一生的理想與追求。

盧作孚為何自殺：士可殺而不可辱

國民黨高官張群稱讚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實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盧作孚當之無愧。

一九四四年，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發表了一篇盧作孚的專訪，如此描述盧作孚的家居環境：「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家裡唯一一件『高級』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買的小電扇，漆都褪盡了，破舊不堪，毛病不少。」孩子們的衣服、鞋子都是盧作孚的夫人親手縫製的。抗戰時，盧作孚身居全國糧食局長之高位，有一次病倒，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卻因無錢而只好作罷。

然而，當共產黨用武力奪取天下之後，連這樣一位刻苦己身、幾近聖徒的人物都容不下。盧作孚昭示了與共產黨的「中國夢」截然不同的願景，其溫文爾雅、誠樸勤苦的品質與毛澤東的虛偽暴虐形成鮮明對比，因此共產黨和毛澤東一定要置他於死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盧作孚與好友晏陽初自危城重慶飛赴香港。此後，晏陽初一直在東南亞從事鄉村建設活動，而盧作孚在香港停留半年之後回到了政權更迭的中國—或許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左右了他，或許是中共的說客向他灌輸了太多甜言蜜語。與此同時，同樣是航運業經營者、當時的資產和聲望都遠遜於盧作孚的董瑞昌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

一九二七年，盧作孚的事業已經蒸蒸日上，比他晚一輩、年僅十

六歲的董瑞昌剛剛考取天津航業公司的學徒。此後，董瑞昌三十歲就被提拔為輪船同業公司常務理事，隨即出任航業公司助理。他乾脆將名字改為浩雲，取「浩如雲海，前程無邊」之義。一九三七年，董浩雲成立了自己的中國航運信託公司。一個月後，他的第一個孩子出身，取名董建華—也就是日後的第一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一九四九年，董浩雲從上海出走香港，以香港這顆即將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東方之珠」為基地，向全球拓展航運業。到了七十年代，他已建立起一個超過千萬噸的船隊，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船王」。[27] 如果盧作孚留在香港，將民生公司由長江航運轉型為遠洋航運，他的事業必將綻放出第二春，其成就未必遜色於董浩雲。兩代船王，在香港擦肩而過。

一九五一年年底，中共基本肅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在農村完成了土地革命，遂在城市發起「三反」運動。表面上是反對黨政軍幹部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但在運動進行過程中，當局巧妙地將矛頭轉向「利用人性的弱點」，「引誘」和「腐蝕」幹部，乃至向黨「猖狂進攻」的資本家群體。一個月之後，「三反」變成「五反」，毛澤東嚴厲指責大中城市的私營工商業主施放「五毒」，禍害國家。「五毒」就是「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罪行。毛澤東號召群眾檢舉和鬥爭，非將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不可。 [28]

既然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上下便一起行動。這是一場小型文革的預演：到處都是逼供信，到處都是工商業主被捕被鬥，他們在鬥爭大會上遭到與土地革命中的地主同樣的待遇，戴高帽子，遊街示眾。在飽受肉體折磨和精神羞辱之後，很多人還要認賠認罰，賠款和罰金之鉅，即便傾家蕩產，也無以應付。僅上海一地，一個月間便有超過兩百名資本家被捕，四十八人自殺，服毒、懸樑、投水、跳樓，不一而足。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每天都殘忍而輕浮地詢問秘書：「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董浩雲若不走，必定是「空降兵」中的一員。

覆巢之下無完卵。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民生公司內部開會，強迫盧作孚檢討。盧作孚一再申訴說，「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我一生沒有土地，沒有私人投資，私人沒有銀行往來，沒有回扣，沒有受禮物」，說到激動處，潸然淚下。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抹黑為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他要維護一心為國為民的一世清名，這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線。

二月八日上午，盧作孚再次參加民生公司「坦白檢舉大會」。公股首席代表張祥麟作動員報告，並主動引火燒身，聲稱差一點中了盧作孚的「糖衣炮彈」。盧的隨身通訊員關懷當場揭發：盧曾請公股代表吃便飯、看京戲，同去理髮代付錢。其實，這些開銷，都是盧作孚從自己的工資中支付的。但是，當時群情激憤，已經無人願意聽盧的解釋了。

這名盧作孚「平日最關心、最親信的十七八歲的通信員」的反戈一擊，澈底摧毀了盧作孚的生存信念。正如學者錢理群分析的那樣，盧作孚最為自豪的，是他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塑造的民生公司的企業理念：「披肝瀝膽，推心置腹，以相糾其短，相攜於義」。如今，卻由公司內部人的「揭發」，將作為公司「靈魂」的「和氣」頃刻瓦解。顯然，這是公司內部的共產黨組織精心策劃、蠱惑所致。盧作孚當然知道，共產黨所要打擊的，不僅是他個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個民營企業。這是共產黨要學習蘇聯、建立國有經濟，控制並最後消滅私人資本的第一個信號。 [29]

當晚，盧作孚在家中服毒自殺。晚八時許，夫人蒙淑儀發現盧作孚服毒後，向民生公司求救。此前早已背叛盧作孚的副總經理童少生攜公司醫護人員趕來作了簡單救治，張祥麟十一時後才趕到現場。十一時四十分，盧作孚逝世。令人不解的是：仁濟醫院離盧家僅兩百米，三個多小時內，兩位實權人物竟未將盧送醫院搶救。此後，這兩個賣主求榮的人物都獲得中共重用。 [30]

隨後，民生公司立即轉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幾乎全部入獄，其中兩人被殺。官方〈關於盧自殺的報告〉及「內參」報導中，對盧作孚潑盡髒水；面對員工自發的悼念，組織上提出要「澈底摧毀盧作孚思想的統治」。同年九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營，成為毛澤東褒揚的樣板。

盧作孚的後人和研究者在談及盧作孚的自殺時，大都語焉不詳，甚至說毛澤東對盧的去世表示哀痛，毛還說過，近代中國工業化有四位不能忘記的人物—張之洞、張謇、范旭東和盧作孚。然而，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毛澤東是殺害盧作孚的兇手，對兇手的諂媚乃是對受害者的第二次謀殺。錢理群指出，盧作孚與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對新中國的理解與想像，以及如何建設新中國這樣的基本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階級鬥爭為中心；是發展和節制私人資本，還是消滅私人資本；是建設相互信賴和幫助的和諧社會，還是建設階級對立的鬥爭社會，彼此的意見和主張針鋒相對。毛澤東堅持要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方式來解決分歧；毛澤東和共產黨又掌

握著不受限制和監督的絕對權力，盧作孚不過是共產黨請來的「客卿」。[31]

盧作孚生於一八九三年，與毛澤東同齡。在其同齡人中，還有宋慶齡和梁漱溟。孫文的遺孀宋慶齡寧可放棄「中華民國國母」的榮耀，也要保持第三國際秘密黨員的身份。她不願跟隨妹夫蔣介石、妹妹宋美齡遷居台灣，而選擇留在毛澤東的「新中國」。結果，宋慶齡晚年受盡屈辱，在大躍進期間不得不響應毛的號召在居所外修建煉鋼爐，而在文革中連父母的墳墓都被紅衛兵毀壞，她宛如一名囚徒，想離開中國而不得。

梁漱溟則公開與毛澤東發生了一場衝突。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在政協常委會上反映農民生活困苦，毛澤東惱羞成怒地辱罵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一九五五年，中共對梁漱溟的文化、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開展全面公開批判，當時被批的，還有梁思成（與梁漱溟合稱為「二梁」），以及胡風和胡適（被稱為「二胡」）。

與多活了三十多年的宋慶齡和梁漱溟相比，盧作孚選擇「臨難毋苟免」，終能「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汙淖陷渠溝」。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掌權，自稱「撥亂反正」，中國卻再也沒有正氣和正義了。既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共太子黨們個個都變得富可敵國；而「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將人性中最為幽暗與邪惡的那一部分淋漓盡致地激發出來。毒奶粉、毒疫苗、地溝油、山寨版充斥中國。中國再無世外桃源般的北碚，世間再無冰清玉潔的盧作孚。[32]

13 張幼儀

在塵埃中綻放的花朵

在中國，女人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後，得聽父親的話；結婚以後，得服從丈夫；守寡以後，又得順著兒子。

—張幼儀



一九一三年，時任浙江都督府秘書的張公權（嘉璈），被一篇〈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的中學生作文所吸引，詢問之下，得知文章作者是海寧縣硤石鎮富商徐申如的獨子徐志摩。愛才心切的張嘉璈當晚給徐申如寫信，提議將自己的二妹張幼儀許配給徐家公子。徐申如雖是江浙富豪，但在重文抑商的中國傳統社會裡，能夠與書香世家的張家結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榮耀。徐申如在回信中恭敬地表示：「我徐申如有幸以張嘉璈之妹為媳。」

這段故事有點像主考官李端棻將堂妹許配給考生梁啟超。一八八九年，十六歲的梁啟超赴廣州參加鄉試，正考官為內閣學士李端棻，副主考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試後，梁啟超中第八名舉人。王仁堪深感人才難得，想將梁招贅入婿，未及開口，李端棻卻請王仁堪作媒，要將其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於是，王仁堪派人到新會將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接來廣州，梁寶瑛答應了這門親事。婚後，梁啟超與李蕙仙舉案齊眉，育有梁思順、梁思成、梁思莊等三個子女。

然而，張公權促成的妹妹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婚姻卻是一場噩夢。

一九○○年，張幼儀出生於江蘇寶山，是家中第二個女孩。三歲那年，母親曾給她纏足，到了第四天早晨，再也忍受不了妹妹尖叫聲的二哥張君勱出面阻止。就這樣，她成了張家第一個天足女子。但是，在徐志摩眼裡，僅僅擁有天足，並不等同於新女性，多年後，張幼儀回憶說：「對於我丈夫來說，我兩隻腳可以說是纏過的，因為他認為我思想守舊，又沒有讀過什麼書。」其實，在那個時代，她已經是少數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結婚之前，年方十五歲的張幼儀正在江蘇都督程德全創辦的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只是為了完婚，才不得不中止學業。

那個時代的婚姻，大都由父母或兄長包辦。尤其是大戶人家的子弟，即便接受過新式教育，也要順從家長安排。胡適與江冬秀湊合著過了一輩子，兩人的「幸福指數」大概都很低；魯迅拋棄了作為「母親的禮物」的朱安，與許廣平結婚，朱安卻成了更無辜的犧牲品。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徐、張雙方的家長為張幼儀和徐志摩操辦了一場隆重的舊式婚禮。洞房花燭夜，張幼儀想要告訴徐志摩，她感謝命運的安排，現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她願意好好地侍奉他們。但張幼儀所受的傳統教育不允許她先開口。十八歲的徐志摩緊張地望著她，一句話也沒有說。二人之間的夫妻生活，是在沉默中開始的。

徐志摩與林徽因、陸小曼的傳奇戀愛故事，傾倒後世無數追夢的少男少年，誰又不願永遠生活在「人間四月天」呢？張幼儀卻是躲在陰影中不被眾人知曉的女子。她幸運地擺脫了纏足這種肉體的摧殘，卻未能脫離中國儒家專制文化的束縛──要改變「精神上的小腳」難於上青天。直到後半生，她才如同一朵花，在塵埃中傲然綻放。

徐志摩的朋友葉公超說過，徐志摩是一個唱歌的人。葉公超說，徐志摩也寫小說，他的小說和他的詩、散文一樣，都脫離不了浪漫主義的色彩：「徐志摩這個人一開口就在歌唱。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說話的人，一種是唱歌的人；說話的人無論採取哪種方式，其結果都是在說話。唱歌的人，一開口就會有美妙的聲音，志摩就是這種人。」[1] 如果說徐志摩是唱歌的人，張幼儀就是說話的人。徐志摩的歌唱和張幼儀的言語，從未發生過共鳴。

沒有愛情的婚姻有多痛苦

一九一八年，張幼儀生了兒子阿歡（徐積鍇），徐家長子長孫的誕生，標誌著徐志摩為家族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同年八月，徐志摩前往美國，進入麻塞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歷史系學習。從結婚到出國留學，他和張幼儀結婚將近三年，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四個月，用張幼儀的話說，「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義務之外，對我不理不睬。就連履行婚姻義務這種事，他也只是遵從父母抱孫子的願望罷了」。

一九二○年，徐志摩前往英國繼續學業。次年春天，張幼儀赴英探親。船靠岸時，接船的人密密麻麻，張幼儀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丈夫：「我斜倚著尾甲板，不耐煩地等著上岸，然後看到徐志摩站在東張西望的人群裡。就在這時候，我的心涼了一大截。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絲巾。雖然我從沒看過他穿西裝的樣子。可是我曉得那是他。他的態度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不會搞錯的，因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當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兒的表情的人。」徐志摩的熱情、豪爽，全都是留給朋友的，一點也不給他不愛的妻子。

張幼儀本以為出國後可以重拾因結婚生子而中斷的學業，沒想到卻被迫充當家庭主婦，買東西、洗衣服、打掃房間，與準備一日三餐。揮霍無度的徐志摩，只從父親寄來的支票中拿出很少一部分，交給她維持家用。徐志摩對張幼儀的態度惡劣而粗暴，對剛到英國不懂英文也不懂英國禮儀的張幼儀毫不體貼。那時，他們在劍橋郊外的沙士頓居住，張幼儀常常以淚洗面，她後來回憶說：「經過沙士頓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領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徐家。我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兩隻腳站起來。」

很快，張幼儀又懷孕了，徐志摩常常不回家，也不關心張幼儀和她腹中胎兒。七弟張景秋建議說，姐弟倆可以一同前往德國留學，二十年代初的德國物價很便宜。一九二二年，張幼儀與張景秋來到柏林，她剛生下二兒子彼得，徐志摩就託人送來離婚協議書。

在張幼儀的一再堅持下，徐志摩答應前來德國見面並商談離婚事宜。那一天，在場的還有徐志摩的同學金岳霖、吳經熊等人。徐志摩冷酷地說：「你一定要現在簽字……林徽因要回國了，我非現在離婚不可。」直到此刻，張幼儀才知道徐志摩愛的是林徽因。

張幼儀內心不願意離婚，但她不是那種死纏爛打的反抗者，她冷靜地回答說：「若你認為離婚是正確的事，我就簽字。」她在徐志摩已經簽名的離婚協議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徐志摩如釋重負，歡天喜地地向張幼儀道謝，這才提出要去看看剛出生的孩子。他在醫院育嬰房的玻璃窗外看得入神，但始終沒問張幼儀要怎麼養這個孩子，要怎麼活下去──他的心早已隨林徽因父女飛回了中國。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徐志摩在《新浙江》上刊登〈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我們已經自動掙脫了黑暗的地獄，已經解散煩惱的繩結……歡歡喜喜地同時解除婚約……」歡喜的是徐志摩本人，他從來沒有關心過張幼儀是什麼感受。

離婚後，張幼儀心境悲苦，但她並未就此消沉。她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一生恪守中國傳統道德，晚年曾對侄孫女張邦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一個人。」張幼儀並非徐志摩所鄙視的那種「土包子」，更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張家的文化素養優於徐家，在英國和德國的生活與求學經歷，讓張幼儀向西方女性學習，磨練出獨立、自由、堅韌的品質。

張幼儀發現，中國的幼兒教育相當落後，便申請進入裴斯塔洛齊學院，攻讀幼稚教育，希望回國後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幼教專業的同學大部分是女生，是比張幼儀年輕好幾歲的少女。雖然是一名「曾經滄海難為水」的離婚少婦，但張幼儀東方女子的外表仍顯得很年輕。她坦率地將自己離婚並獨自撫養兒子的背景告訴同學，那些單純的德國女孩對她十分同情和敬佩。學校裡每天下午都有咖啡時間，同學們邀請她一起喝咖啡和聊天，順便幫助她提高德語水準，更幫助她減輕「斷腸人在天涯」的哀愁。 [2]

此時，追求者亦來到張幼儀身邊。那是一位不亞於徐志摩的才華橫溢的青年男士：正在德國留學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羅家倫。羅家倫常來張幼儀家中拜訪，陪同牙牙學語的小彼得玩耍。有一天，羅家倫與張幼儀坐著喝茶，彼得在地板上的一塊毯子上玩耍，羅家倫問：「你打不打算再結婚？」張幼儀沒敢把羅家倫這句語氣溫柔的話聽進耳朵裡，她看著茶杯輕聲說：「不，我沒這個打算。」那時，張幼儀的四哥張公權寫信告訴她，為了留住張家的顏面，她在未來五年內，都不能教別人看到她和某一個男人同進同出，要不然別人會以為徐志摩和她離婚是因為她不守婦道。後來，羅家倫就從張幼儀的生活中消失了。再後來，羅家倫恢復了與女友張維楨的通信，繼續他們的愛情長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兩人在上海舉行婚禮結為夫妻。多年後，羅家倫的後人在其遺物中發現一張羅家倫給張幼儀的沒有寄出的明信片。

就在張幼儀展開新一階段生活的同時，徐志摩的求愛卻被「一生最崇拜」的林徽因斷然拒絕。林徽因選擇不如徐志摩風流瀟灑、卻比徐志摩沉穩樸實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做相伴一生的丈夫，這是林徽因的聰慧之處。林徽因知道，像徐志摩這樣「生活在雲端」的人，可以成為朋友，卻不適宜做丈夫。[3] 徐志摩企圖在人世間尋求一種完美的愛、完美的善和完美的生命，而不願被家庭模式所束縛。當徐志摩愛的對象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也就意味著他的愛走到了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果然，徐志摩對林徽因的愛並非持久且永恆（至少比不上暗戀林徽因而終身未婚的金岳霖），他很快便將熾熱的愛轉移到別人身上——新的目標是作為有夫之婦的陸小曼。跟徐志摩一樣為了愛情可以不顧一切、好似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郁達夫評論說：「當一個坦白美麗如陸小曼的女人，遇到一個熱情誠懇如徐志摩的男人，自然會迸出熱烈的火花來。他們怎顧得了禮教倫常？又怎顧得了宗教家規？當這件事情成為北平社交閒話的笑柄時，我對小曼的勇敢和志摩的真誠，寄予無上的欽佩。」郁達夫跟王映霞之間不也是如此嗎？郁達夫對徐志摩當然有惺惺相惜之感。但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毫不留情地批評說：「萬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欲弟之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撲風。」一九二六年，在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禮上，作為證婚人的梁啟超對兩人大加斥責，在場人士無不面面相覷。

徐志摩的朋友、畫家劉海粟曾如此回憶與徐志摩的一番談話：

> 那天隨適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陸家，就已經覺察到志摩和小曼眼神不對，似乎心神不寧的樣子。那時，他們已經難捨難分了。
>
>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間裡來，我感覺到他想和我談什麼，又似乎有難言之隱，忙問：「你有什麼心事？」「怎麼？你看出來

了？」

我單刀直入地問：「老實講，和小曼相愛多久了？」

「你怎麼知道？」

「你們的眼睛告訴我的。」

「我和她認識才兩年多，現在已經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儀之間的關係呢？」我問。

「我和幼儀也是強撮合的，這一點，她哥哥歆海最清楚。」

的確，張歆海和志摩始終融洽無間，他是能理解和體諒志摩與小曼的。因此，他一直秉公而論，不加諱言。志摩也一直感激他。[4]

徐志摩將自己視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對於張幼儀來說，他是冷酷自私的加害者。他們的這段婚姻確實是「強撮合」的，但張幼儀為徐志摩生了兩個孩子，張幼儀就不僅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他孩子的母親。徐志摩固然有不愛張幼儀的理由，但不能不盡父親的職責。徐志摩做到了嗎？他的第二個孩子彼得在柏林夭折，他不聞不問，只是對著孩子的骨灰盒掉下幾滴眼淚而已。長子阿歡由張幼儀與徐志摩的父母撫育，徐志摩與兒子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數。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就在跟陸小曼結婚後兩個月，徐志摩給張幼儀寫信，用油腔滑調的口吻說：「你們那一小家庭，雖是新組織，聽來倒是熱鬧而且有精神，我們避難人聽了十分羨慕。」[5] 所謂「新組織」的「小家庭」，是張幼儀依附兄長暫時寄居的地方──要等到二十七年之後，張幼儀才自己成家。徐志摩之毫無愧疚、全無心肝，可見一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在濟南黨家莊附近墜毀，留下的是一具面目模糊的屍體。當時，其合法妻子陸小曼因長期吸食鴉片，在此沉重打擊之下更是精神恍惚，連去認領屍體的工作都不願承擔。於是，張幼儀毅然出面，冷靜果斷地處理有關事務：先讓八弟禹九帶領十三歲的阿歡前往濟南認領徐志摩的遺體，然後周密安排一切後事。在公祭儀式上，陸小曼突發奇想，要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換成西式的，卻遭到張幼儀的堅決拒絕。

民國第一位女性銀行家

一九二七年初，張幼儀的母親去世，張幼儀帶著阿歡回上海奔喪並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國最西化的城市，當時的觀察家感嘆說，上海的生活「如同萬花筒一般」。[6] 張幼儀先在東吳大學任德語教師，然後又創辦幼稚園和小學，她已是一名自力更生的新女性。這一點，兩年以後跟張幼儀再次會面的徐志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徐志摩在寫給陸小曼的情書中，破天荒表達了對張幼儀的敬重之情：「C（張幼儀）可是一個有志氣有膽量的女子，她這兩年來進步不少，獨立的步子已經站得穩，思想確有通道……她現在真是『什麼都不怕』，將來準備丟幾個炸彈，驚驚中國鼠膽的社會，你們看著吧！」

對於精神世界足夠強大的人來說，厄運是自強的催化劑。張幼儀說：「我一直把我這一生看成兩個階段：『德國前』和『德國後』。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一文中，對張幼儀的評價最為中肯：「她沉默地堅強地度過她的歲月，她盡了她的責任，對丈夫的責任，對夫家的責任，對兒子的責任，……凡是盡了責任的人，都值得令人敬重。」這位被自己的男人看不上的女人、這位不曾被丈夫愛過的「棄婦」，在身處絕境時毅然轉身，成為受人尊崇的女強人。

當張幼儀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東吳大學教授第二個學期的課程時，有幾位上海儲蓄女子銀行的股東前來拜訪她。她們希望張幼儀到這家銀行做事，因為她在西方受過教育，更重要的是她的四哥張公權是中國銀行總經理，又是《銀行周報》這份討論中國政治與經濟問題的刊物的創辦人，是二十年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之一。[7] 此前，張幼儀並沒有在銀行業工作過，但她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她答應出任上海女子儲蓄銀行的副總經理，但不做總經理，「我心想，如果我哥哥是一家銀行的總經理，我是另一家銀行的總經理，那成什麼樣子」。[8]

張幼儀在銀行界嶄露頭角，當然離不開她的四哥張公權的幫助。一九二○年代，作為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一個群體，銀行家取代了過去「票號」老闆的地位。張公權是中國最早的銀行家之一，早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慶應大學，專攻貨幣銀行及政治經濟。一九一三年，張公權進入剛剛由大清銀行改組而成的中國銀行，任上海分行副經理。一九一六年，護國軍起，袁世凱政府命令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停止兌現存款。張公權認為，如果遵命而行，中國銀行將聲譽掃地，故抗命不從。不久，袁世凱憂憤而死，張公權不僅沒有受到中央政府的處分，反倒名聲大噪。[9]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蔣介石派人與張公權接洽，希望

獲得貸款支持。張公權在孫傳芳的嚴密監督之下，冒險匯去三十萬元。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間，又先後借給國民革命軍一百二十萬元。[10] 蔣介石為籠絡張公權，無所不用其極。當一九二七年初張公權的母親去世時，剛剛佔領江南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突然出現在張家靈堂，進門之後居然倒頭就拜，彷彿死去的是自己的母親。蔣介石正是通過這一攻心戰術，感動了張公權，在其財政最困難的時候得到張公權的大力幫助。[11]

然而，張公權很快發現，對金融家的態度，南京政府並不比北京政府更友好。蔣介石並不想建立一套現代金融體制，在蔣介石眼中，銀行只是他私人隨意提款的「錢袋子」。張公權幫助南京政府建立了中央銀行，但他哀嘆說：「軍人不明財政，而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一九二八年九月，張公權與蔣介石就政府年度財政預算問題發生公開爭執，蔣介石怒氣衝天，竟以將其投入監獄相威脅。[12]

不過，幸虧還有上海租界，張公權和銀行家們可以在租界裡繼續其事業。後來，張公權和張君勱（嘉森）都曾在國民政府擔任高官，但他們從未與蔣介石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國民黨的統治在中國大陸崩潰之後，張公權不願去台灣，先赴澳洲大學講學，又應邀到美國加州大學、史丹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講學，出版有《通貨膨脹的螺旋：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年在中國的經驗》等著作，闡述中國通貨膨脹的歷史背景，國民政府管理通貨膨脹的努力及其失敗之因。台灣將此書列為禁書。

張公權掌管中國銀行多年，參與制訂中央財政政策，卻兩袖清風、耿介清白。擔當國事，艱苦精勤、任勞任怨；事不可為，則斷然求去，無求於人。他晚年無力在美國購房，最後還是靠友人陳光甫、李銘的資助才得以安家。一九七九年夏，同樣旅居美國的近代史家郭廷以為張公權撰寫一生大事記。當年九月，郭廷以就因病去世，接著由郭廷以的學生姚崧齡撰寫該書。一九七九年，張公權以九十一歲高齡在史丹佛大學醫院去世。[13] 張氏兄弟包括張幼儀以及他們龐大的家族，都沒有去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當然更不會留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他們遠走歐美各國，總算免於遭受威權或極權政治的迫害。

也許，作為哥哥的張公權對自己當年「錯點鴛鴦譜」導致妹妹婚姻失敗而深感內疚，故而要幫助妹妹在事業上開出一片新天地來。一九二七年，在張公權的支持下，張幼儀雖然只是出任副總經理，實際上卻是上海女子儲蓄銀行真正的掌舵人。這是一家現代中國獨一無二的銀行，它主要為女性服務，這說明在上海已經出現了一個需要金融

服務的職業女性階層。這家銀行是一九一○年由一群女性創辦的，往來客戶也多是女性，地點在市中心的南京東路上，很受老少婦女歡迎。張幼儀出任副總裁時，正是這家銀行瀕臨破產邊緣之際，她擔任的是「救火隊隊長」的角色。她當機立斷，說服債務人不要上法庭，因為銀行已經窮得連請律師的錢也沒有了。[14] 在四哥的幫助下，銀行渡過難關，起死回生，並逐漸贏得了上海婦女界的信賴。

為了幫助上海女子儲蓄銀行吸納更多資金，張幼儀開發出「儲金禮券」的業務。上海市民在親朋好友有紅白喜事時，喜歡贈送禮品。這些禮品一般由家庭主婦準備，這種禮券正好滿足她們的需求。她們只需去銀行購買禮券，而不必挖空心思斟酌購買什麼禮物。禮券比禮物更實用──收到禮券的人可自行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

抗戰伊始，上海婦女開展一場「獻金運動」，女子銀行積極參與，在活動的第一天，就收到金銀首飾和器皿等兩百多件，一時在上海傳為佳話。[15] 正如西方觀察家所說，「中國改革最重要的標誌應該是女性的新地位」[16] ，張幼儀等新女性的出現，使得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張幼儀每天上午九點整準時到銀行辦公室上班，她的辦公桌擺在最後面，整個銀行的狀況一覽無遺。她的分秒不差的守時習慣，是在留學德國期間養成的。每天下午五點，銀行下班後，她請一位國文老師來辦公室幫助補習一小時國文。她從十五歲起就中斷了正規教育，希望通過這樣的學習讓自己多瞭解一些中國的古典文學經典。

雲裳時裝：雲想衣裳花想容

六點鐘之後，張幼儀再到同樣位於南京東路的雲裳時裝公司處理相關業務。這是中國女性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時裝公司，由她的八弟張禹九、上海名媛唐瑛、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等合資創建。或許因為父親是公司的大股東，徐志摩自以為是老闆之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在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說：「我新辦兩家店鋪；新月書店老兄想必聽過，還有一家雲裳時裝公司，專為小姐、娘兒們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話嗎？」其言語之輕浮油滑讓人生厭。

當年，在剛剛嫁入徐家時，張幼儀從僕人口中得知，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嘴角向下一撇，充滿鄙夷地說了一句：「鄉下土包子！」徐志摩或許不曾想到，多年以後，被他蔑視的前妻居然成為時裝公司的老闆。

一九二○年代的上海，不僅是中國的工業、金融和文化出版中心，也是引領亞洲時尚的時裝之都。「上海的服飾多種多樣，上海人的穿著在中國最為時髦，靜安寺路、虹口市場、公共花園和騎手俱樂部廣場上的時裝秀非常有名，絲綢花樣繁多巧奪天工。」[17] 雲裳這家時裝店集成衣店和服裝訂做於一身，在店裡陳列一些衣服樣品，再配合女士們的品位和身材加以修改。服裝上面裝飾別致的珠子、釦子，還有花結，都別具匠心，顧客可以得意地向別人誇耀說：「我這衣裳是在『雲裳』做的。」徐志摩的朋友、名畫家李碧波常來店裡晃悠，靈感一來，還動手做一些設計，為時裝增添雅致的風味。[18]

「雲裳」的名字是張幼儀的八弟張禹九取的，典故來自於李白〈清平調〉中形容楊貴妃的句子「雲想衣裳花想容」。雲裳也善於做廣告，在《申報》上刊登廣告說，這是一家「空前之美術服裝公司」，「採取世界最流行的裝束，參照中國人衣著習慣；材料儘量採用國貨，以外貨為輔；定價力求低廉，以期普及」；「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到雲裳去；要配最有意識的衣服，到雲裳去；要想最精美的打扮，到雲裳去；要個性最分明的式樣，到雲裳去。」

一九二七年八月間，上海女界發起慰勞北伐前線兵士的遊藝大會，壓軸的正是雲裳策劃的「最時髦的『時裝表演』」。時裝秀由唐瑛親自領銜出演，一登場即大撒雲裳的廣告卡片，隨從模特兒也「把各人手中的卡片好像雪花一樣的向台前飛著，大做雲裳公司的免費廣告」。《申報》報導說，八位模特兒「都是穿了極美麗極奇突的服裝，看得我（記者）眼花繚亂」。

很多名人都是雲裳的常客。作家梁實秋回憶說：「雲裳開幕不久，我就偕內人前去訂製外衣一件，張小姐（張幼儀）引我們參觀她的公司，規模雖不大，卻頗具匠心。江小鶼是負責策劃的一個人。張禹九（八爺）常去走走，卻不是負責人。禹九的一位哥哥（記不得是老五還是老七）是頗擅服裝衣飾的一個奇人，好像是參加公司的一些業務。」

作為雲裳時裝公司總經理，張幼儀每天下午到店裡巡視，負責查看訂單，與裁縫師傅討論設計圖案，盯緊所有事務。而自詡為老闆的徐志摩，從來不打理店裡的事務，與其說是老闆，不如說是顧客──他

常常來店裡訂做衣服，如果要去旅行，就會找張幼儀訂做襯衫或長褲。有一次，張幼儀幫徐志摩做了一條領帶，徐志摩特別喜歡，回來後卻說，不小心將領帶搞丟了，張幼儀又吩咐裁縫師傅按照原來的樣式給他新做一條。

張幼儀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害羞、內向、沉默的少女，在社交場合，她常常是中心人物。她在自己家中接待二哥、四哥和他們的朋友吃飯，她的家比兩個哥哥的家更有吸引力。二哥張君勱是法學家、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後來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與之往來的大都是學術界的名流；四哥張公權的朋友則更多是銀行界和實業界的巨頭，對上海乃至全國的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張幼儀對這兩個圈子的朋友都熱情接待。有一次，二哥問她：「怎麼從來沒有聽你埋怨那些前來拜訪我的人啊？」張幼儀回答說：「和別人聊天是你的工作，要是大家老不來找你，就表示你事情做得不好。」[19] 這位曾在深閨中暗自哭泣的少婦，如今變成了上海上層社會名聞遐邇的沙龍女主人。

單身的張幼儀進入事業的頂峰。雖然她沒有「絕代佳人」林徽因、陸小曼的美貌，但她作為職業婦女的才華、學識與氣質亦自成一道亮麗風景。同樣是《新月》雜誌撰稿人、有「安福四大才子」之稱的羅隆基在三十年代愛上了張幼儀。羅隆基與徐志摩一樣是「天真自私漢」的典型。他已是有婦之夫，為了追求張幼儀，特意與張幼儀的二哥張君勱組成「再生社」，以為由此「近水樓臺先得月」，偏偏張幼儀對其冷眼以對。

羅隆基到處打聽張幼儀喜歡穿什麼衣服、喜歡什麼鮮花、喜歡什麼咖啡，然後精心挑選禮物送去，卻被張幼儀原封不動地退回。為了早日離婚，羅隆基不惜對妻子實施家暴。[20] 消息傳到張幼儀耳中，她只是搖頭而已。此時的張幼儀早已不是當初天真爛漫的少女，她對人性有了深刻的洞察。她發現，羅隆基與徐志摩一樣，都是浪漫而自私的才子，愛情之於這類人來說，宛如越喝越渴的海水。

追張幼儀不果，羅隆基又跟有夫之婦、新聞界才女浦熙修勾搭上。之後，貪慕虛榮的羅隆基加入中共政權，一度享受部長級高幹的優待，卻在反右運動中成為大右派，被批鬥至死。若是張幼儀嫁給羅隆基，必將成為其殉葬品。經過了痛苦的心理煎熬，張幼儀有了保護自己的智慧，她知道在選擇作為丈夫的男人時，比才華更重要的是品德。

張幼儀很有經商理財的頭腦，她在大風大浪的股市裡賺了不少

錢，在自己家附近給徐志摩的父母建了一所新房。戰爭期間，她囤積軍服染料，直到價格上漲一百倍才果斷出手。她還買賣過風險更高的棉花和黃金，同樣獲利甚豐。連二哥張君勱也佩服她的理財手段，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國家社會黨之後，邀請她擔任會計，守住錢袋子。

張幼儀跟陸小曼只見過一面，那是胡適安排的一場家宴。吃飯時，張幼儀發現，陸小曼真的長得很美，有一頭柔柔的秀髮，一對大大的媚眼。當著眾人的面，陸稱徐為「摩」或「摩摩」，徐稱陸為「曼」或「眉」。張幼儀略帶酸楚地說：「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別的女人那樣，我做人嚴肅，因為我是苦過來的。」

徐志摩的墜機慘死和陸小曼在中國生不如死的晚年，讓張幼儀不再有失敗感，而有一種「閑看花開花落」的隔離感。對於徐志摩的放縱風流，她淡淡地評論道：「文人就是這個德性。」她也不承認林徽因和陸小曼對徐志摩的感情達到愛的程度。對於林徽因，她評論說：「如果她林徽因愛徐志摩，為什麼在他離婚後，還任他晃來晃去？那叫做愛嗎？」對於陸小曼，她評論說：「人們說陸小曼愛他，可我看了她在他死後的作為（拒絕認領遺體）後，我不認為那叫愛，愛代表善盡責任，履行義務。」結論自然而然就出來了：「在他一輩子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張幼儀的確說得起這句硬話──台灣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在她的精心策劃下，由梁實秋主編而成的。

遲到的幸福與寧靜的晚景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共產黨的隆隆炮聲中，張幼儀離開居住了二十二年的上海，移居香港。她和哥哥們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更清醒地知道中共的統治意味著什麼，所以選擇離開這個即將由惡魔當道的世界。

張幼儀不是政治中人，從未公開譴責過中共，但她對中共不抱有任何幻想：中共不會允許私人銀行存在，也不會允許時裝公司繼續開業。正如張愛玲所說，雖然沒有研究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她看到共產黨人清一色的毛式服裝和秧歌，就無法忍受，如果要她穿如此千人一面的醜陋的衣服，她寧可死去。多年以後，逃離中國的作家廖亦

武也宣稱，他與共產黨的對立，首先是審美品位上的對立。

張幼儀對共產黨的深刻認識，或許也受到徐志摩文章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徐志摩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紅場看到的景象是，「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汙的近蹟」，「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徐志摩拜會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更確定了他對蘇聯的懷疑：「她說現代書鋪子裡托爾斯泰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杜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我問她現在莫斯科還有什麼重要的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21] 徐志摩指出，莫斯科相信天堂是可以實現的，但現世界與天堂之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汙海，人類泅得過去，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這血海。後來，徐志摩進一步質疑北伐為何是在蘇俄的控制之下，「為什麼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軍師，還得要外國的主義來策劃流血？」他發現，列寧這個「外國的野鬼」已經鑽進了孫文的棺材裡面。[22]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回國之後，接任孫伏園的《晨報副刊》編輯之職，「赤白仇友」之爭因此興起。[23] 徐志摩在評論文章中指出：「中國對蘇俄問題乃至共產主義與中國，和國內共產黨一類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大大疽。」[24] 在他看來，中俄邦交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後來，報館遭到左派暴力分子縱火焚毀。徐志摩挺身應戰，宣稱他不會被嚇到。而與之論戰的對手中，有一名即為此後中共的元帥陳毅。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沒有看到後來共產黨的得勢，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發現了蘇俄這個人間天堂背後的血汙與謊言。

在香港，張幼儀終於收穫了她遲到的愛情。愛人不是來自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文化圈，追求她的男子是樓下的鄰居、樸實無華的蘇紀之醫生。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蘇紀之向張幼儀求婚，張幼儀分別向二哥、四哥徵求意見─她雖然在英國和德國生活與求學多年，在中國最西化的城市上海生活了多年，但在骨子裡儒家傳統文化的男尊女卑觀念仍然揮之不去。父母已過世了，這個四十九歲的中年女子，卻還要向哥哥們就自己的歸屬徵求意見，這就是「精神上的小腳」的殘留吧。儒家文化對中國女性長達兩千多年的精神戕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去除的。明朝大儒劉宗周如此描述母親的言談舉止：母親在家通常做針線活，閒暇時沉默靜坐，言行舉止中規中矩，走路的時候裙襬不動，連咳嗽的聲音都不讓人聽到。這就是儒家對「賢妻良母」的定位與想象。[25] 張幼儀的一生，始終未能完全從中脫繭而出。

四哥張嘉璈沒有回復，或者他覺得那是妹妹的自由，自己不能橫

加干涉。而一直告誡妹妹要遵從自己內心感受的二哥張君勱，一會兒發來電報說「好」，一會兒又改變主意說「不好」。在反復躊躇之後，這位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來信表態：「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贊一詞？妹慧人，希自決。」張君勱的拘謹與守舊，恐怕連他的老師梁啟超都會不以為然吧。

在這種情況下，張幼儀給遠在美國的兒子阿歡寫信：「母擬出嫁，兒意云何？」她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個寡婦，理應聽我兒子的話。」徐積鍇是一名土木工程師，他的回信富於辭采，情真意切，令人動容：「母孀居守節，逾三十年，生我撫我，鞠我育我，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今幸粗有樹立，且能自贍。諸孫長成，全出母訓。……綜母生平，殊少歡愉。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相對於困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儒學名教的張君勱，阿歡表現出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價值觀，他在美國生活，已融入美國社會，並接受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

一九五三年，五十三歲的張幼儀和蘇紀之在東京舉行婚禮，之後兩人共同生活了二十年，那應當是張幼儀一生中最幸福的二十年，儘管她在上海的事業已不復存在，她重新成為一名普通、平凡的家庭婦女。

一九七二年，蘇紀之因腸癌去世，張幼儀搬到美國，住在兒子家附近。一生中最後的十六年，安寧而平和。張家龐大的家族常常在海外相聚，張幼儀的八弟張禹九的孫女張邦梅幫助張幼儀整理了口述自傳，成為家族中對姑婆的一生最瞭解的後代。張邦梅還記載了晚年的張幼儀與自己的爺爺張禹九這對姐弟之間的微妙矛盾。新月派成員之一的張禹九一生都很崇拜徐志摩，對徐志摩的欣賞超過了對自己姐姐的同情。張禹九在臨終之前特別叮囑張邦梅在研究和寫作之時要「對徐志摩仁慈一點」，而且要求在喪禮中朗誦一首徐志摩的詩。張幼儀和張禹九都曾來張邦梅家作客，張邦梅觀察到有趣的細節：「姑婆待在我們家的時候想來都很自在，可是一有爺爺在場，就顯得不自然又拘小節，說起話來帶著尖銳而且比平常用力的嗓音，好像擔心爺爺會質疑她或譏笑她的權威似的，而爺爺的確有把她的意見看得微不足道的傾向。」這種隱藏的衝突乃是處事風格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徐志摩人格與張幼儀人格的衝突的延續：「爺爺平時那種調皮搗蛋又愛說笑的態度（張家每個人都說這點最像徐志摩的個性），似乎被幼儀那正經八百的態度給壓了下去。」[26]

一九八八年，張幼儀以八十八歲高齡逝世於紐約，安葬在市郊墓園，墓碑上刻著「蘇張幼儀」四個字。她的一生，有痛苦，有挫敗，有愛，有成功，經歷過死亡的幽谷，然後就是花香滿徑。

14　陳光甫

自命為「新士人」的銀行家

銀行一事為耐勞守苦者終身之職業，但絕非吾人投機發財之地。……際此亂世，吾人欲求生存，唯有忠於職務，勤勞節儉，守份知足，抱定真正之人生觀，方不致受外物引誘，以致身敗名裂，為社會所共棄。

—陳光甫



　　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脹的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要求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權，以便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這段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延續下去。

[1]

然而，新興資產階級一開始並不看好國民黨。孫文在廣東掌權期間，血腥鎮壓商團武裝，又倡言「節制資本」。國民黨投靠蘇俄，支持工農運動，上海的銀行家們對黨軍抱持疑懼態度。戰事的蔓延讓商業受到嚴重影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在一封給員工的信中指出：

> 吾人閉目回想民國十六年來國內混亂之情形，人民所受之痛苦為何如？商業與金融兩界所受之打擊又為何如？可知吾人日處亂世之中，十六年來，無一寧歲，尤以革命軍進佔長江流域後，工潮突起，戰事蔓延，卒至市面大受影響，元氣損傷。本行處此非常情形之下，一方面受軍閥勒借之苦痛，一方面遭受戰事與工潮之影響，遂不得不將外埠分行，除留寧漢津通四行外，暫行停業。此十二年慘淡經營之分行，一旦收束，當為吾人共引為痛惜者。所幸本行基礎鞏固，經此挫折，實力猶存，但天演之理，不進則退，此時正當吾人以改造之機會，亟應群策群力，再接再厲，向前做去，是應由吾人共同負責共起而圖之。[2]

成立十二年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面臨著嚴峻的危機。陳光甫對於軍閥、工潮和戰爭之害有切膚之痛。在變幻莫測的政局中，銀行家們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國民黨比軍閥更有希望完成國家統一，而右翼的南京政府比左翼的武漢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更友善。

陳光甫痛恨武漢政府毫不尊重私有財產的強盜行徑：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突然頒佈《集中現金條例》，封存了包括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在內的多家銀行的庫存現金，造成市面恐慌。陳光甫屢

屢抗議無效，只好抱著「若要成功，第一先須與人民立信」的原則，駐守當地長達半年之久。他堅持將儲戶利益放在首位，從別處調來資金向提款的儲戶予以兌現，「犧牲雖巨，而一時名譽大噪」，漢口分行的存款在十個月內不降反增三倍有餘。

銀行家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殊群體。陳光甫的好友張公權指出，「黃金時代」的銀行家是「自發現代化」的先驅者，他們都是「摒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潮」的超群人物，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傑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儘管他們沒有後者那樣慷慨激昂）。張公權也相信，大部分銀行家皆是很有思想、很有才華的中國人，他們足以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3] 可惜，歷史沒有為這個群體提供更大的舞臺。

陳光甫為自己和同仁創造了「新士人」一詞。他眼中的「舊士人」，指「有學術修養、有事業抱負之知識分子，此等知識分子，中國傳統社會中本係最優秀、最有為之國民。」[4]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是「舊士人」之典型，這一類人有理想、有學術，但缺乏實創精神。真正的「新士人」，能將理想、學術、實創三者合為一體，他們多有留洋背景，眼界開闊，風氣開放，沒有官僚氣，對事物的研究更科學，對時局的觀照更理性，中國要有未來，非得這樣的新士人階層不可。張謇、張公權、李銘、范旭東、盧作孚、晏陽初、胡適、吳經熊、劉廷芳以及陳光甫自己，就是「新士人」中的傑出代表。

民國最成功的私人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一八八一年，陳光甫出生於江蘇鎮江海關職員家庭。少年時即「子承父業」，進入報關行當學徒，不僅熟悉人情業務，更有機會學習英文。陳光甫後來如此回憶那段艱難的日子：「鄙人年幼時，亦為學徒，凡添飯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門之役，皆歸鄙人任之。為煤棧學徒時，且須任打包之事，夜間臥於地板之上，熱天則露宿曬臺，飯時常不得飽，苟不與廚役聯絡，則枵腹之時，欲向廚役求一飯而不可得。」

十七歲那年，陳光甫進入漢口郵政。當時，郵政隸屬於海關，英國人赫德幫助建立的海關系統，從清末以來一直是中國最現代化、最

高效和最清廉的機構，在腐敗遍地開花的中國堪稱清流，就連恭親王奕訢都嘆息說：「我們如果有一百個赫德就好了。」[5] 陳光甫在此任職一年有半，熟知海關、郵局用人行政，制度優良；考取人員，先加培訓；升降黜陟，屏絕請託；退職養老，悉有規章；更憧憬郵局之服務社會，便利人群，他日後辦理銀行的人事管理及服務社會的理念，都由此發軔：「這段郵政服務的經歷就像進入了一所學校，使我近距離地看到外國人和他們的做事方式，使我對新企業有了更大的興趣。」[6]

一九○四年，陳光甫以漢陽兵工廠譯員的身份，作為湖北省參加美國聖路易博覽會代表團隨員，赴美考察。在此次博覽會上亮相的諸多新技術以及新產品，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少年陳光甫所受之震撼可想而知，他感嘆展品之豐富，「殊足炫耀遊人之耳目」；而中國展品卻令人失望，「雜置於雜藝院偏厄陰暗之一隅，顛倒錯亂，不列細表」。

被美國的技術和文明喚醒的陳光甫，決定留在美國讀書。經過努力，他以官派身份進入聖路易商業學校，再轉入賓夕法尼亞大學赫赫有名的華頓商學院攻讀經濟學。畢業後，他又在美國的一家銀行獲得實習的機會。[7]

一九○九年，陳光甫學成歸國，入巡撫衙門，負責財政事務。辛亥革命之後，江蘇都督程德全派陳光甫為江蘇銀行監督，這是他從事銀行業的開始。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派張勛任江蘇都督，張勛企圖將江蘇銀行據為己有，命令陳光甫將存戶名單上交。陳光甫堅持銀行有為存戶保密的義務，拒絕此一命令，遭到免職。

這段經歷讓陳光甫意識到，在官辦銀行中不可能實現個人理想。官僚是中國最腐敗、最愚蠢的階層，依靠官僚的力量做事，會像晚清大商人胡雪巖那樣一敗塗地。而他在美國所接受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教育，使他對政府干涉市場經濟的「統制主義」抱懷疑態度。由此，他形成了一套鮮明的個人哲學──「敬遠官僚，親交商人」。

一九一五年，陳光甫著手創辦自己的銀行。他得到江浙銀行業中比他更早嶄露頭角的張公權和李銘的協助。受過日本教育的張公權，側身在各類外資銀行買辦以及錢莊經理的應酬之中，自覺「頗感孤寂」，見到陳光甫則相見恨晚，自認「彼此傾倒」，不僅聘請陳光甫擔任中國銀行顧問，也全力協助陳開設銀行。陳光甫、張公權和李銘，日後將在中國銀行界三足鼎立。

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剛剛起步：外國銀行佔上風，資本雄厚，但

不能深入民間，更不願為大眾服務；傳統錢莊銀號，雖能深入民間，但組織落後、思想陳舊，已不能適應新時代之要求；中國官辦銀行，雖有十二家之多，但體制僵化、服務惡劣。陳光甫發現，私人銀行大有發展空間。[8]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上海寧波路九號正式開業。次日，《申報》以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其開業消息，並發表了陳光甫的一段演說：「一國工商業之發展，全恃金融機關為之樞紐。我國百業凋敝，其故金融機關之阻滯不靈，此次歐戰，已得極好之教訓：凡一國國民，苟無遠識大志，即無可以立足之地。我國實業，今在幼稚時代，欲培植之，啟發之，必當先有完善之金融機關。本行宗旨，注重儲蓄，並欲扶翼中交兩行，而為其輔助機關。」[9]

對比當時上海的各家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規模堪稱「小小銀行」，額定資本十萬元，實收僅八萬元。第一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註冊資本，在上海的十一家銀行中排名穩居倒數第一；三年後，上海二十五家銀行的排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仍然墊底。[10] 最初員工只有七名，陳光甫自稱是「跑街的」—既是管事的總經理，也是辦事的業務員，「自兼經營，拉存款，跑工廠，放貸款，晚上回行還親自為青年行員開辦教書」，確實做到了「銀行是我，我是銀行」。[11]

沒有願景的銀行與有願景的銀行發展軌跡截然不同。前者會由大做小，而後者則能由小做大。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憑藉「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的理念，看重儲蓄，開展「一元開戶」、「女性行員」、「學校儲蓄」、「鐵路匯押」等各類創新服務，不僅在上海銀行業中站穩腳跟，而且業務有後來居上之態勢。在第一個十年結束時的一九二六年，上銀的存款已達兩千四百多萬元；在第二個十年結束時的一九三七年，上銀的存款總額已接近兩億元，分支機搆超過百家，員工近三千人，堪稱民國時代最成功的私人銀行。

陳光甫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情懷，他將西方現代企業管理理念與中國儒家文化中符合普世價值的優良部分融會貫通，提煉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獨特的企業文化。他教導員工，「人不可以貧富貴賤，而顯示招待上之區別」。他本人即以身作則：「譬如有一破衣赤足之農夫，欲與鄙人談話，鄙人即當引至經理室，和藹招待，遇有詢問，尤當誠懇答覆，全行同人均應如是。當知社會無論何人，願與本行接近，即為本行之光榮。這種行為是服務社會之真精神也。」[12] 他希望銀行同人發展出一套跟社會主流價值和銀行界普遍做法不一樣的服務模式：「人惟自利，我則服務社會；人學官僚，架子十足，我則和平待人；人犯墮落，我則守正；人犯奢侈，我則勤苦；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煩瑣。」這是

對銀行業中長期形成的「潛規則」的挑戰和顛覆。

陳光甫也倡導廉潔高效的企業文化。一九三○年，虹口分行會計主任張某因舞弊而入獄，陳光甫認為這不僅是個人的羞辱，亦是全體同人之羞辱。張某與陳光甫有親戚關係，其白髮盈頭之老父於大雨中來到陳光甫的住處為兒子求情，陳光甫拒絕與之見面。此後兩天下午，無數親友上門說情，陳光甫乾脆就不回家。對於外界評論其冷酷無情，陳光甫如此解釋說：「今之談者必指鄙人手段甚辣，不知余亦銀行職員之一，對於行員舞弊而不能執法以繩，即為不能盡職，此後又安能維持全行六七百人之法紀。故自此案發生，明知張之家庭痛心實甚，而余對此事之痛心尤較其家庭為甚，深恐因個人舞弊而動搖根本，更念此十年服務之青年，一朝失足，畢世沉淪，從此陷入深淵，不能自拔。」[13] 他對腐敗是「零容忍」。

陳光甫重視教育，他認識到：「國人無適當之教育，政府固然弄不好，即紗廠、鐵路、銀行、市政等等，永遠皆弄不好。」[14] 銀行雖不是教育機構，但他投入大量資源用於員工的職業培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辦有「一館一刊」，即上海銀行圖書館和《海光月刊》。《海光月刊》邀請知識界第一流作者撰稿，除了討論企業內部事務，也評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是一份著名的企業內部刊物。

中國、香港和台灣的「現代旅遊觀光業之父」

一九二七年，經過十多年打拚，陳光甫已成為上海灘舉足輕重的銀行家，但他不以之為滿足，又將目光投向當時還是一塊處女地的旅行業。

陳光甫是一名旅行家。少年時代，他因到美國參加聖路易博覽會而完成思想啟蒙，他很重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鼓勵年輕人走出家門，走出國門。即便公務繁忙，他在赴國內外出差的間隙，仍不忘遊山玩水、探古訪幽，他形容自己「是一個酷好山水、南北東西之人。萍蹤所至，不知幾萬里」。當然，他也深切體驗到，在當時的中國出行的極不方便和極不舒服。

一九二○年代，幾家國外旅行社壟斷了中國尚待開發的旅遊市

場。有一次，陳光甫到一家外資旅行社購買船票，外籍工作人員態度極其傲慢無禮。陳光甫深受刺激：花自己的錢，在自己的國家旅行，為什麼要受外國人的氣呢？他決定進軍旅行業。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陳光甫投資五萬元成立中國旅行社，確立了「發揚國光，服務旅行，闡揚名勝，改進食宿，致力貨運，推進文化」的二十四字經營方針。次年一月，經南京政府交通部核准，中國旅行社拿到第一號旅行業執照。

在中國旅行社的全盛時期，達到「凡國內遠東乃至全世界的海、陸、空旅行」，都可以在此買到相應的車票、船票和機票，而且不向旅客收取任何手續費，只是向運輸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15] 中國旅行社是當時唯一有能力接待海外大型旅行團、訪問團的公司，如香港遊客到錢塘江的觀潮團、國際聯盟派到中國調查滿洲國真相的「李頓調查團」等，都由中旅負責接待。不僅如此，中旅還能將國人送出國門，如中國的穆斯林赴麥加朝聖、體育代表團赴柏林參加奧運會以及梅蘭芳到蘇聯演出，都是由中旅安排行程和食宿。

由於中旅與上銀是兄弟企業，上銀也成為中國第一家發行旅行支票的銀行。上銀發行的旅行支票分為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四種面額。旅客可以用上銀的旅行支票在中旅購買車票、船票和機票，以及支付食宿費用。旅客也可以憑藉旅行支票到上銀在全國各地的分部兌換現金，這樣就減少了途中攜帶現金的不便。後來，上銀發行的旅行支票也被外國的幾家大銀行認可和接受。

陳光甫認為，「一國之風景，在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上，亦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當時中國的現代旅遊觀光業剛剛起步，很多風景名勝年久失修，無法滿足遊客之需求。中旅應各地政府的邀請，參與許多旅遊區的修繕和開發，比如整修山東泰山的登山石徑、陝西的華清池等處。

鑑於當時中國大部分城市為遊客提供的食宿條件都較差，中旅自行修建了數十家不同檔次的招待所。陳光甫強調，招待所必須清潔衛生、服務周到、價格低廉。中旅在全國各地開設的招待所形成了集團化、連鎖式經營，實行統一管理、統一經營、統一標識、統一服裝，旅客可以在任何一家中旅的分支機構，預訂到全國任何一地招待所的房間。其中，中旅也開辦了南京首都飯店和西京招待所、南昌洪都招待所等豪華級酒店。「外觀宏偉、內景清幽」的首都飯店，每間客房都配有浴室，裝修大氣，菜餚精美，連服務生也必須具備初中以上學歷。[16]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就發生在由中旅經營的華清池招待所。蔣介石選擇下榻於此處，說明此處的設施和服務可以滿足國家元

首的要求。[17]

中旅也是中國最早實行團員制和為遊客提供各類保險服務的旅遊企業。中旅的團員分為普通、特別、永久三個等級，按照不同的繳費標準享受不同等級的優惠服務。在不到兩年時間裡，入會者接近千人。上銀的保險業務在業內具有領先優勢，中旅可以為旅客辦理水險、火險、意外險、行李險等保險業務。

一九二七年，中旅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專業旅行類刊物《旅行雜誌》。該雜誌廣邀著名文化人如胡適、張恨水、沈從文、顧維鈞、蔡元培、潘公展等為之撰稿，還有海外記者提供特別稿件，圖文並茂、資訊豐富，堪稱中國版的《國家地理雜誌》。

陳光甫更鼓勵員工利用假期旅行，他先後組織了幾個數百人的員工旅行團到杭州及日本等地旅行，在旅行過程中增進員工之間的友誼，鞏固企業文化並拓展員工之視野、胸襟，可以說一舉多得。

中共奪取中國大陸之後，陳光甫出走海外，在香港和台灣發展新的中旅，讓中旅浴火重生。他用現代思想辦旅行社，更主動地鼓舞社會上一般人普遍的興趣，使旅行度假蔚然成風，人們「不再把旅行看作是一種奢侈的行為，而養成一種自然的習慣」。在此意義上，陳光甫堪稱中國、香港和台灣的「現代旅遊觀光業之父」。

「江浙財團」與南京政府的分分合合

北伐之初，蔣介石深知「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道理，能否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乃是成敗之關鍵所在。他派出親信黃膺白聯絡張公權、吳忠信聯絡陳光甫，說服這兩名銀行家支持國民黨。陳光甫出面主持，成立了一個三百萬元的借款合同，這是國民革命軍出師以來，所收到的最大一筆接濟。[18]

然而，正如歷史學家高陽所指出的那樣，以張公權為首，而由陳光甫負主要實際責任的，「以實力支持蔣總司令掃除軍閥勢力」的決定，對於國民黨的幫助之大，數十年來，遠未能作一正確的評估。高陽只是說，「原因很多」。生活在兩蔣統治下的台灣的高陽，不敢說

出的真實原因是：張公權和陳光甫都是國民黨的「局外人」，後來跟蔣介石漸行漸遠，黨國自然不願意承認他們當初的功勞。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軍佔領南京和上海，寧漢之間已出現巨大裂痕。上海的金融家和企業家們在上海和漢口都有分行、分廠或營業關系，他們對蔣介石與武漢之間關係的發展持謹慎觀望態度。武漢派出當時還屬於左派陣營的宋子文到上海，欲統籌江浙兩省財政。蔣介石則先一步設立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擬聘陳光甫為財政委員。陳光甫擔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漢口的營業受到影響，躊躇不定，急電漢口分行經理唐壽民探詢武漢方面的態度，「蔣與武漢政府究竟決裂否？」[19]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四月初，支持蔣介石的資產階級聯盟在上海形成。蔣介石發動清黨、寧漢分裂前夕，上海的資產階級選擇站在蔣介石一邊。他們是一群積極主張民族主義、現代化，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最講民主的人們。[20] 從價值上而論，他們跟崇尚國家主義的蔣介石不會有契合，但除了蔣介石，他們還能支持誰呢？上海的這群民族資本家為蔣介石提供了重要的財政援助。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來自上海銀行界和實業界的財政支持，北伐軍當初不可能從廣州出發，而蔣介石也斷然不敢在此刻跟蘇俄及中共翻臉。

軍事方面穩定下來之後，南京政府隨即任命陳光甫為蘇滬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網羅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銀錢業、商會代表為委員，決定以海關所收百分之二點五的附加費為擔保，發行庫券三千萬元，分三十個月償還，稱為「二五庫券」。同時成立基金保管委員會，以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為主任委員。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籍貫幾乎全是江浙兩省。日本報紙以諷刺的論調評論說：「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得力於江浙財團的支持。」從此有了「江浙財閥」這個說法。[21]

陳光甫、張公權等以「新士人」自居的洋派銀行家，與蔣介石的知識背景和思維方式差別甚大。蔣介石從來不信任在西方或日本名校畢業的精英知識分子，蔣介石晚年罷黜在外交上功勛卓著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甚至在日記中咒罵葉公超等留洋知識分子，「凡長於洋語者，無不以一等奴隸自居為得意，可悲極矣」。[22] 蔣介石政府只關心從政治上削弱城市精英和榨取國民經濟中的現代化部門，發展經濟只是為了強國而不是為了富民。[23]

蔣介石倒是跟另一名上海商界領袖虞洽卿聲氣相投。虞洽卿在十

五歲從寧波抵達上海時，還是一個光腳的學徒，在他成為航運大老闆之一和上海總商會會長的漫長經歷中，曾經得到強大的寧波幫的金融援助和政治支持。[24] 虞洽卿恰好扮演了為蔣向上海財界籌措軍費的仲介人的角色，日本方面認為：「雖然提拔蔣介石的是孫文，但救蔣介石於危難的實際上是虞洽卿。」[25]

很快，張公權和陳光甫等銀行家們就發現，蔣介石並非他們心中期待的那位尊重私有財產、個人自由和法治精神的國家領導人。銀行家們想控制蔣介石，卻被蔣介石所控制。「四一二」政變一結束，蔣介石立即提出新的付款要求，不斷加重對商人的敲詐和勒索，並對他們實行真正的恐怖政策──讓杜月笙的黑幫綁架資本家，逼迫其家人交出贖金。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江西井岡山與土匪們一起綁架地主鄉紳，用同樣的方式榨取贖金。相比之下，被國共兩黨妖魔化的孫傳芳，其統治方式更為文明和仁慈。

在發行完蔣介石要求的三千萬公債之後，陳光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停止了與國民政府的來往。他在日記中表達了對南京政府的嚴重不滿，「不脫離北京政府生涯之舊態」，其官僚「用錢如泥沙，不惜物力」，政府上下「抱做官僚主義的作風」。[26] 陳光甫也指出，蔣介石企圖單單依靠武力來消滅共產黨，不可能成功。因為，「赤化」產生於二十世紀社會的特殊狀況，「非以兵力所可遏制之者。中國今日欲求補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務本。若徒恃強權，必致全國促成赤化之局。因果相隨，無可逃也」。[27] 所謂「務本」，就是致力於解決民生問題。一意孤行的蔣介石聽不進去這些建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在上海成立。此前，財政部長宋子文企圖將張公權掌控的中國銀行改組成中央銀行，原來廣州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因為濫發貨幣，早已聲名狼藉。張公權拒絕了此一思路，他深知中國銀行的制度未能完善，若匆匆改為中央銀行，其基礎必將搖搖欲墜。張公權建議另外設立中央銀行，蔣介石和宋子文勉強同意。陳光甫成為中央銀行的九名理事之一，但在其中並不能起到主導作用。

在央行成立那天，主客致詞，無不口吐蓮花、天花亂墜。唯有陳光甫說了一番逆耳之言：「中央銀行是銀行之銀行，我們需要已久。不過中央銀行應該與政府分開，財政部長不必兼任總裁，方可各盡職守。」耿直之言，聞者咋舌。[28] 若以美國的財政金融制度作類比，美國的財政部長不能兼任美聯儲主席，美聯儲的金融政策有相對的獨立性。但中國是人治社會而非法治社會，宋子文也不願放棄到手的權力，於是將財政部與央行攪成一鍋粥。

蔣介石更是將國庫當作個人的金庫，隨意撥款賞賜部下或收買政敵，造成巨額財政赤字。宋子文有時要求蔣按照預算支出，並具體說明收支情事，引起蔣無窮的煩惱。蔣後來以完全順從他的孔祥熙取代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一九四五年，蔣在日記中表明決心：「中央銀行總裁人選，非絕對服從余命令，而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以此二十年來所得之痛苦經驗也。」從此以後，在蔣任期內，所有中央銀行總裁便必須由他決定。[29] 其結果是，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二十二年，國民政府的央行始終沒有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央行。

上海的銀行家、企業家和商人們發現，在經濟上，國民黨的主要的目的並不在於創立一種更加有利於私人企業發展的體制格局。大量事實證明，國民黨政府對於發展私人企業的態度相當冷漠。在國民黨政權中一直佔有統治地位的，是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蔣介石從義大利和德國獨裁者那裡找到一種似乎很有效的發展模式：在講究實效的幌子下，鼓吹經濟發展必須接受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並服從國家的調整。[30] 反之，蔣介石對英美式的自由經濟持懷疑態度。

有人說，陳光甫、張公權等「新士人」群體在一九二七年中國歷史的轉折關頭選擇跟蔣介石合作，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失誤。但是，即使讓他們重新來選擇一次，也只能如此選擇。他們拋棄了軍閥，也不可能跟武漢極左派政府合作，更不可能與共產黨及其把持的工會合作。他們的悲劇命運早已註定，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從未出現一個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國民黨和蔣介石都不是），難怪歷史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感嘆說：「一九二七年，與其說資產階級背叛了無產階級，不如說資產階級背叛了自己，為自己設計了慘遭國家政權摧殘的命運。」[31]

他的離開和他的歸來，從來都寵辱不驚

陳光甫無意做官，為了維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這一事業，又不得不勉力周旋於政治與商業之間，與上海及其他城市的「新士人」階層形成合力，對抗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政治勢力的擠壓。外界關於他要擔任財政部長、央行總裁等職務傳言曾經很多，但他多次謝絕

蔣介石「入閣」的邀請，只是以顧問的身份為政府服務，從未離開銀行本業。好友張公權在戰後的法幣崩潰中臨危受命出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陳光甫的評價是「跳入火坑」。

抗戰期間，基於民族大義，陳光甫接受國民政府的委派，赴美商談美援事務。當時，美國的主流輿論是孤立主義，不願介入歐洲和亞洲的亂局，中方與美方的談判非常困難。經過不懈努力，陳光甫與美方先後就中美白銀問題、桐油貸款和滇錫貸款達成協議。一九四一年，陳光甫被財政部長孔祥熙任命為中英美平準基金委員會（Stabilization Board of China）主席，雖然平準會成效不彰，但在戰時對貨幣穩定起了一些作用。

抗戰勝利之後的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在各方壓力之下表示結束訓政進入憲政，一九四八年被定為行憲年。陳光甫同意出任國府委員，這大概是他側身政治最近的一次。然而，對於行憲國大的實質，他看得清楚，他用銀行作了一個形象比喻，「國民政府正如一家銀行，國民黨辦了二十年沒有辦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兌現，或是怎樣，這家銀行岌岌可危，於是總經理蔣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東來，或者比傳的更確實些，請幾位新董事而總經理不變，希望因為這些新分子而銀行可暫度難關，依然維持下去。」

一九四八年，陳光甫再度奉命赴美借款。蔣介石希望借到三億美金，但美方已對國民政府絕望。陳光甫不得不告知美方，中國的經濟狀況到了「驚心動魄」的地步。他在日記中寫道：「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道路不通；政治上：賞罰不公、綱紀不明、責任不清；社會上：人民無自信心、工商業廢弛、教育破產，一片淒涼景象。」這一趟美國之行果然無功而返。

蔣介石下野之後，代總統李宗仁邀請陳光甫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赴北平，幫助國共和談。陳光甫婉言回絕了這個更不可能達成的使命。早在一九二七年，陳光甫就觀察到共產黨分子在武漢和上海的種種為非作歹、殺人越貨的惡行，對共產黨看透了。一九五○年，共產黨佔領上海後對資產階級展開一系列整肅，在香港的陳光甫評論說：「共黨號稱為人民解放軍，先從工人主政入手，即如銀行方面，首先驅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是在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陳光甫比盧作孚等人更透徹地知道中共的邪惡本質，既然已經到了香港，就不可能回去自投羅網。

陳光甫旅居香港期間，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向他拋出橄欖枝。北京方面託章士釗送去毛澤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葉劍英表示願

意與陳光甫和張公權在廣州見面，「公開或者秘密均可」。蔣介石更是派出特務，冒充周恩來的特使前來拜會，探究其動向。陳光甫識破了這個陰謀，憤怒地在日記中寫道：「蔣介石來探視是否準備接受共產黨統戰政策，以便必要時予以斷然處置。每念及此，不寒而慄。」

陳光甫以接近七旬的高齡在香港重新創業──何妨以香港為上海？一九五○年，他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易名為香港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註冊。數年以後，在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躋身六大銀行之列。

一九五四年，陳光甫應陳誠之邀來到台灣，完成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灣的註冊登記。然而，在台灣實現威權統治的蔣介石不願給私營銀行以發展空間，台灣的各項事業都要以公營為主，都要為其反攻大陸的幻想服務。在此背景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灣的復業變得遙遙無期。儘管如此，陳光甫從未放棄他的理想：「銀行是我的第一生命，我自己的個人生活排第二。從我過難民生活的那天起，我就沒有一天不想到銀行的復興。」[32] 他不以「難民」的身份為恥，祖國已經被強盜霸佔，他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銀行和旅行社化為烏有，不是難民又是什麼呢？他又超越了一般中國人那剪不斷的鄉愁，在海外，在香港和台灣，可以從零開始，他如同猶太人一樣，哪裡有事業，哪裡就是新的家園。

一九六○年代，經濟開始起飛的台灣需要更有活力的金融業，國民黨政府逐漸放鬆對銀行業的管控。一九六五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北館前路七十一號復業，是唯一一家從中國大陸遷到台灣復業的私營銀行。已經八十四歲高齡的陳光甫在開業典禮上與來賓談笑風生，堪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如今，已有百年歷史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灣落地生根已有半個世紀，在全球五百大銀行中排名第二百二十九名，成為中國近代銀行業中的一個奇蹟。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陳光甫在台北市中心診所逝世，享年九十六歲。得知陳光甫去世的消息之後，遠在海外的老友張公權以輓聯表示哀思：「論交六十年前，往復籌謀，以裕國厚民相期，得君偉業垂範，堪償宿願；聞凶數千里外，生死相隔，往異域殊鄉為客，假我餘年著述，以證心期。」這副輓聯，是陳光甫、張公權以及他們那一代金融鉅子的生命寫照。在中國近代化的驚濤駭浪中，這一代「新士人」在立功、立言、立德每個方面的成就，都讓後人高山仰止。雖然中國未能按照他們的期望成為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的卓越國家，但歷史的逆流總有一天會回轉。

第五卷

逝者的證詞

15　李大釗

迷途不知返，走上絞刑架

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唯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

—李大釗



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一側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已併入國家博物館），收藏了共產黨創黨以來的各類紀念物。有誰知道它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為第一號的是什麼物品呢？

是一台絞刑架。據坊間流傳，共產黨定都北京之後，接收舊警察局所轄的功德林監獄，公安部的官員無意中得知，獄中所存放的一台體量龐大的機器，竟是北洋政府時代的絞刑架。一位舊獄警報告說，在執行絞刑的人中，就有「貴黨李大釗先生」。

李大釗是何許人也？一九四九年三月，當毛澤東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城時，十分感慨地對身邊的人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

公安部的官員得知絞刑架的不凡來歷之後，經過層層上報，將這部殺人機器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裡，供新中國各單位組織人員來參觀。那架機器個頭很大，據說是德國進口的，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暗紅的痕跡。後來，絞刑架成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天字第一號文物。[1]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級審判廳、京師警察廳聯合組成軍法會審，就在蘇聯使館被捕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一案，在警察總監的會客室開庭。此前一天，北京警察廳發表公告稱：「黨案發生以來，關於審判機關與審理手續，各主管官署業行送次會商，現時當局為謀裁判之公平起見，決定由享有法權之各機關，組織聯席會議之審判機關。審理之時，採取證據主義，其無相當證據者，概將從寬免究，並予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辯護。」[2] 法庭由安國軍第三號人物、軍事部長何豐林將軍親任審判長，足見張作霖對此案的重視。

經過七十多分鐘的審理，法官當場向李大釗等宣讀判決書，李大釗等人被判處死刑，其他人被判處有期徒刑。軍法會審所依據的是《陸軍刑事條列》第二條第七項，即戰爭期間，平民勾結外國人或陰謀意圖紊亂國憲及煽惑內亂者，雖非現役軍人，亦可按此法審判。

隨即，五輛刑車將二十名死刑犯押往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李大釗要求實施絞刑而非槍決，獄方啟用了大型絞刑機。安國軍政府為

死者準備了二十副棺木並給予首犯特殊禮遇：李大釗是上等棺木，價洋七十元；其餘十九人是中等棺木，價洋四十元。[3]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李大釗一生追求階級平等，死後卻不能與黨內同志享有平等待遇。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組織人手撰寫《李大釗傳》，主要執筆人「根據推測」編寫了李大釗臨刑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場景。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則描述說，劊子手故意增加李大釗的痛苦，別人行刑耗時二十分鐘，李大釗用了四十分鐘—其實，她並不在現場，第二天才得知父親的死訊。

當時在現場的高等刑事廳推事何雋在〈李大釗殉難目睹記〉中寫道：「（李大釗）經行刑人擁登絞台左絞繩下鐵蓋上，其另一受刑人則擁登右絞繩下鐵蓋上，均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兩手，纏縛全身並折繩接環，（李大釗）神色自若不變。最後，李大釗高呼『為主義而犧牲者』，毅然引頸就環。」[4]

《北洋畫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王郎」的通訊《處決李大釗等瑣聞》，描述行刑的詳情：「未幾，執刑吏來，首以李大釗送往絞刑台。李見此，知已不免，乃曰：『請以紙筆來，俟書一遺囑。』執刑者曰：『此時已晚，由不得汝矣！』李無言，神色尚未變。既上（絞刑架），執刑者令其頸稍伸長，李如言應之，厥態殊從容。二十分鐘始絕。」[5]

次日《晨報》披露行刑過程亦頗為詳細：「當日看守所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軍法會審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繼武為監刑官，在所內排一公案，各黨人一一依判決名次點名，宣告執行，由執刑吏及兵警送往絞刑台。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二人，而每人約費時十八分始絕命，計自二時至五時，二十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從「仇俄」到「附俄」：赤旗幟的世界是人相食的世界

李大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生於直隸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一個富裕鄉紳家庭。父親因病去世六個月後他才出生，一歲半時母親

又不幸病故，是祖父將其撫養成人。[6] 他曾回憶自己的童年是孤獨的，但也是愉快的。十歲那年，祖父就為他安排了婚事，娶回十五歲的本村女孩趙紉蘭。

李大釗從小接受儒家教育，一九○五年參加童試，然而正好這一年朝廷宣佈廢除科舉。李大釗等考生轉入永平府中學堂接受新式教育。在此期間，李大釗結識了長他七歲、高他兩班的同學蔣衛平。蔣少有大志，慕班超、馬志尼之為人，後投筆從戎，轉入保定陸軍速成中學。畢業後，漫遊東北、內蒙，勘邊界、察地形，在中俄邊境被俄國軍隊逮捕殺害。李大釗寫下「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千載胥靈應有恨，不教胡馬渡江來」之詩句，表達對俄國的仇恨—他大概不會想到，數年之後他居然成為蘇俄的狂熱崇拜者，為了傳揚蘇俄的共產主義，不惜出賣中國的國家利益。

一九○七年，李大釗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從預科讀到正科，直到一九一三年畢業。在校期間，李大釗與同學發起成立北洋法政學會，參與編輯會刊《言治》。此後，他又加入由江亢虎、陳翼龍等創辦的中國社會黨。中國社會黨吸取了不少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如「二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和「五非「（非私產、非家族、非宗教、非軍國、非祖國主義）。據江亢虎所說，全國有數百個支部和數十萬黨員。李大釗即為天津支部幹事。後來，江亢虎出任汪精衛偽政府考試院副院長，抗戰勝利後以漢奸罪受審，因此共產黨隱去這段李大釗受其啟蒙的歷史。[7]

從法政學校畢業後，李大釗「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但他不安於學業，熱衷政治活動，被學校勒令退學，其學籍表上蓋的最後一個圖章是：「長期欠席，除名。」他的成績單上的各科成績大都是勉強及格。

一九一八年春，經章士釗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兩年後任法學和政治學教授—連本科學歷都沒有的留學生，居然在最高學府擔任教授。章士釗後來說：「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獨守常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8] 可見當時李大釗在北大任職還是引發了爭議。李大釗的月薪為一百二十元，足以讓他進入中產階層—在其手下分管登記新報刊和借閱者姓名的圖書館臨時工毛澤東，月薪僅八元。此後將近十年，李大釗的重心轉向政治活動，但一直都在北大任教。

一九一八年冬，李大釗參與主編《新青年》，還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每週評論》，廣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急劇左轉。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較》一文中寫道，「新文明之創造」是「肇始於

艱難恐怖之中」，「人群演進之途轍，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犧牲、最大痛苦之後」。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即是兩大證明：「於法蘭西革命之血潮之中」，誕生了「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而「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將「茁發今日之俄國革命之血潮之中」。他從血腥的俄國革命中看到「愛人的精神」，以及「和平之曙光」。他未曾料到這場追求麵包和解放的革命會墮落成吞噬人命的古拉格群島。他的知識與視野有限（章士釗形容其「才不如識，識不如德」），從未思考過英美或「英語民族」的文明路徑跟法俄之不同；他如同以玩火為樂的孩童，以為燒掉舊房子就可蓋新房子，哪知他的家人還在舊房子之中。

一九一九年七月，李大釗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一激情澎湃的吶喊，影響一大批青年人。對中國來說，既然作為歐洲最落後國家的俄國可以通過革命實現趕超戰略，那麼中國作為更落後的東方國家，也能通過革命加入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並獲得新生。[9] 李大釗大力支持北大學生組建「國民雜誌社」和「新潮社」等青年社團，還參與組建「少年中國學會」等規模更大的組織，試圖「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開闢一新紀元」。[10]

一九二○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來到中國推動成立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與李大釗深入交談，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由此開始在蘇俄的主導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11]

李大釗生活簡樸，自律甚嚴，據北大學生汪崇屏回憶：「李在北大圖書館任職，每週還教幾節課……李當時每月可拿兩百餘元，領到月薪後，便分給他的黨員，每人三元、五元、七元、十元不等，自己僅剩下五六十元應用。他沒有包洋車，每天只是坐著破洋車跑來跑去，其所剩之錢，還要隨時應付向他求助的同志。」[12] 李大釗喜歡並渴望被當作受尊敬的朋友，他同情、支持學生，而無視他們在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上的差異。[13]

一九二二年，李大釗南下拜訪在上海困獸猶鬥的孫文，與之「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會談之後，孫文親自主盟，介紹李大釗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委託李大釗與廖仲愷、鮑羅廷一起負責國民黨改組工作。李大釗是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文指定國民黨元老

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和李大釗五人組成主席團，輪流擔任大會主席。李大釗發表演說自稱：「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他是唯一進入大會常委會的共產主義者。

李大釗首先是共產國際成員，然後才是中共黨員──這兩個身份並不矛盾，中共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承認中共是共產國際下屬的支部。而國民黨員的身份只是「借殼上市」。回北京之後，李大釗很快幫助建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天津市黨部和直隸省黨部，推動國共合作在北方的發展。六月，他赴莫斯科出席第五次共產國際大會並擔任中國代表團的領導。

因少年時代摯友之死，李大釗曾無比痛恨侵吞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佔有中東鐵路的沙俄。但當蘇維埃革命成功之後，為了在中國複製「庶民的革命」，他忘記了蘇俄的本質是大國沙文主義，一廂情願地以為蘇俄會無償、無私地幫助中國革命，遂全身心地倒向蘇俄的懷抱，成為蘇聯在華利益的代言人。由此，李大釗從迷狂的愛國者邁向無意識的賣國賊的不歸路。他憧憬「赤旗」遍佈中國，在其學生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果然變成「赤旗的世界」，卻又淪為比軍閥時代更不堪的「人相食」的時代。 [14]

一九二四年七月，蘇聯政府派遣曾任蘇俄外交事務全權代表的加拉罕（Lev Karakhan）到中國，與北京政府談判九個月，簽署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北京協定》）。 [15] 加拉罕獲准取代沙俄駐華公使，並接收俄國使館旁邊的前俄軍兵營和中東鐵路辦事處等沙皇俄國的領地──一年多以後，這裡成為李大釗等國共兩黨骨幹的藏身之所。

正當中俄雙方展開談判時，李大釗發動學生公開向北洋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政府，並且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據北洋政府外長顧維鈞回憶，他與李大釗有一段雞同鴨講的對話：

> 北京大學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到外交部要求與我面談。我記得代表團的團長是李大釗。他是那個由大約八至十名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組成的代表團的發言人。

李大釗教授的回答使我極為震驚，他說：即使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裡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講話時非常激動，以致使我覺得他已失去了辨別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對他說：他當然可以發表或堅持個人的見解，但是我，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有責任設法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國勢力的侵犯。

由於考慮到李大釗教授的意見與我的見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訴他，鑑於我們的觀點截然不同，我沒有必要就此問題與他討論。於是我說了句「請原諒」，便起身告退了。[16]

北洋政府長期被國共兩黨在海峽兩岸分別壟斷的歷史敘事妖魔化為賣國政府。但是，以這段對話來看：李大釗與顧維鈞，究竟誰是愛國者、誰是賣國賊？

顧維鈞是老派的職業外交家，風度翩翩、人品高潔，即便對與自己觀念截然相反的人士也保持了風度和禮貌。一九二七年，顧維鈞在危機時刻勉強出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兼攝大總統職務，實際上北京政府為奉軍首腦張作霖掌握。張作霖出動軍警闖入蘇聯使館搜捕李大釗等人，繞開以顧維鈞為首的政府部門。顧維鈞厭惡為了左派意識形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李大釗，卻也不贊同張作霖的做法──多年以

後，旅居美國的顧維鈞回憶說：

> 我的確是會反對這種行動的，在致蘇俄使館的照會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職期間，我盡力使中國政府給人以井井有條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慣例，可是軍閥們的行為使我的願望難以實現。

蘇俄使館成為顛覆中國合法政府之基地

不過，對於躲藏在蘇俄使館中不分晝夜地推動顛覆本國政府活動的李大釗及其同僚，張作霖的做法或許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通緝的李大釗，逃入東交民巷的俄國兵營，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也遷入其中。 [17]

當時，北伐軍劍指長江流域，控制北京政府的張作霖仍據有直、魯、奉、吉、黑、察、熱數省地盤，以及三十五萬裝備精良的奉軍，計劃南下與國民革命軍作戰。京津一帶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活動頻繁，威脅安國軍的後方安全，張作霖決心搜捕黨人。

此時，北京的蘇俄使館已成為顛覆北京政府的基地，其明目張膽的做法讓西方各國使館為之側目。由英、美、日、法、荷、西、葡等國組成的外交團發現了蘇俄的一項陰謀：蘇俄大使館的軍事隨員企圖挖洞偷入英國大使館，盜取情報。「蘇俄大使館跟英國外交團本來是比鄰而居，中間只隔著一堵牆。據說俄國人已在這堵牆下面挖了個洞，準備從這個洞中爬到英國使館裡，攻擊英國的衛兵，且不惜因而

引起一個突發事件。」[18]

按照當時的規定，所有攜帶武器的中國人，乃至各類軍警人員，一概不得進入使館區大門。中方政要來訪時，保鏢可以隨行，但必須解除武裝。另一方面，各締約國的大使及公使們也不可能自行組織武裝力量，突襲受到懷疑的蘇俄使館。[19]

於是，安國軍總部決意自負責任，發起搜捕行動。張作霖先派人與英、法大使商議，兩名大使一開始不能同意。安國軍代表說：「吾人前方正與敵人對壘，今總司令部所在地，即有敵人之一大本營在，危險孰甚，無論如何，非辦不可。」英、法兩國大使回答說，此事涉及變更條約，容各國召開會議討論。會議結果，允以相當條件，許可中國軍警前來，至於具體方法，則委託使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主持。

四月五日晚，安國軍總部召集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授以方略，定翌日早晨準備軍警三百餘人，赴東交民巷備用，便衣人等則以帶紅線為記，同時令其備一正式公文，聲稱使館界內遠東銀行、中東路辦事處、庚款委員會等處，有黨人陰謀暴動機關，事機迫切，立須搜查，請予許可等情。六日清晨，安國軍總部外交處長吳晉赴荷蘭使館指揮。十時以前，軍警及憲兵齊集，十時二十分，由荷使就警廳公文簽字，隨即著手搜查。

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郁文率大批軍警抵達蘇俄使館門口，十名彪形大漢抱在一起，用身體作木樁，強行撞開大門。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甘布克上前阻止無效，拔出手槍對空鳴了一槍，軍警們抓住甘布克，一擁而入。這一片面積寬廣的區域，包括使館辦公區、建有十處工作人員住房的大院子、軍事區域、遠東銀行和商務代表處所在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地段等，全都被士兵圍得水洩不通。[20]

槍聲響起時，李大釗正在裡屋伏案辦公，大女兒李星華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李妻趙紉蘭帶著小女兒炎華在院內散步。李星華驚嚇得扔下報紙，撲進父親懷中。

片刻間，屋外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群警察和憲兵衝進來，吳郁文按照片認出李大釗，將其逮捕。搜查結果，拘獲共產黨人李大釗等中國人六十餘人及俄人十餘人。

當日下午二時，軍警正在搜查時，使館武官室突然起火。「儘管蘇聯人試圖銷毀卷宗，當局依然查獲了大量文件。蘇聯人在一棟使館房屋外設置了障礙，將文件堆進壁爐裡，澆上煤油點燃。但中方軍警

急中生智，用水桶接水後，從煙囪澆下，挫敗了蘇聯人的企圖。」[21]

軍警在蘇聯使館查獲總共三千多份文件。這些檔案充分暴露了蘇聯特工機關在中國的秘密活動，還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名單等。此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對蘇聯駐上海和廣州領事館進行搜查，查獲大量檔案。

莫斯科領導人對此焦慮不安，於五月十二日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由伏羅希洛夫和加拉罕作中國問題報告。會議通過決議，派專人赴中國確保銷毀一切有損名譽的檔案，杜絕其他檔案被抄的可能。據蘇聯情報員阿加別科夫在回憶錄中證實：

> 一九二七年年中，在中國警察搜查蘇聯駐上海和廣州領事館後，我們收到了為全權代表處、商務代表處、情報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擬定的通電，通電命令檢查這些機構的檔案，銷毀那些可能損害蘇聯國外政權機構聲譽的文件。全權代表處和商務代表處立即著手清理檔案。挑出了一堆堆該燒的文件。這些檔案在全權代表處的院子裡燒了整整一個星期。火焰沖天，以致市政府以為蘇聯全權代表處發生了火災，打算派消防隊去救火。

> 我們收到了更加嚴厲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銷毀所有檔案，今後只保存最近一個月內的來往信件，保留的方法和條件是：要使大使館一旦遭受襲擊時，能夠立即銷毀一切損害名譽的材料。從如此匆忙的舉

動可以看到，莫斯科的驚慌失措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22]

蘇俄使館被搜查之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根據所獲各種證物，向蘇聯代辦赤爾尼（加拉罕已奉召回國）提出抗議，「收容共產黨，謀紊亂治安，為國際公法所不許，且違反此前締結之中俄協定」。

蘇聯代辦赤爾尼於同日向中國外長顧維鈞提出抗議，「軍警侵入使館房屋，事出非常，違反國際公例，侵犯使館尊嚴」。荷蘭公使以使館領袖的名義，表示「搜查使館界內房屋之不當」，作形式上的抗議。

蘇俄代理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九日向北京政府駐莫斯科代辦鄭延禧提出嚴重抗議，認為此舉侵犯蘇聯使館人員之治外法權，並提出四項要求：一，立即撤退監視之軍警；二，立即釋放所拘俄使館館員；三，交還使館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軍警劫去之錢物簿籍，即交還原主。在未得滿意答覆前，擬撤回駐北京之代使及職員。

北京政府外交部對上述抗議，經於十六日駁覆，電致中國駐蘇俄大使鄭延禧，讓其轉達蘇俄政府：

公使館之治外法權，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內亂機關。此次未搜查使館，僅於其附屬房屋內，查出軍火、宣傳物品，並捕獲重要黨人，足證俄人有意擾亂中國治安，破壞中國秩序，所提四項要求，與事實不符，礙難照辦。並聲明俟所獲宣傳共產文件翻譯告竣，再提嚴重抗議。[23]

根據一九二四年兩國簽署的《北京協定》，蘇俄政府承諾不在中國傳播共產思想，而被查獲的文件卻證明蘇俄違反了該協定。[24]

蘇俄理虧在先，惱羞成怒之下，以要求未有結果為由，召回駐京代表赤爾尼及館員二十餘人，於十九日乘車出京，取道奉天、哈爾濱回國。至是北京政府與蘇俄外交關係中絕。[25]

此後，南京國民政府也於十二月十四日正式宣佈對蘇俄絕交。蘇俄聲明從未承認國民政府為報復，並令上海蘇聯領事下旗歸國，中蘇關係乃告全面斷絕。

以蘇俄為師傅，更以蘇俄為主子

從被捕到被處死，李大釗在獄中度過了最後的二十二天。中共黨史記載：「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最後竟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李大釗堅貞不屈，沒有向敵人洩露黨的任何機密。」

實際上，李大釗並未受酷刑折磨，他被關押在門口掛著「優待室」木牌的單間，《晨報》報導，李大釗「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26] 李大釗從容書寫洋洋萬言的《獄中自述》，並聲稱：「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全責。」可見其身體狀況良好。

在審訊過程中，李大釗對很多實事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其部分內容如下：

問：你的姓名、年歲及何處人？現住何處？是何職業？

答：我名叫李大釗，現年三十九歲，直隸樂亭縣人，現住俄兵營內三十號房內。我前充北大教員。因

黨員資格，被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現在俄兵營內進行黨務工作。

問：你對現政府是反對的了？

答：當然是反對的。

問：你黨與蘇俄如何接洽妥協？

答：蘇聯為反帝國主義同盟幫，替我們訓練黨軍，軍中用俄教員。

問：你被捕時，由你屋內撿出之手槍是何處得來？

答：是俄國兵送給我自衛的，遇有

必要時，俄館亦可借給我們武器自衛。

問：你黨經費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經費之來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黨經費是舒啟昌管理。經費議決案月支二千元，向由遠東銀行、中國銀行自南方匯來，請查搜出帳簿便知。

問：這秘密稿簿上所教致馮煥章函稿報告軍政情形，內有「本黨接濟西北革命軍之六十萬已經陸續匯上，聞本月尚可籌出百萬並以附聞」等語。此款你如何過付？

答：上年九月、十月間，廣州議決接濟西北革命軍費後，黨軍入湘順利之時，李石曾等介紹馮玉祥代表劉驥、李鳴鐘二人與廣州方面接洽，當付接濟洋十萬元。最近該代表等兩次得接濟費洋二十萬元，前後三次共三十萬元。上年所議之六十萬、百萬之數實際上未能照數供

給。又，馮玉祥由俄回國後，始由于右任等介紹正式入黨，因而黨政府議決予以財政上之援助。上年北京政委員會傳遞消息於馮同志玉祥，將本黨在北方最近之工作及北方軍閥相互之關係作成書面，一併報與馮同志。函稿尾署名李大釗，是我自己寫的。

問：南北軍政各情如何傳達？

答：南方軍政各情由各黨員報告，由南方送至北京黨部，分轉國民軍及各方面。北方軍政各情由北方黨員報告，分轉各方。

問：這件稿簿上載有致顧孟餘函，所述用牛乳寫密信法？

答：信的正面寫些不相干的話，背面用牛乳書寫，接到後用火烘烤，字跡即顯。

問：現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帳一冊，你看是你自己登記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確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問：該帳冊一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貳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補助洋貳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義太覺寬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間張羅來的。

問：你素來光明磊落，不必說這不負責任的話，況此款係最近收入，你哪有不知道呢？

答：我細看帳冊上所登一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又，外友補助費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項均係由俄使館借來

的，經俄使館管理財務之俄國人米尼闊夫與我負責交付及接收。至補助費也是借貸性質，將來由會開帳寄到武漢黨部與俄人鮑羅廷清結。在去年，我會也常向俄使館挪用款項，但只是零用數，不過一二百元，係由俄使館前管財務之俄國人沙士闊與我交接。

問：俄代使借給你黨會辦公費是如何情形？共數若干？

答：因為黨會辦公費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問：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秘密通告第一號、第十四號所載運動方略，有發〔雙〕十節運動大綱、北方區農村工作計畫、聯俄反奉等通告，農村工作計畫，篇中有勾結哥老會，使其勢力集中之計畫，云云。此等計畫是何人違議？如何實行？

答：此等報告原由翠花胡同黨部移

> 至使館，內中所存之物甚為複雜，實記憶不清此項報告是何人違議。至勾結哥老會一節，我個人甚不贊同。

由此可見，共產黨的活動經費全部來自蘇俄，李大釗是蘇俄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一名知識分子固然可以為著他所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反對他認為不義的本國政府，乃至引入外力幫助他實現此一政治理想。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可以超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但他所奮鬥的目標，應當是讓同胞過上自由、富足和有尊嚴的生活，而不是與之相反。從李大釗到毛澤東，他們讓中國墜入三千年未有之黑暗與邪惡之中，他們罪不容赦。

李大釗比同樣得到蘇俄援助的蔣介石、馮玉祥、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對主子更加順從，偏偏從未得到蘇俄的信任和重用。作為紙上談兵的書生，跟手握重兵的蔣、馮的份量無法相比；即便就學術和文章的水準以及在知識界的地位而言，比起陳、瞿的份量也明顯不如。蘇俄看人下菜，你有怎樣的份量，便賜予你怎樣的位置。儘管李大釗比陳獨秀更早宣揚馬列主義—就在北京學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走上街頭抗議巴黎和會無視中國主權時，他正好發表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但他並沒有被捧成「中國共產主義之父」。

在中共的一大上，陳獨秀和李大釗都缺席，陳獨秀當選總書記，李大釗沒有任何職位。在中共二大上，陳獨秀等五人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李大釗僅名列三位候補委員之一。即便是北方地區，他也不是最高負責人—「中共北京地方執委會」的委員長是范鴻劼，後來與李大釗同時被捕並處死。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釗雖出席，仍未進入中央局，只有「駐北京中央委員」之虛位。

李大釗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與他的資歷不相稱，這是蘇俄方面決定的。他以化名「李琴華」出席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沒有被安排在大會上發言。他在蘇聯停留大半年，沒有獲得史達林和其他蘇共領導人接見。在此期間，李大釗多多少少觀察到史達林在全國展開的大清洗，他已對蘇聯模式有所疑慮，「循著蘇俄發展之跡，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27] 可惜，他上了賊船，只能硬著頭皮走到底。

直到馮玉祥再度倒戈，致使直系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大敗，中國北方的政局出現變數，史達林才想起還有李大釗這枚被閑置的棋子。蘇共趕緊派遣李大釗回國，做聯絡馮玉祥的工作。

張作霖搜查蘇俄使館，果然大有收穫。從四月十二日起，北京陸續公佈獲取的七卡車文件，擇其要者譯為中文，次要者舉其目錄，洋洋百萬言，其後輯為「蘇俄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行世（此書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察哈爾交涉員兼臨時編譯會會長張國忱在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近兩年來……蘇聯利用其外交官領事官之指揮，參與我國之內爭。蘇聯種種陰謀之事實，不一而足，舉其最著者，如供給軍械，鼓動工潮，勾結土匪，擾亂治安。甚至指揮軍隊參與我國之戰爭，密佈機關破壞我國之社會，其伎倆之險詐，無所不用其極，久已彰於國人之耳目，引起輿論之譏評。」[28] 於是，世人開始了然第三國際、俄共與俄國政府、鮑羅廷與其政治、軍事顧問團以及中國共產黨，均一脈相通，而以享有治外法權之俄國使領館為行使陰謀之策源地。其赤化計劃之周密狠毒、對華政局之分析精到、購買密探之遍佈全國，與使用經費之龐大，皆超乎常人想像。[29]

其中，重要資料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蘇俄政府寄駐華武官訓令。這些文件業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毀，僅餘全文二分之一，其譯文為：

> 茲特附送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之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項議決案所擬定之訓令寄發，仰即遵照辦理可也。……必須於張作霖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混亂。……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計劃（以下被焚）。……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

> 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群眾之適用武力戰鬥。為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事件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30]

第二部分為蘇俄在華密探之組織：其有關文件載於「蘇俄陰謀文證彙編」者共七件。蘇俄當時在華設有軍事及政治兩種密探系統，直接受莫斯科指揮，在華通過使館互相協助。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蘇俄顧問人員，均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執委會、軍委會代表，都接受蘇俄訓令。其密探機關部之組織運作有嚴格的規定：

> 各分機關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機關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員。各分機關部除得消息後，各自報告北京總機關部，由北京轉達莫斯科。在中國之各分機關部，得藏設於使領館等機關內，以託庇護，有時亦得暗設於市上飯店商號之中。……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部即可藏彼處，以資保障。惟在此種保護之下，無論如何，須以能保全秘密，及隨時探寄消息為要。[31]

蘇俄遣派密探員滲透於軍政憲警各機關及兵工廠暨各使領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謀略之深遠，決非他國所能及。

第三部分為蘇俄在華使用之經費：據北京警察廳公佈搜獲文件中，有關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有詳細的記載：

> 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九三、八五三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一四八、八三○元；（丙）國民二、三軍（按即胡景翼、孫嶽所部）經費共美金一四○、二四○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即需耗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32]

以民國十四、五年間物價之低，蘇俄所用在華軍政及培植共黨經費如此之鉅，其用心叵測，不難窺知。

根據這些檔案資料，張作霖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一、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係；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顛覆政府的活動。

面對各方從寬發落的呼籲，尤其是章士釗、楊度等人說情，張作霖又有些猶豫。他思量十多天後，作出一個特別舉動：「此事不可獨斷，須與京外十一將領商量。」為了讓各位將領獨立發表意見，他不以聯銜通電方式，分別致電孫傳芳、張宗昌、張作相、吳俊升以及吳佩孚、閻錫山等徵求意見。除了老謀深算的閻錫山沒有復電外，其他將領均主張「嚴辦」或「法辦」。吳佩孚回電說：「俄使潛藏赤禍，曷勝痛恨，剿辦敏捷，至為佩慰。」沒有明確回答「殺」還是「不殺」。張宗昌反問說：「前敵將士因討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獲赤黨首要人物而不置諸法，何以激勵人心？」顯然是主張嚴辦。將領的意見比文人重要，張作霖最後作出了處決李大釗等人的決定。

其間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親武漢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發表一則消息：「蔣介石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北京《晨報》轉載時略去蔣介石的名字，改稱「南方某要人」。有學者認為，這則消息是偽造的，因為就在安國軍突襲蘇聯使

館之後的第二天，蔣介石還致電蘇聯代辦表示慰問，張作霖查獲此電報之後為之震怒─南赤與北赤、國民黨與共產黨果然是一家人！[33]

不過，後一事實並不能否定前一事實。安國軍突襲蘇聯使館發生在四月五日，蔣介石四月六日發電聲援蘇俄，正好是「四一二」清黨之前六天，以蔣介石的權謀術而論，他完全可能以此迷惑蘇俄和中共，讓他們以為自己是如史達林所說的「可以放心擠乾的檸檬」。然後，蔣介石在上海及南方突然發出雷霆一擊，比張作霖在北京的行動更血雨腥風。等到「四一二」之後一兩個星期，蔣介石再致電張作霖，建議對方像他在南方殺戮共產黨人那樣，處死李大釗等人，這一轉變亦在情理之中。換言之，張作霖在北京突襲蘇俄使館、抓捕黨人與蔣介石在南方「清黨」，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內在關聯性。[34]

中共建政後，對參與「黨人案」的相關北洋人士，展開無情追殺。原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郁文，在北京鼓樓後的一座大雜院中被捕並被判處死刑，未及執行即瘐死獄中。原京師警察廳長陳興亞在鎮反運動中被捕，也瘐死獄中。負責審判李大釗的京師高等審判庭推事王振南，在上海被捕並被槍決。中共的濫殺和復仇並不能掩藏李大釗犯有叛國罪的事實：他並不是名垂青史的革命英烈，而是遺臭萬年的賣國賊。

在一九一九年與胡適的論戰中，李大釗提出中國的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方案，那就是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結合，改變人民的無知和麻木。為了達成這場革命，中國即便成為以蘇俄為首的共產國際的殖民地亦在所不惜。李大釗從俄國早期民粹主義者的經驗那裡悟出，中國知識分子需要到農村去，他卻來不及去了。

中共發起的一系列城市暴動招致慘敗之後，李大釗的學生毛澤東走向農村的廣闊天地─李大釗為最初熱情推動的運動留下的遺產，與其說是一種教條，不如說是很有價值的視野：農民和農村世界不僅僅是表示臣服、接受他人贈與解放之處，而且也是解放鬥爭必須開始之地。[35]

五四青年／青幫頭目／工運領袖

余輩時值青年，血氣未定，為事不慎，一言一行，動輒得咎，將恐日陷於惡，而不自知矣。

—汪壽華



一九五○年冬，中共開始鎮反運動，清除國民黨遺留的黨政軍人員以及民間秘密會黨。

上海當局將一九二七年被杜月笙誘殺的工運領袖汪壽華的屍骸挖出並厚葬，將其血衣放在工人文化館展覽。參與殺害汪壽華的馬祥生和葉焯山已是六十歲以上的老翁，安土重遷，不願離開上海。誰知共產黨念念不忘一九二七年共進會消滅工人糾察隊的「血海深仇」，兩人很快就逮，被押到滬西公審。當局組織成千上萬民眾前往「觀

審」。

馬祥生年紀大了，猶在刺刺不休的申辯；葉焯山則自始至終傲然屹立，不屑一語。主審官高聲一問：「當年暗殺汪壽華，你們倆個有份嗎？」至此，馬祥生亦無話可說。隨即，兩人被牽下公審台，當眾執行槍決。 [1]

與此同時，杜月笙的另一名得力助手杜維藩自香港冒險化裝北上，潛入滬濱，前後逗留一年多時間。杜維藩在上海時，親眼看見「汪壽華的血衣展覽」在被改成工人文化宮的東方大飯店舉行，旁邊有文字說明指出，那套血衣是汪壽華被害時所穿的。

杜維藩看了暗笑不已。回到香港之後，杜維藩向杜月笙、顧嘉棠報告此事。杜月笙搖搖頭說：「共產黨總歸免不了要騙人。」當初負責誘殺汪壽華的顧嘉棠回首前塵往事，這才說出汪壽華還未被掐死就被活埋的秘密，而汪壽華只是被打昏過去，衣服上絕對不會有血跡：「芮慶榮那一陣手勁，力道不曾用足，其實是稀鬆平常的事。偏偏芮慶榮把它當作奇恥大辱。」頓一頓，顧嘉棠繼續追憶說：「如果那一天我不去攔住芮慶榮，不讓他再請汪壽華吃一頓鐵鏟，那麼，共產黨現在展覽的那套血衣，可能就是真的了。」 [2]

魔鬼藏在細節中，這是工商管理界的名言。中共的歷史敘事和文教宣傳，卻從來不注重細節的真實。偽造汪壽華的血衣可以激發民眾對國民黨以及投靠國民黨的幫會的仇恨，卻被當事人揭穿了真相。

二十世紀的工人運動史，被共產黨理所當然地當作黨史的一部分，彷彿共產黨真如其黨章中所說，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工人運動跟共產黨的奪權運動並不完全重合，有時甚至南轅北轍、針鋒相對。

共產黨當然不會提及作為「革命烈士」的汪壽華跟殺害他的杜月笙具有同樣的身份—青幫弟子。早期的工人運動，不可能脫離青幫和洪門等有數百年歷史的傳統組織系統。共產黨用階級鬥爭之類的革命言辭來標榜，但要將工人組織起來，就「必須依靠『封建』組織的協助」。一九二○年代中期，中共在組織工運方面取得了令人激動的成功，但「每一步勝利都離不開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參加。這種聯合是多麼的不可靠，以致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不過數星期，悲劇便出現了」。 [3]

中國歷史上的劇烈變革運動基本可以分為兩大派別，一個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對既成政治展開批判的運動。從東漢黨錮事件中的清流派士大夫，到宋代的王安石變法，明代的東林黨和復社，再到清末的維新派和立憲派，他們是連綿相繼、一脈相承的。另一個是從秦末陳勝、吳廣暴動，到太平道、白蓮教、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種底層民眾的造反系統。這兩大派別在二十世紀以前基本上是持續對立或平行發展，兩者之間互不應援。努力使兩者攜手合作的最初嘗試始於孫文的革命運動。[4]

到了二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設立農民部和工人部，致力於「喚醒民眾」。一九二六年夏天開始的北伐戰爭的急速發展與工農運動的高漲，使得國民革命的衝擊波很快遍及全國。此時，擁有悠久歷史並曾在歷史轉折關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各種民間秘密結社也被席捲進來，並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對應新的局面。於是，便發生了汪壽華與杜月笙在上海灘的對決，他們同是幫會中人，而他們身後分別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他們的勝負也就預示著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勝負。

誰，又不曾是熱血沸騰的「五四青年」？

汪壽華並非根正苗紅的工人出身，而是受五四思潮影響的知識青年。那一代的莘莘學子，誰又不是思想左傾的「五四青年」？

一九○一年，汪壽華，原名何景亮，生於浙江諸暨檀溪鄉泉畈村。父親是一名秀才，原本做著千百年來士大夫「學而優則仕」之美夢，清廷廢除科舉，使之永遠被凝固在秀才這個最低的功名之上，不情願地以基層士紳的身份終老於鄉間。汪父與山西鄉紳劉大鵬的人生極為相似，是轉型時代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甩出既定軌道的傳統讀書人，其理想的破滅和家庭的衰敗構成了中國二十世紀變革的一部分，儘管他們的故事很少被歷史書寫。[5] 幸運的是，浙江的鄉村遠比山西的鄉村富庶，汪家靠著田產和商鋪過著富足的生活，汪壽華不必像劉大鵬家的孩子那樣下地幹活。汪父教導兒子學習傳統的四書五經，也送兒子去新式學堂學習新文化。

一九一七年，汪壽華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費對普通人

而言相當昂貴，汪家可以支撐，汪壽華往返家庭和學校之間，還能雇用腳伕搬運行李。兩年後，五四思潮從北方奔騰到南方，一師成為杭州引領新思想的先鋒。五四不單單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學生上街抗議、火燒趙家樓的活動，更是指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精神結構的、持續十數年之久的新文化運動。羅家倫所說的「使中國『動』」這一頗富戲劇性的主張，成為五四運動神話的精髓，它顯示了與過去無可避免的澈底決裂。[6] 經過五四的洗禮，傳統的士大夫轉型為新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對中國和對世界的看法與前一代人有了天壤之別。對很多年輕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理念，不是民主和科學，乃是更為激進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五四運動的傾向幾乎決定了以後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社會和政治的發展。[7]

一師學風趨新，設有英文、博物、足球、體操等新式課程，汪壽華在日記裡記載了學習踢足球的經過。國文老師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的著名學者陳望道，或許汪壽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來自於陳望道。當時，汪壽華在日記中對某些虛偽的共產主義者的「單面道德」不以為然：「共產主義一見人有物說共產，自己有物，一聲不響，這真是現在底講共產主義者。」汪壽華與一般學生不同，反對分數至上，「分數為虛名，今堂堂丈夫，甘犧牲其生命，為分數奴隸者，亦可怪矣」。在國文考試中，他就「今後之學生當如何」這個題目回答說：「研究科學」和「開啟民智」。他從各種新雜誌中曉得，青年的責任是「養成身心健全的人，做純粹神經用的事」。他更發誓要「苦學」，要改造「我國真正的弱點」，「努力，努力，無時無息，製造文明的武器，來做國家的根基」。[8]

在此期間，汪壽華大量閱讀新潮書刊，思想日漸左傾。他在日記中記載，從《星期評論》上讀到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受辱的情形，並評論說：「此次外交失敗，全從自己取來的。所以雖有美國極力幫忙，總是無能為力，你看可憐不可憐？」此時，他對美國的態度還算友好。還有一次，他因穿著一件用日本棉紗做的衣服，遭到一名市民的質問：「此日本貨也，你們還可買麼？」汪回答說：「此已早出中國錢購來，明是中國貨，則買無妨。」對方繼續反問：「如此，你們何必奔走東西，去勸導人不買日貨。」汪在日記中記載，自己當時「愧憤交集」，「自後宜謹慎小心」。幾年後，他報紙上發表文章譴責外國工廠對中國的壓榨：「中國人的衣、食、住都發生問題，處處要靠外國人，弄成不死自僵的現象。」[9]

一九二○年九月，經同學俞秀松介紹，汪壽華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三年之後，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大釗對蘇俄十月革命的鼓吹，使汪壽華等左傾青年將蘇俄視為人間天堂，自發組織「留俄團」

到蘇俄考察，卻在哈爾濱邊境遭到奉軍逮捕。一九二一年，他再度從海參崴赴莫斯科，卻因白俄軍隊阻隔交通，只好在伯力、上烏金斯克一帶的華工中活動，組織華工團體，「以革命知識為訓練，頗著成績」。[10]

一九二三年，汪壽華當選為赤塔遠東職工會中國工人部主任，次年又當選為海參崴職工蘇維埃委員，並創辦五一俱樂部於海參崴北京街，又組織遠東一帶的中國礦工工會，還設工人補習學校於各地。[11] 汪壽華出色的組織管理能力受到莫斯科的注意，讓他作為遠東職工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國際反帝同盟會議。挑選有發展前景的左派青年到莫斯科開會、參觀、受訓，是蘇俄「演變」中國的重要策略之一。

汪壽華在蘇俄停留長達三年時間，與工人同吃同住，與蘇共幹部廣泛接觸，其閱歷之廣、見識之豐，遠超過只是在學校唸書的鄧小平、王明、蔣經國等留學生。一九二四年底，莫斯科認為汪壽華才堪大用，可以派他回國攪動中國的「一團死水」了。

上海工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一九二五年初，汪壽華在家鄉結婚後的第三天，便趕赴上海參加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作了一個關於工人運動的報告。會後，他留在上海發動工運。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是在上海這座空氣中瀰漫著金錢和血腥味道的城市度過的。

一八四三年上海剛剛開埠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個長江入海口的小漁村，會變魔術般地成為中國乃至遠東的第一大都市。中國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少數的工業密集區：南滿、上海、香港−廣州地區。在上海，工業和運輸業的勞工佔總人口的兩成以上，他們是第一代勞工。[12] 在中國的所有城市當中，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影響，以作為產業中心的上海最為顯著。過去數十年裡，預示全國政治形式變化的工人運動呈週期性爆發，其背後有一個有規則的模式，即每隔二十年發生一次大事件。也許，正如托馬斯．傑佛遜描述美國那樣，每一代新人都發現有必要採取自己的革命行動。上海工人的抗議具有很大的政治

影響力，黨派、政權和個人命運的興衰，都與這個城市的集體行動有關。[13] 在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向民意作出讓步，並非害怕北京學生的罷課，而是難以承受來自上海的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所造成的經濟壓力。

汪壽華不是產業工人，要像楔子一樣打入工人社群，最快的捷徑便是加入幫會。自古以來，幫會便主宰著中國社會的潛規則。無論是傳統的農民起義還是近代意義上的暴力革命，都離不開幫會的參與。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都屬於四種秘密會社（青幫、在理教、紅幫、天地會）中的一個，其中勢力最大的是青幫。中共勞動部門負責人李立三認為，「上海勞動運動最大的問題是幫會問題」，主張共產黨員應當重視幫會工作。[14]

從五四青年和工運能手搖身一變成為幫會分子，對汪壽華來說似乎並不困難。青幫原來是圍繞大運河沿線的苦力組成的標榜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而隨著上海經濟的崛起，它成為以上海為基地的具有近代化特徵的黑社會組織。[15] 青幫很歡迎汪壽華這位知書達禮且有留洋經歷的年輕人加入，此類新鮮血液可以幫助青幫改善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的猙獰形象。汪壽華成為青幫中人，且是「通」字輩，比杜月笙的「悟」字輩還高出一輩。他比杜月笙年輕，但若論資排輩，杜月笙該叫他一聲師叔。

靠著在蘇俄所受之訓練，汪壽華在工人中影響力迅速躍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也節節高升。他先後擔任中共江浙區委（上海區委）委員、常委、區委農工部主任委員、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等職。五卅運動爆發時，轉任上海總工會宣傳部主任，協助李立三、劉華、劉少奇領導工人運動。五卅運動結束後，李立三、劉少奇相繼離滬，汪壽華遂任上海總工會代理委員長。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揮師東南，共產黨也想火中取栗。汪壽華作為上海區委軍事特別委員會成員，多次發動上海各行業工人大規模罷工，並參與領導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暴動。第二次暴動失敗後，孫傳芳下令查封上海總工會，四處搜捕汪壽華。汪壽華改名換姓、東躲西藏。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席會議，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作為武裝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特別委員會以陳獨秀為首，主要成員有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等。汪壽華「專做政治活動，與小資產階級周旋」。[16]

汪壽華頗懂得「統戰」之術。在第二次工人暴動時，他一再強調：「我們的目標是對付軍閥，而非對付資本家。」為了確保第三次暴動的成功，他積極活動，與上海的國民黨人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青洪幫頭目等頻繁聯繫。汪壽華負責「統戰」的頭號人物，是上海商界大老虞洽卿。此前，虞表示支持罷工，參與勞資雙方的調解，還幫忙找律師處理受傷工人起訴事宜，共產黨的宣傳媒體稱讚其為「紅色商人」。汪壽華常常出入虞洽卿住宅，密談至深夜。雙方的合作並無意識形態一致的前提，只是利益上的互相利用。[17]

一九二六年十月，孫傳芳對江浙和上海的統治搖搖欲墜。虞會見汪，策劃召開一個工商代表臨時會，商議以「上海市民維持會」的名義組織政府。對此機構，中共謊稱不會佔主要地位，只是暗中指導。然而，當孫傳芳的軍隊崩潰，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勝利之後，共產黨以為大權在握，立即讓虞靠邊站。虞洽卿也悄然改變態度，在上海各報發表啟事表示不會參與共產黨控制的上海臨時市政府。四月九日，汪壽華把一份中共起草的《告全上海市民》的宣言送給虞，希望他參加聯署，虞未同意。這是兩人最後一次會面。[18]

虞的變臉意味著上海的權力已悄然發生轉移。此後，直到抗戰期間在重慶去世，虞洽卿長期與蔣介石密切合作，成為蔣介石與江浙財團之間的重要紐帶。政治是風險最大、收益也可能最大的投資，投資蔣介石使得虞洽卿在個人的工商生意中、在日益隆升的社會地位上，都獲得豐厚回報，這一切是汪壽華與共產黨不可能給予他的。虞洽卿與蔣介石的關係，正代表著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一種全新的「政商」體制悄然成形。[19]

自命上海王，魂斷楓林橋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軍東路軍第一師薛岳部佔領上海龍華。二十一日，中共發佈總罷工命令，制訂各部作戰計劃。罷工後一小時，轉入暴動，上海七個區的工人糾察隊開始攻擊警察以及正在與北伐軍接洽歸降之直魯聯軍部隊。汪壽華和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全面指揮戰鬥，日夜不息。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成功，離不開汪壽華的準備和籌劃。一九二七年二月底，上海總工會所屬工會會員到達到二十八萬九千人，對外號稱八十萬人。三月四日，汪壽華主持召開工會幹部會議，決定組織五千人的工人糾察隊，還請來軍事教官對糾察隊員進行作戰訓練。

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佔據上海的政府機關和交通樞紐，上海成了汪壽華夢想的「赤旗的世界」。當天，中共主導的上海市民代表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選出臨時市政府委員十九人。汪壽華名列其中。次日，在市政府委員會議上，經汪壽華的說明，決定接受總工會在第三次起義前提出的「二十二條政治經濟總要求」。

在這二十天左右的時間內，汪壽華儼然是上海的新主人，不把臥榻之畔的國民黨軍隊放在眼中，更不服從中共中央那些白面書生的指揮。三月二十三日，他下令工人糾察隊協助北伐軍維持地方治安。二十四日，上海總工會遷至富麗堂皇的湖州會館辦公。二十七日，在汪壽華的主持下，上海總工會召開全市工人代表大會，有一千多名工人代表參加。會上，汪壽華報告起義經過，並提出收回租界、肅清一切反動派、工人武裝自衛、改善工人生活、發展和整頓工會組織等十七項任務。會後，汪壽華檢閱工人糾察隊，以此炫耀武力。次日，執行委員會推選汪壽華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區委主席團會議又內定汪壽華兼任市政府勞動局局長。

汪壽華瘦小的身軀內似乎蘊含著無窮的能量，他可以幾天幾夜不合眼處理千頭萬緒的事務。登上人生巔峰的汪壽華並未意識到，共產黨的失敗和他的死亡已指日可待。擁有四千多支步槍和二十多挺機槍的工人武裝，連杜月笙等人組織的黑幫武裝「共進會」都打不過，更不可能與蔣介石的正規軍相對抗。

三月二十七日，汪壽華面見蔣介石。在第二天的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上，汪壽華彙報了會見蔣的情況：「昨見老蔣，先加慰勞，他並無讚揚上海工人。我報告一點上海工人暴動的經過，他不大注意。……蔣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會方面聽軍事當局指揮，我沒有答覆。」其實，汪當時的答覆是：「糾察隊不同於軍隊，性質完全是工人自衛組織。」[20]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中，汪壽華志得意滿，沉浸在個人英雄主義的幻想中。

蔣沒有當場捕殺汪，不是不敢，而是不願手上沾滿鮮血。蔣並沒有放汪一條生路，他早已宣判汪的死刑，只是執行者另有其人。

四月十一日晚，綽號「杜大耳朵」的杜月笙正式下帖子邀請汪壽華到剛落成在華格臬路的杜公館喝茶。

當時，雙方已然劍拔弩張。中共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勸汪不要赴此鴻門宴，時任工人糾察隊中隊長的顧順章建議帶一個排的武裝去，均被汪拒絕。汪認為自己與杜私交頗好，輩分上是杜的師叔，杜不至於「欺師滅祖」，「去了或許可以把話談開，不去反而叫人恥笑」，只帶一名司機和一名保鏢前去赴約。[21]

杜月笙並不遵守幫規，對杜來說，政治或利益遠高於幫規。杜公館殺機四伏，等待汪自投羅網。

到了杜公館門外，汪壽華的司機在車中等候，汪壽華隻身一人入內。等汪進入大門，停在不遠處路口的另一輛汽車悄然開過來，靠近汪的座車。數名彪形大漢一擁而上，制伏了汪的司機和保鏢。一切在瞬間悄無聲息地完成。

一進大門，邁向杜公館燈火輝煌的大廳，往內一望，汪壽華便發現情形不對：張嘯林、馬祥生、謝葆生等人在大廳中橫眉怒目、殺氣騰騰。正要轉身離開，中門裡外，早已埋伏了「四大金剛」。以前，這些「晚輩」見到汪，總是畢恭畢敬，此刻卻面露兇光。

汪壽華詢問杜月笙何在，眾人沉默不答。汪欲大聲呼救，立即被葉焯山和顧嘉棠打昏過去。汪沒有看到杜一面，更沒有跟杜說上一句話。

聽到外面有動靜，杜月笙才在二樓現身，並吩咐手下說：「不要做（殺）在我家裡，否則新房子變成了凶宅。今後還有誰敢到我家來？」於是，這幫打手將昏死過去的汪壽華塞進一口大麻袋，扔到一輛轎車的後車廂中，運到郊區的楓林橋就地活埋。[22]

杜月笙為何投靠蔣介石？

解決了汪壽華，上海總工會陷入群龍無首的渙散狀態。凌晨時分，杜月笙組織的黑幫武裝「共進會」從各處攻擊工會據點，工會猝

不及防，毫無還手之力，據當時擔任《密勒氏評論報》記者的史諾估計，約有五千名共產黨分子被打死，「共產黨計劃實施恐怖統治，結果卻由他們自己享受了去」。[23]

上海總工會垂死掙扎，組織示威遊行。白崇禧、周鳳岐等國民黨將領命令軍隊開槍鎮壓。蔣介石在日記中簡略而冷靜地寫道：「四月十二日，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會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產黨煽動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蔣不會記錄軍隊開槍殺人的細節，更不會透露是青幫幫助他清除政敵—蔣本人早年曾拜在黃金榮門下，他成為國家元首之後，黃金榮退回了他的「門生帖子」。

「四一二」清黨的最高決策者是蔣介石，在上海的執行者是杜月笙。真正的「上海王」不是曇花一現的汪壽華，而是從此之後實際上統治上海十多年的杜月笙。杜月笙是孤兒，十四歲到鴻元盛水果行、潘源盛水果店當學徒。由傭差上升為鴉片提運，並投靠黃金榮，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的「公興俱樂部」。一九二五年七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成為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進入主流社會。

杜月笙一改傳統流氓身著短打、手戴戒指、卷袖開懷的打扮，四季身著長衫，打扮斯文。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以及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善斂財，更會散財。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黎元洪、章太炎、楊度都是其座上客。

杜月笙持葡萄牙護照，只受其領事的法律監督。有西方記者發現，杜月笙利用法租界貪汙、無能的風氣，成為法租界的真正統治者。杜氏在法租界的家，就像一個兵工廠。從這個兵工廠中，統治著他的王國。由於他擁有數百名武裝便衣人員，他的命令被奉行不二。[24] 杜月笙的存在，源於上海的外國當局，默許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對警察廣泛的滲透，因為只有與「暴力的買辦」勾結，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秩序。[25]

對於慈善事業，杜月笙是一個極為慷慨的人。他做很多收買人心的事情，持續多年請客，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必定出面組織賑濟。他有時裝出維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調解勞資糾紛。

那麼，為什麼杜月笙願意為蔣介石殺人放火呢？當然不是因為他

認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而是蔣介石承諾賜予他在上海販賣鴉片的特權。「並不是革命精神或是私人關係促使上海鴉片三巨頭向總司令靠攏，維持其賺錢買賣的現狀才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蔣介石當然也願意制訂出一個雙贏的計劃，以得到這些有勢力的幫會大亨的支持。」[26] 三月下旬，蔣介石派遣跟黑社會有密切聯繫的三名親信陳群、楊虎和王柏齡赴上海，與上海青幫三巨頭共同發起成立「共進會」，旨在反對共產黨控制的工會。四月三日，英國警務處在一份報告中稱：「張嘯林等人重新組織共進會，會員主要是幫會中人。目的是為了反對上海總工會和工人中的激進勢力。此舉是為了全力以赴地支持蔣介石。」

汪壽華是被杜月笙誘殺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杜月笙幫助蔣介石清共，被授予少將參議頭銜。黃金榮看到這個後起之秀的老辣，嘆息長江後浪推前浪，就此退隱。杜月笙迅速躍為幫中第一人。同年九月，杜出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一九二九年，又出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他先後擔任諸多企業及同業公會的理事長、董事之職，據說頭銜數量達到一百五十多種。[27] 同年，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的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重量級人士，中匯銀行業務頗為興旺。杜月笙在追求非法利益的同時，也不放棄在合法的貿易、工業和金融業中的純資產階級的商業利益，任何一個黑幫頭子都會有將自己「洗白」的企圖。

杜月笙的枯榮與蔣介石的成敗遙相呼應，他是秘密幫會在國民政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戲劇性體現，正如美國戰略情報局一份關於國民黨的機密報告中所說：「國民黨起於一個秘密會黨，在另一個秘密幫會的幫助下步入權力頂峰（前者指洪門，後者指青幫），認為有必要在反對內外敵人的雙重目標下組織其他形式的秘密幫會，以支撐蔣介石領導下的統治局面。」[28] 所謂「其他形式的秘密幫會」，大概就是蔣介石的門生們組建的具有法西斯特質的藍衣社吧。蔣介石對戴笠的重用，以及對杜月笙的利用，顯示了南京政權「政府犯罪化，以使犯罪官僚化」的本質。早在孫文的反滿革命中，「青幫及洪門的貢獻頗大，在中國政治史上，可說是一件奇異偉大的事蹟」。後來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希望拉攏青幫及洪門力量，將昔日「反清復明」的口號進化為當下「反共抗俄」的使命。[29]

抗戰勝利之後，杜月笙未能如願以償當上上海市長，發牢騷說自己是被蔣介石用完後就扔到床下的一把尿壺。很快，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走向崩解，中共軍隊攻佔上海。杜月笙沒有像黃金榮那樣留在上海而備受羞辱，也沒有追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避居香港直到死去。

國共兩黨都不是工人的同路人

對於國民黨來說，「清黨」使得南京政府治下的城市不再有活躍的工人運動，「工賊取代激進派，成為上海地區工人運動中黨派政治的主要角色」。戴笠的秘密警察和杜月笙的青幫的合作，共同創造出「黃色工會」，接手被鎮壓下去的「紅色工會」的位置。 [30]

對於共產黨來說，以汪壽華被誘殺為開端的國民黨「清黨」屠殺，以及此後在南昌、廣州等城市暴動的慘敗，使共產黨放棄了依靠工人和舊軍隊奪取權力的蘇俄模式，轉向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活動在城市的中共中央頭目們視毛為「流寇」。然而，隨著毛掌握的槍桿子越來越多，毛在黨內的發言權越來越大。

中國早期的工運領袖，如汪壽華、蘇兆徵、向忠發、顧順章等人，都有幾點相似之處。首先，他們都曾赴蘇聯訪問和受訓，是蘇聯打造出來顛覆中國政府的「第三縱隊」；其次，他們都兼有工人領袖和幫派頭目的雙重身份，生活作風上不脫流氓本色，這是由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所決定的；第三，他們最終都死於非命，毛澤東等在鄉下反倒倖存下來，說明在城市從事地下反對運動，比在農村從事農民起義更加危險。

在毛澤東之前，中共有過五任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秦邦憲，張聞天，向忠發是唯一的一名工人領袖。向忠發曾在武漢的兵工廠、輪船公司等多個工廠工作，北伐軍攻佔武漢後，出任湖北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早期工運領袖羅章龍描述說：「向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抬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罵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臉有傷痕。他結識一些無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好賭博，進出賭場，師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勢欺人，獨霸一方，人人說他是漢口的一個大流氓，望而避之。」 [31]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寧漢雙方相繼清黨，中共緊急召開八七會議，向忠發在會上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十月，向忠發參加代表團赴蘇俄，出席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

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到處演講，出盡風頭。[32] 如果汪壽華沒有在一九二七年被誘殺，向忠發的位置或許屬於汪壽華─上海作為工業中心的重要性高於武漢，汪壽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地位也比向忠發高。更重要的是，向忠發是個半文盲，汪壽華是師範學校畢業的五四青年，教育程度和理論水準都遠高於向忠發。

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員，知識分子多於工人；一九二八年，六大的中央委員，工人則多於知識分子，三十六名中央委員中，工人佔二十二人，向忠發名列第一，周恩來憤憤不平地說，「暴徒一大堆」。[33] 到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向忠發被架空，全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城市工人運動被弱化。向忠發一怒之下，不顧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周恩來稱其「墮落」了。這種墮落，不只向忠發一人，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中，二十二名工人出身者，除向忠發被捕變節並被處死外，相繼投降國民黨的有十四人。若汪壽華在一九二七年不死，即便當上總書記，亦難逃一死。

另一名中共早期工運領袖和特工頭子是顧順章。顧早年是上海南洋菸草公司工人，後加入青幫，因敢打敢殺脫穎而出，既受青幫大佬的青睞，也被共產黨看中，一度擔任鮑羅廷的侍衛。一九二六年，顧順章與日後成為中共開國大將的陳賡一起赴蘇聯接受「政治保衛」訓練。據國民黨中統特務萬亞剛回憶，顧順章被蘇聯KGB訓練成為「特務大師」，文的方面如化妝、魔術、操作機械、心理學，武的方面如雙手開槍、爆破、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跡等，無一不精。[34] 在上海工人暴動中，顧順章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密切配合汪壽華的工作。若汪壽華去拜會杜月笙時，有顧順章及其率領的「紅隊」特工人員嚴加護衛，杜月笙的手下便難以下手，汪則未必會命喪黃泉。

國共分裂後，顧順章配合周恩來主持軍委特務工作科，成為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不過，顧順章雖然成為中共黨內要人，但他並不真正信奉馬列主義，他本質上是一個熱衷於投機和賭博的流氓，「吸鴉片」、「玩妓女」、「打老婆」是其生活的常態。中共方面也承認，「任何革命中不能沒有此種人參加，拒絕流氓無產階級的歸附便不能做成群眾性的起義」。[35] 而中共起用顧順章，說明在城市進行地下活動的共產黨，不得不依靠幫會的力量，才能掌握交通、情報網的一端。

一九三一年，顧順章被國民黨逮捕之後立即叛變，供出了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機關，中共中央從此在上海無法立足，只好轉移到江西瑞金的「蘇區」。若不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身邊潛伏了中共特務錢壯飛，錢壯飛通知中共若干要人迅速轉移，周恩來、王明、博古、康

生、張聞天、鄧小平、陳雲等人很可能全軍覆沒，中共的黨史或許因此而改寫。而中共要人向忠發、惲代英、蔡和森等人都死於顧順章之告密。一時之間，顧順章在國民黨特務系統中出盡風頭，還出面勸降被捕的中共人員。[36] 此後，周恩來指揮中共特務將顧順章一家老小滅門屠殺，而顧順章在失去利用價值之後也被國民黨軍統殺人滅口。

繼向忠發和顧順章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做中共領袖。[37] 然後，中共的實際權力轉移到毛澤東手上，象徵著在中共的高層，城市邊緣知識分子和農民出身的軍頭取代工人階級。

文革期間的工人運動有汪壽華的影子嗎？

汪壽華這樣的工運領袖，就這樣在中國革命中消失了。工人從此不再是革命中的領導階級。直到文革中才出現汪壽華式的人物—比如，像王洪文這樣的掌握了一定權力的工人造反派。汪壽華等早期工運領袖的故事被演繹成各種版本，年輕的革命造反派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方式，與老一輩有很多相似之處：「上海國棉十六廠—王洪文的發跡之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曾是工人發動暴力的場所，文化大革命時成為鬥爭的策源地，歷史與現實何其相似，可能並非巧合。」[38]

如果說汪壽華時代的工人運動是共產黨躲藏在背後遙控，參與工人尚有一定自主性；那麼，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是「奉旨造反」，淪為高層權力鬥爭的工具—「他們的造反對象只能被毛澤東圈定。文革中可以對除毛澤東本人而外的任何幹部造反，但不能對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力造反。」[39] 在此大環境的制約下，文革時期的工人造反派領袖，無人具備汪壽華那樣的個人魅力。

即便如此，毛並不真正信任工人造反派，當上海人民公社宣佈成立時，毛關心的是「黨在哪裡」，在群眾組織的聯席會議之上，還必須有黨。毛澤東否定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之後的上海人民公社：「對毛澤東來說，就像對蔣介石來說一樣，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可能是一個有用的盟友，但也可能對政府控制構成潛在威脅，無論是得

到資產階級擁護的國民黨政權，還是聲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都是一樣。」[40] 換言之，黨永遠要有效地領導工人，而不是相反。

文革期間最崇拜毛澤東的主要是三類人：工人、學生和解放軍。工人造反派的不同派系之間發生殘酷的武鬥，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底層工人熱血澎湃地參與其中，他們在造反運動中很少提出勞動權益方面的要求，他們的人權意識並未覺醒，他們悲劇性地成為毛個人野心的炮灰。

安徽宣城的工人武鬥驚心動魄：在一次小規模的戰鬥中就拖回八具屍體，輕重傷員十多名，死傷的都是「鋼筋鐵骨戰鬥隊」的碼頭工人。當時尚是少年人的社會學家丁學良，親眼看到此種慘痛景象：「一輛輛半新不舊的板車上──那是他們生前賴以養家餬口的夥伴──躺著滿身彈孔的工人叔叔，他們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樣威風不滅。失去丈夫的孀孀們攜著半大不大的一群孩子，在寒風中吼叫；這些婦女多年相伴丈夫勞作於強者才能生存的碼頭，在刀口上添飯吃，養就一副粗放剛烈不認命的豪氣，哀哭不出幾聲，落不下幾滴淚，只嚷著要親手報仇。」[41]

那麼，誰是兇手呢？是拿刀槍或者勞動工具殺人的另一群工人嗎？可是，兇手那方也有工友遭到殺害，如此冤冤相報，永無盡頭。一群自以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工人，毫無憐憫之心地殺害另一群也是自以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工人。真正的兇手是在背後操縱工人彼此殺戮的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被共產黨煽動起來暴動的工人殺戮他們所認定的右派和反動派，而投靠蔣介石的杜月笙等黑幫成員以及國民黨的軍隊反過來屠殺暴動的工人；四十多年後的文革期間，工人造反派之間血腥屠殺，是一群信仰毛主義的工人的自相殘殺。丁學良如此描述死難者出殯時的場景：

> 出殯那天，領頭的是十六人持執的「聯指」巨幅戰旗；接著八部卡車，每部載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鋼筋銲接而成，花也是鐵的）和一具棺材。接著是三百名

> 「鋼筋鐵骨戰鬥隊」的碼頭工人，每人手執一柄粗木棍──那是他們日常勞作搬運重物時支撐板車的槓桿，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帶。他們以數百年不變的行頭，護送著亡友。冽冽寒風中，眾人均是粗布襤褸單衣，隱約露出古銅色的肌體；那場景，令我宛然重見秦末田橫五百壯士。 [42]

工人們以為是在用生命追求自由，沒有想到卻跌落到地獄的底層。毛澤東對死難者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人命對他來說只是一堆數字。

至此以後，中國再也沒有發生過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運動。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學生是先鋒和主體，有少部分工人參與其中，卻並未影響運動的整體走向。

17　王國維

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我惛不知，乃見他人之落井而輒追其後，爭民施奪，處士橫議，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王國維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早上九點多，一名身材瘦小、留著長辮的老人步出清華園南院校門，招呼了一輛排在校門外等候的人力車，前往頤和園。這輛人力車的號碼是三十五號。

十點多，人力車抵達頤和園，老人命車伕在門口等候，並先付洋五毫。老人隻身一人入園，漫步過長廊，在石舫前獨坐沉思。不久，即移步魚藻軒，吸紙菸。大約十一時，從石階上躍身入水。

旁邊正好有一名園丁目睹此一場景，立即入水搶救，撈上岸時僅兩分鐘，但老人已然氣絕，死時裡衣尚未全部打濕。老人死志已決，用頭埋入淤泥，遂窒息而亡。有人描述當時的場景說：「先生年老，湖水雖淺，底皆淤泥，入水時必頭先觸底，以致口鼻俱為泥土所塞，因之氣窒。園丁不知急救術，以是貽誤而死。若使當時即以人工呼吸法營救，或能更生，亦未可知也。」[1]

大約下午三點，頤和園的工作人員詢問在門口守候的車伕，才知道車伕拉來的客人正是自盡的老人。於是，車伕拉上一名巡警趕回清華園報信。

下午七時，清華全校師生都知道了噩耗：死者正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前一天，清華剛放假，許多師生尚未離校。晚上九點，教職員、研究院學生等二十多人，乘兩輛汽車前往頤和園。園門已關，守兵不讓進，經再三交涉，才允許校長曹雲祥、教務長梅貽琦及守衛處烏處長進入。

第二天早晨，王國維的夫人潘麗正帶著孩子們與清華師生一同入園收殮屍體。現場狀況極為淒慘，王國維的學生劉節寫道：「先生淹沒已二十餘小時，面目紫脹，四肢拳曲，匍匐地上，令人慘不忍睹。」[2] 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則寫道：「父親遺體置亭中地上，覆一破汙之蘆席，家人及學生莫不痛哭失聲。」[3]

下午四點，檢察官前來驗屍，在死者口袋中，搜出遺囑一封，紙已濕透，字猶清晰可辨：

>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第三子王貞明）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4]

王國維之死，震驚士林，就連在日本旅行的台灣作家劉吶鷗都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記載說：「看上海來的報紙知道王國維投身北海（此處記載地點有誤，應為頤和園昆明湖），說是憤世。不知他的真意在何。」[5]

對王國維而言，死亡並不艱難，或許還是一種解脫。山川人物，一切缺憾，還諸天地；戰爭和平，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盡付昆明湖畔之暮鼓晨鐘。王國維早已用著述奠定了自身的歷史地位，從他投湖自盡的那一刻起，其影響力又溢出學術界之外。雖然他留下遺書交代後事並說明自殺原因，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

辱！」這十六個字仍引發人們作出種種不同解讀。後人不得不從他生前的隻字片語中尋覓各種可能性，或從別人回憶他生活的蛛絲馬跡中建立完整的構圖。[6] 但是，正如史學家巴勒克洛夫（Barraclough）所論，「我們所讀的歷史，雖說是根據事實，但更嚴格地來說並非事實，而是一連串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議決」；那麼，王國維為何自殺？為何在此時此刻自殺？

清華園最後的溫煦時光

陳寅恪為王國維寫的《輓詞》極盡哀婉沉痛，唯獨這四句稍有亮色：「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任教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一年多，是王國維晚年最安穩、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王國維受聘成為清華國學院導師，胡適、吳宓和梁啟超等三人起了關鍵作用。

一九二五年，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創立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改制成大學，並籌備國學研究院。校長曹雲祥是胡適留美時的同學，請胡適為國學院出謀策劃。胡適建議融合英美名校研究院制度和中國古代書院傳統，聘請梁啟超、章太炎和王國維三人為導師，且對王國維評價最高：「現今的中國的學術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7] 胡適與王國維有過來往，曾與之暢談戴震哲學、中國戲曲和古希臘悲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胡適陪同曹雲祥前去拜訪王國維。第二天，曹雲祥就在給胡適的信中明確表示願意聘請王國維到清華任教。

被委任為研究院籌備主任的吳宓，也不遺餘力地促成王國維來校任教。吳宓對王國維的學問評價極高：「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世。余獨喜先生早年文學、哲學論著；以其受西洋影響，故能發人之所未發。」吳宓在自編年譜中如此描述前去聘請王國維的情形：「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係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8] 王國維向來不喜歡新派人物，

以為吳宓這個留學哈佛的年輕一輩學人派頭十足，沒有想到他是一位行禮如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吳宓的老派禮儀讓王國維決定受聘。此後一年多，王國維與吳宓相處愉快，在遺書中交代請吳宓和陳寅恪處理其藏書。

梁啟超「性好動」、「富於領導力」，雖然校方沒有任命他擔任行政職務，但他不知不覺成了「實際上領導一切」的「山長」。梁啟超知道自己學問不如王國維，常常對學生說，如果遇到疑難問題，「先問王先生」，並且「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王為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其後」。梁啟超與王國維政見不同、學問路數不同，但彼此尊重，配合默契。當時國學院的學生回憶說：趙元任、李濟以後學自居，陳寅恪以長輩待梁、王，而梁又事事推讓王，故五大師「排座次」為王、梁、陳、趙、李。每個人都「學術湛深，文章淹貫」，彼此之間又能「集思廣益，撝謙自下」，故而短短兩年間清華國學院便聲名鵲起。[9]

溥儀任命王國維為南書房行走，讓王國維有了「帝王師」的尊貴身份，也按時入宮值班。溥儀被馮玉祥的軍隊趕出紫禁城之時，王國維「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一個月間，「日在驚濤駭浪間」。[10] 但王國維並沒有追隨溥儀去天津租界，而是接受清華大學的聘書，並表示「離此人海，計亦良得」──顯然，他有意躲避小朝廷的勾心鬥角。溥儀對此不無失望，自我解嘲說：「我無養賢之貲，清華為我暫時養賢，亦稍慰我心。」陳寅恪因「康門弟子」梁啟超與「溥儀老師」王國維同時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特為國學院同學戲題一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王國維從地安門織染局十號遷居清華園西院十七號（後改為十六號）、十八號，半年後妻子和孩子一起遷入。當時，清華教工宿舍分為南院、北院、西院三部分。南院為兩層西式建築，多為年輕學者所居，趙元任、陳寅恪等居住於此。北院為外籍教師所居。西院則是中式院子，為資深教授居住，合計二十戶，每戶都是朱紅漆的大門及廊柱，鑲嵌閃著金光的銅環，顯得富麗堂皇。

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描述說，他們一家住兩棟房子：「每棟正房三間，右手邊有下房一間，左邊外為廚房，內為浴室及廁所。其設備已稍具現代規模，有進口的抽水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鐵皮製成，天氣稍涼後，身體接觸盆邊，有一種冰涼透骨的感覺，因此後來將它拆下，改用木盆。……那個時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數也未見識過這麼新式的衛生設備。」而王國維書房的擺設極為簡樸：「書房為三間正房的西間，三面靠壁全是書架，書籍堆放到接近屋

頂，內間小室亦放滿了書。南面靠窗放大書桌一張，籐椅一只，書桌兩旁各有木椅一把，備學生來訪時用。」[11]

清華給王國維的薪資相當優厚。清華一般教授月薪為二百五十元；吳宓是研究院主任兼大學部西洋文學教授，月薪三百元；王、梁、陳、趙四位導師的月薪則為四百元。[12] 王國維一家生活在風景優美的「水木清華」，總算可以不必為生計憂愁。王國維嗜好古書，一旦到琉璃廠淘書，很可能花光半月薪水，潘夫人必須精打細算才能維持家政。王國維愛書如命，還建議學校多購書籍：「校中事，弟建議必多購置書籍，然每歲僅能購萬元，而預算亦尚未定，然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矣。」

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的授課內容相當專精，作為經史小學專任導師，一九二五年秋季學期講授的課程包括每周《古史新證》一小時、《尚書》二小時，與《說文》一小時。他採取「談話式的研究」而非「演講式的上課」，其講義「隨講隨發」，融入多年研究心得，故而極受已經有相當研究能力的研究生之歡迎。

不知不覺間，王國維成了清華校園內的一景。清華園中，只有兩個人只要一看背影就知道是誰，一是王國維，辮子是他的標誌；另一個是梁啟超，兩邊肩膀似乎略有高低，或許是曾割去一個腎臟的緣故。王東明回憶說，父親潛心學問，除了愛抱小孩和養一隻貓，「父親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13] 戲曲研究者不愛看戲，這倒出人意料。

王國維的穿著簡樸之極：「父親對儀表，向來不重視，天冷時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的罩衫，另繫黑色汗巾式腰帶，上穿黑色馬褂。夏穿熟羅，或夏布長衫。除布鞋外，從來沒有穿過皮鞋。頭上一頂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臘月，也不戴皮帽或絨線帽。」[14] 這倒跟學生徐中舒的觀察相印證：「先生身著不合時宜之樸素衣服，面部蒼黃，鼻架玳瑁眼鏡，驟視之幾若六七十許老人（其實那時王國維僅有四十七八歲），態度冷靜，動作從容，一望而知為修養深厚之大師也。」[15]

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年，王國維將研究重心轉向滿蒙歷史與元朝歷史。他一生無意於政治活動，「生死書叢文字間」，但其學術具有鮮活的時代氣息。當時，蘇俄和日本對北方的滿蒙地區鯨吞蠶食，華北

亦不穩定，王國維研究滿蒙的歷史，有經世致用之意。元月十四日，寫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認為中國歷史上很多記載蒙古史事的著作都「虛誣不可信」。二月，讀《元朝秘史》，寫成〈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刊登於日本《史學雜誌》。三月，撰〈金長城考〉，指出金代的長城從東北到西南，長三千多里，「為近古史上之一大工役」。四月，從友人處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並翻譯收入其中的日本學者寫的《韃靼考》等論文。五月，修改論文〈蒙古上世考〉、〈遼金時蒙古考〉等。[16] 可見王國維在去世前夕，在金元歷史方面用功之勤之深。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課程結束、學期告終之日。當天中午，師生餐敘告別。開席四桌，師生談笑不拘形跡。王國維依然保持嚴肅，僅僅談及蒙古史料等問題。梁啟超頗為興奮，起立致詞，表揚學生成就優異，勉勵大家「繼續努力，清華必成國學重鎮」。王國維亦點頭贊同，眾人並未發現其有異常之處。席間，有位山西學生擔心北京成為戰場，邀請王國維去山西長治避難。王回答說：「沒有書，怎麼辦？」書生本色，至死都離不開書。

晚上，學生謝國楨等來訪，暢談一小時。王國維說：「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送走學生後，他評閱學生試卷，草定遺書，然後安然入睡。他選擇學期結束、教學完成之後結束生命，嚴謹負責、從容不迫，對得起清華，也對得起學生。

葉德輝之死：讀書種子，人故鬼新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直接的導火索有兩個。就家事而論，年僅二十八歲的長子王潛明突然病逝，給他以沉重打擊。禍不單行的是，其姻親及多年好友羅振玉毫不照會便將女兒帶回娘家。王國維將兒子供職的海關發放的撫卹金寄去，卻遭無情退回。羅振玉多次來信，對王家嚴詞指責。本來是婆媳間常見的細小矛盾，最終演繹成兩家至交的恩斷義絕。

就國事而言，黨軍北伐，北京政府即將傾覆，王國維對共產黨、國民黨以及馮玉祥都十分厭惡，他勉強接受北洋政府的統治，卻不願

生活在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將全部被剝奪的黨國。他自沉之時，正是馮玉祥的國民軍進抵鄭州，與北伐軍會師之際。而馮玉祥在一九二四年驅逐溥儀出宮，在王國維看來是一種極不守信約之惡劣行動。何況馮玉祥有倒戈將軍之稱，為人反覆無常，以王國維之重視完美之持守的理想，對於當時軍閥政客之唯圖一己私利而置國計民生於不顧的投機反復之行為必當極為憤慨。[17] 臨死前幾天，王國維在跟朋友和學生交談時，多次提及「馮玉祥將入京」之事。

當時，北京《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戲擬黨軍到京所捕之人〉，王國維的名字赫然在其中。目前並無史料證實王國維生前看到或聽說這篇文章，但當時北京已瀰漫著恐怖氣氛。「及奉軍戰敗於河南，北京震恐，以為黨軍旦夕即至，其平昔與黨人政見不合者，皆相率引避。」梁漱溟亦有一段追憶：「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講學則在京，故而每每往來京、津兩地。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謾知識分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

當時，王國維對來訪的學生姜亮夫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的辱。」姜亮夫認為：「先生的自殺，乃完全因共產黨的迫害文人所致。……當時共產黨在北平所製造的恐怖氣氛，使靜安先生走向自殺的路子。」[18] 這一點，在王國維的遺書中，以「義無再辱」四個字說得明明白白。對此，葉嘉瑩的解讀是，「他所畏懼的乃是由外界迫害加之於他自己精神人格上的一種汙辱」。[19]

從南方傳來的那些可怕消息中，藏書家和學者葉德輝被湖南暴民自行設置的「人民法庭」處死，對王國維刺激最大。顧頡剛寫道：「這種事情（葉被殺）或者深深刺中了靜安先生的心，以為黨軍既敢用這樣的辣手對付學者，他們到了北京，也會把他如法炮製，辦他一個復辟派的罪名。與其到那時受辱，不如趁黨軍尚未來時，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園裡死了，倒落個千載流芳。」[20] 顧頡剛是投靠國民黨的左派，此前向王國維請教過學術問題，但對王的政治立場大不以為然。顧以為王自殺是要討好清室，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段話油滑輕佻，隱約有幸災樂禍之意，不過點出葉德輝被殺與王國維自殺之間的關聯性──如王世昭所論：「這一筆賬是要放在共產黨頭上算的，因為王國維不是死於國民軍北伐，而是死於葉德輝之罹難長沙；他鑑於共產黨的摧殘學者，慘戮文人，故在無可奈何中跳水自殺。衛聚賢說得好：『共產黨殺了葉德輝，逼死王靜安，王先生如果尚在，被關在鐵幕中，一樣的也被清算了。王先生的自殺，可謂高人一着。』」[21]

葉德輝以學問精湛聞名，卻個性詭僻，名聲惡劣。[22] 也許見識

過太多風風雨雨，葉德輝對此次的北伐之役並不放在心上。其弟子陳子展去看他，問及是否知道外面宣傳「鏟除土豪劣紳」之事，葉笑言自己乃是藏書家，並非土豪劣紳。

葉德輝的日本弟子鹽谷溫追憶，當北伐軍進入湖南，毛澤東等挑動的農民運動轟轟烈烈時，鹽谷溫前去看望葉德輝，勸其到日本避難，順便「訪遺文，講古學」。葉笑答：「上海革命黨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與弟無往來，此次在上海軍民中宣言，湖南有葉煥彬，不可不竭加保護，若殺此人，則讀書種子絕矣。此人可感，殺我不足懼，惟以弟為讀書種子，則真知己也。弟與人笑談，民軍斷不殺我，土匪則殺我。民軍聞之，莫不大笑。」[23]

從這段對話看出，葉德輝埋首古籍之中，對世事變遷太過無知。章太炎在清末時是參與同盟會的革命者，但此時已與赤化的國民黨格格不入，因倡言反對黨軍北伐，而遭國民黨下令通緝。在葉德輝眼中，章太炎仍是地位尊崇的革命黨人；而在國民黨眼中，章太炎和葉德輝一樣都是「封建餘孽」，章太炎幫葉德輝說話，於事何補？更何況，「民軍」早已「土匪化」，既然「劉項從來不讀書」，對「讀書種子」哪會有半點疼惜？毛澤東公然叫囂「痞子運動」，豈會因為害怕被葉視為「土匪」而放他一馬？

據說，葉德輝惹禍是寫了一副對聯諷刺農民運動：「農運宏開，稻粱菽、麥黍稷，盡皆雜種；會場廣闊，馬牛羊、雞犬豕，都是畜生。」據葉德輝後人所撰之〈先君葉德輝遇害事實〉記載：

> 今年三月，湘長沙亂起，人皆以先君負重名，為之危，勸其他避，先君以近日既不與人交接，復未論是非，自可置身事外，不意初七夜，突有無數暴徒，手持梭鏢將屋宇包圍。時先君方自撰年譜，聞變欲走，然已不及。是夜，先君至特別法庭，逾日，親友往問，見先君神色自若，以為可保無虞。至初十日亭午，特別法庭委員提問，禮貌尚優，先君自知不免，閉目不視，問之則曰，吾不願見汝等賤種也。郭純景有言，命盡今日，汝等亦不久於人世矣。遂遇害。[24]

葉德輝死於三月八日而非十日。《東方雜誌》的一位編輯，當時還是中學生親眼目睹了屠殺的過程：

> 時為三月八日婦女節，余隨師友參加肅清反動份子示威大會，因人小，什麼都看不見，聽不到，遠遠地只聽到槍聲兩響，群眾大亂，四散驚逃，我隨王林蘇國文老師立即前往觀看：只見葉、余（余太華金號老闆余治華）均著皮袍馬褂，雙手反縛，同時倒臥血泊中，慘不忍睹。當時任大會主席的是所謂中央候補委員夏曦，其他共匪頭目還有凌炳、郭亮等都在臺上。司儀的是名體育教師李惠迪，因尚無麥克風，只好手執錫製大喇叭，大吹特吹，每一句話都要重複三次，即向正中及左右各一次。此為促成兩月餘後長沙五月二十一日馬夜鏟共運動的近因。其後郭亮夫婦亦被何芸樵（何健）主席派員在嶽陽逮到，亦公開槍決於教育會坪，並梟首示眾於長沙司門口湖南省會公安局前，青蓮紙室對面電線桿上七天，可謂為葉、余二氏報仇了。[25]

葉德輝面臨死亡，尚能保持風度與氣節。「少年科第，為湘劣紳。謗滿天下，人故鬼新」，葉德輝之死，包括其家中的珍本藏書遭到暴徒的劫掠毀損，讓全國知識界嘆息不已。

葉德輝臨死前發出詛咒，預言殺害他的人不得善終。果然，參與殺害葉德輝的地痞流氓，數月之後皆遭國民黨軍隊之剿殺。當時下達抓捕和審判葉德輝的命令的中共黨棍柳直荀，此前畢業於教會創辦的雅禮大學並獲文學士學位，此時卻投身共產黨的殺戮事業，任湖南省

政府委員和省農協籌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柳逃過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一劫，後來一度代理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又任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要職，若能熬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也算是「開國元勛」之一。然而，一九三二年，在中共內部更加殘酷的肅反運動中，柳直荀等一千五百多人被打成「國民黨改組派」、「AB團」，逮捕關押，嚴加拷打。柳直荀在湖北省監利縣周老嘴心慈庵被處決，死得比葉德輝更慘。

像柳直荀這樣被自己人殺害的中共幹部多如牛毛，百般遮掩的中共黨史中不會有他的名字。柳直荀戲劇般地被人們記得，乃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其遺孀李淑一將一首悼念亡夫的〈菩薩蠻〉詞寄給毛澤東。那時，大概正遇到毛澤東與江青鬧彆扭，毛忽然思念被他拋棄並遇害的楊開慧，遂復信李淑一，附上〈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一首，其中有「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之句，「驕楊」當然指「楊開慧」，「柳」便是指「柳直荀」。文革時期，一些民眾常常以這首詞來曲折地表達對江青的不滿。

非為殉清，乃為殉真理

在王國維自盡前幾天，王國維的友人金梁曾與之長談。金梁記述說，王國維平時性情靜默，那天卻不同尋常地憂憤，「憤激幾泣下，忽然談到頤和園說，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

除了清朝的遺老遺少外，情感上比較傾向清室的學人大都認為，王國維自殺是為了殉清。比如，吳宓評論說：「王先生此次捨身，其為殉清室無疑。大節孤忠，與梁巨川同一旨趣，若謂慮一身安危，懼為黨軍或學生所辱，猶為未能知王先生者。」[26] 陳乃乾在〈觀堂遺墨序〉中也指出：「夫先生以身殉遜清，實無補已亡之社稷，而中國學術之有待先生者無涯矣，孰重孰輕，先生辨之審矣。然先生不死於光復，不死於復辟，竟死於燕都承平之日，博亡朝『忠愨』之封，真先生不幸，亦吾國文化之大厄也。」[27] 後世有學者甚至認為：「觀堂自沉，依當時理解觀堂心境之遺老所見，乃代溥儀『受戈』，欲令北伐軍『引甲而退七十里』，甚至『引甲而歸』，以求能保全『吾君』溥儀。」[28] 這種說法未免太過野狐禪，王國維無論如何迂腐，也不至於認為自己的死亡可以讓北伐軍退兵。

其他一些人士否定了王國維之死乃是殉清的推測。與王國維常常來往的殷南指出，從王國維在考古方面的研究可以知道，王國維不是忠於一家一姓的遺老遺少，不為綱常名教所囿，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太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捨伯邑而立武王也，周公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這種思想，豈是衛道的遺老們所能有的？即使有這種思想，也是不敢寫的。而清朝多爾袞之娶順治的母親，遺老們因為禮教的關係，一定替他諱言，而王國維認為按照滿洲風俗不足為奇。所以，殷南反問說：「你看他那身邊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29] 史達也指出：「王先生的自殺，不在清朝打翻之際，也不在廢帝被逐出宮之會，可見這一死實在並非『乃心王室』。」[30]

葉嘉瑩進一步考證說，靜安先生的死並非為表示對清室效忠，他對清朝王室之態度相當疏遠。[31] 王國維之所以接受溥儀授予的南書房行走之職，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讀到大內收藏的秘笈。他從不參與小朝廷內部的爾虞我詐，也看不起不學無術、遊手好閑的遺老遺少。王國維當然不認同民國，辛亥革命後避居日本多年，拒絕使用民國年號；但他對清室也並非愚忠，張勛復辟時他置身事外，諷刺復辟是「復夢」。所以，王國維「對於遜清與民國任何一方實在都不能完全歸屬」。[32]

王國維寫的〈頤和園詞〉，有人認為是懷念清室，但葉嘉瑩指出，普通讀者對王國維「在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仁者的襟懷與史家的筆法乃全然無所體認」。王國維在給日本友人鈴木虎雄的信中袒露了心路歷程：「此詞於覺羅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於全國民之運命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於此者。」[33]

因此，葉嘉瑩認為，在中國近代化的變局中，王國維乃是「一個文化認同混亂時代的犧牲者」：

> 靜安先生的悲劇，既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文化激變之時代中，新文化道德價值不能及時確立所造成的認同混亂，以及政黨之爭可能加之於一個有理想、有持守之學者心理上的嚴重威脅，也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不能追隨時代前進而一意迷戀於保守的人，所可能造成的

偏頗愚執的嚴重的錯誤。時代既有負於靜安先生，靜安先生亦有負於所生之時代。[34]

在王國維的葬禮上，清華研究院的師生都行鞠躬禮，唯獨陳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禮，師生為之動容。陳寅恪在文化背景、精神氣質上與王國維最相似：他的祖父陳寶箴當過前清的湖南巡撫，他的父親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詩人陳三立。陳寅恪撰寫了長篇悼亡詩〈王觀堂先生輓詞〉，以及〈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並為王國維的遺著寫序言，另外還有輓聯和七律輓詩。[35] 陳寅恪一生中傾注文字最多的死去的師友就是王國維。

在《輓詞》的序言中，陳寅恪對王國維自殺的原因提出獨到的解釋：「凡一種文化值其衰滅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他認為，由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使得「三綱六紀」之文化精神，已銷沉淪喪。此種文化浩劫，為前所未有，「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所以，「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進而指出，王國維之死，「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不僅只是「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而是「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在紀念碑的碑文中，他強調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換言之，王國維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黨國是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專制之國，作為「愛自由者」不可能活在「一九八四」的「美麗新世界」。王國維不是殉清，而是殉真理、殉自由、殉文化。

王國維生前多次張揚哲學、美術、文學、文化、真理的獨特價值。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說：「天下有最神聖、最珍貴而無與於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他在〈文學與教育〉一文中對比政治家與文學家的差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予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予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

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沬。」王國維是少有的將學術與真理貫通的知識人，他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王國維之死，在中國知識界產生極大震撼。種種截然相反乃至自相矛盾的評論，顯示出知識界整全性的世界觀已然破裂，或者說，再也找不到「共識」。王國維以他的自沉，標識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 中國士大夫追求內聖外王，治學的目標是追求完美政治的終極理念，即錢穆所說的「學治」。但是，二十世紀以來，道德精神無法經由學術包裝起來，和政治不再存有依附關係，而政治理念也無需披上道德的外衣。從王國維自沉之後眾人討論之例來看，時代環境和氛圍影響人們的處境和活動，甚至包括如何評價人物行為，而人們也藉由各種評價所衍生的概念，進而改變或充實原先的內涵。道德政治化在民國的沒落，至少說明政治取向裡，道德已經失去它本來的光芒。新的知識分子不再將追求崇高的道德價值和政治串聯在一起，士的理想似乎也將終告結束。[36]

蘇俄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共產主義是最邪惡的思想

若是普通的軍閥混戰，王國維不會過於緊張。民國初年以來，王國維經歷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軍閥戰爭，統御北京的總統和總理走馬燈似的輪換，可謂「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但這

一次的黨軍北伐，與此前的軍閥戰爭完全不同，無論是南方的國民革命軍，還是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其背後都是蘇俄的力量，蘇俄秉持的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若黨軍獲勝，就是蘇俄獲勝，共產主義的邪惡思想必將汙染神州大地。中國不僅將亡國，更將亡天下、亡文明，這就比明清易代和民國取代清朝更為嚴峻。

清初以明朝遺民自居的士大夫們，已有「亡國」與「亡天下」之區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在這些大儒看來，易代之際的危機，正在於這施暴嗜殺以至受虐自戕中「人道」的淪喪，這是比亡國更令人絕望的情境。即便如此，王夫之等人沒有選擇「死節」，而是活下來，乃是因為「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由此，他們確立遺民生存的大意義。[37] 這也許是王國維在清朝滅亡之後活下來堅持學術研究的價值支撐。但是，當黨軍北伐毀滅一切文化和人道時，他只剩下用結束生命來抗議這個最後手段。

晚清以來，中國的士人大都敵視俄國。一八九七年前後，王國維對沙俄極為反感，斥責沙俄對中國「如圈牢羊豬，任其隨時宰割」。一九一五年下半年，有關沙俄是敵是友的問題，引發知識界的一場大爭論，《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刊登了若干論戰文字，還有人編輯成《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一書。身在日本的王國維雖未參與論爭，但不會對這個話題一無所知。

沙俄本來就夠壞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蘇俄更是升級換代，成為亙古未有之邪惡帝國。那時，王國維就意識到，俄國革命將影響東方各國的內政外交。李大釗從十月革命中看到的是天堂般的「赤旗的世界」，王國維看到的卻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恐怖地獄，「俄羅斯赤地數萬里，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他在給羅振玉的一封信中寫道：「俄德過激黨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聞諸國有翦除之計。……德利用之以傾俄，終受其禍，乃甘蹈其覆轍而不悟耶！長此以往，則全世界將受其禍。……中國報紙亦復陰贊其說，我生不辰，如何如何！」他精闢地揭示出十月革命之暴虐殘忍，不僅戕害俄國本國百姓，而且將像病毒般傳染世界，中國也會成為受害者之一，他為此發出絕望的嘆息。

王國維很少寫作政論文字，少數幾篇政論文稿在其自盡前焚毀了，但他在政治上極具遠見卓識。他在唯一一封給溥儀的條陳時勢的上書中，痛斥蘇俄共產主義之禍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

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為也！」[38] 就連胡適、徐志摩、丁文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一度受蘇俄蠱惑，王國維這個「老古董」如老吏斷獄，如庖丁解牛，將蘇俄的本質看得清清楚楚。

周錫山在《王國維集》的前言中，稱讚王國維對世界大勢和中國未來充滿先知般的預見：「王國維對於古代史的卓越史識，已經為世界公認。他對於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發展趨勢，亦有令人驚歎的驚人預見……雖然當時共產黨還未成立，但以學者觀世，能夠如此預見，充分體現了一代歷史學家的遠見卓識。」[39] 王國維的第一身份，不是文學評論家—儘管他最為大眾所知的是文學評論類著作《人間詞話》—乃是歷史學家。他在民國初年已有學術上的轉型，有一段時間集中研究元史，則必將涉及北方異族之邊疆塞外之史，也肯定要接觸更多的有關沙俄的史料。從昔日沙俄的背信棄義、瘋狂擴張，到今日蘇俄支持國民黨、馮玉祥和共產黨明火執仗地顛覆中國合法政府的險惡用心，王國維洞若觀火。

長久以來，人們忽視了作為天才預言家的王國維，而單單以學問家定義之，顯然過於狹窄。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國維就準確地預言戊戌變法必將失敗，隨後又預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到俄國十月革命時，他更是憂心忡忡—俄國赤化，與之接壤的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在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中，王國維的立場跟那些自詡為愛國者的學生截然不同：他寫信給被學生和輿論視為賣國賊的陸宗輿，建議陸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一個議案，「團結全世界各國剿滅俄國布爾什維克」。[40] 他的這一建議不可能為陸宗輿和北洋政府所接納，更不可能被參與巴黎和會的協約國領袖們接納。

不過，王國維的名言「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只說對了一半。他所指的「共和」，只是中華民國宣稱那種表面上的共和模式，在民國初年的實踐中左支右絀；只是孫文東拼西湊的、名為共和實為獨裁的「三民主義」和「訓政體制」，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與憲政體制。王國維對希臘的城邦共和制度，對近代以來以英美為代表的兼有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和制度，並無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他所知的西學僅僅是從日文翻譯而來的德國叔本華哲學。如果他能像托克維爾那樣謙卑地觀察美國這個新興的共和國的社會體制，或者讀一讀托克維爾的名著《民主在美國》，那麼他對「西方」就不至於全盤否定。所以，如果將王國維的這句話稍加修正，其真義是：以訓政始

者，必以極權終。誰要把人民當作孩童來規訓，誰就是百分之百的獨裁者。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聽聞歸順國民黨的馮玉祥軍即將渡過黃河，在「京中一夕數驚」的「奇變」中，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死狀雖慘，畢竟可以免遭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對孿生兄弟之羞辱與折磨。四十二年之後的一九六九年，在文革狂潮中，王國維的次子王仲聞被打成「特務」，不甘受辱而服毒自盡。父子兩人的命運，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在獨裁政治之下的悲慘命運。

第六卷

鄰人的呼吸

18　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

西藏現代化的展開與頓挫

吾自擔負政教統治之責，未曾稍懈，亦無暇享樂，焦慮於國家政教諸事，夜以繼日，以期做出最佳決定，令二者均得昌盛。吾常思及農夫之利益，思索良策以減其哀傷勞苦，以及如何叩開果決、公平及正義之門。

—圖登嘉措



一八七六年出生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其成長和執政時期，正好是近代化風潮猛烈衝擊東方的時代：曾經輝煌一時的東方文明，面對已經近代化的西方的挑戰時，紛紛敗下陣來。印度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強悍的土耳其帝國分崩離析，清帝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而備嘗恥辱。

誰也不曾料到，從歐洲散播出去而只佔全人類極小部分的白人，正在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陸地和海洋，使得以農業為主的亞洲諸社會不得不接受商業經濟和國際貿易。有駐軍和炮艇為後盾的歐洲人，可以想干預就干預亞洲任一國家的事務。隨著歐洲列強如秋風掃落葉般征服一塊塊土地，造成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失序脫軌，亞洲的許多統治者和知識分子憂心忡忡於自己社會的將來。 [1]

圖登嘉措也是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亞洲國家的統治者之一。處於亞洲內陸高原地帶的西藏，單靠地理的阻隔，如今無法讓自己像過去數百年那樣享受「光榮的孤立」。世界的變遷和中國的變遷，迫使西藏重新界定自我和規劃未來。對於圖登嘉措來說，從他的童年時代便經受了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對他的統治權威的威脅，這種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對他看待和處理西藏政教事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

進入二十世紀後，圖登嘉措兩度被迫離開西藏。第一次是一九○三年英軍入侵西藏，作為名義上的宗主國，清朝並未派出軍隊幫助西藏抵禦英軍，駐藏大臣則勸他留在拉薩與英國人周旋。圖登嘉措毅然選擇離開，長途跋涉抵達同樣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希望能向俄國求援，但當時正處於內憂外患中的俄國無意亦無力捲入西藏事務。而蒙

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對地位比他更高的達賴喇嘛心存猜忌，要求他盡早離開蒙古。

一九○八年，圖登嘉措赴北京，見到了行將就木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並與西方列強駐華外交官們會面━儘管在清廷官員的監視之下，他仍然竭力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西藏。他親眼目睹了清廷的衰落和腐敗，在覲見慈禧太后時不得不跪下一條右腿，讓他感到備受羞辱━當年，五世達賴喇嘛跟清朝皇帝見面時，是平起平坐的。

一九○九年，圖登嘉措剛剛回到拉薩，清廷便派新軍兩千名官兵向拉薩進發。英國軍隊撤走之後，清朝意識到西藏的重要性，擔心有可能像失去朝鮮那樣失去西藏，決定向西藏派駐軍隊，介入西藏內政。

此前，川督錫良上奏《平康三策》：第一，將「地多寶藏，藥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區「收入版圖」；第二，改康地為行省，改土歸流設置郡縣，「擴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萬里」，「寶藏尤富」，待勢達拉薩，藏衛如盡掌握後，就在四川、拉薩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西三省總督。繼任川督的趙爾豐即在康區實行「新政」，康地縱橫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來首次被「收歸國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來首次須向「中國」申領耕種土地的執照，有史以來首次給「中國」納糧、繳納鹽茶畜牧等各種稅捐。不過，急於攻進拉薩的趙爾豐，卻被駐藏大臣聯豫阻止於察木多（昌都），並指責趙爾豐的軍隊越界攻進了聯豫的地盤。後來，清廷改派新軍入侵拉薩，從趙控制的「川邊」過境得不到給養，沿途搶掠藏人。[3]

圖登嘉措致函北京，不希望中國軍隊進駐拉薩。北京充耳不聞。當清軍即將進入拉薩時，圖登嘉措再度走上流亡路。隨即，清廷發佈一道尖酸刻薄的詔令，剝奪圖登嘉措的世俗權力和作為轉世活佛的身份和地位。

圖登嘉措一行風餐露宿，總算抵達印度大吉嶺，在此安居下來。他與印度政府駐錫金專員查爾斯．貝爾爵士建立起親密的友誼。在流亡的三年中，他開闊了視野，孕育出改革西藏政教事務的新構想。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革命爆發，清朝的統治被推翻。西藏人與失去效忠對象的清朝軍隊在拉薩展開激烈巷戰。這支主要由流氓地痞組成的軍隊禍害拉薩已有兩年之久。一九一二年四月，大約兩千名清朝軍人和官員繳械投降，並獲准離開西藏。

一九一三年一月，圖登嘉措回到了自十八世紀以來第一次沒有中國駐軍和官員的拉薩。他開始行使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後歷代達賴喇嘛不曾有過的政治權力。[4] 此後整整二十年的勵精圖治，他留下非凡的成就，也留下令人痛惜的遺憾。不過，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其自傳中，給予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高度評價：「我家的生活十分簡樸，卻也幸福與滿足。這滿足多歸功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他是多年的西藏政教的領袖。在他統治期間，他闡明和界定了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他也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畢生努力下，西藏人民開始享有一個長時期的安寧和繁榮的年代。」[5]

西藏與中國的關係如同施主與僧侶的供施關係

一九一二年底，中華民國新任總統袁世凱致函圖登嘉措，「在通告和闡釋中華民國成立的同時，要求西藏予以承認」。中華民國立足未穩，袁世凱的語氣相當謙恭。圖登嘉措在回覆中明確表達了與中國的疏離態度：「西藏人之所以不喜歡中央政府，是由於中國軍人殘暴對待他們，使他們怒火中燒。例如，不管中國軍隊如何摧毀或焚燒西藏的寺院和廟宇，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都沒有任何的對策，如此則西藏人怎會不反對中國人呢？」[6]

袁世凱又發來一封電報，為此前滿清軍隊在西藏的暴行道歉，並下令「恢復」達賴喇嘛的職位和封號。袁世凱聲稱，既然中華民國建立，「五族和如一家」，達賴喇嘛自然應當「被一種深厚的依附祖國之情打動」，達賴喇嘛此前的「過錯」可以得到「寬恕」，封號「誠順贊化西天大善佛」也得以恢復。[7]

然而，圖登嘉措回答說，他不向中國政府要求原來的封號和官位，而「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統治權」。正如他在印度流亡期間向清朝派來商討返藏事宜的官員所說的那樣：由於滿清領導人無視西藏的獨立與兩國間的宗教關係，現已無法再予信任，不得不終止原有的關係。[8] 他對滿清如此，對民國也一樣。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日，圖登嘉措在拉薩發表「水牛年文告」，

正式宣佈解除與中國之間的「供施關係」，並宣佈實行諸多社會改革。這份文告被部份學者認為是「西藏獨立宣言」。雖然在西方的術語中算不上一份正式的獨立宣言，但從西藏的政治理論文獻來看，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了達賴喇嘛要求自由的願望，以及在沒有中國封號、沒有中國干涉的情況下統治西藏的意圖。[9]

在這份「不僅要在西藏所有的縣或地區公佈，而且所有的縣政府必須抄錄一份備案保存的重要文件」中，圖登嘉措如此解釋西藏與蒙古、漢族和滿清的關係：「往昔與成吉思汗和俺達汗等蒙古時期，中國的明朝等各王朝，以及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與滿清皇帝建立的，是植基於施主和僧侶間的供施關係。」[10] 他認為，這種聯繫僅僅是宗教層面的，而不是政治層面的，西藏不是中國的屬國或中國的一部分。[11]

在此之前一個月，西藏與剛剛脫離中國宣佈獨立的蒙古在庫倫（今烏蘭巴托）簽定了一個條約，序言寫道：「鑑於蒙古與西藏已經擺脫了滿洲王朝，脫離中國，並且已經變成獨立的國家，又鑑於這兩個國家一直信奉同一個宗教，而為了讓他們古老又相互之友誼得以強化的目的……」整份文件裡不時使用藏文字眼「讓贊」來指稱「獨立」。[12]

事實上，具有獨立地位的西藏政府存在的時間，比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的時間更長—中共軍隊直到一九五一年才佔領西藏。在此期間，西藏有自己的國旗、國歌、貨幣、政府、軍隊、外交關係等。西藏政府發放旅行文件給進入它國界的旅人，還有少數旅行到國外的藏人。一九二一年，西藏政府正式同意第一支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前往登山，當時在拉薩訪問的英國外交官查爾斯．貝爾寫道：「我從西藏政府處得到了官方形式的一本護照，上面正式給予了攀登埃佛勒斯峰的許可證。」[13]

在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的三十八年間，西藏與名義上隸屬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及取而代之的南京政府）的地方軍閥發生過三次小規模的戰爭，出乎意料的結果是，西藏軍隊獲得了前兩次戰爭的勝利，第三次雖然失敗卻也通過談判取得不錯的結果。當然，這並不表示西藏的軍隊具有多麼強大的戰鬥力，只能說明中國地方軍閥的軍隊不堪一戰。

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劃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區在內）為「川邊特別區」，受四川省管制，引起西藏政府極大不滿。一九一七年，藏軍攻打川邊，攻破康巴地區的首府昌都，川軍指

揮官彭日升向藏軍投降。史稱第一次康藏邊界糾紛（或第一次中藏戰爭）。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藏軍再度攻打川邊，奪取德格、甘孜等地，史稱第二次康藏邊界糾紛（或第二次中藏戰爭）。自此，康巴地區大部份地區處於西藏政府的統治之下。

一九三○年，甘孜的大金寺與白利土司發生糾紛，白利土司處於劣勢，向川軍尋求幫助。川軍將領劉文輝以此為藉口侵佔這個地區。不久，藏軍將川軍驅逐，前進到打箭爐。此後，西寧方面也發生僧院紛爭，藏軍與介入的回教徒發生衝突。統治青海的「馬家軍」首領馬步芳與劉文輝結盟，共同對付藏軍。史稱青藏戰爭（或第三次康藏邊界糾紛、第三次中藏戰爭）。

藏軍在前線失利後，圖登嘉措與蔣介石協議停戰，但蔣介石並未實際控制四川、青海，協議沒有任何效果。幸運的是，四川軍閥發生內訌，自己放棄了金沙江東岸地區。此後，西藏與川軍和馬家軍分別簽訂和約。在此過程中，看不到南京中央政府有什麼作為。

藏軍在前兩次軍事衝突中取勝，是圖登嘉措推動建立現代常備軍計劃的結果。然而，勝利也葬送了這一計劃：藏軍讓西藏保守勢力為之側目，貴族和僧侶集團認為，這支現代化軍隊，如果不忠於傳統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怎麼辦？大清王朝不就是被訓練有素、糧餉充足的新軍顛覆了嗎？

儘管達賴喇嘛被視為在世的觀音菩薩、擁有神一樣的崇高地位，但他推動的現代化的改革仍然遭到西藏各階層強烈反對，他並不能像神一樣一揮魔杖便讓西藏昂首闊步邁入現代社會。跟其他所有東方國家一樣，西藏的現代化之路坎坷不平。

達賴與班禪：現代化及其反對者

一九二七年，對於西藏的首都拉薩來說是一個重要時刻：電燈亮了。水力發電廠和電力分配系統的興建，幾乎「隻手」由留學英國歸來的年輕工程師仁崗所完成。這些工程都是由西藏政府主動開始並且

提供經費的，圖登嘉措及其年輕的助手擦絨是積極支持者。[14]

電燈取代了油燈和蠟燭，給黑夜帶來光明。電燈更讓藏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不管你喜不喜歡它，西藏都將被捲入其中。

圖登嘉措在流亡期間細心觀察英國人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從中悟出一個道理：若繼續抱殘守缺，西藏不可能存世。西藏的生存的關鍵是啟動西化改革，圖登嘉措成為西藏現代化的開拓者。「從他一九一三年回到拉薩，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圓寂為止，都一直為藏獨努力，他改革政府、保衛國家，並且應付西藏社會中反對這些改革的勢力。」[15]

圖登嘉措批准成立茶葉種植園，把電訊設施、電話和汽車引入西藏。一九一二年底，西藏成立了中央銀行（歐康），推出第一套紙幣。同年，他派遣四位年輕藏人到英國留學，並派他的心腹大臣龍廈與之同行。龍廈不只是充當監護人而已，身為「無任所大使」，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學習西方民主史和民主制度，尤其是歐洲各國如何藉由選舉取代君主制度。[16]

一九一三年，西藏創辦第一所郵局，並推出第一套郵票。一九二三年，拉薩設立第一個警察總署，同年創辦第一所英語學校。[17] 從印度到拉薩的一條電報線以及一條基本的電話線，於一九二三年建構完成。兩條線都提供大眾使用。

圖登嘉措願意仿效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他從英國引入司法制度，以遏制當時西藏上層社會廣泛存在的政治腐敗行為，並且真的處罰了若干高級僧侶和貴族的貪腐行為。他還將刑法修訂之後推行於西藏全境，廢除死刑並減少肉體刑罰。稅收制度也被引入，他希望以公平透明的稅收遏制貧富懸殊的現象—在新政當中影響最大、阻力最大的是稅收制度的改革，因為新增的鹽稅、皮革稅、羊毛稅等直接觸動很多人的既得利益。[18]

正如所有後發展國家的社會改革都會遇到保守派的拚命反對一樣，達賴喇嘛的現代化改革也遭遇到西藏保守勢力的抗拒。他必須兩線作戰，對外要防範中國、英國、俄國等外部勢力對西藏的覬覦，對內則要化解乃至壓制保守派的反抗—而西藏最大的保守派是九世班禪喇嘛。

班禪喇嘛在宗教上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但班禪喇嘛並不像達賴喇嘛那樣擁有廣泛的政治權力。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班禪喇嘛對政

治沒有興趣和野心：當一九○九年清軍進入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班禪喇嘛拒絕與之一起流亡，留下來與清軍合作，甚至搬進達賴喇嘛在拉薩的行宮，坐上達賴喇嘛的寶座。三年後，達賴喇嘛流亡歸來並如民族英雄般受到民眾的讚譽，而與清廷合作的班禪喇嘛則聲譽受損，被迫處於半隱居狀態。

當達賴喇嘛要求班禪喇嘛提供建立藏軍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稅金時，兩人原本就存在的政治對立白熱化了。班禪喇嘛在拉薩之外自給自足，有自己的地位和稅基，不願承擔這部分費用。他並沒有現代國家觀念，認為這是達賴喇嘛要瓜分他獨享的財富與權力。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達賴喇嘛逮捕了一些被召到拉薩的、忠於班禪喇嘛的官員。這一強硬舉動讓班禪喇嘛心生恐懼，遂於當月十五日，率領一隊侍從，穿過藏北草原，逃往中國內地。 [19] 此後，班禪喇嘛再也未能回到西藏。他先後接受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冊封，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他致電表示祝賀，並於一九二九年在南京設置班禪喇嘛辦公處。

與之相反，達賴喇嘛並不熱衷於跟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打交道，內亂頻仍的中國不是他效仿的現代化樣板，他努力學習英國，包括在英國統治下蒸蒸日上的印度，他派遣大量官員到印度學習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 [20] 此前西藏派駐北洋政府的代表貢覺仲尼，直到一九三○年才被達賴喇嘛任命為駐南京的總代表，西藏政府駐南京的辦事處一九三一年才成立。南京政府成立兩年之後，達賴喇嘛才在拉薩會見第一個南京派來的官員——一名非正式的「特使」、有一半藏族血統的傳奇女子劉曼卿。 [21]

從滿清到民國，中國對所謂「外藩」的控制，秘訣之一便是挑動其高層內鬥，即「以夷制夷」。對於主動前來投奔的班禪喇嘛，南京政府如獲至寶。班禪逃亡，使得中國順理成章地干涉西藏事務，也讓外人認為西藏只不過是一群不和的侯國，需要中國治理。 [22]

對於班禪喇嘛在中國的活動，達賴喇嘛方面視之為「藏奸」。西藏當局以「西藏三大寺僧俗及民眾全體大會之宣言」的名義公開批評說：

班禪竟獲中央「護國宣化廣慧
大師」封號，並給予玉印玉冊，月

> 俸一萬元，供應費用三萬元。其左右仇視西藏諸人，及諾那喇嘛輩，凡與西藏為敵者，中央概授以職位。彼輩並可至各省地方任意活動，是無異對於西藏政治之為莫大之破壞也。以上各項，中央政府如不能予以撤銷，則中藏兩方和好恐根本上無成功之希望也。[23]

隨即，班禪方面也發表宣言反駁。二十年代後期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兩大活佛轉世系統建立以來，兩方關係最為惡化的階段。

十三世達賴喇嘛牢牢掌控著西藏的大權，但班禪喇嘛的出走仍然給他的改革計劃造成衝擊。隨之發生的一系列騷動和衝突，讓他放棄了新稅改革等革新政策。他違心地將支持改革的官員降級，這些菁英分子成了代罪羔羊。西藏喪失了成為現代國家、在現代世界爭取一席之地的機會。一九二七年，中國放棄了堅持十六年的共和憲政的艱辛嘗試，走向黨治國家的歧途；西藏則中止了現代化改革，重新隱入中世紀的黑暗之中。

圖登嘉措宛如清朝的光緒皇帝，只能算是半截子的改革者。多年以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坦誠地表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作為有可批評之處，「畢竟他是掌權者，他看到了改革的需要。雖然出現了阻力，但他該堅持下去，繼續進行他的計畫，因為到最後真理必會出頭。他該把他的理由告訴民眾，讓他們瞭解。但他沒有那樣做，這是他的錯誤。」[24]

擦絨為何沒能成為西藏的凱末爾？

圖登嘉措最大的改革創舉，是設置一支現代職業軍隊。一九一三年，他剛回到拉薩，就在文告中指出「我們是一個依照佛法，享有和平自由之獨立小國，為了與世界各國看齊，我們在維護自己家園的同時，需要有效地抵抗外國侵略以保國土，這雖然會稍微增加臣民百姓

的負擔，但你們要對此做出忍耐。」[25] 他知道，建立和維持一支現代化的常備軍，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這就要求對西藏原有的經濟模式和稅務制度作出重大改革，而這樣做必然激起既得利益集團相當程度的反彈。

同年，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支正規軍正式組建，擦絨．達桑占堆北被任命為藏軍總司令，並聘請英國教官訓練這支軍隊。藏軍在遠古時代曾有過鐵血而輝煌的歷史，在唐代末期攻入長安，與唐朝的軍隊和阿拉伯帝國的軍隊并列為亞洲三支最強大的軍隊。後來吐蕃帝國解體，藏傳佛教成為全民信仰，尚武傳統終成絕響。乾隆年間新組織的藏軍受清廷控制，到了道光年間才由噶廈政府直接控制，當時僅有三千多人，由六名代本（相當於團長）統轄，已不具備國防能力。

擦絨於一八八五年生於一個最底層的農奴家庭，他的父親務農兼營鑄箭。在父親破產後，他奔赴他鄉謀生，追隨達賴喇嘛流亡蒙古，成為其近侍。在達賴喇嘛第二次流亡途中，他奮勇阻擊追趕的清兵，得到達賴喇嘛的器重。一九一三年，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後，他被封為扎薩，成為貴族，與貴族擦絨家的女兒結婚後取名為擦絨。[26]

擦絨兼有噶倫（類似於行政大臣）、藏軍總司令、造幣廠和兵工廠負責人等四個重要職務，他幾乎成了達賴喇嘛的家人，以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面對日益擴大的外部危機，擦絨提出擴軍三倍的計劃，希望盡快建立一支一萬人的常備軍。

英國人柏爾在《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一書中指出：「西藏之錢大半耗於宗教機關，常備軍餉不易籌措，縱有大部分產業可以斂稅，而為僧侶貴族所盤據，款既難得，則軍官更為難得。」[27] 果然，由貴族和僧侶把持的議會的回答，讓擦絨大失所望：每年只能增加五百至六百名新兵，直到藏軍總人數達到一萬七千人為止，這個過程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但這種蝸牛般的建軍速度，能拯救西藏免受日漸咄咄逼人的外力的侵犯嗎？

當時，英國人在江孜創辦了一所軍官訓練學校，圖登嘉措派遣仲巴扎薩、多仁台吉等高級官員入校受訓。英國人麥克唐納在《旅藏二十年》一書中記載：「西藏政府決定用新式戰鬥方法，訓練軍隊，事經印度政府批准後，西藏一次派遣五十名士兵和軍官到江孜，由商務委員會公署的衛隊英印指揮官出來訓練他們。」[28] 這些受訓回來的人士，成為新式藏軍的中堅力量。

一九二○年代中期的西藏，是主張現代化和傾向西方的集團佔上

風的時代。一個受過西方文化教育和軍事訓練的軍官群體出現了：索康代本組織了籃球賽，並在拉薩修建一個網球場。其他幾個藏軍代本包括果措在內效仿英國人的髮式剪短頭髮。他們的生活方式西化，習慣喝甜茶、握手、打網球和馬球。保守派將這些軍官比喻為猴子，因為他們不穿藏袍而是西裝革履，人們只能看到他們的腿部。

以擦絨為首的新式軍官集團生機勃勃，具有團體精神和國家意識。他們相信，是軍事力量而不是喇嘛們的祈禱鋪平了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道路。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黨，但他們一致認為，過去極端保守的喇嘛們使西藏屈服於他人，不能讓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了。[29]

幾乎與此同時，在西亞的土耳其，以凱末爾為首的軍官團引導日薄西山的帝國走上現代化、世俗化的共和國之路。土耳其未能恢復當年帝國的輝煌，但在伊斯蘭世界是率先邁進現代化的區域大國。那麼，擦絨為什麼未能成為西藏的凱末爾呢？或者換一個問題：西藏軍隊乃至整個西藏社會的現代化改革在二十年代後期為何功虧一簣？

首先，西藏的西化程度遠遠比不上土耳其。土耳其位於歐亞兩大洲的交接點，與西方對抗並吸收西方的文化和技術已有數百年歷史；而西藏則長期處於遺世獨立狀態，是一個封閉甚至停滯的社會。以擦絨為首的藏軍集團的力量，比起其他兩大保守派集團──以三大寺廟為代表的喇嘛集團和政府中的保守官員集團──來相當孱弱。中級以上、受過教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軍官，僅僅數十人而已。

其次，佛教對西藏社會的控制和滲透超過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社會中的地位。西藏的僧侶集團不僅掌握宗教權力，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也佔有絕對優勢。西藏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都被寺廟消耗殆盡，要讓他們讓渡出一部分作為軍費或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資金，難於上青天。十三世達賴喇嘛堅持政教合一的統治，這個不能適應新時代的傳統體制，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流亡藏人海外聚居地達蘭薩拉才被十四世達賴喇嘛宣告廢止。[30]

第三，新式軍官集團之於西藏社會，宛如油浮在水面，而非鹽溶入水中。擦絨等高級軍官過於依賴達賴喇嘛的信任，他們的態度和觀點沒有給西藏社會帶來基本的變化。他們享受若干特權，高高在上，不去爭取民眾的支持，也不想去贏得這樣的支持。普通民眾對這個階層持懷疑看法，毫無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民眾，對於現代軍隊的保家衛國功能並無深切的共鳴。

多年篳路藍縷的建設，一旦遇到挫折，便前功盡棄。一九二四年

年初，軍官團召開秘密會議，商議如何用激進方式推動社會變革。由於膽怯，擦絨沒有發表講話—他缺乏土耳其的凱末爾和埃及的納賽爾那樣勇往直前、剛毅果敢的領袖氣質。農奴的身份讓他存有嚴重的自卑感，更無法突破與達賴喇嘛之間的主奴關係。於是，只好由其他幾名地位次要的軍官發言，呼籲大家團結一致。會議通過一份決議，試圖剝奪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只保留其宗教統治權，軍隊接管權力之後加速改革步伐。大部分軍官在這份盟約上簽了名，有少數軍官沒有簽名，有一個叛徒將此事報告達賴喇嘛。

圖登嘉措是玩弄政治的老手，他搞到這份秘密盟約。然後，不動聲色地周密部署對策。他派遣擦絨去印度執行公務，讓藏軍軍官們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等擦絨一離開，他立即清洗軍官集團。當擦絨從印度返回時，一切已今非昔比。不等擦絨回到拉薩，圖登嘉措即派遣一名特使來到離拉薩還有兩天路程的曲水，向擦絨宣佈免職的命令。之後，鑑於擦絨在軍中的威望和英國人的支持，擦絨沒有受到過於嚴厲的制裁，仍保有噶倫的職位直到一九三○年，但被剝奪所有實權。擦絨奉命籌辦扎什城機器廠並創建水電廠。他在印度請了幾位外國技師前來拉薩。保守派趁機製造擦絨給英國人建立領事館的謠言，民眾發起騷動，將擦絨毆打得幾乎至死—簡直就像是一場小規模的、「西藏的義和團暴動」。[31]

後來，擦絨退出所有的公職，致力於經商，將原本債台高築的擦絨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條。一九四○年代，擦絨家族成為西藏最為富有的貴族之一。一九五九年，拉薩發生反抗中共的暴動，擦絨參與其中，被中共逮捕入獄，並於同年五月十四日在獄中遇害。

擦絨及其他藏軍軍官被解職，中斷了西藏的現代化嘗試，助長了圖登嘉措的獨裁統治，並致使藏軍走向極度衰落的時期。一九二七年，英國外交官諾布頓珠重訪拉薩時，尖酸刻薄地描述藏軍和警察的概貌：「藏軍每天都在操練，但是他們的制服實際上已經完全破爛不堪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一隻腳穿著靴子，另一隻腳卻赤裸著，每當我經過他們的駐地，他們總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約有兩百人，他們的衣著比藏軍更破。我發現，如果能夠想到辦法或找到機會，藏軍和警察部隊中的每一個人都想從這裡逃走。」[32] 這樣一支軍隊無法承擔保家衛國的功能。

如果擦絨等人推行的西藏現代化之路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西藏的現代史會因此而改寫嗎？二十多年之後的一九五○年，西藏或許仍然無法抵抗如狼似虎的共產黨軍隊的入侵，但藏軍至少不會一觸即潰，西藏政府的戰時運作也不會進退失據—當共軍進攻的消息傳到駐守昌都的阿沛處，阿沛立即通知拉薩，並請求噶廈的指示。不可思議

的是，噶廈沒有立即回應。在絕望之中，直到十月十五日，阿沛的隨員崔科才與噶廈的一位助理丹拉終於聯絡上。但他被告知，噶倫們都在野餐，不能打擾。崔科生氣地說：「吃屎野餐！」這是昌都與拉薩最後的通訊。[33]

多年以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宣佈將政治權力移交給由民選產生的政治領袖，雖然那只是數十萬人口的流亡社區，但這標誌著西藏人在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嘗試上走到中國的前面。回顧當年那場失敗的改革，丹增嘉措感慨萬千地說：

> 問題並沒有在一九二○年代就結束，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當中國人進入藏東之後，拉薩有官員專門負責收聽北京的廣播，偶爾會向攝政報告，當時我尚未掌權。一天他向攝政報告中國可能入侵，結果宮務大臣安撫他說：「一點也不必擔心，因為我們這裡是高級喇嘛和神明之所在，因此不必擔心中國的軍隊。」這太愚蠢了，完全是迷信無知。[34]

在「中國的西藏」與「世界的西藏」之縫隙中

一八七六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出生的那一年，英國迫使清朝簽訂《煙台條約》（又稱《滇案條約》、《芝罘條約》），其中〈另議專條〉涉及西藏：「英國得由北京經四川入藏至印度，清廷需妥為照料保護。」清廷擅自將部分西藏的主權讓渡給英國。西藏方面卻完全不曉得有這份條約的存在，而成為無辜的受害者。對於圖登嘉

措來說，他剛一出生，西藏就受此條約的束縛，「他的一生是想要除掉此一束縛之苦戰」。[35]

當圖登嘉措在一八九五年承擔政權之時，正好是清朝在對日甲午戰爭中慘敗，中國從東亞最強勢的帝國淪落為列強案板上的魚肉。清廷連內地的十八行省都不能保全，更無暇顧及西藏事務。圖登嘉措不得不直接與此前西藏從未遇到過的英國和俄國周旋，「中國之西藏」一變而為「世界之西藏」。

傳統的中國既不是歐洲列強那樣的現代民族國家，也不是羅馬、土耳其那樣有著不同臣民和文化形態的「世界帝國」。美國學者黎安友認為，與此前中國的王朝一樣，雖然是滿人創建的清朝，也自以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針對所有臣民推行一條「公正無私的仁政」。[36] 清朝如此處理與西藏的關係：並不尋求對西藏實質性的統治，享受西藏承認的宗主國地位；作為交換，清朝的皇帝拋棄了滿人的薩滿教信仰，改信藏傳佛教。但當英國勢力滲入西藏，清朝逐漸改變對西藏的策略，在其統治的最後十年，試圖將西藏「行省化」，正如在西北開拓「新疆」一樣。

國際化和全球化給西藏帶來危機和困惑，也讓西藏的統治精英睜眼看到外面日新月異的世界。在印度流亡的歲月，圖登嘉措看到英國的強大實力，也發現外交的重要性。一旦西藏的政局穩定，他便派出夏札．班覺多吉率領西藏代表團參加英國倡導召開的西姆拉會議，與英國、中華民國的代表談判邊境劃分等問題。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西藏、英國和中國三方全權代表達成三方簽署的條約，其基本內容為：西藏劃分為「外藏」、「內藏」兩部分。「內藏」大致相當於安多和康巴東部，可以視為中立緩衝區。「外藏」大致相當於衛藏和康巴西部，「將繼續由拉薩西藏政府管轄，以中國為宗主國，但中國不會干預其行政，不向其派駐軍隊和官員，不得進行殖民活動」。在這份條約中，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和承認西藏的自治權本身自相矛盾，這是三方妥協達成的「最不壞」的結果。

中國代表陳貽範於前一天在該條約上簽了字，第二天中國政府又反悔，宣佈不承認該條約。「正式割讓土地以及規定不能將內藏變成中國行省的內容，似乎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37] 最終《西姆拉條約》上只有西藏和英國的代表簽字，麥克馬洪線後來成為中國和印度爭端的導火索。

西姆拉會議之後，西藏的地位有所改善。西藏與中國仍然處於某

種曖昧的戰爭狀態，但西藏的國際地位得到英國的支持與承諾，這是圖登嘉措在位期間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作為弱國的領袖，他不得不周旋在英國、中國、俄國乃至後來居上的日本諸多勢力之間，採取某種「騎墻」的外交策略。

一九二九年，蔣介石給達賴喇嘛寫了一封信，南京政府蒙藏委員會擬具「對於西藏問題如何解決」之條款八項，由達賴喇嘛此前派駐雍和宮之特使貢覺仲尼帶回西藏。其中，達賴喇嘛再次確認了西藏與中國是「施主關係」。而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有一條居然是要求達賴和班禪加入國民黨，可見南京政府的高官何等愚蠢傲慢，亦毫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西藏政府對此要求的回答是：「達賴喇嘛現在年高，加之政教事務甚繁，又因三大寺及上下居巴僧俗官員未經同意之前，不能來京。至班禪住內地，除扎什倫布廟宇教務外，素無其他政務可管，自應就近加入國民黨，但素無解決藏事之發言權。」[38] 這個回答反過來將了南京政府一軍：達賴喇嘛本人拒絕加入國民黨，投靠中國的班禪喇嘛即便加入國民黨，也不能介入西藏事務。

一九三三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在拉薩病逝。有人說他跟上一任達賴喇嘛一樣是被保守勢力下毒害死。一向身體健康的圖登嘉措，被一場小小的感冒奪去生命，最後那段日子與外界隔絕，不得不讓人心存疑惑。

臨終前，圖登嘉措留下的預言與未來西藏的發展軌跡驚人地吻合：

> 在赤色共產黨現在正到處進行恐怖和破壞的時候，我們必須特別警惕自己免受野蠻的暴行。他們積惡至極。他們已經揉爛蒙古，並嚴禁尋找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的轉世。他們搶劫和破壞僧院，強迫僧人加入他們的軍隊，否則就地處決。他們所到之地，宗教必遭摧毀，所經之地，任何佛法教導都不允許。我相信你已經聽到了烏蘭巴托和其他地方傳出來的消息。

為時不久，赤色的屠殺將必闖入我們的前門。無論是我們自起內訌，或是來自外面共產國家的威脅，我們遲早都必須直接面對。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必須隨時準備保衛自己。否則，我們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將被澈底根除。……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財產將被掠奪，我們會成為征服者的奴隸，像乞丐一樣到處流浪，束手無策，生活在悲慘世界之中，充滿極端痛苦與恐懼，度日如年。

十三世達賴的遺體趺坐接受瞻仰期間，人們發現他的頭從朝南轉向朝東北。負責主持轉世靈童尋訪工作的人員往拉薩的東北方向尋找靈童，並在安多地區找到了。這名靈童被確認為新的達賴喇嘛，他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自青年時代即流亡海外，再未踏上西藏的土地。他卻完成了對作為佛教之「偏房」的藏傳佛教的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革，宛如五百年前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對天主教的變革。他讓區域性和民族性的藏傳佛教成為一種極具生機與活力的世界性宗教。

同時，丹增嘉措帶領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從無到有地創建了一個小而美的「域外西藏」，這個小小的流亡政府及其社區，宛如一朵在冰雪風暴中傲然綻放的雪蓮花。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丹增嘉措逐漸放棄了政治事務的最終決定權，讓噶廈和議會擁有全權。二○○一年，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實行政府首腦（首席部長）直接選舉，丹增嘉措不再處理任何政府事務。

二○一一年，丹增嘉措完全卸下政治領袖的責任，宣佈說：「年

輕時，我就抱有引導西藏政體走向民主化的心願，因此，在承擔西藏政治責任之初，我就嘗試了基層的改革；流亡期間，又經過各種努力，如今，在『流亡藏人憲章』的框架下，民眾可以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和噶倫赤巴（行政首長），實現了名副其實的民主。」三月十四日，丹增嘉措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不再擔任領導人的職責，而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起所有政治權責」。至此，從五世達賴喇嘛以來的政教合一制度畫上句號，西藏的現代化之路邁進嶄新的歷史階段。[39]

西藏本土仍在中國的奴役之下，甚至持續發生藏人以自焚的極端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悲慘事件，但藏人的未來並不悲觀。台灣學者李西潭在達蘭薩拉發現了宗教、道德、生態與文化四大軟實力，「達蘭薩拉其實就像梵蒂岡一樣，四道光芒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其並不侷限於土地大小，而是以西藏文化的軟實力來傳遞給世人。」[40] 在此意義上，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也參與著對未來中國的形塑。

19　穆罕默德．伊敏

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我們的種族是突厥，我們的宗教是伊斯蘭，我們的祖國是突厥斯坦。

—穆罕默德．伊敏



一九二七年春，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成立的消息，並沒有在遙遠的新疆激起多大的漣漪。當時控制新疆的督辦兼布政使楊增新，是民國時代除了閻錫山之外穩定統治一省時間最長的地方強人。此刻，楊增新對新疆的統治已進入第十六個年頭。當然，他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後這一切都將畫上句號──包括他的生命，而新疆將陷入多年的戰亂。

楊增新，一八六四年生於雲南蒙自，光緒年間考中進士，先後出任甘肅中衛知縣、河州知府。一九○七年，調任新疆陸軍學堂總辦。一九一一年，升任鎮迪道兼提法使。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黨和哥老會在伊犁成立軍政府。新疆巡撫袁大化提拔楊增新為提刑按察使，訓練穆斯林軍隊（回營）鎮壓起義。不久，袁大化逃離新疆，眾人推舉楊增新為督軍。楊增新調整新疆的政制，集中權力，成為新疆的最高統治者。

楊增新統治新疆，繼續使用清帝國的「羈縻」政策，標榜老子的「無為而治」，信奉「渾噩長為太古民」。他很喜歡「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景」這兩句詩，並把它掛在新建的「鎮邊樓」上。這兩句詩既道出他的心境，也是他統治新疆的策略。 [1]

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楊增新採取軟硬兼施兩手政策。一方面，他認為，只有懂新疆的人才能治新疆，而只有懂宗教的人才能懂新疆，他善於籠絡當地的上層保守貴族和宗教人士。另一方面，他加強對清真寺、伊斯蘭經學院的管理，提防突厥世界宗教改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滲透，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在邊境設置重重關卡，嚴格盤查進出人等。

自從清末新疆設立行省之後，新疆的政治實權都掌握在漢人手中。入民國之後，從楊增新開始，統治新疆的大都是同時兼任行政長官（省長）和軍隊最高指揮官（督辦）的漢族出身的軍閥獨裁者，一直到末代「新疆王」盛世才為止。 [2]

清朝時期，朝廷在北疆設立伊犁將軍，在南疆利用維族的哈密札薩克和碩親王進行間接統治，民國之後仍維持哈密王的封號，但哈密王的實權大大被削弱。楊增新對第九代哈密王沙木胡索特頗為猜忌，哈密王申請去麥加朝聖，他不予批准。從清朝晚期開始，哈密王每三年進京一次已成慣例。一九一五年，沙木胡索特曾到北京覲見袁世凱。後來，楊增新甚至不准哈密王去北京。

一九二八年六月，楊增新看到北伐軍橫掃大半個中國，遂致電南京政府表示服從，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他的改旗易幟比張學良早了半年。當時，很多地方實力派人物都如此見機行事，包括統治青

海、寧夏的馬氏家族。南京順水推舟地任命楊增新為新疆省主席，至於他是否信奉三民主義暫且不論。[3]

楊增新算不上治世之能臣，對新疆的未來也未有長遠之規劃，他的「垂拱而治」的治理方式只是暫時延緩早已如同火山岩漿般奔湧的宗教和民族衝突而已。新疆易幟僅一個多月，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在楊增新創辦的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畢業生慶賀宴上，楊增新遭軍務廳長、外交署長樊耀南刺殺身亡。實際掌握軍隊的金樹仁出兵討伐並捕殺樊耀南，隨即成為新疆的新統治者。整個過程就像韓國軍政權歷史上朴正熙遇刺，全斗煥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那樣。

金樹仁上臺後，一反楊增新的懷柔內政，採取鐵血政策，樹立個人權威。他強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廢除哈密貴族的統治，建立省政府的直接統治。他對百姓的生活和信仰粗暴干涉，對穆斯林開徵屠畜稅，禁止穆斯林去麥加朝覲。就像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索是公務員毆打攤販、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索是突尼斯警察對一名青年施加暴力一樣，「哈密暴動」也是由一個既偶然又必然的事件所引發。在新疆，受新思潮影響最大的是最西邊的喀什，東邊的哈密是宗教保守派的天下。然而，維族的反抗卻先從哈密開始：當時，天山腳下小堡村有一位名叫艾麗絲罕的美貌女子，當地哨卡軍官、金樹仁的親戚張國琥要娶其為妻。求婚不成，張國琥遂效仿《水滸傳》中小霸王周通的做法，帶領荷槍實彈的士兵強搶民女，結果發生暴力衝突，張國琥被村民打死。金樹仁聞訊後，調集重兵要血洗當地，遂引發東疆穆斯林暴動，進而全疆大亂。

這場融合了民族、宗教、個人野心和國際勢力參與的混戰持續了兩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獨立軍、金樹仁的省政府軍、由甘肅進入新疆的回族軍閥馬仲英，甚至蘇軍都被捲入其中，至少十萬人為此喪生。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東突獨立運動由此登上歷史舞臺，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短暫建國。建國運動的重要推手之一正是穆罕默德．伊敏。要講述伊敏的故事，先要從「新疆」或「東突」的悲情歷史講起。

新疆何以成為「新疆」？

今天，新疆的全稱是「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它位於中國的西北，正好處於亞洲的中心。面積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大。人口約兩千一百多萬，其中維吾爾族人口佔百分之四十三，約一千零六萬，其次是佔百分之四十一的漢族，其餘是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

如果用中華帝國的政治術語「經略」來描述，在「帝國史學」中，中國王朝對西北的「經略」始於張騫出使西域。史家郭廷以指出：「有人說張騫是中國的哥倫布，就某一方面看或許非哥倫布所能及，他不只給中國人發現一個新世界，並且帶回來不少的正確地理知識，而中西政治經濟的促進，尤其值得重視。」[4] 不過，郭廷以也承認，當時西域諸國處於獨立狀態，張騫的使命是「出使」，與西域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從漢朝開始，中國好幾代王朝經營西北，始終以爭取民族安全為出發點，即防禦匈奴與西域各國結盟而進窺中原，中原王朝並沒有將西域納入版圖的企圖。

中國對西域的經營雖有二千年歷史，但西域各國大部分時候都處於僅受中原王朝「羈縻」的半獨立狀態，「當中國隆盛時便領有它，衰落時便喪失它」。[5] 中國對西北具有實質性的統治權，始於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間。康熙時經過三次親征和七年戰爭，佔領了哈密、巴里坤、迪化等地。乾隆時擊敗強大的準部、回部，甚至讓中亞的浩罕、布花拉、愛烏罕（阿富汗）汗國、哈薩克、布魯特部落、塔什干、巴達克山等亦內附入貢。天山南北路底定之後，乾隆合此兩部名之曰「新疆」，以此顯示這塊廣大領土是他開拓的疆域。[6] 這是「新疆」名稱之始，這個名字本身就說明，新疆並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清帝國使用武力征服新疆之後，派駐兩萬多名滿漢軍隊，實行軍事殖民統治。[7] 清廷沿用對西藏和蒙古的統治方式，視之為「藩部」—這種制度是清王朝藉以維繫民族政權的一項根本性政治制度。清王朝作為一個多民族帝國，對於漢、蒙、回、藏族的統治態度乃是作為各族共主並分而治之，除了保持滿族認同、避免完全漢化外，滿清皇帝也刻意避免其他幾個民族間的互動與漢化。清廷利用蒙古貴族壓制六城地區（乾隆時期的《西域聞見錄》中記錄的「六大回城」是：莎車、喀什、阿克蘇、庫車、英吉沙、和闐。後世對「六城」的記載又有差異，如有烏什而無英吉沙等，但指塔里木盆地周圍則是一致的）的穆斯林居民，利用西藏僧侶羈縻蒙古各部落。

而清朝之所以能成為國土面積超過明朝一倍的東亞大帝國，正是因為清朝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以多元型帝國構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清王朝的統治同時具有中華王朝與民族政權的雙重性質，其最高統治者兼有中華王朝皇帝與民族首長的雙重身份。[8] 從某種程度上說，清帝國存在著「一國兩制」：一方面在統治中原漢人地區之時大量承繼明代的體制；另一方面，對於東北（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征服與統治技術，顯現的是對於過去金與元朝等其他少數民族王朝傳統的繼承。清朝的很多統治手法，事實上是可以與同時期的俄羅斯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相類比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一八六○年代，清朝各地發生動亂，新疆回部再次發生暴動，並請求浩罕汗國增援回疆。浩罕可汗派遣阿古柏率軍進入新疆，阿古柏趁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哲德沙爾汗國，並獲得俄國和英國的承認。面對此嚴峻形勢，剛剛鎮壓完太平天國運動的清廷，發生了以李鴻章的「海防論」和左宗棠的「塞防論」的爭論。[9] 朝廷的資源有限，如何傾斜？李鴻章主張擴充海軍，防衛沿海；左宗棠主張進軍西北，收復新疆。朝廷採納了左宗棠的建議，左宗棠出征新疆，剿滅阿古柏，新疆再次內附清朝。而海軍建設之不足，使得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戰中，中國初具規模的海軍全軍覆沒。日本不僅割去台灣，還由此深入滿洲，影響了此後半個多世紀的中日關係和東亞局勢。李鴻章與左宗棠、「海防論」與「塞防論」孰是孰非，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今天的中共政權，則企圖恢復「天朝」的地位，不僅要囊括整個南海為中國的內海，而且要以「一帶一路」政策深入內亞，狂妄自大、兩線擴張的習近平終將玩火自焚。

當清王朝被動捲入世界近代化浪潮以後，不僅要在東部沿海地區面對歐洲列強的船堅炮利及思想文化的猛烈衝擊，在內亞的新疆也面臨著俄國和英國勢力的滲透。這就迫使清王朝重新考慮對新疆的統治方式。當時，大清本身也在由部落征服者和儒家傳統組織結構向近代吏治國家轉化，故而決定對新疆實施直接統治。道光年間留心時務的魏源、龔自珍均有西域建置行省的主張，但只是學者私人的議論。當左宗棠佔領新疆之後，正式向朝廷上書，「重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為新疆的長治久安打算必須設置行省、改郡縣。[10]

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清廷下詔宣佈新疆設置行省，定迪化為省會，以左宗棠的幹將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從此新疆成為中國第十九個行省（第二十個則是第二年設置的台灣行省），較東北的建省早了二十三年。新疆原由本地貴族自治的伯克制遭到廢除，新疆全境實施與內地相同的官僚制，開始內地化過程。史家評論說，左宗棠在

西北的成就與地位，頗似鄭成功之在台灣的成就與地位，而劉錦棠則有如劉銘傳。[11] 不過，這是一種「中原中心主義」的論述方式，新疆和台灣的原住民不會認同。

新疆建省，跟在內地增加一個省區完全不同。新疆建省對原有的帝國模式造成了巨大衝擊：

> 在確認主權領域範圍的過程中，清王朝通過「新疆建省」不僅拋棄了民族牽制思想和民族隔離的政策，甚至鼓勵和支持以中華文化來同化其他原來屬於藩部的民族集團，以強化邊疆居民的國家意識。「新疆建省」是清王朝開始放棄「藩部」制度的標誌，也是清王朝放棄民族政權性質的開始，同時也是中國放棄天下思想和政治傳統的開始。在確認主權領域範圍的同時，實質上也開始了建設「國民」進程的「新疆建省」，在中國近代國家建設進程上具有開啟性的意義。[12]

就現實統治的層面而論，北洋政府因內戰頻繁，無暇顧及新疆、外蒙古、西藏等前清時代的「三藩地區」，外蒙古和西藏趁機走向實質性的獨立，唯有楊增新控制的新疆未宣佈脫離中國，但實際上處於半獨立狀態。

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在中原發生的政治變遷，對新疆，尤其是新疆的維族下層民眾並無太大影響。一九二一年，一位維族知識分子曾經如此批評統治當局：「進入民國時期後，新疆的最大變化僅僅是在信中寫上中華民國某年某月，而就是這一點，我們維吾爾族人也是從漢族人那裡學到的。」

東突何以成為「東突」？

維吾爾人以及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數民族，並不認同中國官方使用的「新疆」這個名稱（當然也不認同充滿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色彩的省城的名字「迪化」，即為啟迪、教化野蠻的土著居民），他們所使用的自我稱謂是「東突厥斯坦」。「東突」這個詞早在八世紀就已經出現在阿拉伯的地理學著作之中，而中國隋唐史也記載「東突厥」作為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一線以東的中亞地區諸政權的統稱。[13]

在這一廣闊的區域之內，現存最早的原住民族是維吾爾族，人種和語言上屬於突厥語族的一支。根據歷史民族學的研究，突厥語族約六世紀興起於阿爾泰山，可能帶有匈奴血統，突厥語族現在是中亞與西亞各國的主體民族之一，如土耳其、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等國，俄羅斯與伊朗也各有大量突厥語族的人口。東突地區原為佛教信仰，十到十五世紀期間東突與其他中亞地區逐漸完成伊斯蘭教化，伊斯蘭教成為統合該地區之紐帶，中亞地區的突厥人群與伊斯蘭宗教文化樣貌就此成形。[14]

近代東突主義以及維吾爾民族意識的成形，得益於「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這場啟蒙運動的思想源泉來自於俄國喀山的韃靼人居住區域和土耳其。從語言來看，維族人使用的維語近似於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泛突厥民族的語言，維族知識分子更容易從這個語言系統中汲取文化思想資源。反之，精通漢文的維族知識分子是少數，中國發生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統一，對維族人沒有產生太大影響。而從留學生引入新文化新思想的層面來看，近代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選擇去歐美和日本留學，歸國後帶回留學目的國的思想和理念；新疆的維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則傾向於去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留學。這種不同的選擇，也與地理和交通條件的限制有關。

泛突厥主義運動的創始人是生活在俄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加斯普林斯基。一八七八年，加斯普林斯基被推舉為巴赫奇薩拉市長，從此在社會大舞臺上施展身手：以文教啟民為己任，創辦報刊、革新教育、參與政治，成為俄國穆斯林社會近代化的先驅。加斯普林斯基先後創辦了《達夫里塔》、《鐵爾米曼》（翻譯家）、《民列特》（民族）、《婦女世界》等報刊。《鐵爾米曼》從一八八三至一九一八年間連續出版發行，從未中斷，是加斯普林斯基和俄國泛突厥主義的喉舌，在俄國海內外的穆斯林中產生巨大影響。這些報刊也流傳到新

疆，被維族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閱讀和傳播。[15]

加斯普林斯基掀起泛突厥主義是要對抗沙俄當局「強制同化」的政策，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為突厥民族創立結合奧斯曼土耳其語和克里米亞韃靼語的「共同語言」，「這是從巴爾幹半島到中國長城、從波斯普魯斯海峽的船夫到喀什噶爾的駱駝客都能理解的語言」。他強調，既要同沙皇專制制度作鬥爭，又要把全體民眾從伊斯蘭保守主義的愚昧中解放出來。在他和一幫同仁的推動下，喀山成為俄國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蘭世界中扮演著不亞於伊斯坦堡、開羅、貝魯特的角色」。維族社會加深了與韃靼社會之間的交流，是因為在作為被統治民族而尋求民族未來出路的問題上，這兩個社會具有相似的地方。[16]

然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用牛刀殺雞，在嚴厲鎮壓突厥民族主義分子後，將突厥語穆斯林劃分為多個民族，數十年的突厥一體化成效毀於一旦，從而使泛突厥主義在其發祥地遭遇毀滅性的打擊，一些大難不死的殘兵敗將移師土耳其，圖謀東山再起。[17]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維族從古典走入近代的轉型期。工業的萌芽先從伊犁開始，一九○一年，第一家電廠正式發電運作。與之相配套的是文化教育的現代化。位於喀什城市北面的阿圖什縣的工商業資本家穆薩巴約夫兄弟，是新式學校的先行者。他們投資開辦了維吾爾族社會第一所新式學校。這些「對自己的民族抱有深刻的危機感」的開明派知識分子發現，傳統的伊斯蘭經學院的教育陳腐不堪，年輕人在其中學習五至七年，只能死記硬背部分《可蘭經》經文，卻連基本的閱讀和書寫都未能掌握，更不用說獨立思考了。於是，他們推動普及新式教育—除了伊斯蘭教育之外，同時教授歷史、地理、數學、化學等近代科學知識。在一九一○年代，伊犁、吐魯番、奇台、哈密、庫車、阿克蘇等地先後建立起規模不等的新式學校。

這些新式學校從土耳其聘請一批學者擔任教師。比如，應穆薩巴約夫家族的邀請，土耳其學者艾哈邁提．卡瑪爾來到喀什噶爾地區，於一九一四年，在依克沙克建立了維吾爾社會第一所師範學校。卡瑪爾在學校中教學生演唱土耳其進行曲，宣揚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思想。他希望通過教育喚醒維吾爾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識，讓他們支持作為「伊斯蘭世界盟主」的奧斯曼帝國。受到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思潮影響，一批維族知識分子將「東突厥斯坦」這個稱謂由「他稱」轉變為「自稱」。[18]

當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本身已經在西方的壓力下岌岌可危，經

過一戰更是土崩瓦解，剩下的部分領土蛻變成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國。即便如此，土耳其居然還能向中亞輸出伊斯蘭及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跟隨同清帝國一同衰落的中國儒家文化形成頗有意味的對照——原來在儒家文化圈中對中原文明頂禮膜拜的日本、韓國、越南等，目睹中國被西方列強擊敗和羞辱，紛紛拋棄儒家文化，爭先恐後地向西方學習。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經歷了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全盤否定儒家思想，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自身也轉型成為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外來的文藝復興或精神啟蒙是誘因，泛突厥主義之所以能吸引不同階層的維族民眾，更關鍵的原因是中華民國的憲制框架沒有賦予包括維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應有的地位。維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宛如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黑人以及馬丁．路德．金恩領導的民權運動之前的美國黑人的命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號稱「五族共和」，卻無力在邊疆地區施行良政。新疆由自私自利、深具種族成見的軍閥統治，從楊增新到金樹仁再到盛世才，越發腐敗和殘暴。

據一九二八年中華民國內政部的國情調查，新疆的總人口為兩百五十多萬人，維族佔百分之七十，漢族不到百分之十。但是，統治階層幾乎被漢族壟斷。省政府機關的四廳一署（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和外交署）的首長全都是漢族人，地方行政體系的八個行政區和五十九個縣中只有一個縣長是維族人。楊增新常常以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名義給北京中央政府發電報，而各少數民族一無所知。一九二一年從新疆選出來的二十名國會議員中，只有三名是維族人，而且都是楊增新挑選的傀儡。在經濟上，各級漢族官僚及駐軍更是對維族民眾巧取豪奪，竭澤而漁：與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時相比，一九一五年新疆的農業稅收中，對小麥的稅收增加了兩到三倍，玉米增加了兩到五倍，飼料用草更是增加了十九倍。在文化教育上，新疆省政府一直實行強制維族進入漢語學校（學堂）接受教育的政策。[19] 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中嚴重存在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自然引起維族對漢族統治者的仇恨，以及獨立建國意識的高漲。

「民族之夜」的榮耀與伊敏後半生的顛沛流離

一九○一年，穆罕默德．伊敏．柏格拉出生於和闐市一個中等收

入的宗教教師家庭，從小接受伊斯蘭古典教育。一九二七年，二十六歲的伊敏在和闐一所伊斯蘭經學院任教。教學之餘，他奔走新疆各地，積極聯絡有識之士，為民族解放運動做準備。一名普通的宗教學校的教師用觀念改變世界，其力量可能超過國王或將軍。這樣的例子，在基督教世界裡有反對羅馬天主教、掀起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馬丁．路德，在伊斯蘭教世界裡有推翻伊朗國王巴勒維統治的基本教義派教士何梅尼。

一九三○年，伊敏在伊犁與另一位東突厥斯坦建國之父沙比提．大毛拉會晤。一九二○年代，沙比提畢業於新疆督軍楊增新創辦的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之後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蘇聯等國遊學，掌握了英語、土耳其語等語言，接受泛突厥主義思想。兩人暢談一夜，惺惺相惜、相見恨晚。[20]

一九三二年，伊敏與哥哥滿素爾組建「民族革命委員會」，以東突獨立建國為宗旨。次年一月，哈密暴動，南疆失控。庫車、阿克蘇相繼被義軍佔領，駐喀什噶爾的省軍師長金樹智（金樹仁弟）自殺，喀什行政長、南疆剿匪司令馬紹武僅能保住喀什噶爾。伊敏與沙比提等召集有一百三十多人參加的秘密會議，討論並通過在和闐發動起義的決議，以及起義負責人的名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穆罕默德．伊敏組建的軍隊在和闐以北的墨玉縣截獲省政府由印度運來的軍火，情勢萬分危急。二十四日，起義在和闐墨玉爆發，伊敏率軍攻佔墨玉縣政府。馬紹武無兵可調，伊敏進而攻下和闐舊城。二月二十日，民族革命委員會在和闐集會，宣佈成立「和闐臨時政府」（後改稱和闐伊斯蘭政府），伊敏自稱帕夏（執政官）。隨後伊敏派兵攻下且末、皮山、葉城、澤普、莎車諸縣。

四月，義軍進軍喀什噶爾，此後半年間，這座古老的王城幾度易手，戰鬥極為殘酷。在維族佔據的地方，發生了對漢族移民和回族居民的屠殺；漢族或回族的軍隊打過來之後，又對維族居民實施無情報復。這是一場沒有前線和後方的戰爭，也是一場軍人和平民界限模糊的戰爭。

一九二七年，受聘於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到新疆工作的瑞典學者尼爾斯．安博特，正好經歷了這場慘烈的戰爭。他憑藉膽略和運氣逃過死劫，經印度回國。後來，他寫下回憶錄《駝隊》，栩栩如生地記載了當時親眼目睹的情形。他寫道：「最近，那場戰爭狂潮給和闐造成的創傷歷歷在目。貫穿城市的一個寬闊地帶裡，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廢墟。在戰鬥中，他們從城牆上向房頂噴煤油，並點起了火。」他還

描述了伊斯蘭軍隊執行嚴酷的伊斯蘭法的場景：

> 四月二十日是巴札日，人挺多。我上街買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札四處轉悠的士兵，討厭的情景令我作嘔。走在頭裡的大兵持一支長矛，矛尖上綁著一個人的手。犯人是個賊，跟在大兵的後面，光著脊背，右臂高懸，流著血，纏著繃帶。士兵們走在身後，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憐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東西，我是個賊，我偷了兩隻碗，罪大惡極。」

> 在遊行期間，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彈射進被搗毀的漢人住宅。庭院裡不斷有戰爭發生。丈夫打妻子，母親打兒子，兄長打妹妹，監工不時走上前來讓所有的夥伴嘗嘗他毫不客氣的鞭打的滋味。[21]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各路義軍攻克喀什噶爾城。十一月十二日，伊敏、沙比提等人在喀什噶爾坤啟社區前的廣場上召開群眾大會，當時有七千名士兵和一萬三千名平民參加集會。在會上宣佈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推舉滯留在阿克蘇的霍加．尼亞孜．阿吉為總統，薩比特任總理。泛突厥主義者稱這次會議為「民族之夜」。

該政府的軍政實權掌握在伊敏主導的「民族革命委員會」手中。伊敏的兩個兄弟分別控制著莎車和英吉沙，伊敏則直接管理和闐。那個夜晚，既是伊敏一生最輝煌的巔峰，更是維族人獨立建國的先聲。在親歷者的記憶中，那是一個風沙與烈火、鮮血與眼淚交融的時刻。

然而，失敗來得同樣迅速。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既沒有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也沒有訓練有素的軍隊—義軍多半是平民構成，使用的武器甚至有中世紀的大刀、長矛。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青海軍閥馬仲英的部下攻克疏附，伊敏從喀什噶爾逃回和闐。沙比提逃往莎車。五月，倒向省政府的霍加．尼亞孜．阿吉抓捕沙比提，將其押解往省會迪化。沙比提在迪化第二監獄被關押了整整七年，在獄中完成《可蘭經》的維文翻譯和註釋。一九四一年，沙比提被盛世才殺害。

一九三四年四月，伊敏推舉其兄滿素爾為帕夏，建立和闐伊斯蘭國。六月十二日，馬仲英的先頭部隊攻克和闐，滿素爾被殺，伊敏逃往喀喇古塔格（黑山），和闐伊斯蘭國滅亡。七月二十六日，伊敏攜數千人逃往英屬印度拉達克的首府列城，後來又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據蘇聯官方提供的數據稱，這個新政權最初約有民兵六萬人左右，但裝備低劣，除幾千人逃往英屬印度外，其餘全部喪生，另至少有三萬至五萬名平民在隨後的政治清洗中遭到殺害。

武裝鬥爭告一段落，伊敏回到書齋著書立說。一九四○年，伊敏的維吾爾文著作《東突厥斯坦近代史》在喀什米爾出版。這是第一部由維吾爾人書寫的、完整反映東突厥斯坦近代歷史的巨著。這本書詳細記載了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的建立和覆滅的歷史，以及滿清和漢族地方軍閥對維族的殘暴統治，成為塑造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經典。

一九四○年代初，伊敏看到獨立建國的希望日漸渺茫，決定與重慶國民政府合作。國民政府派艾沙．阿布甫泰肯訪問阿富汗，邀請伊敏前往重慶。次年，日軍偷襲珍珠港，英美對日宣戰，並正式與中國結盟。在新的國際格局之下，統治阿富汗的英屬印度政府不願繼續庇護伊敏，以間諜罪將其逮捕。經國民政府交涉，伊敏回到中國，加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伊敏任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中央組織部專員。

在此期間，伊敏又開始了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民族獨立之戰的序幕：與中國各類文人就有關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歷史等問題展開筆戰。其中最有名的一場論戰以《中央日報》為陣地，而伊敏的論敵是能言善辯的中國歷史學家黎東方。

經歷了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後，新疆成立聯合政府。伊敏前往迪化，出任聯合政府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同時，他還擔任維吾爾文《自由報》主編、維吾爾聯合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新疆學院名譽教授等職務。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合政府因蘇俄作梗而破裂，麥斯武德．沙比爾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疆省主席，他是

近代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東突厥斯坦最高行政長官的維吾爾人，伊敏則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此時，國民黨在三大戰役中接連敗北，連內地都守不住，更不用說保衛新疆了，這個任命的有效期屈指可數。

一九四九年秋，主政新疆的國民黨軍政首腦陶峙岳、包爾漢等人向中共投降，共軍開進新疆。伊敏對共產黨不抱任何期待，他從南疆出境，流亡印度。隨著大量維族流亡者抵達印度，土耳其在印度的外交機構組織他們前往土耳其。一九五一年，伊敏抵達土耳其，此後定居伊斯坦堡。

在一九五○年代流亡土耳其期間，伊敏致力於領導維吾爾移民中的泛突厥主義政治活動，他周遊中亞和中東列國，向伊斯蘭世界發出東突厥斯坦各民族的求救呼聲。他還相繼擔任《突厥斯坦：學術、社會、經濟和文化》（伊斯坦堡）和《突厥斯坦之音》（安卡拉）兩份月刊的主編。同時，伊敏通過指示和闐的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墨玉、英吉沙、洛浦、和闐等地策動多起起義，但都未成功。一九五九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被捕，伊敏的殘餘勢力被消滅。一九六五年，伊敏在土耳其去世。伊敏的侄子買買提．勒札貝金在土耳其軍隊中服役，軍銜至將軍，退役後亦從事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東突厥斯坦的漫漫建國路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儘管曇花一現，卻留下寶貴的思想和精神遺產。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大會上，獨立運動的領袖們公佈了《建國綱領》，正式照會外界：「東突厥斯坦為永久民主共和國，請求南京政府或國際聯盟予以便利，協助人民，共同努力，以達最終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獨立。」大會發佈的《獨立宣言》向外界宣示，終結中國在新疆（東突厥斯坦）的獨裁統治。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擁有現代共和國的國家運作機構：在總理府之外，有軍事部（國防部）、外交部、司法部、衛生部、教育部、宗教事務部等內閣各部門；還建立了中央銀行，發行自己的貨

幣；並對出國人員頒發護照。[22]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時，即有成文的國家憲法。憲法規定了國名、國徽、國旗、國歌。憲法明確規定：宗教信仰自由為人天賦不可剝奪之權利；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共和國；保護個人私有財產。[23] 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有消滅來自於漢族獨裁者的民族壓迫、脫離中國的主張之外，也有推動維吾爾族社會實現近代化的部分。這反映了獨立運動與「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之間的思想傳承關係。[24]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利用瑞典駐喀什噶爾傳教團駐地的印刷機，發行共和國《獨立》雙月刊。雙月刊類似於政府公報，主要發佈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領導成員簡歷及其職務、職責，以及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法令法規等。

當時，霍加．尼亞孜．阿吉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的身份，「代表被壓迫的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向英國國王和英國政府發出求援信。求援信指出：「在（被中國統治的）最殘酷的五十一年壓迫中，蠻橫的中國人以其日趨殘酷的野蠻統治使我們的人民落到了如今的悲慘境地。中國（統治者）剝奪了我們的公民權，他們不讓我們接觸科學、工業、商業。中國統治者甚至無理到封閉了我們唯一的，即由國外帶進來的用來印刷我們宗教書本的印刷機。」他們希望得到英國的幫助，特別是換取武器：「我們尋求並希望得到不列顛政府的幫助，把我們從共產主義的恐怖瘟疫中拯救出來。更準確地說我們希望能夠用我們國家的土特產品，如：絲、毛、皮，從您的政府換取武器裝備。不列顛政府可以成為我們的嚮導，我們可以要求您的政府將教育傳播到（東突厥斯坦）人民中來。」[25]

然而，英國為了保住既得利益，防範蘇俄通過東突厥斯坦對英屬印度滲透，不僅拒絕幫助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反倒支持新疆的漢族統治者鎮壓「叛軍」。英屬印度政府給了金樹仁四千多支槍，卻拒絕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購買槍支的要求。[26]

在大國的夾縫中，維族未能擺脫被利用、被出賣的命運。一九四四年，重慶政府調走盛世才，維族等少數民族再度舉事，建立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這一次的國名中沒有了「伊斯蘭」的定語，說明這是一個像土耳其的世俗共和國。就此而言，這是第二共和國比第一共和國進步的地方。然而，第二共和國的建國者們將實現獨立的願望寄託於蘇聯，卻無視蘇聯對其境內突厥民族的殘酷統治。蘇聯一開始支持東突厥共和國的建國運動，國際形勢變化後，為換取中國承認外蒙獨立，收回了對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的軍事和經濟支持，迫使其取

消獨立，與中央政府簽署和談協議。[27]

中共政權於一九五五年建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是從蘇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複製而來。「民族自治區」的地位似乎比一般的省要高，擁有更多自治權，其實中央政府實行更嚴苛的民族隔離和控制方式，這是現代版的「藩部」制度。這種制度在蘇聯並未成功，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矛盾的激化。[28] 這一制度在中國同樣無法成功。一九六○年代，伊敏去世時，東突獨立運動尚未成為一個爆炸性的議題。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對包括新疆在內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日漸嚴酷，激發了東突獨立運動勃然興起。相對於西藏、內蒙等地，漢維衝突的暴力程度日漸加劇。

近年來，各界對於緩和與解決新疆衝突的期望日益悲觀，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代表溫和派的聲音呼籲說：「在新疆面臨著民族矛盾激化危險、討論民族問題時觀點容易極端化的大環境下，用我們理性、健康的聲音與極端化的聲音爭奪觀念的市場，影響社會情緒向好的方向發展，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之一。」他卻被中共當局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中國政府的做法，等於將所有對於新疆統治有意見的溫和人士，推向伊斯蘭極端主義陣營。[29]

近代以來，維族一直將土耳其當作突厥世界的榜樣，土耳其由伊斯蘭化的奧斯曼帝國轉型為世俗民族國家的道路，或許是維族獨立建國的最佳模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土耳其國民大會宣佈廢除長達六個世紀的奧斯曼統治和蘇丹制度。次年，凱末爾當選土耳其共和國首任總統，展開暴風驟雨般的改革。在凱末爾執政的十五年，建立了堅強的土耳其共和國和現代意義上的土耳其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已成事實，對外關係有了良好基礎，西方化邁出大步，世俗化也有同樣的進步。[30]

然而，自從主張政教合一的厄多安擔任土耳其總理及總統以來，土耳其又從西方轉向東方，從歐洲轉向亞洲，從世俗主義轉向伊斯蘭，從民主轉向獨裁。厄多安宣佈全面禁止社交媒體「推特」的使用，土耳其政府關押的作家、記者和律師的數量也超過中國位居世界第一。二○○九年七月中共鎮壓新疆維族的暴動，厄多安發表聲明，聲稱土耳其人與維族同胞站在一起，並公開呼籲「中國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制止這一野蠻行徑」，由此他贏得了中國統治下的維族人以及流亡海外的維族人的尊重。但是，他在土耳其國內實施殘酷鎮壓，變得跟統治中國和俄羅斯的獨裁者越來越相似。二○一六年，土耳其發生了一次未遂的軍事政變，厄多安藉機大肆清洗國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擱淺，其未來也變得混沌不明──土耳其的變局，讓維族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家的路線圖，再度陷入

困惑與迷惘之中。

無國可愛，無家可歸

這二十幾年來，過著血淚般的人生。雖然過往曾打算一死，不過回頭看看今日的我，其實過著堅強又正確的人生。即便從未輸給任何人，淘氣如我，偶爾也會因想起這些事情而感到寂寞。……我具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天分，但因為如此痛苦的一生才造就了我這個怪物。

—川島芳子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前夕，清廷已無法應對種種內憂外患：它在西藏、蒙古和滿洲的改革計劃為英國、俄國和日本所反對；它也沒有得到財政援助來進行全面的政治、財政和軍事改革。結果是地方不安的加劇：湖廣和四川等省在策劃起義；外蒙向聖彼得堡發出支持其獨立的呼籲；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在印度；華南的革

命活動受到國外華僑的資助。北京面臨著一個非常困難而黯淡的前途。[1]

武昌起義能否成功，不是取決於清廷有無鎮壓的軍事資本，也不是取決於革命軍有無抵抗的意志，甚至也不是取決於袁世凱如何在清廷和革命者之間火中取栗，而是取決於列強的態度。列強的態度逐漸明晰：他們容許帝制政體被推翻和皇朝遜位，並支持袁世凱擔任一個新的共和國的元首。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走投無路的帝制政府將權力移交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給予退位後的大清皇帝以若干優待條件，包括「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相待」等。這些文件標誌著大清皇朝和滿人統治的終結，以及漢人恢復對國家的控制，遠東第一個重要的共和國誕生了──儘管它前途莫測。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六歲的溥儀退居紫禁城，成了一個「外國君主」，一個沒有政權，但按照中華民國的條件仍保持尊號、宮廷、財產和特權的皇帝，直到一九二四年，覬覦大內珍寶的馮玉祥將其驅逐出宮。[2]

在那幾個月的動盪中，北京的局勢相對平穩，皇帝暫時是安全的；可是散居各地「滿城」的滿族官兵和平民，卻並不安全。很多城市都發生了對滿族平民乃至婦孺的血腥屠殺。其實，儘管清朝的統治並不比明朝的統治更為殘暴，可是支持辛亥革命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刻意煽動漢族民眾仇恨作為統治民族的滿族，在此種心態下，屠殺遽然發生了──革命者們堂而皇之地說，這是對兩百多年前滿族入關時屠殺漢人的報復，可是那些事情發生在兩百多年之前。

在武昌，據起義者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槍斃，很少倖存下來的。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武昌城裡的四大滿姓家族（札、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被完全摧毀。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旗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更嚴重屠殺發生在陝西省城西安。西安的旗人大概有兩萬多人，據一位名叫J．C．凱特的英國傳教士調查，有一半旗人被殺，「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樣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革命軍在一堵矮牆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兩名新軍的年輕軍官後來承認：『沒有必要殺死這麼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屬。』」另一位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記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被屠殺。」

並非所有的皇親國戚都是紈絝子弟。作為「八大鐵帽子王」之一的肅親王善耆，拒絕在清帝退位詔書上簽字，主張將中原歸還給漢族，滿族舉族東歸滿洲。但這個設想已然不切實際：散居中國各地的百萬滿族人正在消融於人口是其數百倍的漢族之中。而故土滿洲早已移入大量漢族居民，張作霖等漢族軍閥兵強馬壯，日本和俄國的勢力滲透其間，滿族人落到了無家可歸的地步。 [3]

同為皇族，人心亦大不同。攝政王載灃之心如曹魏大將軍曹爽被司馬家族推翻後的想法—「不失為富家翁」，和議甫成，即慶幸「可以回家抱孩子」。肅親王則有愛新覺羅氏當年席捲天下的決絕之心，毅然攜龐大的家族北上，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旅順，誓言永不踏上民國統治的土地。臨行前，四十六歲的善耆以詩言志：「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頭看烽火，中原造落日。」 [4] 善耆隨行的子女中，有一名五歲的女孩，即第十四格格愛新覺羅．顯玗，漢名金璧輝，日文名字川島芳子。

無情的父親善耆與更無情的養父川島浪速

若早生幾十年，作為滿清的公主，愛新覺羅氏．顯玗可以在王府過著錦衣玉食、無憂無慮的生活。顯玗的哥哥憲立如此描述北京肅親王府的格局：「王府建地四千多坪，建築物內有數百間房間。當時我們已經有私家發電設備，還有私家自來水。我家還有別館，是法國式洋房，還記得裡面裝有管風琴與輝煌的吊燈，此外庭院中還有噴水池。大概因為這類近代建築太過稀罕，甚至大家都傳言我父親吃了外國的藥，中了外國的毒。不過從小孩的眼光來看，父親還是一號充滿改革氣魄的人物，特別對明治維新抱著強烈的關心。」 [5] 五歲就跟父親一起離開北京的顯玗，大概對北京王府中的生活毫無記憶。而皇室的身份，對她而言已不是尊貴和榮耀，而是纏累和包袱。

肅親王善耆在一八九八年繼承王位，傾向立憲改革。一九○六年出任理藩院大臣，曾赴蒙古作為期兩個月的考察，建議朝廷在蒙古修鐵路、建水渠，設立毛紡廠等，卻如石沉大海。一九○七年，善耆任民政部尚書兼步兵統領，成為實權派人物。他在任上展開人口普查，並設立戒煙局，計劃在全國禁止吸食鴉片。一九一一年，北方爆發鼠疫，善耆以各種近代化的防疫方式應對，在奉天舉行鼠疫會議，請來

日本專家幫忙，很快控制住了疫情。

一九一○年四月，革命黨人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被捕。由負責警務的善耆審理此案，讀了汪精衛所寫之口供後，不禁嘆息說：「如此有為之人，與其殺之，莫若改其志，可使為邦國盡瘁也。」他將汪精衛由死刑改判終身監禁。次年，武昌起義爆發，清廷大赦政治犯，汪被釋放出獄。

根據張學良的回憶，一九二二年，善耆在旅順病逝，汪精衛親自前往弔喪，對張學良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跟我說：『你們革命當然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了，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他這句話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6]

善耆是滿清皇族中較為開明的西化派，卻未能主導中樞、厲行改革。清廷的皇族內閣推出腐敗老朽的慶親王當總理大臣，使民間對朝廷主導的立憲完全失望。肅親王傳記的作者石川半山認為：「如果當初是由肅親王組閣，清朝大概不至於在宣統三年便滅亡了。」[7] 這個說法過於誇大善耆的能耐，他即便有當年恭親王的本事，憑一己之力也無法拯救王朝的覆亡。

離開北京之後，善耆的復國之志從未消失。他承認滿人驍勇善戰的習性如今已不復存在，便將希望寄託到蒙古人身上。在滿清統治時代，皇帝賦予蒙古人以較為尊貴的地位，蒙古是「藩部」中最支持朝廷的力量。善耆的妹妹嫁給蒙古喀喇沁旗王貢桑諾爾布，貢桑諾爾布是蒙古現代化運動和獨立運動的先驅，他和蒙古的王公們一致反對清帝退位，甚至聲稱，「蒙古惟與清廷有血統上之關係」，「一旦撤銷清廷，是蒙古與中國斷絕關係」。

一九一二年五月底，在日本軍人和浪人的策劃下，一批軍火從旅順運往蒙古喀喇沁旗，供「勤王軍」使用。六月八日，在奉天近郊鄭家屯附近，運送軍火的馬隊被已歸順袁世凱的當地駐軍攔截，數十人在交戰中被殺，武器亦被沒收。「蒙古舉兵」、「勤王」乃至所謂的「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

一九一六年初，袁世凱稱帝之後，善耆變賣家產、購買軍火，在關東軍的幫助下，以三井物產貨物的名義通過火車運到蒙古，供蒙古將軍巴布扎布的蒙古獨立軍使用。二十歲的七阿哥憲奎隨同宗社黨的軍事人員同行。巴布扎布也將長子濃乃扎布與次子甘珠爾扎布送到旅順的肅親王家中。這是戰國時代諸侯結盟、互相交換兒子作為人質的

傳統。[8] 那時，誰也不會知道，顯玗與甘珠爾扎布這兩名幼童，成年後會有一段短暫的婚姻。

當時，在關外形成兩個滿蒙獨立運動的中心，一個是以善耆及其日本友人和謀士川島浪速為首的旅順總部，另一個以巴布扎布、善耆第七子憲奎及曾幫助孫文在東京建立軍事學校的日本軍官青柳勝敏等組成的前線指揮部。由於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態度曖昧不明，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浪人對其發起自殺性襲擊。六月二十七日，巴布扎布打出「勤王護國軍」旗號，揮師南下。[9]

然而，袁世凱稱帝失敗及突然死亡，打亂了善耆和巴布扎布的軍事計劃。日本政府停止了扶植滿蒙獨立、反對袁世凱的政策，支持繼任的黎元洪。關東都督府和日本領事館立即出手抑制滿蒙獨立軍的軍事行動。蒙古兵在撤退途中，巴布扎布於林西城外被馬賊流彈所傷，就此身亡。「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由此慘澹收場。

滿清滅亡之後，善耆為復國奔波十年，一事無成。他深知復國的艱難，先後將三十八個子女中的二十四個送往日本留學，希望下一代學到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善耆特別將女兒顯玗送給交往多年的川島浪速作養女。年僅七歲的顯玗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在十一歲的哥哥憲立的記憶裡，離別時的場景淒淒慘慘戚戚：「到二樓父親房間道別的芳子，頭上綁著白蝴蝶結，身穿支那服，哭著說：『我不想去日本。』母親則頻頻哄她：『乖孩子，別哭別哭。』」[10]

其實，滿蒙獨立運動的策劃人、發起人、精神領袖、運動核心都不是肅親王善耆，而是躲藏在其背後的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川島浪速在日本政軍兩界頗有影響力，多年在中國活動，被善耆引以為至交。川島浪速曾輔佐善耆創設現代警察制度，其夫人福子曾擔任肅王府女官長。清朝覆滅之後，川島浪速致力於滿蒙獨立運動，不單單出於與善耆的個人情誼和對大清的忠誠（川島曾在清廷任職並獲頒勛章），更是為了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

川島浪速在給日本外務省提交的秘密政策報告《對支那管見》中，明確提出分三個步驟、日本掌握滿蒙的計劃：第一步是通過誘導和支援實現滿蒙獨立並使其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第二步是日本逐漸掌握這個保護國的實際權力；第三步是再來一次類似合併朝鮮時的手續，甚至比吞併朝鮮還要容易。川島洋洋得意地宣稱：「在恩威並施之上適當懷柔操縱控制，讓他們滿蒙人個個感覺生活幸福增長，其來歸化之事自如水流入卑。」[11] 若是善耆讀到這段文字，還會對其言聽計從嗎？還會將女兒送給他作養女嗎？

顯玗出行之前，善耆給其取字為「東珍」，寄託了女兒前往日本成為東洋珍貴的客人的願望。在日本讀小學和中學的那幾年，取了日本名字「川島芳子」的顯玗，確實享受貴客待遇，身邊如影隨形地跟著一名書僮。在豐島師範附屬小學，除了一般課程外，她還學習日本舞蹈、彈琴、茶道、盆景等。在松本高女就讀期間，她曾騎馬上學，其自由奔放的個性已讓同學側目。更出格的一件事情是，為了給一名家境貧寒的女同學籌措學費，她聽說有商店願意重金購買裸體照片，便約了兩名男同學為自己拍裸照來販售。其中一名男同學藤田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那時，芳子突然裸露上半身，讓他目瞪口呆：「似乎還是處女，隆起的柔軟胸部，左右並列如花蕾般可愛的兩隻乳房。」[12]

然而，十六歲那年，川島芳子遭到養父川島浪速強暴，是其人生中最慘痛的一段經歷。有人認為川島浪速道貌岸然，頗有父親、家長之威嚴，其實性好漁色，與夫人感情不睦，家中已納有一妾，將魔爪伸向幼女，實不足為奇。或許，這是如納博科夫小說《蘿莉塔》一般的，五十九歲男性對十五歲少女的迷戀。也有人認為，這是川島浪速將川島芳子塑造成「超級間諜」的手段之一，要消除其個人的愛恨情慾，讓其不能執著於女性的身份。從此以後，川島芳子就成為實現「滿蒙獨立」這一政治目標的工具。[13] 川島芳子的哥哥憲立則透露，川島浪速曾對他說：「肅親王是位仁者，我則是個勇者。如將仁者與勇者的血結合，生下的孩子必然仁勇雙全。」[14] 這段話是要憲立認可養父與養女之間的不倫關係，而其「歪理」來自於德國納粹的人種學、優生學理論。

在遭遇養父性侵之後，川島芳子宣佈與女性身份決裂，常常穿著男裝。但她並沒有努力脫離川島浪速的掌控，她接受了川島浪速用日本武士道精神對她的洗腦。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在法庭上仍為川島浪速的武士道信仰辯護，「她在清算自我、否定自我的同時，已將『武士不道』的負面價值澈底內化，不但內化，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她對日本父權社會權力的渴望與慾求。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自我清算與自我妥協為她日後忽男忽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性別越界開闢了一條迥異於常人的道路」。[15]

青梅竹馬非佳偶，全職太太不易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歲的川島芳子與二十四歲的甘珠爾扎布在旅順大和旅館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傳說此前肅親王家族有意將川島芳子安排給張學良作側妃，這個構想堪稱「急病亂投醫」，為了獲得張作霖的支持，落魄的皇族公主甚至可以當胡匪出身的軍閥家的小妾。不過，這件婚事沒有成功。

在一張結婚照上，甘珠爾扎布穿著立領的蒙古禮服，面對相機緊握著拳頭；川島芳子穿著立領連身長裙，頭上戴著薄紗的面紗，幾乎垂至肩膀的耳環，左手無名指上戴著結婚戒指。

在少年時代，兩人在川島家一同生活過，也留下一張有多人的合影。小學生模樣的芳子就坐在甘珠爾扎布旁邊。那時，芳子是一個頑皮的女孩，悄悄跟甘珠爾扎布說，拍照時你出石頭我出剪刀。甘珠爾扎布性格內向靦腆，不搞這套惡作劇的把戲，而芳子果然右手如猜拳般擺出剪刀的姿勢。

兩人如何從青梅竹馬步入婚姻殿堂？川島芳子的哥哥憲立回憶說，芳子告訴他：「甘珠爾扎布不斷寫信過來，我其實也不討厭他，不如就跟他結婚吧。」肅親王過世之後，在同父同母的十個兄弟姊妹中，憲立是大哥，長兄為父，由他負責認可這樁婚事，「從客觀角度來看，也是一對佳偶」。

關於這樁婚姻的來龍去脈，芳子的親人們與她本人的講法大不相同：「我在旅順養病時，被移到大連的大和旅館，而且竟傳達我隔日就要舉行婚宴。因為驚訝與不滿，婚宴中途曾一度離席。此外，當時新郎手拿戒指要過來幫我戴上時，我甩了對方的手，結果戒指掉落。不可思議的是至今那只戒指仍下落不明。」[16] 芳子的這段回憶漏洞甚多：從結婚的地點（明明是旅順，她卻說成是大連）到戒指（明明出現在結婚照上，她卻說從此找不到了）。更何況，當時她已成年，誰能如此操控她？不過，芳子一向如此，並不是刻意說謊，而是她根本就生活在一個由自己編織的謊言的世界裡──那些簇擁在她身邊的人們，哪一個不是用謊言來利用或欺騙她呢？

這段婚姻一開始就蒙上了陰影。據芳子的姐姐回憶說：「我聽說新婚的第二天早上，芳子無法展示她的落紅巾，因此惹怒了丈夫的姊姊，之後三年間都無法解開這個心結。」中國古時候會替出嫁的新娘準備一張五十公分見方的手織純白布巾，新婚初夜丈夫會將其放在新娘身下，以此作為新娘純潔的證明。十六歲被養父強暴的芳子，不可能向丈夫的家人展示有落紅的布巾。

更為嚴重的是，婚後三年，芳子始終沒有懷孕。而且她永遠都不

能懷孕──她此前在醫院做了輸卵管結紮手術。在那個年代，自己選擇做絕育手術的女子，可謂萬裡挑一。是怎樣的心志，讓她在如花似玉的年華裡做這種手術，放棄成為母親的幸福？大概只有滿清復國的理想才能讓她如此做吧？這好像是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的慕容復，因追求復國大業而走火入魔。

不過，為了挽救這場婚姻，兩人各自做出過努力。芳子對孀居的婆婆相當盡心，婆婆因此很疼愛她。但她與丈夫的其他家人關係不佳，大約是彼此的出身和文化背景相差太大。芳子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曾經當了兩年半的媳婦，那段期間成了大連人無所不在的乖巧、放棄一切尊貴、忍辱抱屈的太太，把廚房事務全都包攬了。」她要扮演全職太太的角色，真是太辛苦了。甘珠爾扎布對芳子很好，據芳子的姐姐回憶說，即便在芳子離家出走之後，他依然希望芳子回心轉意：「他們夫婦倆的感情絕對不算壞，甘珠爾扎布為了讓芳子隨時都可以回家，一直把家中整理乾淨，等待著芳子。那樣子已經到了讓人心痛的程度。」[17]

讓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是，幾年之後，川島芳子出面為甘珠爾扎布尋找再婚對象，即蒙古楊王年僅十七歲的孫女。芳子出現在他們的婚禮現場，並獻上由衷的祝福。對此，芳子的哥哥憲立解釋說：「我看過當天的照片，穿著日式和服的甘珠爾扎布夫婦，和戴著貝雷帽的芳子並列。芳子只是按照自身的身份，也就是自己是甘珠爾扎布的『正妃』，幫自己丈夫找個『第一側妃』，大概是這樣的想法吧。」

但這未必是芳子的想法，她早已蔑視王室禮儀，而且甘珠爾扎布並非蒙古王公出身，家中不必有「正妃」、「側妃」之安排。或許，芳子的真實想法是，幫助前夫找到一個與之白頭的妻子，自己就能抽身而出，成為澈底的自由人。後來，甘珠爾扎布的夫人生產時，芳子帶著小狗絨毛玩具去祝賀。甘珠爾扎布夫婦共育有六子，每次產子芳子都會造訪祝福，可見此後十多年間雙方都還保持友好關係。

從二十三歲直到四十一歲生命結束，整整十八年間，川島芳子再沒有步入婚姻的狀態。傳說與她發生過性關係的男子不計其數，有中國人、日本人、滿蒙人甚至歐美人士，彷彿她如同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那樣，是一名「人盡可夫」的蕩婦。其實，這是男權中心主義的中國儒家文化對禮教無法束縛和命名的女性汙名化的最佳方式──一旦該女子被戴上「色情狂」的帽子，誰還敢為之辯護呢？

就在川島芳子於一九二七年結婚時，意志堅強的裕仁天皇剛剛繼位幾個月，就在政治上扮演決定性角色。四月十七日，若槻禮次郎被樞密院（而非國會）推翻，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對華溫和政策亦告

終結。[18] 新上臺的田中內閣配合裕仁天皇的強硬態度，積極干預中國事務。川島芳子可以一展身手了。

婉容的女官長／安國軍總司令／東興樓的女老闆

滿清帝國崩潰之後，中華民國在國家建構模式上左支右絀、搖擺不定：究竟是繼承滿清帝國的多民族帝國的疆域和架構，還是重新建立一個單純的現代民族國家？孫文起初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韃虜」不包括在「中華」的範疇之內），然後又倡導「五族共和」（「韃虜」被寬容地納入「五族」之中），其國家想像和民族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最荒謬的是，中華民國宣佈成立之後，作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率領文武百官前去南京城外朱元璋的明孝陵祭拜，彷彿同盟會是金庸小說中「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中華民國是第二個大明朝。在孫文等革命者心目中，以反滿為核心的民族問題高於「中華民國」這個名字所顯示的民主、共和價值。

肅親王等宗社黨人拒絕承認中華民國對關外的統治。不僅滿族貴族如此思想，也有一群漢族遺老遺少甘當「忠臣」。民國初年的政治亂象，包括袁世凱稱帝的失敗，更讓他們相信唯有滿清王朝才具備「道統」和「天運」，而代表多數民眾的「總統」及其背後的共和制度，無法促成國富民強。他們更不能接受中國成為步入世界近代政治體系之林之「一國」，而希望刻舟求劍般地回到滿清時代「天下國家」的觀念中。他們將民國當作「敵國」，卻無法以道德層面的「忠君」原則來說服民眾。[19]

沒有皇室的「中國」，已不是「大清國」。清末的君主立憲改革未能成功，中國未能像英國和日本那樣保留皇室，是肅親王善耆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對於肅親王父女來說，滿清不僅是血緣之所由來，也代表他們生前一心想要恢復的政治權力與輝煌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一九一一年以後被漢人推翻的滿清王朝既是中國，也不是中國；既包含中國，也自外於中國。在反對民國的宗社黨人眼中，日本是比中華民國更為親近的盟友，而與民國對抗正是善耆推動滿蒙獨立運動的目的。[20] 在這種邏輯的推衍之下，從推動滿蒙獨立運動到成立滿洲國，即便借助日本的力量，他們也並不認為是在「賣國」。

一開始，川島芳子對滿洲國抱有無限美好的期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她奉日本上海領事館副武官田中隆吉之命，協助末代皇后婉容逃出天津。據說是川島芳子親自駕車，將婉容從監視嚴密的清皇室駐津辦事處接出。後來，溥儀夫婦居住在旅順的肅親王府，直到滿洲國建立。那是川島芳子童年時居住過兩年的地方，也是往返於中日兩國時常常停留的地方。這棟位於旅順城外的建築，原本是俄羅斯修建的旅館，日俄戰爭之後被日本接收，然而由關東都督府借給肅親王一家居住。

滿洲國建立之後，關東軍參謀推薦川島芳子擔任宮廷的女官長，原本以為跟婉容有交情的川島芳子會欣然接受這個職位。卻未料到，早已習慣了過驚心動魄的間諜生涯的川島芳子，哪裡願意做幫助皇后處理日常雜務的宮廷女官呢？生性拘謹的溥儀也看不慣川島芳子張揚的個性，對此任命加以反對。不到一個月之後，川島芳子又返回「東方間諜之都」的上海。

一九三三年，日軍發動「熱河作戰」（中國方面稱之為「長城抗戰」）。關東軍司令部下達了根據裕仁天皇的御旨擬定的作戰命令：「治理熱河，純屬滿洲國國內的問題……熱河省為滿洲國領域，是我軍自由行動之區域。」[21] 清朝皇帝的避暑山莊就在熱河境內，所以這裡被滿族看作是一處聖地。川島芳子將馳騁於熱河作為拓展滿洲國的神聖使命，在關東軍的策劃下，組織安國軍參與熱河作戰。她訂做了軍裝，一副英姿颯爽的派頭，大概是想讓九泉之下的、從未執掌過軍隊的父親得到安慰吧。滿洲國和日本的媒體上刊登了川島芳子的那張穿著馬褲、頭戴軍帽、一副司令官模樣的著名照片。這張照片成為她某個時代的象徵，受到各方廣為使用。[22]

但照片背後的真相是，由於張學良的東北軍士氣低落，不到兩個星期就退出熱河，整個戰役很快結束了。由一群散兵游勇組成的安國軍沒有派上用場，川島芳子沒有立下任何戰功。她本人在《婦人公論》的手記中寫道：「在熱河省的各處巡迴，宣傳內容把我實際的工作誇張數十倍，實在令人難為情。」然而，「金司令」的稱呼從此伴隨她直到死亡，從未在前線衝鋒陷陣的「金司令」的戎裝照片成了其戰後受審的「鐵證」之一。

關東軍並不信任川島芳子，熱河作戰結束後，立即將安國軍解散。川島芳子常常發表批評日本對華政策的言論，比如形容日本政府就像「拿胃藥去治肺病」一樣，「如果推行的政策不能讓中國人與日本人更加相互理解，那麼雙方國民都將陷入困境」。關東軍逐漸將其視為危險人物，有一度甚至打算暗殺她。為了降低其影響力，關東軍禁止她進入滿洲國活動。無奈之下，川島芳子只好在天津經營起一家

名為東興樓的高級餐廳，並收容安國軍中被遣散的部分人士當服務員。同時，餐廳老闆也是間諜身份最好的掩護。

滿洲國建立起來，溥儀當上了皇帝，但川島芳子清醒地知道，那只是她養父川島浪速心目中的滿洲國，而不是她父親肅親王心目中的滿洲國，她如何能愛這個國家呢？在《自白書》中，她以「生於蠱惑，死於蠱惑」八個字總結自己的一生，後世史家評論說：

> 如果「蠱惑」一詞試圖以中蠱代表對身世的迷惑與困惑，它也代表她有如因為中蠱而無法掌握的人生。在這樣一個撲朔迷離的人生道路上，愛國與叛國從來不是清楚界定的選項，而是不可抗拒的宿命。更糟糕的是，這一切似乎在她出身的那一刻就決定了。「無國可叛」的另一層意思是無國可愛，不只是因為清朝覆亡之後，愛國與叛國的客體消失轉換，也在於愛國與叛國的主體從此失去依傍。川島芳子為了打造一個可以效忠的對象，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努力塑造一個新的「自我」，即使這個「自我」不存在於真實世界中。同樣的，她所嚮往的忠誠世界—包括個人對國家、人與人之間無私的奉獻，也只是處於她個人的想像。[23]

是漢奸，且是女漢奸，所以必須死

在日本唸小學時，川島芳子就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認同危機，故

意以含混的方式敷衍過去。多年擔任川島浪速秘書的村井修，其夫人常常見到小時候的川島芳子，她講述了一段故事：

> 當時，芳子是一位穿著紫色褲裙上面繫著蝴蝶結，風格特殊的大小姐。我問她，你從哪一國來的？她以帶著童心的智慧，既不說日本，也不說支那，回答說：「我是從娘胎來的。」讓我見識到她的聰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

多年以後，在國民政府的法庭上，法官問川島芳子：「愛國是愛中國呢，還是愛日本呢？」川島芳子回答說，她「猜想」她愛的「可能」是日本。而她在給被當作爺爺看待的日本陸軍中將、滿洲國參議筑紫熊七的信中寫道：「為了國家，面對各位愛憐我的人們，我絕對不會做卑鄙的事情。『我是受日本養育成長的人』，就這一句，是我堂堂面對人生最後時刻，仍會不斷堅持的想法。」[25]

川島芳子從小在日本長大，她認為教育和文化是比血緣重要的形塑國族認同的因素，她強調自己是日本籍，所以不能被冠以「漢奸」的罪名。她的辯護律師指出，國民有效忠國家的義務，當血緣與國籍衝突時，法律上的國籍是身份的最終判斷標準。然而，日本的親友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以證明其擁有日本國籍。她哀嘆說：「被趕出祖國，雙親離世，又與養父母分別，為何上蒼只如此捉弄我一人？」

川島芳子會日語、漢語以及一點英文，不會滿語。她在血緣上是滿族，卻未能繼承滿族的文化傳統。這不是她的錯。在清朝全勝時期，康熙、乾隆等帝王不遺餘力地保存滿族的語言文字及包括尚武精神在內的生活習慣，然而傳統的「滿洲之道」仍然不可逆轉地消失在時光隧道中。[26]滿族人融化甚至消失在漢人的城市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甚至比長期處於被殖民狀態下的蒙古人、藏人和維吾爾人更加悲慘，他們失去了家園，也失去了自我。

川島芳子的國族認同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她效忠的對象是滿洲國、中國、日本的綜合體。國籍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川島芳子在漢奸審判程序中的身份歸屬問題，反而暴露了她在國族認同上的混亂與糾葛。[27]一旦這三者之間發生衝突和矛盾，她就不知所措了。

對川島芳子的審判，成為「慘勝」之後中國的一項舉國狂歡的娛樂。那時還沒有電視和電視真人秀節目，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庭審的細節，包括川島芳子的服飾和神情，人們讀得津津有味，彷彿每個人都有權力充當法官，揮筆判處其死刑。明朝末年，崇禎皇帝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以漢奸罪名處死「國之長城」的袁崇煥，成千上萬的京師居民衝上去用刀子割肉吞吃。如今，滿漢的位置顛倒過來，川島芳子充當了袁崇煥的角色。民國與明朝，並沒有那麼遙遠。

檢方列出川島芳子的諸多罪狀，很多都是子虛烏有的，就連川島芳子在日本與汪精衛會面，也成為一大罪狀。即便汪精衛投敵的罪名成立，但汪精衛當漢奸，難道是川島芳子唆使的嗎？汪精衛早已下定決心了。如果川島芳子跟汪精衛會面都是罪行，那麼一九二七年底蔣介石訪問日本，秘密會面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又該當何罪？

近代以來中國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輕視與日本的關係。日本之強與中國之弱不言而喻，單單從國防武力之觀點言，則日俄戰後，日本隨時可以侵佔中國領土之一大部分，中國之所以能苟安，只是列強為了維持國際均勢而已。[28] 一九二七年底，暫時下野的蔣介石專程訪問日本，為其東山再起尋求日方支持，用蔣本人的話來說，「亦想一探日人對我國之意見與其隱伏於表面下之政治潮流」。十月二十三日，蔣抵達東京，發表對日宣言，稱「中國革命成功之遲速，與日本之安危有密切關係。」[29]

這是蔣一生中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訪日，蔣介石的足跡遍及長崎、神戶、奈良、大津、箱根、熱海、東京等地。一路上，蔣介石感嘆日本有以武士道為核心的「大和魂」，講究忠君愛國、好俠尚勇、輕生樂死，且汲取西方文明之精髓，又有王陽明「知行合一」之哲學，故而物質與精神齊頭並進，迅速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和軍事強權。而回頭看中國一團亂麻之政局，蔣不禁哀嘆「不知吾國何日能臻此耳！」[30] 這些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難道不是漢奸言論嗎？

十一月五日，田中義一在其私宅中與蔣介石會晤。田中出身軍部，為陸軍大將，四月二十日組成新內閣。會談中，田中力勸蔣介石停止北伐，專心經營長江以南。蔣反駁說，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的失敗前車可鑒。而且，中國若不能統一，東亞不能安定，此固為中國之大患，亦非日本之福利。蔣竭力說服日方支持其北伐，卻未能得到正面回答。蔣一生的志業，皆與日本息息相關；而他一生的走向，更是兩國交往實況的最佳寫照。[31]

有些事情，蔣介石可以做，川島芳子卻不能做。有些手上真正沾滿中國人鮮血的侵略者，如親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偏偏能夠輕鬆脫罪──他是國民政府軍令部長何應欽的老師，何應欽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軍投降時，竟然向岡村寧次鞠了一躬，對屈辱性的受降儀式讓老師丟臉表示歉意。在那張接受投降書的照片上，怎麼看都像是畢恭畢敬的何應欽在向岡村寧次投降。岡村寧次隨即成為蔣介石的座上賓，為蔣介石的剿共之戰提供意見。一九六六年，岡村寧次死在日本醫院的病床上，死時很安詳。

血債累累的岡村寧次不必死亡，汪精衛政權的第二號人物周佛海還逃過了死刑，手上並無血債的川島芳子卻非死不可──她是「漢奸」，而且是「女漢奸」，這是雙重的「原罪」。國民政府和怯懦的中國民眾要用殺川島芳子來挽回戰爭中備受屈辱的面子。這種尋找代罪羔羊的心態，非中國人獨有。法國作家莫泊桑的小說《脂肪球》（Boule de Suif）、義大利電影《真愛伴我行》（Malena）講述的都是類似的故事。在二戰結束後，很多國家都出現了民眾自發動用私刑或通過司法渠道推動的「鋤奸運動」。然而，真正的罪大惡極者大都逃脫了懲罰，並非大奸大惡之人卻成了大眾報復心的祭品。紐倫堡審判的一位公訴人、也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羅伯特．傑克遜說過：「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審判這些被告的依據將被明日歷史用來評價我們。給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於向我們自己灌酒。」[32] 在他看來，有法治才有公正；審判的對象是戰犯，更是戰犯們信奉的邪惡的意識形態。

中國沒有像在紐倫堡大審中擔任總檢察官的羅伯．傑克森（Robert Jackson）這樣深具法治精神的法官，中國只有「眾人皆欲殺」的主流民意。川島芳子被判處死刑，上訴亦被駁回。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川島芳子在北平第一監獄被執行槍決，行刑前寫下「有家不得歸，有淚無處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訴向誰」的俳句。

川島芳子在國族認同和性別認同之間不斷越界，甚至還嘗試超越善惡的界限，但最終無法跨越生死的界限。此後數十年間，中國民間有不少關於川島芳子逃脫死刑，隱居民間的傳說，但無一被證實。[33]

在乍暖還寒的北國的凌晨五點，「男裝麗人」的傳奇畫上了句號。而川島芳子所面對的困境，在中國，在滿洲，至今仍然還是困境：

也許對許多人而言，發生在川島芳子身上的越界，有如天方夜譚，然而這卻是一個最能說明近代中國國族、性別與自我糾結的例子，人們也許無法認同川島芳子這個人，卻不得不承認，在許多方面她其實代表皇朝結束之後，中國傳統政治秩序崩解以及個人無法面對自我的窘境。如果將個人從代表國族與性別的論述中釋放出來，重新找回個人的價值，也許是川島芳子傳奇穿越時空、值得後人再三回味的一點啟示。[34]

21　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

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

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省置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感?!處茲今世，民權一經剝奪，民生勢必致困，民族益衰弱，夫豈不知？

—德穆楚克棟魯普



一九二八年夏天，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北洋政府的統治畫上了

句號。對於普通的北京居民來說，生活中明顯的變化是，除了城市的名字被改為「北平」之外，那面飄揚了十七年、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被廢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從國民黨黨旗脫化而來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新國旗。

在北平的蒙古人對於新政府的民族政策忐忑不安。一方面，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特別強調民族主義，宣傳中使用的新概念是「中華民族」。誰也不知道「中華民族」的真實含義是什麼。「中華民族」只是一個花架子，其核心還是大漢族主義。那麼，在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中，蒙古究竟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呢？另一方面，在被國民黨奉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文所寫的《建國大綱》中指出，「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曾經與漢族等民族平等地居於五大民族之列的蒙古族，是否又淪為「弱小民族」？若蒙古人承認自己「弱小民族」的身份，是否意味著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植」，進而擁有「自決自治」的權利？在這些自相矛盾的說法裡，蒙古人不無焦灼地等待著來自南京的說法。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南京政府公佈了新修訂的《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南京政府正式表示，有關蒙古和西藏行政的中央機構仍舊續存，只是由北京政府的蒙藏院改為南京政府的蒙藏委員會，由總裁制改為委員會制。中央政府承認蒙藏這兩個地方的特殊政治意義。然而，陸續從南方傳來的消息說，新政府對於蒙古事務既無根本政綱政策可循，也沒有所謂臨時變通方法。那些在國民黨中佔有位置的蒙籍人士，只不過應虛位而已，實際上對處理蒙古問題不會產生什麼作用。[1]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在北平的蒙古人，借用位於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一場歡迎指揮國民黨北伐的將領和黨政要員的集會。最初答應來的有不少人，而真正在現場露面的重要人物只有桂系將領白崇禧。白崇禧不是閻錫山、馮玉祥那樣「華麗轉身」的舊軍閥，而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黨員。而且，他是回族人士，也是所謂「弱小民族」之一員。因此，蒙古人對他寄予極大的希望。

然而，白崇禧以征服者的傲慢姿態光臨會場，看到會場中懸掛的「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的標語，勃然大怒。他大概沒有讀過「先總理」親筆撰寫的《建國大綱》，不知道這些話出自《建國大綱》，而認為這是蒙古人挑戰中央的權威。白崇禧厲聲指出，這是政府絕不允許的，他自己雖是回族，其實無異於一個信回教的漢人。他不承認中國除一個中華民族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民族，又怎樣要求自決自治？[2]

經過白崇禧的一番訓誡，蒙古人大失所望，也極其憤慨。他們終於明白，漢人書上所寫的，大都是假話。漢人在自己力量不足之時，可以甜言蜜語、好話說盡；一旦擁有壓倒性的武力優勢，就只靠槍桿子來說理。這是國民黨北伐勝利後，蒙古人第一次對中央政府失去信任的場合。

而白崇禧畢竟不是百分之百的漢人，只是「信回教的漢人」，所以不太會說謊騙人。他說出了心裡話，也是國民黨真實的民族政策。白崇禧自從說出反對蒙古人自決自治的話後，一直到晚年在台灣，在任何場合談及蒙古議題，他的主張始終未變，也不作任何妥協。白崇禧的這番代表中央政府的講話，很快傳到廣袤的蒙古草原上。年輕有為的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飛身上馬，疾馳良久，才消除了心中之憤怒。

作為「帝國」的蒙古和作為「民族」的蒙古

何謂「蒙古」？何謂「中國」？「蒙古」與「中國」之間是什麼關係？清帝國崩潰之後，這些問題開始一一浮現出來。

如果說蒙古是一個「帝國」，那麼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的出現，蒙古文明吞沒了中國文明，繼續向西擴張，連接了地中海文明，這讓兩大歷史文化首度接觸，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史從此變得可能。[3] 曾經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對世界史的影響長期被低估，蒙古帝國不僅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從華北向西歐擴張，更迫使地中海世界從古代逐步進入到大航海時代。而其繼承國除了俄羅斯、印度、伊朗之外，也包括今日滿蒙化的中國。

歷史上蒙古人「國家」意識的形成，可追溯到古代社會。蒙古語中的「國家」一詞為「兀魯思」，最早是突厥語詞，八世紀左右被借入蒙古語，指蒙古社會從部落或部族分裂、割據中產生的強大的政治集團。十三世紀，隨著蒙古大汗國的建立及其影響力的擴大，「兀魯思」具有了「國家」、「領土」、「人民」等寬泛而模糊的含義。作為「兀魯思」統治者的成吉思汗被稱為「可汗」之後，「成吉思汗原則」幫助完成蒙古各部落的整合。尤其是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國，滅了

南宋，鞏固了北方、東北邊疆，元帝國是疆域大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的多民族帝國。對於蒙古人而言，「兀魯思」是國家的雛形，但「兀魯思」所體現的國家規模、性質和規則與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有本質上的區別。

粗略劃分中國歷史，若以秦漢時代為第一階段的中國、隋唐時代為第二階段的中國；那麼，在蒙古帝國的支配下，中國被蒙古化（過去的中國歷史單單強調蒙古被漢化），形成了元明清的第三階段的中國。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說，這個第三階段的中國不再是以皇帝為中心「單獨運轉」的世界。元、清兩個帝國的皇帝其實是以成吉思汗為原型的中央歐亞遊牧君主的中國版，中國實際上是中央歐亞世界的一部分。這個第三階段中國的特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可以清楚看見。[4]

而元帝國（包括後來的清帝國）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廣義的蒙古，原本就由多個「兀魯思」組成，並不是因為成吉思汗去世才分裂為四個「兀魯思」。元帝國作為蒙古帝國的四個「兀魯思」之一，其疆域將漢人帝國完全囊括其中。也就是說，中國成了元帝國的一部分，而非元帝國被鑲嵌在中國的歷史之中。蒙古是中國的殖民者，中國則是「被殖民」的對象：代表中國的南宋帝國被元帝國滅亡，南宋的漢人被劃分為最低等級，被迫接受嚴重的種族歧視的統治。波蘭人不會把被德國佔領的時期描述成「波蘭的日耳曼王朝」，以此類比，中國人以「元朝」定義元帝國堪稱掩耳盜鈴之舉。

古代中國是一種「天下國家」，天下是由天、天子（王朝）與生民（百姓）所構成的政治社會，是以王朝為媒介的公共場所。相對於天、生民與天下的普遍性，王朝、皇帝權力是由個別家族所擔當的。天下觀念的完成，超越了反復興亡的王朝權力的特殊性，長久維繫著前近代中國政治社會之普遍性與統治的現實可能性。[5] 王朝可能傾覆，國家可能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但天下的觀念則是顛撲不破的。以禮法為上層建築的「天下國家」的觀念，從漢代形成之後，一直存在到清末。

到了近代，作為天下周邊的「蠻夷」諸國競相謀求自身的獨立性，而清帝國本身遇到乃來自西方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危機不僅是王朝的顛覆，更是天下觀念的崩潰。美國歷史學家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6] 在此過程中，中國不僅要處理「從天下到國家」的難題，更要完成

「納四裔入中華」的使命──在清帝國的疆域和族群基礎上，如何將周邊各種族群納入一個「中華民族」之中，最後形成一個龐大的、多民族的現代「帝國」或「國家」？[7]

更進一步的追問是：一個「民族國家」何以具有維持「天下體制」的合法性？一九一一年，梁啟超在《新中國建設問題》中明確質問：「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中國如果從一個傳統的多民族的帝國構造向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轉型，「『滿』與『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華』所放棄的『韃虜』」。[8] 面對「驅除韃虜」與「五族共和」之間的矛盾，孫文放棄了作為革命催化劑的前者，而接受清帝退位詔書中提出的「五族共和」。然而，這四個字真能讓其他民族「歸心似箭」嗎？

理解何謂「蒙古」，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如果蒙古是一個「民族」，那麼民族主義意義上的「蒙古民族」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才逐漸形成的。辛亥革命無疑是一場民族革命，儘管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中華民國竭力掩飾此一初衷。一九二七年的黨軍北伐同樣也是一場民族革命，不過革命的對象從昔日的「韃虜」變成了西方列強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軍閥（然而，「新軍閥」們並沒有擺脫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宿命）。沒有民族主義的激勵，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都不可能成功。不僅在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民族主義是國家政治與社會變遷的一種搶眼符號和動力源泉，這在民國時期蒙古地區政治變遷、文化語境下同樣如此。[9]

滿清覆滅前後，蒙古王公由「勤王」走向「獨立」。他們認為，蒙古是清帝國版圖的一部分卻不是中國的領土，蒙古人是清帝國的臣民卻不是中國的國民。清帝國一旦滅亡，蒙古與清帝國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也就隨之煙消雲散，而蒙古也就與中國沒有關係了。鼓吹蒙古獨立的蒙古人將清帝國與「中國」做了區分，既然武昌起義之後中國內地各省可以宣佈獨立，與清帝國中央政府脫離關係，那麼與各省同為清帝國組成部分的蒙古，如果無法通過「勤王」的手段恢復作為母國的清帝國，就只能與中國內地各省同樣選擇自保的方法，也就是宣佈獨立。[10]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西化的知識階層以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旗號，但比這兩者更具吸引力的還是民族主義。受五四運動之啟發，蒙古的青年學人和精英開始接觸和翻譯漢語「民族」的概念。一九二五年，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金永昌創辦《內蒙國民旬刊》（蒙古文）。在這份刊物中，第一次使用「蒙古民族」這個

說法：在《旬刊》的最後一版（第八冊，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中，有〈蒙旗政治制度向來依據軍事力量而建立〉一文，文章寫道：「我們蒙古民族，被稱為遊牧國家，被世人視為勇敢的人群。」[11]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漢族以民族主義作為反對滿清統治的思想資源，而蒙古族經由民族主義的啟蒙，也以此反對漢族的殖民統治，這真是歷史的弔詭。在「民族」的話語條件下，蒙古社會追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步伐，以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為出發點，利用蒙元帝國歷史資源，以及蒙古與中原社會在種族和文化上的差異，在辛亥革命之際行動起來，謀求建立獨立國家。[12]

北蒙古[13]獨立之後，科爾沁右翼前旗烏泰的反應最為迅速。一九一二年八月，烏泰發佈《東蒙古獨立宣言》，支持和回應北蒙古的獨立行為，並宣佈獨立。其後，南蒙古各地王公相繼宣佈支持北蒙獨立，喀喇沁扎薩克郡王貢桑諾爾布、科爾沁左翼前旗扎薩克賓圖郡王棍楚克蘇隆、科爾沁左翼後旗的拉喜敏珠爾和阿爾花公、喀喇沁右旗的海山等最為活躍。賓圖郡王棍楚克蘇隆提議，從哲里木盟起事，北聯呼倫貝爾，西結西部各盟，和北蒙統一起為「蒙古獨立王國」。[14]

在蒙古上層王公精英中，已有了「泛蒙古」或「全體蒙古」的民族主義思想。進入民國後，在西方「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漢人排擠性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氾濫的背景下，在蒙古地區的精英和民眾中形成了將中華民國稱為「漢人中國」，把中華民國視作「漢民族國家」的習慣和話語，進而主張建立蒙古族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

在保守與激進的縫隙中的「德王革新」

就亞洲而言，二十世紀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最高潮，也是民族主義興起，爭取獨立自主的巔峰時期。蒙古閉鎖於東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被中、俄兩大國所包圍，卻也不能避開亞洲和世界巨大歷史變動洪流的波及。北蒙古的獨立、南蒙古的革新與民族自決運動，都是這個洪流所激起的浪花。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兩者互為因果。[15]在此背景下，德穆楚克棟魯普在一群暮氣沉沉的蒙古王公中脫穎

而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蒙古地區民族主義進入成熟時期，南蒙古最著名的「泛蒙古」民族主義運動就是德穆楚克棟魯普領導的自治運動。

南蒙古的版圖就像一匹奔騰的駿馬，昂首奮蹄，馳騁在北方。在它的脊背上，有一塊叫「二連浩特」的地方屢屢被世界矚目，這就是廣袤美麗的塔木沁塔拉草原，蘇尼特部落長期在此生活。蘇尼特部落在清朝初年歸附中央政府，但一直是最桀驁不馴的蒙古部落之一，被稱為「藍色的蘇尼特人」。清廷在蒙古設置盟旗制度，縮小蒙古部落的規模，是遵循漢代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16] 另一方面，清廷又讓滿族王公貴族與蒙古王公通婚，並給予蒙古人基本等同於滿族人的種種身份優待。

一九○二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出生於德王府。他的父親那木濟勒旺楚克時任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長兼蘇尼特部右翼旗世襲扎薩克多羅杜棱郡王，在六十歲時，才有這個寶貝兒子。一九○八年，老郡王去世，年僅六歲的德穆楚克棟魯普承襲郡王爵職。一九一九年，十八歲的德穆楚克棟魯普自主管理旗政。蘇尼特右旗在錫林郭勒盟的十個旗中只是一個中型的旗，但德穆楚克棟魯普自幼就夢想重振成吉思汗雄風，重建蒙古大帝國。他曾說：「當今時代，能振興蒙古者，捨我與誰共？」

德穆楚克棟魯普從小即夙興夜寐、淬礪奮發，研讀蒙文、漢文的經典，也誦讀喇嘛經書，熟悉藏傳佛教教義。他的書法遒勁有力，是蒙旗眾多王爺中唯一一位有相當造詣的蒙文和漢文的書法家。作為「馬背民族」的子孫，他在孩提時就學習騎馬、摔角、射箭，騎術嫻熟，射技精湛。南方一位採訪過德穆楚克棟魯普的記者在《百靈廟巡禮》一書中記載：「三百公尺以外的很小目標，德王每槍必中。」德穆楚克棟魯普還喜好擺弄機械，少年時就學會了開汽車，還想學開飛機。他跟到訪的美國商人藍理訓（Larson）等人成為好朋友，多次向他們請教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等問題。比起當時大多數迂腐守舊的蒙古老王公們，他是一個善於接受外來事物的新派人物。[17]

長大成人後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略圓的臉龐，高鼻樑，大眼睛，英氣勃勃。他平時好戴瓜殼小帽，好穿藍、黑深色蒙古袍，腳蹬圓頭平底便靴。十四歲那年，他娶正鑲白旗出身的女子色布吉德瑪為妻。色布吉德瑪生下兒子都固爾蘇隆之後不久即病故。一九二○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又續配阿巴嘎左旗協理台吉貢森之女、十四歲的額仁欽朝為妻，婚後兩人非常恩愛。

德穆楚克棟魯普在動盪憂患的年代掌權，蒙古民族的生存環境面

臨嚴峻威脅。從清末至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央政府推行放墾蒙地、強化軍政統治的政策，削弱了蒙族傳統權益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北洋政府在南蒙古劃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繼而於一九二八年改為行省，設立墾務局、縣制，漢民族大量湧入南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熱之苦。

這樣的成長環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棟魯普複雜的個性和思想。一方面，他受到儒家忠孝傳統的薰陶，一生忠於大清王朝；又接受喇嘛教影響，奉逃難來南蒙古的班禪喇嘛為上師。另一方面，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知曉世界大勢，很早就萌生了循仿成吉思汗等蒙古先輩，在亂世中「叱吒風雲」的理想。

一九二五年，段祺瑞政府成立臨時參議院，德穆楚克棟魯普、傅倫、馬福祥等蒙古族、滿族、回族人士被選為參議員。德穆楚克棟魯普來到北京開會，在此期間發動了反抗當局在蒙古的屯墾政策的活動。這是他為了蒙古問題，第一次發動的政治攻勢。這個蒙古族的生存問題，或經濟權益保障問題，得到在北京的蒙古一般人士和蒙藏學校學生的支持。他們集合示威，並到段祺瑞的私人官邸請願。這是民國以來蒙古人第一次在北京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段祺瑞政府在壓力下接受請願書，並行文停止屯墾政策。但實力派軍閥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等人我行我素，不予理會。由此，德穆楚克棟魯普認識到，體制內的抗爭效果有限，蒙古人必須自救。 [18]

此後，德穆楚克棟魯普回到蘇尼特右旗，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德王新政」。這一系列新政，不僅引起本旗貴族上層的不滿和反對，還招致鄰近各旗王公和宗教上層人士的強烈憤慨，人們紛紛傳說：「錫盟出了一個蘇尼特瘋王，不知什麼時候闖下亂子，錫盟前途，殊堪憂慮。」實際上，這些新政給蘇尼特帶來現代化的新風氣、新面貌。

德穆楚克棟魯普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對班禪喇嘛頂禮膜拜、尊崇備至。但他對藏傳佛教中保守僵化的一面亦有切膚之痛，他根據全旗近四成的男性都當喇嘛的實際情況，提出必須改變「好兒必為僧」的舊習。他親自到各寺廟對修行的僧眾進行考試，勸那些不懂經文和破戒的喇嘛返俗，將畢希日勒圖等小廟合併到大廟裡，讓更多青壯年男性成家生子，並從事生產勞動，這樣蒙古社會才能發展壯大。他根據在本旗取得的經驗，在錫林郭勒全盟會議上宣佈：「一子必為俗，二子一俗一自願，三子二俗一僧，四子二俗一僧一自願，五子三俗二僧。」 [19]

德穆楚克棟魯普尤其重視教育，深知「人智未開，教化未行，談

何振興」。他明令所轄區域將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作為教育經費，適齡孩童必須上學，由旗方供給食宿及教科書和文具。他在德王府附近創辦興蒙學校、女子家政學校、蒙古軍幼年軍官學校、喇嘛學校等八所學校。在辦學的同時，他還建立了本旗第一座蒙醫院，教導牧民如何防治流行疾病。

德穆楚克棟魯普也認識到「無工不富」的道理，一九二○年代末，他投入資金、購置設備、招聘人才，以興辦工廠。以班禪喇嘛的名義開辦的西營盤槍械修造廠，擁有十多名漢族工人，能修造手提式機槍、步槍以及彈藥。他還創建手工紡織廠，主要生產地毯、麻袋、織毛衣、毛褲、圍巾、手套等，產品遠銷中國南方，備受消費者歡迎。這正是清末時肅親王善耆考察蒙古時給朝廷提出的建議，直到如今才得以實行。另外，他還創辦了鐵木銀銅器具製造廠、造紙廠、奶食品廠、蒙古包製造廠等小型工廠，大大改善了蒙古民眾的生活。

在軍閥混戰的時代，德穆楚克棟魯普深知武力的重要性。更何況，作為成吉思汗的三十一代子孫、「黃金貴冑」，他天生便有尚武傳統。他竭盡全力發展本旗的武裝力量。按清朝舊制，蒙古地區每一百餘戶為一佐領，除為僧人外，男子在十八歲至六十歲期間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每三人之中，二人屬於預備役，稱之為「丁」；一人為常備軍，稱之為「披甲」。到了清末民初，該制度形同虛設，疏於訓練、武器落後的常備軍居然連一般的土匪都無法對付。

如何才能合法擴建軍隊呢？德穆楚克棟魯普所在的蘇尼特右旗，位於從張家口到庫倫的交通要道上，地理位置相當重要。一九二六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向察哈爾都統公署提出，為了沿途的保障交通安全，需要補助一筆經費，維持一支武力。察哈爾都統公署同意他建立一支五百人的「烏滂守備隊」。德穆楚克棟魯普親自擔任隊長，名正言順地購置武器，聘請人員進行新式訓練。守備隊的官兵都是本旗子弟，忠實可靠。這支小小的軍隊，成為日後德穆楚克棟魯普展開獨立運動的基本力量。

在蒙古社會內部，德穆楚克棟魯普不僅要抗拒上一代保守的王公和喇嘛的壓力，還要應對跟他一樣年輕的激進左派的挑戰。這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族的改革者必然面對的困境：一邊是保守派拚命拖後腿，一邊是革命派等不及看改良的成果。

北蒙古獨立後，很快走向赤化，成為蘇聯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天下。蘇俄支持蒙古人民革命黨向南蒙古境內發展，希望假以時日便可讓南蒙古歸順其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國。而當廣東的國民政府與蘇

聯合作，從蘇聯取得軍火和經費之後，蘇聯也成為南蒙古的左派青年憧憬的天堂，蘇俄的勢力和共產主義思想大舉侵入中國各地。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為國民黨的「友黨」，蒙古人民共和國派遣特使到廣州拜訪孫文，孫文表示認同其獨立地位，以討好其背後的老大哥蘇俄。

在此背景下，南蒙古的左派青年白雲梯等人得到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蒙古人民革命黨和第三國際四種勢力的支持，著手在內蒙組建政黨。這個新的政黨，對外稱為「內蒙古國民黨」，其實它的蒙文名字翻譯過來應當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一九六○年代，中共整肅烏蘭夫等內蒙本土幹部，炮製「內人黨」案，數十萬人被波及。）這個政黨的政治目標，是要打倒王公、鏟除封建、消滅軍閥。[20] 即便是改革派的德穆楚克棟魯普，也是他們眼中的敵人。德穆楚克棟魯普不得不耗費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對付來自蒙古內部的明槍暗箭。

蘇俄的外蒙，日本的內蒙？

孤立無援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發現，同樣將蘇俄、赤化的北蒙古、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都看作敵人的是日本。那麼，日本是否能夠成為與之并肩作戰的朋友？

近代「民族」的概念在蒙古地區的傳播，肇始於二十世紀初一批蒙古上層人士到日本留學，從日本汲取了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潮。當時，日本流行的民族主義觀念「對中國學生的政治術語發揮了持久的影響。這個概念在字面上意指『種族主義』，表達了一種基於種族的民族主義者的觀點」。[21] 這一思潮也影響到一群蒙古留學生。

長期以來，蒙古上層精英與日本有著持續而密切的聯繫，肅親王的妹夫、喀喇沁王爺貢桑諾爾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於一九○三年秘密訪日，回國後立即著手改革旗務，興學練兵。貢桑諾爾布在崇正堂開學典禮上鼓勵學生說：「我們蒙古民族，在數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於漠北之地，席捲歐亞兩洲，滅國四十……本王父祖相承，歷當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銀，當此國家多事之秋，如不協助國家，使民眾習文練武，實在於心不忍。」這是近代蒙古地區王公精英提出「民族」概念的最早記載。

辛亥革命之後，北蒙古獲得獨立，卻淪為蘇俄的附庸國，蘇俄用以統治外蒙的工具是共產黨之「變種」—蒙古人民革命黨。若南蒙古像北蒙那樣赤化，德穆楚克棟魯普等蒙古王公所依託的傳統的政治、宗教結構將被徹底摧毀。那時，經由蘇聯教育出來的左翼蒙古青年，已通過國民黨或馮玉祥的勢力，向南蒙古草原滲透。這是最讓德穆楚克棟魯普等王公貴族感到不安的趨勢。那麼，如何既能實現南蒙古的自治或獨立，又能避免南蒙古走向赤化呢？德穆楚克棟魯普將眼光投向日本。

辛亥革命之後，川島芳子的養父、日本浪人川島浪速曾明確提出一條實現滿蒙獨立的路線圖，並採取了具體的行動。相對於高度漢化且相當孱弱的滿人，川島浪速對蒙古人存有些許希望：「蒙古人無疑具有驚人的體力和勇氣，說按照蒙古式的實踐和訓練的兵卒材料冠絕世界也不為過（但日本人除外）。當年作為成吉思汗的部下掃蕩橫行世界的資質並沒有全部湮滅，不過這三百年來中了清祖的巧妙政略之毒，一直安於愚昧而已。如今彼等蒙古人正從長夜睡夢中醒來，但是尚無指導統合的有智識之人。如果以邦人（日本人）的智識、德性、勇氣，由邦人（日本人）隱然起到首腦作用，建成一支堅強團結的軍隊，必能夠發揮出驚人的強大作用。」[22] 即便在川島浪速這個最親近滿蒙的日本人眼中，蒙古人也至多只是衝鋒陷陣的「好士兵」，必須由日本人統率和控制。

當時，日本政壇人士一致認為：「鑑於俄國在北蒙古活動，日本應借機將南蒙古收入我勢力範圍之內。」他們將南蒙古看作是日本對抗俄國在東北亞擴張的立足點。他們擔心，一旦「支那民族」崩潰，必然拖累日本的前途。因此，日本需要提前介入亞洲大陸事務：「極端自私的支那人民今後如何能夠在與列強的競爭中立足和維持國家獨立？作為政治家的國民極端缺乏公義心，作為軍人極端怯弱。如以此等人民組織國家，其結合之力自然極端薄弱，稍有動作即會自行崩潰，遑論面對外敵抵抗能力微弱。如果今後禍亂續發，支那自動解體，受到最深刻影響的無需置疑即是我們日本。」[23] 饒有意味的是，日本政界人士在對「支那民族」極端蔑視的同時，也一股腦地將蒙古人納入「支那民族」之中，他們對蒙古並不友善。

由於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川島浪速未能實現滿蒙獨立。不過，其思想卻被二十年代中後期擔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的外交家吉田茂所吸收。吉田茂是日本政界中的英美派，作風洋派，永遠西裝革履、雪茄不離手。他反對軍部對英美開戰，戰爭期間隱居鄉間。戰後出任日本首相，領導日本走向經濟騰飛。

一九二七年，吉田茂是一名「經略滿蒙」的狂熱分子。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鼓吹「對滿蒙的積極政策」。六月至八月，田中內閣先後在東京和大連召開兩次「東方會議」，吉田茂以駐瀋陽總領事的身份出席會議，參與擬訂對華政策。

在東方會議上，吉田茂作為外務省駐東北的最高外交官，明確表態支持田中首相的對華強硬政策：「日本應該對滿蒙確立堅定不移的政策，使滿洲在政治上得以穩定，始終維護日本的特殊地位，同時根據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原則，專心努力於滿蒙產業化。」[24] 他提出，殖民者無須得到被殖民者的同意：「在英國對印度的政策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印度人的支持；法國人也並沒有顧及阿爾及利亞人的反對而放棄對阿的政策；美國人在美國中部地區虎視眈眈，並沒有得到土著人給他們的簞食美酒。……既然企圖發展滿洲及中國，就應該做好中國人民有抵日情緒的思想準備，就不能對中國的抗日情緒有恐懼心理。」

之後，吉田茂草擬五千字的〈對滿政策私見〉，認為日本應該「指導改善東三省政治，猶如英國之於埃及」。美國學者約翰．道爾將這份政策建議書看成是「意味著在日本史的這一時間點上『帝國意識』的獨創性表現形式」。吉田茂提出，由於「日本經濟膨脹、人口暴增，使得活力四溢，欠缺向外伸展的自由」，因此，作為「我國人民活動天地」的中國，與「適合我民族發展之絕佳場所」的滿蒙，地位相當重要。尤其是滿蒙，面積是日本的三倍，可以成為吸收日本增殖人口的開拓地。[25] 對於國民黨北伐軍勝利進軍，吉田茂提出「當前的政策，應一有機會就斷然向天津、山海關、吉林、臨江、間島各地增兵或派兵」的建議。

日本支持蒙古獨立運動，並非真心幫助亞洲弱小民族，而是出於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北蒙古已成為蘇俄的勢力範圍，日本必然謀求讓南蒙古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以此獲得與蘇俄在東北亞大陸的勢力均衡狀態。

對於蒙古民族而言，掙脫了中國的羈絆，卻又被俄日兩大強國所控制，如同「前門趕狼，後門進虎」，是禍非福。德穆楚克棟魯普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多次表達對日本人的不滿，但東北亞吸引大國逐鹿的地緣政治格局，非他個人之力所能改變。

一九三六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去長春覲見滿洲國皇帝溥儀。溥儀很欣賞這位「蒙古忠臣」，與之單獨會談良久。「談著談著，德穆楚克棟魯普就發起牢騷來，說日本人在他那裡很跋扈，他樣樣都做不了主，不聽日本人都還不行。」同病相憐的溥儀安慰了他幾句。結果，

第二天日本人就來找溥儀興師問罪。可見，宮廷中早已安裝竊聽器，溥儀四處蒐尋，沒有發現。[26]

他是「顛覆蒙古」的罪魁禍首嗎？

雖然看到滿洲國的前車之鑑，德穆楚克棟魯普還是要硬著頭皮往前走。一九三四年四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烏蘭察布盟百靈廟宣告成立，德穆楚克棟魯普出任秘書長，實際主持政務。蒙古的自治或獨立，終於邁出重要的一步。

一九三六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出任察哈爾「蒙政會」副委員長，又成立「蒙古軍政府」出任總司令、總裁，而由日本人山內豊紀出任顧問。這個政府不為國民政府所承認。十一月二十四日，半獨立於南京政府的北方軍閥傅作義調派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主力攻克蒙古軍政府第七師駐守的百靈廟，中國官方稱之為「綏遠抗戰」。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很快控制華北和內蒙古之間的平綏鐵路，十月十七日占領包頭。德穆楚克棟魯普出面組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出任副主席，次年任主席，後又合併「察南自治政府」及「晉北自治政府」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這個政府統治了一片相當廣大的區域：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今鄂爾多斯）等五個盟與晉北（大同市）、察南（張家口市）兩政廳，其首都設於呼和浩特。該政府名義上歸南京汪精衛政府所轄，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又改名為「蒙古自治邦」。

日本戰敗之後，「蒙古自治邦」隨之解散，德穆楚克棟魯普被軟禁於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駐守北平的傅作義部向圍城的共產黨軍隊投降，德穆楚克棟魯普逃往南京，然而南京亦很快失守。他又回到內蒙古西部，集結李守信等舊部，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重新籌組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此時美國已經放棄了國民黨政府，更不可能支持德穆楚克棟魯普營造的、毫無前途的「紙房子」。德穆楚克棟魯普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組建起一支可以抗衡共產黨軍隊的蒙古軍，更何況其北邊是虎視眈眈的、親蘇的蒙古國，蘇聯不會容忍美國勢力進入此一區域，蘇軍隨時可以借道南下將其撲滅。九月十九日，

駐守綏遠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向解放軍投降，蘭州、銀川等地亦相繼被攻克。德穆楚克棟魯普剛剛在定遠組建的「蒙古自治政府」即風雨飄搖，人員四散而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德穆楚克棟魯普等人越界進入蒙古國烏蘭巴托，尋求「政治避難」。他以為外蒙可以容納他，他們都是蒙古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卻沒有想到，對於共產黨統治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階級因素遠遠高於民族因素，他們豈能收納「階級敵人」？更何況蒙古政府處處都得聽從莫斯科的命令，莫斯科此前已經將俘獲的溥儀等滿洲國重要人物全都轉交給中國，又怎麼會讓蒙古人民共和國將極具危險性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留下？

一九五○年，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德穆楚克棟魯普犯有「依靠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和美國帝國主義，企圖顛覆蒙古和蘇聯」的罪名，將其逮捕。這是一個十分荒唐的罪名：這位爭取本民族自治和獨立的英雄，何曾「企圖顛覆」外蒙和蘇聯？

九月，蒙古人民共和國將德穆楚克棟魯普押送北京，卻將他的兒子都固爾蘇隆扣留。對中國來說，如何給德穆楚克棟魯普定罪，始終是個難題。德穆楚克棟魯普是蒙古人，總不能強加給他「漢奸」的罪名吧？於是，未經正式審判，他即被關押在張家口的監獄中長達十三年之久──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一九五二年，他的兒子都固爾蘇隆已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監獄中被凌虐致死。

一九六二年五月，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病獲保外就醫，被送進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治療，並允許與親屬會面。同年九月，他和家人被安排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元禎永街一座經過整修的舊式廳院居住。一九六三年四月，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國家主席劉少奇發佈的特赦令，宣佈將其特赦。

在生命中的最後三年，德穆楚克棟魯普被聘為內蒙古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員，主持編成《二十八卷本詞典》（以蒙文編寫），並完成回憶錄《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一九六六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在呼和浩特病故。

對德穆楚克棟魯普來說，對大部分的南蒙古人來說，清帝國的統治時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以後，北洋不如大清，國民黨不如北洋，共產黨更不如國民黨。百年來一直下沉的歷史軌跡，何時才能出現轉折？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上海啊！魔力的上海！

你告（訴）他們吧，在大馬路上跑的他們，說：

你所吹的風是冷的，會使人骨麻，

你所噴的霧是毒的，會使人肺癆，

但是他們怕不駭吧，從天涯地角跑來的他們，他們要對你說：

你是黃金窟哪！看這把閃光光的東西！

你是美人邦哪！紅的，白的，黃的，黑的，夜光的一極，從細腰的手裡！

橫波的一笑，是斷髮露膝的混種！

—劉吶鷗



「八月二日。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去游泳學校。」

這是卡夫卡在一戰全面開戰當天寫下的日記。從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到八月二日俄、德交戰，這三十五天裡，卡夫卡的生活跟往常沒有任何變化，戰爭陰影對他來說幾乎不存在。他沒有多少民族主義思想，也沒有清晰的國族認同，他是哪國人──德國？奧匈帝國？捷克？都是，又都不是，他是「世界的布拉格人」。

對於卡夫卡這樣的個人主義者而言，世界大戰不一定比個人生活中的哀痛與歡欣更為波瀾壯闊。這一個月，在卡夫卡的私人生活中發生了一件翻雲倒海的大事：他經歷了與女友菲利斯的第一次婚約解除。從卡夫卡的日記和書信中，可以看出他情感的糾結與迷離。他與苦苦追求的菲利斯訂了婚，卻又與菲利斯的閨蜜格蕾特保持著曖昧關係，最後自食其果，導致婚約解除，他對自己的評論是「完全無罪卻如同惡魔」。[1] 七月三十一日，離開戰還有兩天，卡夫卡在日記中說：「要不顧一切地寫東西，這是我維持自己生存的鬥爭。」

無獨有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旅居上海的、二十二歲的台

南青年劉吶鷗在日記中寫道：「六點鐘起來，楚楚洗過臉，吃嘴麵包就跑了。船八點半開，有邱、翁、戴、施諸君來送行。船開後，檢煙，然後行李。十一時就得坐定了。晚上頭脹、胃不樂，似欲暈船，愛禮（同行的台南同鄉）卻爬起來吐了。」[2] 劉吶鷗離開上海，取道日本回台灣，是因為五天前接到一張家裡的電報，「說祖母病重要我們回家」。他似乎不知道，當他離開時，血雨腥風的「清黨」之役正在上海全面展開。

跟卡夫卡一樣，劉吶鷗也是一位沒有國族認同或者說超越國族認同的文化人，他是哪國人—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都是，又都不是，他是「世界的上海人」。他喜歡上海這座遠東第一大城市，並非上海是「中國的上海」，乃是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劉吶鷗的好朋友施蟄存說過，劉吶鷗有三分之一是上海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三分之一是日本人。[3] 在上海，劉吶鷗穿越在不同的文化之間，提前體驗「世界人」的自由與浪漫，直到戰爭與死亡先後降臨。

從上海回台南有多遠？

青年劉吶鷗對政治、權力以及正在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感興趣。劉吶鷗在中央電影攝影場任職時的同事黃天佐說，劉吶鷗是一名「語言天才」，除了會講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外，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和他自己家鄉（台灣）的廈門話都應對如流。「他的魁梧的體格像北方人，他的剛強個性像廣東人。」少年時代即離開台南老家，一直「在路上」的劉吶鷗，也有國族和文化認同上的困惑，他的日本朋友說他是「失去國籍、沒有影子的人」，「他是多麼的以身為殖民地人民而感到自卑」[4] ，但他對台灣獨立或台灣自治等政治理想並無多大熱情。

就在同一年，劉吶鷗的台灣同鄉林獻堂邁上了為台灣的未來尋求出路的歐美諸國之旅。這一年，日本的大正民主落幕，新登基的裕仁天皇為應對中國的統一和蘇俄的擴張以及國際局勢的激烈動盪，與軍部主張對外擴張的勢力一拍即合，走向法西斯獨裁之路。[5] 也是在這一年，日本共產黨分裂，台灣文化協會也因為激進與溫和理念的爭

執而分裂。[6]

隨後，奪取台灣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連溫卿等人於二月十七日發表〈一九二七年的台灣〉一文，指出「要救台灣人非主張階級鬥爭不可」、「民族主義者於此總退陣，以其勢力結成台灣民眾黨而與台灣文化協會形成對立」。[7]

看到台灣文化協會不可遏止地走向左傾，林獻堂深受打擊而離開台灣出國考察，在旅途中發出深深的嘆息：「東方人所愛者是利，西方人所愛者是自由，愛利人若是以利誘之，則為奴隸亦所心甘；愛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則東西之所大異之點也。」[8]

劉吶鷗沒有林獻堂那樣強烈的家國情懷，他是一名沉迷在文學、電影、女色和美食中的唯美主義者，是時代的「局外人」。哪裡有美、文藝和享樂，哪裡就是他的家園。他相信政治和經濟的權勢是一時的，唯有文學、藝術和審美是永恆的。那一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的郭廷以，靠著史家的敏銳，逐日記載北伐軍興之後的大事；比郭廷以小一歲的劉吶鷗，則在上海租界過著文藝青年「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小確幸」日子，做小說創作爆發前最後的積累。

四月十二日，正當劉吶鷗登上輪船離開上海之際，上海無數顆人頭落地。國民黨「正史」中如此記載：「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奉令解除共黨份子組織之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武裝，揭開中國強制執行清除共黨份子之序幕。……『四一二清黨』為中國國民黨厲行全面清黨運動的開端，亦為中國國民黨生死存亡與中華民國統一獨立的重大關鍵。」[9] 這一切「國家大事」奇蹟般地與劉吶鷗擦肩而過。

六天以後的四月十八日，劉吶鷗從基隆港乘坐火車到嘉義，再轉車回到台南新營的家中。然而，他與從小就親愛的祖母已人鬼殊途：「坐腳踏車入大門，看大廳裡白色一閃，才知道來得遲了。……入她生前所起居的房間，雖不見其影，好似聽著她大又亮的聲音。在靈前燒著香，不由地眼睛暖潤起來，不是悲她的死，是憶起不會輕的聲音。」在日記正文旁邊，他特意加了幾個字的旁註：「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在他心目中，家比國重要，祖母的死亡比蔣介石的上位和國民政府的建都更重要，儘管祖母是一名不會被任何官方史書記載的平凡婦人。此刻，劉吶鷗對「國民政府」的好壞並無太多認識。他不曾想到，這個如戲班子一樣搭建起來的「國民政府」，日後要派殺手取

他的性命。

你看政治不嫵媚，料政治看你亦如是

劉吶鷗只活了三十五歲，一生多采多姿，卻只留下一本一九二七年的日記。這本日記簿是東京新潮社出版的「新文藝日記」，裝訂精美，文藝氣息濃厚，卷頭有日本文壇名人寫真集，卷末有文藝年鑑，每個月份前面都選錄一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日記和名言，後面印有當月讀書記錄欄。劉吶鷗每天記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這本日記提供了有關他家庭、教育、嗜好、讀書、創作和交往的珍貴線索，是瞭解這位大時代裡不願隨波逐流的新潮人物的第一手資料。[10] 劉吶鷗以新感覺派的文風記載了上海的風花雪月以及殺戮汙血，是啊，即便你不問政治，政治也要來騷擾你，誰又能躲避開政治的陰影呢？

國民黨掀起北伐戰爭，讓大半個中國更換了新的統治者。原本在孫傳芳統治下安寧而繁榮的東南五省，陷入人心惶惶的境地。上海尤其是租界，大概是全中國最安全、最富庶的地方。租界作為「國中之國」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在中國國內發生革命或戰亂之際，或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之際，它們是「中立」地區。中國政府首次承認租界在中國內戰時為中立地區，正好是在北伐戰爭期間。當時，美國駐華公使、駐漢口領事分別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將上海公共租界圈出戰爭範圍的要求。顧、陳二人名義上以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為由加以拒絕，但事實上，無論北洋軍還是北伐軍都未進入上海租界，實質上承認了上海租界的中立地位。[11]

儘管如此，上海租界仍無法完全避免被戰禍波及。很少為國家大事憂慮的劉吶鷗，在日記中記載了兵亂和罷工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這種張愛玲式的、朝不保夕的「危城」生涯，身為區區百姓，又能奈何？劉吶鷗的應對方式是隨遇而安、苦中作樂。這大概也是當時許多上海人的生活態度，他們並不關心統治者的替換，只在乎每天需用的柴米油鹽。[12]

二月十九日，劉吶鷗記載：「大清早，澄水就走來報杭州失守，

孫（傳芳）軍退到松江！但事實，南軍已到上海了。被介春的詩抓到地獄的心，可被牽出來了。下午，真是如各報所料，上海總罷業起來了。備米糧，換龍銀，心為之一亂，真是無用。約要來的丘，卻不見來，恐怕現在在南京路大道上演說也未可知道，不然就在法界的一角秘處參加那學生會，電車都停，法界的治安也不知怎樣！」

當日，孫傳芳的軍隊在浙江潰敗，白崇禧率北伐軍進入杭州。上海隨即發生大罷工，孫傳芳擔心大本營不穩，命令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以嚴厲手段鎮壓罷工，以大刀隊搜捕並屠殺大批參加罷工隊工人和學生。在租界被捕者，租界當局鑑於華界的濫殺，而拒絕引渡。工潮之勢卻繼續蔓延。

劉吶鷗對交戰雙方的善惡並無評價，僅僅記載了罷工給普通市民帶來的諸多生活不便，就連他這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少爺，也要儲備一些基本物資。抱怨完動盪的時局，他又落筆到個人的感覺上：外面天翻地覆，他卻聞到了室內的藥味，聽到了室外賣餛飩者的叫賣。

在三月二十一日又記載：「一點多阿瑞里便衣隊和外國兵起了衝突，砲火交一小時。從那時起，華界的槍聲繼續而已。南軍下午將佔領龍華。七點北火車站。九點多睡覺，一夜槍聲續聞。」三月二十三日記載：「和弟弟、翁君到北四川路。外國軍隊已經放棄那裡，不讓外國人進入。小巷大多是日本水兵。路口可以看到繫著紅布條的南軍便衣隊。牌子寫著『行人可行，車輛禁止通行。』」三月二十七日記載：「在搖動的上海的空氣，到今天處處顯危險的神色，大早朝連租界內也交通斷絕，恐怕是開在西門的孫中山二週年紀念忌吧。下午一個人跳出鐵絲網，由馬霍路跑到老砲子路去。北側快要張起鐵絲網來，北四川路已經交通斷絕了。想到那邊的知人，啊，但是—，都是英鬼子的膽小，呸！」四月三日記載：「在西藏路被（臭）英國兵搜身軀。」四月六日記載：「去吳淞玩，由甘肅路，走過英兵的把守去北車站，南軍上海佔領後，這是頭一次我去到中國界。站裡廣兵很多，開往江寧的車裡，都是兵滿滿的。」劉吶鷗不喜歡士兵，士兵帶來的是戰爭和死亡。不過，即便在這種兵荒馬亂時，他還有閒情逸致呼朋引伴、外出郊遊，可見他絕非普通的「玩家」。

劉吶鷗對交戰雙方不作評價，而在前來維持租界秩序的列強軍隊中，他對日本軍隊並無批評（他的國籍原本就是日本人），倒是對英國士兵持相當負面的看法，憤恨之情溢於言表。一九二七年，英國以老牌帝國主義的傲慢方式應對中國局勢的變化，讓中國民眾反感之極，就連劉吶鷗這個事不關己的外來者都看不下去。隨後，國民政府在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的支持下，強行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讓英國自嘗苦果。

這一年的秋冬之際，劉吶鷗曾北上訪問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北行日記中只有一處用嘲諷的口吻提及來日無多的「張大帥」。在回程的火車上，他寫道：「很早起來，趕上八點半的膠濟線車。那個查行旅真討厭，也不看人，他連化妝品都不知道，完全傻子。二等車，一半以上都是兵坐，腕袖上的『誓死救國，努力愛民』八個字，越看越好笑起來。同椅一位被張氏（宗昌）僱用的白俄兵。」（十二月四日日記）由於國民黨和共產黨決裂，北伐暫時停止。三大軍閥集團中僅剩的張作霖猶作困獸之鬥，派遣奉軍匆匆南下，等待他們的將是覆滅的命運。劉吶鷗對佔領上海的北伐軍臂膀上的紅布條不以為然，對山東的安國軍腕袖上名不副實的「八字箴言」更是忍俊不禁。

對於血肉橫飛的國共鬥爭，劉吶鷗在日記中不置一詞。關於共產黨，他淡淡地提到一句：「想去商務書館看書，因捕共產黨路不通不果。」（十二月十四日日記）不同於大部分左傾青年，他對共產黨遭國民黨捕殺毫無同情之心。以他的出身而論，不事生產的他靠著台南大地主家族的巨額匯款維持著在上海奢華的「白相」生活，以及不必擔憂生計的文藝生涯；他當然不認同共產黨在南方農村「打土豪、分田地」的酷烈政策。

而對國民黨，劉吶鷗也不喜歡。他在一月三日的日記中提到，此前在震旦大學結交的好友戴望舒、施蟄存、杜衡遇到了麻煩，「戴君們因為加入國民黨，三人都被學校開除。聽說現在在天文臺路租了間房子住著哪」。震旦大學是法國天主教會創辦的學校，政治立場上反對以蘇俄為師的南方黨人，所以將加入國民黨並高調活動的學生開除。在這段話的字裡行間，隱約可見劉吶鷗的看法：他既不贊同戴君們加入國民黨，也不認同大學將三位好友開除。

劉吶鷗對國民黨採取疏離態度。他曾跟一位曾傾向國民黨的「進步」青年討論如何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可喜地發現：「他現在對國民黨的態度完全變了，他信我從前對他說過對蔣介石觀了。」（九月十三日日記）由此可推斷，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已迅速走向腐敗墮落，並同步喪失了民心尤其是青年的支持。

看哪，這個生活在「魔都」的文藝青年

一九二七年一年間，劉吶鷗的足跡到過台南、東京、北京和上海等地，他居住時間最長的、最後決定定居的城市是上海。這位浪蕩天涯的浪子之所以選定上海作為他「將來的她」，文學藝術的追求是主要因素。也是為持續發展文藝事業，劉吶鷗後來讓妻子和孩子一大家人舉家搬來上海團聚，直到一九四○年他遇刺身亡為止。[13]

一九二七年前後，上海已逐漸取代北京，成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國民政府後來將中央銀行設在上海租界中，共產黨中央也在上海租界秘密活動，他們似乎並不覺得受洋人的保護是「不愛國」。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申報》等現代新聞出版機構對全國的影響力，超過了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北京大學。包括北京在內的所有城市，在資訊的豐富、言論的自由和公共空間的廣闊上，都不能跟崛起的上海相媲美。外國人在上海登陸無需護照，中國人到上海居住更不必辦理「暫住證」。雖然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或濃或淡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卻首先選擇在上海居住。一九二七年旅行歐美之後返回中國的胡適，也棄北京而居上海。「知識分子聚集在這裡尋求言論自由和新的信息資源。他們利用『借來的』自由向中國政府發出批評之聲，否則，中國政府決不會忍受意識形態的反抗。由於異議的存在，文化活力才會出現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戰前的上海展現出了有限的『社會空間』，這正是白吉爾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另一個中國』和進步文化得以生存的條件。」[14] 劉吶鷗生命中最精彩的十多年基本都在上海度過的。

當然，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而非人間的伊甸園。劉吶鷗對上海的拜金主義和物質主義有一定的反思，「上海真是個惡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錢和出風頭外別的事一點也不去想的，自我來上海了後愚得多了，不說靈感、睿智、想像，就是性慾也不知跑到何處去了，變成個木人了。」（一月五日日記）不過，他的抱怨不能全部當真，他本人離不開這樣的生活方式—「吃大菜，坐汽車，看影劇，攜女子，這是上海新人的理想的日常生活」。（二月五日日記）

在跳舞場、時裝店、酒吧、麻將桌和夜總會之外，劉吶鷗跟一般的「少爺」最大的不同就是手不釋卷。在上海，他能及時買到中國及世界各國新出版的書籍和雜誌，就日記中每個月末的閱讀記錄欄來看，劉吶鷗閱讀的書籍刊物，中、日、法、英四種文字都有，他在四種文字中悠遊無礙。「劉吶鷗從青少年時期就浪蕩天涯，漂泊海上，實質上跨越了有形的國界。精神上他也少有語言障礙，對藝術家而言，藝術作品是無國界的。」[15] 他結交的文藝青年也遍及不同族裔乃至政治立場。

劉吶鷗讀得最多的是日本文學，不僅閱讀、品鑒、評論，還親手

翻譯成中文出版。一九二八年九月，他出版了譯作《色情文化》，收入一九二七年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綜合雜誌和文藝雜誌上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劉吶鷗第一個接受一九二○年代於日本開始的最先進的現代主義—新感覺派與普羅文學，並將其翻譯介紹到上海文化界。在這本譯作中，他一次性地引入橫光利一、片岡鐵兵、中河與一、林房雄、川崎長太郎、池谷信三郎、小川未明等七名日本先鋒作家的作品，顯然有其良苦用心在，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指出：「一九二七年也是日本因戰敗而破滅的昭和戰前史的原點。劉吶鷗所翻譯的《色情文化》全部採用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這代表劉吶鷗也深深的關注著這動盪的一年，也可將這一年視為現代東亞史的起點吧！」[16] 劉吶鷗在本書的「譯者題記」中梳理了日本文學的脈絡，「現代的日本文壇是在一個從個人主義文藝趨向於集團主義的轉換期內……在這時期裡能夠把現在日本的時代色彩描繪給我們看的也只有新感覺派一派的作品」，因此藤井省三分析說：「劉吶鷗同書收納一九二七年的日本短篇小說群，是以現代主義和中日問題為主題的作品，對他來說像那樣的《色情文化》是尋求『東亞的明日社會』、將來新方向的一種手段。」[17]

劉吶鷗對世界文學的評價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他推崇法國文學，而對美國文學毫無好感，「在我看來，米國人完全不懂文藝」。（五月一日日記）他對翻譯成日文的俄國文學評價也不錯，一月五日閱讀俄國作品《魔窟》，認為：「作者講故事的能力確實大的，我覺得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小，也許是福建話單語少，每每不能設想出適當的話來表現心裡所想的。」一月七日再次讚揚此書作者「老練的描寫和生動的文章」，並指出「我信小說不是少年人可伸手的東西」。

劉吶鷗對中國文學的評價也是別具慧眼。他對中國文學整體評價不高：「中國文學是無病呻吟，中國的文學青年差不多把形容詞當文學，沒有形容詞他們是活不著的。」（十一月一日日記）他偏好早期創造社的作品，對文學研究會和新月派沒有多少好感。他最欣賞的中國作家是郁達夫，或許他們之間有「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相似性格。五月九日，他讀發表在《創造月刊》上的郁達夫的文章：「今天只看郁達夫的小說和雜記類，材料都是私事。〈過去〉一篇最好，寫兩個中國的新女子，表現雖有澀處，文卻又潤濕。他是富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

劉吶鷗對《小說月報》的評價則非常不堪：「《小說月報》二號來，壞得很，中國文人差不多要絕種了。是頭腦壞，還是不用功，我都看不出來。」（七月一日日記）他尤其厭惡郭沫若用白話文翻譯的詩經，他與郭的對立，大概不是因為政治理念，而是出於審美趣味：

「我想拿這樣的作品出來見社會，而大吹牛皮，應不是大名鼎鼎的新詩人郭氏所當做的吧。……他的譯藝術姑且不講；但那非詩的用字和牠的無效果的用法就障眼的多了。口氣弱，獨特的風韻全失，全篇如中學教師對於學生在解釋詩經似的。」

而他對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老舍的小說〈老張的哲學〉則毀譽參半：「在洋風盛行的現在中國文壇似乎是一種換了毛色的東西，作者卻不見得有什麼藝術的手腕，但是他那種冷輕調的文章是很可愛的，性格也描寫得很活潑，尤其是老張和趙四兩個的。」（一月十八日日記）

劉吶鷗常常逛上海的書店，對名聲很大的新月書店評價一般：「去龍華新月書店看書，普通一樣，那有希奇，不過胡適、徐志摩的名氣大而已。」（九月十三日日記）

既然別人的書店、別人的出版社、別人的雜誌他都看不上眼，劉吶鷗既有錢又有閑，在上海文藝界也有人脈，乾脆就自己投資開書店、出書和辦雜誌。次年，他在上海創設「第一線書店」，創立文學雜誌《無軌列車》，並開始創作短篇小說。第一線書店被國民黨查封之後，一九二九年他又開設「水沫書店」，營業三年之久。除了發表和出版跟他同樣是新感覺派作家的戴望舒、施蟄存、穆時英等人的作品外，也出版過魯迅、馮雪峰、姚蓬子、丁玲等左派作家的作品──儘管劉吶鷗本人並不欣賞這類作品。當時的水沫書店受了日本文壇左翼作品盛行的影響，成為左翼作家的大本營，左翼份子常假借該書店樓上開會。[18]

劉吶鷗的創作成就，主要體現在一九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之中，這本小說集奠定了他「第一個描寫都會異域風的中國現代作家」的地位。[19] 如果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那麼劉吶鷗就是東方巴黎的波德萊爾。他寫上海現代都市的景觀和男女的情慾流動，以視、聽、嗅、觸等感官直覺投射於咖啡館、舞廳、賽馬場、戲院、汽車、菸酒、香水、時裝等景色和物質之上，更寫到中國現代文學中從未出現過的喜歡在奔馳的汽車上做愛的摩登女郎。劉吶鷗筆下的上海，跟傳統中國毫無關聯；如同村上春樹的東京，跟傳統日本毫無關聯。他和新感覺派作家所要抗拒的，是「整體組織化運作下的全面民族主義」，是「落入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操弄，或淪為政治的發聲筒」。[20] 在這個意義上，劉吶鷗何嘗不是二十世紀第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世界作家」！

多才多藝的劉吶鷗也是當時中國唯一的電影理論家，他從一九二

八年開始撰寫電影評論，翻譯介紹蘇聯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與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蒙太奇」理論、維爾多夫（Dziga Vertov）的「電影眼」理論、歐洲的「純粹電影」與「絕對電影」的實驗電影美學。[21]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道，親自擔任編劇、導演和攝影。他為由明星公司出品、由胡蝶主演的電影《永遠的微笑》擔任編劇，也為藝華公司編導了電影《初戀》，還將賽珍珠的小說《母親》改編成電影《大地的女兒》。他甚至拍攝了一部自傳體的紀錄片《攜著攝影機的男人》。

劉吶鷗是中國最早一代的電影人。跟劉吶鷗合作過的一位電影工作者如此回憶說：「當他在攝影場的時候，他是精明人，權威。在這剪接間，每天，每當他拉起一端影片，向著燈或窗的亮光處映明著，細審那畫面的內容或次序與尺度的時候，總令我聯想起世界某一名導演的小照，因為他實在有著聰明的眉目，和協調地，藹然地運思著的表情。」[22] 劉吶鷗真心熱愛電影事業，在他看來：「電影，是眼睛吃的冰淇淋，心靈坐的沙發椅。」

一名「女性憎惡者」生命中的三個女性：母親、妻子與情人

一九二七年的劉吶鷗是一名翩翩美少年，不僅極富文藝氣質，而且具有社交魅力，如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女人憐愛，男人羨慕。曾跟劉吶鷗學習電影拍攝的青年人黃鋼，後來投奔延安的革命事業，對劉吶鷗「落水」當「漢奸」深惡痛絕，但在紀念文章中仍止不住地讚美其優雅的外表和氣質：「如戴望舒在〈前夜〉這首詩中曾寫過的，劉吶鷗真是個有著橙花香味的，清明灑脫的南方少年，烏黑的頭髮是密生的，整齊地用四對六的比量梳著，乾淨，沒有留鬢角；不討厭的眉毛下，排著不像科學家而只像藝術家的感覺豐富的大眼。他，沒有戴帽子……劉吶鷗是自由人。腳上，質地講究，式樣大方的皮鞋；額上有汗珠時，他就用那大而無花的手帕迅疾地揩去汗珠！手臂的動作敏捷，豪爽，揮擺的角度甚寬。」[23]

劉吶鷗好交遊、愛熱鬧，卻多愁善感、情緒起伏不定，像郁達夫筆下神經質的文藝青年，時常炫耀自己「多病」。二月六日的日記中記載：「頭痛一半，臉上又發了二、三腫物，真是神經衰弱又來

了。」二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又記載：「頭和臉腫得更厲害。左眼細得難看的可憐，說是極度的神經衰弱來的偏頭痛。但我從未聽過神經會疼得這樣厲害。……臉上和頭髮裡一粒粒的葡行疹，疼得真是上天無門，入地無路，又沒有睡眠藥，又氣看護婦不來，啊，真難過，我哭了。」他真是自憐到了極點。他還多次提及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自殺，甚至動過仿效其輕生的念頭。

劉吶鷗的一生離不開女人，卻又受制於女人，故而產生了文藝青年特有的「女性憎惡主義」。

劉吶鷗生命中的第一個女性當然是母親陳恨。在劉吶鷗十二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母親陳恨以鐵腕掌管劉家祖產六百餘甲土地，行事用度處處嚴守大家庭的規矩禮節。劉吶鷗成人之後，母親見他沒有繼承家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不讓他過問家中產業，故而母子之間亦有衝突。[24] 當劉吶鷗回家之後，為祖母辦喪事，再度跟母親發生分歧，在日記中抱怨說：「時代思想不同當兩個性格合一起，是做無事的。她是上，我是下，一切她料理就是了。我看做無性格的傀儡，也不長久了。想編本《台灣家庭革命》。」（四月二十三日日記）「當然是不合的，年歲的差只有二十歲（母子），但是思想卻從大家族制度的古代跳到現代的個人家庭主義，哪裡有理解的通路。」（四月二十五日日記）與母親不和，是劉吶鷗不願久居台南老家的原因。

劉吶鷗的婚姻，也是母親強迫他接受的，跟魯迅一樣，妻子是寡母給兒子的「禮物」。劉吶鷗的妻子黃素貞是她的表姐，長他一歲，結婚時劉吶鷗只有十七歲。此後數年間，劉吶鷗大部分時間都在外求學和流浪，日記中提及妻子時毫無愛意：「晚餐前接到素貞一封信，難看得很，終不知說的什麼。」（四月十七日日記）以劉吶鷗的學識和見識，鄉下長大、教育程度有限的黃素貞豈是他可以思想交流的對象？

回到台南之後，劉吶鷗跟妻子生活了一段時間，但從日記來看，夫妻關係非常惡劣。「啊！結婚真的是地獄的關門。我不知道女人竟然得呆呆到這個地步。女人是傻呆的廢物啊，我竟被她強姦，不知滿足的人獸，妖精似的吸血鬼，那些東西除放縱性慾之外那知什麼。」（五月十八日日記）「女人，無論哪種的，都可以說是性慾的權化。她們的生活或者存在，完全是為性慾的滿足。……她們的思想、行為，舉止的重心是『性』。所以她們除『性』以外完全沒有智識。」（五月十九日日記）可見，在夫妻性生活方面，黃氏採取主動，讓劉吶鷗男性的自尊有受挫之感。劉在外面花天酒地，除了嫖妓以外，還有固定的情人，對夫妻之間的房事興趣不大。黃氏長期在家獨守空

房，且迫切希望懷孕生子，積極主動自在情理之中，卻引發丈夫的極度反感。

到了三十年代，黃素貞先後為丈夫生下三個子女，劉吶鷗將全家接到上海，一家人終於過上一段時間其樂融融的生活。少年風流時的劉吶鷗一派浪蕩子行徑，到了中年卻是顧家的好丈夫、好父親。他們一家居住在一所豪華的花園洋樓中，出行還有豪華汽車。劉吶鷗常常帶著全家一起去看電影，也常帶妻子去跳舞，家人津津樂道他是「舞王」。他喜歡替妻子購衣飾和皮鞋回來，完全不用試穿。一九四○年劉吶鷗遇刺身亡後，黃素貞攜子女回台南，後又回上海居住兩年，處理劉吶鷗在上海購置的龐大產業。在處理劉吶鷗的遺產時，黃素貞與婆婆兼姨媽陳恨鬧翻，雙方甚至對簿公堂。[25]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劉吶鷗日記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一個人，是他的情人百合子。在上海受戰火波及時，他特別安排百合子遷居到安全的地方，在日記中為之牽腸掛肚。後來，劉吶鷗要回台灣，百合子要回日本，兩人被迫分手，分別前很有一段纏綿悱惻的記載。四月九日記載：「我去找百合子，她只一個人在著，猶躺在床裡，看我進去，她放哭了一聲，怨我好久不去。她並不理我，只管哭了。」次日又記載：「二點多去找她。給她五十元讓她趕快回到東京去結婚。她說結婚真是無聊，她要去大阪工作。我並感到我們就此永別，但是我們或者此去真的不會相見了。回想過往，未免有種依依。但是我們終於昏暗的街前別了。」百合子是誰並不重要，在劉吶鷗的生命中，還會出現多位像百合子的女子，與之相愛並互相傷害。

最風流的浪蕩子，也不願自己的女兒遇到一個像自己這樣的男子。有了女兒之後，劉吶鷗希望以日本的方式教育女兒，甚至讓女兒嫁給日本人，因為在中國女性的地位實在太低了。在跟日本朋友談及女兒的將來時，他第一次不再是「女性憎惡論者」，而視女性為人間寶物：「我將來不想將女兒嫁給台灣人。而且，在上海，我一想到女兒成為中國人的妻子，我就害怕。中國的男性表面上對女性尊敬，但私底下生活的女性，是過得多麼悲慘，一想到這，絕對不想把女兒嫁給中國人當妻子。」[26]

本為日本人，何來漢奸說？

一九三二年，水沫書店毀於淞滬戰爭，劉吶鷗從此轉向電影事業。他熱愛電影，在戰爭的硝煙中希望繼續電影事業，在一九三九年加入由南京維新政府、滿洲映畫協會、日本東寶映畫株式會社聯合成立的「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任製片部次長。他心裡想，在哪裡都是拍電影，對他而言，日本就是祖國，他沒有像周作人等中國文化界名流不得不「落水當漢奸」的心理負擔。

汪精衛政府中央宣傳部成立《國民新聞社》之後，一開始的社長是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由於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劉吶鷗的好朋友穆時英很快當上總編輯，不久，又取代黃敬齋，正式任社長。[27] 一九四○年六月，穆時英遇刺身亡之後，胡蘭成介紹劉吶鷗接任。有人勸劉盡量地深居簡出、以防不測。劉此前常常在朋友面前謊稱自己是福建人，這時他已擺明是台灣人的身份，而台灣那時是日本人的管轄區域，台灣人就是日本人，所以他認為自己不會被當作漢奸視之，行動仍與往常無異。[28]

一九四○年九月三日中午，日本電影業者松崎啟次來中國拍攝紀錄片《珠江》，由劉吶鷗挑選地點，在四馬路的京華酒家，一共約了十三人一起午餐，討論電影拍攝問題。

餐畢，兩點十分，劉吶鷗先告退下樓，松崎啟次忽然聽到四、五聲槍響：

> 被殺了！被殺了！傳來兩聲劉先生的聲音，還是用日文說的。
>
> 那聲音充滿力量，和平常很有精神的劉先生的聲音有些許不同。
>
> 我跑出去。劉先生仰躺在樓梯

> 中央。他右胸前的襯衫有一顆球大小被血染紅。我一瞬間慶幸被打到的不是心臟。為了讓出血減少，我用兩手抱住他的胸前。然而失去意識的他身體十分沉重，我使勁也抱不起他。我把他從樓梯拖到汽車。印度人的警官揮舞著手槍在追著誰的樣子，那瞬間我想追的應該是犯人吧！……劉先生的司機邊哭邊跑來，我和他兩個人把滿身是血的劉先生抬到車裡，接著開車衝出已經拉起的封鎖線。……汽車停下來，劉先生被送到醫院的手術室，醫生用放大鏡檢視劉先生的瞳孔後，簡單的說「已經沒救了」。但是我還是不放棄，我自己檢查被血染紅的襯衫上的彈孔。子彈有三發，且有一發是從右邊進去然後向左，可能打斷了動脈。 [29]

本來，劉吶鷗要趕去赴的下一個約會是跟影星李香蘭（山口淑子）商洽拍片事宜。李香蘭如約來到店裡，未料對方爽約，這不是一向守時的劉吶鷗的風格。翌日看報才知，劉吶鷗遭暗殺身亡。李香蘭再也不可能在劉吶鷗導演的電影中擔任女主角了。 [30]

劉吶鷗確實死於國民黨特務之手。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重慶國泰戲院舉辦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會議，史東山在總結發言中宣佈：「在我們電影製作人當中，陸續出現賣國叛亂之人。叛亂者之代表劉吶鷗，已被我們親手射殺。此事，已經嚴厲的教訓了那些叛徒。」 [31] 然而，即便在非常時期，胡亂殺戮是否符合正義原則？漢奸的標準、殺人的權力，掌握在哪個人、哪個部門手中？殺劉吶鷗並非劉吶鷗有多大的惡行，乃是要利用他的死亡製造恐怖氣氛。但是，靠恐懼來打造的「愛國心」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

從此，劉吶鷗從中國和台灣、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敘事中消失了。「忠奸之辨」是大中華歷史敘事的主軸。在善惡二元論的世界觀中，「漢奸」當然是「一生無足觀」的「歷史垃圾」。然而，在抗戰

期間，中國有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士以各種方式同日本佔領軍合作，他們都該死嗎？研究所謂「通敵」現象的學者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指出：「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準則，也不能製造道德知識。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不是提出錯誤的觀點來抨擊過去的歷史參與者或現在的讀者，而是調查在某時某地產生道德準則的標準和條件以便精心研究。追問為什麼一些中國人選擇與日本人一起工作是歷史研究的課題，但是探尋那時的合作為什麼對人們具有意義可能更為重要。」[32] 去「道德絕對化」的歷史研究和敘述，在華語文化圈中仍寥寥無幾。更何況，無論從法律還是文化的意義上，都很難將劉吶鷗定義為「漢奸」—反之，毛澤東和蔣介石更有「資格」被命名為「漢奸」。

在那個國族意識高漲，甚至成為對人的最初定義的時代，劉吶鷗反其道而行，以超越國籍、種族和文化的「世界人」自居。那個時代容不下這樣的人，劉吶鷗即便不死於那一場謀殺，也會死於另一場謀殺，或者國共兩黨的政治清洗。不過，讓人欣慰的是，子彈並不能戰勝文學、藝術、自由和夢想。在靈魂的意義上，向死而生的劉吶鷗比那些暗殺他的「愛國者」活得更加長久，正如他的友人所說：

> 在八一三以前，我對吶鷗的日本籍是毫無所聞。但是，國籍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們把他看為一個中國人，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所建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較長遠，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言行是屬於中國的。反之，如果把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的一生工作是更加偉大。他深深地走入中國的文化界，去發動中日文化一元化的工作，我相信沒有一個日本人幹過這樣艱深的工作。對於中日問題，他對我說，中國人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日本人的長處和短處，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要由中日文化界澈底合作，探求一種新的文化，一種能夠使中日兩國共同努力的新文化，才足以領導民族，消弭戰爭。莫論他

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的理想是謀中日兩民族的永久幸福，或是全人類的永久幸福。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本著他的藝術良心和精神。他的死，我深痛獨裁政權的殘酷。吶鷗不是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日本人，而是一個世界人。[33]

第七卷

外人的影子

23　鮑羅廷

揮舞紅布的鬥牛士

我的使命是掌控形勢，推動巨輪前進，隨著時間的游移，巨輪也推著我一道前進。我自己也成了這龐然機器裡的齒輪。

—鮑羅廷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蘇聯伊爾庫茨克附近一個最殘酷的集中營裡，一名骨瘦如柴、頭髮和鬍鬚蓬亂的囚犯，痛苦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在古拉格的一個最尋常不過的編號。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一群跟他一樣等死的囚徒。

他熬過了殘酷的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能倖免於四十年代末新一輪的大抓捕。他被認定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是「外國民族主義者」──儘管他的前半生奉命在多個國家尤其是在中國拓展蘇俄的勢力，即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戰後那幾年，蘇俄的政治犯的數量更多了。新一輪的政治迫害、戰爭年代人口狀況的劇烈變化以及直接將政治犯排除在外的特赦，使勞改營裡政治犯的比例大大提高。在整個古拉格系統，超過百分之三十五的囚犯被判犯有「反革命罪」。在某些特別偏遠、冰天雪地的勞改營，這個比例甚至更高，遠遠超過百分之五十。[1] 這名死者就是數百萬計的政治犯中的一員。

他像一條野狗一樣被草草埋葬，沒有葬禮，沒有墓地，沒有鮮花，沒有哀樂，更沒有十字架。此刻，他二十多年前在中國的學生毛澤東和周恩來，已成為新皇朝的皇帝和宰相，而他的死敵蔣介石則在台灣島上咀嚼失去中國的痛苦──毛澤東和周恩來算是幫他為二十多年

前的失敗報了一箭之仇嗎？他曾經朝夕相處的友人，如孫文、汪精衛、陳獨秀、張太雷、瞿秋白、鄧演達等人，早已經以或榮耀、或恥辱的不同方式，先他而去。

三年後，史達林死了，他獲得平反。那薄薄一紙平反通知書，對他躺臥在西伯利亞凍土中的軀體沒有任何意義，卻改善了其遺孀的處境—她可以領取丈夫的養老金過活了。

他的名字叫鮑羅廷。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紐約時報》常駐莫斯科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獲知了鮑羅廷去世的消息。這是蘇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鮑羅廷的死訊，而他已死去兩年多。[2] 鮑羅廷這個名字，在蘇俄已被人淡忘，在中國卻家喻戶曉。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來到中國，點燃了革命的火燄，一度成為大半個中國的「紅色教父」，然後他也被這火燄灼傷。他是蘇俄干涉中國的內政、顛覆中華民國的代表人物。近代以來，俄國是禍害中國最大的鄰國，沙俄時代侵佔中國北方的領土，蘇聯時代則以共產國際為工具向中國輸出革命。

一八八四年，鮑羅廷出生在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的一個窮苦猶太人家庭，年幼時隨父遷居拉脫維亞的里加。十六歲時，他參加猶太社會民主主義同盟（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猶太知識分子選擇激進左派的政治信仰）。十九歲時，他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參與一九○五年失敗的革命，遭到沙俄政府通緝。一九○七年，他遠走美國，住在芝加哥的貧民區，參加美國社會黨，並嘗試新聞寫作。一九一七年，他回到俄國，看到革命的勝利。一九一八年，他奉列寧之命，遊走於美國、英國、荷蘭、墨西哥，到各國煽風點火。[3]

鮑羅廷的最後一站是中國，他的人生大戲最壯闊的舞臺是中國。一九二三年秋，他從西伯利亞進入滿洲，再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他從上海南下廣州。他乘坐的是一艘小輪船，為了掩人耳目，船上還順帶運送了兩百隻綿羊，他躺臥在綿羊之中，忍受著臭氣。途中還遇到了颱風，如果不是船長在台灣沿海找到避風之處，說不定鮑羅廷也逃不掉這群死得一隻不剩的綿羊的厄運。

救星：鮑羅廷之於孫文

正處於內外交困之中的孫文，視鮑羅廷為從天而降的救星。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鮑羅廷抵達廣州，與孫文第一次會面。鮑羅廷在報告中寫道：「孫文非常熱烈地歡迎我，讓我和他坐在一塊，並且目不轉睛地凝視我長達數秒鐘之久。」[4] 孫文對鮑羅廷這個從蘇聯來的欽差大臣抱有巨大的期待。聯俄聯共是孫文最後一場賭注，如果這一局賭輸了，他就真的一無所有了。孫文將鮑羅廷視為顛覆中華民國的秘密武器，他對中華民國的仇恨超過了對滿清王朝的仇恨──他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日後他居然被尊為中華民國之「國父」。

鮑羅廷到達廣州之際，孫文坐擁孤城、一籌莫展。鮑羅廷發現，廣州政權危在旦夕。首先，國民黨成分複雜、組織渙散，「它既沒有綱領，也沒有章程，沒有組織結構」，「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其次，由於孫文治理無方，「廣東人民對孫的政府持強烈反對態度」，市民厭戰，農民「不再納稅，不再把糧食賣給部隊，最終拿起武器在某個地方從後面襲擊部隊」；再次，孫文號稱擁有四萬軍隊，其實大部分是心懷不軌的僱傭軍，真正靠得住的只有一支兩百人的衛隊。[5] 孫文自己也意識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6]

短短幾天之後，兩人便情同手足、形影不離，孫文將鮑羅廷喻為當年援助美洲殖民地獨立戰爭的法國革命家拉法耶特。鮑羅廷帶來的不僅是金錢和武器，更是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方式。鮑羅廷提出將國民黨的組織改為金字塔結構的建議，並同意孫文保留其難以自圓其說的「三民主義」。[7] 孫文內心早已對宋教仁打造的國民黨─適宜於議會政治的英美式政黨─感到厭煩，而鮑羅廷巧妙地利用孫文的好大喜功，在國民黨的新黨綱裡為其安排了龐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孫文大喜過望，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改組委員會顧問。

一九二四年一月，新的國民黨召開一大，全面吸收鮑羅廷的想法，通過了打倒帝國主義和聯合農工的口號。這個脫胎換骨的新政黨，表面上的黨魁是孫文，實際上的掌舵者是鮑羅廷─在鮑羅廷眼中，孫文只是一個需要「挽救」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家」而已。[8]

孫文慷慨地安排鮑羅廷和妻子、兩個兒子住在廣州市中心的一棟寬敞的兩層樓房裡，這棟房子正面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部。鮑羅廷一家人住樓上，秘書和翻譯住樓下。這裡的訪客川流不息，儼然是孫文府邸之外另一個權力中心。除了妻子鮑羅廷娜，鮑羅廷最信任的心腹是中共黨員張太雷，其秘書回憶說：「鮑、張倆甚至同住一房，鮑羅廷絕對信任張的翻譯，一定要他陪同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9]

隨著鮑羅廷在廣州的事業蒸蒸日上，蘇俄派遣大量軍官和文職人員來到廣州，廣州變成蘇俄的一處非正式的殖民地。每個地方，即便是政治和軍事機器之中微不足道的小齒輪，蘇聯的影響力也無所不在。美國國務院在一份秘密報告中指出：「鮑羅廷這位第三國際派駐廣州的特使，是這個陰謀網絡幕後的邪惡人物，他出手闊綽，散發軍火和金錢。」[10]

這場交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孫文。孫文充分利用蘇聯政治、軍事顧問的專業技能鞏固自身權力，即便充當史達林的「兒皇帝」也在所不辭──總好過淒風冷雨的流亡日子。黃埔軍校指揮的部隊從一九二四年的不足一千人猛增到一九二五年底的三萬人。而國民黨已被改造成一個紀律嚴明的政治組織，蘇聯駐北京政府的大使加拉罕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信中如是說：「國民黨正在變成一個有生命力的、積極的、真正有組織的國民革命政黨，這是我們在任何一個別的國家都沒有遇到過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還是波斯，都沒有這樣一個政黨，像現在（我強調的是現在）國民黨這樣舉足輕重；像國民黨這樣，受我們的影響如此之深；像國民黨這樣，尊重和崇拜我們的權威；像國民黨這樣如此順從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11] 加拉罕毫不掩飾地揭露出國民黨與蘇聯之間的僕從關係，也是孫文與鮑羅廷之間的僕從關係。

對於國民黨的起死回生，胡適在〈主義與飯碗〉一文中指出，南方「採用俄式組織之後，全部國民黨，恍若節制之師。政治上之主張儼成宗教上信仰，此為國民黨勝人之處」。不接受共產主義的胡適也承認，西方給中國帶來現代科學和文明，但迄今為止中國人僅得到皮毛。通過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中國人才第一次學到一些實質性的內容，特別是蘇俄政黨那種善於組織的功夫。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孫文在北京彌留之際，簽署了關於國事、家事及致蘇聯政府的遺書。蘇聯政府是唯一支持他的外國政府，鮑羅廷是他唯一的「外國朋友」。鮑羅廷對孫文的輔佐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難怪一九二八年三月有個傳教士對胡適說，「此時中國需要一個英美式的鮑羅廷」。胡適略帶挖苦但又不無怨恨地告訴對方：「可惜英美國家就產不出一個鮑羅廷。」[12] 英美國家為什麼產不出一個鮑羅廷呢？英美國家沒有發明出一套瞞天過海的「國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只能訴諸於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原則。列文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常常為中國抗議者提供反對中國統治階級之思想資源的西方自由國家，往往支持那些民心盡失的中國政權；而對於民心盡失的中國政權來說，承認外國人的要求是從外國人手中得到鎮壓國內敵對勢力所需武力援助的關鍵。」[13]

孫文當然感激蘇俄和鮑羅廷對他起死回生的恩情，在給蘇共及蘇聯政權的最後告白中，一往深情地說：「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14] 這一定是鮑羅廷樂於看到的文字。

死敵：鮑羅廷之於蔣介石

孫文去世後，蘇聯在廣東扶植傀儡政府的決策並未改變。據軍事顧問卡列亞金回憶，僅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莫斯科就向廣州政府提供了二十四架飛機、一百五十七門野炮、四十八門山炮、一百二十八門迫擊炮、二百九十五挺重機槍、近七千四百支步槍、十一萬枚手榴彈、一點二四億發步槍子彈、五萬發砲彈等。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符合當時的最高標準，具備優異的技術性能，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軍閥部隊的同類武器。比如，中國軍閥在那些年裡幾乎沒有空軍，剛剛學會使用重機槍。同時，一艘艘輪船滿載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從海參崴和巴統運至廣州。蘇聯政府還向廣州政府貸款一千萬元用於開辦中央銀行。[15] 若沒有這些源源不斷的武器、戰略物資和金錢，此前無比孱弱、屢戰屢敗的廣東政府，怎麼可能在短短兩年就「麻雀變鳳凰」？

鮑羅廷的地位建立在來自蘇聯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上，他像魔術師一樣，點石成金。史達林授予鮑氏在中國的專斷之權，「蓋因華人程度幼稚，而鮑氏等則從事於社會革命已歷二十餘年，就此經歷一端，自宜服從之也」。[16] 一九二七年，黨軍北伐佔據半個中國，鮑羅廷在中國的事業達到頂峰，然後瞬間跌入谷底，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是其中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鮑羅廷和蔣介石最初發生矛盾，是對何時北伐看法不同。蔣希望盡快北伐，鮑羅廷則希望做更充分的準備，擔心軍事失利會讓多年的心血毀於一旦。鮑羅廷更知道蔣介石急於北伐是想建立個人功勛，他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我們認為蔣介石是個性格獨特的特殊人物，他貪戀榮譽和權力，並渴望成為中國的英雄。他一意孤行，脫

離群眾，無論如何，為了爭取榮耀，達到他的目的，他有時也會利用群眾，利用中國共產黨，利用我們。」

這一次爭論，羽翼已豐的蔣介石占了上風。北伐在軍事上取得意料不到的勝利，鮑羅廷轉而支持北伐。很快，雙方圍繞遷都一事再次發生衝突。蔣介石的行營在南昌，南昌成為新的軍事和政治中心。鮑羅廷提出盡快遷都武漢，迎汪精衛入駐武漢，以實現「以汪制蔣」之策略。[17] 這場遷都之爭，背後乃是權力之爭。

一月十二日，蔣介石乘軍艦由九江抵達漢口，武漢方面為其舉辦盛大的歡迎式。然而，這天晚上蔣介石與鮑羅廷發生了最嚴重的衝突。蔣在日記中記載：「晚，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鮑羅廷說了什麼話讓蔣介石如此憤怒？鮑羅廷講了一個小故事諷喻蔣：一個古代的專制君王不聽別人意見，不許大臣們講話，大臣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鮑羅廷甚至指名道姓地威脅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

蔣沒有當場發作，卻視之為奇恥大辱。蔣在武漢停留一周，仍未緩解雙方的對立，他離開時，街上已出現「打倒蔣介石」之標語。很明顯，在武漢掌握軍權的唐生智和掌握政治權力的鮑羅廷已成為蔣的死對頭，「鮑羅廷是左派的神經中樞和催化劑，唐生智則為鮑羅廷提供了軍事力量」。[18] 蔣四月二十日在對黃埔同學會發表訓詞時對鮑羅廷的公然羞辱仍然念念不忘：「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乃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裡面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麼一個事？……你不只是欺負我個人，不只是壓迫我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裡可以放過你！」

此時，鮑羅廷又下了一步臭棋。他寫信給李宗仁，建議李取蔣而代之，出任北伐軍總司令，並答應給予軍火和金錢支持。但李擔心若逼蔣下臺，中共會乘虛而入，遂予以拒絕。李痛恨共產黨，也為了自保，極有可能向蔣報告了鮑羅廷的建議。對此，蔣十分憂心，一連幾天失眠，四度在日記中吐露自殺的念頭，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19]

蔣介石當然不會坐以待斃，自殺之說亦不可當真。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不顧痢疾重病，在南昌與軍政要員商談驅逐鮑羅廷事。蔣

提出：「必欲去鮑爾廷顧問，使政府與黨部能運用自由也。」但蔣的提議並未得到眾人的支持。何香凝、顧孟餘、戴季陶等人認為驅鮑事關重大，「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蔣甚為失望，嘆曰：「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其實，當時的國民黨離不開蘇俄的援助，沒有人敢跟鮑羅廷撕破臉。

然而，鮑羅廷急不可耐地公開抨擊蔣介石，痛斥蔣是窮兵黷武的新軍閥。他從來瞧不起蔣介石，以為蔣「一無所有，他是光桿司令，而我們擁有一切」，但他很快就嘗到輕敵的苦果。二月二十一日，武漢方面自行召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由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分別在武漢正式辦公。蔣介石認為武漢的行為由鮑羅廷操縱，將所有的憤怒歸罪於鮑羅廷一身：「鮑氏之罪，不容於天地之間」，「奸黨之計毒極矣，鮑氏之肉，不足食也」。

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會談（蔣已知曉維經斯基與鮑羅廷不和）。蔣徑直向維經斯基發問：共產國際是要國民黨團結呢，還是要國民黨分裂？國民黨現在所有糾紛，「皆由鮑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橫暴卑污，思之憤恨」。蔣並揚言，「政府遷期乃待第三國際撤鮑之電與已回去方定」。這等於是要脅共產國際撤回鮑羅廷。維經斯基立即向史達林作了匯報。

莫斯科支持武漢政府和鮑羅廷，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沒有參加。會議通過許多鮑羅廷的主張，對蔣介石的權力進行限制，蔣所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常會主席職被免，僅保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實職。

與檯面上的動作相配合的，是幕後更大的陰謀。四月十日及十一日，鮑羅廷在漢口跑馬場後面四川軍閥楊森被沒收的住宅內，召集秘密會議，商討暗殺蔣介石事宜。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不同意這一計劃，加倫將軍的一名侍從叛逃之後，在上《字林西報》發表文章，披露有關情形。

鮑羅廷在會上說：「同志多人，曾經建議吾人除去蔣介石，並已有人將擔任執行此項使命。」他接著告知，蘇俄間諜披脫老夫已準備擔負此事之全責，甚至願意為此犧牲生命。而共產黨人李立三更提出具體建議：他熟悉蔣介石司令部之路徑，可毒斃蔣氏，甚為易事，只囑一醫生出而證明其為患心弱而死即可。[20]

鮑羅廷的暗殺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蔣介石就已決定利用其掌握的軍隊作出最後一搏。鮑羅廷的秘密會議之後的第二天，蔣便在上海發起「清黨」屠殺。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發

布的第一號命令是通緝共產黨首要，名列榜首的就是蔣恨之入骨的鮑羅廷。

太上皇：鮑羅廷之於陳獨秀

鮑羅廷的對外身份是蘇聯羅斯塔新聞社駐華特派員，真實身份是蘇聯政府派駐孫文「準政權」的「永久的全權代表」。有過在歐美生活經歷的鮑羅廷，風度翩翩，文質彬彬，絲毫沒有一般蘇俄官員身上的僵硬和土氣。有西方記者形容他說：「站在我前面的這個人身材高大，體態勻稱，年約五十歲，他舉止從容、優雅，講話慢條斯理，嗓音低沉、和諧。他的一雙眼睛深邃、炯炯有神，彷彿是屬於夢想家、發明家，這雙眼睛令他消瘦、滿面皺紋的臉龐熠熠生輝。」就連廣州神學院院長香雅各（James Henry）博士也認為，鮑羅廷「個性討人喜歡，誠懇真摯，令人印象深刻，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香雅各問鮑羅廷是否喜歡中國人，鮑羅廷對這個提問驚訝萬分，思索片刻之後說：「我從不考慮這個問題。」[21] 這是典型的外交家口吻，鮑羅廷內心真實想法或許是：我才不會像你們愚蠢的傳教士那樣愛中國人，我來這裡只是要讓曾在蘇聯燃燒的革命之火席捲這片東方的土地，進而將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國。蘇俄對中國的每一筆投資都要加倍地收回，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鮑羅廷的同事加拉罕曾要求鮑羅廷「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他所「固有的隱蔽性」[22]，但長期在歐美國家過著「隱身」生活的鮑羅廷置若罔聞，他要站在舞臺中央，要成為在中國最高調的蘇聯顧問。在廣州，他被稱為「廣州王」；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他又變成「武漢王」。

鮑羅廷竭力排擠加倫等其他蘇聯顧問，建立起「鮑羅廷同志的個人獨裁」，不僅控制政治事務，也將軍事部牢牢控制在手中。蘇聯顧問赫梅廖夫認為：「所有電報只能以鮑羅廷的名義發出。甚至連給北京寄什麼樣的郵件這樣的問題，鮑羅廷也把決定權留給自己。這種情況顯然不正常。」[23] 鮑羅廷統治著數百名蘇聯的政治、軍事顧問，以及通過他們所指揮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鮑羅廷對蘇聯同事盛氣凌人，對國民黨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將領「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對毫無實力的中共領導人不屑一顧。鮑羅廷認為，他有足夠的「草料」飼

養這群「嗷嗷待哺的牛羊」。加倫將軍的侍衛披露說：「人皆以為中國共產黨當然有重要華人為首領，得加入莫斯科中央委員會之機密會議，並由其指導一切活動，然不知由莫斯科方面之眼光觀之，其視名義上之華人首領，不過如小學生之流，實際上指導之責任，操諸鮑羅廷等人之手。其手下尚有多人助之辦理一切事務，對於華人，殊少信賴，偶爾不關緊要事，始與之商議而已。」[24]

然而，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倔強和固執絲毫不亞於蔣介石。陳獨秀被後輩形容為永不服輸的「老頭子」，而他自詡為「龍性豈易馴」。陳獨秀基本上是一名舊式文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人士。他沒有參加中共一大，卻被缺席選舉為總書記，與會者多半是他在北大的學生以及被《新青年》啟蒙的年輕人，他們景仰他崇高的聲望。陳獨秀卻不甘於做一名垂拱而治的黨魁。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由共產國際指導剛剛成立的中共展開工作時，他斷然拒絕：「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絕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這個書記，但中國共產黨絕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25]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黨員無比崇拜蘇聯不同，陳獨秀一開始便對蘇聯存有深刻的不信任，這就使得他與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關係緊張。

一九二七年四月，陳獨秀來到武漢，他立即發現，這裡是鮑羅廷的天下，他的中共總書記的職位是個空殼子。中共政治局會議在鮑羅廷的府邸召開，鮑羅廷在會上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指手畫腳。兩人常常在會議上針鋒相對：蔣介石翻臉前，陳獨秀不同意鮑羅廷對蔣的讓步政策；蔣介石翻臉後，陳獨秀更不同意自取滅亡的暴動計劃—鮑羅廷傳達了史達林要求中共組織一支七萬人的軍隊的指示，陳獨秀評論說：「這簡直是在尿桶裡洗澡。」然而，中共維持運作的每一分錢都來自蘇俄，身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沒有一兵一卒。鮑羅廷通過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控制了中共中央，「陳獨秀如同小媳婦」。[26] 這一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七月十二日，鮑羅廷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傳達莫斯科的命令，將陳獨秀免職。此前八天，陳獨秀的長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下令處死。[27] 此後三天，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進行「分共」。

鮑羅廷及其主子史達林將所有的罪責都推到陳獨秀身上。鮑羅廷要求陳獨秀赴莫斯科匯報工作。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一旦去了，他就成了命被對方捏住的奴才。隨後，陳獨秀退出政黨政治，恢復書生身份，以「撒翁」為筆名撰寫政論文章，一發而不可收拾，他找回了《新青年》時代的激情睿智和鋒芒畢露。[28]

鮑羅廷與陳獨秀最後的來往，是讓瞿秋白去勸誡陳獨秀不要公開批評蘇聯和中共，但陳獨秀不為所動，他不願再出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晚年的陳獨秀以「終身的反對派」的身份對抗國共兩黨。從國民黨的牢獄中獲釋之後，在抗戰的硝煙裡困居四川江津，卻在思想上回歸五四時代的民主自由價值，「將我輩以前的見解澈底推翻」，猛烈抨擊中共及其依附對蘇聯所施行的獨裁專制制度，「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達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他已經預料到毛澤東會是一名中國版的史達林，所以拒絕去延安的邀請。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六十四歲的陳獨秀孤獨地辭世，臨終囑夫人潘蘭珍「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獨立」。陳獨秀去世七年之後，胡適看到陳獨秀晚年的文稿和書信，如獲至寶，將其編輯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在香港自由中國社出版。[29] 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國民黨的敗局和共產黨的勝利已不可避免，陳獨秀的真知灼見將在黑暗中閃閃發光，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政權的崩解，而且還將等到日後中共政權的覆滅。

財神爺：鮑羅廷之於馮玉祥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直接對政治局負責的中國委員會，隨後決定援助馮玉祥大筆軍火和金錢。[30] 蘇聯利用馮玉祥影響中國北方政局的做法收到了明顯的成效，馮玉祥赴蘇聯考察，看到蘇聯的強大，羨慕不已，決定全面投靠。

馮玉祥的軍隊是軍閥中裝備最差的部隊之一，他盤踞在貧瘠的西北，財源枯竭，無力招兵買馬。自從跟蘇聯拉上關係，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馮玉祥的國民軍從蘇聯獲得大量的步槍、彈藥、大砲、飛機、藥品等，數量甚至超過蘇聯對南方國民革命軍的軍援。蘇聯派出教官幫助馮玉祥開辦軍械廠、軍校、軍醫院。馮玉祥任命在蘇聯陪同他訪問的烏斯曼諾夫任政治軍事顧問，在各軍成立政治處。中共也派遣兩百多名黨員到國民軍中工作，還從北方區委、莫斯科、廣州和上海調遣了不少得力人士入夥。

此前，鮑羅廷在土倫與馮玉祥暢談三天三夜，彼此情投意合。當鮑羅廷發現蔣介石不可靠之後，又將牌押在馮玉祥身上，力主武漢方面進軍河南，與馮軍會師中州。[31] 鮑羅廷認為，跟桀驁不馴的蔣介石比起來，對其畢恭畢敬、奉其為導師的馮玉祥，似乎更容易駕馭。然而，鮑羅廷固有縱橫捭闔之才，卻沒能洞悉城府更深的「倒戈將軍」馮玉祥的心機──由於馮氏一生中時常背主倒戈，有人將其字「煥章」改為「換章」（換章意即打麻將換牌之意）。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寧漢分裂，馮玉祥成為寧漢雙方爭搶的「香餑餑」。馮玉祥先在鄭州與汪精衛會面，後在徐州與蔣介石會面。當蔣介石向馮玉祥承諾給予更多的金錢、武器和地盤，「紅色將軍」立即改變顏色，支持蔣介石清黨。

不過，馮玉祥畢竟與蘇聯淵源太深，他不敢與蘇聯決裂，至少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馮玉祥對轄區內的中共黨員和蘇聯顧問，沒有趕盡殺絕，只是「禮送出境」──在離開者當中，有一個名叫鄧小平的留蘇歸來的共產黨幹部。馮玉祥若是殺掉包括鄧小平在內一批共產黨人，文革之後中國的歷史會不會因此改寫呢？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蘇聯輪船「紀念列寧號」赴漢口裝運茶葉，在浦口被奉軍張宗昌部查出載有鮑羅廷的夫人法因娜．鮑羅廷娜及其他三名蘇俄間諜，還有大量宣傳品。張宗昌命令一併扣留。[32] 蘇俄駐北京使館向北京外交部發出抗議，外長顧維鈞駁斥說，被扣俄人來華宣傳共產，企圖破壞中國之社會組織，必須澈底追查加以處分。五月，四人被押送到北京接受審判。律師坎托羅維奇在法庭上指出，這件案子「是中國針對蘇聯公民乃至所有無條約關係的外國人的第一樁重大政治訴訟案」，「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七月十二日，負責審判該案的法官霍沖據說具有「民主傾向」，對涉案人員作出無罪宣判。後來，鮑羅廷娜在回憶錄《在中國暴君的刑訊室裡》承認，霍沖並不具有「民主性」，而是得到蘇聯政府二十萬美元的賄賂。然後，法官和四人都逃之夭夭──盛怒之下的張宗昌將法官的親人投入大牢，北京警備司令部懸賞三萬美元捉拿鮑羅廷娜。[33] 從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可看出，北洋政府對司法系統的控制多麼鬆懈。換一個角度來看，司法獨立在中國已初具雛形──儘管司法腐敗難以杜絕。

就在鮑羅廷娜獲釋的同一天，武漢政府向鮑羅廷發出逐客令。宋子文陪同鮑羅廷上廬山休養，並商定離開中國的行程。海路已不安全，東北在奉軍控制下。天無絕人之路，馮玉祥許諾為鮑羅廷提供從西北經過蒙古回蘇聯的安全通道。十八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當

天以密碼文件形式發往武漢的一封電報：「按照黨的紀律命令鮑羅廷立即回莫斯科。未經上級准許，鮑羅廷不能給自己任命副手。從現在起加倫按照由此發出的預先指示支配錢款。」[34] 鮑羅廷已失寵，回蘇聯凶多吉少，但他在中國已無立錐之地，作為蘇共黨員，又怎能抗命不從呢？

二十七日，鮑羅廷離開即將變天的武漢。汪精衛等武漢方面的大員客客氣氣地前來送行，言不由衷地高度評價鮑羅廷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臨行前，鮑羅廷抓住最後的機會，與一些將領商談，希望他們繼續接受蘇聯的援助和指揮，然後他知道這些努力已無濟於事。他的同伴說，這些將軍非常友善，真心熱愛蘇俄。鮑羅廷反駁說：「他們還很年輕，他們年輕時，個個是好人。」

在鮑羅廷抵達鄭州馮玉祥的轄區後，中共在南昌發起暴動。感到受欺騙的汪精衛大怒，給馮玉祥發去電報，命令名義上服從國民黨中央的馮玉祥抓捕並處決鮑羅廷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

馮玉祥心想：你要殺他，你為何不在武漢動手？汪精衛想學曹操的做法，想殺禰衡，自己不動手，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假手於黃祖而殺之，馮玉祥在日記中寫道，「可是我決不是黃祖」。他連夜催促患惡性瘧疾的鮑羅廷動身，若鮑離開鄭州，他就可以用「鞭長莫及」敷衍汪。

八月三日，鮑羅廷一行的專列到了鐵路的終點──陝州。然而，他們組成五輛轎車和五輛卡車的車隊繼續往北。九月六日，他們翻過長城，離開中國國境，進入蘇聯的保護國蒙古，他們這才鬆了一口氣。九月十八日，鮑羅廷一行安全抵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35]

因為放了鄧小平，也放了鮑羅廷，馮玉祥與蘇聯和中共仍保持藕斷絲連之關係。二十一年之後，在海外遊歷的馮玉祥接受中共邀請，搭蘇聯輪船「勝利」號，返國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殊不料，「勝利」號正向敖德薩港口進發時突然失火，馮玉祥被煙燻窒息致死，時年六十六歲──死在蘇聯的輪船上，是不是他的宿命呢？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作為「一個被打敗的人」，鮑羅廷回到闊別四年的莫斯科，死裡逃生的他，卻沒有喘息的時間。

鮑羅廷將陳獨秀當作代罪羔羊，陳獨秀沒有乖乖就範；史達林將鮑羅廷當作代罪羔羊，鮑羅廷卻束手就擒。史達林曾輕蔑地說：「我知道蔣介石在向我們玩弄陰謀詭計，但倒霉的會是他。我們將會把他當檸檬來擠，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乾之後就扔掉。」然而，不願成為檸檬的蔣介石卻先發制人，將中共和蘇聯當作檸檬擠乾後丟棄。

史達林的遠東政策遭到毀滅性的失敗，但他不會承認失敗。他的黨內最可怕的對手托洛茨基，正以此為突破口向他發起攻擊；如果他示弱，首先倒下的就是他。於是，史達林將鮑羅廷當作羔羊拋出來，再對托洛茨基發出致命的攻擊。鮑羅廷上交了一份數萬字的中國工作報告，卻未得到諒解，甚至有人將「鮑羅廷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并列。

史達林網開一面，給了鮑羅廷一份無足輕重的工作：一份新的報紙《莫斯科每日新聞》的主編。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蝸居在莫斯科簡陋的公寓裡，無權無勢的鮑羅廷一定時常回想在中國風光無限的日子。剛來中國的時候，窮人家子弟的鮑羅廷連坐人力車都感到害羞，而在成為中國革命高高在上的「教父」之後，他迅速懂得如何掌握、運用和享受權力。武漢剛剛成為國民政府的權力中樞，他就搬進一所富麗堂皇的大宅邸，房間內有錦緞窗簾，昂貴的家具，還配有中央暖氣。

鮑羅廷在這座「準總統府」裡發號施令。他有衛隊二十人，終日武裝，以防不測。鮑羅廷同其秘書、譯員和衛隊，住在頂層。進出該棟房屋的訪客，必須有特別徽章，其記號為一種磁質紅星，而且還要在樓梯下接受盤問和搜身。得到許可之後，保鏢會按電鈴告訴樓上，有來訪者即將上樓。在此宅邸內，還設有一印刷所，發行日報《人民論壇報》，其權威地位甚至超過武漢政府的機關報。[36]

當時，有一名西方記者用隱晦的筆調描述了鮑羅廷到中國兩年間的變化：「他對每件事都興致勃勃，他以耐性、幽默、縝密的態度來處理每一件事。就這點來看，他不像那種典型的革命家──從欣賞美景到綁鞋帶都不忘階級鬥爭、毫無情趣的狂熱之徒。鮑羅廷具備列寧那種疏離的人格特質，從人事的大方向來明察秋毫。」列寧刻意與其他革命領袖保持距離，鮑羅廷更是將所有的中國革命者都視為他的奴

僕。如果中國革命成功，他豈不可以充當中國的「攝政王」？

然而，失敗的降臨出其不意，而且是一敗塗地。一九二七年夏天，鮑羅廷離開中國前夕，一位瑞典記者連夜採訪了他。這位記者如此描寫當時陷入沮喪之中的鮑羅廷：

> 鮑羅廷往後仰，身陷扶手椅中，正在一旁的燈光，灑落在他身上那件寬鬆的熱帶套裝上，他那蒼白的臉龐在陰影中輪廓分明，尤其是下顎、深邃的雙眸以及稀疏的黑髮，鮑羅廷紋絲不動，沉思良久，緩緩摸著鬍鬚，最後用低沉、壓抑的語調說：「我來中國是為理想而奮鬥，解放東方人民，實現世界革命的夢想將我帶來此地。但中國本身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社會問題龐雜，無限的可能性，都令我驚愕萬分，也將我淹沒其中，我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漸褪色。」[37]

中國左右了鮑羅廷，讓他認清這世上有些事情是他和史達林無法一手控制的。在中國的經歷，是他一生中的亮點和汙點，也成為史達林對他動了殺機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鮑羅廷的老朋友、美國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將一部寫中國革命的書稿帶給鮑羅廷，鮑羅廷在莫斯科四處熱心推薦這本書的出版。而蘇聯宣傳部門認為，書中沒有提及蘇聯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不能出版。

那時，史達林正因為南斯拉夫鐵托「不聽話」，對共產黨陣營內部的「民族主義」問題十分敏感。當KGB將鮑羅廷和斯特朗的活動報告給史達林，史達林被激怒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四日，鮑羅廷和斯特朗先後遭到逮捕。五天之後，斯特朗被驅逐出蘇聯，鮑羅廷卻永遠消失了。[38]

鮑羅廷不是唯一的犧牲品，史達林幾乎將當年與鮑羅廷一起派駐遠東的高級外交官、情報人員、軍官和共產國際成員全部抓捕並殺害了：越飛，與孫文聯名發表《孫越宣言》的蘇聯特使，以自殺結束生命，抗議滅絕政敵的行徑；加拉罕，蘇聯第一位駐中國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不經宣判就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KGB總部盧比揚卡被槍決；布柳赫爾元帥（加倫）與副官一起於一九三八年在莫斯科被殺害；擔任過駐北京武官的葉戈羅夫元帥因圖哈切夫案被槍決；幫助中共建黨的雅科夫列夫，此前曾經負責押送和處決沙皇一家，沒有料到自己也成為古拉格群島的囚徒，並於一九三八年被處死……這張名單可以無窮盡地開下去。[39] 這些禍害中國的兇手，被更大的惡魔史達林無情地吞噬了。

在古拉格勞改營死去的鮑羅廷，臨死之時唸叨的或許是那段他親筆寫下的關於中國革命浪潮的感慨：「為了革命信仰，四年的奮鬥犧牲已付之東流。歷史總是一再重演。它起先是以悲劇的面貌出現，第二次則是悲喜劇。革命力量已推至長江流域。人跳進這濁流中，浮起來時是滿腔破碎的希望。」

24　金文泰

深受港人愛戴的「使君」

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

—金文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劉曉波從奧斯陸赴夏威夷，途經香港，接受《解放月報》（後改名《開放》）主編金鐘之採訪。金鐘問：「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劉曉波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1]

「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是劉曉波有感於香港的自由、鮮活、富足而發出的感嘆。劉曉波來自經濟剛剛起步的內地，活力四射的香港帶給他巨大的「文化震撼體驗」。雖然在香港只停留了短短五天，他已然發現：「香港，這個每個毛孔都散發著商品氣息的城市，第一次使我感覺到了商品化的力量，自由競爭的力量，以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對人類的力量。……在地理上，香港屬於中國；但在自由港這點上，香港屬於世界。但願香港永遠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英國統治香港以來，短短數十年間，香港從一個貧瘠的小漁村一躍成為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文化多元的「東方明珠」。同樣是華人社會，為什麼中國與香港的現代化進程宛如天壤之別？答案很簡單，是專制制度扼殺了民眾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專制制度必然帶來貧窮、奴役和停滯。「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讓中共和憤青們給劉曉波戴上

「賣國賊」的帽子，但劉曉波始終堅持這個說法。二○○七年，《開放》雜誌創刊二十周年，劉曉波撰文談及十九年前的經歷時說：「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2] 六四之後，劉曉波出入於監獄之間，中共不予發放護照，他再也未能造訪香港。他在不自由的環境下，一直關心「一國兩制」在香港崩壞的過程，以及香港本土意識和港獨思想的興起。

今天的很多香港人懷念英國統治的時代。最令香港人懷念的，是曾被中共妖魔化為「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中港矛盾日益激化之際，彭定康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下，三十年過去仍未能實現一個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他斥責英國政府為了保持與中國的利益往來，未有盡力履行契約一方的責任是「無恥」。彭定康為港人發聲，不惜嚴厲批評本國政府。港人愛戴港督而厭惡特首，不是無緣無故的。有香港評論分析說：「彭定康雖然並非港人選出，但委任他的前英國首相馬卓安，是由民主選舉產生，需要向所屬政黨和英國選民負責。反觀委任特首的執政集團，推行「民主集中制」，透過國家機器鏟除異見聲音，不單剝奪普遍中國人的選舉權利，就連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都受到限制，平民即使眼見高層貪污腐敗，都只能敢怒不敢言。掌握軍、政、財、權的執政集團在中國全無約束，更加不用提責任和義務。」[3] 顯然，港人親身感受到，民主英國治港成功，獨裁中國治港失敗；英國統治時代人心向上，中國統治時代社會崩壞。

在一百多年間的二十八名香港總督當中，深受港人敬重和喜愛的，除了彭定康，大概就數金文泰（Cecil Clementi）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金文泰接任港督之後一個月，訪問當時還是荒郊野外的新界。新界鄉紳以「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名義，在大埔墟蓋搭葵棚為歡迎禮堂。在禮堂前的橫額，用花朵砌成「還我使君」四個大字，歡迎金文泰。所謂「使君」，是中國古代對「奉使之官」的尊稱，三國時劉備便稱「使君」，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金文泰的職務相當於中國古時的州郡長官，並且曾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過，所以鄉紳們尊稱他為「使君」。[4] 金文泰在香港擔任港督五年，果然不負「使君」之名，帶領香港度過了那段動盪而幽暗的歲月，並奠定了「具有香港特色」的制度、經濟和文化根基。

緩和省港衝突，抵禦紅潮侵襲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金文泰抵達香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他是首位從皇后碼頭登岸的港督，自他以後，從該處登岸履新，成為歷任港督的傳統。

等待金文泰的，不僅是那座英印風格的、奢華舒適的總督府，更是前任港督司徒拔留下的棘手的爛攤子：出身主教家庭、畢業於牛津大學的司徒拔，為人尖酸刻薄、飛揚跋扈，不會說華語，而且認為應當對本地人施行最嚴厲的體罰。司徒拔一輩子都相信應該以帝國鐵腕手段治理屬地，他跟當時佔據廣東的國民黨政府及其首腦孫文的關係相當惡劣，就連剛到廣州不久的鮑羅廷都看得一清二楚：「英國人只關心一件事，將孫中山困在廣州，但又不讓他壯大，廣州越弱，香港就越強。……英國在中國沿海利益巨大。幾百條船從事沿海貿易。整個沿海貿易都要通過香港中轉，香港已經成為最大的中心，廣州作為廣東及其鄰省的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其作用日益減小。」[5]

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包括政府的低級公務員都參與罷工，許多罷工工人徒步回到廣州。香港的所有行業都受到波及，這場罷工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煽動，也是香港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司徒拔寸步不讓，火上澆油，但他根本無法切斷廣州和香港兩地工人的聯繫，罷工高峰期有二十五萬人離港，佔當時全港華人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廣州成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廣東國民黨政府給從香港回來的罷工者發放津貼，幾乎耗盡了該市的財力。[6] 在廣州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委員會對香港進行經濟封鎖，導致進入香港的船隻減少百分之六十，洋行商戶破產的不計其數，連生活用品也無法運進來，香港一度淪為一座死城。[7]

在省港大罷工的壓力下，英國政府撤下司徒拔，換上金文泰。臨危受命的金文泰，在很多方面與司徒拔截然相反：他是在印度服役的英國軍官的兒子，一八七五年出生於印度北部，然後被送回英國接受現代教育，倒是與司徒拔一樣畢業於牛津大學。一八九九年，金文泰被招募為官學生來港，到廣州學習粵語和書法，因義和團之亂而返回香港。他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官話和粵語，熱愛中國古典文化，書法造詣可以跟中國的書法家媲美一位於香港屯門通往青山禪院的路上，自一九二九年豎立了一道「香海名山」牌樓，牌樓上「香海名山」四個大字即為金文泰親筆題寫。

金文泰在香港任職多年，從基層幹起，對這塊土地瞭如指掌，香港是他的第二故鄉。更為重要的是，金文泰思想開明，擺脫種族偏見，對底層民眾深具同情心，是大英帝國知識階層中的新派人物。

此前，金文泰在政府文官考試中成績出色，完全有條件挑選政府的任何部門去工作，例如人人嚮往的外交部、財政部等。但他偏偏選擇去被視為「才智平庸之輩的避難所」的東方殖民司，並自願到遙遠的香港。金文泰的上司卜力認為：「金文泰是東方司最具才幹者之一，一個學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將有所成就。」[8] 果然，金文泰以自己的才幹贏得了香港總督的職位，並在這個職位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英國的官僚系統中，殖民地總督傳統上具有宗主國政府賦予的很大的行動自由。重視法治的英國在佔領香港之後即頒佈了《香港憲章》，授予港督組織政府和制定香港法律的權力。[9] 若總督是公認的人才，並且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往往會表現出一種不受歡迎的獨立性。金文泰就不時讓殖民部感到擔憂，「他覺得自己作為香港總督，有權掌握中國南部的全部海陸空部隊，決定我們在那裡的政策」。[10] 然而，正是這種大開大合、敢為天下先的施政風格，金文泰才得以扭轉香港走向沉淪的局面，既恢復了與廣州國民黨政權的友好關係，又避免了赤色風潮席捲和撕裂香港。

金文泰上任之時，省港大罷工的高潮已經過去，但雙方都騎虎難下，一時難以善後。他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認為廣州和香港向來就親睦如一家人，罷工浪潮讓雙方都深受其害，盼望早日結束對立狀態。[11] 他先後派出香港華人西醫杜應坤、律政司金培源和署理輔政司夏理德等前往廣州商討如何解決僵局。他進而邀請廣州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訪問香港。雙方在香港和廣州舉行多次會談。

然而，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廣州方面提出巨額賠償，這筆金錢或許正是國民黨北伐所急需的軍費。金文泰認為，向廣東支付「勒索款」並不能確保香港的永久安寧。他觀察到廣東的「四大勢力」──在東園主導罷工委員會的共產黨、蔣介石主管的黃埔軍校、胡漢民主導的國民黨右派以及汪精衛和廖仲愷領導的國民黨左派──之間即將陷入惡鬥。他堅拒廣州政府的賠款要求，決定靜觀其變。[12]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金文泰召開行政局會議決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維持現狀，直到廣東現政府被中國某一敵對將領所推翻」。[13]

果然，廣東的局勢發生了一波接一波的劇變。廣東國民政府沒有

如金文泰所預料的那樣被其他軍閥推翻，其內部無可挽回地走向分裂。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艦事件之後，掌握軍權的蔣介石解除罷工工人的武裝力量，大肆搜查罷工委員會總部。 [14] 蔣介石發現，要擺脫蘇俄的控制、清除中共的勢力，就必須尋求英美的支持。六月，蔣介石準備興師北伐，對外發表八點宣言，其中承諾停止對香港的抵制。這就使得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出現了轉機。

金文泰敏銳地抓住這個轉機。他讓華人政務司夏理德與蔣介石的代表會晤。香港政府嚴正拒絕國民黨方面提出的向罷工工人賠償的要求，但承諾資助廣東工業發展，包括協助興建連接九廣鐵路和粵漢鐵路的環市鐵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中英雙方在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舉行為期八天的談判，仍無果而終。

九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全力支持北伐，決議在香港政府不讓步的情況下，主動取消封鎖港澳政策，恢復粵港交通，准許人民自由往來。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在內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罷工委員會繼續供給生活費。至十月十日，廣東國民政府正式解除對香港的封鎖，並且解散罷工委員會，由此結束了這場持續十六個月、讓香港貿易損失數億英鎊的省港大罷工。 [15] 香港之罷工既因中國方面之煽動而起，亦因中國政局之改變而結束。

可悲的是，香港罷工工人淪為中國政治勢力的棋子，訴求無一得以實現。罷工領袖在香港無法容身，唯有到中國投靠共產黨。但蔣介石隨即暴力清黨，這些香港罷工領袖大多淪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品。罷工領袖為激進中國民族主義所煽動，但所謂的祖國視之為芻狗，這種始亂終棄的故事，還將多次在香港和中國的現代史上重演。 [16]

在反對共產黨這一點上，港英政府與蔣介石政權取得了相當的共識。一九二七年春，蔣介石在各地清共，香港政府隨即通過《非法罷工與停業法令》，嚴禁威脅政府的罷工行為，還規定不得用工會經費支持香港之外的政治活動，本地工會不得成為中國任何工會的分部或支部。同時，香港政府又將共產黨掌控的海員工會、全港工團聯合會等組織封禁並解散。及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國民黨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廣州公社暴動，大規模鏟除激進工會，香港的工運更是孤掌難鳴了。 [17]

一九二八年三月，金文泰代表英國政府，到廣州展開官式訪問，期間正式承認了國民政府政權，使兩地外交關係得以修復。他改變了此前對國民政府的看法，承認「要維繫香港的安寧，就有必要和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他結交國民政府最高統治者蔣介石，還與廣東

實權派人物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等人維持合作關係。[18]

金文泰深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禍害之烈，他從香港政府的財政中撥出一筆款項，發放給華人領袖羅旭龢等人，資助他們發行反共的報紙。《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等報紙連篇累牘地批評共產黨迷惑無知熱血青年，並將繁榮安定的香港與赤化動盪的中國二元對立起來，形成了某種港中有別、視香港為福地的本土意識，堪稱港人身份自我認同的開端。[19]

當然，金文泰更知道，要阻擊共產黨的思想和勢力滲透香港，必須提升香港的民生狀況。他對勞工與工廠法例作出相當程度的改善，限制童工的聘用。他也主持了重新規劃市區的貧民區，積極改善貧民的生活水平。

經過不懈的努力，香港逐漸恢復了生機和活力。一九二六年秋，香港當時最時尚和昂貴的卡佛百貨公司在商品目錄中炫耀說：「本公司不斷有大批款式迷人的新晚裝運到，全部都是由本公司代表親往倫敦與巴黎精挑細選的。」[20] 隨著轉口貿易的恢復，香港一九二七年出口船隻之總噸位數，已直逼一九二四年罷工發生前的水平，而且還在不斷上升。政府的年收入屢創新高，每年收益大約維持在兩千萬港元以上。相比之下，在十九世紀末一度比香港更繁榮的廣州，卻因為深陷於暴動、政變和戰爭之中而黯然失色。

吸納華人從政，扶持本土精英

在一九二○年代的香港，有四千五百名英國人，他們周圍生活著七十二萬五千名華人。在金文泰來香港之前，華人一直是香港史上被動的觀察者，在訪客及史家眼中，華人等同於模糊的背景，沒有清晰的面孔，也沒有名字。香港史書上很少出現華人的名字，只有極少數華人在香港發展史上扮演了公共角色，如孫文革命的贊助者、香港富商何啟。香港的華人大眾大部分都不參與公共事務，一心一意只顧謀生。他們大多數都是從廣東省來的鄉下農民，突然一頭栽進先進西方都市令人困惑的壓力之中。

香港所有的現代化設施都只是為照顧洋人而設計，而不是為了華

人。香港廣播節目委員會電臺的廣播只偶爾有個華語節目，電影院也只有一家有華語「解畫佬」—這人坐在銀幕旁邊跟著電影情節翻譯內容。根據一份一九二四年的記載，荷李活道有個不露面的業主，把他名下的一棟出租建築轉租給二房東，二房東再將之分隔成很多戶分租出去，那些三房東又再把每戶寓所分隔成小隔間分租給別人——一戶寓所往往住了二十五個人，而且經常不止此數。[21]

由於香港長期以來缺少一個界定清晰、威望卓著的本地華人群體，英國人的雙重管治設想很快演化成一種體制上集中、操作上卻自我克制的治理。殖民政府將幾近獨裁的權力保留在港督手裡；華人居民承受著粗糙的高壓手段，比如宵禁、繁複的登記手續以及其他的監視及管制措施。[22] 然而，對於遷居香港的華人來說，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雖有種族歧視的一面，卻遠比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各個時期的統治更為優越。

香港開埠以來，長期實施一種比美國早期或南非更為隱蔽的種族隔離制度，對洋人和華人的居住區域有不同的劃分。一九一八年，立法局通過「山頂居住條例」，規定所有居住在山頂的人士，其申請須得到行政局批准。論者認為這是變相將山頂保留為西人居住區，把華人摒棄於外的做法。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只有一個華人獲准居住在山頂，她就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23]

另一個居住在山頂的華人是混血的何東家族，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的首富。何東花園於一九二七年建成，批准何東搬上山頂的港督正是金文泰。何東獲准在山頂興建花園這一事件的背後，反映出香港政府對待本土精英的政策有了微妙的轉變。早在一九○八年，何東有意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頂頂端比港督別墅位置更高的住所，此舉卻被當時的港督盧吉否決，當時英國統治者無意賦予何東太過特殊的社會地位。到了一九二○年代，世界局勢大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倡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決。英國的殖民管治政策不得不作出調整，金文泰在此背景下被任命為港督，一上任就大力拉攏本土精英。在省港大罷工期間，何東四出奔走調停，更私下承諾支付工人罷工期間的一半工資，對平息罷工厥功至偉。港英政府對何東感激不盡，批准其在山頂蓋一所豪宅自然不在話下。一九○八年，盧吉拒絕何東搬到山頂的說法是：「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金文泰的新政策自然不是說自此華人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而是乾脆把何東也吸納進「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何東花園的建成，表明金文泰治理香港的方式是以懷柔取代高壓。

金文泰是第一個勇於批判種族偏見的港督，他公然聲稱在香港實行華洋隔離是「造成這個殖民地社會、士氣、智能甚至是商業和物質進步開倒車之舉」。[24] 在一九二○年代說這些話是很危險的，因為在那時期的香港確實有很多地方嚴禁華人居民涉足，香港的洋人商店助理也不會夢想要去跟華人握手。金文泰卻言行合一，身體力行，一些華人精英經常是總督府的座上客——總督府的舞會大廳、彈子房、牌局廳和吸菸室中，時常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金文泰還一度建議廢除被稱為「聖地中的聖地」的、只有白人精英才能加入的「香港會」，希望另外設立一個向不同族裔開放的聯誼會。

鑑於華洋隔離的制度是省港大罷工的誘因，而在罷工期間華人紳商大力支持港府，為了舒緩華人的反英情緒，激勵士氣，爭取華人精英的效忠，金文泰決定改變歷來行政局不許華人參與的傳統，首次委任華人周壽臣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金文泰的這一做法，受到保守的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張伯倫的反對，他們認為華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經過金文泰的一再要求，英國政府才同意了這一任命。[25]

在立法局方面，金文泰逐步加強其代表性，在一九二九年委任布力架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葡籍人士首度在立法局有了代表議席。他又委任華人律師曹善允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局內首次有九龍居民。一九二九年，立法局的官守議員人數增加了兩名，非官守議員人數則由六名增至八名。八席非官守議席當中，華人議員佔三席，分別是周壽臣、羅旭龢與曹善允。

身兼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雙重身份的周壽臣，在中國和香港的近代史上地位顯赫。周壽臣於一八六一年生於香港，被容閎選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時被選中的還有唐紹儀、詹天佑等人。一八七四年，周壽臣等人抵達美國，進入溫斯第小學唸書，次年入讀菲立斯學院。回到中國以後，這批西化的留學生並未受到重用。後來，周壽臣輾轉到負責朝鮮事務的袁世凱的麾下，在朝鮮十五年間，由翻譯員晉升成為署理仁川領事。

義和團暴亂之後，走投無路的清廷終於開啟新政。一九○三年，周壽臣終於出任位高權重的「關內外鐵路總辦」之職，官至二品。他也協助籌辦鐵路學堂，以培訓國內鐵路專才。一九○九年，周壽臣調任「奉錦山海關兵備道兼山海關監督」，直至清朝覆亡。

入民國後，袁世凱成為權勢堪比帝王的總統。作為袁的舊部，周壽臣本可大有作為，卻婉拒袁讓他入閣的邀請，南下回到闊別多年的香港。大概他已經預感到民國政局的敗壞，而對英國統治的香港頗有

信心。回港後不久，周壽臣獲香港政府贈予「太平紳士」之名銜。省港大罷工期間，金文泰請周壽臣出面，穿梭兩地、調停紛爭。一九二六年，周壽臣與金文泰一起被英皇喬治五世冊封為爵士，是繼何啟、韋玉、何東之後的第四名華人爵士。

二十年代後期，大英帝國「最好的時光」晃晃悠悠地過去了，舊式的殖民統治體系搖搖欲墜。生活在香港的洋人們，那時未必感受到變局將至，他們沉溺在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正如英國作家吉卜林在《漂洋過海》一書中所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但如果有人想品嘗墮落的滋味，就去香港好了。」但金文泰的確代表了大英帝國處在變動中：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洋人支配中國的日子就跟在印度的一樣，已經到了尾聲。到了一九二○年代末期，英國放棄了中國沿海的三處租界，並原則上同意逐步放棄其他在中國的額外領地的特權。但上述這些承諾並沒有把香港這塊割地算進去，恐怕連金文泰也無法想像香港有一天會歸還給中國──「我無法相信大英帝國有朝一日會默許交還香港。」[26]

融合港島新界，塑造東方明珠

一八九八年，英國強迫清帝國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獲得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區及兩百三十五個島嶼的九十九年租借權。

一八九九年，一些新界居民由於其前途未被考慮，表示要抵制英國的佔領。數百年來，這裡的居民就是不願服從滿清統治的「化外之民」。非常活躍的三合會是聲稱「反清復明」的秘密會社的一個分支，直到今天的香港，它還是最危險的犯罪組織。滿清當局從未有效地治理這片區域，這裡的居民也從未享受過皇朝雨露的滋潤。然而，當這塊土地租借給英國之後，滿清的官僚們悄悄地縱容乃至支持居民反對外國佔領的抗爭活動。

一八九九年四月十六日，三個連的英國正規軍和民兵在「名譽」號砲艦的支援下進入新界，英國國旗升起來。次日，發生了一場混戰，英國人輕而易舉地擊潰三千名中國人的數次進攻。中國人的抵抗並不激烈，也沒有持續多久。[27]中國的地方官員們見勢不妙，轉而

安撫和勸說當地居民接受英國統治的事實。

英國佔領新界初期，鑑於新界居民一向在這片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代相傳，其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均與市區大不相同，便採取不干涉政策，港督卜力承諾：「你們的商業和土地權益，必獲得保障；風俗和習慣絕不會受到干涉。」[28]

然而，後來香港政府並未遵守這些承諾。香港政府制訂「田土法庭」條例，規定新界土地均屬政府財產；又制訂「收回官地」條例，授權政府可徵收土地作為公用。一九二二年，港府修訂「收回官地」條例，增加民眾建房的賦稅負擔，引發居民不滿。一九二四年，新界各區村民齊集大埔文武廟召開大會，決定向政府交涉。後來，新界居民成立了「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涵蓋大埔、上水、沙頭角、沙田、荃灣、坳頭、新田、西貢及屏山九區的代表。

金文泰放下身段，與「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展開對話。當時，共產黨在中國成立農會，掀起殺戮地主、富農的血雨腥風，金文泰因「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名稱與共產黨主導的農會、工會接近，建議改為「新界鄉議局」。改名之後，意想不到地產生了一項「制度創新」：自此，關注地方慈善公益、地方利益興革、地方風化及代雪沉冤為任務的鄉議局，成為新界民間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致力於溝通新界官民、協調新界資源之開發，特別是監察政府的土地政策，維護原居民的利益。一九五九年，鄉議局被納入港府官方的諮詢機構。[29]

金文泰同意廢除被新界鄉民批評為不合理的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得到新界民眾的真心愛戴。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界鄉紳罕有地為金文泰五十一歲的生日祝壽。民眾除了在大埔舉行盛大壽宴外，還特意呈上〈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以為紀念。香港歷任港督中，能夠獲得民間團體自發為其祝壽，而且對其家庭成員也相當友善，大概只有金文泰一人。金文泰離任之後，香港有多處地景以之命名，如金文泰道、金督馳馬徑、金文泰中學、金夫人徑等。[30]

金文泰任職期間，香港的經濟和建設都得到長足發展。啟德機場、城門水塘、海底輸水管道、廣播電臺、九龍半島酒店等相繼建成。一九二七年，香港出現了第一家手電筒製造廠；一九二九年，華商總會設立了圖書館。雖然英國選擇新加坡而不是香港作為其在亞洲的軍事基地，但香港經濟貿易的發展領先於新加坡，逐漸成為當之無愧的「東方之珠」。

金文泰極有遠見，他在改善華人地位的同時，強烈建議英國永久佔領新界。一九二七年，他在一份給英國政府的電報中指出，鑑於中國各地都有人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得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

然而，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擔心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激化中國人的反殖民主義情緒，甚至讓英國受到列強的杯葛。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英國政府只是授權金文泰發表了一份語義模糊的聲明：「當內戰的戰火不幸在中國燃燒之際，英王陛下政府全力保護香港及其大陸部分，絕對不會交出香港，不會以任何方式在英國統治的大陸的任何部分放棄或削弱其權利或權力，英王陛下政府保有它們符合它的最高利益。」[31]

倘若金文泰的永久擁有新界的主張得以實現，香港是否可以免遭專制暴政的中共政權的接收？那麼，今天的香港，或者繼續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或者成為新加坡那樣的獨立國家，那是大部分對中國「一國兩制」的謊言失去信心的香港人夢寐以求的未來。金文泰離開香港六十年之後，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並未聽取港人的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說，港人遭到了出賣。歷史無法假設，錯誤令人扼腕，今天的香港人再也得不到英國的保護，必須直接面對北京政權，只能孤獨地展開一場牧童大衛面對巨人歌利亞的戰鬥。

重視中文教育，延續文化馨香

在歷代港督中，金文泰是最富於學者氣質的一位，他崇尚古典文學和藝術，精通多種語言，勤於著述。他曾將清代文學家招子庸所著的《解心粵謳》翻譯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嶺南情歌》），首次將《粵謳》介紹到英語世界。他還著有《英屬圭亞那華人》、《英屬圭亞那憲制史》等著作。一九二八年，著名印度詩人泰戈爾訪問香港，曾評價金文泰是「我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

早在十多年前，當時的港督盧吉爵士就認為金文泰才華洋溢，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學成立時提名其出任創校校長。事實上，金文泰曾大

力支持設立香港大學，一九一一年四月署任香港大學創校官守校董。當香港大學於一九一二年正式成立時，他更為大學撰寫拉丁文校歌，捐贈大批重要的中國典籍，並為大學的中英文化關係研究籌款。香港大學校方為表答謝，曾在一九一六年建議向金文泰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可是由於當時金文泰身在外地，結果要遲至十年之後的一九二六年，港大才向已貴為港督的金文泰頒發這一榮譽學位。

金文泰任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是他對中文教育之突出貢獻。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學於一九二七年增設中文系，聘請前清遺老賴際熙與區大典等教授中國經典。金文泰又響應周壽臣、羅旭龢等知名華人紳商的倡議，在一九二七年成立香港首間官立漢文中學，即為金文泰中學之前身。一九二八年，金文泰進一步頒布《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香港的中文學校與國民政府採用相同的「六三三」學制，讓中文學校學生能銜接到內地的學校課程。

辛亥革命之後，有一批前清遺民移居香港，逃避他們認為混亂不堪的民國的統治，延續古人生活方式，並成立教授傳統經典的學校。他們認為，香港非民國領土，故能在此繼承儒家道統。他們考證出九龍城有南宋末代皇帝躲藏過的宋皇臺，常往此處憑弔唱和，以南宋遺臣的事蹟肯定自己拒事民國的情操。省港大罷工以及中國赤潮氾濫，讓金文泰和羅旭龢等人意識到，復興儒家傳統文化或許可以抗衡激進左派意識形態，便以官方和民間的力量支持國學研究者。

一九一九年之後，五四運動中激進一翼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國共兩黨互相廝殺，卻都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的來源。反之，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得以保留並發揚光大，過去兩千年來處於中原文化邊緣地帶的香港，意想不到地成為一處比中原更「中華」的地方。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陰差陽錯地成為除了國民政府奠都之前的南京之外的最重要的文化保守主義基地。

金文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鍾愛和倡導，具有「雙重弔詭」的性質。第一重弔詭是：香港乃是英國從中國搶奪的殖民地，金文泰是英國政府任命的香港總督，是純種的白人。但是，二○年代卻由金文泰領頭在香港推行在中國本土已風雨飄零的傳統文化。金文泰在香港推動教育和學術朝向古典中國，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逆流。而在北國的故都北京，地位如同古代國子監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偏偏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共產主義學說發酵的基地，「比左」成為「比賽正義」的代名詞。這種文化立場的尖銳對立，讓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而設立的港大中文系，受到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魯迅等人的大力抨擊。此後歷史的演進證明，儒家文化早已喪失生命力，無力抵禦激進左翼學說的擴張。但是，金文泰及香港一批傳統文士的堅持並非

毫無價值，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錢穆為代表的「新儒家」群體移居香港，再次讓香港成為中國古典文史之學的重鎮。

第二重弔詭是，金文泰跟前任港督、持「白人優越論」的帝國主義者司徒拔不同，他真心實意地熱愛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卻在無意之間催生了香港本土意識、「脫北」意識之萌芽。正如史家所說，省港大罷工的衝擊，以及金文泰對「香港例外」的宣揚，使得港人有意與「深圳河以北的中國人」區隔開來，本土主義透過教育與傳媒，從精英流向基層，從而有力地形塑了「何為香港人」之身份認同，「如是者，幾代人接受同樣的教育，有著同樣的人生歷程，便會形成新生的國族。只待香港政府進行促進公民權的改革，再把港中邊界稍微封閉，香港就會成為一個實質上的國族國家」。[32] 當連香港的中學生都認同香港而拒斥中國的時候，金文泰無比熱愛的「文化中國」成了一個被解構的對象，這大概是作為「業餘漢學家」的金文泰始料不及的情形吧？

金文泰希望香港大學比北京大學更多地承傳中國的傳統文化，但近一個多世紀之後香港大學的學生們，在「香港」和「中國」發生衝突時，毅然選擇忠誠於前者。最早和最完整的香港獨立論述，就出現在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學苑》雜誌上。年輕一代的香港學子提出了並非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邊界、歷史、文化，加上逃離極權、追求自由的經歷來共同界定的「公民民族主義」。他們最終目標乃是香港獨立建國，「追求獨立是因為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自由民主的時代，國家主權當在人民身上，而港人亦理應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力，與世界其他各國平起平坐，這是理所當然的」。[33] 港大成為港獨思想的大本營，也成為北京政權的眼中釘──北京恨不得將這所香港的第一學府關閉。港大不是金文泰故意在香港埋下的「定時炸彈」──若金文泰讀到《學苑》雜誌上的文字，應該嘆息自己當年的作為乃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25　史迪威

當美國鷹遇到中國龍

如果我能夠證明中國士兵跟任何一個盟國戰士一樣出色，我也就死而

無憾了。

—史迪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軍第十五步兵團—被人們富於想像力地稱之為「龍團」—比美軍其他任何團執行的駐外任務都要多。比起其他部隊，它被「談論得多、寫得多、詛咒得多，想像得也多」。一種生動的說法是，它是唯一一個步兵們「用不著偷就能得到一瓶啤酒的地方」。[1]

第十五團的歷史跟美國國家的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它參加過南北戰爭、美西戰爭、美墨戰爭以及鎮壓菲律賓的起義者，它的一部分士兵也參加了遠征中國義和團的八國聯軍。一九○一年，中國與西方八國列強簽訂《北京議定書》，十一國取得在從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十二處駐紮軍隊的特權。同年，第十五步兵團被派駐天津，此後長期在此駐紮，直到一九三八年中日全面開戰後才奉命撤離。長達三十七年在中國的駐紮，使得第十五步兵團的盾徽上出現一條張牙舞爪的龍，龍象徵著中國古代的皇帝。這樣的設計背後，隱藏著耐人尋味的信息：當美國鷹遇到中國龍，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第十五步兵團的軍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看到盾徽上龍的圖案時，一定百感交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歲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抵達中國。在他到來之前六個星期，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讓兩千多年的帝制意想不到地終結了。當時，史迪威正在菲律賓的美軍中服役，與叢林中的叛軍作戰。他請假去中國，在中國停留十七天。他走馬觀花地看到帝國的崩潰，而普通人的生活仍在若無其事地持續。他看到繁華且西化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還以為到了費城。他也接觸到廣州街頭的叛軍，「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彈帶，彈藥很多，有些人提著手槍站在周圍，手指擱在扳機上」。[2]

八年之後的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史迪威被任命為美國陸軍駐華首席語言教官，派駐駱駝與汽車並行不悖的北京—那是他最喜歡的中國古都。他在專門為西方人開設的華北協和語言學校學中文，很快被中國的一切所吸引。一個月之後，在陸軍的一份問卷調查中，他對「最喜歡的職業」的回答是：「武官，中國。」就連母校西點軍校的教官職務都被他劃了「否」。

史迪威一生中先後四度派駐中國：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任美國陸軍駐華語言教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十五步兵團營長及代理參謀長；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長。他在中國的時間加起來長達十五年，接近其軍旅生涯的一半。其傳記作者形容他「有週期性離開美國的衝動」，而他首選的目的地就是中國。

「我們都覺得這是在回家」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史迪威一家度了暑假之後，再次乘坐陸軍運輸船前往中國，史迪威夫人寫道：「我們都覺得這是在回家。」

史迪威將中國當作「第二故鄉」。他不滿足於辦公室裡的文牘工作，抓住一切機會深入中國貧窮而苦難的底層社會。作為在鄉村長大的孩子，他更喜歡深入中國農村，與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為友，而不願受西方人外交圈子中的繁文縟節的束縛。

上一次到中國任美國陸軍駐華語言教官期間，史迪威就有過一次「吃苦」的機會：紅十字國際賑濟委員會將他借去山西，擔任建築公路的工程師和管理者。史迪威到工地現場奮戰了整整四個月，他手下有十二名西方助手，指揮著六千名中國農民工開啟山林──他們大部分都是在災荒中流離失所的災民，修路是唯一一份可以填飽肚子的工作。當時，官方和民間救災機構發動災民修建公路，僅在山西就有超過一千公里長的公路採取這種辦法修建。地方軍閥樂見其成，一方面可以利用公路增加軍隊的機動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公路運輸促進商業發展來增加稅收。

在風沙撲面的工地上，史迪威看到了在北京養尊處優的西方外交人員圈子裡看不到的中國的真相：中國缺少什麼，需要什麼，以及鐵腕人物閻錫山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史迪威背著野戰背包，裡面裝著筷子（他使用筷子比西式的刀叉還要嫻熟）、汗衫、罐頭食品和換洗的襪子。他發現了西方傳教士家庭喜歡的一處避暑地──玉濤河谷地，在那裡，整整一個盛夏租用一個老磨房只需要四十美元。他把家人接來團聚，也避開酷暑的北京。

閒暇時刻，史迪威繼續寫作的愛好，年輕時誰又不是「文青」呢？他創作短篇小說和異域生活特寫。他描寫中國人不是通過社會學和分析，而是根據自己的見聞和感受。他的作品情節簡樸，對話生動，他筆下的中國農民跟契訶夫筆下的俄國農民一樣栩栩如生，他沒有英國作家吉卜林寫亞非殖民地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種族優越感。他給《亞洲》雜誌投稿，獲得刊登，得到一百美元稿費。這些不知疲

倦地修路架橋的農夫，如同他日後將親手訓練的士兵，他們身上蘊含的巨大力量一旦被激發出來，就能改變中國。

成功地修築了山西的這條公路後，史迪威在這個特殊領域贏得了一定的名聲。這一名聲使得鄰省的軍閥馮玉祥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幫助主持修建一條從西安到潼關的公路。史迪威應邀來到破敗的古都西安，馮玉祥對築路似乎並不在乎，只想跟史迪威討論軍事方面的情況，比如有沒有可能向美國購買坦克和飛機。史迪威告訴馮玉祥，若是為了維持其轄區的安全，並不需要重型武器，何況馮並沒有與之配套的後勤與保養能力。史迪威發現，這名被譽為「基督將軍」、反覆無常的軍閥「只相信他自己」，那些被他用水龍頭施洗的士兵並不明白基督信仰的真諦。馮玉祥派給史迪威八百名勞力和四十名士兵，拿著「唐代的鎬頭和木鍬」開工了。路還沒有修完，一場新軍閥之間的戰爭就爆發了，工程被迫終止。

不同於大部分思想左傾的西方傳教士和觀察家，史迪威對馮玉祥持負面看法，而對閻錫山頗多好評。這兩個軍閥日後將在中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且他們也成為由北洋系統舊軍閥轉換成國民黨新軍閥的碩果僅存的兩位。當一九四二年代初史迪威以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的身份來到中國的時候，還會跟這兩個人打交道。

在史迪威之前，還有一位著名的美國人到中國採礦和修鐵路，那就是一八九九年到中國的、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在義和團的排外狂潮中，華北鐵路被拆得七零八落。義和團或農民擰開連接鐵軌的魚尾板，大段大段的道釘被拔走，將鐵路上的每一丁點兒金屬都搬到幾英里外的內地去了。被拆下來的鐵路散落在上千個村莊裡，鐵匠鋪未來幾年不用愁沒鐵可打了，四方鄉野一片歡騰。農民還拿走枕木當作建材和燃料。軍方需要鐵路來運送軍隊，維持治安。而胡佛服務的公司也需要鐵路運輸礦裡挖出的煤。軍方指派了一個軍官委員會，接管鐵路重建工作，作為礦業工程師的胡佛和一部分工程人員前去援助。在考慮如何收回所有鐵路材料時，鐵路管理方認為中國人會發現是鋼軌，而不是鐵軌，一點碎鋼屑都敲不下來，村民們一旦瞭解真情，可能會歡歡喜喜地出賣路軌，如果當局出個收購價，再加上既往不咎的諾言和抗命嚴辦的威脅。胡佛觀察到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場景：「我記得我們當時出價五個銀元換一節鐵軌。幾天以後，被毀路段兩側的田野裡出現了無數毛蟲般的隊伍，三、四十個村民抬著一節鐵軌，向我們緩緩走來。」[3] 一九一五年前後，胡佛撰寫了回憶錄，他憶起當年離開中國時，心中飽含著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刻骨銘心的崇敬和讚美」，他寫道：「百分之九十的勞苦大眾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幾乎每座村莊每年都會有人凍

餓而死。但他們忍耐而寬容，對家庭無比忠誠，為孩子傾注全部愛心。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長久。」

史迪威在中國去過的地方一定比胡佛更多。他酷愛旅行，他經常違反休假規定，虛報時間不等的出差任務，將從滿洲到兩廣的大半個中國全都走遍了。他在市井小民當中比在高級官員當中更輕鬆自如，他會說引車賣漿者生動活潑的語言。他常常好幾天在鄉間步行，有些地方的鄉民從來沒有見到過像他這樣的西方人。中國民眾一般對外國人挺友好，「他們都認為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他們對本國政治毫無興趣，只希望不受干擾地好好過日子」。

唯一親歷北伐戰場的美軍軍官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波特（Stephen G. Porter）提出的「波特決議案」，要求柯立芝總統與中國政府談判，廢除此前與中國簽訂的諸多條約中的不平等部分，使今後兩國間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在國會的壓力之下，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國務卿凱洛格（Kellogg）發表《對華政策宣言》，提出一旦「中國能協議任命可以代表本國的人民或當局的代表」，美國政府願意「就治外法權及關稅等全盤問題」展開談判，並重新簽署新條約。[4] 美國是西方列強中唯一主動提出與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的國家。

然而，南京事件為美國的這一努力蒙上了一層陰影。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第六軍程潛部攻入南京，劫掠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人商店、住宅、教堂、學校、醫院，並有多名西方人士遇害，是為南京事件。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MacMurray）稱此事件為「一九○○年義和團事件以來，中國對外關係上最令人不安的唯一事件」。列強擔心出現一場新的義和團排外運動，決定派兵到中國保護外交人員和僑民。當國民黨軍隊繼續北上時，美國派遣五千名海軍陸戰隊到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的官兵因為被裝備更加精良的海軍陸戰隊搶去風頭而很是不爽。

美國公使館需要對中國內戰的雙方作出評估，決定派遣能幹的軍官到前線戰場去偵察。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因為當時的中國人被煽

動起強烈的排外情緒，作戰雙方都警告外國人不要出現在前線。承擔這項任務的唯一人選是史迪威：他瞭解中國並精通漢語，以前常常在中國各地作冒險的旅行，精神頑強，隨機應變，「如果穿上中國服裝，臉上撲上適量的黃色化妝粉，就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中國人。起碼，他從未被人識破」。[5]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不能或缺的素質──他願意去，儘管要暫時丟下四個孩子和即將為他生下第五個孩子的妻子。

五月二十六日夜間，史迪威和一名中國助手老趙搭火車趕到徐州前線。雙方軍隊在這座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展開激烈爭奪，市中心幾度易手。史迪威看到了山東軍閥張宗昌麾下的白俄僱傭兵，他們擁有兩百節車廂、二十輛機動車和三輛鐵甲車。這些士兵沒有國家，性情殘忍暴烈，史迪威寫道，這是「我看到的最兇惡的人」。他對俄國人有一種天生的憎惡，正如他從來不喜歡裝腔作勢的英國人──儘管他父系的祖先是從英國移民美國的。他進而發現，表面上無比凶悍的白俄官兵，並不具備多大的戰鬥力，「如果這些烏合之眾上了戰場，即使再富於想像力，除了想像他們逃跑之外別無可能」。[6] 這樣的邏輯推理是成立的：南方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顧問是蘇聯紅軍的將領，在慘烈的俄國內戰中，紅軍打敗了白軍，在中國戰場上也將是同樣結果。

蘇俄十月革命之後，流亡遠東的白俄軍人數多達十萬左右。張作霖最早招募了一批白俄官兵為其所用，而成規模收編俄國白軍並用於中國內戰的是張宗昌。一九二二年秋，張宗昌收編白軍五百多人，由原沙俄步兵團長涅卡耶夫指揮。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宗昌的白俄軍首次登上中國內戰的舞臺，白俄的砲兵部隊給直軍以猛烈打擊。一九二五年，張宗昌掌握山東軍政大權之後，在濟南成立「入籍軍」幫辦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俄國人米洛夫任幫辦司令。白俄先遣軍第一梯隊由此成立，下轄步兵、砲兵、騎兵、裝甲列車隊等諸多兵種，兵力達兩千多人。直魯聯軍成立後，白俄僱傭軍更是擴張到三千多人，編為奉軍第六十五獨立師。其中，白俄鐵甲列車隊下設四列鐵甲列車，配備野戰砲、迫擊炮、重機槍等重型武器。[7] 史迪威在徐州郊外看到的大概就是這支隊伍。這支軍隊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國民黨軍隊二次北伐的山東戰役中覆滅，由於他們軍紀敗壞、殘害百姓，少數潰兵被地方民團擊殺。

在兵荒馬亂的前線，史迪威和隨從連果腹食物都找不到，幸虧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唐先生願意向他們提供食宿。在唐先生那裡躲藏了六天之後，據說北軍已潰敗、南軍已入城，他們才冒險出去觀察形勢。史迪威首次見到南方士兵，「多數是不到十六歲的孩子，肩頭窄窄的小矮個子，體重很輕」，基層軍官是看上去像學生的年輕人。南

軍的官兵對西方人並沒有傳說中那麼敵視。

他們等到一列南下的火車。在火車上，史迪威被一名警官搜身，查出他身上攜帶有手槍。他被看管起來，很可能會被當作間諜槍決。當火車緩緩駛入南京郊區的浦口站、還未停定的瞬間，史迪威跳下火車拔腿狂奔，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背後的追兵。然後，他找到一艘渡船，進入上海，安全抵達鐵絲網背後的上海租界。租界方面派遣了一艘舢板，將他送到停泊在海邊的美軍「匹茲堡號」巡洋艦上。在那裡，他提筆撰寫報告。

四十四歲的史迪威像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一樣完成了這場冒險之旅。他向上級提交了關於中國戰局的第一份權威報告。美國公使對其「勇敢無畏的個人品質」表示「極為敬佩」，軍方則表彰他「極高的效率、軍事智慧、超群的決心和勇敢的舉止」。美國駐華部隊司令官卡斯特納將軍讚揚說：「跟戰友一道時表現勇氣往往可以被人看見，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樣的使命都需要一種更高的勇氣—要孤立無援地近距離接觸兩支互相敵對的中國軍隊的幾百名無知的、對外國人充滿敵意的中國人。」[8]

史迪威回來一個月之後的七月，他的第五個兒子班傑明出生了。他特別疼愛這個兒子，也許因為他在這次漫長的旅途中，在若干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時，一直在思念這個尚在母腹中的孩子。

史迪威的報告讓美國駐軍和外交官鬆了一口氣。美國政府以較為溫和的方式跟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商討南京事件的善後事宜。中美寧案協議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後與外國達成的第一個重要協議，為南京政府獲得國際之承認，邁出一大步。由此，美國政府強化了對國民政府內部溫和派的影響力，也提高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同年十一月，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南京政府，但沒有回應南京政府提出的將美國公使館從北京遷至南京並升級為大使館的要求，可見美國對南京政府的前途尚持觀望態度。[9]

一九二八年五月，史迪威晉升中校，成為整個駐華美軍中最受歡迎的軍官。他被視為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並兼任第十五步兵團語言學校校長，每月在娛樂廳介紹中國局勢，他的演講極受歡迎。他還在第十五步兵團的《崗哨報》撰寫一個名為「中國局勢中的重要人物」的專欄。在一篇關於蔣介石的文章裡，他認為北伐「更像是一次示威，而不像一場戰爭」。他對中國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憫，更有嚴厲的批評和規勸：「中國像是一個玩弄剃刀的小孩，除非有人趕快把剃刀拿走，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認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只是一個「字面上的共和國」，北伐勝利的現實「並不能改變典型的中國軍事

強人的本性，國民黨黨旗的更換以及五色旗、奉天旗的臂章無法區分愛國者和土匪」。[10] 史迪威一語道破了北伐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及其內在的矛盾：被蔣介石收買的軍閥，比被他打敗的軍閥更多。然而，北伐因偏離了「打倒軍閥」的原初目標，勝利之後反倒產生了四個新的軍閥集團，隨即這些新軍閥又開始了一場比北伐規模更大、死亡士兵更多、波及民眾也更多的中原大戰。

「酸醋喬」與「花生米」的對峙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遭日本人偷襲的那一天，五十八歲的陸軍少將史迪威鎮定如常，他的內心深處甚至有一絲不該有的喜悅。他訪問過日本多次，早已洞察日本稱霸亞洲、吞併中國的野心，這個野心必然與美國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可惜，在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的美國高層，沒有人願意聽取提防日本的建議。這一天，歷史為之改變，史迪威的人生也為之改變。如果美國不是被動捲入這場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史迪威的多姿多彩卻並未「物盡其用」的軍旅生涯很快將畫上句號。如今，退伍不可能了，廣闊的戰場正等待著他縱橫馳騁。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正在率領第四軍防守加州海岸線的史迪威，突然接到赴華盛頓接受新任務的命令。他原本以為，作為一名上過一戰戰場的老兵，他將受命率領美國赴北非作戰的第一支集團軍，參加大西洋一側對抗德軍的軍事行動—當時對全美陸軍四十幾位與之同級別將領所做的綜合評價，史迪威以驕人的成績名列第一。殊不知，史迪威的老朋友和老上級馬歇爾將軍（George Catlett Marshall）有另外的計劃：將史迪威派到太平洋一側的中國戰場，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長，並將其提升為中將。

或許，在一九二六年年末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天津，史迪威為第十五步兵團指揮官馬歇爾服務的那些日子，讓馬歇爾對他的勇氣、睿智、熱情和無與倫比的中國知識感受很深，因此將他列為美國派駐中國戰區軍事代表的第一人選。確實，史迪威對中國和遠東的瞭解超過任何一位現役軍官，他在中國的探索使他有了別人無法企及的背景知識。

陸軍部長史汀生在與史迪威面談之後，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敬謝不敏。他們記憶中我是個可以任意虐待的中校。他們看見我一腳踩在泥沼中，與苦力一起，和士兵一同擠火車。」不過，作為士兵，他的回答乾脆俐落：「讓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史汀生說：「命運之神的手指，已經多次指向你。」[11]

在接見史迪威時，面對兩大洋凶險的戰局，馬歇爾沒有閒情逸致回憶他們在天津度過的美好日子，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任職中國的使命是「協調、穩定、管理滇緬公路，結合不同派系，掌握指揮權，指派他們各類任務，不計代價」。史迪威向來我行我素、快人快語，並不是善於「協調」的人（綽號「酸醋喬」），這個任務對他有些勉為其難。而陸軍部給他的正式指令是：「強化美國給予中國政府用於作戰之援助的有效性，協助改善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這個任務本身就包含了若干內在的矛盾：「強化」與「協助」之間，有時指向南轅北轍的兩個目標，而蔣介石的派系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在華利益三者之間往往並不重合。

史迪威在第十五步兵團任職期間，正值蔣介石率軍北伐。史迪威只是步兵團的中校營長和參謀長，是一名對中國和美國都無足輕重的基層軍官；而蔣介石是一顆冉冉升起的軍事和政治明星，是袁世凱之後中國最有權勢的強人—辛亥革命推翻了紫禁城裡的皇帝，卻未能改變中國人心中的「皇帝意識」，這種「皇帝意識」呼喚「真命天子」。在史迪威這個旁觀者眼中，蔣「作為國民黨所謂的委員長」，是一個「被吹噓為將華盛頓、拿破崙和凱撒結為一體的人」，他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就連竭力為蔣介石辯護、並批評史迪威在中國的做法不切實際的史學家方德萬（Hans J.van de Ven）也承認：「北伐沒有造就一個穩定的國家，而是留下了一大堆難題，諸如個人的敵對、軍事的分裂、地方的殘暴，以及國民黨既要應付又深陷其中的暴力文化。新的國民政府毫無公共威望，為債務和膨脹的軍事所累，面對著強大的敵人，並為與之來往的犯罪集團和白色恐怖中謀殺對手的迫害所玷汙。」[12]

等到一九四一年史迪威再來中國時，表面上他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是中國戰區的第二號人物，但他手上除了幾十位參謀人員外並無一兵一卒。蔣介石不願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但史迪威掌握了美國援助的武器和軍需品分配，蔣不得不對其曲意奉承。兩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上下級關係以及個性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兩人很快彼此憎惡。史迪威在日記中替蔣取了「Peanut」（笨蛋、沒用的小人物，直譯是「花生米」）的綽號，說蔣是第二個「葉名琛」[13]，甚至將蔣介石的黃山行館稱為「Berchtesgaden」（希特勒山莊）。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差異如同冰火般不相容。史迪威是典型的美國南方人，具有美國南方人率直的性格，他無法去討好一個自己不尊重的人，他因說話尖酸刻薄而有「酸醋喬」的綽號；蔣介石則是典型的中國南方人，具有中國南方人內斂的性格，他常用「口蜜腹劍」的方式迷惑敵人，史迪威給蔣取的另一個綽號是「響尾蛇」。史迪威畢業於西點軍校，受過世界第一流的軍事教育，他本人是美軍中卓越的將領和軍事教育家；而蔣介石甚至沒有完成初級的軍事教育，他的「勝仗」大部分不是從戰場上獲得的，而是通過收買對手、合縱連橫贏得的。史迪威是農家子弟，與子弟兵一起風餐露宿，習慣了一副普通士兵的打扮；蔣介石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時代一度混跡於社會底層，掌權之後便如帝王般深居簡出，很少公開表露喜怒哀樂。史迪威是一名職業軍人，其思考的終極目標是如何在戰場上打敗敵人，並竭力減少手下官兵的傷亡；蔣介石是一名狡猾的政客，軍事永遠為政治服務，他的著眼點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實力。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更包含了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也可以歸入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

一九四四年七月，國民黨軍隊經歷了新一輪的大潰敗，重慶面臨抗戰以來最大的危機。史迪威巡視桂林之後發現，一切混亂不堪，他相信桂林即將淪陷。九月十五日，他到重慶與蔣介石「談了一個半小時的廢話」，「全是尋常人都知曉的蠢道理，白癡透頂的戰術、戰略概念。他根本扶不起」。次日，史迪威與宋子文會談，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希望蔣委員長能了解，我並非覬覦這個職位，我試圖告訴中國人，如何能抬頭挺胸，重拾他們的尊嚴，但兩年半以來，我不斷遭人敷衍、漠視，飽受欺騙，像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14]

美國對蔣介石喪失了信心。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呈送給羅斯福總統一份建議書：「依我們之見，時機已經成熟，中國所餘之權力資源宜委由一人指揮。此人必須有能力以有效的方法抗衡日軍。在中國政府或軍隊裡，無人有此能耐協調中國軍隊迎戰日軍的威脅。戰爭期間，唯有一人能指揮中國軍隊以有效的方法擊潰日軍。此人就是史迪威將軍。」[15] 在魁北克與丘吉爾會談的羅斯福總統看到這份建議書以及史迪威給馬歇爾的信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要求「讓史迪威將軍不受約束，指揮您所有部隊」，並聲稱「這有助於增強我們決策時的決心，促使美國亟需努力維持、增加對您的援助」。

九月十九日，史迪威手持羅斯福總統的電文面見蔣介石，要求其交出兵權。史迪威將這封信看成是「最驚天動地的一根爆竹」，蔣介石看到信之後，「臉色變得鐵青，啞口不語，兩眼直視」。[16]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羅斯福來電，欲派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並

以一切租借物質置於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國內政之心，昭然若揭矣。」蔣擔心失去軍隊的控制權之後，自己的獨裁地位會崩解，他卻祭出內政和主權等觀念來，希望國人與之同仇敵愾──確實有不少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家因此而同情蔣介石。[17] 其實，戰時由盟國的將領指揮多國軍隊，並非干涉內政，也非侵犯主權，艾森豪威爾不就統率美軍和歐洲各同盟國軍隊實施諾曼第登陸嗎？

蔣介石決定跟羅斯福豪賭一把。他孤注一擲地提出，若史迪威在中國，中國便退出對日作戰，他看準了「美國實有藉華制日之必要，即使敗日以後，將來亦有藉華以制俄之必要。美國實不能無中國」，故而敢於拒絕羅斯福任命史迪威為中國軍隊統帥的要求。[18] 最終，羅斯福退縮了，按照蔣介石的意願撤換了史迪威──同時，為了安慰這位功勛卓著的將領，將史迪威提升為上將。

史迪威的繼任者是他在第十五步兵團時的同僚與後輩魏德邁將軍。魏德邁比史迪威性格圓融，但他很快就抱怨說，「擔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蔣個性「異常敏感，做事像女人一樣全憑直覺」，蔣和底下的人「力不從心，驚慌失措，他們缺乏從事現代戰爭必備的井然組織、有素訓練及精良裝備。他們一味在政治上勾心鬥角，虛張聲勢。」看來，無法合作的人，不是史迪威，而是蔣介石。

他的理想是為中國打造一支現代化的軍隊

一九七七年，維吉尼亞軍校一九二七年畢業班的學生，為了紀念畢業五十周年，特別出版了一本紀念冊。凡是能夠聯絡到的同學，大部分都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經歷。一名中國籍同學如是寫道：

> 我一九二七年畢業後回到中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混亂狀態，軍閥割據，土匪掠奪於鄉間，國民政府無能為力。我也面臨著種

> 種困難。我好像到了外國，一切都需從頭開始。我願意接受任何職位，不管官職高低，仍是走投無路。……我終於找到一個位置，在蔣委員長麾下服務，大部分時間在戰場上度過，曾參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負了傷，並且被日軍俘虜達六個月之久，最後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率領軍事代表團到香港，後來復員，在那裡開了一家餐館，並且辦了一家私立中學。總之，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但也無愧於母校。[19]

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周雁濱，一九○一年生，是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的同期同學。他沒有孫立人那麼顯赫的成就，不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升任少將，也算是一名身經百戰的將軍。他的晚年在自由的香港經商和辦學，比被軟禁在台灣的孫立人幸運多了。

一九二七年，作為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生，周雁濱回國找工作，四處碰壁。這不是他一個人所獨有的遭遇，孫立人最初也遇到挫折，屈就中央黨務學校軍訓隊長、陸軍教導師排長等卑微的職位。[20] 這些優秀的「海歸」人才回到祖國卻英雄無用武之地，說明中國的近代化並未真正展開──雖然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讓大多數國民黨領導人感受到長期停滯的中國近代式國家建設時刻最終到來了，但大多數國民黨成員並沒有在「什麼是近代式國家」，以及「中國需要怎樣的改革」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21]

同樣是留美歸來的蔣廷黻，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第一次到新國都南京，尋找報效國家的機會。他看到的一切卻讓他大失所望：首先入目的是病馬拖著破車，農人們在城中種菜種稻子，水塘、沼澤、半塌的廟宇、光禿的小山、高低不平且塵土飛揚的大街、破爛的店鋪。外國人打趣中國的軍隊，說他們的將軍說話太多，士兵無紀律，營養不良。槍械不統一，有來福槍、有手榴彈、有手槍、有機關槍，還有雨傘。[22]

蔣介石的軍隊打敗了軍閥，但它並非現代化的軍隊──就連蔣介石本人都弄不清楚中國究竟有多少軍隊。南京政府的前十年，軍費開支

在整個國家預算中的比例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遞減，使得軍隊的現代化遙遙無期。[23] 蔣介石專用黃埔軍校畢業生，不信任「海歸」人員。蔣用人的標準是對其個人忠心，而非是否具備真才實幹。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若非在緬甸戰場遇到慧眼識英才的史迪威，孫立人大概難有機會立下不朽戰績。如果史迪威是中國真正的最高統帥，孫立人、周雁濱這樣才華橫溢、訓練有素的年輕人，必定會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其人生理想。

史迪威善於練兵，在第十五步兵團擔任參謀長時，推行過嚴厲的「減肥計劃」，讓長期生活安樂的官兵們叫苦不迭。在任教西點軍校時，他更以嚴厲出名。一天清晨，他在長跑時發現兩晚上沒有回校的軍校學生，那兩傢夥拔腿就跑，四十歲的史迪威從學校東門一直追到西門，一步也沒有被甩下。當史迪威獲得准將軍銜時，收到許多賀信，其中就有一名被追的學生，他說：「我永遠支持你。」這個學生就是後來歐洲戰場的傳奇人物巴頓將軍（Patton）。

一九四一年年底，史迪威赴中國戰區，等候他的是大廈將傾的緬甸戰場。如同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下逃離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一樣，史迪威也經歷了平生最恥辱的一次慘敗。這不是他的過錯，在緬甸的中國軍隊跟他一九三○年代末期觀察到的中國軍隊一模一樣，他們「犯了基本的軍事錯誤：忽略戰略和戰術的基本原理，使用支援性的武器不當，漠視軍事情報的作用，沒有能力採用健全的指揮和幕僚作業程序，未能建立通訊網絡，無法使車輛、武器維持堪用狀態」。

在此後兩年多時間，史迪威幾乎以一人之力，以自己的經驗與方式訓練中國駐印遠征軍，並領導這支軍隊實現一九四三年底緬北反攻的大捷──日軍在戰場上從未遇到過戰力如此之強的中國軍隊，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十八師團幾被澈底擊潰。據日軍戰史記載：「敵軍原來是中國軍第三十八師（孫立人師）一支勁旅，和第十八師團過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國軍隊，在質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過去，日軍以優異的單兵作戰能力及較先進的裝備，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都有壓倒性的攻勢。尤其是這個由九州編成，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師團轉戰中國，同中國交戰最有自信，豈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國駐印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

史迪威曾向蔣介石提出過一個幫助中國訓練三十個師（後來擴展到九十個師）的現代化軍隊的宏大計劃。如果該計劃實現，中國足以打敗日本，戰後中國的命運可能截然不同──這支現代化的美式軍隊，一定可以戰勝蘇俄幫助武裝的共產黨軍隊，正如追隨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上作戰的威廉．佩爾斯將軍（William R. Peers）所說：「我自己堅

信，如果史迪威將軍裝備、組織並訓練中國地面部隊的計劃得以完成的話，那麼一九四四年日本步兵就無法摧毀華南的空軍基地……而抗戰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也不可能達成他們的目標。」[24] 然而，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計劃。因為，這支軍隊如果練成，將是美軍那樣的國防軍，而不是為蔣介石看家護院的私人軍隊。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失去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他寧願接受失敗的羞辱，也不願擁抱不被他個人所獨佔的勝利。

國共內戰的失敗就無法避免了。史迪威訓練的孫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隊，被稀釋到混亂而龐大的國軍系統中，被無能甚至心懷不軌的高級將領胡亂指揮，在東北戰場上先勝後敗，最終灰飛煙滅。遭到排擠的孫立人被調到台灣訓練青年軍，孫立人使用的正是史迪威的練兵方法。這支青年軍贏得了金門保衛戰的勝利，奠定了台灣的安定以及此後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在此意義上，守住台灣的功臣不是蔣介石，而是史迪威。

不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在睡夢中死於胃癌的史迪威，再也無法知曉這一切。關於史迪威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卡爾森上校評價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從來沒有出現另一個像他那樣對中國忠心耿耿的朋友。」二十世紀對中國的各種外來影響中，如果說鮑羅廷是最大的惡意的那一極，那麼史迪威就是最大的善意的另一極。

史迪威在中國的努力，即便不能說是失敗，也算不上成功。戰後，美國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標準「改造」了曾經在戰場上與之殊死搏鬥的敵人—日本與德國，使它們成為亞洲和歐洲的穩定而富足的民主國家。但是，美國未能如願以償地「改造」戰時作為其盟友的中國。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美國總統塔夫脫在國會發表演講，對中國「在近代化的影響下發生的震撼全國的內戰」表示關切，聲稱「將竭盡全力對中華帝國和它的人民實行傳統的同情友好政策」。[25] 雖然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在南北之間抱持「嚴格的中立態度」，但實際上它更傾向於支持革命黨。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宣佈退位，中國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美國國會兩院發表聯合決議對此表示歡迎：「鑑於中國人民已經成功地表明主權來自人民」，同時又由於美國人民「本質上、傳統上對採取代議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國「祝賀中國人民承受了自治的權力、義務和責任」，並希望共和政體「能夠保證中國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進步」。

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美國政府對其大力支持。美國政府參與了國民政府的各項改革，包括經濟、財政、交通等項改革與現代化。所謂國民政府「黃金十年」之成就與美國之援助，有相當大的關係。中美的友好關係正如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所言：「一九二八年僅憑藉上帝的仁慈，和凱洛格、詹森（助理國務卿）兩人可靠的直覺，促進了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解，美國人再次把自己視為『中國主權的維護者』。」[26]

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對華外交，始終存在著一種司徒雷登那樣的傳教士式的單純與樂觀的心態：善良的中國人民一旦接受美國的文明與價值，這個龐大的國家將不再是張牙舞爪的惡龍，而成為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這種美好的「中國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至今沒有回頭。史迪威為中國訓練的那支軍隊已不復存在，史迪威在山西修築的那條公路消失得更早：就在那條公路竣工十一年之後，史迪威的朋友、國際新聞社記者約翰．格林寄給他一份《字林西報》的簡報，談及中國政府對公路缺少維護，那條從汾州到黃河的公路從來沒有進行任何維護，「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27]

注釋

01 吳佩孚：五色旗才是真民國

1 章君穀：《又談吳佩孚》，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109。

2 中州散人《吳佩孚憑通電成霸業經

過》，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96-97。

3 《吳師長佩孚通電》，《大公報》，1919年6月11日。

4 李鵬程：《吳佩孚評價之我見》，見《吳佩孚新論：吳佩孚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351。

5 陳冠雄：《奉直戰雲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1。

6 章君穀：《又談吳佩孚》，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110。

7 陶菊隱：《大風

思猛士》，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頁9-10。

8 瀨江濁物：《吳佩孚正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49-150。

9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頁290。

10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頁46。

11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

130-131

12 張一麐：《直皖秘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5。

13 《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209。

14 陳冠雄：《奉直戰雲錄》，頁137。

15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71。

16 章君穀：《吳佩孚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445。

1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

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76。

18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129。

19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75-576。

20 老隨員：《馮玉祥抽後腿．吳佩孚摔得慘》，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72-73。

21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67。

22 章君穀：《吳佩

孚傳》，頁594。

23 陶菊隱：《大風思猛士》，頁153。

24 陶菊隱：《大風思猛士》，頁154。

25 白堅武：《白堅武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501-502。

26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71-72。

2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85

28 楊森：《吳玉帥遊川》，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130。

29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36-837。

30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下），頁855。

31 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鬥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見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57。

32 《章炳麟通電》，《申報》，1926年8月15日。

33 章太炎致孫傳芳

電，《晨報》，1926年9月10日。

34 1927年5月4日，國民黨控制的「各團體」紀念五四，通過決議，其中之一是請國民政府通緝「學閥」，指定為章太炎、張君勱、黃炎培、劉海粟、張東蓀等人。6月16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又以「通緝學閥事呈中央」，第一名「著名學閥」仍是章太炎。該公文聲稱，章太炎等人「不知斂跡，且活動甚力，顯係意圖乘機反動，殊屬藐視法紀」，所以要「儆反動而申黨紀」。然而，章太炎並非國民黨黨員，黨紀跟他有何關係？這種以「反動」為名打擊異己的做法，是二十世紀專制主義鉗制言論自由的新花招。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下），頁888。

35 章太炎致李根源書，1928年5月27日，載《近代史資料》，總36號，頁153。

36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64。

3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137。

38 陶菊隱：《大風思猛士》，頁210。

39 章君穀：《吳佩孚傳》，頁658。

1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112。

2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36。

3 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91。

4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第113頁。

5 《國軍政工史稿》，台北：國軍政工史編委會，1960年，頁290。

6 《孫聯帥之三愛主義》，轉引自傅幼玲：《孫傳芳與浙江自治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16。

7 何德騫、潘榮：《孫傳芳：北洋鐵翼》，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161、356。

8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頁135-136。

9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1頁。

10 《孫傳芳昨就淞滬督辦職》，上海《申報》，1926年5月6日。

11 上海《字林西報》，1927年5月8日，轉引自何德騫、潘榮：《孫傳芳：北洋鐵翼》，2016年第1版，頁184。

12 何德騫、潘榮《孫傳芳：北洋鐵翼》，頁185。

13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頁150。

14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頁155-156。

15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

文化》，頁157。

16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91-194。

17 陳炯明《陳炯明集》（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086。

18 傅幼玲：《孫傳芳與浙江自治運動》，頁124-125。

19 傅幼玲：《孫傳芳與浙江自治運動》，頁64-66。

20 《江蘇修訂禮制會之發起》，上海《申報》，1926年8月9日。

21 王曉華《東南王

孫傳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86-187。

22 王曉華《東南王孫傳芳》，頁188。

23 王曉華《東南王孫傳芳》，頁189-190。

24 《孫傳芳抵滬之通電》，上海《申報》，1926年5月4日。

25 《縣議會代表由杭返滬》，上海《申報》，1925年12月20日。

26 《孫傳芳昨假總商會招待各界》，上海《申報》，1926年5月6日。

27 本內特

（William J. Bennett）：《美國通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8-179。

28 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第191頁。

29 當時即有史家評論說：「孫氏事業，若早建立數年，其成就或不止此。惜乎創業未久，根基未固。」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397。

30 錢進、韓文寧：《孫傳芳幕府與幕僚》，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78。

31 1925年12月，孫傳芳整編五省聯軍，兵力二十多萬，有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空軍、機械兵（駕駛戰車）以及無線電通信兵等兵種，偏偏未設海軍。大概孫傳芳認為，只要與海軍強國英國保持友好關係，就不會受到來自海上的攻擊，因此不必籌建耗資巨大的海軍。他卻未料到，他被北伐軍趕到長江以北之後，要想南下反攻，必須渡過長江，而沒有海軍，渡江會異常困難。龍潭之戰前夕，孫軍的渡江工具僅有木船和小火輪，一艘只能載人五十至一百人左右。孫軍多為在山東等北方省份招募的新兵，不熟悉水性，遭到此前答應中立的楊樹庄派遣的艦隊攻擊，遂死傷慘重。即便僥倖抵達對岸的官兵，許多亦在江邊的蘆葦地淹死，對其士氣影響甚大。若孫軍有一支艦隊封鎖長江，炮轟北伐軍陣地，

進可攻，退可守，則此戰勝負可能易位。參閱何德騫、潘榮：《孫傳芳：北洋鐵翼》，頁155-156、頁284-285。

32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96。

33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轉引自何德騫、潘榮《孫傳芳：北洋鐵翼》，頁287。

34 刺殺孫傳芳之後，施劍翹當場被捕，被判刑入獄，後來被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特赦。中央政府直接干預司法獨立，在當時頗為罕見。有人認為，施劍翹的背後是國民黨藍衣社，這是藍衣社特務策劃的謀殺。施劍翹的胞弟施則凡為南

京軍事委員會交通研究所總隊長，其堂兄施仲達為南京軍官教導隊團長，兩人為其提供線索和特製的勃朗寧手槍，並幫助其起草《告國人書》，暗殺非施劍翹一人所為。因為孫傳芳與北方的國家主義派來往，公開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才遭致殺身之禍。參閱王曉華：《東南王孫傳芳》，頁348-349。

03 張作霖：「好總督」與「壞國王」

1 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61。

2 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30。

3 常風編：《張作霖》，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203-204。

4 薛觀瀾：《北洋官場現行記最後一幕》，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301。

5 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4。

6 參閱大江志乃夫：《炸死張作霖：昭和天皇的統帥》，日本：中央公論社，1989年。

7 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18。

8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71。

9 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97。

10 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頁35。

11 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13。

12 滿蒙的地位，取決於近代以來的條約體系，而非空穴來風的「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說

法。歷史學者劉仲敬指出：「滿蒙問題在世界史和國家法的意義上，酷似佛蘭德、科索沃和燕雲十六州。中國歷史學家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最大限度地損害國民智力和國家利益。他們假定中華民國有權隨意改變長春或庫倫的政體，猶如隨意任免河南駐馬店的地方官。」參閱劉仲敬《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14。

13 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1897-1942）》，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165-166。

14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頁133。

15 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頁56。

16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頁134

17 東三省的物產進入了國際貿易領域。從一九○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大豆產量增加三倍，從三千九百九十萬增加到一億五千八百萬蒲式耳，而這期間的世界大豆供應，幾乎有一半來自東北三省。一九○三年，該地區的對外貿易僅佔全國的百分之三點五，但到了一九二八年，其比率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從一九二○年起，東三省每年的外貿都有相當大的出超，這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情況截然不同。一九一三年，東三省貿易順

差為三百萬兩；到了一九二八年，上升為一億零五百萬兩。而同一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逆差則由一億六千九百萬兩上升到三億一千萬兩。東北對整個中國經濟日益增長的重要性，用下面這些數字——即用一九二九年奉天一個省的經濟上在全國所佔的比重來表示，也許看得最清楚：奉天省煤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鐵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鐵路里程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七，外貿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五，發電量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五，豆類產量佔百分之八十五點五，而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二。參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14-15。

18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頁136。

19 盧作孚：《盧作孚自述》，合肥：時代文藝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頁153。

20 盧作孚：《盧作孚自述》，頁117。

21 臼井勝美著、陳鵬仁編譯：《中日外交史（北伐戰爭）》，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年，頁46。

22 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頁204。

23 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頁192。

24 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頁207。

25 頁163-164。

26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368。

27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99

28 劉仲敬：《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頁311。

29 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051。

30 張氏帥府博物館陳列資料。

31 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頁267-268。

32 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頁185。

33 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頁186。

34 《俄羅斯對外情報綱要》（第三卷），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1年，頁207。

35 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08。

36 這個小組所從事的工作撲朔迷離，即便是專門研究蘇聯在中國的間諜活動的歷史學家烏索夫也只是蜻蜓點水般地寫道：「一九二八年，由北京來的拉脫維亞人薩爾嫩、保加利亞人維納羅夫和從莫斯科派來的年輕特工埃廷貢等人，在哈爾濱組成一個特別小組。他們在工業企業主韋格杰卡擁有的罐頭廠掩護下工作。維納羅夫的妻子列別捷娃從北京轉至哈爾濱遠東銀行工作，依然是該小組的密碼員。」參閱維克托．烏索夫：《蘇聯特工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136。

37 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14。

38 張學良並沒有膽量在戰場上抵抗日本。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張學良在北平醉生夢死，命令東北軍全線退入關內。時人皆稱：「大帥（張作霖）在，必不至此！」如果沒有皇姑屯事件，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由溥儀當皇帝的滿洲國，也不會有張學良成為地下黨員、發動西安事變，致使共產黨獲得合法地位、不斷壯大，最終擊敗國民黨、奪取中國的統治權。日本也未必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戰爭的真正得利者卻是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張作霖一生反共，死於蘇共之手，倒是死得其所；唯一讓他死不瞑目的是，他的兒子張學良成為共產

黨員和共產黨崛起的墊腳石。

39 莫洛佳科夫主編：《東京審判之秘聞實錄》，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42。

40 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22。

04 蔣介石：危機四伏的巔峰時刻

1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頁278。

2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頁65。

3 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181。

4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頁296。

5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53-54。

6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頁300。

7 方德萬（Hans J.van de Ven）：《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頁127。

8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台北：聯經出版，2013年，頁213-214。

9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頁186。

10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83。

11 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台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

218。

12 蔣常常向前線指揮官頒發手令，並深受詬病。學者則指出，軍事將領喜好越級指揮作戰，乃是在長期指揮小兵團的環境中所養成的習慣，加以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訓練與經驗所致。見張瑞德：《山河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203-204。

13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07。

14 阿基莫娃：《在中國服務的兩年，1925-1927年》，轉引自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南寧：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第1版），頁214-215。

15 賞罰不明、寬嚴皆誤，是蔣介石治軍的最大弱點。在此後的剿共及對日戰爭中，蔣的嫡系將領如胡宗南、湯恩伯等人打過很多丟臉的敗仗，蔣卻刻意回護，不加處罰；反之，戰功彪炳的孫立人、薛岳等，因為不是蔣的嫡系，而未得到應有的獎賞。參閱黃道炫、陳鐵健：《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34。

16 張瑞德：《山河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頁240。

17 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台北：聯經出版，2015年，頁218。

18 楊天石：《蔣介石崛起與北伐》，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14年，頁386。

19 布賴恩．克羅澤（Brian Crozier）：《蔣介石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頁82。

20 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台北：八旗文化，2014年，頁188。

21 戴鴻超：《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文化，2015年，頁180-183。

22 楊天石：《蔣介石的崛起與北伐》，頁129-137。

23 北伐期間，從蘇俄引入的「反革命」一詞已經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階層中流傳開來，武漢國民政府司法部專門制訂了《反革命罪條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恐怕沒有其他刑名像反革命罪一樣虛實相因、真偽難辨、寬嚴無度的了。這一罪名將要在此後七十年間衍生出腥風血雨。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120。

24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229。

25 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蔣介石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1年，頁124。

26 黃堅立：《艱難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41。

27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頁302。

28 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台北，與蔣介石談判。蔣說，只要美國積極援助我們，反攻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經杜勒斯駁斥之後，蔣又說，沒有美國同意，我們不會反攻。參閱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台北：衛城出版，2015年，

頁373-374。

29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頁302。

30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168。

31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115-116。

32 王人博：《中國近代憲政史上的關鍵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頁213。

33 王軍：《首都計劃的百年大夢》，見王軍：《歷史的峽口》，北京：中

信出版社，2015年，頁117-118。

34 何廉：《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頁117-118。

35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頁299-300。

36 本來宋母希望婚禮在宋家常去的衛理公會教堂內舉行，但蔣介石並非基督徒且是再婚，衛理公會教堂牧師江長川拒絕主持這一婚禮。當過黎元洪英文秘書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勉為其難充當證婚牧師，而忘記了此前幾個月的「南京事件」中，蔣介石默許國民黨軍隊對西方人士尤其是傳教士發

動的暴力攻擊。

37 漢娜．帕庫拉（Hannah Pakula）：《宋美齡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頁132。

38 據上海《時報》採訪主任金雄白報導，在戈登路的大華飯店是上海最豪華的西式大飯店。當時米價還是每擔三元的時候，大華飯店一碟牛排就要價四元了。

39 布賴恩．克羅澤（Brian Crozier）：《蔣介石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頁84。

40 漢娜．帕庫拉（Hannah Pakula）：《宋美齡傳》，頁190。

41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有張聞天、王明、王稼祥、鄧小平、左權、伍修權、烏蘭夫、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等後來在中共政權中的顯赫人物，他還與馮玉祥的十五歲女兒馮弗能產生了一段戀情。參閱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32。

42 陶涵（Jay Taylor）：《蔣經國傳》，台北：時報出版，2000年，頁47。

43 蔣經國在其關於蘇俄生活的回憶錄中並未提及這一段遭遇，歷史學者認為當時他很可能並不知道此事：「這一次的危險如果不是蔣經國一生中經歷的最危險的一件事，至少也是他旅蘇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危險的一件事……他在不知不覺中鬼使神差地躲

過了這一劫。」參閱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頁340。

44 在摒絕親情上，蔣介石跟史達林一模一樣：史達林的長子雅可夫被德軍俘虜，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提議用被蘇軍俘虜的保盧斯交換，史達林斷然拒絕：「我不會用一位元帥與一個中尉來互相交換。」這些細節常常被極權政府用以宣揚領袖之大公無私。其實，獨裁者之所以成為獨裁者，早已泯滅了正常人的情感。

45 作家柏楊輯發表了美國著名漫畫「大力水手」，他沒有覺察到漫畫中的父子與現實中的父子頗為相似—他們都逃到小島上相依為命。這組漫畫為柏楊贏得了綠島的漫漫刑期。獨裁者是不能諷刺的。

46 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頁189。

05 汪精衛：縱橫憂患今方始

1 聞少華：《汪精衛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頁314。

2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香港：天地圖書，2012年，頁317。

3 汪夢川：《雙照樓詩詞藁．後記》，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頁380-381。

4 余英時：《雙照樓詩詞藁．序》，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頁

11。

5 卜正民（Timothy Brook）：《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精英》，台北：遠流出版，2015年，頁19。

6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77。

7 菊池秀明：《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44。

8 轉引自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73。

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

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499。

10 汪精衛：《銑電》，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頁73。

11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114-115。

12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年，頁193。

13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277。

14 後來，周德偉在汪的幫助下赴英國留學，師從經濟學大師海耶克。汪精

衛投靠日本，周德偉即與之疏遠。再後來，周德偉隨國民政府遷居台灣，擔任財政部關務署署長，致力於外匯貿易改革。而周德偉的家「紫藤廬」在白色恐怖時代成為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心靈家園。周德偉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他晚年在美國寫成《落筆驚風雨》一書，是罕有的體現「汪派史觀」的代表作。

15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訓令及決議案》，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頁65。

16 轉引自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74。

17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

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82-383。

18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82-401。

19 余英時：《雙照樓詩詞藁序》，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頁26。

20 轉引自余英時：《雙照樓詩詞藁序》，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頁26。

2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499。

2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

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561。

23 龔固忠、唐振南、夏遠生主編：《毛澤東回湖南紀實》，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頁81。

24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79。

25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25-126。

26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5。

27 李志毓：《驚

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108-109。

28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238-239。

29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176-177。

30 卜正民（Timothy Brook）：《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精英》，頁18。

31 陳從周：《徐志摩：年譜與評述》，上海：上海書店，2008年，頁23-24。

32 轉引自余英時：《雙照樓詩詞藁序》；汪精衛：

《雙照樓詩詞藁》，頁28。

33 參閱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34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頁314-315。

35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28-29。

06 毛澤東：從筆桿子到槍桿子

1 張研：《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因何拒絕毛澤東特赦？》，見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63038363.html。

2 沈雁冰即左翼作家茅盾，中共建政之後曾出任文化部長。沈雁冰在其自傳中提及：「一九二五年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長。」

3 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台北：八旗文化，2014年，頁207。

4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349、頁344。

5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354-355、頁360、頁367。

6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體代表大會，毛澤東出任候補中央委員，隨後轉往上海執行部擔任秘書，負責辦理黨員入黨等文書工作，月薪一百二十大洋。依照《銀元時代生活史》記載，當年一般大學教授月薪八十大洋，北大、清華教授的月薪約為一百二十大洋，上海書店店員月薪約六塊大洋，白米一擔約四塊大洋。毛此前在北大圖書館做臨時工，月薪僅八塊大洋。換言之，毛的薪水在短短數年間攀升了十五倍，又怎能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呢？參閱《國民黨承認曾欠毛澤東720大洋薪水，還沒還不知道》，見《鳳凰網》，http://

news.ifeng.com/taiwan/3/detail_2013_08/30/29172621_0.shtml。

7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180。

8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首次發表於1927年3月《戰士》周刊第三十期。

9 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頁216。

10 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見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

北：聯經出版，1999年，頁51。

11 王汎森：《傅斯年》，台北：聯經出版，2013年，頁199-200。

12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頁33。

1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570。

1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762。

15 斯諾記錄：《毛澤東自傳》，香港：文林社，2001年，頁52-53。

16 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出版，1999年，頁332。

17 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頁118-119。

18 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見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頁50。

19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頁184。

20 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頁202。

21 唐德剛：《中國革命簡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14年，頁266。

22 松本一男：《毛澤東傳奇》，台北：新潮社，2004年，頁111。

23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頁222-223。

24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上卷），香港：香港月刊社，1978年，頁136-137。

25 三十多年後，毛澤東重回井岡山，假惺惺地召見袁的遺孀表示慰問，袁也獲得「革命烈士」的身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革命烈士並非被國民黨殺害的，而是被共產黨殺害的。

26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頁43-44。

27 唐德剛：《中國革命簡史》，頁270。

28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達比較分析》，頁306。

29 陳永發：《中共

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1998年，頁230。

30 美國學者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在《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中指出，井岡山上的「紅軍」在很長的時期內都是孤立於農民之外的，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將他們當作土匪來攻擊。

31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頁227。

32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頁217。

33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頁67。

34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頁229。

35 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頁217-218。

07 梁啟超：中國即將陸沉魚爛

1 《蕭公權先生序》，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長春：吉林出版社集團，2007年，頁1。

2 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28-229。

3 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312。

4 黃延復：《梁啟超治學雜拾》，《人物》雜誌，1985年第1期。

5 姜亮夫：《回憶錄》，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北：蘭台出版社，2013年，頁425-426。

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146。

7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10。

8 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5-7。

9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01。

1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09頁。

11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頁91。

12 葉曙明：《國會現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38。

13 荊知仁：《中國立憲史》，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頁347。

14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台北：聯經出版，2013年，頁217。

15 轉引自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台北：藝文印書館，1994年，頁778。

16 據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出版之《康有為》一書記載，康有為之死「與當時政治背景大有關系」。李雲光根據

康有為家人所說康有為飲一杯橙汁，認為是關鍵所在。「席上橙汁，非康一人獨飲，則蓄意謀害者，獨於康之一杯，陰下毒藥，亦非無可能。」見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頁786。

17 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頁787。

18 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頁791。

19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442。

20 潘強恩、吳申元、童麗：《被歷史遺忘的角落：梁啟超的新民學說與經濟思想》，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9年，頁52。

21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104-105頁。

22 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啟超家族的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16。

23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24。

24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25。

25 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啟超家族的文化史》，頁283。

2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

長編》，頁1107。

27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26。

28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22。

29 民國十四年，北京學界發生「蘇俄是不是我們的朋友」的爭論，梁啟超肯定地指出，蘇俄是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83。

30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129。

31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18。

32 鳳凰歷史：《梁啟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劇──民族的悲劇》，見「縱覽中國」網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35466。

08 胡適：敢向黨國爭人權

1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35。

2 白崇禧的軍隊進入上海時，胡適的美國朋友施考克寫信給他說：「你那出了名的不消五個月的預測似乎應驗了。我想上海的陷落，意味著張作霖、張宗昌的敗亡。」轉引自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之《日正當中》（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

382。

3 白吉庵：《胡適：真實的為我》，台北：五南出版，2013年，頁272。

4 顧頡剛致胡適信，轉引自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10。

5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42。

6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208。

7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之《日正當中》（下），頁381。

8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85。

9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之《日正當中》（下），頁441。

10 轉引自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頁286。

11 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年，頁169。

12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42-143。

13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台北：聯經出版，2004年，頁22。

14 周作人：《談虎集．怎麼說才好、人力車與斬決》，見《周作人全集》（第1冊），台北：藍燈文化公司，1992年，頁292-293。

15 周作人：《談虎集．怎麼說才好、人力車與斬決》，見《周作人全集》（第1冊），頁294-297。

16 增田涉：《魯迅傳》，轉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237。

17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

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378。

18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第2卷第6號。

19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民國採訪戰》，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2-123。

20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62-263。

21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頁144。

22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

子的選擇》，頁144。

23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頁294。

24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

25 黃堅立：《艱難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40。

26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頁306。

27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頁297。

28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頁57。

29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48。

30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頁58。

31 同時也與胡適旅居美國遇到重重困難有關。胡適一直沒有獲得一個穩定的教職，因而經濟壓力巨大。在美國大學當局眼中，他如同大而無用的「白象」。妻子江冬秀不懂英文，許多事情需要胡適親

自應付，如購買食品、郵寄信件、發電報、跑銀行、付賬單等。手邊缺乏足夠的參考書，也不可能僱用學術助理。當時胡適年過六旬，患有心臟病，購買醫療保險亦有困難。見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72-76。

32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頁334。

33 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轉引自潘光哲：《何妨是書生：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34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頁22-23。

35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頁346。

09 郭廷以：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1 據郭廷以的學生張朋園回憶，郭廷以住在紐約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公寓是自己買的，大概花了一萬多美金，只有一個臥房，以台北的居住標準來看，棲身而已。郭先生在美國的生活並不寬裕，他的待遇和那些大教授比起來，還差得遠，只夠他和師母生活。」對於從事人文研究的華人學者來說，美國確實居之不宜，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胡適，旅美期間亦遇到諸多生活困難。參閱《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4

年，頁250。

2 參閱《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253。

3 參閱《郭正昭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379-380。

4 參閱《郭正昭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380。

5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0。

6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

37。

7 胡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0-11。

8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41。

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270。

10 三谷孝：《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99。

11 廢止內戰大同盟會編：《四川內戰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86。

12 持槍權是基本人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美洲十三個殖民地之所以能打敗作為宗主國的英國，就是因為民眾擁有武器。獨立戰爭之初，美洲十三個自治領沒有正規軍，華盛頓率領的是一支被英軍瞧不起的、連統一制服和武器都沒有的民兵。所以，美國建立之後，即在憲法中確立了民眾的持槍權。近代以來，中國統治者總是千方百計剝奪民眾之持槍權，民眾以被規訓得不假思索地認為私人不可持槍，否則天下大亂。但若換個角度思考結論便迥異：倘若人人有槍，毛澤東還敢讓大饑荒氾濫全國並禁止農民外出逃荒、以致活活餓死嗎？鄧小

平還敢調動軍隊入城，大肆屠殺學生和市民嗎？如今，中共政權殘民以逞，並向人民灌輸「禁槍是為保障民眾安全」之謬論。

13 《郭秉文先生紀念集》，台北：中華學術院，1971年，轉引自東南大學校史館（網路版），http://history.seu.edu.cn/_t97/72/77/c2648a29303/page.htm。

14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頁91。

15 陳鑒：《憶二十年代中期東南大學易長風潮》，見東南大學校史館（網路版），http://history.seu.edu.cn/_t97/72/a3/c2650a29347/pagem.htm。

16 樂黛雲：《吳宓與東南大學》，見東南大學校史館（網路版），http://history.seu.edu.cn/_t97/72/83/c2648a29315/page.htm。

17 樂黛雲：《吳宓與東南大學》，見東南大學校史館（網路版），http://history.seu.edu.cn/_t97/72/83/c2648a29315/page.htm。

18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頁105。

19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397。

20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396。

21 胡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頁51。

22 胡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頁241。

23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434。

24 王鼎鈞：《關山奪路》，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頁276。

25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年，頁238。

26 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南寧：灕江出版社，2007年，頁358。

27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頁119。

28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6年，頁61。

29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頁63。

30 郭廷以口述、張朋園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傳》，頁120-121。

31 郭廷以的學生王聿均在回憶文章中指出，郭廷以在軍中短暫服務，軍銜由上尉升至中校。參閱《王聿均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4。

32 郭廷以的學生王聿均在回憶文章中指出，郭廷以和羅家倫的關係始於師生，後來又有同事之誼，再漸漸變成師友關係，到了晚年，尤其是到台灣之後，兩人完全是朋友關係了。在歷史研究方面，羅先生看事情多從大處著眼，觀察整個時代變化的軌跡與特徵，而郭先生則是特別注重細微的地方，在基礎上下功夫，從資料中獲得問題的結論。參閱《王聿均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4-5。

33 參閱《周道瞻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485-487。

34 參閱《廖隆盛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447。

35 參閱《林明德先生訪問紀錄》，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287。

36 轉引自呂實強：《郭（廷以）所長篳路藍縷創所與致辭風波》，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538。

37 美國學者魏斐德指出，在當時仍然生活在蔣氏獨裁政治桎梏之下的郭廷以和他的學生們，舉重若輕地在「壕

溝」內外往返自如。比如，他們把辛亥革命視為其實是一連串與日俱增的各省分治運動的整體呈現，而不認為是孫中山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間領導下的統一的政治革命。他們都摧破了國民黨政權合法性的神話學。參閱魏斐德：《遨遊史海：向導師郭廷以致敬》，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580-581。

10 劉大鵬：沒有詩情畫意的晴耕雨讀

1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122。

2 按照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標準，劉大鵬擁有的土地面積和僱用農工的數量介於富農和中農之間。共

產黨掌權之後，劉大鵬的長孫被劃為貧農，兩個賣地抽鴉片的兒子也被劃為貧農，而勤儉持家的另一個兒子則被劃為中農。劉大鵬的嫁入比較富有家庭的姐妹和女兒，則被劃為地主。參閱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7。

3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4。

4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頁212。

5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頁115。

6 閻百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百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頁743-744。

7 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8。

8 駱藝、黃柳青：《軍閥之國》（上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頁8。

9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84。

10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431。本文所引之劉大鵬日記均出自此書，以下不再一一標註。

11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頁1-2。

12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頁129。

13 羅志田：《權勢轉移》，（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71頁。

14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

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頁182-183。

15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頁293。

16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176-177。

17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頁15。

18 列文森（Lever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21-222。

19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2。

20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頁56-57。

21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頁240-241。

22 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34-36。

23 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皇

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頁251。

24 葉檀：《煤老闆現象如同一場瘟疫？》，見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special/sxmqcz/cjpl/20090924/1278976.shtml。

25 葉檀：《煤老闆現象如同一場瘟疫？》，見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special/sxmqcz/cjpl/20090924/1278976.shtml。

26 從2009年開始，山西實施了規模最大的煤企重組方案，小煤礦將被徹底終結，煤老闆退出歷史舞臺。山西省在《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提出，將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從2200

個變成100個左右，礦井數將由2598個壓縮到1000個。

27 劉家峰：《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04。

28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頁178-179。

29 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2。

30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77。

31 胡適：《這一週》，轉引自周明之：《胡適與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41。

32 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頁56。

33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頁3。

34 與閻錫山的寬容相比，八十多年之後的二十一世紀初，中原大省河南的衛生系統腐敗不堪，許多農民因為賣血，被不潔針頭感染上愛滋病，「愛滋病村」泛濫失控。當地一名女醫生高耀潔調查和揭露此真相，卻受

到河南各級官員之惡待，監視、軟禁、恐嚇，無所不用其極。高耀潔最終以八十高齡流亡美國。「新中國」的文明、氣度和法治，趕不上當年的閻錫山。

11 石美玉：救人身體，更救人靈魂

1 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頁55。

2 李亞丁：《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之石美玉》，見「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站，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

by-person/s/shi-meiyu.php。

3 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頁56。

4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87。

5 李傳斌：《非基督教運動時期的教會醫療事業》，見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19。

6 曲寧寧：《性別模塑：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婦女的角色建構》，見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頁223。

7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

8 陶飛亞、姚海鈞：《在華傳教士運動的內部檢討：以教務雜誌的醫療傳教士文章為例》，見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頁289。

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2001年，頁357。

10 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頁328。

11 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

12 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頁60。

13 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

頁260-261。

14 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頁3-4。

15 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頁344-346。

16 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第1版，頁63。

17 郭穎頤：《中國現代是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6。

18 奮興佈道家：十九世紀之歐陸及美國產生「奮興運動」，尤以美國影響深遠，出色領袖有芬尼、慕迪等。被稱作「奮興佈道家」的慕迪等人在各地舉行「奮興佈道會」，宣揚「教會大復興」。

19 參閱蔡蘇娟：《暗室之後》，香港：晨星出版社，1987年。

20 劉翼凌：《宋尚節傳》，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88年，頁132。

21 宋尚節：《靈歷集光：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恩雨出版部，1995年，頁27-28。

22 基要派：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

基督教新教內興起的一個運動，主張「聖經絕對無誤」，反對一切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基要派和現代派神學的爭論在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了，王明道、宋尚節是基要派的代表。直到今天，基要派仍然佔中國家庭教會的主流。

23 劉翼凌：《宋尚節傳》，頁62。

24 列文森（Lever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06-108。

25 北京《晨報》，1922年3月20日。

26 羅章龍：《憶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與邵振青》，載《新聞研究資料》第4輯。

27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一九二二ーー九二七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04。

28 葉仁昌《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系的分析》，台北：久久文化，1992年，頁82。

29 北京《晨報》，1922年3月31日。

30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253-254。

31 吳廷燮：《段祺瑞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4-125。

32 汪兆翔：《基督

教對應最近時局當有的態度和措施》，《文社月刊》第2卷第8期，1927年8月。

33 王冶心：《青天白日旗下的基督教》，《文社月刊》第2卷第6期，1927年6月。

34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27。

3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86-388。

36 岳謙厚、李衛平：《申報關於1927年南京事件報

導之分析》，《安徽史學》2012年第1期。

37 黃嶺峻：《誰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38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1版，頁319。

39 日本駐南京領事森岡正平在報告中指出：當天上午七點，數十名南軍士兵闖入日本領事館，開槍射傷領事館警察，並用槍托毆打不肯交出保險櫃鑰匙的領事館少校武官根本博。根本博更被人以刺刀刺傷，之後為了逃走而從二樓跳出，身受瀕死的重傷。（此人在二戰中任

日軍駐蒙司令，抗戰之後受蔣介石招募到台灣幫助訓練國民黨的潰敗軍隊，並指揮金門戰役。）整個日本領事館從領事室到傭人室、庫房等處都被澈底擄掠，達三小時之久。他們大聲喊──「打倒日、英帝國主義」、「華俄一家」、「日本人的財產是搶奪中國人的，把它搶回來」。接在後面，有遊民數百人也一湧而至，趁火打劫，甚至連地板、便器、空瓶都被拿走。參閱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390。

40 曲拯民：《創辦金陵大學的文懷恩博士》，見「翼報」網站，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90102。

41 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頁63-64。

12 盧作孚：北碚是建設未來中國的縮影

1 駱藝、黃柳青：《軍閥之國》（上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頁31。

2 國民黨改組派人物周德偉在回憶錄中評論說，蔣介石調大部分川軍出境，優其供給。如對日戰爭失敗，仍可以四川為根據地，陝甘黔為附庸，廣東為其支援。川軍劉湘為坐地虎，川軍不出，蔣氏終不敢入川。周德偉引三國故事來驗證此一論點：

法正不死，李嚴不調巴東，劉備終不敢出川征吳。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出版，2011年，頁417-418。

3 盧紀國：《我的父親盧作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68。

4 若干研究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著述，都未將北碚實驗納入其中，如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5 盧作孚：《建設中國的困難及其必循的道路》，見盧作孚：《盧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33-336。

6 學者張瑾認為，「北碚模式」的提法不失為一個具有量化標準的研究內陸地區現代化的概念。相對於同時代先進的中國人探索國家出路而言，盧作孚在北碚的建設頗具獨創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北碚的建設超越了鄉村建設的內涵，成為研究內陸中國現代化的特殊個案。見張瑾：《盧作孚「北碚模式」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重慶城市變遷》，《盧作孚研究》，2006年第1期。

7 李約瑟：《李約瑟遊記》，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96。

8 盧作孚：《我們要「變」，要「不斷地趕快變」！》，轉引自盧紀國：《我的父親盧作孚》，頁318。

9 翁文灝：《四川遊記》，《地學雜誌》，第20卷第1期。

10 《中國科學社第18次年會紀事》，《科學》，第18卷第1期，頁133。

11 轉引自盧紀國：《我的父親盧作孚》，頁321。

12 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34頁。

13 陶行知：《陶行之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頁322。

14 盧作孚：《國際交往與中國建設》，見盧作孚：《盧作孚自述》，合肥：時代出版、

安徽文藝，2013年，頁235。

15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頁92。

16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500-502。

17 廢止內戰大同盟編：《四川內戰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82-183。

18 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0。

19 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頁52-53、頁56。

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一九二七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年，頁446 - 447。

21 張瑾：《盧作孚「北碚模式」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重慶城市變遷》，《盧作孚研究》，2006年第1期。

22 盧紀國：《我的父親盧作孚》，頁184。

23 李家鈺生於筆者之故鄉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抗戰爆發之後，出川迎戰日軍，在山西、河南與日軍持久鏖

戰，以軍功升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李家鈺在陝縣秦家坡遭優勢兵力的日軍伏擊，身中數彈，壯烈殉國。國軍高級將領以集團軍總司令職殉國者，僅李家鈺與張自忠兩人而已。六月，國民政府追晉陸軍上將；八月，為之舉行國葬。李家鈺從軍多年仍兩袖清風、家徒四壁，與一般人對軍閥斂財無度的想像迥異。遺憾的是，李家鈺的家鄉至今未修葺其故居及設置紀念館。參閱國史館：《國史擬稿》第二輯之《李家鈺傳》（袁繼毓作），台北：國史館，1990年第1版），頁102。

24 盧紀國《我的父親盧作孚》，頁179。

25 盧作孚：《東北遊記》，見盧作孚：《盧作孚自

述》，頁108。

26 王芸生：《我們反對武力解決》，《大公報》，1946年5月20日。

27 吳比：《革命與生意：辛亥革命中的商業與商人命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61-162。

2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卷），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頁625。

29 錢理群：《盧作孚為什麼會自殺》，《炎黃春秋》雜誌，2014年第4期。

30 章立凡：《盧作孚：哀莫大於心死》，《財經》雜誌，2009年第12期。

31 錢理群《盧作孚為什麼會自殺》，《炎黃春秋》雜誌，2014年第4期。

32 補充一段與今日北碚有關的花絮：2012年，一網站發表文章、圖片及視頻鏈結，稱「重慶北碚區委書記包養情婦並與之淫亂」。這段雷政富與趙紅霞的性愛視頻爆紅網路，被線民稱為中共官員性醜聞之最。數日後，中共重慶市紀委通報，不雅視頻中的男性確為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對雷政富作出免職處理並對其立案調查。從不雅視頻在互聯網曝光到其被免職調查，前後僅63個小時，被網民稱為「秒殺」。2013年6月28日，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對雷政富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雷政富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

3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追繳雷政富受賄贓款316萬餘元。從盧作孚到雷政富，八十多年來，北碚主政者素質之退化，讓人咋舌。而北碚主政者素質之退化，乃是整個中國主政者素質退化之縮影。

13 張幼儀：在塵埃中綻放的花朵

1 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台北：衛城出版，2015年，頁84。

2 朱雲喬：《張幼儀傳》，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年，頁165。

3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朋友、美國學者費慰梅認為，林徽因並未愛過徐志摩，林視徐為老師和大哥的角色：「在多年以後聽她

講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記憶總是和文學大師們聯繫在一起—雪萊、濟慈、拜倫、凱薩琳．曼斯費爾德、維吉尼亞．沃爾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來, 在她的摯愛中他可能承擔了教師和指導者的角色，把她導入英國的詩歌和戲劇的世界。」參閱費慰梅《中國建築之魂》，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

4 劉海粟：《存天閣談藝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頁201。

5 陳從周：《徐志摩：年譜與評述》，上海：上海書店，2008年，頁71。

6 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頁251。

7 張邦梅、張幼儀：《小腳與西服》，台北：智庫出版，1996年，頁204。

8 張邦梅、張幼儀：《小腳與西服》，頁204。

9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一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頁405-406。

10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73。

11 十三叔：《民國陳光甫：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35-236。

12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60。

13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一冊），頁414-415。

14 張邦梅、張幼儀：《小腳與西服》，頁204。

15 朱雲喬：《張幼儀傳》，頁203。

16 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頁337。

17 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頁253。

18 張邦梅、張幼儀：《小腳與西服》，頁206。

19 張邦梅、張幼儀：《小腳與西服》，頁206。

20 朱雲喬：《張幼儀傳》，頁220-221。

21 徐志摩：《歐遊漫錄》，見《徐志摩全集》第三卷，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頁269。

22 徐志摩：《歐遊漫錄》，見《徐志

摩全集》第三卷，頁288。

23 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182。

24 徐志摩：《又從蘇俄回來講到副刊》，見《徐志摩全集》第三卷，頁337。

25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6。

26 張邦梅、張幼儀：《小腳與西服》，頁201。

14 陳光甫：自命為「新士人」的銀行家

1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15。

2 陳光甫：《一九二七年下期發告同仁書》，見傅國涌、周振新編著：《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頁2-3。

3 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1。

4 吳相湘：《陳光甫服務社會》，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42。

5 趙映林：《赫德掌控晚清海關始末》，見《傳記文

學》雜誌，2016年8月號。

6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頁441。

7 姚崧齡：《陳光甫的一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4-5。

8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二冊），頁443。

9 吳經硯、資耀華：《陳光甫與上海銀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232。

10 傅國涌、周振新編著：《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頁230

11 吳經硯、資耀華：《陳光甫與上海銀行》，頁82。

12 傅國涌、周振新編著：《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頁232。

13 陳光甫：《一九三○年十月二日與行員聚餐談話》，見傅國涌、周振新編著：《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頁18。

14 上海市檔案館編輯：《陳光甫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33。

15 十二叔：《民國陳光甫：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79。

16 周振新：《一代銀行家陳光甫》，見傅國涌、周振新編著：《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頁244-245。

17 十二叔：《民國陳光甫：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頁183。

18 高陽：《陳光甫外傳》，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頁209。

19 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頁477-478。

20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頁258-259。

21 高陽：《陳光甫外傳》，頁209。

22 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台北：衛城出版，2015年，頁13。

23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904。

24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頁158。

25 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83。

26 上海市檔案館編輯：《陳光甫日記》，頁50。

27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03。

28 高陽：《陳光甫外傳》，頁232-233。

29 戴鴻超：《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出版，2015年，頁161-162。

30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頁323-325。

31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頁262。

32 十二叔：《民國陳光甫：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頁228。

15 李大釗：迷途不知返，走上絞刑架

1 李潔：《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47-148。

2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227。

3 中共在文革期間槍殺持不同政見者林昭，公安部門向林昭的母親討要五分錢子彈費，致使林昭的母親發瘋慘死。對比之下，北洋政府對李大釗堪稱仁慈。

4 李潔：《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頁246。

5 李潔：《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頁246-247。

6 朱志敏：《李大釗傳》，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年，頁7-9。

7 蔡登山：《叛國者與親日文人》，台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33-34。

8 蔡曉濱：《巨流下的叛逆者：改變民初歷史的九位革命家》，台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251。

9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29-230。

10 朱志敏：《李大釗傳》，頁244。

11 朱志敏：《李大釗傳》，頁291。

12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頁11-12。

13 傑羅姆．B．格里德爾（J.B.Grieder）：《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61。

14 一九五○年代末至一九六○年代初的大饑荒，至少餓死三千多萬人，甚

至出現大量人吃人之慘劇。相關研究著作有：楊繼繩《墓碑》、馮客（Frank Dikoe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伊娃《尋找人吃人見證》等。

15 一九一九年七月，加拉罕對中國發表《加拉罕宣言》，聲明放棄俄羅斯帝國時期對華簽署的不平等條約，然而此宣言並無國際法意義，最終被史達林否決。

16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39-340。

17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夫

婦遁入美國駐北京使館；二○一二年，中國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遁入美國駐北京使館。中共官媒媒體均指責說，他們是勾結西方勢力的賣國賊，卻忘記了同樣的邏輯可以套在李大釗身上。

18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54。

19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民國採訪戰》，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5。

20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220。

21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民國採訪戰》，頁45。

22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頁231-232。

23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23。

24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頁155。

25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24。

26 朱志敏：《李大釗傳》，頁353。

27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30。

2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614-616。

29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24。

30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24。

31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25。

32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26。

33 李潔：《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頁242-243。

34 當時即有學者撰文論及張作霖在北京抓捕共黨與蔣介石在上海等地清黨之間的相關性，如田鵬之《從俄使館案至國民黨清黨》，參閱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580。

35 傑羅姆．B．格里德爾（J.B.Grieder）：《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頁379。

16 汪壽華：五四青年／青幫頭目／工運領袖

1 章君穀：《杜月笙傳》（第二冊），台北：傳記

文學出版公司，1968年，頁14。

2 章君穀：《杜月笙傳》（第二冊），頁15。

3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20-121。

4 三谷孝：《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3-4。

5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

6 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10。

7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97。

8 《汪壽華日記》，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整理。

9 汪壽華：《日本棉紗業在中國之發展》，載於《民國日報》之《覺悟》副刊，1925年8月15日。

10 《汪壽華傳》，《犧牲》第一集，上海：中國濟難全國總會編印，1929年。

11 黃美真：《汪壽

華傳略》，內部資料。

12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83。

13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頁2-3。

14 三谷孝：《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頁24。

15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頁87。

16 《汪壽華傳》，《犧牲》第一集。

17 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

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42。

18 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63。

19 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49。

20 上海總工會拒絕執行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的命令，並得到武漢方面的背書。武漢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在本黨未組織黨的憲兵維持革命秩序時，承認糾察隊為維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軍政長官有任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參閱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

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660。

21 黃美真：《汪壽華傳略》，內部資料。

22 章君穀：《杜月笙傳》（第二冊），頁10。

23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140。

24 約翰．本傑明．鮑惠爾（John B. Powll）：《在中國二十五年》，頁139。

25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頁90。

26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頁146-147。

27 三谷孝：《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頁25。

28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頁106-107。

29 帥學富：《中國幫會史》，香港：現代出版公司，1961年，頁8-9。

30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中國革命》，頁91。

31 參閱羅章龍：《亢齋文存：羅章龍回憶錄》，美國：溪流出版社，

2005年。

32 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32。

33 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頁237

34 王彬彬：《顧順章叛變之後》，見王彬彬：《並未遠去的背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6。

35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頁109-110。

36 左翼作家丁玲被捕後，顧順章曾前去勸降，丁玲記載說：「顧順章每次都擺出同我們是老鄰居，像串門的樣

子……他來了就講一點社會新聞，他對社會人情講得頭頭是道。他講生意，講買賣，顯得精明；他玩魔術，手法乾淨。他也講他的歷史，掩飾自己，說他並沒有出賣共產黨。說黨對他發生了一場無可避免的誤會。他裝出一種不怨天，不尤人的樣子。他還講他的將來，說將來要退出政治舞台，到農村去，興辦農場、講求實業，可以由小到大。……有一天，他在外廳催眠了一個看守。我不懂催眠術，但那個看守的確被催眠過去，他完全依從他，聽他命令，做他平日不能做的，一個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隨後這個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動彈，一點也不知道他被催眠過去後所講的話和所做過的事。這種情形是令人心驚的。」見丁玲：《魍魎世界．顧順章的出現》，轉引自王彬彬：《並未遠去的背影》，頁

33。

37 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頁251。

38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上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56。

39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上冊），頁811-812。

40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上冊），頁258。

41 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從文革到重慶模式》，台北：聯經出版，2013年，頁112。

42 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從文革到重慶模式》，頁112。

17 王國維：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1 柏生（劉節）：《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見《王國維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310-314。

2 柏生（劉節）《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見《王國維全集》（第20卷），頁310-314。

3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45。

4 陳鴻祥：《王國

維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頁275。

5 康來新等合編：《劉吶鷗全集．日記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頁396。

6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2009年，頁304。

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775。

8 吳宓：《吳宓日記》（第三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4-5。

9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64-265。

10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北：蘭台出版社，2013年，頁322。

11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頁21-22。

12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69。

13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頁36。

14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頁35。

15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68。

16 參閱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380-395。

17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81-82。

18 姜亮夫：《回憶錄》，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25-426。

19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78。

20 顧頡剛：《悼靜安先生》，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17-419。

21 王世昭：《中國文人新論》，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16-417。

22 一九一○年春，長沙發生搶米風潮，葉德輝因有穀不售，被清廷革

職，從此喪失了對湖南省政「陰移暗轉」的權勢。一九一三年，他嘲諷長沙坡子街改名為「黃興街」，被唐才常之子唐蟒派兵捉拿。一九一四年，他又被湖南都督湯薌銘追捕。一九一五年，他出任湖南教育會會長和湖南經學會會長，掀起尊孔讀經運動；又任籌安會湖南分會會長，幫助袁世凱營造稱帝輿論。袁世凱稱帝失敗後，為避禍赴蘇州參與刊刻《四部叢刊》，直到一九二二年才返回長沙。一九二四年，他又因反對湖南省憲運動，被省議會目為「毀憲分子」，派兵捉拿。然而，每次葉德輝都能轉危為安。

23 鹽谷溫：《先師葉園先生追悼記》，轉引自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305。

24 鹽谷溫：《先師葉園先生追悼記》，轉引自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頁305。

2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276。

26 《王國維全集》（第20卷），頁260。

27 《王國維全集》（第20卷），頁218。

28 劉季倫：《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詩箋證稿》，見《東嶽論叢》，2014 年5 月號。

29 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07-409。

30 史達：《王靜安先生致死的真因》，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15。

31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65。

32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79。

33 鈴木虎雄：《追憶王靜安》，日本《藝文》第十八年第八號，頁54。

34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95。

35 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頁322。

36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05。

37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68-269。

38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314。

39 周錫山編：《王國維集．前記》（第一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40 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頁360。

1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台北：聯經出版，2013年，頁56-57。

2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45。

3 唐丹鴻：《西藏問題：餓虎飢狼的獵物》，見「縱覽中國」網站，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68795。

4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

頁61。

5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北：台灣圖博之友會，2001年，頁19－20。

6 邁可爾．C．范沃爾．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台北：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2008年，頁90。

7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頁61。

8 邁可爾．C．范沃爾．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

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頁89-90。

9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頁63-64。

10 邁可爾．C．范沃爾．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頁88-89。

11 這種看法被很多藏人所接受，也有學者不完全認同。藏族學者茨仁夏加認為，僅僅用喇嘛與施主的關係來界定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不夠的。西藏人過去將中國的皇帝視為宗教與世俗兩者兼具的制度，在藏文的史料中，清朝皇帝一直被稱

為文殊菩薩的轉世化身，對他的定義，不只是世俗的施主而已，也在佛教的眾神之中佔有一席之地，對於西藏行使一定程度的世俗權力。但清朝皇帝滿足於儀式性與象徵性的臣服，並未試圖將西藏與中國融合在一起。參閱茨仁夏加：《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台北：左岸文化，2011年，頁15。

12 嘉央諾布：《獨立的西藏：一些事實》，http://www.rangzen.net/rangzen-facts/%E7%8D%A8%E7%AB%8B%E7%9A%84%E8%A5%BF%E8%97%8F%EF%BC%8D%E4%B8%80%E4%BA%9B%E4%BA%8B%E5%AF%A6/。

13 嘉央諾布：《獨立的西藏：一些事實》，http://

www.rangzen.net/rangzen-facts/%E7%8D%A8%E7%AB%8B%E7%9A%84%E8%A5%BF%E8%97%8F%EF%BC%8D%E4%B8%80%E4%BA%9B%E4%BA%8B%E5%AF%A6/。

14 擦絨．占堆朗傑：《報效國家：西藏軍司令長官擦絨．達桑占堆傳記》，美國：雪獅出版社，2000年，頁62。

15 湯瑪斯．賴爾德（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台北：聯經出版，2008年，頁226。

16 圖登嘉措派龍廈攜四名中等階級子弟赴英國留學，宛如清廷派容閎攜若干幼童赴美留學。其中，仁崗學電

機、吉卜學電報、門沖學採礦、崗卡學軍事。見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年，頁475-476。

17 《歷代達賴喇嘛簡傳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官方國際華文網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132。

18 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頁479。

19 喜饒尼瑪、蘇發祥：《蒙藏委員會檔案中的西藏事務》，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71。

20 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

頁477。

21 劉曼卿雖然被後人演繹成「藏地女欽差」乃至「中藏友好」、「西藏屬於中國」的見證，但從她進入西藏的過程就可以發現，雖然她是南京政府的「特使」，要入境西藏仍然必須得到西藏當局的同意，甚至不得不在川藏邊境等候數十天之久。參閱丁小文：《民國藏地「女欽差」：劉曼卿傳》，北京：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年。

22 湯瑪斯．賴爾德（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頁232。

23 喜饒尼瑪、蘇發祥：《蒙藏委員會檔案中的西藏事務》，頁200－204。

24 湯瑪斯．賴爾德：《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頁233。

25 邁可爾．C．范沃爾．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頁89。

26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頁68。

27 轉引自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頁474。

28 轉引自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頁475。

29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頁90-92。

30 中華民國的一個高級考察團在關於西藏的考察報告中指出，西藏社會可以用四句話概括，「宗教至上，階級森嚴，貴族專政，民生困苦」。報告認為：「西藏實為一神權支配下之社會，人民知識落後，惟知迷信宗教，少數貴族乃利用宗教勢力，以造成一般人民之階級觀念與安命心理，雖受無窮痛苦而莫自拔。然則如何提高西藏之文化，改善藏民之生活，是皆我中央政府之責任也。」雖然該報告不無中國中心主義的傾向，但其所指出的西藏社會的問題，仍頗具參考價值。參閱黃慕松、吳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北京：中國

藏學出版社，1993年，頁157 - 159。

31 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頁502。

32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頁139。

33 茨仁夏加：《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頁75。

34 湯瑪斯．賴爾德（Thomas Laird）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頁234。

35 山口瑞鳳：《西藏》（下），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3年，頁547。

36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安道（Andrew Scobell）：《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台北：左岸文化，2013年，頁60。

37 邁可爾．C．范沃爾．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頁97-98。

38 牙含章：《達賴喇嘛轉世傳奇》，頁505-506。

39 參閱蘇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轉型》，台北：商鼎數位出版，2012年。

40 李西潭：《來自達蘭薩拉的四道光芒：宗教、道德、生態與文化》，見

「縱覽中國」網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aspx?AID＝126240。

19 穆罕默德．伊敏：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1 王子純：《楊增新軼聞》，見《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79）。

2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7。

3 彭武麟：《評楊增新主政新疆17年》，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4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頁381。

5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18。

6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頁389-390。

7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頁118。

8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70-271。

9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頁393。

10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頁

283-284。

11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頁398。

12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272。

13 參閱林文凱：「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見「歷史學柑仔店」網站，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5/「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html。

14 參閱林文凱：「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見「歷史學柑仔店」網站，http://kam-a-tiam.typepad.com/

blog/2016/05/「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html。

15 張來儀：《俄國1905年：泛突厥主義從文化宣傳轉向政治行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環球市場訊息導報》網站，http://ems86.com/touzi/html/?19918.html。

16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頁30-31。

17 張來儀：《俄國1905年：泛突厥主義從文化宣傳轉向政治行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環球市場訊息導報》網站，http://ems86.com/touzi/html/?19918.html。

18 參閱林文凱：「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見「歷史學柑仔店」網站，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5/「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html。

19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頁39。

20 伊利夏提：《薩比特．大毛拉．阿卜杜巴克．卡瑪利：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設計師》，見「博訊」網，http://dzdskxsytkube.cloudfront.net/0/?url＝bG10aHMuMV80L2Zsb3cvMTExMTAyL29yZV

21 尼爾斯．安博特：《駝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72-173。

22 伊利夏提：《薩比特·大毛拉·阿卜杜巴克·卡瑪利：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設計師》，見「博訊網」，http://dzdskxsytkube.cloudfront.net/0/?url=bG10aHMuMV80L2Zsb3cvMTExMTAyL29yZW

23 伊利夏提：《薩比特·大毛拉·阿卜杜巴克·卡瑪利：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設計師》，見「博訊網」，http://dzdskxsytkube.cloudfront.net/0/?url=bG10aHMuMV80L2Zsb3cvMTExMTAyL29yZW

24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頁35。

25 《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霍加·尼亞孜·阿吉寫給英國國王的信》，伊利夏提翻譯，見「博訊網」，http://dzdskxsytkube.cloudfront.net/0/?

url＝bG10aHMuMV8wMS9mbG93LzMwMTEwMi9

26 伊利夏提：《薩比特·大毛拉·阿卜杜巴克·卡瑪利：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設計師》，見「博訊網」，http://dzdskxsytkube.cloudfront.net/0/?url＝bG10aHMuMV80L2Zsb3cvMTExMTAyL29yZW

27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頁298。

28 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者認為，蘇聯在民族問題上走入了死胡同。蘇聯當局一方面宣傳「民族自決原則」，按民族屬性劃分行政區域，另一方面又過分強調無產階級族際主義原則，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各民族的權利得不到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受到國家共同性的威脅，積聚了許多不滿和怨恨。參閱沈志華主編：

《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205-1206。

29 參閱林文凱：「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見「歷史學柑仔店」網站，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5/「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html。

30 戴維森（Roderic H. Davison）：《從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現代化之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頁165。

20 川島芳子：無國可愛，無家可歸

1 李約翰（John Gibbert Reid）：

《清帝遜位與列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445。

2 李約翰（John Gibbert Reid）：《清帝遜位與列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外交插曲》，頁423-425。

3 宮脇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頁63。

4 劉仲敬：《從華夏到中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83-184。

5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頁

50。

6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頁232

7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68。

8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97。

9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81。

10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82-83。

11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頁162。

12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103。

13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248。

14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111。

15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249。

16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125-126。

17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128。

18 賀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裕仁天皇》，台北：時報出版，2002年，頁152-153。

19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2009年，頁25。

20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197。

21 馮學榮：《日本為什麼侵華：中日交惡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頁204-205。

22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164。

23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261。

24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87。

25 上坂冬子：《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131-132。

26 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頁134。

27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236。

28 張季鸞為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作之序言，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13。

29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八卷），頁141-142。

30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的縮影》，台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55。

31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的縮影》，頁6。

32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39。

33 參閱王慶祥主編：《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34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264。

21 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

1 札奇斯欽：《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1985年，頁32。

2 札奇斯欽：《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頁33。

3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的終結》，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頁272。

4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的終結》，頁283。

5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到王權與天下秩序》，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9、

82。

6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87頁。

7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76。

8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39。

9 常寶：《蒙古地區近當代「民族」概念及其社會認同》，見《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10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頁145。

11 德力格爾主編：《哲里木史話》，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5年，頁380。

12 周竟紅：《蒙古民族問題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37。

13 所謂「外蒙」、「內蒙」，是由「中原中心主義」或「北京中心主義」的帝國政治地理學術語，離帝國中樞近者為「內」，離帝國中樞遠者為「外」。筆者拒絕採取此種命名方式，更傾向於使用中性的「北蒙古」和「南蒙

古」的概念。

14 吳恩和、邢復禮：《貢桑諾爾布》，見《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1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13。

15 札奇斯欽：《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頁1。

16 札奇斯欽：《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頁2。

17 高永厚：《蘇尼特右旗往事》，見「南蒙古時事評論網」，https://smglnc.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3329.html。

18 札奇斯欽：《我

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頁26。

19 高永厚：《蘇尼特右旗往事》，見「南蒙古時事評論網」，https://smglnc.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3329.html。

20 札奇斯欽：《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頁22-23。

21 馮克（Frank Dikotter）：《近代中國之宗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00。

22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頁162-163。

23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頁168-169。

24 豬木正道：《吉田茂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頁345。

25 原彬久：《吉田茂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52-53。

26 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13年，頁297-298。

22 劉吶鷗：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1 馬克斯．布羅德：《灰色的寒鴉：卡夫卡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頁143-144。

2 康來新等合編：《劉吶鷗全集．日記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本文所引用之劉吶鷗日記內容，均來自此書，以下不再標註。

3 許秦蓁：《專訪上海施蟄存談劉吶鷗》，見康來新、許秦蓁編選：《台灣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年，頁124。

4 劉吶鷗，原名為劉燦波。松崎啟次為日本電影業者，與劉吶鷗有多次合作。松崎啟次：《劉燦波槍擊》，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頁258。

5 半藤一利：《昭

和史》（上），台北：玉山社，2015年，頁33-34。

6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公會堂舉行臨時會議，出席會員一百三十三人，屬於連溫卿派的左翼青年佔大多數。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連溫卿派十一人當選。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相繼退出，向來從事民族主義文化啟蒙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一變而成為階級鬥爭的團體。參閱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26-27。

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194-195。

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台史所，2004年，頁221-222。

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紀要》（一九二七一至六月份），頁659-661。

10 彭小妍：《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見《中國文史研究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1998年，頁3。

11 費成康：《上海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230-231。

12 彭小妍：《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見

《中國文史研究集刊》，頁18。

13 彭小妍：《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見《中國文史研究集刊》，頁19。

14 傅葆石：《灰色上海，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214。

15 彭小妍：《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見《中國文史研究集刊》，頁34。

16 藤井省三：《台灣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眼中的一九二七年政治與性事：論日本短篇小說集〈色情文化〉中的中國語譯》，見康來新、許秦蓁編選：《台灣現代作

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頁148。

17 藤井省三：《台灣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眼中的一九二七年政治與性事：論日本短篇小說集〈色情文化〉中的中國語譯》，見康來新、許秦蓁編選：《台灣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頁159。

18 隋初：《我所認識的劉吶鷗先生》，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251。

19 李歐梵：《臉、身體和城市》，見康來新、許秦蓁編選：《台灣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頁190。

20 李黛顰：《經驗／驚艷上海：新感覺派的都市書寫》，見《劉吶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5年，頁256。

21 李道明：《劉吶鷗的電影美學觀》，見康來新、許秦蓁編選：《台灣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頁230。

22 黃鋼：《劉吶鷗之路：回憶一個高貴人，他的低賤的殉身》，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304。

23 黃鋼：《劉吶鷗之路：回憶一個高貴人，他的低賤的殉身》，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295

24 彭小妍：《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見《中國文史研究集刊》，頁4。

25 彭小妍：《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見《中國文史研究集刊》，頁15。

26 松崎啟次：《劉燦波槍擊》，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257。

27 蔡登山：《叛國者與親日文人》，台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367。

28 翁靈文：《劉吶鷗其人其事》，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318。

29 松崎啟次：《劉燦波槍擊》，見康來新

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292-293。

30 劉漢中：《我的父親劉吶鷗》，見康來新、許秦蓁編選：《台灣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頁78。

31 松崎啟次：《劉燦波槍擊》，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255。

32 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81。

33 隋初：《我所認識的劉吶鷗先生》，見康來新等編：《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253-254。

23 鮑羅廷：揮舞紅布的鬥牛士

1 安妮．阿普爾鮑姆：《古拉格：一部歷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頁511。

2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鮑羅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571。

3 曾成貴：《弄潮：鮑羅廷在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37。

4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698-1699。

5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鮑羅

廷》，頁29-32。

6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頁1831。

7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南寧：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頁210。

8 鮑羅廷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對孫文的評價相當不堪：「孫中山身上重重矛盾，對中國的國民運動極其有害，而要掙脫出來也極其困難。……他猶如一個水珠，可以折射出國民黨內部，從共產黨人到新加坡商人，形形色色的成分和魚龍混雜的情況。……有時，他的話極其革命，比我們共產黨還革命。有時，他把革命的詞藻忘得一乾二淨，

淪為小資產階級市儈。忽而他大發雷霆，氣勢洶洶地反對帝國主義，忽而他又對美國公使說，美國人應當干預中國事務，卻不惜背叛本國的真正民族利益。」參閱《第111號文件：鮑羅廷筆記和報告記錄摘要》，見李玉珍編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台北：東大圖書，1997年，頁351-353。

9 鮑羅廷離開中國之後，張太雷成為中共黨內主張武裝暴動的激進派，在一九二七年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十二月十一日，張太雷領導廣州暴動。次日下午兩點，張太雷與共產國際代表海因茨．紐曼乘坐一輛敞篷汽車，在大北門附近遭市民武裝槍擊，身中三彈，倒在車內身亡。

10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頁215。

11 《加拉罕致契切林的信》，見李玉珍編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頁337-338。

12 胡適日記，轉引自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81。

13 列文森（Lever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31。

14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頁

2131-2132。

15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184-185。

1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651。

17 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頁170。

18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鮑羅廷》，頁375。

19 陶涵（Jay Taylor）：《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台

北：時報出版，2010年，頁82。

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648-650。

2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頁212。

22 曾成貴：《弄潮：鮑羅廷在中國》，頁74。

23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頁185-186。

2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

一至六月份），頁651。

25 姚金榮：《解密檔案中的陳獨秀》，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頁26。

26 唐寶林：《陳獨秀大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98。

27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29。

28 姚金榮：《解密檔案中的陳獨秀》，頁346。

29 阿明布和：《晚年陳獨秀與蘇聯經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81-182。

30 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上），頁146-151。

31 曾成貴：《弄潮：鮑羅廷在中國》，頁308。

3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252。

33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頁216。

34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頁234。

35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鮑羅

廷》，頁544-546。

3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頁652。

37 薛衔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上），頁200。

38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鮑羅廷》，頁569-571。

39 維克托．烏索夫：《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頁253。

24 金文泰：深受港人愛戴的「使君」

1 劉曉波：《從六四到○八》（劉曉

波文集第一卷），台北：主流出版，2016年，頁47。

2 劉曉波：《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文集第二卷），台北：主流出版，2016年，頁294。

3 范克：《香港人最懷念的是……》，見《蘋果日報》（香港）網站，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05/18856544。

4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頁244。

5 《第111號文件：鮑羅廷筆記和報告記錄摘要》，見李玉珍編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台北：東大圖書，1997年，頁349。

6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623。

7 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頁120。

8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37。

9 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香港憲章》（Hong Kong Charter）由英國國璽大臣以《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的名義發佈，其內容包括：確定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權；制定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總督的權力；規定設立行政及立法兩局。

關於港督的權力，在「殖民地規例」中明確指出：「總督是殖民地唯一最高權力者，他須向英皇負責，也是英皇的代表……所有軍事及民職人員必須向他效忠服從。」戰後任期最長的港督葛亮洪曾說過：「在一個殖民地裡，總督的權威僅次於上帝。」參閱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76-77。

10 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總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357。

1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37。

12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圓桌文化，2015

年，頁237。

13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38。

14「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委員長為共產黨員蘇兆徵，顧問包括共產黨員鄧中夏和國民黨左派廖仲愷、汪精衛。因此，省港大罷工實際上是中共策劃的一次反英的政治性罷工。

15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39。

16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頁238。

17 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89。

18 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22。

19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頁239。

20 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06年，頁268。

21 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頁264。

22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5-26。

23 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08。

24 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頁261-262。

25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41。

26 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頁262。

27 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總結》，頁301。

28 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上冊），頁102。

29 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03。

30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45。

3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240-241。

32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頁241。

33 香港大學學苑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3年，頁20。

1 阿爾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龍旗的美國大兵：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在中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63-64。

2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41。

3 《赫伯特．胡佛：青年採礦工程師在中國》，見《新交流》雜誌，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jl0200_hocver.html。

4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

中心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1996年，頁196-198。

5 阿爾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龍旗的美國大兵：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在中國》，頁100。

6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頁112。

7 駱藝、黃柳青編：《軍閥之國》（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頁37-38。

8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頁117

9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頁8。

10 阿爾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龍旗的美國大兵：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在中國》，頁102。

1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南寧：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頁272。

12 方德萬為蔣介石政權辯護，竭力貶低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地位和貢獻，認為「史迪威算不上什麼重要的軍事領袖，由他負責的行動也無足輕

重」，並且「史迪威的地位取決於別人對他的利用」。這一評價不符合歷史事實。僅舉一例即可反駁之：若非滇緬公路（史迪威公路）作為中國的生命線，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不可能長期支撐下去。方德萬（Hans J.van de Ven）：《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73、183。

13 葉名琛：鴉片戰爭中，「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總督」，被英軍俘虜後囚死於印度。

14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頁293。

15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頁288。

16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頁293。

17 歷史學家張玉法即認為，蔣介石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是因為史迪威「僅注意緬甸戰場，置中國戰場安危不顧」。參閱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1999年，頁408。

18 戴鴻超：《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出版，2016年，頁269-271。

19 轉引自張瑞德：《山河劫：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1-2。

20 沈克勤：《孫立人傳》（上），台北：學生書局，1998年，頁47-57。

21 曹瑪莉（Margherita Zanasi）：《經濟民族主義：30年代國民黨國家的經濟建設計劃》，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施恩德（Andre Schmid）編：《民族的建構：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頁146-147。

22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116。

23 吉爾伯特．羅茲曼（Gibert Rozman）主編：《中國的現代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63-364。

24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頁540。

25 李約翰（John Gibbert Reid）：《清帝遜位與列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370。

26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頁253-254。

27 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頁80。

另眼看歷史26

1927：民國之死

作　　者　余杰

編　　輯　王家軒

校　　對　陳佩伶

特約校對　趙冰檗

地圖繪製　黃清琦

封面設計　李東記

企　　劃　蔡慧華

總 編 輯　富　察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發行　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　號9　樓

電　　話　02-22181417

傳　　真　02-86671065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信　　箱　gusa0601@gmail.com

Facebook　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

Blog　gusapublishing.blogspot.com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印　　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定　　價　550元

二版一刷　2019年（民108）04 月

ISBN　978-957-8654-6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天下已逝，邦國難成

第一卷　武人的落幕

吳佩孚：五色旗才是真民國

孫傳芳：曇花一現的「東南五省門羅主義」

張作霖：「好總督」與「壞國王」

第二卷　黨人的崛起

蔣介石：危機四伏的巔峰時刻

汪精衛：縱橫憂患今方始

毛澤東：從筆桿子到槍桿子

第三卷　文人的異議

梁啟超：中國即將陸沉魚爛

胡適：敢向黨國爭人權

郭廷以：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第四卷　庶民的活力

劉大鵬：沒有詩情畫意的晴耕雨讀

石美玉：救人身體，更救人靈魂

盧作孚：北碚是建設未來中國的縮影

張幼儀：在塵埃中綻放的花朵

陳光甫：自命為「新士人」的銀行家

第五卷　逝者的證詞

李大釗：迷途不知返，走上絞刑架

汪壽華：五四青年／青幫頭目／工運領袖

王國維：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第六卷　鄰人的呼吸

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現代化的展開與頓挫

穆罕默德．伊敏：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川島芳子：無國可愛，無家可歸

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

劉吶鷗：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第七卷　外人的影子

鮑羅廷：揮舞紅布的鬥牛士

金文泰：深受港人愛戴的「使君」

史迪威：當美國鷹遇到中國龍

注釋